

序本

Raymond Aron

Mémoires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我相信，我已经说出了基本事实。

雷蒙·阿隆回忆录

【下】

增订本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魁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增订本

Raymond Aron

Mémoires 雷蒙·阿隆回忆录

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下】

【法】雷蒙·阿隆 著

杨祖功 王甦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雷蒙·阿隆回忆录：全2册 / (法)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著；杨祖功，王甦译。--增订本。--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7

书名原文：Mémoires：édition intégrale inédite

ISBN 978 - 7 - 5097 - 9589 - 7

I. ①雷… II. ①雷… ②杨… ③王… III. ①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1905—1983) - 回忆录 IV. ①K835.65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6654 号

雷蒙·阿隆回忆录 (增订本) (上、下)

著 者 / [法]雷蒙·阿隆 (Raymond Aron)

译 者 / 杨祖功 王 甦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董风云 段其刚

责任编辑 / 段其刚 甘欢欢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 (010) 59366551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38 字 数：882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589 - 7

著作权合同 / 图字 01 - 2012 - 8029 号

登 记 号

定 价 / 168.00 元 (上、下)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上 册

序言 雷蒙·阿隆和普世史的时代	0001
增订本出版说明	0029
前言 雷蒙·阿隆和他的《回忆录》	0030

第一部 政治教育 (1905 ~ 1939)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0003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0030
第三章 发现德国	0066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0110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0147
第六章 浩劫之路	0187

第二部 政治愿望 (1939 ~ 1955)

第七章 战争	0229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0277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0313
第十章 瓜分欧洲	0355
第十一章 20 世纪的战争	0402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0435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 ~ 1969）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0477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0506

下 册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0561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0595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0641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 或 1968 年 5 月	0667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0707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 ~ 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0753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0789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0823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0866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0902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0938

第五部 死缓阶段 (1977 ~ 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0969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0980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0994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	1015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1027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1037
结束语	1084
作者书目提要	1118
索 引	1126
增订本译后絮语	1141
译后记 (1992 年版)	1144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从 1955 年到 1956 年，我在巴黎大学授课，以“工业社会” 511 为题。我在德国图宾根执教时也曾以此为课题，但比较简略。

我在几年以前便有这个想法，其实就是在战争刚结束的时候。统治阶级的理论和社会阶级的理论相反而又相似，叫我非常吃惊。意大利的法西斯很喜欢引用莫斯卡 - 帕累托的统治阶级观，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只知道社会阶级。马克思主义者混淆了统治阶级与在社会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而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了政权，便不再代表工人阶级，而代表一个统治阶级，一个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而登上前台的统治阶级。

当然，苏联的革命跟法西斯主义不一样，甚至跟国家社会主义也不一样，因为它在工农业方面，打乱了生产关系，消灭了工厂的业主，然后通过农业集体化，消灭了地主。然而，这个秉承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并没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预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按照帕累托悲观的学说，造就了一个新的统治阶级。于是，帕累托学派便轻而易举地根据他们自己的方案来解释布尔什维克的壮举。而马克思主义者也从自身的角度，根据自己的方案来解释法西斯主义，认为它是假革命，因为它并没有打乱生产关系，而仅仅是“金钱势力”派了另外一些人来管理国家，通过另外一种形式的政府来行使他们的治理权。

我从 1940 年代起就着手写一部书，此书将对照马克思和 512 帕累托两家的学说，比较分析 20 世纪的革命运动，包括右派

的革命、左派的革命、法西斯和共产党。几百页手稿还在书架上睡大觉。我结束在图宾根大学的授课后回到巴黎大学，便着手宣扬工业社会这一概念。

我在这个计划里仍然要提出几种想法。我跟其他一些人一样，都为科林·克拉克的《经济进步的条件》所触动。不管是苏联的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消算一算国民收入，便可以肯定国民经济都顺着一条线上升。一切现代经济，不管政体多么不同，主义多么不同，大家都有一些共同之处，特别是经济增长的潜力。苏联通过五年计划，展示了国民增产率的辉煌成就，可以说是向西方发出了挑战。苏联要的是用行动证明自己制度的优越性。苏联国民增产迅猛，劳动生产率直线上升，都胜过资本主义国家。

我在法国看到让·富拉斯蒂埃笔下的经济增长论。这门理论本身——也许说得谦虚一些，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工业社会的概念。东欧和西欧一样，经济增长的标志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还有其他标志，即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很正当，很有必要来分析现代经济的共同点，而苏联的模式也罢，西方的模式也罢，又都各具源于历史的特点。经济扩张都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千百年来，盛衰沧桑，循环不息，却又仿佛遵循一条规律，至少该说经济扩张是缓慢的。

三门课程7年后变成了《工业社会十八讲》《阶级斗争》《民主制与极权主义》^①，包括十多年光景里紫环不息、耿耿于

^① 还有第四门，是讲第三世界国家的。我觉得不值得发表，只保存了打字稿。

怀的许多问题，诸如欧洲两个方面经济与社会的对比、经济增长体制与方式的多样性、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随经济增长体制与时期之不同而不同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的相对独立性、政治制度对于生活方式和阶级关系的影响，诸如此类。

这几本书里的看法大都经过详细研究，或者引起一些详细的研究，其价值并不在于看法本身。我可不敢做什么概述让读者讨厌，倒不如只说一说三门课程的主导思想。

我们先讲讲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大家知道，说法来自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19世纪初，爱搞历史和哲学的人，特别是搞历史的，正走红运，都想知道法国大革命以后出世的社会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特点。圣西门和他的同道都解释为这是新时代到来了，而且风行全欧，影响久远。从此，工业化便成了现代社会的特点，是一种劳动和生产体制。工业化的管理者、银行家、工程师成了领导阶级。法官、公职人员、外交官、军人不算寄生虫，也不能算不可缺少的人才。奥古斯特·孔德继承圣西门派，提出完整的体系。工业社会模式与过去的军事模式相反，开发自然资源代替了依靠侵略与掳掠发财。和平劳动在过渡阶段结束以后便将代替战争，从而结束神学与军事时代的传统。

尽管马克思常用一些黑格尔的语言，但把马克思说成是圣西门的后人，倒也不见得全无道理。马克思也提出，公民社会作为实质性现实，等于工业社会，国家不过是公民社会的体现。公民社会的内在矛盾，名叫阶级斗争，乃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但跟圣西门的学说一样，正是工业体系成了整个集体的躯体或结构。只有彻底改变工业体制，才能完成真正的革命。那就不再是什么暴烈或不暴烈的危机了，过去这种危机，只不

过牵涉到掌握或行使国家权力的一些人罢了。

由于环境的推动，我重新提出了工业社会这个概念。当然，苏联人把自己的社会叫作社会主义社会，把西方社会叫作资本主义社会，然而这样的反衬对比是建立在一个公设上面的：经济社会制度的定义或特性，在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类别，在于提取剩余价值的方式，在于管理的方式是计划还是市场。将国家所有制与私人所有制对立起来有没有道理姑且不谈，把所谓社会主义经济的工业体系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体系彼此比较比较，我看也是有道理的。工业社会的概念，正是这部比较研究的作品用作指导思想或用来做出结论的。

“工业社会”一词虽然已经用得很普遍，但是这一概念本身还有争议。我上课时用它是如此，日常谈话中用它也是如此。所以应当说清楚工业社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既存在于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之中，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之中。只有给工业社会下了定义，才能说明该不该引用这个概念。

我用生产单位来下定义。在一个社会内，大企业作为劳动组织的特定形式，这个社会便是工业社会。由于这些企业的性质，家庭与劳动地点（即劳动单位）彼此分开了。企业引进了劳动分工，虽然不是什么全新的模式，但程度大大加深了。传统的分工是职工担任不同的工作，而现在又加上劳动的技术分工。企业必须累积一定的资本，不然没法竞争。组织与竞争必然引出经济核算。企业发展势必集中工人，而工人的集中几乎不可避免地引起劳资之间的紧张关系，于是有了工会，职工
515 凭仗人数众多，能与企业领导谈判。

任何经济制度都得完成某些任务，如因工作而异地分配集体资源、处理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我在上文举出了工业社会的

五种性质，用于为之下定义，暂时撇开了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大标志，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与依靠计划或依靠市场来处理企业之间的关系。

历史学家追述了他们所谓工业革命经历的几个主要阶段；而19世纪初叶的社会学家则置身于时势之上。我本人是追随奥古斯特·孔德的路线的，而且常常支持科学用于生产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因为这是我们时代的特征。然而，我在第五讲里并没有强调科学与生产的关系，因为谈企业、谈集中、谈合理核算的时候，这已经不言而喻。我在很多场合，强调了工业精神的主导地位。现在人们已经把钢铁、汽车等大体上生产制成品的行业叫作第二产业，而工业精神并不仅仅在第二产业中表现出来。奥古斯特·孔德早就预见到，农业也将同狭义的工业一样实现工业化。

苏联人则用烧红了的炮弹轰击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本身，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个概念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马克思本人会不会反对比较分析的原则呢？谁也不敢断言。事实上，马克思曾在一篇大名鼎鼎的文章中^①提出，英国的前途具有典范的价值。而他在其他作品中却反而提出，资本主义过程本身就全人类而言是无法避免的，但可能按资本主义前期社会的多样性而采取不同的形式。不仅如此，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不怎么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比较苏美两方相等的发展阶段，比较人均生产的方面，比较各产业部门劳力分配的方面，倒似乎并不见得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

苏联人却不用这副耳朵来听这些话。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 516

① 《资本论》序言。

义相提并论，或者把二者归入一种类型，那简直是对马克思犯下弥天大罪。理所当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一定要掘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沟。两种制度若能放在一块板上，各有各的优缺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把人类带到历史前期的末尾，尽管今天苏联的社会主义还带领着一队工业国家，在美国的背后穷追猛赶。

《工业社会十八讲》是在1955年和1956年讲授的，到了1962年方才在弗朗索瓦·艾尔伐尔主编的“思想”丛书中出版。巴黎大学打印的讲义，直录我讲的话，没有经过审阅，或者几乎没有经过审阅，已经卖掉好几千份。^① 我不肯直接把这些讲义出版成书，认为这不过是雏形。真正的著作应该同时从历史与理论两个角度来研究两个主题：苏维埃主义与资本主义，马克思与帕累托。“思想”丛书的问世解决了问题，但我仍认为是暂时的，因为在廉价的丛书里发表的讲义，仍旧可以加工成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真正著作。

这种事情一向如此：意外的成就往往出于偶然，所谓时势造英雄是也。匈牙利发生革命，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许多共产党人失望之余，退党如潮，行吟泽畔，追求一门可以替换的主义。我的《工业社会十八讲》一书恰好应景问世，解忧惶，息烦恼，并不能启发什么信念，或者纵观什么全景，但总可以把我们这个既一致又离析的世界照得清楚一些。事情却大大出于我的意料，至今居然还能遇见一些大知识分子，有时候遇见一些学者，告诉我说，这本小册子，这本近乎通俗读物的小册子，对他们有了大用场，教诲了他们。

^① 我在巴黎大学用的讲义，由小女多米尼克·施纳佩尔修改了一遍。

第二门课程，从科学上讲，我认为三门中最好的一门（大部分内行读者都同意我的看法）。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这门课程分析了生产关系。如果用中立的词汇，那就是分析了社会阶级。这门课给一个主要问题提供了答案，这个问题就是：在西方式的工业社会里，在苏联式的社会里，阶级斗争分别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搞清无穷尽的阶级论。任何现代工业社会都很复杂。所以一眼就看得出来，成百万的男男女女在劳动中各有各的工作，有的在工厂，有的在田地，有的在店铺，有的在行政机关。他们中间绝大部分人都拿工资。正因为国民生产不断发展，这种人才越来越占多数。换言之，他们都在企业里，按等级组织起来。在今天的法国，83%以上的劳动者都拿工资。结果是区分社会的标准十分繁多。有体力劳动，有非体力劳动，有拿工资的，有不拿工资的，有企业主（或者管理人员），有雇佣人员，有工人，有农民，如此等等……在各种类别里面，大多数观察者主要想的是生产资料的业主或经理为一方，无产者为另一方。无产者拿工资，用不属于自己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①

雇员和雇主之间展开或强或弱的对抗，实际上是分配企业收入或剩余价值的问题。总的来说，为了分配国民收入而进行或隐或显的斗争，搅动着西方式的工业社会。雇员和雇主之间的斗争（现在雇主就是国家），乍一看很像是马克思想象的阶级斗争，其实是另一码事。

① 今天的社会学家比较喜欢做三分法：高等阶级或统治阶级、中等阶级、下等阶级。

各种社会团体为了分配国民收入而明争暗斗，若要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必定具备两项条件：首先，工薪阶级或无产阶级要有阶级意识，其次，他们的要求必定不局限于对他们的物质与精神条件的改善。用直率的话描绘这两个条件就是：工人能不能意识到，自己形成了一个与这一社会内的其他集体截然不同的集体？这种区别于众的意识（或者说是自身的本色）是否含有对其他集体的敌意？或者对整个社会抱有敌意？工人们是否不爱祖国？反正，这个阶级由于成员的意识而成了现实，那么它是否有造反的决心？是否反对的不是现行制度的各种现象，而是政体本身？

在任何西方型的社会里，为分配国民生产而进行阶级斗争成为正常的前提。工会的普遍化引起了混乱的抗议和要求。雇佣人员与雇主间纵向的碰撞，还有不同部门生产者相互间横向的冲突，这种阶级斗争浮在现代民主制的表面，在东欧社会里是看不见的。不是说苏联式的社会已经和合一致达到了这种程度，利害冲突已经销声匿迹，而是说那里的政治社会制度本身提供了这种表面上的和合一致。压力集团已经不存在了，或者说，至少已经不再合法地存在了。工会不去表达工人的要求，而把工人群众框起来。浇上芥末蛋黄汁的社会主义，的确消灭了这种阶级斗争，倒不是由于和衷共济，而是由于压制各种团体本身不得不学金人缄口。至于雇佣人员与雇主之间纵向的阶级斗争，也被政权与主义掐死了。在东欧，罢工等于叛逆，因为罢工在那里是禁止的（只有波兰算例外）。这说明了一个平凡的真理：国家拥有企业的产业权和管理权，并不足以消除工人与领导之间的紧张关系。在苏联式的社会里，纵向的阶级斗争在表面上消失，并非由于和衷共济或阶级消亡，而是由于国家的

威力无比，由于废除了自由，特别是废除了结社的自由。波兰团结工会崛起，把所谓无阶级社会的隐情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第二门课程的主导思想也许是比较不平凡的思想，就是把社会结构与政体联系起来。这个想法是在研究马克思-帕累托学说时引申出来的。只要阶级斗争关系到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一切便取决于国家与法制：阶级斗争能不能出现，甚至在某种程度上，阶级斗争能不能存在？苏联工人大概也会分什么“咱们”“他们”，因为领导和特权分子的生活与工人不同，并且还要管工人的劳动。然而，由于既没有新闻自由，又没有结社自由，无产者没法从各自的身份感过渡到对立的意识、要求的意识或者造反的意识。

当然，“咱们”对“他们”的想法，关系很大。在西方社会里，“他们”是东家老板、企业主，被认作掌握生产资料的人，尽管在法律上也是领工资的人。如果苏联的制度实现了自己的理想，那么，“他们”便将从本质上区别于西方的企业主或东家老板。然而，一切都表明，事情完全不是这样。苏联的领导者在工人心目中就是企业主，就是特权分子，但又与西方的老板不一样，苏联的企业主并不脱离政权、国家和党。他们身在特权阶层，同工人的距离不见得小于法国工人与雷诺汽车厂老板或液化气公司老板之间的距离。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止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来解释苏联的制度。私人、法人、有骨有肉的老板、匿名股东公司，都在苏联失掉了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但是所有权并没有落到工人手里，除非象征性地说是通过党落入工人之手。因为党就是工人，工人就是党。国家也在党的掌握之中，几乎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独自掌握着生产资料。党和国家的官僚机器“剥削”

劳动者，一如往日的私人老板。但是做如此解释可能叫人联想到，国家不一定总是体现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然而，在这里，确实是国家，或者说得更恰当一点，是国家中掌握政权的少数人，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520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说明了帕累托学派关于领导阶级与革命的概念。少数人武装夺得政权，或者——比较罕见——用准合法的程序按自己的主义重新组织社会。法西斯革命别无二致，基本上，在关于取得政权的阶段上别无二致。新贵坐稳了宝座，接下来践行的理念却不一样。不用说，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痛恨莫斯卡 - 帕累托关于领导阶级的学说，一如他们拒绝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本身。马克思列宁主义体制在信徒们看来，绝不成为一种一类的东西，或一种模式，而只能是历史的最终成就，人类的唯一功业。事实确是如此，只不过是在黑暗的王国里罢了。

根据国家由少数人主宰这一条来比较各种体制，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犯大不敬的弥天大罪。因为这样一来，一党专政的体制便会降为各种体制中的一种，就会取消它的绝对独创性，就会叫它跟其他一切体制落个平起平坐，同时揭示出各种体制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和帕累托的综合，并没有太大困难。任何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都有领导阶层，我的意思是说少数人占领了战略要津，影响着别人的思想和社会的管理。在领导阶层中，我可以列举出生产力的业主或管理人员、狭义的政治阶级、高干、群众的带头人（职工会的头头、群众性党派的头头）、知识分子、教会权贵、军队领袖。在共产主义体制中，党内人物自认为既是政治阶级，又是国民经济的管理人，也是世俗宗教的教士。换句话说，他们想一手抓住世俗权和神权，

一手行使政治权力和行政权力。东欧国家还有一种多党制，主要在波兰和匈牙利，而且这种多党制或多元论还在逐渐形成。相反，在苏联，党的统治维持如故，没有什么察觉得出的改变。

在西方式的体制中，不同的领导阶层并不联合起来成为一个政党。各有各国的情况。管理生产资料的人与群众的带头人，相互之间的矛盾强弱因国而异。同样，管理生产资料的人与政治阶级之间的亲密程度，也是因国而异的。在激进党主持共和国的时代，政治人物与工业家和银行家来路不同，并不属于同一社会阶层。1981年以前，第五共和国的政治阶级同高级行政机关没有什么区别，而高级行政机关又同经济方面的领导人物没有什么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领导阶层倾向于——用通俗的话来说——联合起来，成为一个领导阶级。各个领导阶层由于出身相同、经常协作，意识到了他们自己的身份，意识到了共同利益。他们鼓动群众的领头人独立自主，加上宪法的条款，群众的个人自由权得到了保障。

521

把一党制或多党制作为分类的标准确有争辩的余地，但在我看来，目前还是说得通的。组织合法竞争，行使政权，确是现代民主的现实。现代民主不仅要求多党，而且要求获胜的党事先便容忍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此外还要求暂时执政的党依照宪法行使政权，同时必须尊重普通的法律。这就是为什么我用一个不规范的词来称呼西方式的体制，我把它叫作“宪政多党制”，与之相对立的是各种一党制，其中苏联体制是最完美的代表形式，即一党包办世俗的最高权力、宗教的最高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最高权力。

不少政体既非宪政多党制，又不是极权一党制。但是，我在工业社会的政治制度理论中举出反对派作为问题的中心，这

522 不仅反映了一个亲历的事实：正是基于一党垄断政权——自封为国家唯一的主子——希特勒与斯大林的种种冒险行径才一发不可收拾。多党制最适宜于象征民主价值观，即对话的准则。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党制把合法的发言权占为己有。相反，合法的多党制允许论调不同，允许公民之间、公民与当权派之间进行经常性对话。

三本小书与其说是文章，毋宁说是谈话，代替不了我多年一直想写的一本书。哪怕把三本书汇编为一本予以出版，仍然代替不了。由于听众的关系，我在一些情况下撇下了最艰涩的学术问题，比方说做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是对历史的、特殊制度具体形态的分析，另一方面是对理想典型的分析。同样，我引用工业社会的概念时，不太注意明确指出工业社会的地位与本质。我的课堂安排不是没有毛病的：社会精英与政党、政府相互之间的关系，我谈得很简短，不是只有在一本讲义里，而是在几本讲义里都有这种情况。在《工业社会十八讲》一书里，我讲到并且描绘了经济增长，但没有细谈清楚经济增长的机制，也没有说清楚经济增长的要素。在《民主制与极权主义》一书中，缺了我在第四门课中谈的各种体制。这次课的讲义也没有发表。第三门课的概念体系，尤其是引用孟德斯鸠体制的“本质”与“原则”两项概念，同第一、第二两门课的概念体系很不一样。

第三本讲义是我在 1957 ~ 1958 学年讲授的。我往往忍不住提到法国当时的政局，提到第四共和国的危机。我说，宪政多党制的原则，是以孟德斯鸠的两种感情、两项原则来规定的，也就是：尊重法律和妥协意识。我们所说的民主体制倾向

折中妥协，哪怕仅仅为了争取多数选票也不能不如此。在内部事务中折中妥协会坏事，但很少弄到集体丧败。在外交上不肯做出抉择，却往往因为一而再，再而三，当断不断，深受其害。第三共和国面对希特勒，第四共和国面临阿尔及利亚危机，一再搪塞敷衍。1958年年初，我用一节课讲述第四共和国的腐败，以下面一段话结束了讲课：

人们天天都在说改革宪法是法国性命攸关的问题，是不是真正如此？如果真的如此，那又意味着什么？法国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危机。谁都知道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梦寐以求改革宪法，不是想忘掉亟待解决的问题，便是想寻找一个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本质上不同的政府。 523

接下去的一讲题为“丝线与剑锋”，我推敲了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作为一种弁言，我举出了第四共和国推行的政策。我说：“我怀疑目前有可能推行一项不同于现行政策的政策。因为现行政策既反映了国家，也反映了议会和政体。”反映国家分裂的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有没有解决办法呢？我举出三个：第一是专制，第二是古罗马式的独裁，第三是观望等待。反正事态发展终会有个结局。

我又说：“用专制来解决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失眠时所梦想的办法，但有一个条件：起来掌权的人一定要想法跟我们一致……”我接着便谈古罗马式的独裁，其实是吁请戴高乐将军出山。我说：“大家常常提出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呼吁一个合法的救星，也可以说，一个古罗马式的独裁者。这人姓甚名谁，今天已经家喻户晓。不管持有何种不同政见的新闻机关，

都主张这个最后的手段。正因为那么多想到他的人意见各不相同，甚至矛盾对立，所以必须考虑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这个合法的救星如果做出仲裁，必然使各方面都感到失望，因为请他出山的乃是各阵营的代表人物。”于是我提出一项奇迹性的解决办法，这办法不太可能实施，但能调和对立的集团，不管它们怎样各持己见，自以为掌握了真理。我的最后一句话后来得到了证实。我说：“就算对立的党派在救星的人选上达成协议，我们的对手却不会就此归顺他。”我讲的课由电台广播，不好公开陈述我个人的意见，所以主张“丝线”。这是引用G. 费雷罗用过的话，意思是：合法性这条脆弱的防线可以保护城市免受内战之祸。

这一年的最后一课是在1958年5月19日讲授的，是戴高乐将军正式执政前几天。我虽然没有提他的名，可是在下课前说得清清楚楚：

524

宪治能否逃脱劫数？现行政体向另一政体过渡，能否合法进行？20世纪的法国擅长搞合法的政变，或者说，擅长给政变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目前的形势的特征是合法与非法混在一起，不可究诘。形势特别复杂，因为对于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物，大家众说纷纭，各自看时候、看爱憎，说他意味着这样、意味着那样，而且说法矛盾百出。古罗马共和国曾实行过一种合乎法国国情的制度，叫作独裁制……独裁的候选人，也就是说合法掌握最高权力的候选人，不愿意延长现行的制度，而要改变这个制度。因此，他不仅应该是一个独裁者，而且应该重新引用古代的概念，他是一个立法者。

我再一次提出：

人民期待的独裁者，不能保证今天，1958年5月19日欢呼支持他的人以后还会全都支持他。然而，独裁立法者的登龙奇遇是顺应形势的。当时执政诸公怎能在阿尔及利亚推行一项连自己都不相信的政策呢？作为结束语，我许一个愿，防止内江内战只有一个办法，我在几个月以前就称之为丝线，或者叫合法手段。这条丝线还没有断，但愿苍天有灵，这条丝线永不扯断。

我原想不写这些讲义而写一本书，结果落空了。何苦再指出错误，填补空白？倒不如把有关的想法捡起来解释法国的、苏联的或世界的形势，让时间来批判，而时间的批判一般是最严厉的。最近25年来的事实到底否定了什么，证实了什么呢？

比较苏联体制与西方类型的各种体制，丝毫不意味着它们可以“趋同”，这个词概括了曾经风行一时的理论。尽管有种种传闻，我却从未赞成这种趋同论。《工业社会十八讲》一书的某些段落可能引起误解，例如：苏联的计划经济将来有可能多利用一些市场机制；在西方经济中，由国家转移的收入已经占总收入的一大部分；国有生产资料的部门可能在西方经济中逐渐扩大，这意味着经济中的某些矛盾有可能减弱。我并没有用这种结构的演变推断出二者大概会趋同，或者必然趋同。《工业社会十八讲》，尤其是接着出版的两本书，我从中一再肯定，这种经济上可能的趋同（其实至今并未实现），几乎缩小不了两种本质不同的社会类型之间的差距。

525

过了25年，我重读当年执教时的三册讲义，倒还不至于

脸红。历史安下的许多圈套，我居然一个也没有钻进去。斯大林逝世，“解冻”一露苗头，许多评论家，最有名气的有伊萨克·多伊彻和莫里斯·迪韦尔热，都兴高采烈地一头钻进圈套，因为他们是由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苏联的解冻引发出一个玫瑰色的未来学派。社会主义之所以背离自己的阳关大道，不是迫于急需原始积累，便是因为俄罗斯还太野蛮这一历史命运。现在好了，可以重走正道，逐渐实现自己的远大向往。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传记作家多伊彻，是盛名之下的苏联学大师，头一个预测苏联的党和体制将会“复兴民主”。^①他考虑到神化了的最高领袖逝世以后可能发生三种情况：重犯斯大林主义、军事专政和复兴民主。后者似乎最有可能。一党制摆脱了斯大林的过激行为，就会一点一点地稳定下来，但不会发展出多少民主。这一前景是多伊彻没有看到的，因为他充满了社会主义空想，始终坚信计划经济、集体所有制理应正常地伴随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资产阶级的民主。

1964年，即过了差不多10年，M. 迪韦尔热写了一本书，命名《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介绍了最浅近的趋同论。他说：

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永远不会变成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西欧也永远不会变成共产主义国家。然而，双方都似乎通过一种双重运动，一起走向社会主义。东方实行自由化，而西方则实行社会化。这种双重运动困难重重，所以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要走许多回头路。很可能是这样，

^① *Ruissia after Staline*, Londres, 1953.

但是看起来大有不可抗拒之势。

这种预测或这种预言的根据何在？福利本身能带来自由吗？

1972年，迪韦尔热又出版了一本书，叫作《雅努斯，西方的两面人》，重新提起趋同论。他说：“不同的体制趋同这一想法今天已经不时兴了，但从世界全局来看仍有一定的价值。至于快慢如何，何时实现，那倒很难肯定。公私科技结构，彼此渗透，更促使事物向这个方向发展……关键在于西方需要社会化，而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自由化。‘需要’这个词不仅表达了人心和主观的要求，而且表达了物质的客观要求。”从世界全局来看，趋同论仍有一定的“价值”，不过“很难肯定快慢和什么时候实现”。这样便不能算预见，因为谁也不知道，趋同要经历几年或几十年或几百年。这样的未卜先知，本身就建立在错误的见解之上。这种见解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公私科技结构相互渗透，苏联或西方都因而互相类似，从而强化趋同的倾向。科技结构决定社会的前途，这是假设，是没有经过证明的。这样的对称骈比，苏联要自由，西方要社会化，只能满足一些肤浅的读者。当然，东方等级森严，实验室被纳入专横的框框，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所以拖慢了科学进步。但并非因此就可以说苏联的体制“合理地需要”自由。若要现行体制活得下去，若要特权阶层继续统治，恰恰相反，就必须对自由严加限制，哪怕因此而不得不放慢科学进步。至于西方的社会化，那倒是怎样讲都可以。

斯大林主义缓和一些，我认为这并非不可能。只拿斯大林主义最骇人听闻的方面来说，大清党（如李森科那样的骗子）垄断思想，宣布遗传学罪大恶极格杀勿论，把遗传学家送进集

527 中营，这样的事大概不会再干。我在那时候写过，官方的意识形态一张一弛，随时而异。过了1/4世纪，这话似乎还搔到了痒处。然而，我仍旧坚持我的论点：苏联自由化是有限度的，超过限度，政权的存在就要受到质疑。党以主义的名义来统治，就是说：无产阶级等于党，党起主导作用，完成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苏联的老百姓和领导人还相不相信这个主义，在这一点上，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争论不休，无法一致。然而，信也罢，不信也罢，没什么要紧，寡头统治者绝不能让人讨论正统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是政权的基础，而这个政权是从本质上与众不同的，并且非向全世界传播不可。

现在的批评来自另一方面：撇开了趋同论，两个不同的社会典型，还有没有道理来比较呢？苏联社会就像季诺维耶夫或阿兰·贝桑松所描绘的那种社会，能否容许人拿来同西方社会比较，哪怕是要比出两家的对立性来？这样一来，工业社会这一概念便从两个方面受到威胁，一方面是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强调苏联社会与众不同的独创性，从此再做什么比较，岂不完全失去意义了吗？

我不否认，圣西门的思想东山再起，恰逢东方与西方较量的决胜时刻。较量的内容是经济增长率与战后的经济扩张。这上面有两种说法，都很吃香。一种是英美方面科林·克拉克的增长阶段论。另一种是法国让·富拉斯蒂埃的论点。但是，我不想做经济分析，不想摆出东西方经济增长的统计数字。我想的是把阶级、政权体制与经济发展相互联系起来。正如托克维尔，一方面承认民主是天命所归，另一方面却又让人们自己选择自由或奴役。我认定，工业社会既不注定要苏联式的一党制，也不注定要西方引以为豪的意识形态和多党制。所以问题

只在于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之间，还有没有剩下一些共同点足以用来证明，进行比较仍然有道理，同时也就证明，概念本身也是有价值的。我觉得从正面回答这个问题是对的。 528

各行各业，劳力分配，在东西方大同小异，尽管在同一发展时期，美国和苏联不需要同样多的商人、银行雇员、法学家。苏联购买整套西方工厂，长期以来想追上并且超过美国（在这一点上，勃列日涅夫没有继承赫鲁晓夫，而把雄心壮志放在兵力的对比上）。这不能说没有成效，欧洲的两个部分属于同一类型，而又各自代表了这一类型的两种差距很大的版本。

圣西门派有理由预料，工业秩序将会波及农业与服务行业。在这个意义上，圣西门派观察现代社会的眼界比较宽广，比较深刻。而马克思则一心牵挂着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冲突，同时受了英国经济学家的影响，最终得出一个贫乏而单调的乌托邦（借口是以物治代替人治，以社会主义来管理人，包括人的思想）。最杰出的圣西门派奥古斯特·孔德曾肯定说，（广义的）工业化发扬光大是不可抗拒的。但是，他没有流于幻想，认为工业化就足以实现人在社会中和谐无间的生活。

再回到比较通俗一些的水平上来说说。任何政府，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担负着管理经济的责任，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选举那天，西方候选人拿生产和税收的统计数字往对方的脸上扔。在莫斯科，党的第一书记不知疲倦地做报告，列举数字，把这里的落后，那里的缺点，归罪于这个人或那个人。在东西两方，经济问题总在政治演说中占统治地位，尽管莫斯科的寡头统治者以行动证明，自己爱好大炮胜过黄油，爱好武力胜过人民的安乐。

与过去相比，关于我们知道的一切复杂的社会，我仍然相信圣西门派看对了。而马克思却歪曲了他们的哲理，以资本 529

(或资本主义) 代替工业至上论, 而今天的所谓后工业社会, 应该解释为科学用于生产的独特阶段, 而且, 再放宽一些说, 科学用于人类生活本身的独特阶段。

其实, 这种概念之争无关宏旨, 要紧的是历史眼光和从概念引申而来的理论。1/4 世纪以前, 我认为苏联的发展属于世界工业化的大潮流, 而且是别开生面的, 有其生命力的一种模式。哪怕东方的生活水平已经接近西方, 这种别开生面的模式仍然可以存在下去。换句话说, 我认为——这是不成问题的——布尔什维克以自己的方式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但是人均收入达到几千美元, 这在他们心目中不能算完成了任务。我当时这样想不能算错, 但也许在一个基本点上低估了现实。当然, 贫困化的理论, 不管是绝对贫困化还是相对贫困化, 都不适用于苏联的体制 (不管代价如何, 反正苏联的生活水平在最近 25 年确有提高), 但是我低估了过度扩军的影响和苏联经济的低下效率。

《民主制与极权主义》的最后几章内容受了“解冻” (发生于 1957 ~ 1958 年) 的影响, 表现得很乐观, 可惜过了 25 年, 这种乐观显得过头了。我重新检阅了斯大林死后发生的变化: 极端的恐怖主义——大清党的恐怖主义没有了, 思想生活从解冻中得到了好处, 警察不与党员过不去了。可是, 与变革相对称的是我指出了一成不变的东西: 非斯大林化的作风, 仍旧是斯大林的作风。斯大林并不是一个龙钟可笑的人物, 连作战地图也看不懂。“这样把几年前奉为神明的人, 转眼说得连人也不配做, 仍然是搞新神话、新迷信。” 大清党总算不搞了, 但清洗依然经常进行。正统主义统治, 一党垄断政治, 依然如故。前总书记账上的怪脾气, 过火的举动, 算是清除了。我把自己的想法用一句话来说: “直到现在, 这个体制是有点

改变，但体制本身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概括我当时的想法，或者宁可说，当时向学生用婉转的言辞所表达的自己的想法，可以引用《民主制与极权主义》第17章里的一段话：

改变是可以预料的，这关系到工业建设，关系到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但这并不意味着取消一党制，取消正统主义，也不意味着社会与国家共有的官僚等级制将消亡。资产阶级的稳定性难道前途无量吗？有什么不可以？经济合理化呢？为什么不可以？减轻恐怖吗？大有可能。放弃病态的暴虐作风呢？很有可能。引进西方式的多党制和自由制度？也有可能，但是没有可以证明的必要性，甚至没有太大的可能性，因为工业社会的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我们希望的后果。

今天，我在这里首先要改掉“也有可能”那句话。当时说的是苏联会推行西方式的自由化。我倒不是要把“有可能”改成“不可能”（天底下的东西比我们哲学里的东西多得多……），我只想说明，这样的自由化将会弄垮政权本身，不管是不是和平地垮台。这样稳定下来的政权，绝不容忍什么人来动摇自己的思想原则。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绝大部分苏联人已经不再相信了——不能容忍我所说的经济合理化。李伯曼教授的尝试都不顶事。然而人民民主国家，特别是匈牙利，却大大地引用了西方的经济观念。

1958年春天，我还在盘算苏联的前途，赫鲁晓夫的时代刚开始，莫斯科的头头们还以美国的手对手自居，吹嘘自己的增长率，指明何年何月何日，苏联的工业生产将要超过美国。我

是从来不上吹牛大王的当的。我从来不怕苏联的经济优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我在1958年做出了上文举出的几点分析。

假如我对苏联社会的分析偏于乐观，那么我分析西方社会时，是否该受同样的责难呢？我是不是混同了“光辉的30年”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进程呢？所谓“意识形态的终结”，这句话曾引起众议纷纭，难道不是起源于高估经济增长，从而把工业化国家看得前途一片光明吗？从1974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全世界的人至今还在其中挣扎——难道不也戳穿了这种乐观吗？对我的责难，有一部分是对的，但只有一部分。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我跟别人一样，觉得欧洲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引人注目（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6%），比美国经过长时期发展而爬到世界首位的增长率翻了一番。所以我认为，不正常的增长率是难以持久的。

“1985”委员会认为战后的经济增长率直到1985年不会下降。法国最杰出的经济学家马林沃德（M. Malinvaud）倾向于这样一个论点：战前和战后中间，发生了蜕变，原因众多（其中一个原因是管理经济的人进步了），新的经济增长率（5%~6%）可以代表新的指标。“1985”委员会请我去解答问题，我马上说我怀疑年增长率是否能够长期维持下去。根据假设，这个增长率可以维持到1985年。当时，我并没有决定性的论据，足以肯定我的怀疑。别人也就有礼貌而又满不在乎地对待我的疑虑。

我没能说服那个委员会，那是我咎由自取。我跟委员会一样，都没有提出廉价的能源能促成工业国的迅猛发展。我强调其他因素来解释“奇迹”：从美国引进生产技术、组织技术，
532 追随这个开拓者得到了好处；西欧形成了大市场；运气好，从

两次世界大战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动荡造成的落后中奋起直追。但是，我仍然相信，当旧大陆即将接近新大陆时，欧洲的经济增长率便会随着生产力发展的放缓而慢慢降下来。

为什么委员会和我（如果没有记错）都没有提出石油和石油的价格呢？我们都知道，石油产品消耗每年递增 12%。很容易预料，远远不到 1985 年，世界年消耗量便将超过 30 亿吨。不到 1985 年，这条曲线延长下去，便将碰上不可逾越的障碍。至少，石油产品的价格将不可避免地上涨，从而这样或那样地改变实现欧洲奇迹的条件。1956 年苏伊士运河的危机过后，我为《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一书写序，认为欧洲头一次控制不住欧洲工业的补给路线。我说：“与苏美相比，西欧虽然是地球上第三个工业中心，但显然处于劣势。欧洲的大量食品靠输入（英国就买一半），原料也靠输入（有色金属、棉花、羊毛），战后的能源供应纯靠输入……所以苏伊士运河的危机，难道不是标志着欧洲进一步附庸化、进一步仆从化了吗？”自不待言，我宣称，今后数十年间，欧洲在能源和原材料上将越来越依赖别人。美国将越来越多地购买原材料，也许是自己的矿藏日趋枯竭（铁和铜），也许是想保持自己的储量（石油）。我并不预言什么绝对匮乏，但可以看到“尖锐的竞争，争取在政治上控制能源和原料生产”。^① 我不管 1956 年戏剧性的变故，至今仍然坚持我的中心论点：“法、英、德等国，一如荷兰失掉了殖民地，但仍能跟荷兰一样失掉了帝国而繁荣生存下去。”^② 但我还是把上面肯定的话改为：“欧洲人

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第 384 页。

②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第 362 页。

失掉了帝国，丧失了对外行动的能力，只能听凭几种国家的摆布：一种是人民富有的强国，一种是人民贫困的强国，一种是人民赤贫的弱国。”

我对经济增长所抱的乐观主义，从未发展到认为可以消灭阶级斗争的程度。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或阶层之间的争执，为的是分配国民生产品，或者是为了改善劳动条件。我否定的是这个论点：工人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阶级，意识到自己的革命意志，向往着由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进行统治的另外一种社会。从某种意义来讲，我认为这一观点基本没有搞错：经济发展并没有依赖彻底改变收入的分配方式。而将来大概会在争吵中求得满足，而不再搞造反或使用暴力。^①《进步梦幻的破灭》一书，是我在1964~1965年写的。那时候，学潮还没有爆发，离1974年的石油危机还早得很。这本书也是应景的作品，是大英百科全书归美国人办了以后请我写的。这部享有盛名的百科全书庆贺双百周年，负责人，特别是芝加哥大学前校长 R. M. 赫岑斯教授，决定在成册的条目前面冠以长文，名唤“冠首文”，其实是一本长达几百页的书。

我抓住这个机会，弄清楚号称发达社会的阴暗面。我的三本讲义里都没有进一步阐述这个方面。我引用三个概念——平等、社会化和世界化，提出现代文明的三个方案。其中每一个方案本身都是辩证的，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包含着矛盾。向往自由会撞上许多不可摧毁的现实——社会僵化，不管是不是阶级社会；人人追求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个性，这与个人社会化是格格不入的。个人社会化是通过家庭、学校、同辈群体等社会

^① 其实，这个分析不过是重新捡起半个世纪前列宁的说法。

设置来实现的。工业秩序必然分等级，比较一般的生产秩序，也是与对个性的向往格格不入的。人类团结的美梦，国家人民和谐相处的理想，还没有改变国与国之间传统的无政府关系。这种关系是建立在强权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法制之上的。

总之，《进步梦幻的破灭》一书并不否定经济增长论表面上的乐观主义，只不过限制其范围和作用而已。“光辉的30年”告诉我们，经济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的。共同的财富，一天多似一天，就可以不必挖东墙补西墙。但是，“光辉的30年”并没有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并不消除不平等，甚至并不一定能减轻不平等，而且并不能和解人类，更不能和解各国人民和他们各自的思想意识。非斯大林化以后的苏联，依旧是西方的敌人。工人加入了工会，受到社会保险的庇护，可是依然要碰运气，看祸福，工作则往往是机械单调的。

人用技术操纵自然的力量，却操纵不了社会。历史奔流不息，一方面凭仗科学居然局部主宰了自然界，而另一方面则是搞社会计划的人无能为力，二者对比，日益明显。东方是这样，西方也是这样。

为什么分析工业社会，会得出“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样一句话来呢？或者说得确切一些，会得出“意识形态时代的末日”这句话来呢？（问号是必要的。）这就是《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结论所用的题目。我的朋友 E. 希尔斯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意识形态的终结》。报道的是“文化自由大会”于1955年在米兰召开的会议。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也用此题目作为一部文集的标题。这个问题在美国引起争论，长达几年之久。有一个作家

为此出了一本论文汇编^①。1960年代学生闹事，搞了许多滑稽的主义，从表面上看是对政治思想生活的穿凿附会。

要讨论，必先对意识形态一词的含义取得一致的看法。帕累托把意识形态叫作派生物，也就是说，是演说家、积极分子、执政者用来讲道理的各种方式。不用说，各种意识形态会变格调，变内涵，但不会消亡。一个意识形态撵走另一个意识形态，各种意识形态永无尽期。我的意识形态观却比较明确，比较有限。也许可以把意识形态叫作对社会和社会历史的一种整体表述，既宣布有救，又规定从事解放的行动。我在1950年代中叶已经预感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将趋没落。1960年代和1970年代，没落加快。至少在法国是这样。尽管在1968年，表面上有所反复，没落之势却并未中止。我看不见任何新的意识形态能像马克思列宁主义那样无所不包。1960年代对工业社会的批评甚嚣尘上正足以证明，人的激情可以轻易取代系统的控诉方式。在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学生造反，他们并没有怎样假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名义，倒是以人的原始要求为名，也许甚至该说，由于厌恶消费社会而从感情上反对劳动者的异化，反对个人失真。1960年代的大学生，有时接近某种（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的）准马克思主义。他们体现了反对工业理性的浪漫式造反，照马克思的说法，这种造反将伴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而我要纠正一点，应该说是现代社会或工业社会的发展。

根据我对意识形态一词的理解，直到今天为止，我做出的分析似乎仍然是对的而不是错的。然而，对意识形态一词限定

^① Chain I. Waxman: *The 《End of Ideology》 Debate*, New York, 1968.

的定义，本身就值得批评。国家主义，甚至自由主义，都不组织成为世界的总体系，甚至不成为历史世界的总体系，但二者并不是从根本上区别于社会主义或马克思列宁主义，尽管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都自称具有科学性，也就是说具有总体性。如果应该害怕真实信徒的狂热，随时准备不顾一切来拯救人类，那么，该怕的倒不是他们的思想，而是他们的信仰。共产党把不平则鸣的年轻人变成党的积极分子或官僚。其中有些人摆脱了党的纪律，受到了恐怖主义的引诱。

536

我为什么在 1955 年就提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呢？我的判断有两条理由：马克思列宁主义与苏联的体制混淆在一起，只能跟随苏联的衰落而衰落。西方人终将放弃他们的幻想，同时对宣称信奉这种意识形态的学说和政党的幻想也随之破灭。不可能有另一种意识形态能达到同等程度的总体性。马克斯·舍勒写得很有道理，他说：在知识的灵霄宝殿里，主义寥寥无几。我们这个时代足以动员群众的主题，几乎都给马克思主义占去了：无产阶级的救世作用，凭仗技术而得到的富裕，资本主义不可救药的、导向决裂与死亡的矛盾。社会主义的其他版本，由于缺乏这样的系统性，相形之下，黯然失色，沦为一种改良主义。集体所有，计划经济，就事论事，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拼在一起，也成不了整体，可让历史的原因弄得神乎其神，那么，为什么人们竟受到这些事物那么大的鼓舞呢？就算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苏维埃主义的失败而受到连累，工业化的西方也不见得就此批评不得。湖泊污染，思想污染，财胜人败，商贾思想大发作，旧的不平等添上新的不平等，如此等等，已经足够激起青年一代的义愤。然而，这些题目却拼凑不出一门主义堪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匹敌。

《知识分子的鸦片》问世后 10 年，我写过三篇文章，答复对我的批评。它们汇刊成一本小书，命名为《三论工业时代》^①。

537 三篇文章都把对社会经济之前途的解释与意识形态的消沉联系起来，简言之，就是把 1962 年、1963 年、1964 年在巴黎大学出版的讲义与《知识分子的鸦片》联系起来。

我重新提起一个平凡的想法：社会问题跟着经济增长阶段发展而改变，同样的方式并不一定适应一切阶段的要求。我在 1964 年写道，东西方对话是在四个方面进行的。首先，传统的争论仍然在于市场经济与集中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苏联的宣传仍然照本宣科，谴责垄断资本主义。然而，如果问题只在生产和消费，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西方人何苦牺牲自己的自由，仅仅为了加快可能的经济增长（我不是诋毁对方，远远不是，而是对他过于宽宏大量了）。

在较高的水平上，西方人与苏联人争论的是双方各自体制产生的政治 - 社会后果，或是人文后果。我以社会流动性为例。苏联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于提拔低微阶级的子弟呢？就算确是这样，那又应当怎样估计社会流动性的重要意义呢？家庭能够世代代传继下去，该算是一个社会的积极面还是消极面呢？

在另一个层次上，对立着的两个草案其实都可以称为准马克思主义的，谈的都是历史的未来。一个草案是多少经过修正的马克思主义草案，预料资本主义将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个是科

① 头一篇叫作《发展论与现时代的意识形态》，写于 1962 年自巴西游历回来。第二篇名为《发展论与进化论哲学》，写于 1962 年教科文组织与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合办的讨论会以后。第三篇叫作《意识形态的终结与理想的复兴》，写于 1964 年，引起了对于工业社会与意识形态终结的长时期争论。

林·克拉克与 W. W. 罗斯托 (W. W. Rostow) 的草案, 谈经济增长各阶段, 甚至可以算上比较原始的莫里斯·迪韦尔热的趋同民主社会主义论。

西方进化论的某些版本, 认为生产力发展 (按人均国民产品计算) 会决定经济社会制度。苏联人大可加以驳斥。趋同论立论的基础是技术决定论, 或者是生产决定论。但是, 西方的理论家可以而且不能不满足于一种盖然进化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 都有利于某一种体制。苏联体制比较容易在起飞阶段建立起来。在已经工业化的社会里就没那么容易了。提高技术水平, 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就会降低斯大林极端式的危险。但是, 这种关系是靠不住的, 作用也是有限的, 而且不足以借此认识一切社会。把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的英国工业化, 同 19 世纪最后 30 来年和 20 世纪初的日本工业化比较起来, 相似性并不多; 或者说, 相似性少于差异性。 538

苏联关于历史未来的理论, 不太容易符合现实。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接替了”资本主义, 且又要“追赶”美国, 但是经济增长的阶段与体制交替之间并没有平行关系。为什么欠发达国家非得走苏联的道路呢? 既然皈依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一种历史必要性, 那么今后苏联人就得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去芜存菁, 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 确实优于西方体制, 不管在经济效能上, 还是在人的价值上, 都比西方体制强。

这下子, 我们就讲到了第四个方面: 工业型社会是否都趋向同一个目标呢? 我在《解读奥古斯特·孔德: 工业社会与战争》一文中, 指出实证论鼻祖的幼稚乐观主义。科学开发自然使人剥削人变得不合时代、毫无用处。战争随神权-军事政权的消亡而消亡。今天, 我们都在寻思, 生产到底是为了什

么? 接下来, 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就要让位于多种理念。

我觉得有必要参考苏联与西方的对话, 以便指出美国和欧洲对意识形态终结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什么区别:

539

美国学者反对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跟加缪反对意识形态的性质不一样, 加缪年轻时曾是共产主义者。跟我本人也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中断过与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进行对话。在美国, “自由主义”(就是左倾思想)并没有怎样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很少系统化, 难以形成一种历史哲学。1945年以后, 除少数例外, “自由人士”都坚决反共。美国人没有什么东西相当于伯克式的保守主义, 也没有考茨基式的马克思主义或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 连萨特式的进步主义都没有。美国人自由进取的学说, 很少以米塞斯的方式或哈耶克的方式作为一种理论表达出来。美国的反意识形态派从意识形态那里回来, 路并不远; 某些人不过是从欧洲回来罢了……^①

绝大部分和我辩论的人都不否认, 在发达国家, 对于意识形态或政治的激情比较平和, 但是, 乔治·利希海姆 (Georges Lichtheim) 反对我说, 不发达国家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恐怕难以进步。社会工程师的技术完全解决不了它们的问题。“全面解释世界史”, 对它们来说, 是实际的和紧急的需要, 如果它们不想同过去决裂, 另搞一套别种形式的文化的话。这便是它们的

^① 《三论工业时代》, 第200~201页。

物质进步需要付出的代价。就在同一篇文章里^①，我写了赞扬社会工程师的话，就是卡尔·波普尔爵士的“社会工程”：

当前的历史进程，既说明技术用得其所的威力，又说明人和社会的本性，是怎样抵制别人妄想“重建”社会秩序的。不仅如此，一切都好像人们越忍受他们的历史，也就越怀有普罗米修斯式的幻想，一心要制造自己的社会。相反，执政者处理一个一个的问题，很谦虚，出什么案子，处理什么案子，反而比较有可能获得如意的结果。正是社会工程师的实用主义与理性主义精神最合拍，并使人们最有可能去服从社会的本性，然后加以改善，而不是变成社会的主人和本质占有者。

利希海姆的反对虽然并不怎么针对我个人，但不失为掌握了部分真理。别人往往引用《知识分子的鸦片》的末尾一章，责怪我的怀疑和悲观。我在那里写道：“也许西方人梦想在政治上宽容忍让，正如他们在三个世纪以前为了选择真正的教会而以上帝的名义白白地互相残杀。他们当时对之已经心灰意冷。但是他们把前途光明的信念转送给了别的民族。无论在亚洲还是非洲，福利国家都没有广施福利，足以堵住那些空想妄想的冲动。”这就是说，我不想把缓和意识形态的诊断用于发展中国家。

540

利希海姆是否有理由走得更远一些，认为全面解释历史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是与千百年民族传统一刀两断必不可少的？日本和中国台湾搞现代化最有成效，但并没有求教于什么

^① 《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思想的复活》。

全面解释历史，也没靠革命。也许，神话可以帮助从事战斗的少数人取得政权，把社会倒个个儿。雷吉斯·德布雷已经不相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但是他认为它对革命者有用处。乔治·索雷尔 (Georges Sorel) 在他以前已经做过解释。至于我，我仍然认可如下几句话：

不管我们赞不赞成，发展中国家就是要革命。新的精英人物夺得独立，应该让他们负起独立的责任。我们不能以审判员自居，不能扮演民主或革命的导师。其实，治理这些年轻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很快就学会了行使绝对权力的本领，懂得了绞刑的必要性。何苦还去帮他们说服自己？他们出于历史的大道理，天职便是当刽子手，便是无所不为而于心无愧。

甚至对于西方问题，我也不肯随波逐流，表示乐观。我说：“我当然不能瞎说，西方的现状体现出人的政治地位的特征，或者说得简单一些，体现出摩登时代的特征。我倒倾向于相信反面。按照汤因比的说法，至少在历史动荡时期，极端的情况在许多方面更加具有典型性。”我从不认为，人会长期踌躇满志，因为他们得到了二十多年前还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

我们有运气，不再像祖辈那样被逼到墙根底下，不得不在保守和狂信中间进行选择：要么匍匐蜷伏，死捧着既得的利益，要么瞎了眼睛，一会儿大仁大义，一会儿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前几个世纪的自由派和社会主义者梦想实现科技进步，合理组织劳动，而我们知道这是现代化能够做到的。

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拥有，或将会拥有必要的资源，保证每个人都有像样的生活水平。仅仅为了广施福利，他们并不需要牺牲个人自由。不错，这种富裕叫人失望。姑且不说占人类2/3的人盼望的小康还远在天边，就说已经合理化的社会，也还等级森严，一会儿让民族激情，一会儿让种族狂热，撕得四分五裂。等到激情平息下来，这个社会又将在布尔乔亚的享福生活中，睡眠惺忪，瞌睡沉沉。爱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差不多全体的知识分子，轮流不息，大声疾呼，揭发核战争的危机，责备电视观众消极被动，不受娱乐行业的操纵，便受极权国家的操纵……他们有理由不满意那种差劲的现实，批评那些缺德的制度和大多数人的生活的无聊。但是，不管愿不愿意，他们根本没有本领拿出一个决然不同的社会形象来把现存的社会比下去……

1968年的前几年，我想跟赫伯特·马尔库塞^①唱一出对台戏，用“历史里的批判”对付“批判论”及其最终成果“大拒绝”。马尔库塞的诊断可以归纳如下：“批判社会的理论在发源时期已同各种现实的力量进行过对证（客观和主观）。在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内部，现实力量的运动有可能摧毁妨碍进步的现存制度而趋向比较合理、比较自由的制度。理论正是在这些实验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从这种基础上派生出一种理念，即解放那些发展所固有的可能性，否则，发展便受到封锁，生产力出现偏差，物质的和精神的能力与需要都受到扭曲。”^②但是，照马尔库塞

① 《三论工业时代》中第三篇文章。

② *On dimensional man*, p. 48, Boston, 1964.

的说法，“解放固有的可能性”已经不能充分表达历史的交替取舍。美苏两种社会在骨子里都不合理，但是已经得到公认。

542 从马尔库塞的这部作品中，看不出那种理性足以引申出“现实所固有的种种潜力”，也看不出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于是批判的理论沦落为“大拒绝”：完全拒绝人所共知的这两个社会，其中一个社会把生产力国有化，创造出解放人类所必要的下层建筑，但是解放的花朵又受到约束而不能开绽吐艳。另外一个社会较好地保障个人，但又把个人断送给人为的不合理的需求，断送给阴暗的谰言，断送给大权在握的官僚机器。这两个社会互相鞭策，发了疯似地搞核武器竞赛，直奔天崩地裂的战争。

我同意马尔库塞的一些批判，同意他对西方社会的口诛笔伐，但是有一个条件，批判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一股脑地拒绝西方社会。否定现实，远非产生于现实本身，倒很像一个知识分子离群索居，眼看着历史的进程而灰心丧气，但又念念不忘一些含义不明的价值，比方说，“自决权”。要是这样的话，还剩下些什么黑格尔 - 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呢？

批判社会的理论在最后的形势下，苦于一对内在的矛盾：“这门理论抱怨缺乏彻底的否定，同时又把调和人类关系当作至高无上的理想。‘大拒绝’从来没有被人认作在号召和平。在当今的局势中，‘大拒绝’之所以没有好战的性质，是因为它事实上置身于历史之外。”1968年5月头脑发热的几个星期中，大学生往往自称信奉马尔库塞，那是因为他们大多数人没有读过他的书。德国和意大利的恐怖分子当了“大拒绝”的化身，那是马尔库塞本人意想不到的，也是他绝对不会赞同的。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安德烈·希尔巴赫很自然地对皮埃尔·布里松说：“将军 543
重掌政权，就是大西洋联盟的结束。”对此，我回答说：“不，
将军那么精明，那么关心力量对比，绝不会同联盟或同美国断
绝关系，绝不会把美国赶出欧洲。他清楚地知道，莫斯科的目
的是离间欧洲人和美国人；难道他会赋予自己同样的目的吗？”
这就是我在 1958 ~ 1968 年，特别是 1962 ~ 1968 年的大部分岁月
中的信念，而将军当时则通过其言行，动摇了在反对第三帝国
大联盟解体之后于 1947 年建立起来的外交结构的支柱。

就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前，法国外交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是：对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应采取什么态度？从 1960
年至 1963 年，我写了不少关于英法争论的文章，这些文章更
多地表明了混杂和对立的感情，而不是思想上的变化不定。我
回想起 1940 年，英雄的英国只身为西方的共同事业做出了贡
献；我看到了傲慢的阿尔比恩（大不列颠）的衰落，它不得不
上门向共同体求助，要是在 15 年前，这个共同体就有可能置于
它的领导之下。在 1962 年 12 月 22 日和 23 日合版的《费加罗
报》中，我选择了《历史的不公正》这样一个题目作为我其中
一篇文章的标题。读者反应强烈：有的认为历史是不公正的，
有的则认为是公正的。前者提到了 1940 年英国只身抵抗希特
勒，后者则揭露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背信弃义的英国外交。

按照几个世纪以来给修辞班学生讲课的那种风格，我首先 544

对英法两国进行了比较。联合王国方面：

……理解殖民地人民的愿望，并同意帝国从殖民地撤出。撤出与帝国时期一样是光荣体面的。英国在战争时期全民一致，同仇敌忾，从未经历过重建家园年代的那种身心分裂……几个世纪或几千年以来，为贤人所称颂的全部美德在英国人身上都表现出来了。可是，今天，他们却受到了年轻的美国总统的侮辱^①，上门向欧洲共同体求助，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和前途都没有把握。

而法国方面：

它经历了1940年的深重灾难，维希主义和戴高乐主义势不两立，内阁不稳定，它深陷于殖民战争的泥潭中，军队几乎造反，领导和各党派之间的冲突仍旧没有解决。总之，我们没有逃脱被诅咒的世纪编年史中所提到的每一个不幸……然而，法郎是坚挺的，英镑则失去了信誉，法国向布鲁塞尔提出了自己的条件，法国在完成了非殖民化之后以及在欧洲的统一正进行之际，似乎掌握了自己的命运。

这种明显的反常现象的起因是，英国拒绝充分理解战争不可避免的全部后果：“……英国是其1945年之胜利的受害者，如同法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其1918年之胜利的受害者一

^① 肯尼迪放弃了空对地导弹计划，英国人指望靠这一计划来保持他们的威慑力量，这一威慑力量当时由轰炸机组成。

样，因为这两次胜利有一个共同点：它们是军事上的胜利，而不是政治上的胜利，是虚幻的胜利，而不是真正的胜利。”全都衰败了的欧洲大陆国家被迫抛弃了它们的习惯和传统，走向了新的未来。英国则不认为有必要更新：它首先是与美国结盟，其次是维护英联邦，最后才是同欧洲人合作。丘吉尔和保守党人为法德的重新和解而辩护，但是，所有工党和保守党领袖都对实施《罗马条约》怀有戒心。他们没有把欧洲统一计划当回事。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后，发出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该倡议的性质显然是使共同市场组织瘫痪。在自由贸易区的倡议被否决之后，英国提出了加入共同市场的申请。我们不能把这一申请解释为英国转向了共同体，而应解释为英国摧毁共同体的一种微妙方式，或至少可以解释为它想按照自己的观念和利益来改造共同体。 545

1961年年底，我在伦敦待了两个星期，以便探测英国领导阶级和舆论的动向。我拜见了哈罗德·麦克米伦首相，钦佩他能自己守口如瓶而让对手谈问题的那种艺术。希思（E. Heath）负责同布鲁塞尔进行谈判，他无疑改变了信仰，属于“欧洲派”（我在这里或那里碰到过一些“欧洲派”，但人数不多）。哈罗德·威尔逊不掩饰他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他用了近似孟戴斯-弗朗斯曾提出的反对法国加入共同体的那些理由：英国经济没有能力顶住欧洲大陆国家的竞争，为了能从竞争中获利，它首先应该进行改革。我的朋友休·盖茨克尔属于第三种学派，在他悲惨地英年早逝的前几个星期，我与他在巴黎共进了午餐。我喜欢这个工党领导人的淳朴、诚实和坦率（所有这些优点在职业政治家身上相对来说是少见的），这样一个工党领导人对共同市场也只是给予次要的重视。他对我说

过，如果我们能得到良好的条件，就赞成加入共同市场；如果六国把与预计的好处不相等的牺牲强加于我们头上，我们就留在共同市场之外。总之，对未来起较大决定作用的是远离古老大陆的地方，在印度，更确切地说，在亚洲、非洲。那里的原殖民地人民起来说话了，并向其原来的主子提出了挑战。

我这次调查回来，至少该说心中是没有把握的。英国人不是真心希望加入欧洲共同体，但又憎恨被排斥在外。我觉得共同市场还太脆弱，不能马上接受一个目标和利益肯定都与法国的目标和利益不一致的新成员。1962年9月4日，我不客气地阐述道：

546

……视欧洲为祖国的那些人不能不看到，在英国人的眼里（极少数人除外），欧洲永远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我们的英国同行所做的那样，只要稍加挑动，人们就会说欧洲大陆的人认为英国是美国在共同市场内的特洛伊木马……人们大致可以知道六国的欧洲将是什么样（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六国的欧洲注定要扩大）……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之后所带来的一切变化，都将与法国的构想背道而驰，我甚至可以说，与法国所有党派的观点都背道而驰。我们的代表对我们的英国朋友往往显得强硬，这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与此同时，我尽量不夸大冲突：

如果英国不进入共同市场，大西洋联盟也不至于垮台。说到底，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其他英联邦国家中，对布鲁

塞尔谈判失败感到高兴的政治家大有人在。怎能仅仅以戴高乐将军或许赞成艾德礼勋爵的愿望为借口给他戴上反英的帽子呢？

不管怎样，我这篇文章的最后一句话，说它巧妙也好，圆滑也好，反正揭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英国的申请并不反映政界的共同意见和全民族明确而又坚定的意志。许多反对加入共同体的英国人在法国官员中找到了客观的盟友，法国官员把当时流行的一句美国话“有问题，就有解决办法”，用玩笑的方式颠倒过来说：“有解决办法，就有问题。”^①

实际上，尽管戴高乐将军在1963年1月8日举行的著名记者招待会上的风格，更引起了我们的共同市场的伙伴的不满、英国人的愤怒和肯尼迪班子的气愤，但是，戴高乐将军是在理的。1961~1962年，大西洋联盟被两场争吵闹得不安宁：共同市场应该向英国开放吗？法国建立一支战略核力量将带来什么后果？在1963年1月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将军向伦敦和华盛顿同时说出了两个惊人的“不”字。 547

肯尼迪班子有一个庞大的计划。在经济上，由于英国的加入而扩大的共同市场将向大西洋地区靠拢，并将削减在六国变成七国的边境上的关税，与此同时，对美国的关税也将削减，从而对美国起保护作用。在政治上，统一的欧洲与美利坚合众

① 1971年5月，还是在蓬皮杜-希思举行决定性的会谈前夕，我写了一篇文章，最后几句话是：“英国加入共同市场的可能性为新开端提供了机会，但条件是我们的政治家们不要对我们未来的英国伙伴的利益抱有幻想，我们英国伙伴的利益比我们德国伙伴的利益，对于法国谈判者直至现在还维护的论点距离更远。”

国构成了大西洋联盟建设的两根支柱。肯尼迪犯的第一个错误是干预了只与欧洲人有关的辩论。第二个错误是为了补偿空对地导弹计划，向英国提供了北极星导弹用来装备由英国人建造的核动力潜艇。肯尼迪向法国政府提供了类似于与麦克米伦政府缔结的协议。戴高乐将军大有机会使用爆炸性语言，在预先布置好的场面有意扩大他两次否决的反响。除了政治上的理由，戴高乐将军拒绝了拿骚会议^①提供的条件也是出于技术上的考虑。法国人已制订了一个核军备计划，北极星导弹在1963年不可能列入这个计划之中。再者，既然制造核武器和运载工具要耗资几十亿法郎，法国的核力量还是完全法国式的为好，由法国工程师设计，法国工人制造。出于感情和理论上的考虑，肯尼迪班子更注重美国在联盟内部的核战略垄断，而不是武器垄断。这种垄断，戴高乐将军不想让与美国。因此，法美签订协议是不可能的。安德烈·马尔罗在拿骚会议和戴高乐将军申明否决的这段时间内来到了华盛顿，向肯尼迪总统暗示法美对话将可进行。至少肯尼迪是这样理解马尔罗的话的（美国总统从中做出推断并顺便对我说，最接近将军的人也不总是了解他的意图）。

在将军说出了“不”字后的那几个月里，我有机会对他的政策进行解释和评论。在《费加罗报》中，我的评论的措辞是讲究的，有时是“不中听的”（用将军本人的话说）。

1963年1月的著名记者招待会之后，我写了两篇文章（1963年1月19日和25日）。在第一篇文章里，我解释了将军的决策，没有对决策的主要方面提出批评，因为戴高乐政策“如同戴高乐将军本人一样不可动摇”。两个不合乎逻辑的出

① 英美在这次会议上缔结了关于北极星导弹的协定。

自国家元首的众所周知的观点：“共和国总统反对常规武器一体化，不可能不反对原子武器一体化。再者，由于法国既不拥有热核弹，也不拥有北极星导弹的弹头及能够运载这些导弹的潜艇，《拿骚协议》对它来说不具有任何现实利益。戴高乐将军不是那种打算以许诺参加多边力量换取美国的技术援助来进行谈判的人。”在解释了为什么戴高乐将军的拒绝是在大家的预料之中之后，我对引起公愤的拍桌子外交提出了保留意见。“难道一定要提示说新成员的加入就意味着走向大西洋共同体，即走向重建美国的霸权和欧洲卫星国化吗？”文章的后面我又写道：“我们可不可以对一项政策的有效性抱希望，是由它所触犯、伤害或侮辱的盟友的数量来衡量的……”我惋惜将军本人提出的那些论据，但没有批评创建一支法国核力量：“在等待法国核力量建立起来之时，也许没有必要去怀疑自己最需要的美国决心……在柏林事件中，戴高乐将军正是依靠美国的威慑力量来保障自己一味强硬的外交……”

几天之后，我在一篇题为《将军的秘密》的文章中回答 549 了读者的一些问题。我既没有批评将军反对英国提出的加入共同体的申请，也没有批评将军反对肯尼迪的庞大计划。我只惋惜将军采用那种与民主国家之间的永久联盟很不相称的作风，并对将军的最终意图进行了猜测。我认为有必要重提这篇文章中的某些段落，这是我对将军的外交所采取的比较典型的态度，这种态度对无条件拥护戴高乐的人来说是相当令人生气的，但在我看来是理智的：

人们给在第五共和国时期出现的这样一次记者招待会命名为玩政治——历史的高空杂技——它与美国记者和美

国总统所称的不大相同。戴高乐将军的每一次记者招待会都是一部艺术作品：演讲者浏览全球，追溯过去，放眼未来，鞭挞某些人，颂扬某些人，蔑视敌人，毫不掩饰对自己所塑造的法国感到满意。然而，这部艺术作品也是一种政治行动。在一句拐弯抹角的话中，阿尔及利亚部长本人获悉撒哈拉将属于民族解放阵线所要继承的遗产的一部分。这种政治行动最终是一种战略和自传的材料。讲话的确切意义依然捉摸不透。眼前争取的目标并不总是清晰可见的，长远的打算则被小心翼翼地保持在暧昧之中，这种暧昧充满了神秘，变成了一个不解之谜（温斯顿·丘吉尔语）。无论什么事件，戴高乐将军似乎都能预计到并且由他操纵指挥。在《回忆录》第三卷中，他建议重建几个德国（如同在红衣大主教黎塞留时期和帆船时期一样），并通过同德国人重新和解来实现欧洲统一，这样便保证了他的先见之明。对苏联（一般称俄国）也是一样，他在考虑对苏联采取完全强硬态度的同时，只待事过境迁又向苏联伸出手去。如果演讲者的思路没有遗漏任何可以设想到的前景，那么，先知先觉几乎不可能有差错……

550 接着在我的文章中，我提到了记者招待会上有关法国打击力量的那一大段话，法国是否可以更多地依靠几十架幻影IV型战斗机而不靠美国的巨大实力？我提醒说，对戴高乐将军的话始终需要做一番解释，需要猜测他的真实想法。因此，“当他声称希望对阿尔及利亚问题寻求最法国式的解决办法时，他真正想的是什么呢？”我指出了那既言之有理，又很可能为未来做了铺垫的两个短语：“自然，美国的核军备依然是世界和平

的保障……不言而喻，法国并不一股脑地反对这支力量和其盟国的类似或相同力量采取联合行动。”

关于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和英美巴哈马协定这两个正在争论的具体问题，我重提了将军做出的决策是站得住脚的理由：“共同市场同英国、英联邦和美国就共同市场签订一项协议，不管多么必要，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共同体将会立即扩大，这一扩大本身包含着分化瓦解的危险。同样，法国已开始制造核武器，在已制定的计划产生初步成果之前，是难以抛弃这一计划的。”

这一实质上的赞同在我文章中所占的位置以及它所引起的注意，反而不及我对将军的风格和方式多少带点讽刺性的批评：“英国被宣布为岛国，因而不是欧洲国家，难道1940年时它也不是欧洲国家吗？英国在欧洲主义的考试中首次落选，就该过几年在这方面取得某些进步后再应考……最终，大家不禁产生了疑问，因为将军把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所运用的极其成功的方法用于世界外交上，隐瞒了他的真实想法并任凭每个人对他的真实想法进行猜测……”因此，我得出的结论是：“我认为大西洋联盟已足够牢固，对一个关心个人地位和个人隐私的伟人可以宽宏大量，但是，如果他不幸收了徒弟，那么，联盟就会吃不消了。”

我记得在两个会议上，我为法国政府的论点进行了辩护。我想第一个会议是大西洋联盟所有成员国的军事首脑年会。我从未见到过这么多的陆海军大将佩戴着这么多的

牛津大学见到他在当某学院的院长)用阴沉的语调描述了危机将会造成的后果:被排斥于欧洲统一之外的英国,注定要走向经济衰落,最终只好闭关自守,离开大西洋联盟(这一推理当时在我看来更多的是出于感情上的冲动,无法令人信服)。

在香榭丽舍大街的英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晚宴上,这种情感爆发得更加强烈。在晚宴结束时,作为主宾,我发表了讲话,我尽力阐述将军的理由和意图。一反常规,我的讲话多次被该俱乐部的一些成员,特别是荷兰人所打断,我好不容易才结束了我的讲话。当联盟的秘书长迪克·斯蒂克讲话时,我也不顾礼节规定,多次打断他的讲话,使他无法把话讲完。主持晚宴的斯托克维尔将军站起来,把我拉到一个摆着烈性酒和雪茄烟的客厅。几天之后,美国大使托马斯·范莱特邀请我与他单独共进午餐,向我这个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挑衅”和无礼待遇的贵宾表示歉意。说实话,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古巴导弹危机,而不是欧洲内部和大西洋内部的争吵。

如果不是由将军独自向世界表态,申明法国反对英国加入共同体,仿佛除了我们,欧洲共同体里面的其他成员国都无权参与对话似的,那么,法国的否决也许不至于引起这么多的怨恨?不管怎样,将军在主要问题上没有搞错:共同体的五个成员国没有因为我们的总统曾经傲慢地对待它们而同巴黎断绝关系。其实,它们自己也不是不知道,伦敦的申请没有得到强大的舆论支持;多年来,英国人对共同市场只是改变了措辞,并没有改变感情。他们曾揭露“歧视性政策”,即在六国的边境建立了关税制,其他欧洲国家以及大西洋联盟的其他伙伴国都享受不到关税方面的好处。反对歧视性政策的论战在我看来

是不值一提的：共同市场实质上意味着内外有别，这是完全合理的。在对歧视性政策进行了攻击之后，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出笼了，该计划想把欧洲共同体扼杀于摇篮之中。英国加入共同体的申请表明的是另一种思想，还是不过是另一种方式呢？无论如何，伦敦的谈判者向自己掩饰了其立场的脆弱性，因此，他们无权提出各种条件。共同体内部支持英国的人不能强迫法国人同意；如果没有记者招待会引起的轰动，谈判的失败不会掀起轩然大波，但将军是很欣赏暴风雨的。

将军拒绝《拿骚协议》提出的建议，更加剧了人们对其反对伦敦加入共同体的不满情绪。他的话既针对肯尼迪，也针对麦克米伦。他不仅拒绝在拿骚匆匆达成的英美协议，而且迎头痛击肯尼迪的庞大计划和由来自哈佛大学或兰德公司的人士带进白宫并灌输给总统的这个信条：在原子时代，应只有一个人掌握扳机。在一个联盟内部，在大西洋联盟内部，掌握武器和使用武器的决定权应归于一个人，因此应归于美国总统一个人。

1962年5月，我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美国的这一立场：在核方面同英国保持“特殊关系”，但拒绝同法国原子能署进行任何合作。我使用了多次被人援引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话：为什么秘密会毫无危险地传过大西洋直达伦敦，而不能传过英吉利海峡直达巴黎呢？我要指出，这篇文章写于1962年5月，那时，布鲁塞尔谈判正在举行，肯尼迪政府正想方设法使欧洲人理解并接受麦克纳马拉理论。我向麦克乔治·邦迪发了一封5月16日写的信，邦迪当时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这一

职务后来由亨利·基辛格接任。他给我回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我一直保留了20年，但今天它已无任何秘密：“您说得有道理，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感情是来自我们的这种信念，即西方的核防务是根本不可分割的。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我们对英国核能力的估价与我们对法国核能力的估价是一致的。”在接下来的那一段中，麦克乔治·邦迪解释了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在什么情况下重新搞核合作的。1957 ~ 1958年，苏联发射卫星的冲击促使美国人寻找前沿基地。况且，当时美国人还没有考虑到今天所考虑的问题：“我赞赏您的论据的说服力：法国人对因为我们的思想变化而导致的区别对待是不会感到满意的。”

他的中心论点是用下述提法表述的：“由于我们认为，集中控制和不可分割的反击对建立西方核防务来说是危险性最小的手段，因而我们认为只有出于异常重要的理由，我们才能改变我们的现行政策。在法国努力搞独立核防务的情况下，我们看不到这种迫不得已的需要。可以肯定，法国有权进行这方面的努力，我希望您不要认为肯尼迪政府会以敌视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决定。我们可以对这一决定表示遗憾，但不是由我们来反对它。”麦克乔治·邦迪就各国在核防务方面所做的努力有可能朝欧洲联合方向演变的问题讲了几句之后，又研究了德国和英国这两国的情况。眼下，他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核武器没有关系，不会因法美合作而感到受了侮辱。但从现在起至下一代还会是同样的情况吗？”

接着他谈到了英法截然不同的态度：“在核方面，英国的特定目标不是要建立核自治，而是要保留提醒美国谨慎小心的建议权 (cautionary counsel)。英国政策的目标是同美国保持密切关系，保持安全的磋商关系 (advisory relation to the safety-

catch)。法国的政策则完全相反，倾向于对美国保持越来越大的独立性并倾向于直接掌握核主动权，这种说法难道是完全不正确的吗？”伦敦和巴黎之间彼此对立的意图触及了问题的实质。向一个自己提出要维护亲密联盟关系的国家提供援助，同向一个首先关心扩大自主范围的国家提供援助，所遭到的反对是不一样的。

麦克乔治·邦迪在信的结尾指出了—个事实，该事实以某种方式解决了问题。戴高乐将军从未就法美在核军备合作的问题接近过美国人，戴高乐将军也从未允许法国政府的代表去谈这个问题。他以提问的方式做结论说：“我希望您就这一谅解的可能方式谈谈自己的看法。”可惜我没有找到我的回信。我很可能给他写了我不断对我的华盛顿朋友们所说的那些话：既然您不能阻止法国创建自己的战略核力量，而且您也承认这一事实，那就请您不要再斥之为无效的和危险的，再说，这种说法多少是矛盾的。就在这同一年，1962年，即1963年1月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之前，沃尔特·李普曼访问欧洲回来之后，写了一本题为《西方团结与共同市场》^①的小册子，他采取的立场是令人惊讶的，因为他以前常常表示出赞同他所钦佩的将军。

李普曼努力领会将军的论点。他认为，将军根本不怀疑美国的威慑价值，而是予以完全的信赖。在将军看来，东西方平衡已经确立，战争是不可想象的。在1963年能杀害2000万俄国人的这支“小力量”可以用来做什么呢？“可以用来防止被卷入在亚洲爆发的核战争，也就是说，不介入法国民族利益区

^① *L'Unité occidentale et le Marché commun*, Paris, Julliard, 1962.

域以外的战争。”其次，“核打击力量是一种由美国担保的策略，同时，特别是要使欧洲大陆保留核主动”。李普曼从西方核力量的分散中看到了美国垄断的结束，同时也看到这对美国是一个致命的危险。

由于火箭极为昂贵，英国早已退出了火箭竞赛。英国的轰炸机在这 10 年内将过时。英国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因此，法国不存在重犯这种错误的问题：“西方联盟内部在核问题上的最后责任应该只属于一国首都，而不是属于两国或三国的首都。如果我们的核力量指挥棒不再掌握在华盛顿手里，那么这种局面对美国来说是无法支撑的。”在后面他又评论说：“西方联盟内部若有另一支核力量，这支比较独立的力量足以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但由于它太弱以致不能打赢这场世界大战，那么，这支力量将对世界和平与我们自身的安全构成一种威胁。”

李普曼曾是戴高乐主义者，现在又重新成为戴高乐主义者，他在这时候揭露了“戴高乐主义好大喜功的梦想”，这些梦想与德国的真正利益有深刻的矛盾。^①更有甚者，他把肯尼迪政府的伟大思想及庞大计划同维护美国的原子垄断结合到一起了：“……肯尼迪预计英国和其他几个欧洲国家将被接纳到共同市场中去。欧洲的中立国将同共同市场协作，将同英联邦国家达成友好的谅解，最后，美国将加入一个削减关税的广阔贸易区。”

我知道戴高乐将军的“宏伟计划”无论如何与肯尼迪的是不相容的，不管我多么热衷于大西洋共同体，我既不赞成李

^① 他告诫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不要被卷入戴高乐主义的事业。

普曼关于美国核垄断的论点，也不赞成共同市场立即向英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无论它们是不是大西洋联盟的成员国）开放。

为庆祝《纽约先驱论坛报》在法国出版 75 周年而举行的午餐会上，李普曼就法美关于核武器问题举行对话一事进行了 556 引起轰动的讲话。就在 1963 年 1 月将军提出反对意见的前夕，1962 年 12 月 3 日我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他。这篇文章被法国驻华盛顿使馆采用了。我在文章中说，李普曼把“大西洋联盟比作一辆在盘山公路上行驶的汽车，美国总统驾驶大西洋汽车，乘客（即欧洲国家）应信任驾驶员。对乘客来说，这样的要求太过分了”。接着评论员从总的方面尽量明确地指出，在什么情况下，即“战略力量平衡发生危险时”，美国将冒打一场热核战争的风险。这一提法勉强可应用于古巴危机，人们很难看出它怎么能应用于柏林危机。李普曼没有在设置在古巴的苏联导弹和西柏林的具体自由这两者之间找到共同点。事实上，古巴危机和西柏林危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肯尼迪总统的庄严承诺，一方面他不能容忍古巴有进攻性武器，另一方面他则要维护西柏林的地位。

我不否认欧洲人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拥有一支名副其实的威慑力量。但是，如果美国人请欧洲人完全信赖驾驶员，那么“欧洲人将肯定会去做李普曼不愿他们做而客观上又逼迫他们去做的事。为了获得一支威慑力量，也许是无效的威慑力量，他们将不惜做出最大的牺牲”。

与那些传说相反，无论在第四共和国时期还是在第五共和国时期，我对法国关于制造原子武器的决定从未表示过反对。甚至在 1960 年 2 月法国在撒哈拉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之前，

我还在 1959 年 11 月 26 日写的一篇文章中列举了赞成政府论点的理由：“不管人们怎么说，法国从现在起至 1965 年或 1970 年，并非不能依靠自己的科学技术资源建立起一支‘小小的原子打击力量’。为达此目的，只要每年花费几千亿法郎^①，法国从现在起至 1965 年将拥有几十颗原子弹和几十架超音速轰炸机。从现在起至 1970 年，有可能用美国的专利合作制造中程弹道导弹（IRBM）来替换达索轰炸机。”那时最好不要提美国的专利，最好用“补充”这个词来代替“替换”。

那时（1959 年 11 月），我没有谴责这支“小小的原子打击力量”，它“也许在为今后 25 年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准备”（确实，早在 1985 年以前，法国就已使用装备有导弹的核潜艇，这些导弹能打击苏联的大部分城市）。可是，我列举了一些与严格的安全打算无关的理由：

打击力量具有某种威望……在同美国进行关于交换机密的谈判中，它具有无可争议的外交价值。它是一种最后的手段。假设这支打击力量躲得过突然袭击和地面摧毁，它将使可能的侵略者冒的风险大大超过其使法国失去战斗力的好处。最后，当大西洋联盟需要制定对付苏联的抵抗路线时，也许它会使法国的声音在联盟的各项建议中更具有权威。

几年以后，在小册子《大辩论》中，我重提了法国核力量问题，并以我的方式对此做了介绍：

^① 我是用旧法郎计算的。

用完全是安全方面的语言来进行分析，会歪曲这场辩论的确切前提。应该给这场辩论至少加进另外三个方面的问题：对盟国的影响或联盟内部的自主；在世界舞台上的威望；最后，关于选定的经济发展计划的作用，特别是科学进步的作用。

在同一章的末尾，我介绍了法国的计划，并为该计划辩护：

法国不愿被排斥在核技术之外。它不愿整个欧洲大陆永远处于英美的保护之下。它考虑到中长期的前景，考虑到世界局势可能大变，因此采取了防备意外的措施。不管怎样，即使是一支有限的力量也会带来一些外交王牌，同时会对负有主要威慑责任的盟国战略，提供施加影响的机会。在威慑方面，即使人们不大相信以引爆核战相威胁的法国力量会对苏联领导人的思想产生影响，但在这些更多属于心理方面而不是逻辑方面的问题上，人们也不能断然否认，这支力量会给那些希望发动侵略的苏联指挥官们增添一个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计划本身比它的辩护者更有说服力。

558

我赞同当时被称为“打击力量”的论点没有引起大多数读者的注意，因为我当时也提出了反对意见。我没有加入热烈欢呼法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行列中去，不管这种欢呼是自发的还是有组织的。我认为属于第一代力量的幻影 IV 型战斗机不太能够代表第二次打击力量。我觉得这种飞机无论在地面还

是在空中，都是易受攻击的。我永远不会赞同以弱对强的威慑理论，或更普遍地被称为“庇护所”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从此成为官方的理论：拥有核力量的国家将确保其国土具有“庇护所”的性质，该国的国土从此将享有绝对的安全。然而，由于小的打击力量只能打击敌方的城市，换句话说，它会招致大规模的报复，以弱对强的威胁的可信性至少是令人怀疑的：法国会首先采取对苏联使用核武器的主动行动吗？

就这样，1960 ~ 1963 年，我成了负责公共关系的官员们的眼中钉。我有一个学生在该部门服兵役，他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使命：阅读我的文章，并撰写文章驳斥我。这场辩论到底留下些什么？没留下什么，尽管同样的辩论在今天又开始了，而实际上这场辩论比 20 年前的更为现实了。在 1960 年代初，法国因为拥有原子弹和幻影 IV 型战斗机，才勉强具备了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而美国的威慑能力则比我国的要强得多。戴高乐将军在一句拐弯抹角的话中居然甘心承认了这一点。在我的文章中，我尽力说服他不要把我们的战略核力量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立起来，相反，倒应该把这支力量加入到大西洋联盟中。我不大相信当时流行的“导火线”的想法：一国有核力量会迫使美国使用核武器。事实上，将军想把核力量作为法国军事独立的象征，而那时，1961 年，甚至肯尼迪新政府也在修改美国的官方理论。美国的逐级反应新理论与法国的概念不一致：只要脆弱的运载工具只能打击大规模目标，换句话说，只能用于打击城市而不能打击军队，那么一支小的打击力量注定要招致大规模的报复。

对于肯尼迪和戴高乐将军各自的宏伟计划所进行的任何磋商，不管是多么微妙，都没能创造奇迹，使这两个计划协调一

致。我不抱任何幻想，对肯尼迪政府中的朋友说：请不要再宣传反对各国自己掌握的核力量，特别是法国的核力量；请不要用毫无意义的指责来加深大西洋两岸的误解了。在法国，尽管没多大成效，但我还是利用一切机会提醒说：法国的核力量不能代替美国的核力量；还是不要使美国的核力量丧失信用为好，没有美国的核力量，1960年代的法国核力量无足轻重。

1961~1963年展开的有关战略问题的辩论渐渐趋于平息，这倒不是因为缺乏对话者，而是因为人们对此已感到厌倦。这两个宏伟计划，还是将军的计划占了上风。他禁止英国进入共同市场。尽管遭到美国的指责，他仍然实施了建立本国打击力量的计划。这两个决策都是由他独自做出的。但是，戴高乐的宏伟计划能超过眼前能达到的目标吗？眼前能达到的目标指的是，法国加入原子能俱乐部，并拒美国最亲密的战友（英伦三岛）于共同市场的门外。

李普曼也对戴高乐的宏伟计划提出了疑问，该计划与“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提法一样神秘。他怀疑将军想创建一个法德两国的欧洲：

肯尼迪总统是有道理的。他事先就告诉法国人和德国人，尽管美国不打算离开欧洲，但是有可能被迫这样做。如果美国人迫于形势，不得不起来保卫欧洲，进而导致战争，性命攸关的决策却不归华盛顿去做，而是由巴黎或波恩做出，那么，美国就不得不退出欧洲。如果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博士执意要创建他们梦想的所谓欧洲，一个把英国排斥在外、无视共同市场中的小国、给中立国泼冷水并傲慢地拒绝美国提供的协作的欧洲，那么，美国就有可能远离欧洲。

是形势逼人做出如此悲剧性的分析吗？是形势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情绪吗？由戴高乐将军和阿登纳总理设想和缔结的法德条约确立了两国的和解，难道这一条约为法德共同管理整个西欧从而为摆脱美国的领导做了准备吗？诚然，戴高乐将军把《北大西洋公约》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看成导致欧洲附庸化的工具。但我不相信他曾希望美国军队撤走；他经常重复道，美国的核力量是世界和平的保障。但是，不管将军的最终意图是什么，从1964年7月起，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已承认法德条约的失败，或至少他在提到以前所抱的希望时流露出失望的情绪。

然而，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即使法德条约已在某些领域取得了具体的成果，并已使两国政府以及它们的行政部门进行了接触，总的来说，我们认为这些接触是有益的和十分令人愉快的，但至今没有制定出一个共同的行动路线。我们可以肯定，在波恩和巴黎之间没有、也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对立，但它关系到法德两国在防务方面的真正合作，关系到大西洋联盟的新结构，关系到对东方，首先是对莫斯科的卫星国应采取的态度和行动，关系到相互关联的中欧与东欧的边境和国籍问题，关系到承认中国以及欧洲对该国伟大的人民在外交和经济上所能做的事情，关系到亚洲的和平，特别是在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和平，关系到对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需要提供的援助，关系到建立农业共同市场，因此关系到六国共同体的前途。人们不能说德国和法国仍然同意一道制定一项政策。人们不能否认，直到现在，波恩还不相信这一政策应该是欧洲的独立政策。

这篇文章所述内容是十分清楚的，但多少带点儿神秘色彩。将军是否曾认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将毫无保留地加入有损于美国联盟的法国联盟？法德在防务方面的合作将采取何种形式呢？大西洋联盟的新结构是什么样的呢？不管怎样，在法德条约宣告失败之后，戴高乐的外交仍然具有真诚的潜在性，只不过变换了一种方式。它转向苏联和它的卫星国。在记者招待会上，将军提出了另一整套计划。

1964 ~ 1968 年——后来，“五月风暴”以及由此造成的后遗症，使将军不能够再将精力和时间用于制定重大的政策——将军的对外政策没有出现前后不连贯或转折，然而，法德的蜜月已属过去。将军和阿登纳总理签署的条约继续存在，但为欧洲摆脱“附庸地位”做出努力一事，将军已不再指望波恩了。根据他历次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来判断，从此，他已把希望寄托在苏联身上，寄托在东西欧的和解上了。

在 1965 年 9 月 9 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戴高乐将军提出了欧洲独立的另一条道路。在提及了罗马尼亚总统毛雷尔前不久进行的访问和对波兰总理西伦凯维兹的即将来访表示欢迎之后，他声明说：

我们毫不迟疑地设想着这样一天的到来：为了达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建设性谅解，全欧洲都愿意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首先是德国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可行的途径是通过一项全面的协定。到那一天，我们的大陆可以为全人类的幸福在世界上重新发挥与其资源和能力相称的作用。

562 1966年10月28日，将军以更加露骨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谈到的是法德条约：

在联邦共和国的要求下，我们甚至同它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已签订快4年了，这个条约本可以作为两国在政治、经济、农业和防务方面进行特殊合作的基础。如果把我们将排斥在外，由波恩和华盛顿缔结并不断加强的特殊关系使法德这一协议失去初衷和实质性的内容，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因此，我们莱茵河彼岸的邻人很可能在两国本来可以实现的共同行动上失去机会。因为他们实施的不是我们的双边条约，而是单方面的声明，从而改变了双边条约的整个意思，而由他们自己加进了在别处，特别是在东欧，也许甚至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这就打破了事情最初规定的前提。

在同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英国申请加入共同市场时，他强调指出了大西洋联盟国之间的关系和欧洲一体化之间的矛盾：

就这样，我们不得不于1963年停止了在布鲁塞尔进行的关于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的谈判，这诚然不是我们不希望看到有朝一日这个岛国的伟大人民真正地把其命运同大陆的命运连在一起，而是事实上它不能执行共同规定，并且不久前在拿骚表明，它在名副其实的欧洲以外，别有效忠之处……

接受美国的武器（更确切地说，是购买美国的武器），在戴高乐将军看来等于对外效忠。我们共同体的伙伴们怎么能追随这

样一个向导：他似乎在两个巨人之间几乎做不出区分，姑且不用更重的字眼，他怎能同美国达成任何协议都看成依附呢？

1966年，戴高乐将军看得更远，已经不限于一个摆脱了美国的控制的统一的西欧。他认为欧洲的解放只能通过东西欧两方的协议来实现：“此外，即使有朝一日，六国经济集团增添了政治上的协调，但只要东西欧人民不能和解，就依然做不出任何对欧洲有价值 and 牢靠的事。特别是，像德国的命运这样严重的问题是不可能设想用其他办法加以解决的。”后来，他补充说：“人们知道所取得的进展有多快有多大，人们知道法国和苏联这两个国家签订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协定开辟了何种真正广阔和富有成果的前景……” 563

在法德条约告吹之后，将军多次谈到了德国问题。例如，在1965年2月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对法国来说，今天的一切都可以归纳为三个紧密相关的问题。我们所做的是为了使德国从此成为一个进步与和平的可靠成员。在这种条件下，可以帮助它实现统一。采取方式，并选择可以达到这一目的的环境。”将军在追溯了粉碎第三帝国以来所经历的几个阶段之后，概述了他的分析：

在世界上的这样一个地区，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显然不可能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噢！也许，人们可以设想，事情还将像它现在这样长期继续下去，明天和昨天一样不会爆发世界大战，因为彼此的原子威慑将成功地阻止滔天大祸。然而，很清楚，只要德国的不正常状态继续存在，只要这种不正常状态引起的不安和带来的考验继续存在，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平，更不必说东西方之间富有

成果的关系……只有当过去一贯是、现在还是、将来仍然是关心日耳曼邻邦命运的人民，简言之，即欧洲人民达成谅解并采取共同行动时，那些应该做的事在某一天才有可能去做。但愿欧洲人民首先考虑一起研究他们本大陆的问题的解决办法，共同解决问题并联合起来为这一解决办法提供保证。这是在大自然赋予欧洲的那整片土地上重新出现并保持平衡、实现和平与合作的唯一途径和唯一纽带。

564 在戴高乐将军的想象中，欧洲的这种和平是即将来临，还是仍然遥远呢？他列举了得到德国的所有邻国赞同的、实现德国统一所必需的各种条件。在这些条件中，他举出：“这就是俄国在发展中不再把自己的前途放在自己和别人同受其害的极权制度上，而是放在人类与自由的人民共同实现进步上。这就是被苏联变为卫星国的那些国家可以在一个更新的欧洲发挥各自的作用……”将军本人认为，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平衡或协调，要求苏联改变其体制。他相信会出现这种改变吗？在什么时候？在这两个问题上，“将军的秘密”（这是我多次使用的表达方式）始终没有被揭开。

对这种模棱两可但又洋洋大观的全部政策，我从未表示过赞同。（况且，当我是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时，我也认为，将军就德国问题的论点既不合时宜又不现实。）将军往往将两个超级大国等量齐观，在同一次演讲中，他把苏联的极权主义同美国的友谊相提并论。他似乎把解散各个集团和东西欧双方的接近作为自己的目标，就好像美国的霸权同苏联帝国主义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通过这些，他在本国散布了当前世界的一种假象，挑起了法国人民潜在的反美情绪，并使法国人民忘记了，苏联

在军事上在欧洲中部扎下了根，对我们的民族独立构成了唯一真正的威胁。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和平欧洲纯属幻想，或者是在近期毫无希望实现的长远目标；它暗含了一种错误和危险的想法：把“欧洲派”和“大西洋派”完全对立起来。把“大西洋主义者”一词作为贬词是从戴高乐将军那里开始的。

法国逐渐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系统，由此表明了其独立倾向。对于法国在这一过程中采用的措施，我平心静气但毫不宽容地进行了评论。与一体化指挥系统的最终决裂，标志着戴高乐将军上台后不久便宣布的并很快就付诸行动的一项政策已经可以功成身退了：地中海舰队最先退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系统，然后是大西洋舰队；理所当然，战略核力量也立即归法国政府自己指挥。要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基地或美国的基地撤走，清除这些基地，使从一开始就定下的一项政策合乎逻辑地被逐步实施了。

565

有一点经常被公众忽视，但很有必要对此加以说明。在将军重新掌权之前，法国军队在和平时期名义上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配，实际上仍由法国指挥。“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支配”这种表达方式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实际上，只有在发生冲突时才实行。当阿尔及利亚战争迫使法国政府从大陆调几个师到北非时，法国政府丝毫没费气力。所以，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军事上并没有像观察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引起什么变化，却具有立即引起轰动的意义。

将军和他的亲信们列举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论据来证明：把由法国军队参加的军事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外国将军是不合适的。1944年，艾森豪威尔将军轻率地考虑从斯特拉斯堡撤军时，没有估量纳粹分子重返城市，甚至旋即重返城市的政

治后果。多亏戴高乐将军的干预，这场灾难才得以避免。在更高一级，特别是在高等军事研究院发表讲话时，将军多次强调说：若不幸发生战争，那么，战争应该是法国的战争，应该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战，并应该由法国当局来指挥。由于战争的危险在欧洲本土出现的可能性比在世界其他地区小，这条原则就变得更为紧要了：法国不愿因东南亚或中东这些遥远地区的冲突而卷入一场与其无直接关系的战争中。最后一条理由是：既然法国从此拥有一支纯属本国的战略核力量，那就必然会设想出一个关于防务的理论，这个理论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论并不抵触，但并不从属于或者并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理论。

566 从1962年至1966年，同大西洋主义的决裂没有在法国引起一场大辩论。肯尼迪政府用“逐步升级”的理论代替了“大规模报复”的理论，这触及了欧洲安全的实质以及美国保护的价值。民族独立和防务自主的提法满足了法国人的自尊心。法国人不是不知道美国人保持着驻防欧洲的军队。因此，法国人在幻想着不欠任何人的账，对美国的保护视而不见。

将军本人是怎么想的呢？我在这几年间，多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我认为，很明显，意味着主权国家行动自由的“独立”，对他来说不只是一种手段，而本身便是一种目的。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既然损害了或者说似乎损害了这种独立，他就根本无须另外什么理由来与该组织决裂。法国应该重新恢复它的“独立”，无论今后独立的目标是什么。对今后的目标，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想象。

1966年，戴高乐将军展开了对东欧的全面外交攻势，他只谈欧洲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一律享受和谐与保持平衡，但是根本不提美国；因此，评论家们对这个宏伟计划进行了猜测：是

清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遗症吗？是不再让旧大陆一分为二，彼此都组成军事集团，进行武器和决心的较量吗？将军利用每一次机会强调把欧洲人与欧洲人的关系同欧洲人与美国人的关系这二者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德国问题将由欧洲人来解决，特别是由地处“欧洲中心的国家”的邻国来解决。总之，将军为自己设定的目标是不是要把美国排除出旧大陆，把法国独立扩大到以同俄国结成“良好而传统的联盟”为基础的欧洲独立呢？将军已经尝试过同波恩结盟来动摇“美国的枷锁”，他是否想另辟蹊径，通过同俄国结盟来达到一样的目标呢？

也许，这就是戴高乐派所描绘的远景，那时候，欧洲才摆脱了两个集团的枷锁而获得了和平。然而，就像我在上面驳斥安德烈·希尔巴赫时所提到的那样，我从来不相信将军会希望——至少在眼下——解散大西洋联盟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67
诚然，将军曾多次宣称两个大国的相互威慑取代了美国对苏联的单方面威慑，从而完全改变了世界局势。从此，谁也不可能知道美国的核武器是否会用来，以及何时会用来保护欧洲。他提到了两个大国在相互尊重它们自己的领土之际，有可能在第三国的国土上打一场仗，譬如在欧洲进行一场战争。但是我难以相信，第一代的战略核力量，即在地面和空中都易受攻击的幻影IV型战斗机，能填补美国“核保护伞”的漏洞。我认为，戴高乐将军意欲消除美国在战后那些年代里所取得的优势，取消对保护人任何形式或任何迹象的依附，大张声势地显示法国的独立，同时，保证法国的安全。由于苏联统治区和法国边境之间一支日耳曼-美国军队的存在，这种安全得到了保障。

这些对戴高乐外交政策的评论大大激怒了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我不采取一贯赞成或一贯反对的立场；我在多次赞成这种政策的

同时，也批评政府发言人的论据。我举 1964 年 12 月 1 日的一篇文章为例，这是在议会就第二个军事纲领法进行辩论后写的：我看到了在核武器方面要做的优先努力，而到 1970 年，至多“有两个师可以实现现代化”。我不批评这样分配军事开支，但我从这一分配中找出了不同于官方的辩解的另一种真正的含义。

在唯一的大国和法国边境之间，夹着联邦德国的国土。在这块国土上驻扎着美国和德国的师团。这就使得法国不需要有许多装备常规武器的师。正像多数派的一个议员所说的那样，并不是常规手段的缺乏让使用原子武器的威胁变得更加可信，而是我们的盟国提供了“盾牌”。法国即使明天正式退出北大西洋联盟，也将仍然得到美德军队的保护。

568

接着是关于法国本身威慑力量的辩论：

当梅斯梅尔声明说，一有侵略，无愧于其名称的法国政府就将毫不迟疑地发动原子报复战，他不是在恐吓任何人，也不是在恐吓法国人，尽管不幸的命令若是下达了，无愧于其名称的政府就会促使法国人为国捐躯……无论如何，只要美国军队在古老大陆上表明自己信守诺言——尽管法国“专家”会对这种诺言表示怀疑，但克里姆林宫的人会明智地把它当真——苏联领导人仍将受到美国热核武器的威慑。

关于战略核力量的作用，我思忖着，苏联的何种主动行动会被法国的威胁所震慑，而不是被美国的实力所震慑？不可否认，法国的核力量增添了对方捉摸不定的因素，但我可以肯

定，“需要许多年之后，法国的力量才能够代替美国的力量。当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正在努力加强某些欧洲人与美国的联系，这是符合法国的利益的，而法国的外交却给人一种仿佛要松懈这些关系的印象——当然是错误的”。

我这种说法不无讽刺的味道，因为当时法国极力反对多边力量和德国参与核事务。我说人们对法国外交的印象是错误的，其实是我把一些显而易见的看法强加给了戴高乐：“我的确说了这是错误的。法国的安全应该建立在美国实力的基础上，这是事实，戴高乐将军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实，但是，根据他对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看法，却没有任何理由来偿还美国迫于形势而无偿地向他提供的东西。”我这篇文章的结论，会让人认为“当然是错误的”的这句话具有挑衅意味：“既然承认没有任何战争危险，而我们的盟国，有的拥有常规武器，有的拥有主要的威慑力量，那么，严格用外交语言来解释法国的军事政策是完全说得通的。”（1964年12月3日）

请不要忘记，这是1964年的分析，也不要忘记，当时，569
战略核力量只是由幻影IV型战斗机组成的。至少暂时地，这支力量主要是具有外交上的价值，并非一种反对祖国的罪行。当我把类似于我的看法说成是将军的看法时，这也不是一种亵渎君主罪。两年多之后，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在《世界报》的“自由谈”专栏里以友好的态度，责备我过于随便地解释将军本人的话：“如果人们没有理解错的话，对国家元首的深刻思想做出真实解释的要数雷蒙·阿隆先生本人了。通过他，戴高乐将军好像对我们说，‘但愿我的宣传不会使你们感到不安：这不过是装饰品’。”

1966年9月15日，我回答说：在阿尔及利亚事件中，最少搞

错将军意图的人不正是对他的这个或那个声明不按字面来解释的评论家吗？为什么在战略核力量问题上就不能这样呢？戴高乐将军不爱理睬美国分析家侈谈什么第一次打击、第二次打击，打击军队、打击城市。“只要大国拥有核武器，法国也应拥有核武器。否则，法国就不再是法国，就会丧失军事上的独立，在戴高乐将军眼里，军事独立是民族和国家的根本。戴高乐决计要原子武器，不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也不是考虑核扩散的危险，而是出于一种纯属哲学的理论，可以说是出自一种对历史的看法。”

570 这是原则性的决策，并非应付时局，从这一决定出发，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各自的论据或推论。能让成百万甚至成千万人死这种能力，不可能不起某种威慑作用。谁也不可能保证永远得到美国的保护，更何况美国的国土本身从此也变得易受攻击了。这一论据是站得住脚的，即使在目前，人们还可以怀疑法国的力量能否威慑苏联人，使他们不敢轻举妄动——而美国的力量反而还做不到这一点——但是，当中程导弹，尤其是核潜艇导弹可供实战使用时，可以用作外交工具的战略核力量就能够真正成为一种威慑武器。

1965 ~ 1967 年，戴高乐的外交至少在表面上把重新取得法国的独立和反美主义混淆起来了（在戴高乐的语言中，大西洋联盟使法国成了美国的“附庸”）。戴高乐将军在金边和巴黎就越南战争问题毫无掩饰地阐明了这一看法。他把这场“无耻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的干预。在 1966 年 9 月 15 日的同一篇文章里，我对金边讲话评论道：

由于讲话含糊不清，所以每时每刻都有进行解释的必要性。报界电台都把金边讲话称颂为戴高乐的史诗中最杰出的

时刻之一。为了尽量少带偏见，我不想重谈冲突的发展史，也不想同阿尔及利亚战争做比较。我只想谈一点。戴高乐将军能否梦想在这样的场合做的这样一次演讲，竟会影响约翰逊总统或美国舆论倾向和平呢？显然，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只能是否定的。这次演讲甚至会激怒最不赞成越南战争的领导人。如果戴高乐将军真担心冲突扩大，就像洗脑式的宣传试图灌输给我们的那样，那么，难道他首先关心的不该是阻止发生最糟糕的事情而择日发表宏论，以图名垂青史吗？

1966年，法国军队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系统中撤出，这一决定成为戴高乐外交的有标志性意义的一步，并使舆论大为震惊。1967年，他对“六日战争”所采取的立场得罪了一部分舆论；魁北克之行也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响。

1966年的这一决定是多么合乎戴高乐的思想，我几乎不需对此加以评论。法国军队指挥部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参谋部之间达成的军事协议代替了军事一体化，这没有带来太多的不便。起草得比较含糊的《北大西洋公约》（戴高乐将军曾严厉地批评过该公约）倒为第五共和国总统的计划帮了忙。法国将独自决定对它受侵略的盟国之一提供援助。如果来自非洲或亚洲的敌对行动有可能在欧洲出现，那么法国将有最大的可能不卷入一场与它无关的战争。

571

我不打算评论戴高乐将军的魁北克之行，特别是他的“自由魁北克万岁！”这句口号。这件事并不出乎我的意料。如同我已经指出的那样，1957年我应邀出席公共事务研究所的年会时，我在那里碰到了所有后来几年在魁北克和加拿大成为头面人物的人。让·勒萨日这个主张“平静革命”的人物，还有勒内·莱维斯

克、皮埃尔·埃利奥特·特鲁多都在那里，而且许多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的人也在。魁北克人的变化、杜普莱西政权垮台以及北美式的选举机器已在地平线出现。民族主义从防御转向进攻；操法语的人不再满足于维护他们的语言和法律，而是雄心勃勃地想掌握自己的命运。“美丽的省”（指魁北克）的操英语者掌握着经济及大企业和行政部门的高级职位。教育体制的革新是“平静革命”的要素，它使 1960 年代持文凭的人数或者说“知识分子”的人数大大增加了。这些人成为独立党的发言人和积极分子。

1957 年，我在圣阿黛尔逗留之后，继续观察加拿大的政治运动。我接受了英国公共事务研究所的邀请。法国公共事务研究所是按照英国公共事务研究所的模式建成的。我觉得诧异，操英语和操法语的人居然没有合成一体，而加拿大的统一竟会这样脆弱。在独立分子发动袭击之际，我为《费加罗报》写了一篇文章（1964 年 4 月 24 日），题为《魁北克省会独立吗？》。文章说：

572 法国人不会表态说魁北克成为独立邦是否可取……从某种意义上说，说法裔加拿大人一贯是民族主义者时，“民族主义者”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如果说决心捍卫自己独特的文化并管理自己的事务就是民族主义者，那么他们就是民族主义者。但只要法裔加拿大人依旧是农业人口，仍然受到教会的严格管教，与城市和工业文化隔绝，那么民族主义就处于守势。而且，即将庆祝成立 100 周年的联邦形式，将使两个族群即使在精神上达不到统一也将和平共处。

今天，操法语的加拿大人正在迅速发展并实现城市化。他们发现，从选民人数上讲，在他们占统治地位的省里，操英语

者控制了经济部门甚至行政部门。

大多数英裔是“问心无愧的”，一个世纪以来，他们不是给操法语者保留了宗教、法律、习俗、语言的较大自主权吗？他们把独立分子看成可笑甚至危险的狂热分子或哗众取宠的人。然而，我担心他们忘记了主要的东西，他们没有给予操法语的同胞最不可缺少的东西：被人承认的心情……英裔加拿大人在反殖民主义方面是英国人中最正统的，他们甚至不能想象出法裔加拿大人会感到自己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然而，任何民族，甚至是获得自治的民族，假如在两个民族共处的国家中居于下等地位，就会觉得或者认为自己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那么法裔加拿大人怎么能没有一点儿被殖民的感觉呢？

由于他们进一步加入了现代生活，那种自卑感就更令人痛苦。我的朋友，特别是埃里克·德·丹皮埃尔嘲笑我，也嘲笑魁北克的独立。然而，我的文章却在在大西洋彼岸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挑起了一场辩论。一家英语大报《蒙特利尔明星报》在头版从上至下用两栏的篇幅专为我写了一篇社论。它认为，我曾提到的独立分子发动的袭击是无足轻重的（法语报纸也这么认为）。它把我介绍成一个著名人物，以致肯尼迪总统也把我叫去咨询（并非真有其事），它指责我为一项不理智的事业提供了某种可能性或至少使得它可以被接受。因为雷蒙·阿隆认真看待独立分子，这些独立分子便达到了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小圈子，变成了受人尊敬的人。我也收到了英裔加拿大人的许多来信，他们都感到气愤，并多少带

点粗暴地抨击我的文章（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篇文章被一份名叫《义务报》的法文报纸全文转载了）。

一篇普普通通的文章竟使英裔加拿大人这样激动，那么谁都能理解将军的加拿大之行所引起的反响，以及将军在蒙特利尔市政府阳台上最后呼出的“自由魁北克万岁！”的口号所引起的轰动了。这个口号原来是极端独立党的口号。在1967年11月2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他重新描述了法裔加拿大人的业绩，在签订巴黎条约之际，他们总共有6万人，“都是农民出身，是耕地的小人物，后来他们的人数大大增加以抵抗不断增加的入侵者”。将军也追溯了第一个阶段，即为了保持他们的语言、传统、宗教以及法国人的团结而进行消极防御的阶段。因此现在他们跟其他所有人民一样，宣称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可以说，工业化是越过他们搞起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掌握了国家资源，“把法兰西人置于日益低下的地位”，由此产生了一个完全可以理解的解放运动。

将军接着用他最精彩的辞藻叙述了他的访问和他同主人的会谈以及登峰造极的时刻。他说：“在世界上第二个法国城——蒙特利尔城争取解放的激情汹涌澎湃，法国自有神圣的义务来对这种激情做出直截了当并郑重其事的回答。”将军毫不犹豫地阐明了解决加拿大问题的必要条件：“加拿大现有结构的改变将导致魁北克进入主宰自己民族生存的主权国的行列……”第二个条件“就是要形成大西洋两岸法兰西共同体的团结局面”。

我也曾被法裔加拿大人的毅力和觉醒所感动，然而，我不能肯定魁北克的独立和获得主权是一种解决办法。我的朋友杜普伊（P. Dupuy）于1940~1942年穿梭来往于维希和伦敦之间，他对我说：“我不愿意在一个独立的魁北克生活，我宁可

回法国。”这次谈话是在1967年，当时，我去蒙特利尔是为世界博览会做报告。回国后，我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尽可能客观地介绍各党派的论点。

首先，我看到了总统之行产生的影响：

这次访问既没有促成魁北克的民族主义，也没有催生独立党……民族联盟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大党从此认真地考虑“独立的选项”（我不过是转述我在各种场合看到和听到的表达方式）……多么奇怪的魁北克人和法国人的关系啊！被1763年的《巴黎条约》“抛弃的”法国人的后裔今天已达600万人，他们对古老法国和现代法国的象征人物热烈欢呼，表达他们对祖国的热烈致敬。勒萨日标榜的“平静革命”，目的在于实现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在他们眼里，戴高乐将军既是天主教徒又是共和主义者，恰好是这种结合的化身。所以，法国人对国家元首的这次访问所做出的反应，对大多数魁北克人来说是费解的。

尽管将军的访问被魁北克人看成一次胜利的访问，但受到了法国本国新闻界的严厉批评，这一插曲提醒我们要防止可能的误解。

在加拿大并没有形成一个能与在美国的美洲民族相比拟的民族。正如那儿的人所说的：“两个创建国家的人民在一起生活，但不相混杂。”“集中在魁北克的法国天主教徒要保持本来面目，他们不知道法国不关心他们……教会支持法裔抵抗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压力，但同时也阻止了对现代化的适应，而且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法裔加拿大人经历了既迅速又深刻的变

化。他们也城市化了，他们发现，在他们自己的省里，他们处于低下的地位，而该省在加拿大各省中也是落后的。”

接着，我提出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在勒萨日的‘平静革命’之后，约翰逊先生领导的民族联盟党出其不意地夺取了勒萨日领导的自由党的胜利成果，法裔加拿大人在这些事件中到底意图何在？经济意图是：加快并领导本省的经济的发展。文化意图是：捍卫魁北克省的法语，促使渥太华和其他各省同时使用两种语言。至于政治意图，则是辩论的中心议题……长期以来，魁北克人的口语被看成下等人才讲的一种方言：它要与通用语言竞争，只有在政府当局的帮助下才能顶得住。”我提及了形势的另一面：“法裔加拿大人从此应在美国人、新加拿大人和过去的宗主国英国人三种人之间确定自己的人格。这样才可以弄清楚，为什么在‘特殊地位’和‘分离主义’之间犹豫不决，为什么觉得这种或那种形式也许都不足以保障前途。如果加拿大联邦本身不保持其民族的真实性的话，如果新加拿大人既没有被英国人同化，也没有被法国人同化，而是被美国人同化的话，那么魁北克在加拿大联邦中还能保持它的民族认同感吗？”

在第三篇文章里，我阐述了这两种解决办法各自有其成功的可能和失败的危险：“一种是分离主义，它意味着抛弃在魁北克省之外定居的 100 万法裔加拿大人，这冒有经济衰落或比理论上的独立更起作用的‘相互依存’的危险。另一种是做出巨大的努力，给加拿大民族以实质性的内容，并加速推广双语或‘双文化’以保护魁北克省的法国特征。”无论是莱维斯克还是特鲁多，都没能在 1982 年获得成功。

法国应该尽力支持魁北克人保持北美法国人的特征的意志，而不应该去尽力瓦解加拿大联邦。魁北克的分裂，很有可

能导致其他分裂。无论如何，决定应该由魁北克人来做，而不是由欧洲的法国人。

1967年，将军的讲话触犯了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他预先声明说，他将谴责双方中首先诉诸武力的那一方，从而他毫不宽容地谴责了以色列人。更有甚者——我至今还弄不清楚到底为什么——他把“六日战争”的部分责任推到了美国的身上。他粗略地勾勒了解决办法，便以一种悲观的调子做了结论：

只要四大国之一不退出它在别处进行的可耻战争，人们就看不出怎样能够不是虚构地就某种形式，而是真正地就共同行动达成某项协议。因为当今世界的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若是没有越南的悲剧，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就不会成为现在这种状态。但是，如果明天东南亚重新出现和平，那么中东很快也就会获得和平，这将有助于随之出现全面缓和。 576

这种分析在我看来都是穿凿和武断的，简言之，是错误的。埃及军队集结在西奈半岛或关闭蒂朗海峡与越南战争有何关系呢？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人从印度支那半岛撤走不足以给近东带来和平。以色列-阿拉伯冲突始于美国干涉越南之前；在美国结束对越南的干涉后，以阿冲突继续存在。根据戴高乐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他本人早就预料到了“六日战争”和以色列的胜利。就在“六日战争”和以色列获胜之后，法国在联合国投了与苏联和阿拉伯国家相同的票。在此之际，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毫无保留地批评了将军的外交。

第一个批评是：法国的行动是否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

“如果法国的外交目标是促进一项持久的解决办法，那么人们至少可以说，法国赞成苏联 - 阿拉伯的论点这一行为似乎是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

第二个批评是：“用纯现实主义的语言来讲，温和派掌权的那些黑非洲国家都感到不安或感到愤怒。苏联向阿尔及利亚运送武器和布迈丁先生的所谓革命政策，引起了突尼斯和拉巴特的不安。突尼斯和拉巴特的当权者理解法国的中立，但不理解法国亲苏的战斗精神，也不理解法国为什么有意识和自愿地支持第三世界中所有敌视美国人和西方人的人。”

我对逐渐转变的法国外交提出了异议：

1960年，戴高乐将军把本·古里安（Ben Gourion）先生当作一个“友好”国家和“盟国”的代表来接见。1967年，全靠法国武器的以色列却感到它被同一个戴高乐将军当作敌人来对待。美国的朋友就是法国的敌人吗？苏联或阿拉伯革命者的敌人同时就是法国的敌人吗？法国疏远了共同市场内的伙伴们，也疏远了大西洋地区的其他国家，同在经济、文化和理想上与法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也疏远了……

577

我用下面的话作为结束语：“自中东危机开始以来，我就感到共和国总统将被他的外交逻辑拽入苏联的阵营。然而，今天我焦虑不安地思考的是：这是一种理智的逻辑，还是单单是一种感情冲动的逻辑？”我甚至故弄狡黠，援引了戴高乐将军1949年讲的一句话：“我清楚地知道，可怜的人们，如同他们所说的那样，想要用政策代替实力。如果人们放弃力量，不愿自强，那么人们永远不可能制定出任何政策，尤其是一项宽宏

大量的政策。在印度支那，某些人主张采取所谓胡志明的解决办法，实际上就是投降。”

当然，他可以回答说形势完全变了。在 1949 ~ 1951 年，他曾认为不久后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管怎样，他曾认为这是可能的，甚至是非常可能的。1967 年，防止共产主义不再使他感兴趣。但是，他当真有理由认为共产党的扩张主义不再构成持久的威胁，不再是 20 世纪后半叶，或许还要延续到下一世纪的全球危机的根源了吗？

针对《为什么？》这篇文章，让·珍罕（Jean Paulhan）于 1967 年 7 月 8 日用他那无法模仿的字体，给我回了一张简短的明信片，信中写道：“我常常想给您写信。但说什么呢？您还有什么事情知道得不比我强呢？您最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真叫人赞叹，因为它表达清楚，结构严密，充满智慧。可惜我的朋友格罗修森没福拜读。……”他在附言中补充说：“戴高乐将军想要仿什么呢？我觉得他先当了个莫拉斯（这是一个有成就的先生）。后来想成为一个列宁式的人物，如果可能的话，是一个不大量杀人的列宁。马尔罗从未跟我谈起将军对他讲过的心里话。但他对马尔罗如此矛盾的友情，难道不是一种秘密吗？”

上文所述，到底对我们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对戴高乐的外交到底能有些什么看法？

我们先把战争年代搁一边吧。戴高乐还没有被公认为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首脑时，他的行动既关乎内政也关乎外交。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因为他首先要让自由法国正式成为法国。在进兵达喀尔、叙利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忠于维希政府的据点时，

他并不顺利。军人和官员抵抗自由法国人，比抵抗英国人或美国人还要来得顽强。那么，对贝当元帅的忠仆做另一种宣传，不那么咄咄逼人，是否会减轻甚至排除法国人的内战呢？没有人能这么说。所有的事件至少可使人做出这样的假设：一开头便采取非善即恶的态度来对待停战求和，甚至说不管风吹浪打都采取善恶分明的立场，始终不渝，这些都是传奇故事或武功歌。无论是解放时期的官员还是法国人民，都不同意这一史诗般的看法。6月18日的宣言保持了精神和政治上的意义，但紧接着该号召之后发表的那些讲话已是一个政党领袖的讲话，而不再是一个缄口屏息、噤若寒蝉的国家中有人奋起发言的讲话。

现在我们来谈谈同英国人和美国人的争吵，特别是同美国人的争吵。1943年年初的争吵险些引起西方盟国同自由法国首脑的决裂。我们来看看重返法国并成为他的祖国的领导人的戴高乐将军最初的外交吧。他的第一个实际的、具有象征性的姿态是，在谁都不大可能看不出战争的结果的时刻同苏联缔结反德条约。战争的结果是：苏联在欧洲中心的长期存在，德国的最终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同俄国缔结条约来对付第三帝国，或对付继承第三帝国的一个或两个国家，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将军的辩护者们反驳说，通过这一条约，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首脑对其强大的西方盟国表示出自己的独立性。我们可以接受这种反驳，但我们应该回想一下其他插曲。

在将军的军队同维希军队进行战斗之际，将军曾答应让叙利亚和黎巴嫩独立。在这两个国家的问题上，将军卷入了同英
579 国的激烈争吵。根据他的《回忆录》，他甚至对英国大使迪夫·库珀（Duff Cooper）宣称：“你们冒犯了法国；若是我有办法，我就要向你们宣战。”将军想同英国就领土问题打一仗

吗？无论如何，这些领土总归是要获得独立的。这句雄赳赳的话——姑且不说是杀气腾腾的话——我宁愿不把它当真。布里格和当德事件获得了圆满解决。对阿奥斯特河谷的领土要求遭到了美国的否决，但它反映了戴高乐思想的传统一面：对边界的考虑优先于其他任何考虑。

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对德国的态度，那是一种暧昧的态度，但他可能连这种态度的暧昧性都没有意识到。他邀请更新的德国进入新的欧洲，并粗略地勾画了一个在法国领导之下联合起来的西欧。但德国将是什么样呢？戴高乐将军提到的法德和解，是在形势已完全改变了的情况下重温了班维尔“几个德国”的老调。

三方委员会设在柏林。法国代表对所有可能促进恢复德国统一的措施都进行了否决。三个大国安排了一个由四个占领国共同选择的官员或机关组成四个占领区的行政机构。法国怀着对德帝国的传统敌意再一次行使否决权，坐使苏联人占了便宜。^①从1945年9月起，苏联人通过符合他们意识形态的措施（土地集体化）宣布了他们留驻的意愿。更有甚者，那时，即使法国的“几个德国”理论已经过时，但摆在面前的也是一个德国或两个德国的选择（一个是苏联的德国，另一个是西方的德国）。将军和安德烈·马尔罗继续弹他们的老调——“永远不再要德意志帝国”，就好像德意志帝国在1945年意味着另一种东西，而不是国家。面对被苏联占领了一大块领土的德国，将军仍然对德意志帝国，对建立三个占领区，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咆哮如雷。对鲁尔的国际共管——苏联要求参与其中——以及划出莱茵地区，所有过去提防德国的办法构成了将

^① 这一见解会引起争议。另一种政策也会有利于苏联在西德的影响。

军思想的主要方面，就好像他并不完全理解显而易见的大变化。从此，在可预见的将来，捣乱分子用在普天之下推行专制来威胁欧洲的，不再是德国，而是苏联了。

在将军重掌政权，尽力同英美“重建德国”的政策进行斗争之后，他发现他 1945 年的计划已所剩无几。他注意到了当时的形势，接受了既成事实，但重新提出了一个比对德帝国历史性的敌视更为紧要的想法，即拒绝将法国置于两个集团中美国所领导的那个集团。阿尔及利亚这个惨痛的、实质上不过是内政的事件一结束（非殖民化，或至少是欧洲帝国的解体已经完成），将军就致力于德国人过去说的重要政策。法国应该与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大国进行较量，而不是同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或同布尔吉巴的突尼斯。同阿登纳的德国结成紧密联盟以及制造核武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可能从财政上参与制造核武器），将奠立欧洲自主的基础，这个欧洲不再沦落为西方集团中处于下等地位的部分。将军取得的成就有助于他的宏伟计划的实现，他反对英国进入共同市场，不让共同市场四分五裂；他建立一支战略核力量，以便将来进行“全方位”威慑，同时能对各个集团保持完全独立。德国人不同意他们所猜想的戴高乐计划。联邦议会在永久性的法德条约中加了一个前言，重申了大西洋联盟的优先性。自此，尽管“永久性条约”继续存在，法德合作依然继续，但将军不再对该条约感兴趣了。

从 1963 年至 1967 年，戴高乐的宏伟计划变换了手法。为了逃脱大西洋联盟的虎钳以及美国的“控制”，他转向了苏联。诚然，在柏林危机和古巴危机时，他表现出了同西方人的团结，但从 1963 年起他改变了调子。也许应该说，他重操了

他保留着的调子：“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达成谅解、合作后，缓和也就到来了”。同苏联以及苏联化的东欧国家关系正常化，在大多数法国人看来是有道理的，无须参照戴高乐的“宏伟计划”。事实上，同德国“永久结盟”以及同苏联的“特殊关系”，这两者之间的共同点更多地是来自将军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政治分析。同德国和共同体的其他大陆国家一起，法国可能获得一个大国的地位，由于同苏联保持长期的对话而又不离开大西洋联盟，法国抬高了它的世界地位。

由于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指挥系统，法国在防务这个始终是决定性的问题上拉开了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距离。将军在莫斯科没有签署任何会受牵累的协定。他也没有得到物质或精神上的好处。双方的贸易在发展，但也不只法国一家。尽管将军在访问莫斯科后的第二年访问了华沙，并鼓励东道主把眼光转向苏联世界以外的地方，但他遭到了哥穆尔卡的粗暴拒绝。戴高乐将军几乎是传奇式的历史英雄，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但他没能动摇苏联集团，却动摇了本来就比苏联集团更脆弱的西方集团。

阿登纳总理曾对第四共和国的一个部长说：“如果你到莫斯科去朝圣，请你不要抱有幻想：在你到达的次日，甚至前夕，德国人也会去莫斯科朝圣。”将军的作风的缓和，意味着西方人终于勉强容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根据苏联人的说法，这种容忍在将军去世几年后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中已经表达出来了。将军的接班人有理由利用一切机会提醒说，戴高乐主义的法国在东西方缓和中起了决定性作用，所以激励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实行人们所称的“东方政策”，换句话说，就是同东方接近。法国有理由对此表示庆贺吗？

建立战略核力量、法德结成联盟以及不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指挥系统这三项决策，只有最后一项决策不是在第四共和国时期做出的，其他两项都是将军的遗泽。鉴于显而易见的理由，对于这三项决策至今没有人提出异议，因为任何一届政府都不能将如此昂贵而又如此享有威望的武器扔进垃圾堆，任何一届政府都想将核力量现代化以保持核力量的可信性；法德联盟从此属于法国的正常外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使乔治·蓬皮杜和维利·勃兰特的关系缺乏热情。最后，重返一体化指挥系统在可预见的将来是谈不上的，这个问题将会在政界，从而在整个国家挑起一场大辩论。

将军的遗产不只局限于这三项措施，大多数舆论都曾赞成而且现在继续赞成这些措施。正是戴高乐将军提高了反美主义的身价。在危机时刻，他表现出同西方的团结，但他也经常把法国说成受两个大国的威胁。他把“六日战争”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在越南搞的行动。他使法国人习惯于搞错敌人，把苏联当成盟友，把美利坚共和国当成危害法国独立的大国。在将军逝世12年后的今天，法国的外交由于这种敌友颠倒并对世界做出我认为与事实相反的看法而处于半瘫痪状态。

回过头来看历史，我们能够确切地说出将军的宏伟计划或揭破他的秘密吗？是否存在宏伟的计划或秘密呢？我从未接受过让·珍罕的假设，我从未想象过戴高乐将军在实现了莫拉斯的某些思想后，会渴望扮演列宁的角色。人们可以肯定，在法德条约宣告失败之后，将军自己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尽可能地从大西洋联盟中解脱出来，但既不破坏大西洋联盟，也不抛弃大西洋联盟：他使用了与苏联人一样的语言来反对各种集团。由此产生了正当的疑问：他希望美国人撤走吗？他是否认为美国军队的

撤走将有利于从缓和走向谅解与合作？他是否梦想法国的战略核力量将足以代替美国的力量呢？我无法明确地解答这些疑问。

583

从长远来看，将军指望苏联发生变化，这种看法我很愿意接受。他是在1914~1918年战争之前成长起来的。他往往重复斯大林的一句话：国家社会主义消失了，德国人民继续生活下去。他爱讲“俄国”，不怎么爱讲“苏联”。他很可能不了解苏联政权的特性，在他眼里，一个专制的政权也会和其他专制的政权一样消失。但是，从大西洋到乌拉尔，拉丁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彼此协调，在古老大陆重新恢复平衡，这到底是一种遥远的幻想，还是真正的政治目标呢？戴高乐梦想建立统一的欧洲，绝不依赖欧洲以外的大国（美国），这到底是经过认真考虑的，还是仅仅想使比较平凡的政策搞得有声有色呢？他怎能不知道没有美国的帮助，西欧就不可能与苏联帝国抗衡呢？解散两大集团，重搞主权国各自为政的外交，这是走向新的未来，还是回到过去呢？

让我们从思想上忘掉记者招待会吧，记住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之后，1962~1969年戴高乐外交的那些重要日子吧。戴高乐本想拉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法国结成紧密的联盟而疏远美国，但这个企图失败了。从此，将军不想以西方集团成员的身份，而是以与超级大国平起平坐的大国身份出现。与此同时，他保留着大西洋联盟的好处，因为德国和美国的军队横插在苏联军队和法国边境之间。可能将军曾打算离开大西洋联盟。可能他曾设想过“全方位”威慑，这是阿伊雷将军的论点，但这种导致中立的论点很快就被抛弃了。戴高乐将军的做法是，一方面，法国拥有自己的战略核力量，实行自主独立的防务；另一方面，同苏联继续对话。将军，还有乔治·蓬皮杜，都自

584 以为能够都自在苏联和西方之间担当中间人的角色，这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代替他们的。在将军辞职后的第二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由 - 社会党联合政府揭开了“东方政策”的序幕。这一政策在 12 年后，损害了德美联盟并促使德国人民的感情和外交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舆论把维持局势的缓和视为头等要事。将军对美国咄咄逼人——尽管口头上说的多于行动——是否可以解释说是因为他对美国过于强大怀有戒心呢？他是否为了恢复平衡而假装站在苏联一边呢？我认为我无法解答这些问题。

我不全盘否定将军的政策，我赞成建立一支战略核力量，我怀疑英国政府和人民是否对欧洲抱有信心。法国 - 以色列联盟随着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结束而丧失了基础。正是将军的作风，促使我提出了一些批评，而且这些批评或许还过了头。然而，正是这种作风使他获得了成功。积极的结果本可以不必哗众，不必激怒友邦和盟国而取得。

作风和内容最后混淆起来了。在全世界看来，特别是在第三世界国家看来，戴高乐将军是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家的代表。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只要欧洲人拒绝担负起自身的防务，那么大西洋联盟依旧是欧洲安全必不可少的条件。

我一直担心的不是美国的过分强大，而是某个美洲大陆国家的不稳定，该国由于战争的偶然性而投入全球政治，但其执政者大多没太意识到共和国的历史命运，所以被变化不定的舆论思潮所左右。将军今天还会担心美国过于强大吗？

在将军隐退之时，他可能还把深陷于越南泥潭之中的美利坚共和国看成唯一的超级大国。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在伦敦的那几年，我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开始关心战争。如同在其他许多情况下一样，内疚或至少是遗憾促使我做出这样的决定。战前，我们对军事问题、各种力量的关系、胜利的可能性和失败的危险性一无所知，或几乎一无所知，我们有什么权利对外交武断定论？我研究了经济，为的是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判断有理论根据。为什么忽略了德国人称为“国防科学”（Wehrwissenschaft）的东西呢？ 585

战后不久，原子弹的出现使所有人害怕和惊慌失措；摆在文人和军人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武器——这是一种毁灭性武器，它的威力是那些所谓常规武器无法相比的——用于国家间传统的活动中？作为《费加罗报》的国际事件评论员，我感到需要研究种种决策的军事和历史背景，作为记者，我应该弄懂这一切并应能做出解释，“威慑”，即“美国的威慑”，这个词成了常用语。在美国，这一概念引起了一系列问题，它使许多研究所应运而生，促成上百本书问世：谁能威慑谁？叫人不敢干什么？用什么威胁来威慑？在什么情况下威慑？

1945~1955年，我重新考虑了20世纪两次大战的后果，并在《连锁战争》中就冷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它是能替代全面战争，还是在准备全面战争呢？国际舞台的特点大家一目了然：世界的协调代替了欧洲的协调；从前的大国，特别是从 586

前的欧洲大国地位下降；超级大国与其他所有国家之间的差别；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及东西欧之间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明争暗斗；由于有了核武器，爆发一场全面战争变得不大可能。

在上一章中，我提到过我原先论述的对国家间关系的看法。我那时候的设想后来成为《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但我尚未构思《大辩论》这本小册子。但在一些文章中，我在一定程度上参加了大西洋彼岸称为“核战略”问题的辩论，这种命题不确切，因为人们很少讨论战略而是讨论对某种武器可能的或实际的使用。然而，像核武器这样革命性的武器尽管改变了整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仍包括不了全部战略思想，因为关于核武器的思考不过是战略思想的一部分。

在巴黎大学，讲完关于工业社会的三节公共课之后，我用接下来的两节课讲了国际关系。根据录音打印出来的这两课正好是《和平与战争》一书的前两部分，即“理论”与“社会学”。接着我向巴黎大学请了一年的假，以进修教师的身份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一个学期。回国后，我写了最后两部分，分别命名为“历史”与“人类行为学”。（“人类行为学”这个词在法文、英文中都有，但很少见。它受到许多评论家的批评。）

这是本雄心勃勃的书，也许过于雄心勃勃了。这本书分理论、社会学、历史、人类行为学四个部分，这就促使我研究了主权国家之间产生的绝大部分问题。

在第一部分，克劳塞维茨给我提供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全部理论的思想萌芽；在和平与战争的交替过程中这些关系的延续性，外交与战略的相辅相成，各国为了达到它们的目的或保护它们的利益而使用的暴力和非暴力手段。从这儿开始，分析进一步成了论述，或发展成了国家定策的类型学和国家拥有的

手段的类型学。我从个体转向体制，即在世界一个地区或整个地球上的国家所构成的整体。国与国的体制同其他社会体制相比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没有一个控制或管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上级机构。而且首要的特点是力量的分配：如果几个实力相当的国家相互对立、相互联合或相互反对，那么体制就趋向于19世纪的欧洲协调。反之，如果两个国家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所有国家，我们则称之为两极体制。多极体制和两极体制的运转是不一样的。另一个区分体制的特点是在各国建立的政权的相似性或完全相反的敌对性。在18世纪的欧洲共和国里，君主们并没完全忘掉他们的兄弟情谊。他们常常不支持起来反对合法政权的革命者，哪怕造反是发生在一个一时的敌对国中。相反，在多种多样的体制中，每个国家趋向于支持敌对国的造反派和持不同政见者。神圣同盟说明了第一种体制，冷战说明了第二种体制。我从体制的种类说到和平、平衡、恐怖以及满足的种类，为的是阐明当前的形势并引进“好战的和平”这一概念。我用的这个词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一直在其中生活的那种体制。

第二部分的标题是“社会学”，分为两个小部分。“空间”这一章使我重新捡起对地缘政治的研究，重新采用麦金德和一些德国理论家的模式。在“数量”这一章，我谈到了两种争论：数量对于战争胜败的影响以及对和平角逐胜败的影响。“资源”这一章论述了各种经济制度与战争（或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及其各种有关的理论。在第二个小部分中，我力图寻找政治制度与外交决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但没找到。于是，我心里有了疑问，历史学家是否能认清一切国家和文明各自前途所必然要遵循的秩序。

第三部分命名为“历史”，因为它分析了一种特殊的形势，即1960年代初国与国之间体制的状况。我对下述问题犹豫了好长时间：关于时事的这部分降低了整本书的作用，但费尔南·布罗代尔却比较喜欢这部分，而不太喜欢其他三部分。不可避免的是，对现代形势的许多分析很快就过时，而其他三部分的分析却想做到能够指出一种不太短暂的真理。而且，“历史”这个概念是有确切含义的。历史针对的是独一无二的形势，在时间上独一无二，在特点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但这种研究可以被认为是社会学，而不是历史学（根据大学的专业人员的意思）。这种研究并不追述一连串的史实，而恰恰相反，只致力于描绘一个事件群的主要特点，而这个事件群必然要发展变化，变化的快慢不一致，彻底的程度也不会一致。

历史这个部分阐明了许多背景情况，这些背景情况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在核时代中却是长期的。占统治地位的两个国家，尽管它们是对立的，但有一个共同利益，那就是不要同归于尽。为此我写了“敌对的兄弟”这一章，谈到美国与受保护的欧洲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欧洲国家一会儿担心被两个大国拖入一场殊死的战争，一会儿又担心莫斯科与华盛顿勾结，使自己丧失自主权。威慑、说服、颠覆这三个词展现了当前形势的三个主要方面：核武器、宣传竞争、群众或少数民族造反。

第四部分命题为“人类行为学”，总结了前三部分：寻找一种伦理，寻找一种战略，寻找和平。

引言的题目是“理解的概念水准”，它致力于说明这本书分成四部分的理由，以足球运动为比喻，也以经济为比喻。与其重复我在电视里用的比喻，还不如引用几段表明主导思想最清楚的段落：

国际关系的中心是我们曾称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作为单位由这种关系联系起来。我把外交官和军人叫作象征性的人物，正是他们以特定的行为并在特定的行动中体现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种人，只有这两种人，不像国家的普通成员，而是代表他们的国家进行活动：大使在任职期间是个政治实体，他以政治实体的名义讲话。军人在战场上是个政治实体，他以政治实体的名义杀死他的同类……大使和军人体验着并象征着国际关系，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外交与战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所有社会关系的特点：它是在战争的阴影下进行和维系的，或者用一句更准确的话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包括了战争与和平的交替。

这种观点没有独到之处，它继承了古典哲学的传统。只要人类没有在大同世界中完成统一，对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便存在根本区别。对内政策倾向于由掌握合法权力的人垄断暴力，而不同意武装力量的多中心。凡是涉及集体内部组织的政治，它的内在目的总是要人服从法律。凡是涉及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政治，它的理想和目标好像就意味着国家必须面对其他国家的存在所造成的潜在威胁而能够活得下去。这就是古典哲学中常见的一对矛盾：政治艺术教人在集体内部和平地生活，又教集体要么在和平中生活，要么在战争中生活。

由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定义，引出了在我看来是根本性的结果：外交行为（从国家对外行动的责任者来讲）没有内在目的，可以与赛场上的运动员或经济行为人相比拟。对于治理一个国家的人来说，他追求的东西完全不同于经济行为人

所追求的和所有经济理论模式所要求的最大效益。“国际关系理论的出发点，在于多中心各自独立自主地做出决定，因此，要从战争的危险中推断出有必要对采用何种手段进行考虑。”

590 这些提法乍一看是明确的，不管怎么说，这里面包括了一个教训或真理，尽管这个教训或真理往往为人们所否定：国家的行为或军事上独立的政治实体的行为，即使人们假定它是合理的，也不只涉及一个目的。如果说国家根据本国利益行事，只要没有确定这种利益的内容，那就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在希特勒心中，德意志民族的国家利益既不同于他的前任，也不同于他的后任。但和平与战争的交替可以构思出国际关系的根本概念（战略与外交，方法与目的，国力与实力，荣誉与思想，等等）。

我用更具体的说法重申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永久性的问题。每一个集体首先应依靠自己求生存，但也必须或者也应该为各国的共同任务做出一份贡献，国家互相残杀，势将同归于尽。在我们的时代，不只是一个国家，而是整个人类受到超级战争的威胁。防止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是外交活动中所有角色的目标，其迫切性丝毫不亚于保护纯粹的国家利益。

这本书我思考了十来年。为了写这本书，我在哈佛大学度过了一学期。出版时，我十分重视，但我可能过高估计了它的价值。

同时，不出所料，我受到了新闻界的高度赞扬。《外交世界》称之为“宏文杰作”；《世界报》刊登了一篇由阿尔弗雷德·格罗瑟署名的文章，标题是《雷蒙·阿隆的一部伟大著作》。埃蒂安·伯尔尼称其为“政治修养和清醒思想的出色运用”。在《神灵》月刊中，对我以前写的著作不大宽容的雅克·朱利尔写了一篇非常善意的文章。就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

那样，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摆脱了这种欣快的感觉，认识到这本“论著”或“概论”的缺陷。

《和平与战争》超越了巴黎大学的选举，实现了大学与记者的和解。《年鉴》杂志组织了一种书面讨论会：P. 勒努万、A. 图莱纳和其他一些人就此书或此题写了一些文章。皮埃尔·诺拉友好地对我说：您坚持了您的第二种论断。在某种意义上，他是有道理的。许多应时的书不幸被著名的大学教授（比如亚历山大·柯瓦雷）视为新闻体裁的书。如果从1947年以来我不是一周一周地评论国际政治，《和平与战争》一书就永远不会写出来。然而，这次，这部作品超出了新闻体裁，尽管新闻体裁孕育了这部作品。 591

我收到了卡尔·施密特的一封信，便托我的朋友朱利安·弗洛因德给他送去一本《和平与战争》。我在这里借用他信中的几句话：

我钦佩您精辟的论证，它使不可究诘的矛盾现象真相大白。这种矛盾现象使两个敌对的世界大国同它们自己的盟国团结在一起。我觉得古巴危机的发展过程充分地证实了您的分析。要是列宁读了您的“我们不要摧毁，而要改造”（第686页），他很可能自然而然地在边上写下评注，就像他在1915年对克劳塞维茨的一句话（第167页）写评注一样。克劳塞维茨写道：“征服者总是喜欢和平，他愿意太太平平地进入我们的国家。”列宁在边页上注了：“伟大，啊哈！”

卡尔·施密特提到的那句话确切的是这样的：“我们不

愿摧毁想要摧毁我们的人，而是要改造他们，使他们变得宽容和平。”这句话是接着下述论据说的：“比如说，我们应在各个方面跟踪敌人，这不意味着我们应向他学习。相反，这是战略或战术问题、说服或颠覆问题，不对等是必然的。”换句话来表达这个思想：西方人不能够也不愿意采用苏联人所采用的那种方式，将他们的社会制度强加给所有国家，有如苏联人把他们的革命作为唯一的活路强加于人，并把他们的制度作为唯一的人道主义制度强加于人。难道我没有理由总结说，我们不愿摧毁想要摧毁我们的人？列宁可能会发笑，但他也许理解不了这个思想：如果我们能够改造苏联人，使他们接受我们的哲学，我们实际上就“摧毁”了共产主义的本质。

在我看重的外国文章中，我记得有戈洛·曼在西德的《时代》周刊发表的文章，他把我的书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做了比较。我还记得国际关系教授马丁·威格特的文章，他似乎不怎么信服自己的专业。

592 1967年4月23日，《观察家》报登了一篇文章，首先把我描绘成一名欧洲骑士，进场比武，把美国人垄断的国际关系研究夺了过来，就像杜·盖克兰 (Du Guesclin) 在与黑太子 (爱德华) 争夺王位的内斗中取得了最后胜利。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在第1页，阿隆指出古典的政治思想作品是政治危机时期思考的成果……我有时想用这个论据，反对把国际关系研究作为自成一家的学科……阿隆这本典雅的适度的宏伟著作使我不能再使用这一论据了。

《纽约时报》请亨利·基辛格评价这本书，他评价此书“深刻、文明、杰出和晦涩”。我对“晦涩”这个形容词不感到意外，但我不认为它能成立，除非一本800页的书本身就是晦涩的。列奥·施特劳斯——我极为敬重的人，1933年我在柏林见过他一面，后来就再也没见过——读了《和平与战争》，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对我说：就他所知，这本书是现有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一本书。

这些评价不管怎样可贵，却反映不出此书在美国受到的待遇。姑且不谈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教授（杨格）一棍子打死这本书的文章，大多数人的书评是褒贬参半，可以适用于任何一本书。各家报刊则强调指出，这部作品篇幅过长，艰深晦涩。在专业期刊中，评论家好像生了气，并且倾向于奚落，因为这本书居然以“总结”自居，而且胆敢创造“理论”。他们说：这是国际关系的社会学，其中对时事的分析太多，堵死了基本研究部分，或者说扼杀了基本研究的雄心。

这部作品译成英文需要好几年，出版商先请一个杰出的作家、著名的翻译家着手翻译，后来又请人修改三遍。我在第三部分中所描写的形势，与四五年后的形势存在的差别正好为批评家提供了很方便的靶子。好几章内容的结论，消极多于积极（特别是第二部分）。“人类行为学”表面上显得暧昧不明，许多读者对此不满。如同福克斯教授在他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整本书都带有德国的影响，特别是韦伯的影响，也带有美国国际关系学派的影响。一个法国人以他自己的文笔、他自己的方法综合这两种影响，所以作品是复杂而晦涩的。

593

交代过了这一切，我渐渐地相信《和平与战争》一书在

美国的相对失败^①应归咎于该书本身的不足，同时也由于意外的形势以及专家之间惯于各不相下。在该书出版 20 年之后，要是我对评论员的评论做出回答——有的评论是赞扬的（我仅提一下在法国人中间有 J. B. 杜罗塞尔、法美双国籍的斯坦利·霍夫曼以及 J. D. 雷诺）——那么我就会使读者们感到厌烦。我只想说明，为什么我认为我的目的有一半没有达到。我曾经认为，并且仍然认为，我赋予这一“理论”的意义是有效的（我宁愿同意不用“理论”这个名称）。而第一部分“概念与制度”和第二部分“决定因素与规律性”，二者区分得不好，第二部分的某些章节有些薄弱。

尽管我强调过核武器带来的新问题，尽管我的目标是把这些武器放到日常的外交行动中去，但我是否已成功地在这些极端可怕的武器和因循平庸的国与国的关系之间建立起了必要的平衡呢？“幸存就是胜利”，尽管我很可能仍倾向于为这种提法辩解，至少是部分的辩解，但在我看来，现在这种提法比过去更为含糊不清了。

有人会指责我（有人已经这样做了）把今日世界带回昔日世界，并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到国与国的关系问题上，而不顾跨国、国际和超国家的问题。诚然，我在某种程度上为区分这些问题做出了贡献，但我对此几乎没有进一步探讨和发挥。关于跨国问题（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和宗教的社会是不在乎什么国界的，而且往往贬低国界的价值），我从概念上做了鉴定，也多处提到过，但我没有对它做过深入的分析。是否

① 我说相对失败，是因为这本书在美国过去有人读，现在还有人读，还有受美国影响的拉美和亚洲的大学也有人读。

有人会说（但这是错误的）我这本书的主题——外交与战略行为，在整个国际关系中竟变成比较不重要的因素？我习惯性地吧核武器作为外交的组成部分，但没有指明这种外交与跨国问题相联系以及与世界经济相联系的地位。我曾想写一本书，按“战争”与“和平”这两个词的一般含义，讨论战争与和平问题；这种战争就是使用武器进行血腥屠杀的战争。我既不否认广播战，不否认贸易战或货币战，也不否认意识形态的战争。我甚至涉及过这些战争，或更确切地说，涉及这些斗争的某些方面。但是，1961~1962年，东西方对抗在我眼里构成了国与国关系问题的核心。今天，我仍坚持这一提法，但是，我应该先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并且缩短对其他问题的阐释，以使对国与国体系的分析同对世界市场（或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制度）的分析结合起来。

我也牺牲了在外交现实中日益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外交家（根据我给的这个词的意思，他是对外行动的决策者）所受政界内部或社会本身的各种影响。G. A 阿里松在他的书中说：尽管有保留，有深浅，最后我还是保留了“理性行为人”的概念，换句话说，我同意把集体与“个体行为人”等同起来。然而，美国对“决策”一词如此普遍的研究表明，美国总统不同于一个不受任何约束或压力而根据既定目标自主地考虑自己手段的战略家。历届美国总统（从某种程度来讲，甚至斯大林或希特勒也是一样）都是从多少有点独立的情报部门获得情报的，在做决策之前，他们先同顾问，特别是军事首长进行讨论。然而，这些顾问或这些情报员并不是除了了解真情和为了国家利益便毫无其他动机地完成任任务的理性行为人。他们属于一个组织，为中央情报局或空军服务。他们并不直接为美

595 国服务。他们滥提相互对立的建议，因为他们至少部分地根据本组织的切身利益行事。也许各组织之间的争吵在美国以外的任何地方都引不起同样的激情。这些争吵在别的国家不具有几乎是制度的性质。但在现时和过去，其他国家也有不同程度的类似事情。对1914年战争前夕的那些日子有过一点儿研究的人，就不会对乱作一团的舆论、利益和情感再产生什么错觉。一些造成几百万人死亡的决定，就是从这样的混乱中做出的。

当然，我不是不知道，当时法国、俄国、德国、奥匈帝国的“理性行为人”与在这些国家具体地创造历史的领导人之间的差距。我本应该（特别是在第二部分）对这一外交现象做深入的研究。这种现象并不新颖，但在我们的时代变得突出了。这样，我至少应该阐明属于社会学的一项任务，不是P. A. 索罗金所运用的宏观社会学，而是适用于社会各个部门和社会人物各种行为的实践社会学分析。

我也责备自己没有写好第二部分的某些章节，特别是题为“交战制度的根源”这一章。我在所谓古代社会战争文献方面的知识肯定是欠缺的。

我只想做一些粗线条的自我批评。这本书不能说给法国以及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大部头”或一座“里程碑”式著作，但至少提供了对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特别是当代的）国际关系问题与现象的一种系统分析。大多数美国教授不认为他们从这个综述的尝试中受到教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只记下了这本书的缺点和缺陷。在别处，教授和大学生倒不太挑剔地赞赏并继续赞赏这种尝试。通过这种回顾，人类行为学的结论比对作品的科学价值和过错的评价更为重要。

这里，我应该同时思考几篇文章：《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一书中的《连锁战争》；《大辩论：核战略的启蒙》；《和平与战争》一书中关于“威慑”与欧洲的“平局”两章。这两章不如《大辩论》那样使我满意。

我和许多人一起从概念上研究过美国人说的核战略。第一阶段是单边威慑：只有美国一家搭配好了原子弹及其运载工具（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重型轰炸机）。第二阶段：苏联人也拥有了原子弹和轰炸机，其续航里程可以抵达美国国土。第三阶段：美苏双方都以热核武器补充了或代替了核武器，除轰炸机外又增添了火箭。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正是我写《和平与战争》以及《大辩论》的时候，从那时起，核弹头〔英语“弹头”（warhead）一词，法语译为“橄榄头”（ogive）。我把“橄榄头”一词专用于全部由导弹运载的核弹头〕的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由于有了分导式多弹头（MIRV）技术，加上导弹的精确度，陆基洲际弹道导弹（ICBM）越发难保易破。阿尔贝·沃尔斯泰特（Albert Wohlstetter）的著名文章《微妙的恐怖平衡》^①重新成了时事问题。

大西洋联盟内部的大辩论始于1950年代末，从那时起，苏联人拥有了毁灭敌人的能力，大致与美国人相等。通过对苏联领土的轰炸来回击苏联对欧洲的侵略，这样的威慑政策还能叫人相信吗？美国核战略思想的关键概念就是威慑，总而言之是属于心理学的。这种威慑到底可不可靠，有必要在表面上给对它的推测提供一种严谨的论据，为此，所有作者都使用了“合理的”或“合理性”这样的词。为了反击苏联军队越过分

^① 1959年的《外交》季刊。

597 界线而由战略空军指挥部动用重型轰炸机，美国总统是在理智地行事吗？他肯为拯救汉堡和巴黎而牺牲纽约和华盛顿吗？这种争论无休无止：为了使美国的威慑失去信誉，某些战略家首先提出了威慑失败的假设，即苏联入侵欧洲；有的开始设想入侵前的状况，认为苏联人会在进攻欧洲时决定不使用核武器，坐视美国人拥有首次打击的优势，这种设想是不合理的。

我于1960年在哈佛列席参加了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联合举办的讨论会，会上起草的意见后来成为肯尼迪政府的意见。根据1950年代的经验，这些教授得出结论说，美国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以诉诸核武器相威胁来制止苏联、苏联的盟国或卫星国发动任何侵略。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抛弃了所谓大规模报复的理论，而去寻找另一种理论，名曰灵活反应或逐级反应。这种理论专门适用于欧洲的情况。从广义上讲，它涉及美国的总体战略。核武器在美国的武库中已成为最后的手段。同时，不言而喻，美国人抛弃了可能的概念，根据这一概念，核武器是决定性的，而不只是威慑性的，是用于结束战争的，而不只是用于防止战争的。在这一点上，我曾追随过美国人；今天，我产生了疑问。

那时，讨论涉及三个主要问题。

(1) 美国人既然肯定核战争是最大的危险，他们便制定一种战略：在发生敌对行为时，将升级的危险降至最低程度。他们通过推理和经验，断言并论证了最重要的区别是常规武器与核武器的区别，无须明确的协议，敌人也会自动尊重这种区别。从这个总论点出发，所谓麦克纳马拉的学说，主张加强欧洲的常规防务以尽可能推迟使用核武器。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推动下，美国军队曾组织了第一个这样的师，进行有核武器或

无核武器的战斗训练。等到 J. F. 肯尼迪采纳了教授们的意见时，这种尝试被抛弃了。J. F. 肯尼迪的意见是：战术核武器存库，使用这些武器的决定权从此属于美国总统一个人。^① 根据美国人的看法，一旦核门槛被跨越，就不存在任何保险闸。向最后手段升级，虽然不能说完全不可避免，但已非常有可能。

(2) 灵活反应论会削弱美国威慑的有效性吗？苏联人是否从这个理论中看出了征兆：美国以核战争为代价，来保卫欧洲的决心是否减弱了？或者，完全相反，西方人建立了常规防务，是否以另一威慑来加强原来的威慑？预先申明自己将立即招来世界末日，就是虚张声势。一面准备战斗，一面准备最后诉诸核武器，却是采取一种理智的态度，比虚张声势更能使对方认真对待（《止步，不然我就拼命》）。

(3) 法国人于 1960 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戴高乐将军把建立一支打击力量（正式的提法为“战略核力量”）放在首位。战略家和军人不得不制定一种学说，证明一支小的核力量可以对付一支大的核力量。以弱对强的威慑就是这样产生的，并且成为法国的官方学说。

读者如对大辩论感兴趣，可以在《大辩论》一书中找到当时各种论点的交流情况。关于我采取的立场，我觉得就是我书中或文章中的立场。在第一个问题上，我接受麦克纳马拉的理论，或更笼统地说，我抛弃了大规模报复论。朝鲜战争表明，一个拥有庞大武库的超级大国既吓不倒朝鲜，也吓不倒中

^① 或者在“两把钥匙”的制度中，使用这些武器的决定权属于美国总统和有战术核武器的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

华人民共和国。J. F. 杜勒斯的那些话在朝鲜停战之后似乎重新给了最初的大规模报复论以活力，却说服不了任何人。成为争论点的正是，在欧洲这种特殊情况下，作为负有威慑使命的这两种理论是否相对有效。

599 关于麦克纳马拉的理论，或至少是该理论在欧洲的实施，我绝不接受战术核武器方面的教条主义。诚然，敌对双方在限制敌对行为问题上达成的默契，要求有一些双方都能理解的信息：核门槛就是各方能够立即理解的保险栓。除此之外，不存在其他如此显而易见的保险栓。根据这些推论便下结论说，使用战术核武器必然导致最坏的情况，各趋极端，换句话说，导致交战各方相互摧毁城市。对于这样的结论，我不认为是合乎情理的。

关于这两种理论是否各有其有效性，怎样有效，我从不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我这样做的理由，在我看来显得越来越有力量。有关威慑的任何理论或文章，都只是建立在推测的基础上。它们不可能成为科学的理论，只因为它们是通过模式来论证的。外交斗争的得失与核交战的得失，二者大相径庭，以致数字模式失去了所有价值。再者，我几乎一直对抽象的威慑论表示反感。

赫尔曼·卡恩在他写的一本书里^①引用了我的一句话：“不应该抽象地讨论威慑，而应该知道谁威慑谁？威慑什么？用什么威胁来威慑？在什么情况下威慑？”进行抽象推理的人显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对苏联以核轰炸相威胁是救不了西柏林的。就地自卫当然谈不上，那么西方难道就应该做结论

^① *On Escalation*, 1965, Hudson Institute, p. 23.

说它事先就输了吗？柏林人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担心过苏联军队会武装占领柏林。威慑已在发挥作用，但苏联人并不因此就相信，美国人会不顾死活，大动干戈，来对占领军进行报复。西柏林对美国人来说不只意味着 200 万德国人和原帝国首都的一个部分。西柏林象征性地代表着美利坚共和国生命攸关的利益。一个大国不能损害另一个大国生死攸关的利益，除非它肯冒大战的风险或冒局势长期极度紧张的风险。

现在，再来谈谈整个西欧防务问题。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队发动正面进攻，在当时，我觉得无论如何不大可能。这种进攻，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只有在美国参加战争的情况下，也就是全面战争的情况下才可设想。所以，1961 ~ 1963 年，大西洋两岸之辩论的激烈具有人为的性质。所以，从 1963 年起，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赫鲁晓夫的所谓最后通牒垮了台，这场辩论就自行平息了，过了 15 年才死灰复燃。 600

事实上，美国的灵活反应论已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式接受了；多边力量的奇怪计划则被抛弃了，主要盟国派代表参加一个专门委员会，负责制定核战略计划，至少负责向欧洲人通报这方面的情况。各方思想上都有保留：逐级反应的设想是不是最好的威慑？西方人是否拥有足以进行持久防御而不必动用战术核武器的常规力量呢？存放在几个武库里的这些武器，难道不会在使用之前就被摧毁吗？苏联会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预测的那样发起进攻吗？

《大辩论》一书在美国很受欢迎，许多大学都使用它。麦克纳马拉在五角大楼接见我时，就已把我的书摆在他的办公桌上了。他对我说，在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书中，他喜欢我这一本（这是对一个记者的奉承吗？基辛格向我肯定麦克纳马拉

曾跟他说过同样的话)。这无关紧要。我在政治学院讲完课，随即用三个星期在乡村撰写成的这本小册子，几乎没有提出独到的见解（这可能吗？），但是，它毫不教条地开导了一场争论，结果这场争论成了心理推论。有些细节提高了分析水平：苏联人是象棋大师，他们否定打有限战争的设想，那他们是不是不打扑克呢？美国人在纸上大谈不全有则全无，大谈末日与投降，实际上不断设想着中间方案，他们不是也梦想下一盘战略棋吗？美国人希望自己的对手精通战略的奥妙、熟悉狡猾的战略，还是正相反，希望自己的对手对于美国的想法一无所知？总之，美国人会不会邀请苏联政治局的一个委员去兰德公司听课？

我写的一句话对麦克纳马拉有所触动，他对这句话发表了评议。这句话是：在盟国之间，要避免发生误会，促进相互理解。相反，捉摸不定，甚至误解，应存在于敌人之间。具有合理思想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难以接受敌人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我觉得，一种虚张声势的成分在外交危机中则是不可避免的。诚然，看看历史，人们可以把战争爆发的部分责任归咎于缺少沟通，譬如1914年的战争。如果奥地利人早知道俄国人为了支持塞尔维亚会冒险或发动一场大战的话，他们就会采取别的行动了。但事实上，从一开始奥地利人就下了大赌注：正如他们所打算的那样，惩罚塞尔维亚，在柏林的全力支持下恫吓俄国并迫使它按兵不动。他们并非不知道有可能导致全面战争，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无论如何，在目前的危机中，在核末日的阴影下，当事人拿不稳、料不定对手是否会进行反击，因此他们可能得出比较有利于和平的结论。只要各大国相互对立，各自的目标无法调和，相互以诉诸武力相威胁来

达到自己的目的，那么对话便不会变成讨论，也不会成为一盘棋：它依旧是一场斗争，虽然不一定会恶化成你死我活的战争，但会完全失去理性的控制，也会掩盖当事者的明显意图。

为什么 1961 ~ 1963 年会吹起那股狂热的风呢？而过了两三年，为什么又几乎若无其事了呢？欧洲的政治家和记者大都不了解美国思想在各大学和思想库的发展情况，肯尼迪是从大学顾问那里吸收了这些思想的。当大部分部长和评论家还在坚持早期的大规模报复论和简单的开战理由（越过分界线）时，新理论表面上的微妙性并没有很好地被人理解，或至少在这方面 602 面对美国人做出了最刻薄的解释。德国人的理解是，新的理论意味着同意别人占领一部分德国领土。法国人则怀疑美国威慑的价值，加卢瓦将军认为，“任何一国都不可能保护另一国”。他的论点一时很流行：美国不会为了拯救盟国的城市而牺牲本国的城市。

法国的威慑力量及其有效性这一论点构成了《大辩论》一书的最后主题。在前一章，我援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谈论了这个问题。在《大辩论》一书中，这方面的讨论比较抽象。

核武器的性质是否证明，以弱对强的威慑概念本身是对的？可以肯定，有了这么一种武器，只消上一个，就能酿成滔天大祸，那么平等或平衡的概念就变了意义。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小国可以威慑一个大国，尽管它所造成的损失与它所遭受的损失不成比例。但不应该把这一说得通的思想发挥到荒谬的地步。弱国也应该使敌人确信，它已下定决心，宁死不屈。要证明这种可能的威慑合乎情理并不困难：小国所代表的利益不值得侵略者冒风险。但是，小国的“价值”是什么呢？大国估计

的“风险”又是什么呢？还有，哪一个法国总统会用幻影 IV 型战斗机向莫斯科发动进攻而不使法国遭到核攻击呢？

一旦以弱对强的威慑论被抽象地接受，就有必要研究历史情况，我在 1961 年至 1963 年这么做了。但不要用概念来研究，不要虚无缥缈地计算赌注的代价，而要用具体的资料来进行研究。从地理上看，法国与苏联没有共同边界；从政治上看，它属于大西洋联盟。在 1960 年代初，法国的战略核力量有无必要威慑苏联，制止它对法国发动侵略？这种侵略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思议的。

现在我们已进入 1982 年，而不再是 1962 年了。我们应该追溯一下过去 20 年中发生的变化。

603 在竞选总统时，J. F. 肯尼迪揭露了“导弹差距”，即苏联人实际上在导弹方面所拥有的优势。他在当选之后却发现，“这一缺口”无须填补，因为它根本不存在。苏联人远不能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数量生产洲际导弹，但他们于 1962 年已部署了好几百枚中程导弹和少量的（也许是 100 枚或稍多些）洲际导弹：

苏联没有大批量生产战略轰炸机，不能击中在美国的目标，也没有生产美国专家在 1957 ~ 1958 年所担心的几百枚洲际导弹。可能是因为财政拮据，也可能是为了致力于研究下一代导弹。苏联人满足于利用某种反击能力（他们声称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能确保这种报复能力），同时利用他们对西欧防务的优势，来抵消美国大量的武器优势。^①

① 《大辩论》，第 163 页。

美国的灵活反应理论是以美国在高级洲际导弹方面的优势为基础的，更笼统地说，是以“控制升级”为基础的。如果美国的优势随着升级而更加突出，美国方面负责应付危机的战略家们便会自以为完全可以由他们来决定敌对行动应该在哪一级进行。

出于政治和技术这两大方面的原因，欧洲形势和世界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根据美国的理论设想，侵略将来自苏联，而且苏联将理所当然地利用它的优势，即常规优势。同样是假设，美国人则拥有控制战争升级的能力。在苏联人的军事著作中，他们并不公开考虑美国人喜欢设想的那种场面。他们把美国的取舍和美国的战略分析，当作帝国主义的一种诡计来对待。他们提出的论点是，如果有朝一日爆发战争的话，那么战争将是全面的，使用的核武器将对敌对行为的结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604

1981年，苏联不仅仅保持了而且扩大了它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它的各个师都配备了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特种营。在高级洲际导弹方面，它至少达到了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准，或许甚至获得了“理论上”的优势。从这一意义上讲，苏联重型导弹的核弹头 SS18 导弹和 SS19 导弹，可以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失去作用。在 1960 年或 1961 年，“导弹差距”并不存在；在 1982 年，在这方面可能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差距。

除了美苏力量对比发生变化，还出现了技术进步，甚至技术革命：导弹——甚至洲际导弹——的命中率越来越大。第一代导弹瞄准的是大范围的目标，因为它与目标的平均误差以千米计算。这一误差现在是以几百米计算。因此，连远程导弹在内的多种导弹重新成为战斗武器，不再只是威慑武器了。1961

年，我已对苏、美理论的不对称做了评论。如果把苏方的言论当真，那么苏联人似乎只考虑这样一种抉择：要么打总体战，要么根本不打仗。美国人则在各种危机和各种敌对行为之间做种种区别。

20年之后，美、苏双方理论的不对称依然存在，但已变成了另一种情况。由美国空军翻译的苏联军事著作坚持克劳塞维茨的论点，即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一论点由于得到列宁的赞赏而被神圣化。尽管核战争对人类是滔天大祸，但仍然完全符合这一论点。核战争标志着两种社会制度之间殊死斗争的决定性的最后阶段，它将以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而告终。苏联人并不把威慑概念作为他们的中心思想，他们确认核战争是能够而且应该打赢的，而不仅仅是可以防止的。美国人方面则考虑了和写出了许多关于避免核战争的办法，而对如果突然爆发使用核武器的战争他们该如何处理，则相对来说考虑得较少。

当然，苏联的军事著作一贯把理论和宣传混在一起（至少根据我们的看法是这样的）。什么也不能表明政治局的成员或军事作家真心真意地认为核战争可以打赢，但是，一切都要看人们赋予“核战争”概念的含义。即使疏散城市人口和建设民间防务可以减少人员的伤亡，但两个大国仍然拥有相互摧毁的能力。这种能力越大，打核战争就越发说不通，也就是说核威胁的作用越发叫人难以置信。但是，导弹的命中率高到足以摧毁敌方的导弹，或在欧洲战区打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生命攸关的防务中枢，但并不使西欧变成原子辐射的废墟。各人都可以想象战争的情景，其结局不是同归于尽，而是其中的一个阵营投降或在暴力的世界末日来临之前进行谈判。

应该重写《大辩论》这本书或者再给此书增加几章。今天，法国拥有了导弹核潜艇。20年前，我就觉得它是一支真正的战略核力量的实质内容。但是，根据官方的声明，由于对纯属军事目标的选择缺少必要的准确度，导弹仍以重要的城市为目标。再者，法国的政治命运与西欧其他国家的政治命运是休戚相关的。以诉诸核武器相威胁，也许能使我们的国家免遭入侵，但是，怎能设想法国在一个苏联化的欧洲中仍然能保持自由呢？威慑力量至少给了我们喘息的时间来适应局势。

应英国实证主义协会的邀请，我为纪念奥古斯特·孔德做第二次演讲，我选择了“工业社会与战争”这一主题。这是一项令人生畏的工作，因为我所注重的论点显然是孔德论点中一个最无说服力的并为各个事件所驳倒的论点，即根本对立的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种是军事社会，另一种是工业社会。第二种类型本质上是致力于和平的：它通过科学性的劳动开发自然资源，从而无须用暴力获取战利品而发财。

606

我既有点偏不买账，又有点出于经验感受，试图挽救孔德论点中的某些东西。我一再议论列宁主义的论点，这种论点把我们时代的各种战争说成是资本主义的产物。我很愿意在一个致力于劳动的社会中，寻找国与国和平相处的希望。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地下室的礼堂里做报告之前，我起草了一份长达80页左右的手稿。在做完报告后，我对这份手稿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这次报告给我留下了有趣的回忆。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听众。尽管我的报告一反常态，讲了75分钟，超过了规定的时间，但听众们都坚持听完了。《工业社会与战争》这篇文章

多次被转载到论文集里，或以单行本多次再版。

这本小册子的前几部分根据 20 世纪的战争史解释孔德的思想，对 20 世纪的两个 50 年进行分析，追忆 T. 凡勃伦 (T. Veblen) 和 J. 熊彼特的理论。读者如有兴趣，不妨自己去看。我现在只来谈谈此书的结论，或者说第四部分。在这一章里，我列举了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保证国与国和平相处的必不可少的三个重要条件：缩小占少数的特权阶层与仍未摆脱贫困的大众之间的差别；在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情愿彼此相容的国家；结束两个大国之间和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第一个条件，我不认为基本上不能实现，尽管在几十年内前景不容乐观。第二个条件，等于排除强权政治，我觉得难以用规章制度来落实。持久的和平既不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之上，不建立在人人畏惧的基础之上，也不建立在帝国发号施令的基础之上。应该设想，共同繁荣是个人繁荣的必要前提，而集体应该接受经济方面的超国家性。至于第三个条件，则为苏联世界与西方世界之间减少冲突。我认为这从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从历史上讲至少是遥远的。

607 根据苏联人的看法，理论应该指导人们重新组织社会，这不是实证主义，实证主义主张阶级合作。但是，马克思主义宣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只有无产阶级彻底胜利，才是实现和平的唯一希望。这种理论使人类分裂了，它鼓励那些信奉这种理论的政权毫不留情地谴责其他政权，总之，它保持了奥古斯特·孔德所称的原则战争。

在进行这样的分析时，我考察了 19 世纪的作家曾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进行辩护的各种和平理论：自由党人向往贸易共和国，社会党人向往胜利的无产阶级国际，经济学家则寄希望于消除军人阶级。这些乐观主义的或乌托邦式的看法，我一概不能同意。假设工业文明能使战争成为违反理智的东西，那么发生争执的原因仍有待消除。殖民统治虽然往往不再能带来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占有蕴藏石油的沙漠却能得到大量报酬。20 世纪理想的殖民地是藏有石油的沙漠。但是，除了这些次要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由奥古斯特·孔德所确定的那种工业的社会性，包括思想方法、社会组织、政府体制，这一整套与战争思想是不相容的。而实际上却完全是另一码事：工业的社会性带来的是对立的意识形态、世代的偏见、国与国的明争暗斗。专制主义被错误地认为是过去的世纪的残余。工业社会并不排除任何暴政，也不包含任何特定的政治制度。最后，尽管这篇文章比其他任何一篇文章都更多地从社会学角度来解释现代战争，我仍要顺便提一下社会学解释的局限性：

人在集体力量中有了自己的一份就会感到满足，把经济上的盘算一扫而光，甘心自我牺牲，认为大有意义。掌权的野心，胜人一筹的傲气，其深切的程度并不亚于对人间财富的追求。而这种追求势力的意愿可以在集体中，或通过集体，得到满足。如果权势就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那么工业能使关心统治胜于关心生活的人们彼此和睦相处吗？

文章是以乐观的调子还是以悲观的调子结束的呢？重读这篇文章后，我觉得说成乐观有点勉强，悲观则从分析本身流露

出来。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乐观主义占了上风，就是对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大国来说，不打仗对大家有利。相比之下，那些引起对立的局部利益，便显得微不足道了。两个大国既然不能共同统治，那么合乎情理地，只有冒有限的风险，选择武装的和平，这总比冒热战的不测之险为妙。根据奥古斯特·孔德的说法，过渡阶段引起各国之间、各种意识形态之间和各种宗教之间的无数冲突，但并不扼杀避免无限战争的希望。

过渡阶段很可能持续几个世纪，过了这个阶段，将是什么景象呢？在这个过渡阶段中，工业社会性的扩展会遇到古老传统的抵制，会打乱过去稳定的秩序，会使得广大群众的贫困蔓延，会增加冲突的因素。假设在过渡阶段之后还有一个阶段，“我觉得什么都不能证明，‘智人’（*l'homo sapiens*）必将在一场发疯的灾难中与大地同归于尽……奥古斯特·孔德错误地认为各种战争不会再发生，因为战争已毫无用处。而我们是否有理由走向另一个极端，再也不去看看明智与疯狂的差别、理智与荒谬的差别？”最后一句话，我事先没有准备，在即席演讲时突然闪现在我的脑际：“我们失去了预言的兴趣，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希望的义务。”《泰晤士报》发表一篇社论，评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小册子。撰写这篇社论的记者以带点儿讥讽的口吻，对“希望的义务”这句话做了很有见地的评论。希望是不可控制的。战争属于人类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记者的这个看法缺乏新的见解，但不乏常识。不管怎样，他的评论没能使我们满意。诚然，发动战争的是人，而不是机器。无论如何，当机器是氢弹时，难道这些机器不会对人的精神产生影响吗？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 或 1968 年 5 月

1968 年 5 月事件正如法国的历次革命，从不会事过境迁。609
依着人们不同的情绪，那些事件有的显得壮丽激烈，有的显得滑稽有趣，但都激动人心，尤其扣动社会学家的弦。社会学家给造反的学生发言讲演，提供那么多的思想和词汇，自己的同行也就不能不觉得身在其中，越发痛感撕裂之苦。短短几天，天摇地动，几乎把戴高乐派 10 年来经营缔造的宏图巨制一举推翻。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时至今日，连外国人都还在争论。有一份英国杂志介绍了好几本研究法国“五月风暴”的书，它们还在讨论我那本小册子的功与过。^① 到底是最好的文章，还是最坏的文章呢？1979 年颁发歌德奖的时候，R. 达伦多夫谈到我对事变的态度，遣词用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足以让人猜想出他自己的态度。他大概认为，我在感情冲动下，文才见拙，甚至一反常态，背叛了自己。他绵里藏针，恳请人们宽恕，不要计较我那些情有可原的东西。

至少在表面上，我并没有奉命捍卫古老的巴黎大学和学官大人。我一向在报章杂志上批评法国高等教育的组织方式，批评中等教育毕业考试太难，而大学入学考试则失之太宽，批评 610
教师考试不足以保证教学质量，不利于培养研究人才，批评教授唯我独尊，师长席上一坐，除了上帝便是他最权威，对于同

^① *La Revolution introuvable*, Fayard.

寅的工作往往一无所知。

然而，在“选拔”问题上，我大概该算是“右派”。“选拔”一词从1968年起竟包藏了那么些不满以及盲目的冲动。教学制度，从小学到教师会考，直到名牌学府，始终实行优胜劣汰的选拔制。男生、女生同年入学（至多相差一两岁），而离校时有些人是16岁（甚至不足14岁），另一些人是19岁，还有25岁的。“选拔”这个词，只有出中学上大学时，才真正用得上。我主张上大学要经过选拔。而作为补偿，中学毕业只消一次考试就行了。到了今天，我这个主张仍然可行。商业学校、职业学校，都不是什么中学毕业生都收，只有大学文学院却来者不拒，连前途难卜的学生也可待下去，挤在这种托儿所里。大学毕业文凭不值钱，专科学院越发吃香。进大学后过了一年，才看得出选拔起作用。正因如此，所以大笔大笔的经费，花在几万、几十万升不上二年级的学生身上。有人连一年级的年终考试也不去考。

1967~1968学年的第一学期，同人们推我担任社会学系系主任，因而我有机会跟学生聊天，比较清楚一点儿地了解到新章程实施后立即引起的各种后果。旧章程马上就不适用于在校学生。有人可能白白浪费一年，或者说得确切一些，有人会要多花一年才能取得学士或硕士学位，或者与旧章程所规定的相等的学位。

这一场危机震撼了整个巴黎大学，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第六部也没能幸免，而我却已经在1月1日脱离了巴黎大学，所以全然没有理由插手其间。指导老师可以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太太平平，远远地瞧着。5月的第一个星期，维持秩序的武装力量开进巴黎大学。4号星期六，我看到暴力在升级，虽

然不出意外，但仍不免叫人心急。学生示威，与警察发生冲突。我在卢森堡电台讲了一次话，讲的是乱事的原因而不是反对或赞成那些学生。星期六上午，拦街筑起的壁垒已经过了一夜，原来埋头研究、不管政治和大学乱事的人，心里也不得安宁了。我和好多人参加了一次会，其中有 C. 列维 - 斯特劳斯、夏尔·莫拉兹、J. - P. 韦尔南（Jean Pierre Vernant）等。会议通过一项动议，据记忆所及，动议主要在于谴责使用暴力。我虽然署了名，劲头却并不大。

就在星期六这一天，广播电视台的官员们来试探我。大概是伊夫·穆鲁西当了他们的代表，不然就是他出的主意。我觉得他们想要我说一些近情的话，缓和缓和气氛。据说总统府秘书长特利戈先生讲了话，这话由别人传进我的耳朵。他说：“谁也没法硬叫雷蒙·阿隆守规矩、受拘束。”我考虑了几个小时，终于拒绝了那个送上门来的讲坛。鉴于11号星期六这一天的人心状态，我实在不知道讲什么才好。是不是还有一些不愉快的情节，促使我决然拒绝呢？对于我，戴高乐将军感到不太痛快，至少谣传如此。戴高乐派人物和电视台对我都避而远之，仿佛要躲开一名危险的不法之徒。为了这点事而不肯讲话，未免不太漂亮。不管是不是戴高乐派，反正应该出力救火，但是，我到电视台去讲讲话，又能起什么作用呢？

下一个星期二，我订了从巴黎去美国的机票。一共有三个约会：首先，到一家纽约州立大学去讲人权。然后到波多黎各去做各家银行举办的年度讲座，讨论货币问题。我是外行，只能算业余爱好者，居然要面对世界上最出色的专家们班门弄斧。最后，到美国犹太委员会去讲越南问题。我确实在星期二动身了，那是法国总罢工、群众大示威的次日，是巴黎大学重

612 新开门的次日。我在异国他乡，远远望着，心里发急。罢工越发频繁，示威游行接连不断，暴动此起彼伏。5月20日，我实在待不住了，决定回国，并向犹太协会表示歉意，说爽约实出无奈。飞机在布鲁塞尔降落，法国机场全都关闭了。幸而一家大公司的领导跟我同路，他邀我搭他的车一道返回巴黎。

我去拉丁区溜达，有一两次溜达到黎世留大厅，听听一个接一个的演说家在讲些什么，气氛倒像什么革命的节庆庙会。我又到圣威廉街跟一些出身名门的大学生谈论。这帮年轻人仿佛都大彻大悟了，人人都觉得戴高乐将军5月24日在电台讲的话有点“隔靴搔痒”。我也有同感。将军老了，还想装点似是而非的哲学派头，像当年那样鼓舞起几十万法国人的心。印刷厂开始检查《费加罗报》的文章。我写了一篇打趣的文章，把托克维尔的几句话拼凑在一起。

在格勒纳勒街进行的谈判促使协议得以达成：逐步停止罢工，解决社会危机。大学生的问题也许还不能同时解决。比扬古工厂区的工人起哄，指责共产党和总工会的代表。27日星期一，一切都重新成了问题，连政权本身都似乎摇摇欲坠。29日和30日两天，我自己也担心这股子不平之气会不会滑向革命。我在家里跟几个好友一道听将军讲话。我好像叫了一声：“戴高乐万岁！”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一次他搔到了痒处。他赢了。我跟巴贝雅努去到香榭丽舍大街，人群越聚越多。到了报馆，听说法共在国民议会领导议会党团的巴朗热先生发表了声明，宣布“我们将参加选举”。6月1日星期六，卢森堡广播电台“号外新闻”栏目约我讲话。我用“心理游戏”这个说法，惹恼了在场的工会干部。

下一个星期，我连写几篇文章谈大学危机。有些读者——

为数不多——责怪我凑热闹，为凯旋之师增援，多此一举。这种指责是不公正的。国民议会还没有解散，政治危机还没有结束，我的文章一定会被印刷工人退回来，反正不会引起舆论注意。而法国必须重新工作，必须重建一个政府来从事建设，特别要建设大学教育。这些都必须提上日程。再者，虽然选举已经被宣布了，但愤愤不平的年轻人仍未宁息，还把选举叫作“叛卖”。偏激狂热的青年还没有冷静下来，占据巴黎大学的人还没有通通离去。教授不教书，学生不学习，甚至院长和掌权官员也不都在尽其职守，借口自己赤手空拳已经做不了主。

我以向来不开口的老百姓的名义，呼吁各级教师出力改变气氛。教育部秘书长皮埃尔·罗朗对我说，没有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起的运动，他就没法搞中学毕业考试。可是这里面有多大成分是客套呢？我在《费加罗报》和《社会学欧洲中心》发出的呼吁，弄得皮埃尔·布尔迪厄跟我绝交。他的信徒们涌进巴黎大学，发传单宣扬布尔迪厄-帕斯隆（Jean Claude Passeron）的福音书，并且发出“教学三级会议”这一口号。学生们则引用而且过分引用《继承人》一书中的一些想法。有些社会学家马上出来解释当时发生的事变，有的自己积极参与其中。传说 C. 勒福尔在卡昂当了“狂热分子”。好些教师改变了本来面目，仿佛一下子跳进了化妆狂欢节，扔掉了自己原来的社会身份、自己的习惯打扮，暂时摆脱身上的义务、规矩和职业，让深埋在心坎里的梦想奔放出来。在社会学系全体会议上，我瞧着这些突然暂时改变信仰的人，觉得又可爱，又可笑。

我写的一些文章，甚至在《难觅的革命》出版以前发表的文章，已经把我从旁观者变成了当事人，从观众变成了演

员。当年我发表小册子讨论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后，我的变化还不如这一次大。《新观察家》周刊刊登了我的一张照片，下面写着“被理智引入迷途”的“一个凡尔赛派”^①。让-保罗·萨特也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并痛斥戴高乐将军和我，口气之暴烈，简直令人没法相信。

614 我跟这个月里的官方主角们仅仅有过一次接触，那便是在沙勒蒂开会时，同孟戴斯·弗朗斯在马塞尔·布路斯坦家里谈过一次话。我想说服他，学生运动不过是导火线，本身并没有什么力量。我对他说：两个阵营以共和国、政府、议会及未来的选举为一方，以共产党为另一方，而后者却至今不像急于渡河决战。知识分子、弄笔杆子的革命家，指责共产党不肯追随柯恩·邦迪、热斯玛尔和巴尔若内^②那些人。假如共和制的合法性被一群乌合之众扔了几块石头就垮了台，那么能出来填空的也将非共产党莫属，尽管共产党还有点扭扭捏捏。我记得孟戴斯·弗朗斯当时同意我的看法。过了两个小时，当天下午，他便大受学生欢呼。他对我提供的道理——用来说明他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概括起来只有一句话：别让拉丁区绝望。今天的大学生便是明天的国家栋梁，大学生们不该在这一次乱事中丧失希望，产生厌世之心，从此不由自主地牢骚满腹，逆来顺受。

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许多文章以及那本《难觅的革命》引起了笔战，但在叙述这些事情以前，我想先稍微谈

① 巴黎公社成立政府，梯也尔率领旧政府，在普鲁士军队的卵翼下，在凡尔赛策划反攻倒算，这些人便被叫作“凡尔赛派”。——译者注

② 三人均为1968年5月运动中的学生领袖。——译者注

谈事件本身，区分一下危机里面哪些属于历史，哪些属于社会学范畴，解释各色各样对于事件的评价。这些评价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因为事件总的命名叫作“五月风暴”，而其内容却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我们先讲讲历史或经过。事件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警察开进巴黎大学到5月13日爆发总罢工，巴黎大学重新开门。第二阶段罢工扩大，先是野蛮罢工，后来才由共产党发起并指导。结果劳资双方在政府监督下，达成格勒纳勒协议。第三阶段只不过短短几天，包括比扬古工厂区罢工工人表面上拒绝执行协议，总统、总理遭到质疑。弗朗索瓦·密特朗宣布，倘若将军引退，他将竞选总统。共和国总统失踪几小时，使这一切发生了戏剧性变化。总统于30日星期四发表演说，事件达到高潮，随后引起香榭丽舍大街的群众大示威。最后一个阶段历时几个星期，秩序逐渐恢复，巴黎大学和奥德翁剧场一带的混乱巢穴被一一肃清，立法选举得以举行——多数党大获全胜，倒不是在议会席数上胜利辉煌，而是全国人民的呼声扣人心弦。

历史学家对于每一个阶段都要提出两类问题：一类是史实上的，另一类是社会学的。比方说，头一个星期，总统还在亚洲进行访问，而国内做出一些决定，点燃了火药。4日星期六警察出动，警车拉走几十个大学生，判了几个大学生的罪。特别是11日星期六，蓬皮杜总理回国，街垒战刚刚过去，政府政策一下子倒了个个儿。若克斯（L. Joxe）和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同学生和工会代表谈判达成的协议，蓬皮杜不予实施，自称上个星期不在巴黎，而且总统处于一切派别之上，当即答应了“大学生”的全部要求。（给大学生加引号是

必要的。大学生并没有都参加事变，为首的不过是一些革命小组织。)

这些决定都产生了重大的后果，其中尤以5月11日乔治·蓬皮杜做出的决定之后果为甚，直到今天仍然没法盖棺论定。学生搞的化妆狂欢节发生于5月13日，工人则依样画葫芦，而戴高乐的政治格言“国家不能后退”，由于政府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出尔反尔而大出洋相。蓬皮杜几星期后写给我的信，在我看来成了历史文献。这位总理在信中不仅谈了事件的经过，而且阐明了他的思想。信上说：

我亲爱的朋友：

616 奉读阁下就“五月风暴”与大学问题发表的文章，不胜钦佩。然而，文中就富尔的演说词所下断语，使我不得不做书面更正。这绝非为阁下的读者着想，而是纯粹为阁下着想。您曾写道：蓬皮杜赌绥和，已经赌输。请容敝人奉告阁下，尊见并不尽然。我并没有打赌。在我看来，我于5月11日做出的决定，欲挽狂澜于既倒，可能性百不能一。您也许会问，那便怎样？那我就像将军稳不住阵脚，退守可守之地。我使撤退显得出于主动，一为顾全面子，二为顾全舆论。我再补充说明一下：我从阿富汗回国，局势似乎已临绝境。巴黎舆论完全支持学生。5月13日宣布举行示威。我当时认为，而且今天越发可以肯定，如不让出巴黎大学，示威运动不仅将推翻政府，甚至将拖垮整个政体，何况夺取巴黎大学乃势所必至。阁下不妨想一想，50万人的队伍由共和国广场直奔丹费尔区（而且这条路线是由我做出决定后才获得示威领导人同意的），

一路上会不会向前直奔，竟然不到巴黎大学去绕个弯？而共和国保安队还占据着巴黎大学。自古以来，谁能不让这样庞大的人群，闯进像巴黎大学这样的地方呢？派正规军来也吃不消，何况由谁下命令，叫士兵向这样的人群开枪呢？

果真弄到这步田地，学生不顾政府的决定，重新占据巴黎大学，那便真的走入绝境，不投降便打仗。舆论可不会同意打这样的仗。

因为阁下知之甚深，这种性质的事情，全在舆情之向背。归还了巴黎大学，示威者便失去战略目标，再不能掀起暴动，而只得以示威始，仍以示威终。尤其是顺应舆情，责任便别有所归。从此理亏在“学生”，本来受政府与警察迫害的无辜学子，忽由自卫变为挑衅，从而成了挑衅者。我只消争取时间，控制住病患，等舆论厌倦，就可以采取无痛的攻势。这便是我始终如一奉行的行动路线。

碰到这样的事情，出路只有两条。要么从一开始便实行最暴烈、最坚决的镇压。我既没有这种嗜好，也不掌握这种手段。就算我既有这种嗜好，又掌握这种手段，舆论愤愤不平，也将逼我后退，等于叫我滚蛋。一个民主国家得不到舆论支持，绝不能使用武力，而当时我们并未得到舆论支持。

617

要么就让步，虽然焦头烂额，但仍可庆幸毕竟未至尽成灰烬。只消争取到时间，学生会渐觉厌倦而折中言和。也有可能执迷不悟，一如日前。但这样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不得人心。这也是已经见到的事实。时间一到，我便着手无痛攻势。

望阁下不至误认为5月11日晚上做出的决定效果不良。恰恰相反，有赖这项决定，我已在政治上赢了一局。假如共产党决计搞暴力革命，那就另需一决输赢。事到其间，问题便与对付大学生完全相反。政府使用武力，非但军队绝对忠实可靠，舆论也将左袒政府。反正在这一险招面前，倒是共产党望而却步。

言之草草，奉恳自供参考，不足为外人道。鄙意无非为阁下阐明上述策略之用心所在耳。

假毕开学，盼得一晤，畅谈大学情形。E. 富尔所言，时萦下怀，觉得问题不少，至于碍难公开采取立场，亦不待言。

专泐并表怀念友朋之情

这封信写在1968年7月底，不仅说明了5月11日做出的决定，而且解释了“处理”事变的经过。而蓬皮杜为此所负责任，胜过将军。5月29日，将军秘密出走，有其前因后果。总统与总理两人不睦，于5月11日采取决策时发生冲突。总统出走，总理担任作战指挥，从而策划方略并取得胜利。这是总理自己的胜利。

史学家阅读乔治·蓬皮杜手书，不禁发问：5月11日，倘若政府不屈膝而坚持，又会发生什么后果？谁也没法做有把握的答复。然而谁也不会对下面的说法有争议：乔治·蓬皮杜的决定拖长了乱事，但取得了最后胜利。

618 对于其他事件也可以提出类似问题。万一几个年轻人开枪打死保安队，公众会做出什么反应？将军出走几个小时后，于5月30日在广播电台发表简短的申明，是否为不动武而解决

危机创造了有利的气氛呢？事实上，1968年5月事件期间的几个星期，确有少数几个“关键事件”会让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会搞成什么模样，如果……

社会学家则比较关心事变的前因，关心总的条件。居然把本来不大的乱子弄得影响很大，到底是哪些原因弄出了爆炸性的局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因人而异，要看注意的是物质条件，还是把造反者说的话字字当真。

咱们不妨看看学生们老嘀咕不完的一个题目：大学民主化还是不民主化。布尔迪厄和帕斯隆写的《继承人》，可以说在5月变成了大学生的枕边宝书。可是从这一事实中又能推论出什么呢？是不是学生自己是继承人，向往着8月4日那个夜晚，自愿放弃自己的一切特权呢？或者学生不是继承人，其中有些人自觉冤枉地受到排斥，只好去搞二流学科，前程有限，不符合自己的雄心壮志呢？或者学生确是继承人，但没有能力去搞一登龙门则身价十倍的学科，从而对制度愤愤不平，怪它排斥自己的没出息？这些假设都有个人的实例作为根据。小资产阶级的子弟，大众阶级的子弟，破例上了大学，自觉手足无措。世家子弟反对国家行政学院或巴黎综合理工学院那种纯讲精英主义的学府。世家子弟不得已而求其次，勉强搞搞心理学或社会学，把自己的一股怨气变成意识形态。情况各不相同，大多数又是哪一种呢？而这些意识形态又有什么意义呢？

比较严肃的社会学调查揭示出一种时代性的现象。出身于不熟悉高等教育家庭的子弟，上了大学，茫茫然不知所措，到底选什么学科，毫无把握，只怕抢到了一张文凭，仍然解决不了就业问题。他们心里着急，形单影孤，前途渺茫。于是，他们跟着家庭比较优裕的同学一道呼喊：打倒消费社会！

痛骂小考大考，是这次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痛骂倒不一定是爆发革命的原因，但说明了这种“大放假”的形式。政治倾向各不相同的学生小组织，拟订出改革大学的方案。老师跟学生平日难得交谈，这时候居然尔汝相称。甚至倒转地位，学生要求从此参加考试评审委员会，竟然还要求任免教师。这种化妆狂欢节并非法国独家经营，别国也有类似情况，只是法国有法国的派头罢了。

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在法国比在英美大学大。巴黎大学的一个教授往往施加威力于整门学科。其他国家的情况无与伦比，因为别国没有这样的集中制。医学界大师的诞生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或者为了鸣不平。革命的爆发由环境造成，有时候是正当的，因为反对的是滥用权力、不合情理的森严等级。

倘若从大学生说到工人，只消分析分析，也可以瞧出起因与旨向、思想与意识。最初发动罢工的种种原因，内中包括这么一条，即事变前一年，米歇尔·德勃雷曾推行过相当严厉的紧缩政策。最低工资的增长落后于平均工资。各种报酬都有所增长，而国家保证的最低工资却没有调整。格勒纳勒协议引起1969年的法郎贬值，至今还有不少人（如雷蒙·巴尔）还会倡言，法国的经济有能力消化工资增长的20%~25%，而不用让法郎贬值。这至少暗示出，在前一阶段，工资压缩得太厉害了。然而，不管原来的工资水平该归谁负责，反正爆发了没遮拦的野蛮罢工，成百万劳动者失了业，人们的议论便远远超出了通常的工运要求，而波及企业的结构、指挥的作风、工人自主、消费社会、反对污染、和睦相处等问题，从而展开了大辩论。几十万法国人撤下工作，也正是马克思说的“必然王国”，投进大辩论。

日常的沉闷生活突然得到了发泄消遣的机会。半真半假的革命，与其说是真干，还不如说是演戏，可是很能引人同情，甚至能激起人们的热情。街巷斗殴变成了暴动，示威群众与警察发生冲突，而警察总是理亏，总是他们先动手，群众见了，莫不拍手称快。群众永远爱看木偶戏，最爱看木偶宪兵到处倒霉出洋相。快活的年轻人，宵宵结伴，出去游行示威，成年人看了心里也高兴，只要自己的汽车没有被搞得没法再用就行。大学里半圆形的大讲堂里，过道走廊里，红男绿女，一场接一场开会。即席演说家不知不觉模仿着伟大先辈的手势和腔调，吸引了很多猎奇的人前来取乐。大学教授，甚至中学教师，彼此都有矛盾，尽管激烈的程度不一样。有的跟着怒冲冲的学生们走，有的奔着迎上去，有的拦河筑坝，遏制哗众取宠的洪流。空想如烟云，梦幻如雾霭，氤氲泛滥，不可究诘，而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亲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

5月15~30日，国家生活可说是已归瘫痪。大部分工厂停工，工人占领车间，细心维修停转的机器。罢工竟然蔓延到公用事业，这儿那儿成立了一些类似公社的组织，由工人和工会干部领导。直到皆大自在的最后一天，开心一直胜过动武。而这样的社会性爆炸，一般都免不了动武。反正，什么都没法完全当真。大家玩玩，不能太“认真”。到了月底，对于“出色青年”的同情心变了，变成对于“丑剧”的深恶痛绝。害怕真的革命，弄得看戏也兴致索然。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新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从27日星期一到31日星期五，政权发生动摇，或者说，好像发生动摇。说这是大学生化妆搞狂欢，也许是的。但是国民议会里的那一场会，谁又能忘记呢？那次会上，E. 比萨尼本该以多数派议

员的身份为政府发言，而结果，他发表了一篇反对派的演说。乔治·蓬皮杜听了又气恼又诧异。吉斯卡尔·德斯坦在记者招待会上，提出请总理卸任。5月27日，F. 密特朗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戴高乐将军应于6月16日引退（据说公民表决议于这一天举行），也许到不了6月16日就得引退。所以他的总理、他的政府当然都应一锅端。他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建议马上成立临时政府，暂行处理国家事务的职责……”接着又提出谁当总统的问题。他说：“谁当共和国总统呢？由普选决定。但是，现在我就宣布，因为预备期只有18天，前后都属同一战斗，所以宣布由我当候选人。”这话暗含着对宪法的违背。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辞职，总理留任，由参议院院长代行共和国总统职权，直至选出继任人止。F. 密特朗说戴高乐将军辞职，总理也得辞职，这是他经过考虑后提出的一种违背宪法的解决办法，如果有人要说是革命的解决办法，那也可以。

密特朗提议临时政府由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出来主持，而孟戴斯居然受他的引诱，答应出来冒险。29日星期三，21点，将军到达科隆贝村，准备返回巴黎。而孟戴斯·弗朗斯“并不拒绝承担左派可能交给我的责任，整个左派团结一致交给我的责任”。“至于过渡政府，绝非一个中立的政府，而是行动的政府，倾向于更加公平、更加社会主义的社会，并将立即采取一些决定。我们今天下午已经谈过这些决定，今后几天还得继续讨论，方能达成完全一致的协议。”那些一本正经的共和派已经在打算组建一个出身于暴动的政府。反正总统和总理都已引退，或者说都已经成了被逐客。可是，他已经落后于形势。将军已在策划反攻，其部下亲信着手组织30日的游行，而孟戴斯还以为革命有了成果。就在这时候，阿尔弗雷

德·法布尔-鲁斯在《世界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孟戴斯进爱丽舍宫》。

所以，除了罢工，除了大学生空口说白话，真的政治危机确也存在，而且我也观察到了好些征兆。中央各部的官员逃之夭夭。多数派政党的国会议员，有的埋怨总统，有的埋怨总理，不是要求这个人辞职，便是要求那个人辞职。政界人士担心局势大乱。可是，一篇几分钟的讲话居然平息了当权派的焦虑惶恐。那些想像 1830 年和 1848 年那样把街上闹事所推翻的政权据为己有的人，只得眼睁睁瞧着自己的希望破灭。

5 月 29 日，A. 科耶夫打电话给我，谈了半小时。他比我还要来得有把握，认为根本没有革命，只不过是模仿革命而已。他对我说，根本没有革命，因为没有人杀人，也没有人想杀人。骚动只引起他深切的鄙视（这是白俄意识）。我告诉他说，我在美国一会儿也待不住了，一心只想赶回来看看，或者做点什么。他回答我说：“你就那么急于就近看看这场‘屁事’，这出卑鄙齷齪的丑剧？”过了 24 小时，我再也没什么怀疑了：全部事件只算一场猴子学样，重演了历史上大革命的把戏。值不值得歌颂？值不值得咒骂？时至今日，还值不值得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呢？

为什么到了今天，“五月风暴”还能激动人心，赞成的赞成，反对的反对呢？要回答这个问题，今天看起来似乎相当简单。历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把“五月风暴”树立成对象，而这个对象是那么五花八门，以至于你看这枝花，他看那扇门，各看各的，问题也好，答案也好，莫不因人而异。

一切解释都倾向于集中在事件的一个现象上，或者集中在学生造反上，或者集中在罢工泛滥上，或者集中在比较法国与

别国的有关特点，或者集中在大学生或工薪阶层的意识形态争论上。

623 1960年代，学生造反运动遍及全世界，从日本到巴黎，中间还有伯克利大学和哈佛大学，总不能光说是流行感染，依样画葫芦。要解释便需到各国的特殊处境中去找原因。法国没有越南战争的问题。美国没有巴黎高度集中的问题，没有几十万大学生挤在古老陈旧的校舍里。至于工业国家共有的原因却不难指出，为什么青年人蓦地惊醒，一跃而起。也不难指出，运动中最积极的分子各有什么样的社会出身。比方说在美国，民主学生会（SDS）的领导人是什么出身。如果从殷实富有和开明（美国含义）家庭的子女在民主学生会里占相当大的比重这一点来得出结论，那么造反派大部分就是来自有钱人家，而不是穷困家庭。同样，各方面的社会学调查表明，美国民主学生会、德国和法国类似学生运动的会员在不同学科所占比重各不相同。特别在我国，社会学家出了名地不买账。也许因为社会学从本质上讲批判，弄得学这种东西的学生都倾向造反，也许是脑后有反骨的学生才去学社会学。

当然，大学里闹乱子，在非共产主义世界中到处蔓延泛滥，很能揭示并说明一些问题，虽然从达喀尔大学到伯克利大学，从哈佛大学到巴黎大学，各家的情况大不一样。这至少揭示出成年人的威权在减弱，教师和制度本身的威权也在变弱。天主教会的威权受到抵制。军队指挥的威权也受到抵制，心情如出一辙。背景则为1960年代登峰造极的文化革命。这都是造反作乱的舞台布景。反正，安东尼大学城男生女生要求昼夜自由交往不过是征兆。

1968年的意识形态来自自由派思潮，在学生群体中引起

强烈共鸣。勒内·雷蒙说,《继承人》一书可以算是事变的标志之作,应该对事变负部分责任。《辩证原理批判》一书则引了安齐欧的《认识论》中“白热的集体”这一概念,以此比喻当年向巴士底狱冲锋陷阵的人群。1968年,知识界造反,拿“我们”来反对结构,拿萨特来反对列维-斯特劳(法国的政治仍然顽固地保持文学性),拿“效益”来反对制度,拿极左来反对共产党。美国的学生运动也受自由主义的启发。任何造反行动,凡是只想动摇政权而不想取而代之的,都出于自由主义心情。然而,绝大多数大学都有自己的明确目标,而且大都是做得到的。 624

5月里的思想性议论,不论是学生发的议论或是工人发的议论,都跟党派政纲截然不同。引用的通俗化的题目,都早已杂见于文化批判的书籍之中。“文化批判”这个词是德国人惯用的。马尔库塞写的《单向度的人》一书,包括了绝大部分人所共愤的主题:重商社会,生产机构必不可少的强迫消费,污染,社会镇压,有些人赤贫有些人却在挥霍浪费等。在这些方面,革命者又结识了许多朋友,因为他们普及了一种意识形态,同党派标榜的意识形态泾渭分明,不相同流:以质对量,和睦生活比生活水平还要紧。一味崇拜经济增长率,已为大众所不齿而惨遭灭顶。

紧跟大学生在巴黎闹事,法国工人大举罢工,而在别国,根本没有工人支持学生,别说行动上,连精神上也不支持。特别在美国,蓝领工人、工会,都没有起来反对越南战争。连法国在内,学生拼命动员工人采取一致行动,总的来说并没有成功。共产党人居然防止了工人运动受自由主义的感染,虽然格勒纳勒协议使基层群众大失所望,原因正在于协议指望结束罢

工，结束工人的要求，想用“一般的”手段来解决“不一般的”问题。

如果仔细看看这些罢工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倒不是什么世间受苦人忍无可忍，像波兰工人那样，在城里缺过了肉缺蔬菜，缺过了蔬菜缺水果，弄得忍无可忍。那么到底为了什么呢？为了工人的不满。可是，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在一代人内好多了，而且工会领导也通过自由选举产生了。于是就来了一个经典解释，名叫“托克维尔规律”，就是说，弊病减少了，抱怨却增加了，爆炸也发生了。换个说法，基本需求得到了更好的满足，对质量的要求便越来越高。再换句话说，在法国社会，僵硬的等级制和越来越叫人难以忍受的发号施令作风长命百岁。这些解释虽然都有事实和言辞为根据，但没有一种能够自称是全面的和独一无二的解释，但各种解释可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法国的“五月风暴”也体现了民族特色。可观察得出这一点的事例可不止一件。在别国闹的乱子，分而不合，而法国的乱子都集中在几个星期。各大学一哄而起，不是轮流闹的。议论纷纷，多于明确的要求。通俗的解释有：法国只有一个大学；巴黎定调；知识分子加入狂欢以及大学生们从思想大师的著作中得到启发。

学生和工人在同一时候，逃学的逃学，旷工的旷工，好似野马脱缰。示威的人跟警察顶撞，过了一天又一天，双方就是都不肯开火。天天都闹事，可是整整几个星期只出了两条人命。一条是由于警官手枪走火，但他其实根本没想杀人。另一条人命是一个小伙子给警察追得紧，自己掉进河里淹死了。只消一不吵架，气氛往往是快活的，仿佛在过什么节。标语和招

贴画的气氛，跟柏林极左派学生那种郑重其事的派头很不一样，那是“五月风暴”的几年前，我在德国亲眼见到的。有一句口号自相矛盾得有趣，叫作“禁止禁止”，显示了1968年的意识形态既荒唐又滑稽。

从深处着眼，这种思想状况跟美国和德国的民主学生会没有什么两样，都可能走向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三 M（马克思、毛泽东、马尔库塞），这三个 M 有可能把资产阶级子弟拖去加入巴德尔 - 梅因霍夫恐怖分子集团，打城市游击战。另一极端则是搞生态，回乡土，当嬉皮士。有些“三 M”的信徒很想动武。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在他谈革命战略的小册子里，梦想从里斯本到莫斯科，把整个欧洲付之一炬。5月过后，托洛茨基派和小组织继续活动，而在1968年宣扬极左、亲历极左的绝大部分知识分子都悬崖勒马，意识到了动不得杀机。直接行动，大会恫吓，城市游击，这是实现民主，还是提倡法西斯？首先是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不久便打动了“白热集体”的左派。5月的几个星期里，极左分子指责共产党，说他们屈从叛卖选举使群众的革命冲劲瘫痪了。几年以后，共产党人在他们心目中不仅成了在僵死的组织里做窠的官僚，而且是古拉格劳改营里的牢头禁子、自由人的解差狱卒：极左变成了保卫人权。 626

怎样下结论呢？社会学家就1968年5月事件做出的解释很不一致。卡尔·马克思没有，托克维尔也没有对1848年革命做出任何解释。对于革命的后果他们也没有做出解释。他们二位都叙述了这一段历史，写得很有启发性，并且通过进行阶级分析，写得很深刻。至于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叙述1968年事件，我觉得比叙述19世纪的事情更容易，也更难。为什么更

容易呢？因为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不曾合流，没有成为革命。为什么又更难呢？因为大学生、带头闹事的人并不属于一个阶级。尽管口头上自称属于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却并不承认他们是自己人。至于工人呢？他们的举动部分听命于共产党的策略，部分出于自己的感情。比扬古工厂区的工人起哄，反对总工会的发言人，反对共产党，他们是听自己的，还是听某些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想渡过卢比孔河）？

在法国的社会学家里面，只有一人想来个飞跃，不再搞那些土法调查而做出全面的解释。他出了两本书，一本叫《“五月风暴”或空想共产主义》，出版于1968年，另一本叫《后工业社会》，于次年出版。下面的引文概括了阿兰·图莱纳的想法。他在南代尔大学扮演了主角，5月11日参加街垒战，不久又搞历史哲学，但不能算是研究史实的社会学家。他写道：

尽管态度相反，其实分析是一样的。欣赏各种力量和各种需要突然解放，一下子从技术文明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或者火冒三丈，瞧着不讲道理的人、不负责任的人胡作非为，鄙弃经济的需要和精神生活；不管这两种态度是如何南辕北辙，背道而驰，但都说明危机是来自社会与社会所压抑的东西，彼此发生冲突，而有人对此觉得可敬可爱，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愚蠢可憎。由于这一运动——特别是学生运动——在集会时宣布决意决裂，还把话写在大学的墙上，而它既无纲领，也没有组织，所以旁人也越发觉得，它只消体味体味魅力或者发发火就行了。^①

627

^① *Le Mouvement de Mai ou le Cmmunisme utopique*, Paris, 1968, p. 9.

阿兰·图莱纳既反对着魔，也反对光火：“五月风暴”不否定工业社会，也不否定工业社会的文化，而仅仅揭示出矛盾，揭示出工业社会当中新的社会矛盾。也可以说，“五月风暴”既反对法国社会中的旧思想、旧作风，也反对正在崭露头角的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官僚。有两种矛盾在琢磨我们这个社会：一种是把技术官僚与现今社会的劳作者-消费者对立起来；另一种是把现今社会中的科技和文化现实与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组织形式和体制对立起来。

人人都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矛盾。一方面是大学的组织仍是19世纪末的样子，在人满为患和大学生造反的压力下一下子解体了。大学生被抛到社会边缘，陷入没有出路、没有就业希望的盲目学习。另一方面，工人或普通选民抗议专家治国，因为专家们一言为定，决计营建核电站。图莱纳自以为大有道理，根据“事件”，起来反对占统治地位的乌托邦。“这是统治社会的主子们的乌托邦。他们公开宣布，社会问题不过是要现代化，要适应，要学会融入，所以五月运动在形成了一股打击统治阶级的战斗力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个乌托邦，这个反乌托邦反对专权，讲究公而无私，讲究听其自然。”

我看不出有什么严肃的理由来反对这种解释，说大学生“孕育出”自由主义的另一乌托邦。但是，让咱们再把图莱纳的书念下去。他说：“‘五月风暴’在13日以后，说话多于打斗争……乌托邦蜕化为白日梦，尽搞现代化计划……由于他们的出身和大学经历，大学生跟他们想要的那种社会还很脱节。他们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典型的社会，才以行动提出了种种问题……大学生发现了未来的斗争，但并非有意识的，还把未来的斗争同过去的阶级斗争混为一谈。”就这样，“五月风暴”

自以为处在社会变革的危机的中心，重新找到了陈旧的阶级斗争！这一历史诊断好像很难批驳，也很难证实，因为这关系到理论问题，也就是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理论问题。照图莱纳的说法，行为人中最重要的行为者，即大学生们生活在一个远离专业化社会和程序化社会的世界里，需要这位社会学家或历史哲学家来破译他们的言辞，使他们的乌托邦带有未卜先知的含义。从这个高度来看，5月11日的决定、将军的演说、法共的策略，都淹没在了朦胧之中。细节看不见了，只剩下这位阐释者对行为人的指点迷津，而这些人并没有意识到，在他们的行动的一片混乱背后，是这位事后诸葛亮的、介入的前旁观者在操纵。

在写下面的章节之前，我重新翻阅了1968年5月15日至7月初右派在大选中获胜的前夕，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章。事过境迁，头脑冷静下来，我们也看不出这些应时的文章有什么火药味。文章提醒人们要警惕那些颠覆手段，指出学生参与管理学校该有限度，还不管不顾地为我曾经严厉批评过的开明办学进行辩护。因此，我的种种立场成为众矢之的，对此，我并不放在心上。^①我记得《世界报》转载了一个学生的声明，禁止我继续在巴黎大学讲课，或者干脆向我宣布，我今后在巴黎大学再也没有发言权了。

我始终不能忘却的，是一篇用过激语言对我进行人身攻击的文章。我指的当然是萨特刊登在《新观察家》周刊上的那篇文章。文章的刊登日期是1968年6月19日，题目为《雷

^① 我不大记仇，然而……

蒙·阿隆的巴士底狱》，明为批我，实际是在抨击政府。我认为有必要引用其主要段落，并对其加以探讨。

然而，最高当局推行的是懦夫政策。但与此同时，他却下面号召人们进行屠杀。戴高乐号召建立国民行动委员会，用的正是这种伎俩。这等于告诉人们：在你们所在的地区团结起来，狠狠打击那些你们认为发表过破坏性言论或有危及政府的行为的人。 629

指责共和国总统“号召人们进行屠杀”，就连一个拙劣的蛊惑者也不会对戴高乐将军，对曾经容忍示威的政府，对日复一日容忍半暴动的政府，使用如此恶毒的语言。

再看看文章是怎么谈论大学生和我的：

学生人数如此之多，他们已经不可能像我们那个时候那样同教师有直接的联系了——这在当时就已经很困难。有很多学生甚至见不到老师的面，他们只是通过扩音器，听见一个毫无人情味、没法接近的声音向他们讲课，而学生们根本就不理解这样的课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大学教授几乎总是这样一个先生，他写过一篇论文，然后终身拿来背诵给学生听……我上学时就是如此。当风烛残年的阿隆喋喋不休地向学生们重复他在二战前所写的论文的观点时，听课的人都不能对他提出任何批评。他行使了真正的权力，但是，这种权力绝非建立在名副其实的的知识的基础上。

教师与学生之间交流困难，确实如此。但是说多数教师终

身背诵他们的论文却并非真事。就拿莱昂·布伦什维格来说，情况绝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他的论文。说我本人在巴黎大学喋喋不休地背诵我的论文，这纯属捏造。无论是《工业社会》《社会学主要思潮》，还是《和平与战争》，都与我的论文毫无关系。更有甚者，说什么“这意味着，人们不再像阿隆那样，认为只有独自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后面，30年来思考着同一件事才是智力活动”，这句话本身就带有侮辱性质。它也表明，萨特无视真相，起码在他发火的时候是这样。

630 在这篇文章中，他还探讨了我在文章中提到的由“受教育者”选择“教育者”，或者说，受教育者参加考试委员会的问题。从理论上说，在和我们所处的社会不同的社会中，可以设想学生在任命教师时拥有发言权。在现实社会中，在1968年，造反的学生只会以政治见解，而不会根据科研和教学水平来选择教师。那些最活跃的积极分子想的是驱逐被扣上反动分子或法西斯分子的帽子的教师。同样，在不同条件下，也可以考虑让学生参加评判委员会。但是在“五月风暴”时期，如果评判委员会塞满了学生代表，即学生会代表，那么学术生活将“政治化”，大学文凭也将失去本身的价值。从这一点上看，萨特是在哗众取宠，他不是为了讨好青年人，就是对现实全然无知。

最后，我们来看看那几句众人皆知的话：“我敢保证，阿隆从未否定过自己。我认为，就是由于这点，他不配当一名教师……”萨特的文章是以下面几句话结尾的：

这就更加需要，每个教员都肯接受被教育者的判断和否定，并且自己应该说：“我是赤身裸体地暴露在他们面前。”教员会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如果他想重新配得上当教师，

就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验。现在，戴高乐应该赤裸裸地站在整个法国面前，雷蒙·阿隆也应该那样站在学生们面前。只有当他接受了否定，学生们才可以把衣服还给他。

我觉得萨特的这番话既粗俗又无礼。他有什么权利来评论一个人有没有资格教书呢？

萨特在 70 岁生日时，在同孔达（Contat）的一次谈话中是这样为他在 1968 年发表的那些文章辩护的：“当我看到雷蒙·阿隆对自己教过的学生持有的看法，看到他反对整个大学教育体制，我就意识到他一点儿也不理解自己的学生。这种同自己的学生为敌的教师正是我所反对的……”萨特为自己做的辩护词并不比他的恶语中伤强多少。他对教师有多少了解？为什么他要用谎话来攻击、侮辱教师？

我们还是来看看实质性的问题，即自己否定自己的必要性。631
凡是在学校里教过书的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都知道他会受到学生们的“评判”和“质疑”。一个演说家或者一个演员，要由自己的听众和观众来做出判断，也就是这个道理。对于一个教师来说，没有比学生的敌对情绪更严峻的考验了。1968 年有许多教师向那些造反派屈服，其主要原因就是担心自己将会被学生，至少是其中的激进分子驱逐。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教师都不能拒绝被质疑，因为这不取决于教师本人。至于自我质疑，这是另一码事。僵化威胁着每一个人，我们都可能闭关自守，拒绝接受他人的批评，以便保证一种精神上的安逸。我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处于强者的地位，可以无视认识的发展，可以无视我们那点儿可怜的思想必然会很快被超过的事实。

1968 年令我感到震惊，并且今天仍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萨

特本人的行为。虽然他声称自己依据的是辩证法，但他却是靠内心的独白而生活的人。萨特自己用论战者的技巧和阴险的手段，亲自回答了阿尔贝·加缪。我不应该比别人受到来自让·普莱的更多的激烈抨击。列维-斯特劳斯的见解被这样一句荒谬、愚蠢的话拒之门外：人种学家错误地自认为是哲学家。而萨特本人，他在政治上发表的观点或者判断并不总是一致的，但是他从不做自我批评。可以说，萨特关于自由的学说（随时花样翻新的自由）使他完全摆脱了对自己的过去的责任。1968年，他在谈到工人暑期学校和学生下工厂实习时说：“这种方法已经在许多国家开始实行，在中国和古巴，人们已经开始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仍然余火未熄。萨特无论何时都从未质疑过自己的过去。（在同贝尼·莱维谈话之前。）

632 有个读者责备我说：“为什么1968年你没有回答《新观察家》上的文章？你是否想等他去世再和他算账？”我什么账也不算，撇开他的天才不谈，我只是想探索一下让-保罗·萨特这个人。当时，我一点儿也不生气，就连我这爱激动的脾气也没受到影响。要说自我辩护，上面已经说过，我不过是要更正这一点，即我从没重复过《历史哲学导论》中的内容，更谈不上“背诵”了。萨特是故意撒谎。一个“不配教课”的教师编写的教材怎么能被六七个国家翻译出版，供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使用呢？我怎么能随便什么物质条件下同听众对话，我的研究生讨论课怎么能向所有造反派开放？我可不想充当被告的角色^①，仿佛我

^① 这是作者对萨特的嘲讽，因为后者曾为当时的《人民事业报》题名曰《我控诉……》。——译者注

承认萨特有权审判我；我更不想像萨特那样堕落至这般卑微和粗鲁的地步。如果当时我的朋友认为有必要为我辩护，让他们去为我辩护吧。如果萨特的朋友们要维护他的尊严，应该由他们提醒他注意自己的偏激情绪。

如今，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全世界，萨特都是以一个作家和一个伟人的形象活在我们心中。我认为我们有权利不受任何约束地评论他和描写他。为什么萨特终生追求伦理道德，却诬陷戴高乐将军，说他号召人们进行屠杀呢？为什么他咒骂我是令人厌恶的学院派象征，而他本人对学院并不了解？要让大家承认他有当天才的特权，当然可以。可他自己并没有要求过这样的特权，他在自己的最后一部小说《词语》中写道：“一个人产生于所有人，他等于所有人，任何一个人也等于他。”为什么他能够这样看待所有人，却拒绝这样看待戴高乐将军和雷蒙·阿隆呢？（恕我把这两个人相提并论，但萨特也是这么做的。）

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有必要提一下亚瑟·库斯勒援引过的波伏娃和萨特的一句话。他们俩说过：“宁要共产党人，不要（戴高乐）将军。”既然如此，就只好用最不令人满意的解释方式了：无知将导致十足的愚蠢。倡导自由的哲学家从来没有认清或者不愿意看清共产主义的实质。苏联的极权主义是 20 世纪的毒瘤，而萨特从来不这样认为，也从不对这样的共产主义进行谴责。他使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不同意他的错误观点的人。他在《涅克拉索夫》^① 中嘲弄的，是与苏联政权持不同政见的人，而不是那些屈从于斯大林或赫鲁晓夫的文化官员。

萨特为什么生我的气？在萨特的一生中，他始终是个 633

① 萨特在 1951 年写的一部剧作。——译者注

“该死的小家伙”。在高等师范学院的时候，他对同学们或“伙伴们”说话的生硬态度不止一次使我吃惊。他谈起自己的祖父有时也冷漠无情。有一次他用挖苦的语气说：“老家伙的身体又好起来了。”真不知道他是盼望“老家伙”快死，还是奇怪他又活下来了。《恶心》出版之后，他在《新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前辈作家——如吉罗杜、莫里亚克等——的文学评论。这些评论闪烁着天才的光辉，但也咄咄逼人。萨特明确表示要取代他们。记得他是这样评论莫里亚克的：“上帝不是一个艺术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同样也不是。”他根据自己的小说理论，断定《爱的荒漠》的作者违背了创作原则。然而，他对远在美洲的多斯·帕索斯尽其吹捧之能事，而对自己的平辈和对手却不赞一词。

就算采用下文的解释（我却不太喜欢这么做），我又有什么可使他忌妒的呢？^① 在1940年代末期，赛尔旺-施莱贝尔打算把他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定为《让-保罗·萨特与雷蒙·阿隆》。拉扎雷夫向他指出，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在这一点上，他并没说错。到了1968年，把这两个老同学进行比较已经不像过去那么离奇了，但是我没有想过把自己的著作同萨特的进行比较。1960年，我们曾有一次偶然相遇。在这之前，我已经表明了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立场。萨特走过来对我说：“你好，我的小同学。”往事一下子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信口说道：“我们过去净胡说八道。”（或者诸如此类的话。）萨特答道：“我们应该一起吃午饭。”这就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① 一些朋友对我说：“正因为他知道你是对的。”坦率地说，我不相信这种解释，但是一些波兰人也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饭没有吃成。在 1960 年代，我们没有“和解”，但也不是处于论战之中。为什么到了 1968 年，冷酷的愤恨或者灼热的狂怒又再次爆发了呢？

萨特只是在写文章时才变得粗暴起来。他不喜欢面对面地交锋，他从来不肯在电台或电视台与我公开对话（同别人也是如此）。这个靠内心独白的辩证家甚至不屑对梅洛 - 庞蒂的《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亲自做出回答，是西蒙娜·德·波伏娃受命完成了这项任务。《雷蒙·阿隆的巴士底狱》这篇文章的口气，使我们想起战前出版的《格兰瓜尔》和《我无所不在》这些极右翼的刊物。阿尔贝·加缪和莫里斯·梅洛 - 庞蒂只是在他们死后，才受到萨特只对他的挚友才会表示的真正宽恕。

634

我写作《难觅的革命》有点出于偶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阿尔弗雷德·马克斯在 7 月初要我为《现实》月刊写篇文章。我对他说，写文章是不行了，请人来帮我记下来，也许我还可以应付。但出于某些具体原因（距下一期杂志出版日期太近），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这篇未写成的文章使我产生了写本小册子的念头。在这之前，夏尔·奥伦戈把拙作《阿尔及利亚的悲剧》收入“绝对自由”丛书集出版了。当阿兰·杜阿梅尔来看我时，我向他谈了自己计划写的四个章节的主要内容（这四章的标题是：“内心独白或者一种文明的结束”“革命中的革命”“戴高乐主义的死亡与复活”“戴高乐主义者与渴望革命的知识分子”）。我用一个上午口述所有这四章，然后又很快写出了前言与结束语（题为“对谬误的简要说明”），并将这部口述而成的著作迅速做了修改。两个多星期后，《难觅的革命》这本书的清样便送到印刷厂并于 8 月初付

印。奥伦戈为了在《快报》周刊的新书预告上占据“有利位置”，有意拖延了杂志的发行日期。

这里暂且不谈这本书在读者中引起的成功反响。鉴于1968年夏季的局势，该书的成功已在预料之中。人们对一时成为热门话题的这本小册子会有些什么想法呢？都引起了哪些典型的反响呢？在这里，我先引用持反对观点的一封来信中的某些段落，这封信出自一个年轻的女性资产阶级之手。她攻击社会，但并不反对自己的家庭。

635 ……您的观点使我感到气愤，也感到苦恼。当我想到您写了那么多有意义、有思想、公正而又客观的著作时，读起这本《难觅的革命》使我不禁想放声痛哭一场。您诽谤这场革命，把它看作一场闹剧，一段令人悲伤的插曲，一场无关紧要和毫无意义的运动。成千上万个伤员、囚犯和遭杀害的人 [原文如此] 不可能充当一场闹剧中的演员。您写这本书虽然也许仅仅是一段悲伤的插曲，这场革命却不可能仅仅是一场悲剧。您对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运动的那些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我是其中的一分子），以及那些积极而又热情地支持我们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大学的教师表示蔑视，这说明，或者是您惯用的思维方法和对历史的评价使您丧失了理智，或者是您在使自己成为一场反革命运动的著名先锋，而这场运动的反革命气焰要比戴高乐将军的反革命运动更加嚣张。

这个女学生在整整两页纸上，为那些被看作变革缘由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辩护。她揭露我使用权术，指责我蔑视民众阶级

和犯下“反对人的罪行”。她还提到在街垒战斗中，与社会做斗争的这些人的痛苦，因为他们所热爱的亲生父母却代表着这个社会。“如果对您来说，革命是难觅的，这是因为您没有到它所在之处去寻找。”她的信是以“顺致敬意”作为结尾的。我从内心深处同情这个姑娘，她派给我一些想法，却又为之而苦恼。失掉诗意的现实使她伤心。她的心灵受到了创伤。

然而，我也听到不少赞美之音。欣赏《难觅的革命》一书的人，并不仅仅局限于和我同辈的政界人士或学院同僚，他们都处在各自事业的顶峰时期，其中大部分人在政府中身居要职。安德烈·马尔罗寄给我一封短信，上面写道：“《难觅的革命》一书十分精彩（尽管您在书中莫名其妙地提到了我）。要知道，支持您的人数之多，远远超过了报纸的估计数。”弗朗西斯·蓬日并不是一个学者，但是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必须向您说明，在知识分子中间，您并不像自己所想象的那样孤独（至少我这个可以自诩为‘次于您’的人，是百分之百地赞成您对去年5月至6月发生的革命闹剧所做的分析的）。”让·吉东的过分赞扬令我感到惊讶：“奥伦戈先生将您的书寄给了我。这是一部杰作，一件传世之宝，而且写的时机非常好。再次向您表示友谊。”

最令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对我的被认为过于极端的观点并未做出极端反应的来信。下面我将引用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来信中的几段话：

……您同样知道，我欣赏您的才华。当我拜读《难觅的革命》这本书时，我非常高兴看到您仍然精力充沛……《难觅的革命》这本书有许多正确的观点和精辟

的分析，并合乎情理地对一些令人惋惜的简单化做法做出了回答。但是我觉得您这本书似乎有暧昧不清的地方。您毫不费力地证明，五月革命不可能引起社会大翻身。又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有必要以您的全部才华来撞破敞开着的大门吗？正如您在书中正确地指出的，一旦戴高乐将军丧失了斗志，或者全民投票失败了，那么这场革命只会导致孟戴斯·弗朗斯再次上台，而他是不会脱离资本主义轨道的，他将依靠一个以国民议会为中心的联合政府……此外，我们之间的误会恰恰就表现在：五月革命在您眼里是一种回答(或是一种回答的尝试)，然而它对于我来说只是提出了一个问题。应该由我们对此做出回答，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认真倾听问题。您一开始争论就怀着偏见，尽管您还是用了一些谨慎的措辞。您说这个布满阴霾的春天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在我看来，这个结论是站不住脚的。我相信，您那超人的智慧不久将使您放弃这一立场。下面我仅举医学界的一件事为例，因为这件事已得到正式认可。我认为，取消见习医生和结束名医的统治，实在是可喜的好消息……当然，这些改革最好以其他方式予以实现，但是我们十分清楚，如果“以其他方式”，那就根本不会有这些改革。有些时候，最好以某种幽默来适应不合情理的事情，并从中取得可能的最佳效果。我要补充说明的是，依我之见，不应对“马尔库塞主义”仅仅持蔑视态度……1968年春天令我感到遗憾，因为我听到一些学生说：雷蒙·阿隆不理解我们。讲这种话的人完全不是狂热分子，而是那些赞赏您的学生。这个误会不应加深了。本来没有任何理由发生这种误会。

我没有保留一份写给他的回信的副本。如果放到今天写这封回信，我的回答将是：1958 年的政变是合法的，而 10 年之后的今天取消共和国的合法性，这在我看来却是可悲的。我当然不是个绝对的戴高乐主义者，但是科恩 - 本迪打败戴高乐将军，却使我的感情受到极大的伤害。我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耻辱，我实在无法接受。法布尔 - 鲁斯发表在《世界报》上的文章《孟戴斯·弗朗斯在爱丽舍宫》，真叫我痛得像手指甲被翻了过来。

637

我从未否认，“五月的冲击”也带来了某些符合人们希望的变革，而且我对这种指责也做了解答。但是法布尔 - 鲁斯却只从中看到了“谨慎的措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写了我曾提到过的一个情节：“在戴高乐将军主持的一次讨论会上，我说：‘法国接二连三地搞革命，从不进行改革。’而戴高乐将军在评论我的发言时，恰到好处地纠正我说：‘法国从来只在革命的足迹上进行改革。’当然，从目前的危机中，有可能产生某些有益的而且必要的变革……”

我承认，人们当时常常按照法布尔 - 鲁斯的方式来读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章和《难觅的革命》一书，并因此产生了误解。那时到处都洋溢着激情，我的文章和那本书自然也不例外。如果现在我重新阅读这些文章，如果 1968 年的那些“老”青年重新和我一起阅读这些文章，我们就会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这些青年人，时而受人恭维，时而遭到诽谤，竟会引起公愤呢？等到激情消失后，恐怕就只剩下最基本的感情，即一部分人对运动表示同情，甚至热情，而另一部分人却表示反感和厌恶。显然，我属于第二种人。旧的巴黎大学应该消亡，但它不应该像 1968 年 5 月那样被人置于死地。总之，我们每个人都亲身经历了那几个星期，但是这些身临其境

者之间几乎没有进行过真正的对话。

好吧，我们以爱德加·莫兰的来信为例。他这样对我写道：

对我来说，托洛茨基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的帽子虽然并没有什么不体面之处，却套不到我的头上。人们并不能因为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时不时把这顶帽子强加于我就信以为真。在运动当中，我曾试图从社会遗传学的角度对这场运动进行分析。当时前途未卜，我就指出事件的性质近于“公社”，有如一场“亲历的乌托邦”，我实在看不出来，怎么能用“乌托邦式的”来形容这段时间（5月中旬）。我把“五月风暴”定名为“面目不清的革命”，实在也看不出有什么像“神话传说”。所谓“面目不清的革命”，不过是指情况还大大地摸不透罢了。此外，我的文章往往表明，我并没有从这种公社，从这场面目不清的革命中看到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金丹仙方。我只看到了一张证明我们这个社会极端无能的诊断书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先兆。它表明社会将“从20世纪向21世纪转变”，并且准备“超越资产阶级文明”，如果人类到那时候还有点文明气息的话。我的这种提法向您证实了我对历史也同样持谨慎的态度。

638

我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在1968年10月给我的来信中摘录了下面这段话：

而我现在的处境却一反往常。四年来，在我的实验室工作的三十多个人之间没有等级和职务上的差别。这种情

况一直都很顺利。我认为，只有在很小的集体组织中才可以实现真正的民主（卢梭和孔德早就明确谈过这一点）；在极小的集体范围内，人们的思想分歧受到人与人之间真诚关系的约束。为了增加共同管理实验的成功机会，首先必须进行挑选，以保证学生的质量。这就要求全体学生都珍惜自己的机会，而无权自甘堕落。其次就是要在基层，即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有限人员中实行共同管理。教育界如果不采取这些措施，那么大批学生的幼稚病就必然会同助教们的布热德主义（poujadisme）^① 结成联盟。

虽然我还可以列举更多关于“运动的反应”和“亲身的感受”等言论，但在这里就不去论述了。我想回到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提出的质问上来。他这样写道：“您没有扮演您应该担任的角色。不是要您去赞扬这些‘可爱的年轻人’，也不是要您加入革命者的行列，而是要您为了给这些人出主意而去理解他们，为了让舆论界能够理解这些人而去理解他们。可惜您所持的立场却是您曾经严厉批评过的那种学官大人和保守派的立场。”我在（1968年6月14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样谈到这个问题：“那些对我的大部分观点持赞同意见的朋友，对我的这一行动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了指责。他们对我说：‘几年来您一直在批判许多同辈的保守思想，现在您却要为那些保守分子所利用、所回收。您本应该加入革命者的行列去指导他们，而不应该一一列举那些令

① 布热德代表法国小店主的保守主义，曾为右派作鹰犬，但在服务行业中有一定的群众基础。法国最近新出现的极右派与之不无类似之处。——译者注

人痛心，但并非实质性的过火行为。’”今天，我对自己当时写给朋友们带有自我批评口吻的回答是不甚满意的。我的回信主旨是“错误属于谁？”。我说：“谁会为‘复辟’张目？谁会阻挠改革？有些人仍然赞成一些已经被否定的机构，最终使部门的负责人、部长和政府相信，教育界人士没有能力得到自由，也不配得到自由，除了这些人，还有谁呢？”

时至今日，我仍得不出痛痛快快的判断。我在1968年5月采取的行动（如果可以称之为行动的话）得到了我哥哥阿德里安的支持（以前他从来不给我写信），他在给我的信中这样写道：“让这个辉煌的成就激励你更经常地从那个追求公正客观的奥林匹克神山上走下来，并在大学界的斗争中发挥你的才华。老教授已经发怒了，这太好了，什么时候能轮到年轻的公民发怒呢？”持保皇派立场的《法兰西民族》周刊编辑部的秘书“对（我的）公民勇气和我对他产生的精神作用再次表示钦佩”。我对《费加罗报》一读者的来信也同样深有感触，信中写道：

我并不了解造反派的主张，因此我实在无法对他们的行动的原因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可能同他们在许多观点上存在分歧，但是我认为，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我们的时代最明显的事实是年轻一代极为关心公众事务，关心社会问题，他们渴望从那种机械的、精神上缺乏寄托的生活中解脱出来，然而现实情况却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我们都在无可奈何地忍受这种生活。人们指责这一代青年只对无谓琐事和近于病态的荒谬行为感兴趣，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代青年却代表了最具有反抗精神的力量。即便您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仅仅因为这一点，

您难道不应该给予他们另外一种评价吗？您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正像我自己也做不到一样，对此鄙人并不讳言。因为我们已经过了他们的岁数，我们缺乏他们的那种朝气，所以也就不会产生他们那种幻想。任何一次革命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离不开名门子弟，永远不能跟多数派在一起搞。多数派只能被富有活力的少数派牵着鼻子走。人们有权不要革命，也可以反对这样的运动，但是，把这些具有献身精神的人看作宗派分子，看作丧失理智的狂人，或者看作其他，都是极不公平的。我坚信，这些“无足轻重的人民”，无论其政治色彩如何，总会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是伟大的人民，他们不会陷入被奴役的麻木状态。

640

给我写这封信的人希望我给他回信，而我大概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他讲的某些话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部分正确的话中却掺杂了许多“幻想”。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对《难觅的革命》一书的评论。文章的作者认为，在某些时刻，有些人激动异常，而另一些人却神态自若，雷蒙·阿隆就属于这后一种叫人吃不消的人。^①我给克洛德·鲁瓦写过一封信，谈到他评论拙作《难觅的革命》的文章。这篇文章令人感到不快，但它并没有破口大骂。一年之后，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写道：

我认为在我那篇虽然口气不够尊敬却是友好的文章中，

① 《Raymond Aron is that ultimate inconvenience: the man who stays sober at your saturnalia and who will afterward give everybody else an intellectual hang-over.》John Leonard in *New York Times*, 11-12-69.

已经相当明确地表达了我们对您的感激之情。大作《进步梦幻的破灭》并未因此而改变我们对您的看法，请您相信这一点。同您一样，我也常常因“消解自身的愤怒”而产生那种古老的喜悦之情。但是，如果我恰恰时常抱怨自己爱发火，那恰好也是在“五月风暴”以后，您的愤怒使我发火。在这种心情下我禁不住要说，如果青年“造反派”的火气是白皙的，那么您的愤怒却是非常黝黑的。您和摩尼教几乎没有什么瓜葛，您的愤怒和他们的愤怒之间所产生的敌对情绪，却带有摩尼教善恶分明的味道。

641 法国是否充分地利用了它的革命或者它的所谓的革命？如果我试图在此对运动的后果做一个分析，我就可能要走题了。毋庸置疑，法国经济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已经经受了冲击，并迅速恢复起来。对文化中腐朽堕落现象的批判题材已经广泛普及；整个社会都意识到了低工资的问题，意识到了各行业最低保证工资（现在改为各行业最低增长工资）会引起公愤的原因了。专家治国论者开始接受人类各种美好的愿望，并且突然对从未被怀疑过的经济增长提出了质疑（哪怕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付出揭露消费社会的代价）。那些企业的负责人大概从长达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争吵中吸取了某些教训。这些企业同其他部门一样已经恢复了秩序，而且这种恢复后的秩序可能比从前的秩序更为优越。

大学界的危机却仍然存在。埃德加·富尔的方向性法案重新挑起了辩论。在国民议会审理法案那天，《费加罗报》在头版发表了我为《魔术师》的文章。部长在一封私人来信中指责了我的文章，信中写道：“您在法国最大日报的头版，

用几行粗体字标题把我形容为魔术师，而且时间选在一场决定性的辩论前夕，这说明您对我缺乏友情，就算您没有义务对我抱有友情，那么至少也是缺乏正义感（因为不管人们内心深处怎样想，我的努力是不应受到这种侮辱的）和分寸，这一点对诸神却是宝贵的。”

《新观察家》时而把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话归咎于部长，时而又归咎于我，从而使“王公贵胄之间的辩论”更加激化了。巴黎大学开学时，一些学生砸碎了路易·里亚尔大讲堂的玻璃。我当时正在那里参加一场论文答辩会。学生们在校园里大喊大叫，嘲骂我是“法西斯分子”。埃德加·富尔给我打了电话，向我表示他反对那些令人无法容忍的过火行为。光阴荏苒，我们之间真挚的友谊经受住了方向性法案风波的考验。

我不大赞成这个法案，但是它在国民议会上几乎获得全体一致的通过。在大学实行自治倒符合我的意愿，但是法案中的自治无疑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教育部掌握着大学的经费。同这种自治制度同时并举的选举制度，在我看来也是不合理的。学生参加竞选的比例并不大，从而组织性最强、活动最积极的学生会，也就是亲共产党的学生会，在这一比例中便占据了绝对优势。此外，在教育界里存在人与人、辈与辈，以及不同科技学校之间的矛盾，除此之外，又增添了纯政治性的冲突。教学及研究单位和各个大学都按照不同的政治倾向而形成不同的体系。我认为连教育界自己都已承认的那种被强化了的政治化是“五月风暴”的流毒之一，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也是最令人痛心的。而巴黎大学的“反动”势头发展到其倒退程度超过 4 月以前的情况，因为那些主张自由主义的“反动派”不时表现出派性，同受到他们正确批判的全国高等教育工会成员不相上下。

起码在文学院，原来大学的那些优良传统并未得到恢复。

而另一方面，肢解原来的综合大学同 1968 年以前的情况相比却是一个进步。由于教学及研究单位的成立，教师拥有了某些行动的自由。在外界看来，高等教育，至少是大学里的高等教育，在这次摧毁了腐朽建筑物的地震中有得也有失。教学及研究单位取代了原来的文学院，成百上千的男女青年在进入这些教学及研究单位时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在毕业时没有得到任何文凭。

此外，“五月风暴”的后遗症对大学的影响并不像招生问题对大学的影响那样严重。大学几乎再也没有容纳一代新秀的地方。直到 1972 年以前，学生和教师人数一直水涨船高。公众权力受到削弱，助长了大锅饭，学生无论好坏，都可以发迹有道。如今，最优秀的师范生在获得教师学衔后，却找不到助教的工作。人文科学正走向死亡，几乎所有高才生都选择 C 类专业。高等师范学院的文学系已经变得很一般了。它无法为自己的学生寻找出路，从而使人对它的职能和存在的理由提出了质疑。1968 年事件后的最初几年，高师的学生还颇有影响力。他们中的某些人曾邀请我去学校办一次讲座，但我后来放弃了这一计划，因为一群极左的学生扬言要阻止我开讲座（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在一次不知是什么的示威之后，图书馆的书就被人从窗户里扔了出来。虽然校园逐渐恢复了平静，但是生活并未回到原来的轨道上。同我青年时代的高师相比，如今的教学楼、实验室和生活条件都反映了经济的发展。但是，注重文科的高师从此不复存在了。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643

1967年春天，近东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犹太血统的法国人”。先是以色列国家受到威胁，接着是“六日战争”，然后是以色列获胜，激起大多数犹太人和许多法国人莫大的兴奋，最后是戴高乐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称赞犹太人民是“自信的、爱好统治的优秀人民”。

我在1968年年初发表的一本小书^①中，加入了在战前、战争期间及战后为《费加罗报》撰写的一系列文章。那些外交分析在我看来是经得起重读的。5月21日，我认为从逻辑上说任何一个当事国都不愿意打仗。纳赛尔的埃及，因其一部分军队深陷南也门的泥潭之中而处境艰难。单枪匹马的叙利亚则缺乏向以色列挑战的必要手段。但是，我在结论中修正了这种乐观主义的看法：“因此，尽管看起来谁也不想在当前这种局势下挑起一场重大危机，但鉴于两个重要的理由，对此，谁都不敢说有把握确保危机不会爆发：各阿拉伯国家的政府不能完全控制恐怖分子的活动；大国角逐，虽然打不乱地区力量对比的逻辑，但地区势力彼此恫吓的辩证发展却似乎比较容易预测。”

在封锁亚喀巴湾4天之后，《费加罗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调子变得阴沉起来：

^① 《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普隆出版社。

5月21日清晨，这一局扑克牌仍然是外交上的赌局。以色列不会同意封锁亚喀巴湾。美国和英国在这一点上毫无保留地支持耶路撒冷政府……然而，只有顽强的乐观派才会相信，大使级或部长级的谈判竟能找到一条出路。纳赛尔总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是不会停止在亚喀巴湾布雷的。莫斯科没有任何理由对他施加压力，除非有人给莫斯科什么好处。总之，出路似乎只有两条：要么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发生军事冲突，要么苏联和美国之间发生战略和外交上的对抗。第一个假设已成为现实，被动员起来的军队已经虎虎对峙，第二个假设尚未超越舌战阶段。

5月28日，疑问消除了：

纳赛尔封锁亚喀巴湾，促使联合国维和部队撤出该地区，这既是向美国挑战，因为美国曾庄严保证，不能容忍封锁埃拉特，也是向以色列挑战，因为以色列曾宣称，对埃拉特的封锁构成开战的理由。一旦开战，他将把责任推给敌人（以色列及其保护者）……虽然侵略者应该是首先开炮的人，但是，埃及的军事行动得到了显然缺乏经验的联合国秘书长的支持，以色列仍然会被宣判为侵略者……自1948年以来，各届政府都从未做出过带有这样严重后果和充满这么多汗水、鲜血和泪水的决定。他们无法使动员起来的军队旷日持久地处于战备状态（军队占全国人口的10%）。然而，苏联、埃及和法国所要的是以色列在外交上屈服。

我给这篇文章取题为《真相大白的时刻》。文章的最后几行使人预感到战争的来临：

就是这么几个人，要对创建以色列国的 250 万犹太人负责，要对他们的命运和良心负责。他们是孤立的。通过纳赛尔之口，消灭以色列的威胁声重新在人们耳边回荡。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亚喀巴湾，而是以色列国的存亡。该国被所有阿拉伯国家视为迟早应被消灭的外来团体。

接着，我权衡了赞成和反对战争的理由：“即使打了胜仗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胜仗只能带来像近 11 年来那样的暂时休战。反之，投降则是为不久的将来的另一个、也许是更为不利情况下的对抗做准备。”但是，我几乎已经澄清了读者的疑问，我说：“凡是了解以色列当局的人，都能预感到这样的思考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645

这些外交分析几乎与对其他危机所做的分析没有什么差别。在我看来，激动的情绪有时流露在解释中，但还不至于搞乱解释推理。6 月 4 日，在发生敌对行动的前夕，我在我的布拉纳古老的农庄里，为《费加罗文学报》写了一篇不同于我平时文笔的文章。有一段话从此被别人反反复复地引用：

但愿纳赛尔总统公开表示要摧毁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不至于触动尼赫鲁夫人敏感的心。消灭一个国家当然不是消灭一个种族。然而，法籍犹太人曾把自己的灵魂献给所有黑色、棕色和黄色皮肤的革命者。现在，他们的朋友在向死亡嚎叫，他们自己则呼号得心碎肠断。不管他们

说了些什么或干了些什么，我像他们一样感到痛苦，并且分担他们的痛苦，这不是因为我们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或以色列人，而是因为一场无法抗拒的运动。这场运动来自何方是无关紧要的。如果大国出于对自己利益的冷静考虑，任凭他人摧毁这个不是我的国家的小国，这个罪行从数量上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将夺走我生活的勇气。我相信，千百万人将为人类感到羞耻。

对这篇文章，我最不满意的并不是上面摘录的那一段。此外，在这一段的前面还有一段，像是一个非犹太教的热爱法国的法籍犹太人的忏悔。我最不满意的是忘记了或忽略了力量对比。以色列依然是最强大的；如果它首先发起进攻，毫无疑问，它能够克敌制胜。对此我应该是清楚的，但我的这种清楚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无意识的。因为我在前一篇文章里暗示过，根据纳赛尔对埃及本身的见解，进行一场新的战争是没有道理的。1956 ~ 1968 年，以色列的敌人没有足够充分的发展，所以没能用大量资金来改善武器装备。皮埃尔·哈斯内尔不喜欢《费加罗文学报》上这篇慷慨激昂的文章，也许他是的。即使在这种时候，我也应该保持头脑的冷静。我生来就易感情冲动，我有时不能让理智来控制我的讲话。

646 暂且把我的法国思想感情中突然涌现的这一股犹太意识搁置一边（我下面还要谈这个问题），先来谈谈过去。

我早就说过，我没有接受过任何宗教教育。凡尔赛的犹太教教士给我们上过课。那时候，我们弟兄三人还都是学生。这是阿德里安提议的，但上课并不能代替宗教教育。无论如何，我在上中学时偶然遇到过反犹活动，但没有给我留下任何印

象。我阅读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文章入了迷。但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这一事件是有教育意义的：真理占了上风，法国人为了一个人，为了一项原则，竟会闹得四分五裂。在高师，反犹太主义几乎不存在，总而言之，是隐蔽的，几乎是秘密的。希特勒的冲击重新唤起了我的犹太意识，我觉得自己也属于所谓犹太人的集团（或犹太民族，或犹太国际）。

自从1930年代初，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即K. 曼海姆的影响打消了我对抽象的世界主义的幻想。我已经感到自己跟上一代人十分疏远，同我的父亲和莱昂·布伦什维格那一代人十分疏远。他们不肯昧没自己的犹太身份。我则尚未认真思考犹太教或我的犹太身份。更有甚者，1948年以色列国的诞生没有引起我任何激动的情绪。我理解某些犹太人一心想建立一个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他们不再是风雨飘摇中的少数民族，但是，尽管我不是特别了解近东，我已预感到不可避免的后果：后来成为以色列人的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之间的战争将会延续下去。我第一次在以色列逗留期间，在一个军事办公室里看到以色列王国的一整套地图。这些地图从古戴维王一直画到1956年，我看了却没有动心，恰恰相反，我倒回想起1930年代墨索里尼在罗马广场建造意大利帝国的地图浮雕。从戴维王到本·古里安、从图拉真大帝到墨索里尼的历史，只使我想起一个平淡无奇的题材：神话在历史中的威力。在信徒的想象中，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些信徒真是古怪，他们并不都相信上帝，倒相信《旧约》，或相信犹太人，或相信以色列的使命。

我曾读过萨特写的《犹太问题》，并就此同他谈论过。在两个根本问题上，我提出了反对意见。第一个反对意见针对他的分析的本源：犹太人不能仅仅是别人心目中的犹太人。这种

有些简单化的方式，可以适用于随便哪一种人与人的关系。譬如，我只有在别人看来是傲慢的。问题是要知道，我的一举一动是否真的配戴这顶帽子。如果人们把我这样的人——既不信教，也不遵守教规，受过法国教育，从未受过犹太教育——把我这样不信奉犹太教的犹太人当作典型，那么确实可以说，犹太人对别人来说是犹太人，就被别人看作犹太人而不是自为的犹太人。但是，卷了头发、在墙前边摇晃边祈祷的犹太人则属于一个历史集团，人们恰当地称之为犹太人，他们才是自在、自为的犹太人。

我提出的第二条反对意见是萨特对于反犹太主义者形象的描绘。萨特拆散并消解了犹太人的'人格，来迁就非犹太人的幻想。他又加强了反犹分子的人格，竟然派给了他们一种实质。当然，按照他的哲学，存在先于本质。反犹分子根本没有什么本质，只有从头到脚的反犹太主义。这种敌对情绪是与他们的抉择、他们的地主地位紧密相连的。在我看来，有很多情况能使人成为反犹分子。G. 贝尔纳诺斯有他自己的情况。他和他的老师爱德华·德律蒙就与萨特所描绘的形象不一样，贝尔纳诺斯从来就没有产业。

我在196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收集了在各种情况下撰写的文章，这本小册子不反映什么一贯的思想，可以由别人做出各种不同的解释，甚至互相矛盾的解释。姑且不谈我断断续续的心境、我的犹太意识的更迭，以及我对以色列国的感情。但是，我认为，把我写的所有关于犹太人的文章汇集在一起，把其中一些想法——我一直坚持不放的一些想法汇集在一起，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有用的。

没有任何人类或上帝的法律，要求一个受法国教育的、祖

辈几代是法国公民的犹太人来自认定自己是犹太人。在1967年那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我同罗歇·斯蒂芬闹翻了，一连好几年，他拒绝对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表示任何声援。凭什么谴责这样一个犹太人呢？一个失去信仰的天主教徒离开教堂，谁都不会感到惊讶。更不必说，为什么一个从未进过教堂、既不信奉犹太教也不遵守犹太教教规的犹太人就应被当成叛徒或逃兵？只有曾参加过或曾想参加某一个团体的人，才能谈得上背叛或开小差。 648

同样，我拒绝加入这样一些人的行列，这样的人相当多，他们对犹太知识分子肆意辱骂和鄙视，如同罗丁逊先生那样在以阿冲突中反对以色列。关于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的权利问题，只有正统的以色列人才会毫不妥协地确认这种权利。这种基于圣书的权利，只能使具有同一宗教信仰的人敬服。耶路撒冷古城属于圣书中的三个宗教。在忠实的基督教徒或伊斯兰教徒眼里，时间上的先后不能决定犹太人的权利。先是英国人——贝尔福勋爵用笔代表他们——接着又是美国人，认为阿拉伯人把他们的一块土地给了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作为他们民族的家园。不少以色列爱国者都承认阿拉伯人眼里的以色列国的“原罪”。我的朋友哈尔卡比将军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现代》杂志特刊号上，讨论以阿冲突问题。文章说，不幸的是，只有牺牲定居在巴勒斯坦的居民，或说得好听点，只有损害这部分居民的利益，以色列人方能实现他们的民族愿望。关于罪责的争论，有些人说，巴勒斯坦人是被赶走的；有些人说，他们是在首领的唆使下，怀着以主人的身份卷土重来的希望逃离的。这些都无关紧要。所有论点都含有部分真理。事实上，以色列人重新取得了犹太人一直在那里生活的那块土地，

可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那块土地上生活的阿拉伯人多于犹太人。一个自称不带偏见的旁观者，无论他是不是犹太人，都会为阿拉伯人的案子辩护。

犹太人生来是犹太人，因为他们的父辈就是犹太人。但犹太人可以自由抉择是否继续当犹太人。这种自由是否从本质上有别于法国天主教徒或基督教徒的自由呢？对这个问题很难做出回答。至少在我们世俗化的社会里，国家号称同所有的教会没有关系。一个脱下道袍还俗的人便成为与其他公民一样的公民，但他有时要受原先的教友们的歧视。关于国籍，法国人只要移居到一个比较容易给他公民身份的国家就可以改换国籍。一位不信犹太教的犹太人，虽然与其他犹太人断绝了关系，但他不否认他本人的任何一个方面，既不抛弃他的语言和伦理，也不抛弃他的生活方式，因为他这一切都来自所谓的他的社会环境，来自他所生活的那个地方，来自他所听从的那个国家。在别人看来，他仍然是犹太人。

由此提出了一个抽象而又带根本性的问题：“犹太人民”究竟意味着什么？犹太人民是否存在？人们是否能像谈论法兰西人民那样来谈论犹太人民？或像谈论巴斯克人民一样来谈论犹太人民？在我看来唯一站得住脚的回答是：如果人们谈到“犹太人民”，人们只在适用于这一种情况的意义上使用“人民”的概念。

人们所称的“犹太人”，从生物学来讲，大都不是闪米特人部族的后裔。《旧约》记载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并叙述和美化了历史。在公元前夕，或在公元1世纪，犹太人的集体已经存在，他们散居在地中海盆地，并改信犹太教，但不一定是由巴勒斯坦移民组成的。罗马化的高卢犹太人也不都是从巴勒斯

坦来的。在基督教徒获胜、君士坦丁大帝改信基督教之前，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彼此间差别不大。自 11 世纪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起，莱茵地区开始发生迫害犹太人的事情。是不是历史把许多犹太支族——人们习惯这样称呼——变成了一个民族，一个唯一的民族呢？

我们搞历史，引用概念，避开了一般的下定义的方式。搞社会学也往往如此。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生活在东欧和西欧的犹太人，生活在伊斯兰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的犹太人，经历的不是同一种命运。在各个时期，各个不同的犹太支族通常担心受到迫害，所以彼此交往，免得忘记他们独特的信仰。然而，这些支族并没有一般的构成民族的任何特征：既无土地，也无共同的语言，更没有政治组织。他们的统一是建立在他们的圣书、信仰和某些实践基础之上的。“明年到耶路撒冷去”这句话表达了一种至福一千年的希望，而不是一种政治意志。以色列国产生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这与同化及世俗反犹太主义是同时代的产物。现代犹太复国主义更接近于现代欧洲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从耶路撒冷流亡出去的犹太人的百年信仰。 650

目前，“世界犹太人委员会”是由各国的委员会组成的。在美国委员会的推动下，散居在各国的所有犹太人团体彼此间保持着多少算是密切的联系。美国委员会是所有的委员会中最强大和最富有的。世界委员会的代表谈论犹太人，说犹太人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是危险的，被其他民族同化也是危险的。从而产生了第一个矛盾：犹太人确认他们构成了一国人民，并要维护他们的统一，但同时又要求获得接待国的其他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而且还要求获得非所在国人民的特殊权利和义务。为此，竟有不少犹太人担心反犹主义完全消失，因为反犹

主义的消失将促使犹太人被同化，从而促使犹太人民自身的消亡。针对这种担心，德国人以讥讽的口吻回答说：我倒很希望有你这种担心。然而，犹太男女青年结识其他公民，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摆脱了与其信仰无法分离的宗教活动。他们与持其他宗教信仰的人通婚这类事情一般来说确会有所增加。

事实上，社会学家今天观察到，犹太意识有所更新，至少在法国，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对他们的起源、他们祖先的文化表现出好奇心，这些也许会平息上面讲的那些离奇的不安心情。在任何一国的犹太人都不会忘记昨天的悲剧和明天的脆弱。我更感兴趣的是，反对犹太人同信奉其他宗教的人通婚，一心保持犹太民族的本来面目，是否应该说是宗教、文化和人种的本来面目呢？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自在的犹太人，也想当自为的犹太人，这是我可以理解的。尽管我不否认我自己身上继承了犹太人的东西（我不知道它是由什么组成的，但我感到外人是能感觉出来的），但由于缺乏成为犹太人的决心和不承认有必要拯救犹太人的特性，我没有任何理由谴责犹太人同信仰其他宗教的人通婚。

651 当前，对差异的崇拜（或酷爱）抑制了雅各宾主义。科西嘉或布列塔尼的微型民族主义的积极分子正在玩弄炸弹。阿兰·德·伯努瓦和他的伙伴们为某些右派搞平反，这些右派敌视中央国家或现代化工业，硬搞一刀切。他们颂扬凯尔特人或日耳曼人的古老神话。他们沿着这条路线，至少从口头上接受其他差异，譬如，犹太人的差异，尽管犹太人的一神论被基督教接了过去，并从历史的角度看似最应该对盲目的信仰负有责任。既然文化的多样化本身是好东西，是全人类的财富，那么为什么不从这样的人类财富中得出合理的、有利于犹太教的成果呢？因为各种犹太支族无不自认为是犹太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法国爱好差异成了风气，甚至崇拜差异，有可能犹太人现在正从中获得益处。为什么犹太人的差异不能像起来反抗雅各宾主义枷锁的巴斯克人、凯尔特人或奥克人等其他种族的差异那样得到容忍，甚至得到确认呢？但是真正的犹太人不会把自己与微型民族主义等同起来，或把自己与法国文化没能消除他们特点的人种集团等同起来。他们只相信一个上帝，这个上帝一方面给犹太人规定了特殊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却统治着普天之下的生灵。许多不相信上帝的犹太人保留了犹太支族的生活方式，并有意无意地使他们的犹太教同要求保持其所谓文化本性的任何一个集团接近，无论是科西嘉集团，还是布列塔尼集团。这种本性难道能够成为一国人民的基础吗？

事实上，这种基础是脆弱的。就算散居在各国的犹太支族不管怎样仍旧保留着他们的某些共同特性，但这些特性多少受到各自在当地社会里所处地位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里，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都同意，或更确切地说都愿意过当地居民的日子，在自己选择的国家里过公民生活。甚至大多数犹太教徒都不希望移居以色列，也不想当一个犹太国的公民。俄国、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犹太人即使做同一种祷告，但讲的不是同一种语言，彼此难以理解，他们大半受了各自国家的文化的影响，而并没有怎样受到祖传神话——这些祖传神话并没有真正的历史价值——的影响。 652

我要重复说，“民族”这一概念并没有确切的含义，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用法。我毫不犹豫地支持这种看法：就算真有那么一种犹太民族，那么与犹太民族同一类型的其他民族肯定不会存在。我这种说法可能会激起强烈的抗议，但我愿意冒这个风险。圣书中提到的其他两种宗教，分别被当地的文明所同化。

犹太教仅占少数，却在那些地区存活下来了。据此，耶和华和戒律的信徒们即使不都是《圣经》中支族的后代，但他们声称他们有共同的起源，他们忠于主要的信条和教规。因为他们在各国的遭遇是相同的，也许他们具有某些精神或社会特征。只要去以色列访问一下，人们就可以消除文学作品中普遍宣传的犹太人的形象，而这种形象仍萦绕在某些人的脑际。至于像西劳克这种厌恶军事道德的商业金融界的典型人物，以色列士兵已把这种形象清除干净；以色列士兵倒被人称为近东的普鲁士人。^①

从客观上讲，根据一般用于鉴定一个民族的标准，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不构成一个民族；他们是信仰同一种宗教——这一宗教激怒了所有教会的基督徒——的少数群体，他们继续互表声援，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眷恋以色列国，以色列国象征着他们有能力建立一个国家，他们不愿在当地社会充当外国佬。在1930年代，法国犹太人把来自德国的、跟他们有相同信仰的人当成“德国佬”。美国犹太人在我看来还是美国人。诚然，使人记忆犹新的种族大屠杀一时改变了已进入法国或英国资产阶级阶层的犹太人的心理。他们恢复了他们的犹太信仰或犹太意识。假设他们同意自己属于犹太人民——但这种归属对他们几乎不附有任何强制的东西——“犹太人民”对他们来说仍然是极为抽象的，因为他们不打算分享以色列的国土、语言和命运，甚至宗教。在青年一代中，许多拥护犹太教或以色列的积极分子是不信教的。

今天，我回过头去看我走过的历程，觉得可以分成几个阶

① 这种比较无论如何都是荒谬的：普鲁士的纪律、普鲁士军队和国家的严格的等级，与以色列军队和以色列的民主并不相同。以色列军队是国民军。

段。第一个阶段直至我的第一次德国之行，那时我的犹太意识是薄弱的，也许是压抑着的；在德雷福斯事件期间，我对饶勒斯和左拉的文章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但并没有受赫茨尔的诱惑。

接着是战争年代的到来：神圣的联盟笼罩着每一个人的心，没有少数民族保留意见的余地。在我上高一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齐格勒老师。平时学生们都要对他起哄；有一年，他班上的学生既安静又用功，他十分高兴。一天，他终于谈起了“宽容”这个词。我感觉他仿佛转过身来跟我说话，他阐释了他的想法，认为“宽容”这一词没有表达出对“不同的人”的恰当感情，“尊重”一词比“宽容”一词更好，因为宽容意味着上对下的关系。

从1933年起，为了不因怯弱而隐瞒我的犹太人身份，我尽可能不加炫耀地予以确认。在1930年代，大学没有受到毒化。布格勒、哈莱维、里沃（他曾在维希政府当了几个星期的国民教育部部长，很可能是因为在战前曾写过一本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书）似乎都不担心来自莱茵河彼岸反犹太主义的扩散。但我感觉到了这种气氛，每逢莱昂·勃鲁姆在银幕上出现，我就听到电影院里响起一片“犹太人，犹太人”的喊声。G. 芒代尔、J. 吉恩，他们两人都是在占领时期被杀害的，他们曾在内阁任职。他们遭到了右派和极右派周刊的攻击，被指控为支持犹太人而不关心法国利益的好战分子。

在战争期间以及战后，人们难以把我采取的立场归咎于我的犹太身份。我没有参与任何肃清法国通敌者的工作，我写的文章（也许除了有关某些作家^①的文章）没有把法国写成摩尼

① 亨利·德·蒙太朗、阿尔弗雷德·法布尔-鲁斯、雅克·夏尔多。

654 教人式的非善即恶的形象。在第三帝国投降后的第二天，我就主张同德国和解。由于希特勒的罪行，反犹主义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后也许将永远躲在暗处或潜伏在地下。巴尔戴希记载纽伦堡诉讼案的书也许是件丑闻，但几乎没有引起反响。

我注意到 1948 年以色列国的诞生，但没有感到胜利的喜悦。我没有意识到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事件，“世界意义的”（weltgeschichtlich）一词来自德国人。我没有把自己与这些开垦了土地并建立了国家的先锋等同起来。战争伴随了以色列国的诞生，更确切地说，战争使以色列国的诞生成为可能。战争才刚刚开始。以色列人战胜了由叙利亚人、约旦人和埃及人结成联盟的阿拉伯邻国，这种时机产生于一些难以遇到的意外情况，以色列国将以军事立国。

我首次访问以色列是在 1956 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 20 世纪出现了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政治实体，一个亦民亦兵的共和国。旁观者们远远看到，两三百万以色列人淹没在几千万阿拉伯人的海洋之中。旁观者们（我也一样）有可能会忘记，以色列的作战部队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超过阿拉伯联军。而 1948 年也许应该除外。更确切地说，从 1956 年起，而不是从 1948 年起^①，我必须按照我的职业伦理学来分析和评论近东的政策，尽可能客观地参照法国的利益和不管是多么含糊的政治道德准则。

理论上的法以联盟使我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非常有限：1956 年，法、英远征苏伊士，法国人和以色列的一些部长串通一气，这种马基雅维利主义的手段搭上了匈牙利革命，

① 为什么不是 1948 年呢？那时我还没有担任《费加罗报》的外交评论员，阿以冲突还没有同东西方的争夺连在一起。1948 年，那仍然是英国撤走的插曲。

很叫我心神不宁。P. 布里松对我的评论提出了责问：“这一次真是机会难逢，我们想有点儿作为，而你却只顾评头论足。更有甚者，你这个犹太人，竟批评法国与犹太人结盟……”就在最后通牒被寄给纳赛尔的那天，米歇尔·德勃雷和他的夫人及安德烈·弗罗萨尔夫妇都在我家共进晚餐。米歇尔·德勃雷怀疑“这样一个政权”能够成功。我们也都表示怀疑，感到困惑并抱有敌对情绪。难道法、英想推翻纳赛尔，用另一个军人取而代之吗？在远征的头一天，英国电台提到了纳吉布。这个人曾被阴谋策划反对法鲁克国王的军官们推举为头领或旗手，但在君主政体垮台后几个月，他被挤出统治阶层。 655

像居伊·摩勒、克里斯蒂安·皮诺这样的法国人可能很少想到开放苏伊士运河：撇开以色列不说，埃及人为何放弃自己从过往的货船和油船中获得收入呢？法国人希望狠狠打击真正得到纳赛尔支持的阿尔及利亚叛乱分子；即使纳赛尔辞职，一个不太反西方的班子上台也不会中断阿拉伯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支持。

在1954年至1960年的这些年里，我没有掩盖这一联盟的脆弱性和危险性。法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碰巧都在同阿拉伯国家开战，法国是因为阿尔及利亚，以色列是因为巴勒斯坦人以及因为阿拉伯人拒绝谈判。但阿尔及利亚战争比以色列同阿拉伯国家的战争结束得早；这两个国家，不管好坏，都不介入对方的争端。1956年，在我访问以色列期间，我有幸见到本·古里安，那时他不在政坛，过着乡居生活。他住的白色房子，室内没有任何装饰，几乎像修士的小房间；在经过靠墙壁的书架时，我认出了莫里托翻译的马克思著作，斯宾诺莎和康德等哲学家的著作，还有一本我不认同的犹太文学作品。我们

进行了交谈。当谈到阿尔及利亚时，他以一种严肃的调子对我说：“我看过报纸了。昨天死了 23 人，前天死了 34 人，今天死了 18 人。但是，你也不得不走了。”我没有反驳他的话。

656 这次谈话是在 1956 年 5 月，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国有化，西奈战役^①还没有开始。这个满脸皱纹、白发萧萧的老政治家以哲学家的口吻说着话，有时还流露出他那战士的气质。他如实地揭示，总有一天，法、以之间的矛盾会爆发。以色列向法国购买武器，并向法国派去了原子方面的工程师。作为交换，以色列在联合国尽力帮助我们，不对第四共和国以及第五共和国的阿尔及利亚政策提出批评。许多以色列人，其中包括个人或政界人物，都不相信什么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也不相信什么以战取和。有朝一日法国找到了解决办法——很可能是阿尔及利亚独立——法国便将重新奉行亲阿拉伯的政策，这种政策在 1948 年为承认以色列国而多日犹豫不决时已经看得出来。甚至在石油供应还没有成为生死存亡的问题时，为了本国的利益——用平常的话来说——法国也应该在以色列和阿拉伯人之间奉行一条中间路线，一种中立政策。

的确，当 1960 年本·古里安到法国进行正式访问时，戴高乐将军把他当作“朋友和盟友”来接待。在会谈中，将军再三问以色列总统究竟怀有何种开疆拓土的计划。他不相信本·古里安的否认。当时，他没有声明反对（也许他真的不反对）希伯来小国为了国家的安全而去征服一些地方。正是在这第三阶段，也就是在我看来是暂时的和脆弱的以、法联盟阶段，我在《费加罗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犹太人和以色列人的文章。

① 即第二次中东战争。——编者注

我不是为《费加罗文学报》或其他一些周刊写这篇文章的，而是应美国一批人的要求而写的，这些人准备为以色列国的第一任总统哈伊姆·魏茨曼出一本合集。该总统从贝尔福勋爵那里争得了为犹太人建立民族之家的宣言，并同侯赛因王朝的费萨尔国王进行谈判，费萨尔国王是阿拉伯君主中唯一没有对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采取不妥协的直接反对立场的人。最近，本·古里安发表讲话，支持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重返以色列。他说，只有在巴勒斯坦，犹太人才能完全像犹太人那样生活。这一声明使我生气，也许是为了进行反驳，我才写了这篇文章，此文发表在1962年2月24日的《费加罗文学报》上。它表达了我在犹太问题上一种过激的思想。作为纪念魏茨曼的文章，它则不免具有挑衅的性质。

657

这篇文章使得《费加罗文学报》在巴黎的销售量倍增，使我收到了大量引人入胜、充满各式各样赞成和谴责的来信（可惜已丢失）。关于我对法、以前景的预测，有人谴责我的悲观主义，有人责备我不合时宜地宣布了前途将留给我们的东西。勒内·梅耶以不客气的口气对我说，这篇文章发表得真不是时候。我永远都不会明白为什么不合时宜。要是以色列人仔细阅读了我的文章，他们就会在1967年避免几件令人不快的意想不到的事情。

至于其他，也就是主要的方面，我要辩护的是两个论点：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只属于一个民族；一个犹太人，如果他服膺教法，并在他的思想和生活中继承了以色列的最佳精神遗产，那么即使他不遵守教规，也绝不算背叛他的犹太教。对这两个论点，我一个也不否认，但我要以比较温和的方式予以阐述。再者，当我把这篇文章汇编在一本题为《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的文集中时，我用注解指出，我现

在的观点与5年前写这篇文章时已经有所不同。

几年之后,我应社会研究新学校的邀请,参加讨论一个人能否兼有多种公民身份。从实际法来讲,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许多人都拥有双重国籍。譬如,在服兵役时,在英国出生的法国青年必须做出抉择:如果他们不服兵役,就丧失法国公民的资格。许多获得以色列公民资格的法国人却没有失去他们原来的国籍。但是,这种情况相对来讲不多,不能解决政治和伦理问题。

我回想起在巴黎某一地方举行讨论会——但记不清是因为什么近东危机——参加讨论的有12个犹太人。在讨论中,其中一人向自己并向别的对话者提问道:若以色列和法国之间的争吵加剧,怎么办?与会者中有一个退役将军,有人问他:“如果政府命令您同以色列作战的话,您是否遵命?”将军的理智的回答使在座的某些人感到惊讶,他说:“我是一个法国将军,我执行的是我的上级,总之是我的政府交给我的使命。”尽管犹太人要求享有平等的权利,但他们不可能同时为两个君主服务。这种极端的情况好像尚不可能,但在1967年之后,在以色列和法国事实上的联盟破裂之后,一些军官痛苦地感到他们的法国军官的义务与他们犹太人的感情是相矛盾的。如果一个犹太法国人首先想成为以色列人,其次才想当法国的一名官员,那么确实会产生一仆二主的问题。

再者,在一个民主的政体中,效忠国家不具有也不应该具有极权的性质。许多法国人哪怕是忠于法国的,也不掩饰自己对这个或那个国家的特殊爱好。在20世纪,一些天主教徒支持教皇的外交,而在那时,教皇自己也承认是罗马的俗权君主。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至少是最积极的分子和“经常在支部工作”的人,都多次用实际行动表示他们首先爱的是他们

意识形态的祖国。当然，犹太人不希望把自己跟共产党人相比拟，因为共产党人是无条件地为外国服务的人。

在美国，院外压力集团属于政治生活中的正常政治手段。卡特总统的兄弟报名并受雇当利比亚政府的代表。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经常影响美国的舆论和政府，以利于以色列和以色列的外交。直至现在，虽然美国犹太人在委员会内部对梅纳赫姆·贝京的主张和行动不全都赞成，但是犹太人组织仍旧保持了一条共同阵线和表面的一致。人们到处都这样说：法国没有类似的院外压力集团和类似犹太人、爱尔兰人或希腊人的选民团。美国人民是由移民组成的，尽管各个人种已有一部分被美国社会塑造为美国型，但令人奇怪的是，美国人民依然是混杂的。他们由居民成为公民，然后正式取得美国国籍。但是，各个人种原有的不同特征并未因而消失。在法国，移民更多是从语言和文化上而不是从国籍上和法国社会融为一体。自大革命以来，也许自宗教改革以来，法国人不断分裂，这仿佛是正常的和不可避免的。双重国籍，双重公民身份，毕竟是可疑的。犹太“复国”运动是与官方组织相对立的，它要求成立“犹太人选举团”，四面八方都有人起来反对。 659

关于我个人的情况是，我尽我最大的努力，遵守法国政治评论家的政治道德准则。我的评论始终是分析多于有价值的判断，但从未做到完全客观。这些评论往往启发人们做出决定，而这些决定在我看来是对法国以及对和平最为有利或最符合道义的。我有关近东的评论，主张以色列有生存的权利，但不否认这个国家的建立伤害了巴勒斯坦人民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感情。

我采取这些基本立场以后，便对每个危机本身做出论断，尽可能公正地指出每个角色的责任、错误和失误。我在 1956

年对法国人和英国人的谴责远比对以色列人严厉，因为英法是主谋，而以色列人仅仅是抓住机会，同纳赛尔的埃及算老账并想使边境地区太平几年。

1967年，我说埃及不对，因为纳赛尔是有意识地采取行动，挑起以色列的进攻（这是他预料到的）。封锁蒂朗海峡，建立一个约旦-埃及指挥部；埃及军队在西奈半岛集中，这三条开战理由，以色列当局早就说得明明白白。用通俗的话说，这叫求仁得仁！

660 无论1956年还是1967年，我都没有无保留地像法国犹太人，甚至像全世界的犹太人那样欣喜若狂。1956年，入侵西奈半岛的第二天，我在沃日广场上由拉比费尔韦尔克组织的研究小组会上讲了话。在进行讨论时，我阐述了我的疑虑和反对意见。一个年轻人（现在仍犹如在眼前，他25岁光景，完全不像犹太人，穿一条笔挺的裤子和一件浅色的上衣，脸蛋很讨人喜欢）在一场混乱的讨论结束之际叫喊道：“这一切说明，强权讲理，越讲越有理。”这一次，我一反常态，冲动地、气愤地教训了他一顿。这句话在许多情况下是千真万确的，称得上是法国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言论，但一个犹太人说出这样的话，应该感到羞耻。犹太人有多少回掌握过强权呢？他们还能把强权保持多久呢？

以色列人在1967~1973年奉行的政策，理将导致一场新的战役。我每次出访时，都对我的以色列朋友这样说：无论埃及还是其他阿拉伯国家，都不能容忍强大的以色列。我批评在苏伊士运河上部署以色列军队，这既有军事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苏伊士运河构不是一道牢固的防线，反而迫使以色列人远离基地，前往作战。从政治上讲，占领西奈半岛、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把以色列国变成该地区的帝国，

一个接一个的战争升级将不可避免。

我认为，1973年叙利亚和埃及发起进攻是正常的。1967年以色列发起进攻，也是正常的（说它正常是根据实际，根据习惯或强权政治的“道义”）。在实现停火之后，尽管以色列在战役的最后阶段获胜，但我对埃及人在战役头几天取得的胜利感到高兴，因为这些胜利有可能平复萨达特总统的自尊心和自豪感所受的创伤，从而使他选择和平的道路。

我赞成戴维营的做法，但不抱过多的幻想。我指责大以色列论，反对在约旦河西岸建立定居点，总的来说，我反对贝京的全部政策。我也批评法国的外交，因为它不是用另一种可行的做法，而是用一些声明来代替戴维营的实际做法。在理论上，这些声明无懈可击，但实际上却无法付诸实施。当然，如果我是一个外交官而不是一个自由评论家的话，我就要服从我不赞成的政策。许多非犹太人外交官都处于不惬意的境地来执行他们不满意的外交，并要为这种外交进行辩解。

661

总之，我按照我的职业道德办事，但我经常收到表示愤慨甚至对我进行辱骂的信件，这些信件有时来自犹太人，有时来自非犹太人；犹太人给我来信是因为我对以色列的政策持保留态度，而其他人的来信则是出于相反的理由。反犹分子的来信，我毫不介意，就像一种盲目的刻骨的仇恨向我袭来时那样；犹太人的来信比较动人，但丝毫没能使我动摇。我是法国作家；作为犹太人，如果先把自己当作以色列人去思考问题和行动，就会生活在自相矛盾之中。为什么不定居在自己的祖国呢？

戴高乐将军为6月事件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讲的一段话中有一句所谓的小句子。这句话引人注目并受到评论：“自信的、爱好统治的优秀人民。”有一些我尊重和崇拜的人，

例如里凯神父，他们不肯怀疑将军的话中除了对优秀人民的赞赏外还有别的意思，即使这国人民在这一次事件中已在滥用他们对统治的爱好。至于我，我不怀疑（我仍相信我是对的）将军想在教训一下法国犹太人的同时也教训一下以色列人。因此，他用“人民”一词，既包括以色列人，又包括散居各国的犹太人，他打的不只是以色列的犹太人。很有可能，使他生气的正是法国犹太人，生气他们对“六日战争”的胜利所采取的态度：群众示威游行，一些新闻机构公开亲以，甚至到了制造假消息的地步。法国群众惑于宣传，怀着暧昧的激情，同情以色列（小戴维受到巨人哥利亚的威胁）。此外，法国人认为放弃北非是全国人民的失败，所以有意无意地希望对阿拉伯人进行报复。

662 当时，我常常思忖，是否应该参与这场辩论，同时也常常问自己，是否应该发表我对阿尔及利亚问题的意见。戴高乐将军从来就不是反犹太主义者，至少从1940年他进入政界以来一向如此。那么何苦把这样一句反正是夸奖的话看得那么重呢？在将军的思想中，“爱好统治”和“自信”都是恭维话。但是这种解释实在靠不住，因为“爱好统治”这一词常常被法国反犹分子所引用，例如札维埃·瓦拉——他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负责犹太事务的高级专员。沙皇警察局伪造著名的《犹太人贤士议定书》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并提出了同样的指责：犹太人的统治欲。

我亲爱的朋友加斯东·费萨尔就《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一书给我写信，他以友好的态度说我反应过火。他说：

首先谈一谈戴高乐将军在记者招待会上说的话。我认为，您做出反应并将您的反应公布于众，这种做法很好。

首先，这是因为您有权利这样做，而且您的反应和往常一样是非常明确的。从我个人来讲，虽然在6月冲突问题上，我几乎是完全亲以色列的，并对以色列的胜利感到高兴，但对“自信的、爱好统治的人民”这句话的理解，我不如您那样严格。我认为这“几个字”，无论引起多大反响，也不足以正式恢复反犹太主义的名誉，甚至不可能揭开新的“怀疑时代”的序幕。但是，您完全有理由说出您的感受。我希望您写的东西有助于（即使这是不大可能的）您写的书中最后一页所考虑的、所呼吁的更正。

《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这本小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的标题为“怀疑时代”，探讨了将军的记者招待会；第二部分转载了在“六日战争”以前、“六日战争”期间和“六日战争”以后发表的文章；第三部分收集了两篇文章，一篇发表在1960年9月的《现实》杂志上，另一篇我已提到过，发表在1962年2月24日的《费加罗文学报》上。

对第二部分，我只想谈几句话。我在本章开头提及的现场分析是经得起重读的，尽管今天的读者掌握的情况比我当时掌握的更多。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应负的责任很可能比我当时想象的要少。纳赛尔曾一个接一个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挑战；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总统，无法履行对以色列许下的关于蒂朗海峡自由通航的诺言。

杜勒斯曾于1957年向以色列做过正式保证。这些保证与联合国无关。整整48小时，命运游移不定。一个美国总统在10年前做出的诺言应由约翰逊总统来兑现了，或更确

切地说，他本来应该庄严声明，应该发表具有说服力的公开或秘密讲话，不让开罗和莫斯科怀疑他的决心。然而，被远东一场没完没了的战争压垮了的美国总统，理所当然地怀疑在埃及的挑战背后藏着苏联的影响。于是，他吞吞吐吐、结结巴巴地答应向以色列提供外交援助，结果引起了双方的连锁反应，一直弄到非爆炸不可。^①

8月，我在以色列待了一个星期，回国后写了3篇文章，以后发生的事件与这些文章的主要论点不谋而合。在第一篇文章里，我报道了我同列维·艾希科尔总理的对话，他对我说：“我们的资源多得难以选择，耶路撒冷，加沙地带，西奈半岛，还是约旦河西岸呢？这次，我们手里有最好的王牌。让别人去考虑应采取什么行动吧。”我打断了总理的话，问他说：“您是强调难以选择，还是强调资源呢？就谈判的王牌而言，你们是不缺的。如果你们要保留战利品，那么这些战利品还能不能算资源？”我觉得以色列人在手段和目的的问题上有分歧，他们仅仅在战略上而不是在政策上一致。眼下，他们保留了所有征服的地盘，并让阿拉伯人做出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进行谈判，这就等于留在原地等待。每一个以色列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怕武力兼并败坏国民精神吗？怕撤出占领区造成军事上的不安全吗？怕少数阿拉伯族膨胀，使犹太人失去民族特征吗？如果我没有必要金人缄口，我就可以说出每一个对话者怎样有意无意地对各种危险性划分等级。但无论是政治家还

^① 这篇文章写于6月6日，于7日发表。在书里的注解中，我责备自己对美国总统过于严厉了。

是军事家，他们总离不了一个无懈可击的外交套话：只要阿拉伯人同意和平解决，那么一切都不成问题。1973年还得再打一仗，让埃及打个胜仗；开罗出个政治家，一个所谓的阿拉伯国家才有可能和以色列直接对话。

第三部分的两篇文章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主要是调子、文笔和气氛上的差别。第一篇文章——发表于《现实》杂志上的那篇文章的结尾，引用了让-保罗·萨特论文中引用的黑人作家里查德·赖特的一段话：“在美国不存在黑人问题，只存在白人问题。”让-保罗·萨特补充说：“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说，反犹太主义不是一个犹太问题，而是我们的问题。”我当然不赞成这样的警句，它至少是过于简单化了。犹太人今天不能回避他们的问题：自己确定自己是以色列人还是法国人；既是犹太人，又是法国人，是可以的；既是以色列人，又是法国人，是不行的。这并不禁止他们对以色列有特殊的爱。这很难为西蒙娜·韦伊辩解，正像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那样，说不该责备她反对犹太人。她尽管附有条件，提议禁止与犹太人通婚，以清除犹太主义，可是这不等于要搞种族灭绝吗？不管怎样，在这篇文章中，我找到了我的信仰的两根支柱：“我认为，犹太血统的法国人要求保持他们的信仰和传统文化是合乎情理的。为什么一个犹太人非得要被当地人同化，非得丢掉父辈的宗教信仰和教规，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法国人或一个好的英国人呢？只有公然承认此观点的羞羞答答的极权主义理论家，才要求把这种异化作为获取公民身份的代价。”另一根支柱，我借自斯宾诺莎：“我重读了《神学政治论》，认为‘国与国是有区别的，也就是说，各有各国的社会制度和法律’，但‘无论是权贵还是犹太人，都受法律的制约，我说的法律是有关真正道德的法

律，而不是对各国制定的法律’。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在理智和真正的道德方面，没有一个民族生来就是有别于另一个民族的，因此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民族得到上帝的偏爱。因此，今天犹太人绝没有任何东西可据为己有，并把自己置于所有民族之上’。”我要补充一句，除了不幸，什么也没有。同时也没有任何东西应把他们置于其他民族之下。

另一篇文章——我已提到过——从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本·古里安的话：“犹太人只有在以色列才能完全成为犹太人。”在重读这句话时，我觉得有必要修改那些太绝对和太简单的说法。我在注解中写了这些修改的话。我曾写道，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不是受宗教的影响，而是受政治的影响；我还在注解中写道：“这种提法不妥当，至少应该在深浅程度上有所区别。”这些修改固然重要，但只属于历史方面。我于1967年批评过的那些话是属于同一类型的：“对信教者来说，甚至对正统派来说，成为好的犹太人最佳的、唯一的办法，不就是根据字义和神灵服从戒律吗？”注解：“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以色列国是世俗国家。”注解：“这种提法不完全确切。以色列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关系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对真正信教的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国家不是主要的。”注解：“这种提法太简单化了。”“以色列的事业在20世纪的世界中是没有普遍意义的。”注解：“今天我不再写这种句子了。”

但愿读者重新看看这一连串的句子和我的修改。这些修改几乎都涉及以色列国家的性质，涉及希伯来国家的影响和其结构中政治和宗教所占的地位。我曾犯了过于简单化的错误；第一批犹太复国主义者，特别是这一组织的发起人，即被同化的奥地利记者，对犹太人进入社会而引起的反犹主义做出了反

应，其实，他们从自己身上是找不到父辈的信仰的。但是，由欧洲民族主义引起的反民族主义成为犹太复国主义，并且渐渐地被宗教感情充实了，而这种感情是由上千年来对耶稣教堂和耶路撒冷的怀念所唤起的。

读者可以相信，我的内疚和愧悔并不触及我的犹太意识的核心。我有法国国籍，受的是法国教育，关心的是不脱离自己的根子，我尊重教友们的信仰，而自己又不抱有这种信仰。这就是小书的第一部分，命题为“怀疑时代”。这是同戴高乐将军的记者招待会进行的一场论战，也是这本小书的中心及其存在的理由。

666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说什么呢？它在我写的所有文章中是独一无二的一篇。首先，我想通过这篇文章，表明戴高乐将军的下面这句话远不是对犹太人民的赞扬，而是与反犹主义的传统产生共鸣。戴高乐将军曾经说过：“有些人甚至担心，现在一直散居在各国的、始终保持了原样的、自信的、爱统治的优秀犹太人民，一旦集中在一起，将把19个世纪以来他们所怀有的极为动人的愿望变成强烈的征服欲望。这个愿望就是：明年到耶路撒冷去。”要说散居在各国的犹太人仍然是自信的、爱统治的人民，我听到这种论断只觉得如此反常，如此骇人听闻，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犹太人在几个世纪内都被圈禁在犹太人区，被排斥于大部分职业之外，并随时会受到迫害（用将军的话来说，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他们自己“挑起”的），这难道就是他们的自信吗？札维埃·瓦拉——战时曾任犹太事务专员——评论我的书，并表示欢迎我重新采用了他一贯主张并予以贯彻的思想。我不怪将军反犹太，而怪他给反犹主义的尊称，就算不是尊贵的称号，起码也算给了一种

正当的名义。我不责备他拆散法国同以色列的联盟，“无论哪届法国政府，在阿尔及利亚独立之后，完成了非殖民化，都将极力同中东各阿拉伯国家建立所谓的传统联系”；我责备他单方面谴责以色列，而带有挑衅性的外交主动行动却是由纳赛尔采取的（封锁蒂朗海峡，在联合国维和部队撤走之后占领沙姆沙伊赫，在西奈半岛集结部队）。诚然，戴高乐将军曾事先声明，他将谴责首先动用武力的人并将援助岌岌可危的以色列。“戈尔斯先生对我说，戴高乐将军的诺言是算数的。”可是，除了开个记者招待会，他又向以色列提供过什么援助呢？

667 将军抱怨以色列国没有听从他的建议。也许他更不乐意法国犹太人对以色列表示“声援”，并为以色列的胜利欢欣鼓舞。^① 一个知己对我说：

在6月份表现出来的亲以色列的狂热，不含有某些隐晦的东西吗？不含有某种情况下令人不快的东西吗？《世界报》的“自由谈”专栏中有一个作者说：“这些表现不成体统。”可是谁也想不出，《世界报》会判断谁成体统，谁不成体统。我承认自己既不喜欢跑到香榭丽舍大街高呼“以色列必胜”的青年人，也不喜欢在以色列大使馆前游行的犹太人。我既不喜欢当年积极拥护阿尔及利亚永远属于法兰西的人，也不喜欢那些怀念远征苏伊士的人。他们借以色列之手，继续同阿拉伯人打仗……这些人的申斥，还是接受了罢。他们在6月份每时每刻都保持了冷静，从来没有对以色列居民的生命表示出一丁点儿担忧……在一

① 下面转引了“怀疑时代”中的文字。

个基督教养育成长的文明中，任何一个人不管信不信教，都对耶稣基督所凝聚的乡愁亲思怀有孩提时的回忆和复杂的心情。谁能对这个民族的命运无动于衷呢？是啊！一个善良的反对者回答我说。20年来，信奉基督教的欧洲总是想忘掉而不是想理解，反正眼不见为净。我可以理解他们，只要事先揭露了种族大屠杀，自己便可以说问心无愧，高枕无忧。其实，他们以为以色列人将会遭到种族大屠杀，可是他们搞错了，这些威胁并未成为事实。但像你一样的法国犹太人对我们说，他们是，也愿意是“像其他人一样的”法国公民。那些从北非回国的人，他们喜欢法国甚于以色列，难道他们不应该少出头露面，少说话，少指手画脚，免得别人耻笑他们是一仆二主吗？在这些发疯般的日子里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可避免地会颠倒黑白。与其说戴高乐将军带了头，倒不如说他不过当了别人的喉舌。当然，同病相怜的兄弟，你替别人讲起话来，正像所有的人一样，显得多么乖巧。最好还是……犹太人不应该……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老实说，度过了6月艳阳天，我等待的是11月的寒风霜冻……人们忘记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只有它能够解释法国犹太人几乎完全一致的态度：因为法国大多数人的同情心都是向着以色列的，犹太人喜出望外，犹太人的身份终于与法国公民的身份水乳交融了。犹太人过得很惬意，表示自己对以色列的热爱非但不会同法国人疏远，反而更加同法国人打成一片了。可惜好景不长：他们也相信了圣诞老人会白白给他们送礼。

我提醒说，法国的犹太人不全都属于同一社会阶层，不会

只有一种见解：有的是右派，有的是左派，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亲巴勒斯坦的，反帝的，因而敌视“殖民主义的产物”以色列。话是这么说，但法国犹太人仍然是第一次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居然也自成一种团体。我，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首先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犹太人，“我比以往更清楚地知道，以色列国有可能被摧毁，一部分居民有可能被残害，想到这种可能性就会刺伤我（直至我的内心深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也和我有相同的感受。他们时而忘记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产物”，回忆起自己的身世，重新感到自己是犹太人，这使他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犹太血统的左派知识分子没有为以色列的民族主义而放弃世界主义，尽管 J.-M. 多梅纳克写这话的时候并不十分出于恻隐之心。他们做了和加缪相同的尝试。在某些情况下，知识分子经过反复思考，权衡利弊，查遍了各种材料，一一比较对证，参考了各种抽象的是非准则，最终徒劳无功，依然不能够采取一定的立场。他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听从他的魔鬼。左派知识分子，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在6月份都是这样做的，不惜次日重新恢复平时的习惯。也许有一句话能够更好地概括我的立场：“作为法国公民，我要求跟全体公民一样，享有效忠国家的权利，享有信仰的自由，享有同情什么的自由。对信教的犹太人来说，以色列有完全另外一种含义，这种含义与对我来说的含义是不同的。虽然他们比我更加需要这种自由，但是，如果我竟让他们单独来捍卫这种自由，我将瞧不起自己。”

关于戴高乐将军本人，我只想提一些问题，不做回答：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是以引起公愤为乐吗？是为了惩

罚不服从他的以色列人和偶然反对戴高乐主义的犹太人吗？是为了郑重其事地杜绝脚踏两只船的企图吗？是为了多卖几架幻影战斗机给阿拉伯国家吗？是指桑骂槐地冲着美国打犹太人吗？他是否想再次考验，在夏尔·戴高乐时期委曲求全的某些忠实信徒是否仍然无条件地服从？是否学路易十四，不肯容忍新教徒？是否学雅各宾党人，自己热爱自由，爱得不许公民怀有其他感情？这一切的一切，我都说不好。我只知道任何过火的民族主义最终将迫使某些犹太人（我不是这样的犹太人，但我不愿脱离这些犹太人）做出抉择：要么拒绝，要么否定自己。

次年，“五月风暴”发生了，1969年，将军隐退，1970年，将军逝世，记者招待会的风波得以平息。回首以往，我承认论战是无用的；无论如何，“以色列和犹太人”问题迟早有一天会被提出来。两封高质量的信各自非常清楚地阐明了两种对立的态度。有一个同我联系不频繁但保持着真诚关系的作家写信给我说：

我的妻子不能忍受人们在信仰基督教的法国人和信仰犹太教的法国人之间分出最细微的差别，但她对法国绝大多数犹太人的行为十分反感。可以说，一条鸿沟在她的脚下出现了。就这样，这些人居然把以色列放到了法国的前面。有一些好像已经解决的问题，如反犹主义问题，又很快被提出来了。您——雷蒙·阿隆，您曾写文章说，您是那样坚决地确认您的犹太特性，所以您的话会不会让反犹分子拿去做论据，您满不在乎。可是您错了。

在触及主要问题的这几句话以外，来信的人还说，以色列在入夏之前，就决定要打断阿拉伯国家的脊梁骨。

6月份，人民群众的反应使您感到兴奋^①，却使我感到沮丧和悲痛。我从中看到了法国人没完没了地寻仇报复的浑蛋劲儿。

斯特拉斯堡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信教和遵守教规的，而且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写的信是典型的。他在信中承认经常阅读我的文章，但很少赞成我的观点。他把写给 P. 维昂松 - 蓬特的信复印了一份寄给我：

670

您把“犹太人民”放在引号里面。我的意见是，您可以去掉引号，因为这是个历史事实。有许多和我的信仰相同的人，都否认这个事实，因为他们难以接受。这是他们的事，改变不了社会和历史事实。米歇莱给灵魂下的定义是：“灵魂是精神元素。”这既可以用于犹太人民，也可用于其他一切人民。因此，远远不能责备将军使用“犹太人民”这个词。但他加了“优秀”这个词，姑且不说后面还用了不友好的形容词。然而，我根本不相信有什么优秀人民，也不相信那些自封为天之骄子的人。犹太人自称是“上帝的选民”，人们可以对此提出异议。从形而上学来讲，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乡村里最小的拉比也会向您解释说，当选仅仅是一

① 这话不确切，我也觉察到这些游行示威过激过火，而在亲以色列的感情里面，含有暧昧不明的东西。

种义务，一个沉重的负担……法国是我的祖国，我的祖先和我自己都曾为它而战斗。我们讲的是它的语言，它的文化就是我们的文化……只有在这里，我才生活得自由自在。然而，这个祖国难道有权随意指挥我的全部思想和我的全部感情吗？它能够合法地去掉我的犹太人特性吗？（或巴斯克人或布列塔尼人的特性……）犹太血统的法国人虽然举止应和所有法国人一样，但我绝不认为，为了达到精神上的同化，他应该抛弃犹太人的特性，使自己变得贫乏无聊。如果他沐猴而冠，机灵地模仿他认为是法国人发自内心的行为和思想，他又算为他的国家做出了什么贡献呢？既然作为“选民”首先是一种负担，一种神秘的义务，既然他不因为自己生来就是犹太人而觉得了不起，那么他就不必为此感到羞耻，也不必讳莫如深……唯独极权国家，才强迫它的犹太人做出这种不正常的和不人道的选择。真正的民主制始终是多元的，并且是承认相异性的。在我看来这甚至是民主制的主要标准之一，民主制也从中得到补偿。每一个国家都有称职的犹太人。因为任何社会集团的人道贡献都是积极的，只要这种贡献是真诚的和真正的……因而，从大革命以来，我们就成为十足的法国人。但是，就像纽约的爱尔兰人对所有爱尔兰人的命运感到不安一样，我们也对全世界的犹太人的命运十分敏感。再者，我们都是教会的后代，而且我们在祷告中，一向怀念耶路撒冷，所以，以色列国对我们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既是历史性的又是宗教性的吸引力。我们几乎所有人都思念以色列人，就像思念我们的同胞手足一样。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这从狭义上讲也是事实，因为我们在那里确有亲戚。对我来讲，我在那里有儿有孙：他们在理想主义的推动下到

基布兹去了，就像你们那儿有人进修道院一样。那么，为什么我对以色列人的感情与我对我法国祖辈的感情就不能相容呢？

1967年6月，关于法国犹太人的态度问题，我收到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封信，像往常一样，他的态度是友好而宽容的，但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他却持批评态度。我把那些恭维话搁一边，先谈谈主要问题：

您所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但我觉得您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确实，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一出蓄意操纵本国舆论的把戏。您可以回想一下，《法兰西晚报》整版的标题是《埃及人已经发起进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六日战争”结束多日之后。

许多法国人，无论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对事件持有与政府不同的看法，并且公开维护自己的看法。没有比这更为正当的事了。但他们从事新闻工作，就得特别要求自己写文章有分寸，严格尊重事实。如果凭仗新闻界的实力地位来扩散假象，试图改变形势，这就有点玩阴谋的味道了，我几乎可以说这是背叛。作为犹太人，我为此感到羞耻，也为那些犹太知名人士感到无地自容，因为这些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厚颜无耻地代表众人发言。

在出现了这样严重的偏差之后，提出警告无疑是不可避免的。令我遗憾的是采取这种形式，但我又承认，至少这一次不得不承认，将军所采用的形容词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有些法国犹太人利用他们在报界和广播电台的权力和已获得的

地位，窃取了代表其他所有人讲话的权力。正是这些人表现出“自信与爱好统治”。但人们可以把这一切告诉他们，而不必以牙还牙。眉毛胡子一把抓本来是他们这些人搞的，而且已经搞得十分严重。（1968年4月9日的信件）

我没有保存我的复信，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以同样的坦率和同样高尚的思想境界，给我回了第二封信。凭信中的段落，可以猜测我写给他的信中所提到的事实和论据： 672

您说得千真万确：个人或集体对形势和事件各有各的看法，除此之外，就不存在什么客观的历史事实。对我来说，鉴于我们所要处理的问题，这就更加千真万确了。因为我对以色列情况的看法，仍受另外一种情况的影响，而且我对这个情况至今仍然十分敏感。这个情况在几百年前发生在地球的另一边。那时候，另外一批受迫害和受压迫者，来到由更加弱小的人民栖息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定居，并急于把后者排挤出去。我显然不能在对红种人受到的摧残感同身受的同时，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做出相反的反应。即使这是事实，我与阿拉伯人的接触虽短，却对他们产生了无法根除的反感……因此，我自觉自愿地承认，鉴于职业上的特殊原因和我本人的原因，我的认识从根子上就歪了，再加上作为犹太人，凡是在制造舆论的地方掌握着大权的犹太人，都应该比通常更加注意尊重事实。这样才对得住他们自己，才对得住我们这些人。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听了一肚子假话。就算照您的说法，我心目中的那些人只不过当了一帮居心不良、怀有成见的人的跟屁

虫，那么他们对我们所有人还是犯了极其严重的错误。至于我，我担心（但我当然一点儿证据也提不出来）甚至连戴高乐派的报纸和戴高乐派的人物也别有盘算。在政府还来不及做出反应之前，他们便把舆论倾向扩大到无法逆转的地步。可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完全搞错了……

实际上，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分歧只在于一个细微的差别。您认为，法国犹太人满怀激情地抓住了可以声明自己既是法国人又是犹太人的机会，这是感人肺腑的和可以谅解的。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他们不应该这样，更不应该在暗中挑起这种狂热情绪。（1968年4月19日的回信）

673 我认为，今天大部分法国犹太青年倒是同情那个在斯特拉斯堡和我通信的人，而不是与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抱有同感。前面那一个属于戴高乐派，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法国抵抗德国的游击队里担任军官。他不仅仅代表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信教者，甚至连不守任何教规的犹太青年也采纳了他的意见，决心肯定自己的犹太身份，赞成多元化，也就是说赞成差异，并从此再也不在乎别人指责他们为反犹主义提供了论据。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与斯特拉斯堡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差不多（尽管是从完全另一种哲学出发的）。他做结论说：

总统完全改变态度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反犹主义是一种传染病。如果杆菌携带者知道或认为他们在混乱的局面中有支持者，他们就立即变得咄咄逼人，而在他们应有的位子上时，他们就会变得极其卑躬屈膝。然而，戴高乐和布热德的政治联盟，亲阿拉伯政策的那个记者招待会，可

以给所有这些可怜虫以启示：发泄的时刻重新来临，就像1940~1945年他们有人保护的时候一样。

我要重新提一提这封信的最后一句话：

我认为以诚相见者，彼此进行对话是有益的。这种看法有点天真，像我这样属于“爱好统治的人民”的一员不应该持有这种看法。

与往常一样，亨利·古伊埃写信感谢我送书给他。这封信与作家们通常收到的空洞客套的信大不一样。信中充满了言之有理的思想，令人钦佩的诚意、公道和精确三者交相辉映：“如果我反省一下的话，我发现，在第一阶段，当我从收音机里听到这句话时，我惊呆了。这句话听起来带有贬义，那是毫无疑问的。第二阶段，我提出了抗议，我把此话同国家社会主义做了比较……没有顾到当时的背景和反应：‘不要夸张’。第三阶段，喘一口气，恢复时代背景，排除与国家社会主义做可笑的比较，并提醒说，上流社会的反犹分子从来没有建议使用杀人的瓦斯房。”除了这些个人的分析，H. 古伊埃在我的书中抓住了我对“犹太人民”这一概念本身提出的疑问。可是，他的说法与斯特拉斯堡的通信人恰恰相反，尽管后者也是赞成我的观点的。“您使人领悟到，‘犹太人民’这几个字实际上比其他所有称号都更为重要。这是真正的问题。正是这一提法使您的处境变得十分困难：您凭什么、为什么、以什么名义，可以属于另一国人民而不是法国人民呢？这实际上是创立一种‘犹太主义’，它只是作为一种身份，那些像您这样的法国人在这种身份下，徒劳地寻求他们可以寄托的东

西。”他准确地解释了我的思想。与斯特拉斯堡的通信人所不同的是，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像确认法国人民的客观存在那样来确认“犹太人民”的客观存在。犹太人民的存在是根据那些想让他们存在的人的意愿而存在的，那些人有的出于元史学原因，有的是出于政治原因。

我出乎意料地、欣喜地收到了《现代》杂志的一封来信。素不相识的克洛德·朗兹曼给我寄来信，我引用几行，也许很不谦虚：

我刚拜读完《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一书，我谨向您表示感谢。您写道：“伟人的声音”沉默了。真是太好了。谁也没有以这样严格和关注的态度来谈论事实真相，这使得我有可能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紧跟您并永远完全尊重您。我要补充一句，这可能是前者的结果：一共45页的“怀疑时代”，文字非常优美。

我想对费萨尔神父的遗著《雷蒙·阿隆的历史哲学》提几点看法，作为本章的结束语。这部著作在我朋友的全部著作中是独一无二的杰作，它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它试图解释我内心的、几乎是秘密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在这儿或那儿，在一句拐弯抹角的话中或在激动的时刻泄露出来的。

如同我对拙著的判断一样，神父没有弄错主要的方面：战后，我的教学和记者职业并不意味着我同战前进行的哲学探讨决裂了。从表面看，在《导论》中，过于密集精炼的文字与《费加罗报》上一贯易懂的或清晰的、不考虑文学效果的文字，二者之间不再存在什么共同点。除了文笔上的差异，对事件的评论似乎属于另

一种类型，另一种天赋，不是解释价值哲学的中性或神道之间的斗争（用散文式的话讲，价值之间互不相容）。这些一目了然的意见与我思想路线的连续性是一致的。我的那些书有关于国际关系的，有关于意识形态分析和社会学分析的，书中的思考不一定都来源于《导论》一书，但它们构成了可能的续篇之一；它们阐明了莱昂·布伦什维克的话：“您的论文包含了您一生的工作的萌芽。”（我想不起原话，只是援引了大意。）

《导论》是在进行政治反思时创作的，它除了包括认识论方面的研究，还包括历史学中的行动理论和对意义的研究。然而，不言而喻，我尽力将这种行动理论付诸实践。费萨尔神父将这一行动理论比作耶稣会创始人伊纳爵·罗耀拉的《神操》。1945年后，我选择了1938年提议的那种立场，它不是根据情绪而提出的，而是根据对我们所要选择的各种类型的社会做出尽可能科学的研究后提出的。1945年，大分裂把我们置于两者择一的境地：选择革命，就是选择苏联模式和苏联帝国；拒绝革命，就是选择自由民主制，它既不是美国模式，也不是美国帝国，而是多种民主制模式中的一种。多种民主制包括所谓资本主义民主制、社会民主主义民主制、自由民主制的民主制，它们在战争结束后都得到美国的保护。

我在《导论》中阐述的这种选择包含意识形态方面和哲学方面的含义。根据常常被引用的说法，争取世界统治权的斗争是以哲学的名义进行的。斯大林援引黑格尔和马克思，尽管他们的辩证唯物论已经变质。美国仍然忠实于启蒙运动，忠实于尊重人和尊重人的自由权利的无限进步，忠实于繁荣和谋求幸福。这种政治哲学选择不单独支配我的各种决定。每一个决定要求除了原来的选择，还要权衡风险与成功、希望与可能、

利与弊。而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正是通过自己做出的决定来塑造自己的人格和生活的。

676 费萨尔神父和我都非常赞成抛弃马克思主义。我们针对亚历山大·科耶夫的真实思想进行了交流。在他眼里，苏联预示着清一色的世界帝国吗？无论他还是我，我们都不把 J. - P. 萨特的话当真：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时代“不可超越的”哲学。坚决主张自由倾向，马克思的独断主义与萨特思想的奇怪混合是我俩都不能接受的。对于行动家来说，前途依然是敞开的；除非采用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萨特本人曾多次批判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否则我们会进入“一个不协调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种支离破碎的科学和一种浮浅的思索，没有其他保障”^①。既然如此，有什么权利把反共者称为“狗”呢？

费萨尔神父重提了莱昂·布伦什维克对我的博士论文答辩提出的批评：我把历史看成“一个不协调的悲剧”。他既想为我受到的指责进行辩解，也想根据我的实际行动，甚至我的理论，更好地理解连我自己都不理解的我，还想拿我跟他做比较，而又不对我本人做任何不真实的解释。在《导论》一书中，我把自然史和人类史区分开来；我不断排除超自然史或圣史；我保留了这方面的可能性，也可以说是保留了这方面的空白。费萨尔神父出于对基督的信仰填补了这个空白。

既是自然史又是人类史的历史，确实是一种不协调的悲剧。历史成为人类史，是因为人为自己寻找一种天赋，也是因为人把自己的使命和命运对立起来。但与此同时，他并不忽略自己心爱的人民的特性，也不忽略他自己应当为之效命的目标

① 这是我《历史哲学导论》中的最后的话。

和价值是靠不住的。在历史的目的方面，他按康德的见解来设想理性的概念，并泛泛地拟出了它的内容。这是理想还是幻想呢？我不知道。在历史主义方面，我概述了定命的绝对性和理性的世界性所限制不住的东西。然而，费萨尔神父则在超自然方面寻找悲剧的一致性。在基督教徒眼里，犹太人民的命运属于超自然史。在基督诞生之前，犹太人民通过结盟，在救世主的救世学说中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位；在基督诞生之后，犹太人民变成了不信教的犹太人，即不承认救世主的人。崇拜偶像的异教徒改信基督教，一直有可能抵挡不住迷信的压力。不信教的犹太人和改变宗教信仰的异教徒并不在物质上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团体，而是形成了世界史里的一些类别，世界史在基督身上每时每刻都能找到自己的目的和一致性。 677

在《导论》中，在个性与普遍性之间找不出“平分秋色的偏爱”的痕迹。当然，城邦和帝国的交替，人民和国家的盛衰，全部都被写进了各个世纪的编年史中。在每个时代，人们为那些由同样的创造者轮流建立或摧毁的不牢固的建筑而流血牺牲。尽管这些建筑在当时的人看来几乎全部是永垂不朽的，能够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但是，它们没有一个被列入圣史。我无保留、无条件地觉得我是法国人。1967年6月，我表示了对以色列的声援。这种表示“声援的情感”，意味着我的实践比我的理论先走了一步吗？

我愿意同费萨尔神父继续进行对话，但并不认为莱昂·布伦什维克是对的。诚然，我多次使用“反常”这个形容词来形容犹太人的命运。我反复思考在20世纪建立一个希伯来国家，而这个国家所怀抱的与其说是“明年到耶路撒冷去”这一长达千年的祷告，还不如说是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半世俗半信

神的以色列，同散居各国的“犹太人民”一样反常。在社会学家看来，以色列集团聚集了一批先驱者（这批优秀分子的人数日益减少，而来自近东和北非的犹太人则子孙满堂），他们受从欧洲和被称为发达国家的地区移居来的移民的领导。

在以色列国家的形成和犹太人在各国永久散居这些问题上，没有任何东西与一般的历史性的解释方式相对立。在公元头几个世纪，犹太人与基督教徒差不多。渐渐地，犹太人被驱逐到犹太人区，沦为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夕开始的灭犹运动的牺牲品。渐渐扩大到全欧洲的法国大革命“解救”了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弑神的、被蔑视的犹太人民，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万人坑里，在奥斯维辛杀人的瓦斯房里，丢掉了他们的幻想：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他们可以成为与他们所属的并在那里生活的国家中的其他所有公民一样的公民。正是为了驳斥现代反犹主义（不再是驳斥原本是宗教上的反犹主义，而是驳斥带有隐晦的情感，披着假科学观念外衣的反犹主义），一部分犹太人——大部分是东欧的犹太人——对“民族同化”感到失望，并向往建立一个将是他们自己的国家。亚瑟·库斯勒在一本题为《圣迹的剖析》的书中叙述以色列的诞生，但没有提示唯有上帝和上帝的意志才能使这一事件为人理解。他寻找并找到了各个偶然事件之间不太可靠的联系，使从区区 60 万人里动员来的以色列军队竟然战胜了由所有阿拉伯国家结成的反犹太联盟。

大多数犹太人都觉得同以色列有“亲族关系”，即使他们抛弃了犹太复国主义，并且无条件、无保留地想当另一国的公民，这一事实无论如何不意味着全世界犹太人的“神秘”一致。我于 1967 年 5 月至 6 月 6 日战争前夕写的东西仍然是纸上的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按他的方式来解释在风平浪静的时期

被抑制的感情的爆发。我不禁止费萨尔神父从中得到证据，或至少，从中看到我的“闪米特人特性”的症状。

我认为他弄错了。我只是坚持认为：

亲族关系的感情超越不了世俗史和人类史。数千年的历史在犹太人的心灵深处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些痕迹当中，人们的直觉是，尽管所有犹太人散居在各国，但经历的是同一种命运；当其中一个犹太人团体被迫害时，所有的犹太人团体都感到受牵连，受威胁。当这个团体叫作以色列时，这种在我们眼里不可抑制的、不可阻挡的、可以说是神秘的和不言而喻的“亲族关系”怎能不爆发呢？

在一个非次要的问题上，我向我亲爱的神父投降。当我写犹太人和我的犹太身份时，我有玩弄简单化的两者择一的倾向，即要么是圣律的世界性或以色列使命的世界性，要么是在联盟中暗含的民族主义，不管以色列的使命有什么样的精神意义，是多么微妙和多么真实。在世界性的人类目的性与人类团体的“迷信”之间存在各种人民，各种人民都深信其为人类的共同财富提供并贡献了一份无法替代的珍宝。

犹太人也持有他们的珍宝，但这份珍宝在《圣经》和他们的信仰之外，他们不具有同一种文化。再说一遍，如果他们想作为一种人民，那么这种人民不同于其他任何人民。

作为结论，我重新回到我一直没有解决的矛盾：一方面是存在的价值和方式的历史性的多样化，另一方面是我有时赋予人类的天职。我不放弃人类使命的一元论，我也不放弃各人都认为不可替代的文化多元（理所当然地是对那些靠这个生活

的人来说的)。我喜爱法语和法国文学并没有什么道理可讲，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就是这样生活的。因为它们和我的人格已融为一体了。至于我对以色列的“声援”，究竟应该更多地把它说成是精神上的还是生理上的呢？也许两者都有。不管怎样，这种“声援”提不到圣史的高度和超自然史的高度，我把这个高度的位置留给那些信教者，我则不攀登这个高度。

第四部

※

当官的年代
(1969 ~ 1977)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 罗贝尔·埃尔桑

683

1969年，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和《费加罗报》的动荡历史上都出现了一个裂痕。戴高乐将军在公民投票中被否决后自行隐退。他在1968年就曾想搞这种公民投票，由于乔治·蓬皮杜的劝阻才一度放弃。《费加罗报》由于编辑部的罢工也曾停发两周——这次罢工本身是由报社的股东之一让·普鲁沃斯特与皮埃尔·布里松的道义继承人之间的龃龉引起的。

皮埃尔·布里松逝世时发生的第一次危机就曾动摇了《费加罗报》。1949年报馆的股东科特娜蕾阿尼夫人、让·普鲁沃斯特、费迪南与布里松的编辑们达成的协议，到1969年已期满。这份报纸随后是开始按普通法律行事，还是让编辑部保留1949年的协议赋予它的全部或部分自由呢？

我个人当时认为，普鲁沃斯特必然会希望自己不被排挤出《费加罗报》编辑部，况且，这种要求也是自然的。我曾多次对布里松谈过我的看法，但他每次都回答说：“你弄错了，他对《费加罗报》不感兴趣，他一定会同意修订目前这个协议。”1965年年底，布里松心脏病发作，没有几天就一命呜呼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让谁来接他的班。他任命路易·加布里埃尔-罗比内担任副社长时，曾明确告诉普鲁沃斯特，说这个人不能再提升了。然而，除非从外面另请高明，否则，自然只有加布里埃尔-罗比内能补社长一职的缺。

如今我才知道，原来布里松心里有另一个接班人。不过，

684 他对我从来只字未提，我本人对这种际遇也没有认真想过。对我来说，教书、写书与报纸同样重要。60岁的人了，还要另起炉灶，我难免感到惶恐。主编一份月刊《自由法兰西》，与领导一份日报不能同日而语。

有个人——可能是让·多麦颂——对我说，布里松认为，我最有资格接替他领导这份报纸。为了弄个水落石出，我写信给让的叔叔弗拉季米尔·多麦颂，下面是他回信的主要内容：

……完全准确，我确实同布里松谈起过，在凯旋门广场上他的办公室里，大概是1963年，或者1964年春季。我可以从我50年来一直保存的日报上查到确切日期，可惜它现在不在手边。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我可以去寻找。在这次谈话中，布里松对我说起他的前途和《费加罗报》的前途。他说的大致是：“当承租公司的契约到期时，我也就到年纪了。理智地讲，到那时候我就应该退休了，因为有时候我真感到筋疲力尽了。当然，我也可能继续干几年，领导《费加罗报》。总而言之，到我罢手时，我认为雷蒙·阿隆最有资格接替我。”他没有对我提起其他任何人的名字……（1971年4月1日）

米歇尔·德鲁瓦在他的一本回忆录中记叙了我同布里松的几个朋友共同发起的讨论会，他们也都是承租公司的股东。他写道：“这家报纸所依靠的所有人，诸如学院院士、承租公司委员会委员、社论撰稿人或知名学者、主编，都应邀出席……我们共13人围坐在桌旁。”在这13个人中，我回忆起来的有

弗朗索瓦·莫里亚克、让·施伦贝格、乔治·杜阿梅尔、雅克·德拉克雷泰尔、路易·加布里埃尔-罗比内、蒂埃里·莫勒尼、让-弗朗索瓦·布里松、米歇尔·德鲁瓦和我本人。剩下的4个人，可能是亨利·马松-福雷斯蒂埃、勒内·科拉尔、马塞尔·加比利、莫里斯·诺埃尔。

每个人都发了言，雷蒙·阿隆做了总结，把其他人所表达的意思和每个人的讲话都概括了进去。要从所有有资格接替布里松的人当中找一个思想最权威的人，他的名字明摆在那里。但是，他的性格能使他在这个岗位上干得很出色吗？这一点还不能肯定。不管怎么样，这还不是眼前的问题。这次会议的结果是：通过了也是由雷蒙·阿隆起草的动议，到会的人都签了名，按照原则，可能还要由部门负责人、企业委员会成员、人事代表等会签。动议讲了些什么呢？要点是，如果把报社的资本和领导混为一谈，皮埃尔·布里松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态度十分坚决，但语气毫不盛气凌人。 685

我对这次会议的印象稍有不同。我是带着动议草案去参加这次会议的。我觉得，当时的核心人物犹豫不决。加布里埃尔似乎被布里松给让·普鲁沃斯特的信搞得左右为难。

到会的人是不是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呢？根据我个人回忆，我对此表示怀疑。乔治·杜阿梅尔和让·施伦贝格一向深居简出。莫里亚克过去曾脱离《费加罗报》，现在只算回来了一半，对报纸的命运并不十分关心。我倒确实急于维护这个最有力的论点：1949年的协议应该执行到1969年。布里松曾委

托好友普鲁沃斯特肩负起维护《费加罗报》独立的重任，就是他过去设想的那种独立。“在我和您之后，要挽救《费加罗报》，就必须维持享有其全部权利的承包公司，既不听资本家的，又该同资本家取得协调。”我们不能不尊重他的遗言：普鲁沃斯特在《费加罗报》代表资方，尽管他当记者也很有才华。事先拟好的动议，稍加修改（莫里亚克同意删掉多余的副词“庄严地”）后由核心人物通过，还要经编辑大会通过。

米歇尔·德鲁瓦对我的性格持保留意见，这可能导致他在背后对我有些议论。我没有资格评断自己的性格。实际上，在《费加罗报》工作期间，我也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出来。有几次我记忆犹新，一次是就一篇有关奥本海默事件的稿件同马丁·朔非耶争吵起来，这篇稿子是珍妮·埃尔什拿来的；另一次是因为“排版错误”同罗歇·马西普闹翻了。这两次我都很粗暴（说话上）。我一般都能控制自己，可能有时比较勉强，但686 不时也大为光火。但是，与我经常打交道的一般是经济部的编辑们。据我所知，他们对我的为人并无怨言。

对我当候选人一事的反对，既来自周围的人，也来自我自己。我似乎在前面写过，我同《费加罗报》的某些记者关系融洽，甚至友好，但我还是有点儿不合群。莫里亚克、让·施伦贝格、德拉克雷泰尔、杜阿梅尔留在报社，但不属于报社。这些大名鼎鼎或头顶桂冠的作家不时拿来他们的“大作”帮助闯闯牌子。他们无须同专业编辑竞争。当时，弗朗索瓦-蓬塞与专业编辑较为接近，但又避免同他们竞争。我那时的处境，显然也是如此。

1965年，反对者是否来自编辑部呢？肯定有几个人对我完全是个人意气用事。据说，加比利把有关他的文章和我的文

章的评论或引文一一记录在案；让·格里奥由于加布里埃尔-罗比内的晋升而成了新星，宣称他似乎同我无话可说，而我从来不去讨好加布里埃尔-罗比内。加布里埃尔-罗比内对我的态度始终是“亲热和赏识”。如果他在有机可乘时仍不动心，他就是超凡脱俗了。实际上，他的荣升我也助了一臂之力，他对我无可指摘。我对此感到高兴，觉得并不怎么意外。有两三年，他对我毫不掩饰他的感激之情。

读者对这种漫长纠葛的细节毫无兴趣，而且我本人也早忘光了。听说那些大人物在动议书上签上“大名”以后，由让·普鲁沃斯特与布里松的编辑班子继续谈判，这个编辑班子经常是由乔治·伊扎尔出面。布里松的编辑班子掌握着一份法律文件，我认为是站得住脚的。这就是那个为期20年的协议，布里松虽然去世了，但1969年以前的协议仍然有效。

经过谈判而最后达成的妥协，没有赋予加布里埃尔-罗比内以布里松过去享有的全部权力和好处。承包公司董事长由德拉克雷泰尔担任。如果我的脑子还管用的话，我记得布里松可得到公司利润的5%（其余95%归股东）。这5%的利润被分掉了，德拉克雷泰尔得到一份，加布里埃尔-罗比内毫无所得。后者向我提起让·普鲁沃斯特讲过的一句话：应该论功行赏（德拉克雷泰尔什么也没干）。

687

在布里松逝世后，我就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扪心自问。我反对让·普鲁沃斯特进入报社，这做得对吗？有好几年，我竭力维持《费加罗报》的独特地位，即让报社的股东承担财政责任，但又禁止他们对编辑有任何干涉。从理论上讲，我赞同这样一种安排，但这样做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在所有国家都是必需的，另一个是法国独有的。

一旦报纸经营亏损怎么办呢？近几年来，《泰晤士报》就遇到了这种不幸。这份著名的伦敦日报不仅是英国的或伦敦的报纸，而且是世界性的报纸，可它最后还不是到辽阔的英美世界去找到一个澳大利亚人答应帮助弥补亏空吗？《费加罗报》设在巴黎，刚刚成为全国性报纸，却不仅不能向股东伸手，还要给他们赚钱。另一个困难虽不是物质上的，但更为深刻，我认为这是法国特有的。在英国，主编就是报纸编辑部的负责人，一般来讲，对股东有自由行事的权利。而在法国，社长或主编往往没有这种权利。在我国，报社老板虽然不会每天过问管理和编务，但是他希望甚至要求报纸的见解与他的好恶大致相同。老板同编辑部负责人的会谈本身就很尴尬，三句话不离本行，离不开报纸的两重性，既是商业性企业，又是新闻工具或舆论工具。

与让·普鲁沃斯特谈话，性质略有不同。这个老板不把自己看作资本家，而是社长或报社主编。他创办、支持、领导过几个刊物的编辑部，他做这些比管理一个行政机构或管理企业的财务更加在行。作为记者或编辑部主任，他不愿意只担任资本家的角色。如今，当我回过头来浏览一番《费加罗报》从1965年到1982年江河日下的景象时，我开始怀疑当初我是不是做错了。不管怎么说，结局不会更坏，如果1965年普鲁沃斯特就进了报社，结果可能会好一些。

布里松逝世的翌日，我为何如此坚决地反对普鲁沃斯特的要求呢？他并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只知道他是一个真诚的、忠心耿耿的“老板”。对他的“新闻检查”，我没有什么好怕的，我的声望足以摆脱这一类危险。我之所以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我还记得布里松的话。当普鲁沃斯特在布里松断

气48小时以后提出愿意效力主持报纸时，我立即做出反应，并再三说：“不行！不行！”布里松一生中所拒绝、所反对的事，哪能由他完全信任的人旦夕之间便一口答应下来呢？

我从来没想过要坐布里松的位子。我认为，除了加布里埃尔-罗比内，别无其他人能接替，除非从外面另请高明。提到过的几个人选，我连他们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无论是蒂埃里·莫勒尼还是我本人——当时报界认为我们“有可能”出山——我们都不反对那个“可能性最大”，或不如说“没办法只能是他”的人，也就是过去布里松认为无力由副社长升任正社长的人。布里松早就预言，当二把手，可以，当一把手，不行。不幸被他言中了。

我表态支持加布里埃尔-罗比内，也不是没有一点儿犹豫和担心。他的人品比他的名声或文章还要好。私人交往中，他不乏幽默，尽管有些过分爱好文字游戏。他的文化素质并不表现在他“写的东西”上，那些东西多数是随大流的，反映了本民族的机敏，不过这种机敏有真有假就是了。记者们对他并不崇敬，有时，他的朋友不得不劝阻他发表某篇过于简单、过于幼稚的反共社论。这类社论对《费加罗报》和他的个人威望都没有好处。最后，如果他担任了他本人可能根本没有想到的最高职务，他的健康状况也不允许他像他的前任那样正常来上班。从1965年到1969年，报纸的发行量继续上升，但布里松逝世后把这份报纸的精神和灵魂也带走了。编辑部分裂成几个集团、地盘或小圈子。在最高领导层，缺乏一种能够启示人的思想，甚至没有一条政治路线。诚然，《费加罗报》始终是中右势力和传统多于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喉舌。

在加布里埃尔-罗比内之下，从理论上讲还有同级的两个

主编——让·格里奥和让-弗朗索瓦·布里松。前者渐渐压倒后者；加布里埃尔-罗比内经常不来，本来应该由他们两个共同负责的，让·格里奥却一个人承担起领导的职责。我认为，这就表明每个部门，甚至每个编辑都可以自行其是。在有关对外政策或经济政策方面，我并不认为报纸的领导人下过什么指示。因此，一篇文章与另一篇文章明显冲突的情况层出不穷。录用新编辑也有点随心所欲，新鲜血液并没有使衰老的《费加罗报》增加青春活力。它非但没有更年轻，反而更不协调。

1964 ~ 1965 年的危机在 1969 年重演：编辑部拒绝了普鲁沃斯特要求取消承包公司的决定。接着，在选举董事长的前夕，为期两周的罢工爆发了。我可以说是没有介入这次冲突。这几年的个人经验告诉我，对于这份报纸继续遵循罗比内体制的可能性不要抱太大幻想。我同进行这场斗争的“勇士们”保持了距离。

1965 年，布里松的编辑班子与普鲁沃斯特达成暂时协议后，编辑部选举我担任编辑公司主席。从当时的情况看，这种选举结果是明智的，顺理成章的，因为在“署名文章的大人物”中，我有资格（也许值得怀疑）充当“反对派”的头领。由于受到一种“论资排辈”的观点的支持或大力鼓动，这次当选实际上是出于一种误会；我采取反对普鲁沃斯特的立场，是由于坚持布里松的事业的一种本能反应。普鲁沃斯特天真地以为，这样就可以维持报纸编辑部的稳定性，至于报纸的独立性，他本人可以担保。我认为“编辑公司”是必要的、正常的，但我并不像它的创始人，特别是像德尼·佩里埃-达维尔那样，把它看得多么重要。这些人设想有两个目标，即维护《费加罗报》的地位，同时不仅让本报编辑承认“编辑公司”

的合法地位，而且让所有报纸都承认。

虽然我与编辑公司董事会的成员关系融洽，谈得来，但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在精神状态、最终目标和个人好恶上存在差距。实际上，即使不担任任何有权的职务，在管理委员会的同行眼里，我也更接近上层而不是普通编辑。我已意识到这种误解，但不想自动退出，我在等待提出辞职的时机。1967年，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

我已经说过，编辑公司作为一个实体，希望在法律上和事实上得到承认。它试图得到某些承认的标记。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能不能把我的名字列入“公熊”一栏（报上每天刊登主要出版负责人的一栏）。普鲁沃斯特同意把我的名字补充列入承包公司董事成员之中，但不标出编辑公司董事长的头衔；我不能以这种身份而只能以个人身份参加。我说开这种先例将会形成司法判例。雷蒙·阿隆参加了承包公司董事会，但同时又有了董事长的身份。我无法说服董事会的多数成员。我可以辞职，既不引以为憾，又无苦衷可言：这些编辑自己也希望由他们其中的一个来代表他们。

在为期两周的罢工期间，我不时来报社，有时见见编辑公司的领导人，有时找加布里埃尔-罗比内和他的参谋班子。有一次我漏掉了去拜访其中一方，罗比内便怀疑我串通编辑公司搞针对他的阴谋。有一种流言说股东们将和布里松的编辑部达成协议，让我出面担任领导，我对此毫不介意。《费加罗报》的领导核心和编辑公司确实曾建议贝甘和普鲁沃斯特任命我当社长。实际上，他们也毫不怀疑后者的答复一定是否定的。他们提出建议便可以充当好人了，谁也摸不准我会不会接受这个使命。编辑公司董事会的两个成员曾来会见我，对我说明了他

们的意图。我急忙表示我要再三斟酌才能回答，但我接着说普鲁沃斯特可能会拒绝。如果加布里埃尔-罗比内预料到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他会帮忙出把力吗？加比利和格里奥的态度如何呢？最后，我个人还是给普鲁沃斯特写了一封信，信中明确指出，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才有可能接受领导职务：我必须同时得到他本人和编辑部的支持。我认为，如果名义上的股东们和掌握经营权的人之间不能恢复真正的协调，在目前这种紧张气氛下，报纸是不可能重新振作起来的。

在这件事上，我也不愿意赘述冲突的细节来让读者厌烦了。格里奥变成了普鲁沃斯特的宠儿。一旦有机会，他就会另找“靠山”。阿姆兰当时正主持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有一段时间几乎就要登上这座圆形建筑物的金交椅了。他是普鲁沃斯特的人，他向“老板”信誓旦旦，作为管理委员会主席，他可以当报纸的领导人，他能够使记者放心。^① 在5月22日至23日夜间，由于普鲁沃斯特的苛求，经过各方煞费苦心达成的妥协被搁浅了。普鲁沃斯特要阿姆兰做出“补充保证”：

股东会主席让·普鲁沃斯特与管理委员会主席让·阿姆兰，在前者认为与报纸生命攸关的三个决定上必须互相协商并取得一致：有关报社各部门的费用预算的决定；有关人员录用或解雇的决定；各种薪俸的确定。如果你在这三点上拒绝我的决定，就等于不仅同意剥夺我的所有权，而且不许我本人作为记者留在《费加罗报》。

① 他当时领导广告部。

让·普鲁沃斯特的信发表在5月24日星期二的报纸上，这段摘录再次表明了冲突所在：让·普鲁沃斯特感到自己不仅作为资本家，而且作为记者被排挤出报社；贝甘是个地道的资本家，他既不情愿，但也无反感地接受了多数记者的要求，即答应3个记者代表在管理委员会内有阻止权。委员会由6个股东代表、2个报纸行政机构代表和3个记者组成，凡属重大决定（例如，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必须由11名委员中的9名多数通过，这就等于任命总经理也要经过记者代表同意才行。围绕管理委员会内部出现不同意见该如何仲裁这一问题，他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但最后的失败应归咎于普鲁沃斯特的苛求；贝甘也撤销了对他的支持。《巴黎竞赛报》创办人对纸张和糖业大王说这是报业资本主义，过去他们曾长期合作，此次却当面指责其是资本主义的报纸。过去，贝甘曾让《费加罗报》刊登过一篇关于制糖工业的文章。

两个东家的不和使罢工延长了，弄得贝甘不得不聘请一个临时法律管理人从名义上来领导报纸，直至达成最后协议。在此期间，布里松的班子对股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并获得胜诉：布里松的章程在他死后仍然有效，因为这个班子留下来的几个老人合法地要求执行1947年2月28日法令。

两年之后，普鲁沃斯特终于容忍报纸拥有与他在1969年拒绝同意的近似地位。股份有限公司与管理委员会继续保持区别。管理委员会包括一个监事会和一个领导机构，领导机构的负责人由监事会选举产生，行使领导职能。在监事会上，编辑部代表对领导机构负责人的人选有否决权。

1974年2月，加布里埃尔-罗比内逝世，让·多麦颂走上舞台。普鲁沃斯特提名让·多麦颂担任领导机构负责人。开始

时，我对这种挑选感到奇怪（因为让缺乏记者经验和政治修养），当他来拜访我时，我盛情接待了他。他也问我想不想当领导。我再一次答复他，我没有这种奢望。况且，我还要在法兰西学院教课，此外，这几年我目睹昔日享有盛名的报纸正在衰落。但是，我答应在这件事上支持他，在记者大会上维护他的事业。他会不会指望我提出与上述不同的理由呢？我劝编辑部对这个未来的领导人大可放心，因为谁也不认为他在政治方面或经济方面有什么固定的或独特的见解。他是法兰西学院院士，既属保守派又算自由派，这个形象同《费加罗报》很相称。

在我同他几乎天天合作的几年中，我不记得有过任何争吵，尽管有几个记者竭力想挑起事端。他们曾宣称这是注定会发生的：“由于阿隆的‘性格’，你没法同他共事。”让在巴黎有成百上千的朋友，我不知道他有什么真正的仇敌。他是个身心舒坦、情绪外露的乐天派。他知道自己出身名门，但遇到那些可能对他的大家族派头不太乐意的人，又善于忘掉自己的出身。他对生活和已拥有的东西都很满意。他由于取得一连串轰动一时的成就（出版《帝国的光荣》，进入法兰西学院和《费加罗报》）而心满意足，他用罗比内的风格而不是布里松的风格领导《费加罗报》。他不看这份报纸，因为它同其他报纸一样，由于版面过多，纸张同新闻的数量（当时是质量）不成比例，变成了一个庞然大物。他不时写几篇政治社论，在我看来，这些社论议论过多，但也显示出他出色的文笔。他表面上十分谦逊，对我除了表示对老校友的尊重以外，还十分赞佩。然而，世代隔阂把我们分开了，估计他觉得我有时十分傲慢，但他从未流露出不满。或许，他对此一笑了之。他同我比起来，在历史和自然方面占优势，但作为哲学家和政

论家，我比他又略胜一筹，他对此没有什么不快。还应说明，他对我抱有真诚的友谊，当然，在他的众多宾朋中也不算与众不同，但友谊是真诚的。

有一次或两次，我生了气，或不如说，有点不耐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问题是有点典型的。那次是要介绍米歇尔·莱格里的一本讨论和反对《世界报》的书，任务当然落在我头上。要我去做冒犯意大利人街^①的批判，有朝一日，我要是出一本书，后果可想而知。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或之后不久，让·多麦颂写了一篇长文赞颂维昂松-蓬特的一本书。也许他确实喜欢这本书和它的作者。他不赞成两家报纸互相争吵。他主持《费加罗报》，但不愿与《世界报》唇枪舌剑。我没有领导《费加罗报》，就该由我来进行论战或战斗。再者，说得公平一些，谁在政治上没有敌手，谁就会贬低自己的身价。

在我看来，某些记者散布流言蜚语，千方百计在我们之间挑拨是非是幼稚可笑的，也是枉费心机的。如果我写一篇有关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的长文，而恰好让·多麦颂已经提到过或者评论过这两个持不同政见者，我就怀了司马昭之心，“我是拖过被子自个儿一个人盖，抢了他的好题目，甚至有意驳他的面子”。报刊编辑部胜过英国大学的教师公寓，都是毒蛇麋集之所。记者们对自己的地位不太有把握，像所有文人一样自尊心太强，随时注意别人的评论，同其他人比较，更受不得一点儿刺伤。应该承认，报社的气氛渐渐变坏了。1969年罢工期间表现出来的那种团结掩盖了派别之争，特别是社长同编辑公司的活跃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

① 《世界报》报社所在地。——译者注

695 这些活跃分子追求的那种意识形态，已经超出《费加罗报》的具体范围。诚然，他们想维护这份报纸在战后特殊条件下取得的地位，但他们对编辑公司的作用也同样重视。在一个杰出的律师的支持下，他们竭力争取在布里松的编辑班子对股东们的指控中作为一分子而取得诉讼的权利。加布里埃尔 - 罗比内根本不关心编辑公司；他过河拆桥，不止一次把它当作包袱。而这个编辑公司对他们的领导人也无好感，在这些毕业于新闻学校的青年看来，他是老滑头、反动分子。

同《世界报》比较，记者们也不高兴。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费加罗报》的发行量还超过这份晚报，但在知识界和教育界中已经竞争不过它了，甚至在政界和社会名流中也一样。当时被当作思想大师的人（以萨特为首）可以说想把不属于左派的人一概逐出知识界，尤其是《费加罗报》的编辑们——由于这种身份，他们被指责，遭白眼。

1975年，让·普鲁沃斯特在银行的压力下，只好卖掉《费加罗报》。当时他已经买下了贝甘的一半股份，就成了唯一的股东。据说由于纸张价格猛涨，《费加罗报》在1973年和1974年蚀了本。办报实际上就是做生意，今天我才相信这一点；而在1975年我还不懂得。《费加罗报》在巴黎每年减少几千名读者，1977年以来，发行量持续下降。我脱离报社时，巴黎地区发售量仍在9万至10万份。后来，变动幅度维持在1万份左右。

有三个买主相继出现，他们先后来拜访我。先是安德烈·贝当古，再是让 - 雅克·赛尔旺 - 施莱贝尔，最后是罗贝尔·埃尔桑。第一个是在当政人物的推动下来的，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害怕并且反对别人强加于他的这项任务。他不懂新闻，

也不相信自己能领导一个编辑部，更谈不上如何应付解雇记者和改变他们自己定的报酬了。我们谈得很投机，我可以肯定他不会把自己的命运和行动放在他认为冒险的事业上。

接着我又见赛尔旺-施莱贝尔。在以后几年中，我同他的关系有时友好，有时紧张。他年轻时在《世界报》写过几篇精彩的文章，当时是他自己找上门来的。我对这个思想活跃、充满自信、要干就干出名堂的人颇有好感。他创办《快报》周刊时向我谈了他的打算，并提出有可能的话就合作。《快报》周刊有时对我友好，有时对我冷漠，这要看在什么事情上和这个社长的心情好坏了。1975年，他竭力取悦于我。他对我说：“20年前在报刊上只有两个人的分析文章有分量，即莫里斯·迪韦尔热和您；如今，只剩您一个人了。”（当时迪韦尔热很少在《世界报》上写文章。）我盛情款待了他，并向他保证我绝不会反对他来报社当股东和社长。我向他保证，我至少可以保持中立，也可能给予积极支持，但我对他能否成功抱有怀疑，我说话直截了当。尽管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有过风波，但赛尔旺-施莱贝尔在我眼里仍是难得的报人之一。他有能力使萎靡的《费加罗报》振作精神，也能够由于好挑逗，使我们的读者觉得不成体统，而一下子丢掉几千名订户。让·普鲁沃斯特没有忘却，也不愿原谅同他打过的一次不成功的交道，断然拒绝了《快报》周刊社长的建议。

罗贝尔·埃尔桑也来看我，谈了近一小时，给我留下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我对他的印象同这个报业巨头在公众中众所周知的形象相反。他手里有两件法宝，一件是别人无法否认的，另一件是谁都不承认的：一是他的机智，二是他的魅力。罗贝尔·埃尔桑善于运用魅力，首先得力于嗓音好听（至少是在

他能控制自己，避免以势压人的时候)。他圆脸蛋，像婴儿一样白里透红的健康肤色，金发碧眼，一下子就使人感到可以信赖：这是一个好伙伴，宜于一起工作，更宜于觥筹交错。然而并非如此，不要抱幻想：偶然碰到一句话或一点儿小事，他一下子就暴露出自己的好色、易怒，这是他个性中两个最鲜明的特点。

自然，对他在战争期间的所作所为，以及与法律和国民议会的纠葛（他有一次被取消候选资格，后来又在瓦兹省选民的支持下重新当选），他含糊其辞。他的意思是，在这些问题上他有好多话要说，有朝一日将讲给我听（但并没有讲）。但初次会面，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他的优点还是超过了缺点。几年以来，《费加罗报》没有人领导。加布里埃尔-罗比内衰病龙钟，已领导不了编辑部。依我看，管理部门比编辑部也好不了多少。埃尔桑曾创建了一个报业王国，他的成就绝非出于偶然或碰运气。也许他能制止这份报纸的衰落；报纸就只剩下招牌了。

我在做出决定之前，曾去求见共和国总统和内政部部长。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我保证严守秘密的条件下，把埃尔桑的资金来源告诉了我（我不认为他的消息是完全的）。这次谈话再一次使我看清，政治家们的公开讲话与即时反应是有差别的。总统暗示我，《费加罗报》不配享有目前这种自主地位。他显然关心有时矛头针对自己的批评，但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报刊的反政权职能完全漠然视之，他还不止一次巧妙地著文论述过这种职能。《费加罗报》的精神权威和声望，比某一篇文章是否循规蹈矩或不太恭顺重要得多，但甚至于德斯坦在私人谈话时，似乎也不理解这一点。罗贝尔·埃尔桑获得

《费加罗报》的经营权，就打击了报纸的非物质资本，这正是这份报纸的象征，而他却不予理睬。

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允许我看一份内政部有关埃尔桑的简要材料。战争年代的材料对我用处不大。况且，宣战时埃尔桑只有20岁，他年轻时犯的“错误”不能给他定终身。所犯轻罪既然已被赦免，就不再影响犯罪者的名誉。

最后，我赞成让·多麦颂的立场，并且引用了他在1975年6月3日所发表的文章的一段话：

在这种比较复杂的、仅仅加以概括说明的背景下，我愿意支持这种看法，即罗贝尔·埃尔桑虽有许多不足，但他至少有两张王牌。首先，与那匹哲学家的千里马——它虽然十全十美，但并不存在——不同，我宁愿相信罗贝尔·埃尔桑先生虽有很多毛病，但他至少确实存在。目前，只有他能够把《费加罗报》的行政管理担当起来。同不存在和有落空的危险相比，有人在就是一种优势。其次，还必须看到，《费加罗报》大名鼎鼎的章程，也就是它的《圣经》，承认编辑享有许多权利，尤其是他们可以反对任命某人当社长。但是，这种章程的意义本身，就是保证资本家与编辑部要分开。允许编辑部有审查股东的权利，同时不就是授权未来的股东来审查编辑部吗？……罗贝尔·埃尔桑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已经讲清楚了；我没有去调查他的言行。我已经被揭露他的各种小册子淹没了。在这类书面的或口头的论调中，很难分清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宣传或诽谤……由于得到大赦，罗贝尔·埃尔桑成了人民选出的议员。我们难道应该比共和国法律和人

民的意志更苛刻吗？

如果让·普鲁沃斯特不放弃把《费加罗报》的股份卖给罗贝尔·埃尔桑的意图，那在 295 人中有 118 人投票宣布将罢工，虽然还是少数，但有一定实力；如果让·多麦颂和我本人加入可能的罢工者行列，就可能变成多数。爱丽舍宫和马提翁宫^①暗中施加压力支持这个报业大王。他是靠《日记报》发迹的。随后，他又把十几份地方小报弄到手，创办了几份专门刊物（《帆》等）。最后要是得到《费加罗报》，他就可以功成名就、登堂入室了。不久前他买下《巴黎 - 诺曼底报》，成了他征服巴黎的最后一级阶梯。

我个人的决定将带动让·多麦颂的决定（除非是他带动了我），同时也将影响整个编辑部的决定。我不能肯定这一点，但我不愿逃避自己的责任：说心里话，我对于把自己算进 118 名赞成罢工的人之中，还是算进 177 名反对罢工的人之中，也是思绪紊乱，难以定夺。我若投反对票，就会动摇让·多麦颂投赞成票；而事实上我们做出了相同的决定，而且是一起做出的。同其他场合一样，想到我上次做出的决定，我受了很大影响。1965 年，我做了布里松的朋友们的带头人，他们支持加布里埃尔 - 罗比内，迫使在稍作修订的条件下延长 1949 年的协议，也就是说，维持承包公司到预定期限。在 1969 年的纠纷和罢工中，我支持了编辑部，但也没有什么劲头，没有起积极作用。我没有想过我会担任报纸的领导，就算让·普鲁沃斯特居然接受了《费加罗报》的一致建议。1975

① 法国总统府和总理府所在地。——译者注

年，至少从表面上看，问题已经全然改变了，因为罗贝尔·埃尔桑已保证尊重《费加罗报》的章程。记者们僭取了监督股东决策的权利。然而，他们在纸面上拥有的权利，不过是冻结管理委员会的监事会的某些决定的权利，特别是在任命领导机构主席，其实就是报纸的负责人方面。让·多麦颂明确指出他们弄错了，但无论他和我，都不会天真到相信罗贝尔·埃尔桑的口头许诺。他答应尊重 1971 年妥协决议的条文和精神。一个“办报的实业家”，外加是一个议员，有可能长期不对编辑部和报社的行政管理施加影响吗？

为什么在 1975 年我认为不能再来一次 1965 年的那种斗争了呢？10 年前是否占了理，我已经没有把握。当时，光是为了忠于布里松，我就振振有词地起来反对普鲁沃斯特。编辑部已经慢慢地解体了，从物质到精神上都是如此。编辑公司董事长佩里埃-达维尔所领导的活跃分子，主张继承布里松的学说而不要他的遗产：出售一家新闻企业，不能像出售一家商业企业一样。罗贝尔·埃尔桑作为一个人，不能收买《费加罗报》，这是一笔精神产业，不能像一家钢铁厂或电子厂那样买进卖出。这个学说很可爱，但不容易变成现实。除非记者们自己拥有资本，否则就必须有股东。如果所有权属于一个工会或政党，自由的余地就更加会被缩小。勉强的解决办法也有，那就是英美国家的办法：由东家挑选一个主编，让他根据惯例、舆论和体统，享有广泛的自主权。

1975 年，还有别的理由促成我支持埃尔桑这个“候选人”。尽管直到最后还有不少谣言，但没有出现任何其他补缺的人。即使发生一部分记者罢工，也不一定能阻止出售这份报纸。罢工只能表现这样一种真实状况，即布里松的原班人马

中，只剩下几个人多少还有资格保留着他的传统。编辑部的团结一致已成为过去或一种神话。争权夺利，文人相轻，唇枪舌剑，造成报纸内部不团结的各种原因，彼此火上浇油，加剧了多种恶果。《世界报》蒸蒸日上而《费加罗报》每况愈下，记者们深感羞愧。关于今后走什么道路（中右？右翼？还是中左？），意见发生分裂，于是一部分人反对某一个人，另一部分人则反对一种做法，象征了精神破产和财政破产。我应该同哪些人站在一起呢？同德尼·佩里埃-达维尔及编辑公司的战士们站在一起？还是同主张《费加罗报》持中左立场的那些人站在一起？抑或同布里松留下的几个老报人站在一起？后者既计较养廉干薪，又依恋一个不复存在的报社的老框框。《费加罗报》在国家生活中将继续占有一席之地，可能作用有限，但必不可少。左思右想，多麦颂和我决定冒险让埃尔桑试一试，这样做并没有错。

领导机构——此后我也是其成员——每周聚会一次。因此，我经常见到罗贝尔·埃尔桑。老实说，我确实对他的天赋感到惊奇。不管涉及什么题目，我从来没听他讲过蠢话。整个领导机构承担起吃力不讨好的事：解雇职员（其实，解雇的必要性并不像以前想象的那么大）。领导机构讨论时往往像时断时续的聊天（就是桌上只有几瓶矿泉水，缺几瓶酒，否则真仿佛坐在咖啡馆里了）。埃尔桑并不太重视这些例行会议，尽管有些重要决定（在报纸事务的范围内）是在这种会上做出的，例如，谁去华盛顿，谁去罗马，谁去波恩。

在这段时间里，埃尔桑丝毫没有干预编辑部的工作，尽管他立即把他的“亲信”，或不如说把他的“笔杆子”（除非他

必须在自己写的文章上署名) 查理·勒布瓦安插进了编辑部。《费加罗报》搞民意测验时, 他插进几个问题, 并按照自己的方式——这种方法至少是值得商榷的——阐释了民意测验中提供的几种答案。这是一种客串编辑的幼稚, 还是肆无忌惮的操纵呢? 围绕埃尔桑本人撰写的一篇关于全球政策的文章引发了第一次冲突。他阐发了一种观点, 即苏联由于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威胁, 今后要保障其西部的安全, 因此要加强对欧洲国家的控制, 特别是通过社会党和共产党联合执政, 来控制法国。这篇文章同其他许多文章大同小异, 不好也不坏, 属于那种茶楼酒肆之作。1974年, 苏联对吉斯卡尔确实表示出某些好感, 对密特朗则不然。文章的质量如何, 无关宏旨, 问题在于他打破了禁忌, 东家干了记者的事。

这时候, 我还是主张忍让。我们曾抱着希望担保, 埃尔桑会照规矩办事。我们能够拒绝一篇只要东家不署名就可以发表的文章吗? 至少在我看来, 他不可能常常拿撰写社论来练笔(我要补充一句, 他收到了近50封读者来信, 多数是赞同的)。乱了几天以后, 让-弗朗索瓦·布里松离开了报社。他堪称刚正不阿的楷模, 为维护和发扬其父的传统尽了全力。他为反对普鲁沃斯特的擅权行为作过斗争。在报社的领导层中, 他是唯一希望我重新担任领导的人。他是不是听他父亲讲过弗拉季米尔·多麦颂讲过的话呢? 我并不认为如此, 如果他确实听到过这些话, 他会说出来的。我曾试图挽留他, 但没有用。我错怪他了, 因为正好两年之后, 我也步了他的后尘。

1976年, 罗贝尔·埃尔桑要求主持管理委员会, 也就是领导报纸, 这又引出新的冲突。尽管经过监事会投票通过, 他

愿意尊重 1971 年协议的条件，但他确实侵犯了这个协议的精神实质。这个决议甚至要求领导机构的主席必须是一名记者。（1981 年社会党人获胜以后，在记者工会的催促下，法院命令埃尔桑拿出记者身份的证明，并判决他在未提出这个证据前每天罚款 2000 法郎，但法院尚未提起上诉。）

702 如果让·多麦颂和我本人召集编辑公司开会并展开辩论，那么，经过净化、重新改组的不协调的编辑部，不管怎么样，也许会追随我们。监事会中的编辑部代表同意任命埃尔桑担任领导机构的主席，实际上就等于赋予老板以大权，而这种大权是股份有限公司与管理委员会分治而禁止给他的权力。因此，至少从理论上讲，这是必须起来抵制资本家掌握一切权力的时刻了，甚至是最后时刻了。让·多麦颂倾向于抵制，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也就是说，如果他失去领导机构主席的位子，他就丢掉了名义上握有的领导权力。这一次，我仍然可以使天平倒向这边或那边。在我看来，《费加罗报》内部重新开战是过时的东西，归根到底，没有意义。

为了什么，为了谁，进行一场反对老板（或资方）对报纸的内容施加一些影响的斗争呢？为了维护布里松编辑班子的精神权利？这个班子的成员已经所剩无几，都退休了，还能代表什么？德拉克雷泰尔、阿姆兰、加比利、肖韦已经不为报社做任何工作了，他们代表不了布里松要求的价值观，许久以来，他们早就不能为报社承担精神保证的作用了。至于多麦颂，他只勉勉强强领导编辑部，对管理工作，过问更少。如果我们拒绝埃尔桑担任领导机构的主席，他不会甘认失败；这种紧张局面将延长并损害报纸的最后一线希望。从我个人来讲，我拒绝介入一场新的冲突，这场冲突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布里

松班子中上述四个人的权力和让·多麦颂名义上的权力。

说老实话，如果局面变得无法容忍，我宁可自动撤退，也不愿为了保留我们的地位而步步为营地战斗。从这种立场出发，我认为埃尔桑不可能答应如同普鲁沃斯特那样近乎被排斥在外的处境。既然他已经一步一步把《巴黎-诺曼底报》弄到手，他还会尽力采取同样简单的策略来征服《费加罗报》。他将依靠自己的盟友站稳脚跟，收买某些人与他合作，拉拢一批，供养一批，让所有人都知道，不是他们的顶头上司，而是他，只有他一人能够决定他们的命运。

703

让·多麦颂在他的一本书中叙述了我如何脱离《费加罗报》和在该报的最后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但奇怪的是，他在书中避而不谈这场结局的开头和我反对埃尔桑的第一幕。我们三个人在内伊大街上让·多麦颂家中一起吃饭，我们心平气和地讨论1978年立法选举的前景。埃尔桑提出，如果左派获胜，他准备采取什么措施，以便维持他掌握的各种刊物。接着，我们又谈到选举前几个月该怎么办，我向他建议——语气中丝毫没有挑战或要求的味道——让我切实履行政治领导的职能。从9月休假结束到次年3月的选举，还有9个月，我对他说，我愿意在此期间名副其实地干起来，每天来报社，切实掌握《费加罗报》的方向。让·多麦颂可能对我的要求感到不快，因为这种要求似乎会侵犯总领导人的权力。但我不认为他会采取这种态度，因为他承认我年高德劭，还可能承认我是善于写政论文章的“行家”。他本人则自诩为“职业”作家或小说家。当然，《费加罗报》也给他带来乐趣，社长一职使他的自尊心得到了某种满足。如果我参与日常编务工作，他将乐于与我合作，如果出现某些分歧，他会出面解决。

这个建议居然被埃尔桑驳回，真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要自己负责政治领导，我将定期写社论。”我的回答也很强硬（我想不起我具体讲了什么话），过一会儿我就离开了，因为在巴黎的另一头，我在人文科学之家大楼还有一个约会。这一下我发火了，因为他对我失去了信任，特别是他自己打算当《费加罗报》的社论撰写人。这一回，什么政治理由和效率理由都不必提了。摆在我面前的唯一出路是，自动退出。

704 在随后几个星期内，我要求晋见共和国总统。我见了雅克·希拉克，走访了几个知名人士。我对他们每个人说了同样的或类似的话：罗贝尔·埃尔桑对我表示过，今后他要自己写社论。如果他不让步，我就离开《费加罗报》，而且让·多麦颂会跟我一起走。他一直向我保证，如果我走，他也不会留下来。然而，《费加罗报》虽然衰败，在政治斗争中仍是一个无法取代的论坛。当这份报纸被拉入埃尔桑的王国时，它已失去一部分威信。如果它变成瓦兹省议员的喉舌，它就会更加空洞无物。因为我走了，让·多麦颂走了，其他人再仿照我们，那么香榭丽舍圆形广场上的这家报社剩不下什么来了。

我要再次指出，这段插曲——吃饭的时候，埃尔桑申明他要自己撰写社论——没有写入多麦颂的叙述之中。至今我还奇怪，他为什么会忘记这一点或故意避而不提？反之，他却杜撰出一出三个人的巴黎悲剧——三个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的神经是完全正常的。他写道：

雷蒙·阿隆和罗贝尔·埃尔桑只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以为只要别人多听听他们的意见，事情肯定就会越来

越好办。他们两个人的特征是——应该说表面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都有点好大症和妄想症。而我呢，不如说是精神分裂症患者或至少是癔病患者。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罗贝尔·埃尔桑一心想当共和国总统。雷蒙·阿隆倒不那么痴心妄想，但也不甘心自己不当法国的基辛格。让我马上说了吧，如果我是戴高乐、蓬皮杜或吉斯卡尔，我就选阿隆当君主顾问。假如我是法国人，我也不能完全肯定我会选举埃尔桑担任国家首脑。

这段引文饶有兴味，但同事实相去太远。谁也不肯承认自己害了“好大症和妄想症”。而且让·多麦颂既没有患精神分裂症，也没有害癔症。听他这么一说，他的唯一奢望就是想叫罗贝尔·埃尔桑和雷蒙·阿隆一道工作。但问题却发生在内伊大街家中的谈话之后，这次谈话奇怪地从他记忆中消失了。我只要求给我几个月，让我从政治上影响《费加罗报》，根本没有想到要一直干下去。正如他写的那样，我从来没有提出要当领导机构的主席。我已经 72 岁了，何苦再当这个主席。如果我要求得到或者认为我能够得到这个职位，恐怕我便真的患了妄想症。我所要求的，是罗贝尔·埃尔桑至少应该答应，他不会同让和我一起轮流撰写政治社论。

705

这种反应完全是个人的，不知是否表示得太晚或太早了？听让的口气，或者像他的兄弟——他的高参对他讲的，我们本来应该挺身而出，反对埃尔桑出任领导机构主席。既然我们已经让他坐上了皮埃尔·布里松和加布里埃尔-罗比内原来的位子，我们凭什么同他争夺这个职务带来的特权呢？这一条在法律上站得住脚。当然，如果埃尔桑允许让和我分别顶着总领导

人和政治领导人的头衔，就等于放弃了他的前任们拥有的某些特权。埃尔桑虽然拥有议员资格（他从来不出席国民议会会议），但别人首先是把他看作报商、资本主义的报业大王，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社论撰写人。让·普鲁沃斯特从来不写社论。因而，埃尔桑的这个念头或计划，对报纸或我本人，不啻是当头一棒；从合法权利上讲，没有任命他当领导机构主席那么沉重，从精神上讲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曾把我的担忧告诉过一些大人物，他们对《费加罗报》再次出现的危机兴趣不大（只有雅克·希拉克除外）。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知道罗贝尔·埃尔桑的竞选计划：放弃瓦兹区，到阿希勒·佩雷蒂放弃的选区去碰碰运气，因为佩雷蒂已经由埃德加·法佛尔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共和国总统曾劝阻我——如果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不要离开《费加罗报》，但我觉得他对问题的实质并不关心，即几个象征性人物一走，会给这份报纸造成多大的智慧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损失。只有雅克·希拉克承认这项论据的分量，他威胁埃尔桑说，如果他把《费加罗报》的“文人”逼走，保卫共和国联盟就不支持他。实际上，埃尔桑已经获得保卫共和国联盟的正式提名。玛丽-法朗士·加罗夫人在电话里曾对我大发雷霆，当时我告诉她，我支持佩雷蒂的替补候选人达尔古尔夫人。后者拒绝执行保卫共和国联盟总部的命令，轻而易举地击败了本党原来指定的那个候选人。埃尔桑老板在别处的拿手好戏——让“老头子卷铺盖”——在一个如此富裕的选区中没有吃得开。

尽管我有点妄自尊大，但对于我的离开将给《费加罗报》的未来造成什么后果，我却从来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我还需要学学乖的话，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就是我的前车之鉴。报馆中

不管哪个德高望重的同人要走，都不会带走一批读者。我一走就削弱了《费加罗报》的政治资本，但是从1977年开始，这种资本就不断慢慢地经常地自动贬值。与我一起走的大约有12名记者。^①让·多麦颂陪我离开了几个星期，随后被当时经常给雅克·希拉克出谋献策的几个人（如皮埃尔·朱利叶和玛丽-法兰士·加罗）召了去，说了他一頓。他又回到《费加罗报》担任社论撰稿人。

在内伊寓所同埃尔桑一起用餐以后，我和他只在我的位于圣米歇尔大街的家中晤谈过一次。当这个客人得知除非他放弃自己的打算，否则我就离开《费加罗报》时，他对我说：“如果能够同您轮流写社论，我将很荣幸，但您不愿意和我轮着写。”这个细节我至今记得一清二楚。我耐住性子回答说，我并不反对他这种完全准确的说法——我尽力使自己的态度不带一点儿火药味——我之所以不能同意，不是不肯与罗贝尔·埃尔桑轮流写，而是不肯与报社老板、竞选议员的人轮流写。后来，我就再也没见过罗贝尔·埃尔桑。在1978年的竞选运动中，他没有写过一篇社论。当我表示“愿意在几个月内切实参加报纸的领导”时，为什么要如此粗暴地叫我“守些本分”呢？

至今，我还弄不清他出于何种动机。他本人也总是说，特别是对我的好友贝尔纳·博尼洛里说，他不明白为什么我要退出《费加罗报》。他对我已经有了一定看法。在一次领导机构会议上，他流露出了这种意思。在他看来，我和他属于同一类人，即如果我已经做出决定，就寸步不让，不会妥协，总之很

^① 他们引用了良心条款。上诉法院承认他们有理。

难对付。让·多麦颂既不使他难堪，又不令人担忧。从第一天开始，埃尔桑就了解这一点：让放不下《费加罗报》。因为他喜欢为这家报纸写东西，他同广大读者声气相投，他在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出这样一个能够始终发挥其才能的论坛了。尽管让·多麦颂不止一次在编辑部同人面前重申他将和我一起离开，但埃尔桑毫不怀疑这个浪子一定会回头。

对我本人，埃尔桑可搞错了，倒不是看不起我，而是对我估计过高。我自己也怀疑，为了启发或指导记者，我能不能每周到《费加罗报》待上6天。跟他写社论一样，也许几个星期以后，我的政治领导也就流产了。埃尔桑熬过了一种辱没了他的含糊局面。他作为业主，却只能以成员的身份，以五名成员之一的身份，参与领导，他个人不能就解雇或招聘做出决定。他肯定以为，我提出要求是出于争权夺利，一旦我得到这个位子就会限制他的主宰权。我了解他，他却不了解我。我厌恶权势，但思想方面的权威除外，因为这种权威来自论争或理智。也许他是不愿意放弃撰写社论的权利，尽管他并不打算行使这个权利。我并不认为他会经常写社论，但我不愿意冒同他分享社论撰写权的风险（我却情愿同让分享这个权利，他的署名是众所周知的大写字母“F”，这标志着他是领导机构的发言人）。

我与埃尔桑谈了话，又同当政的大人物们谈了话，摆在我面前的，只有辞职，别无他途。4月份的某个星期一，我原定第二天动身去儒加斯找我的孩子们，清晨却接待了来访的约瑟夫·丰塔内，这个前国民教育部长创办了一份日报《我报道》。此时此刻，我不能拒绝同这个诚挚而宽厚、笃实可信又不带一点儿教权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天主教徒合作。下午，准确

的时间是3点差20分钟，我突然瘫痪了：右臂贴着身子耷拉下来，我的嗓子也坏了，再也发不出声音。

几周以后，我恢复了知觉，立即给埃尔桑写了辞呈，并最终为《费加罗报》准备了几篇文章。下面就是我从未发表过的辞职信： 708

当你要求获得并且确实得到了领导机构主席一职时，无论让·多麦颂还是我本人，我们都未反对你的要求。当然，股份有限公司的东家与管理委员会董事长混在一起是不符合报纸章程的精神和条文的，正如法庭已经确认过的那样。但是，布里松那套班子的四个代表几年来在报纸中已经不起什么实际作用了；然而，只有这四个代表或编辑公司有权向法庭起诉，这种行动，不管怎么样，却有可能把报社彻底搞垮。我们已经决定不在资本家和编辑之间挑起新的争端。

如果赋予让·多麦颂社长的头衔，给我本人以政治社长的头衔，就等于你默认，《费加罗报》要保持其在知识界和政界中的威望，就应该由一个记者或作家担任经常性的领导，而不能由一个报业集团的老板或一个议员来领导。

过去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无法履行政治领导人的职责。你事先不向我们打个招呼就自行招聘工作人员；你不听听别人的意见就选派某个部门的负责人。你通过你信任的一个记者下达指示，而不考虑编辑部现存的领导等级。你这样做，就是剥夺了理应行使这种权力的所有人的权利。编辑部等着被遥控，却不能听从本应领导编辑部的人的意见。针对别人对现状的批评和我要求履行我的领导职

责，你对我的答复是，从9月份开始你有意由你本人承担这个职责，包括编写社论。把老板、报业集团的经纪人、编辑部主任、社论委员会主任和议员候选人，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我认为现今的舆论对此是难以接受的，对报纸的发展和威望也是极坏的。我从我们在2月和3月的谈话中得出什么结论，你也不会感到奇怪了。我不认为，用也许是荣誉很高但肯定是虚设的头衔来当保人和当掩护是得体的。我将离开我供职三十余年的这份报纸，心情十分沉重。

其他报纸对此事的评论既不激动，也为数不多，这正是我期待的。在《世界报》上，J. 索瓦热奥认为，征服《费加罗报》已接近尾声了。我错误地认为或幻想能够维护《费加罗报》的某种独立性。面对像埃尔桑这样的人，幻想与错误搅在一起。这个老板在《费加罗报》的行为同在《巴黎-诺曼底报》一样，似乎要采取所有“头头脑脑”行之有效的分而治之的方法干到底。

至于外国评论，我只知道《经济学家》（1977年6月1日）的一篇，标题是《被剥光了的〈费加罗报〉》（用的是过去时态）。这家伦敦周刊的驻巴黎记者是从《费加罗报》第一版上的两篇文章得知这一事件的，第一篇是让·多麦颂的，第二篇是埃尔桑的，还有我对《焦点》周刊的谈话。因此，这个记者把让·多麦颂去职看作一件大事；我去职则是步他的后尘。而事实上，让·多麦颂与我同时离开，目的是履行他对我的诺言。但是，他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再见了，但不是永别。”这就为今后作为社论撰稿人重返报社留下了后路或可

能。

这个英国记者把我称作“法国最受尊敬的政论专栏作家、法国政治新闻知识界泰斗”，他概述了我在《焦点》周刊上对埃尔桑要求身兼数职所做的分析，并得出结论：“这是阿隆先生所无法忍受的，他毕竟是在《费加罗报》干了30年的作家，他的精辟而出色的分析使《费加罗报》锦上添花，并造就了一代思想温和而有抱负的政治家。”当然，任何一家法国报纸都不会用这种调子评论我的辞职。《费加罗报》的同人中，没有一个人给我写过一句同情的话。他们当中有12个人跟着让·多麦颂和我一道辞职了；但他们都不知道有一个人去职，仅仅是为了暂时履行诺言。

对于我曾尝试同罗贝尔·埃尔桑合作，以及我辞职前后与让·多麦颂的关系，我还要再谈几句。有些人说：“报业大王一来，他就应该离开《费加罗报》。”然而，直到今天我也没这样想过。如果政府当局当时鼓励另一个主顾买进这家报纸就好了，但这不取决于我。如果我拒绝——或者威胁说若罗贝尔·埃尔桑来我就走——很可能其他不少人也跟着拒绝，从而导致政府选择的或容忍的解决方案告吹，这倒确实可能如此。我曾努力帮助《费加罗报》维持下去，对此我并不后悔。报纸需要一个报业资本家来当领导。埃尔桑符合这个要求，也符合此种用意。我们以为他具有这种人物的所有品质，但我们弄错了。

710

我乐于承认，如果问题依然如故，也就是说报社的地位不变，我本来可以或应该反对选举埃尔桑当领导机构主席。然而，布里松的原班人马留下多少东西呢？一个是权迷心窍，碰到阻力就七窍生烟的人，另一个是漫不经心、爱发脾气又讨人

喜欢的学院院士，两个没什么可比性。为了防止股东僭取编辑部领导人的权利，需要随时保持警觉，需要一种强有力的意志，这正是让和我都缺乏的本领。那么，1977年2月至4月我做了些什么呢？只是发出警告！提醒多数派的领袖们并且说服他们，他们可以而且应该阻止一个负债累累的老板促使几个热爱《费加罗报》的大手笔辞职以掩饰其贫弱。我未能达到目的，而且根本不相信能够做到这一点，只不过谈过几次时断时续的话而已。至于让·多麦颂，他还主持着报纸分给他的栏目。我理解他的处境，并且保持了对他的友情。

我也曾梦想过，如果我像让那样离开《费加罗报》几个星期以后再回去，遭到的嘲讽和打击不是那么太无理取闹。《世界报》，这个除了对本报以外对一切人和事都是铁面无情的法官，居然宽恕了学院院士。我有幸——并不是“妄自尊大”——逃过了我的朋友让的那种好运气。他居然险境余生。

这几个星期我干了不少蠢事，首先是我心荡神摇——说得又太重了——迷迷糊糊地想同约瑟夫·丰塔内合作，或者从《费加罗报》拉出几个人。于是，就在我突然得了脑血栓的那天上午，我与约瑟夫·丰塔内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发病时，我正准备动身去拜访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丰塔内公
711 忠体国，信仰基督，身体力行，令人不能不肃然起敬。他死得悲惨而荒唐，扭曲了他这个人及其一生。遗憾的是，我同他的谈话未能给我带来太大的希望，因为他既不掌握足够的钱，也没有相当有力的班子保证取得成功。他希望领导出版，同时还想利用写社论来规定报纸的“路线”。这就没有我的位置了。我也没法带人进来。我一出院就做出了决定，他还给我写过一

封恳请的信。

让·多麦颂于1977年6月6日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致读者》的文章，宣称他对我表示完全支持：“雷蒙·阿隆在《费加罗报》中起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本周他在一份周刊上总结了他在这次危机中汲取的教训：他脱离了《费加罗报》。30年来，他是这家报纸的象征和荣誉。显而易见，他的脱离深深地震撼了这份报纸，他同这份报纸是血肉相连的。”他向埃尔桑的开明作风表示敬意，并说埃尔桑从来不对《费加罗报》记者的写作自由施加任何压力。接着他列举了编辑部和管理部门中重要人员的任命，这些任命都“不受他支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这是暗指一个对我来说很关键的问题：“利用写社论或写文章的形式，报社东家实际参与报纸的编辑工作，对于头脑简单或从政治角度考虑问题的人来说，问题的可恼和尴尬是难以想象的。”此外，他强调了他要离开的主要理由——无法充分行使他的领导职责——这就留下了他可能回来继续斗争的余地。“我设想，如果给我提供机会，不管在什么地方，即使在这里也行，只要给我提供手段，只要我的言论自由得到充分保证。当然，这只是指一种明天就可能开始的未来。”

罗贝尔·埃尔桑写了一篇文章来答复让·多麦颂。说句公道话，这篇文章对《费加罗报》倒无伤大雅。他首先描述了他购进这家报纸时它的财政状况是多么糟糕，说它几乎是陷入绝境了。直至今日，我还希望能对1975年和1976年的危机做出正确的分析。既然发行量没有增加，他是靠什么方法弥补亏损的呢？他取消了下午版，还想出来一个办法，即建立一个电

712 传网，把夜间在巴黎打好的“纸型”传给8个印刷分厂，与首都同时印出最后消息。我倒是乐于相信这种“空前的技术和工业成就能够每个月从地皮里搞出一座工厂”，但是，如果报纸的销售量不增加，要这样的出奇制胜又有什么用呢？况且，假如不向银行要求新的贷款，又用什么资金来维持这些工厂呢？

我应该补充说，他对1945~1975年报纸管理方面的批评是正确的。当时，《费加罗报》确实赚了不少钱，但没有把房产买下来，也没有更新技术设备，反而从每年发13个月的工资，增加到发14个月、15个月、16个月的工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家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主要原因。我成为领导机构成员后立即发现，工资级差之大使我无法不感到惊讶。

《焦点》周刊上发表的我同友人乔治·絮费尔的谈话，解释了我要离开的理由，并保留了一些悔过的意思。我当初反对让·普鲁沃斯特进入《费加罗报》有没有道理呢？那一天，我责怪自己：“他的到来可能导致某些人流泪和咬牙切齿。但是，很快，大家的情绪就会稳定下来，报纸很可能恢复元气。”我完全没有把握我这种自责是否正确。1965年的《费加罗报》似乎吃不消普鲁沃斯特，而后者由于年事已高，也不可能使报纸恢复青春。

我提出要离开的理由同前面的叙述相吻合。我曾讲到同埃尔桑的一次对话，他对我说过：“为什么你过去同意这种章程，而今天却又拒绝了昵？”我简单地答复他：“在一般情况下，我不愿发生新的冲突。我再次打赌，您是一个聪明人，相信您不至于跨过一条一旦越过我只好离开的界线。然而，这条线已经被逾越了。”乔治·絮费尔向我指出，无论到什么地

方，我都可能重新遇到这种微妙的局面。我回答他说：“只要我在《费加罗报》上写东西，这份报纸就多少同我有关。我走了以后，我将只对我本人负责。”最后，絮费尔使出一个撒手锏：为什么现在离开？我引用了贝格松的一句话回答他说：“由于有人把我当成一部智能机器，最后可能大家都会忘记我也是个普通人。这就是说，有朝一日一些事情会忍无可忍。贝格松说得好：‘我们希望知道出于什么理由我们做出了决定，然而我们发现我们做出了决定却没有理由，甚至违背了所有理由。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恰恰是最好的理由。因为已经完成的行动，符合我们的全部心情，符合我们的思想和追求……总之，符合我们对幸福和荣誉的个人看法。’”我的朋友们，如阿妮·克里热尔，都劝我不要放弃其他任何报刊都不可能给予我的这块地盘。1977年4月，在我住医院以前或以后一周，我不再犹豫：我再也不能容忍埃尔桑的《费加罗报》。

713

在《焦点》周刊社，我同奥利维埃·谢弗里荣和乔治·絮费尔谈了头一次话，他们向我建议一项合作办法，每月提供两篇文章。此外，戈德史密斯也知道我想离开《费加罗报》，希望我同《快报》周刊合作（他把这些话传给了我）。我不了解菲利普·格伦巴赫，同让-弗朗索瓦·勒韦尔和奥利维尔·托德（Olivier Todd）也是萍水相逢。我担心这个左派的编辑部对进来一个被视为右派的作家到底会做出什么反应。不管怎么说，如果奥利维埃·谢弗里荣得知《快报》周刊对我的许诺后不再与我接触，并且提出一项同他第一天向我提出的建议全然不同的条件，我也就不必在这两家互相竞争的周刊之间进行选择了。这一次是每周写一篇文章，并且担任一种倡导者或启示者的角色。这后一个建议是在我向戈德史密斯提出后他经

过几天的思考才同意的（照规矩来说，从经济上讲，《巴黎竞赛报》提供的条件最优厚了）。

714 我做出这种选择的主要理由是《焦点》周刊的朋友们的态度。当初他们之所以没有立即给我提供一席之地，这倒不是他们缺乏热情或对我不尊敬；根本原因是，在这样一家总的来说不愿有倾向性的周刊中，不可能有我的位子。在1978年大选前的竞选运动中，由于絮费尔在一次公众集会上讲话，记者们投票通过给予他申斥处分。我不想仅仅充当一种分析家或单纯的旁观者的角色。我认为，我在《快报》周刊将享有更大的自由，在那里可能发挥影响，而且这家周刊的老板一般比较重视“大手笔”，可以使我免遭来自编辑们的任何敌视。1947年，我没有选择《世界报》而是到了《费加罗报》，可能就犯了错误（尽管我根本不相信这一点）；但我依然认为我不去《焦点》周刊而选择了《快报》周刊是有道理的，尽管经过了几次失望。至于让-弗朗索瓦·勒韦尔和奥利维尔·托德离开《焦点》社而造成危机以后的情况，即1981年6月以后的情况，留待另一章去叙述。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1969年4月，我对戴高乐将军搞的公民投票、分权化和参议院改革一概不置评。在全国对这些改革予以否定性回答以后，我才评论这一事件，笔法可能有点过于例行公事。“5月30日演说和香榭丽舍大街示威之后11个月，戴高乐将军遭到普选的否决，作为一个‘孤独的强者’，离开爱丽舍宫，回到科隆贝村旧居。”我先分析了这一事件的根源，又谈了他在乔治·蓬皮杜的恳求下放弃了公民投票，而他又十分重视这样向国民提出信任案的做法。我追述了将军作为法兰西人民联盟主席长期以来反复思虑的问题。我说：“他把区域化改革看作支持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手段，区域化改革同时也是扭转近百年来行政权力集中趋势的第一次尝试。”戴高乐将军很可能把信任问题看得比改革的内容更重要。在6月份的选举中，究竟是谁取得了胜利呢？是总统，还是总理？“公民投票，即信任问题，应该扫除一切怀疑，应该赋予将军无可争辩的权力，没有这种权力，他宁愿走出金銮宝殿，回到故乡……他像安泰神那样，需要接触祖国的泥土和人民的意志来恢复神力。”总统变成温和的多数派（也可以说是右派，如果你愿意）的领袖以后有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尽管不一定出自他的本意。我就是用这一点来解释戴高乐将军的失败，这一点至少可以部分地解释他的失败。

不管怎么说，出于对历史的讽刺，戴高乐将军这次成了他所信奉的公民投票哲学的牺牲品。他当选连任7年，在国民议会拥有紧密团结的多数，这个多数派可能有些保留，但都甘心顺从，除了上帝或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他毫无所惧。其他任何人都会对此感到满意，而他却要一举雪耻，要么取得个人胜利，要么来个一败涂地，无论表面看来这是多么荒谬和不公平。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才是一次对英雄豪杰至高无上的考验。如果他在1968年5月灰溜溜地返回科隆贝故乡，那将会辱没法兰西，因此，1969年4月，他重新披上一种凄凉的伟大，这一点可能与戴高乐主义的世界观是神秘地吻合的。

在题为《捉摸不定的法国》的第二篇文章中，我详细分析了1968年5月事件与戴高乐最终隐退的关系：

这些“事件”如果不是决定了，也称得上加速了两个人的分离。戴高乐将军的引退还间接地表明，这是几百名大学生在巴黎十大点燃烈火的后果，或者说是余波。自1968年5月11日以后，对于戴高乐将军来说，法兰西是难以把握的了。他的种种决定，尽管从他信奉的哲学和他的个性来说都是可以理解的，却奇怪地对他本人不利。他本人对命运和人们的忘恩负义不会感到惊奇。像所有古老文化培养出来的敢作敢为的人一样，他也考虑过祸福问题，而英雄只有泰然处之，才能正确对待祸福无常。

我望洋兴叹，不敢做什么总结，或者比较谦虚一点儿，只

对戴高乐将军的历史作用做几点说明。当他的事业受到挫败的时候（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我追随过他。即使我在实质问题上同他一致时，我也不真正赞成他的行动方式。作为法兰西人民联盟的成员，我继续按照我的人生哲学写文章，并不是照搬他的思想。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中，我被看作这个君主最不能容忍的非戴高乐主义分子之一。

他对我的几本书大表赞许，这是毫无意义或几乎没有意义的。他身边不乏作家，有小作家也有大作家，这些人的抽屉里有的是歌功颂德的信函。

我从他那里收到的第一封亲笔信谈到了《连锁战争》一书，这封信与其说是能说明他对本书及其作者（我当时是法兰西人民联盟全国委员会的委员）的态度，倒不如说更能说明将军自己的世界观。信中说：

承蒙惠赐大作《连锁战争》，书中见解、事实和论点十分丰富，深为叹服。您如此精辟地指出的前景，既令人满意，也叫人担心。然而，这可能是精神对聚物质尚能取得的唯一胜利，这使人正视动荡的时局及其后果，而不至于自暴自弃，自暴自弃是毫无用处的。当然，也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斗争、努力、意志最终成为主宰。可是，必须看清局势。您对此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聚物质”“控制混乱的努力”，这些词句启示了将军的柏格森主义和尼采主义。评判一个行动果断的人，要看他力图治理的乱世到底乱得怎样。

《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出版于1957年，《工业社会与

战争》则于他重新执政以后得以问世。这些书也同样受到赞赏，甚至是最高级的赞扬。第一本谈了我对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和独立的论点，他对此肯定没有任何不满。

我接着又出了一本书叫《不变的与可变的》，分析第四共和国向第五共和国过渡的情况。这本书比较直接地触及他。这次，他不无讽刺地奉承说：

在您的大作中，我再次发现和领略了您敏捷而丰富的才思、您分析历史和人物的伟大天才、您的确非同凡响的风格。我对您表示折服，并羡慕您能够立即对我们亲身经历的事件和对我们卷入其中的激流（torrent）做一番评断。至于我，我仍然保留我的哲学观点。……这不会使您惊讶。……

毋庸置疑，用“我对您表示折服，并羡慕您”这些字眼，对我这个评论家来说，是一个并无恶意的教训。我认为，“我们卷入其中的激流”这种说法，反映了将军的一种通常的想法，或者更确切一些说，是他世界观中的柏格森倾向。而且，可能直到1959年5月19日，他还不知道他本人的政策将导致什么结局。

当我祝贺他的《战争与和平》一书问世时，他用巧妙的方式影射我的立场：

……我简直不能相信您所写的，我知道，许久以来，您很少对我做的事表示赞同。然而，请相信，我赞赏您的思想方式，即尽力纵览浩瀚的潮流（flux），把我们大家冲向一种表面上无限的，至少是史无前例的命运。

客套的方式同前一封信一样。前一封信暗指伦敦（“一直”），用的是同样的比喻，只是用“潮流”代替“激流”而已。

关于《历史意识的纬度》一书的回信倒没有任何发火的迹象。他写道：“您对历史的哲学观点给黑暗的深渊带来了光明，特别是用在分析当代问题时。各国人民的生活就是一个深渊，难道不是吗？”发信的日期是1961年4月4日。对我写的有关“论证”的一些文章——其中有几篇已经发表，至少是过早地批评了将军的阿尔及利亚政策——他似乎不怎么觉得难受。

我收到的倒数第二封信依然客客气气，回答了《大辩论》一文。信中带有讽刺意味，口吻有点近于轻蔑：

我拜读了《大辩论》一文，正如我经常拜读您就同一问题到处写的东西一样。我觉得，您之所以不停地写这个问题，而且用词如此激烈，可能是您对自己所采取的态度不完全满意。实际上，“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所有这些都可以归结到唯一的争论：法兰西应不应该成为法兰西？抵抗运动时代就存在这个问题。您知道我的立场，我本人也知道理论家们的嘴是停不住的。（在答复《论自由》一文的最后来信中，他称呼我为“亲爱的大师”。）

在他写给我的所有的信中，1963年12月的来信在我看来是最富于戴高乐风格的。这倒不是因为这封信免去了恭维客套，而是他单刀直入指责文章的主题，即战略威慑力量问题。正如我在前一章提到的，我从来不反对法国努力争取核军备，这是有文章为证的。在将军看来，我的不可原谅的错误在于，没有努力把依靠国家核武器的防务同欧洲防务或大西洋防务区

719 别开来。最后，我承认我探索的解决办法是不可能的。对将军来说，尤其从他的核武器哲学来看，国家与国防是一码事。核武器比其他任何武器，更不能置于同盟国家的指挥之下。阿尔弗雷德·法布里-吕克在《世界报》（1966年9月1日）著文指责我在既成事实面前低头了。他的文章得出如下结论：

目前，核打击力量还从未经过议会通过，也没有通过人民投票明确批准，它已成为并且应该成为全国讨论的议题。我们不能让核打击力量未经充分讨论便享受什么时效权。

尽管如此，我同将军还是保持着文字往来，而我同乔治·蓬皮杜则从未建立起这种关系。诚然，我同他在索尔费里诺大街谈话后没有几年，便于1959年寄给他一本《知识分子的鸦片》。他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感谢，这封信我后来找不到了。对于其他的书，他均回信表示感谢，并答应要认真阅读。我曾给他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内容涉及一篇有关法国和美国总统在亚速尔群岛的会晤和达成协议的文章。信中有个事实弄错了，我向他表示歉意。他友好地回了我一封信。

乔治·蓬皮杜代替了戴高乐将军，给我同当局的关系带来了一些变化。政界和新闻界人士不会不知道我的“反戴高乐主义”，他们也说将军对我特别仇视，这样说不免夸张。电视台的负责人想要找我发表谈话时也感到犹豫不决，即使谈话是有关我的著作的。这种害怕只是表现在戴高乐时期的最后两三年。1960年代初期，德斯格鲁珀多次请我到“人人可读”节目中谈话。第四共和国时期，我也有机会在拙作《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出版时阐明我对非殖民化的观点。还有一段

插曲：德·凡尔内儒尔教授曾邀请我在一次关于医生社会职责的大会上致开幕词。我接受了邀请，但告诉他戴高乐将军可能不愿意在主席台上碰见我。几周以后，他要求同我会面。我看出他十分尴尬，不等他开口就立即对他说：“如果我发表演说，将军肯定就不来了。你不必介意：我并不感到奇怪；明摆着，他的出席比我的出席更重要。”后来，让·居伊东代替我发了言。这真是历史的讽刺，他当过战俘，投靠过贝当将军。他刚进入巴黎大学时，有几个星期之久，大学生不让他讲话。我则是属于那些无保留地为他，进而为自由和宽容而斗争的人。

720

我被看作一个“不可接触的贱民”，以致当一个共同的朋友想邀一个部长——1940年7月与我在同一个装甲兵连服役——与我共进午餐时竟遭到那个部长的拒绝。10年以后，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政时期，他回想起这件事，同我友好地交谈起来。我也不会忘记另一次相当难堪的场面。我应邀在一次军事工程师毕业典礼上讲话（那是在1968年），国防部部长梅斯梅尔在场，国防部的代表布朗卡尔也在。谁也不敢冒险请我讲话。经过短暂且难熬的犹豫，是不惜引起轰动离开会场，还是走上讲台若无其事地发表我的演说，我理智地选择了第二种态度。几天以后，我收到了经过让-克洛德·卡萨诺瓦提醒由布朗卡尔写来的一封道歉信。

1969年的总统选举，是我第一次参加竞选运动。在第四共和国时期，我远离党派之争和内阁危机。1947年以后，共产党已经脱离政治实体或议会实体（1954年孟戴斯·弗朗斯事先就宣布，他将不把共产党选票计算在他的绝对多数票之内）。从1958年开始，戴高乐将军在全国不可否认的多数支持下执掌了最高权力。将军辞职以后，法国人第一次被迫面对一次事关重

大的抉择：一方是阿兰·波埃，参议院议长，一个真诚、温和、热情的人，但缺乏总统的才智；另一方是乔治·蓬皮杜，1962 ~ 1968 年的总理。我毫不犹豫地支持了后者，因为我不认为，将军尸骨未寒就削弱总统的职能是符合民族利益的。

721 竞选运动开始时，《费加罗报》由于编辑们宣布罢工而停止出版。我收到蓬皮杜 1969 年 5 月 25 日的来信，信中说：

我从星期二的《费加罗报》上得知，您将支持我作为总统候选人。您的支持是宝贵的，也使我深受感动，对我是个鼓励。我尽力劝说让·普鲁沃斯特，但无结果。他已经到了脾气执拗的年纪。不管怎么样，我对贵报的重新出版感到高兴，因为必须让巴黎人感到，我们已经受到“微型法国”的威胁，这大概是《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我们的称呼。应该发展，而不要重蹈覆辙，您对此很清楚。感谢您的支持。您的支持使我的讲话有了意义，而其他人则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曲解。致以最诚挚的友谊。

在法兰西人民联盟时期，我同他保持着表面上友好的关系。我记得，他曾邀请我参加他在他位于查理曼大街的寓所举行的鸡尾酒会。他进入马提翁总理府以后，我很可能对他的某些决策提出过批评。有一次，我认为他的讲话中有一段是针对我的，这次讲话批评了主张某种大西洋主义观点的人，指责他们同华盛顿妥协。我用一种论战的语气回答他，并影射他与洛希尔银行的关系。蓬皮杜给我的信和我所采取的支持他的立场，本来应该可以恢复共和国总统与我之间互相信任的关系。事实上，在领导阶层中，我已经不再被看作当局的反对派了，但也没有

取得戴高乐-蓬皮杜派的好感——当然，我也不追求这种好感。

说实在的，直到1973年我才第一次介入左派与右派的斗争，介入原来由戴高乐派组成、后来渐渐扩大到中间派的多数派与社会党和共产党联盟之间的斗争。1965年，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勒卡尼埃的支持下提出竞选共和国总统，弄得戴高乐将军在第一轮投票中失利，但第二轮投票的结果是不成问题的。我没有任何理由表态，因为至少当时的老社会党——居伊·摩勒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已日暮途穷。到1969年的总统选举，加斯东·德费尔只获得5%的选票。

一个新社会党于1971年在埃皮奈诞生，密特朗当选为该党第一书记。由于社会主义教育和研究中心、加斯东·德费尔以及皮埃尔·莫洛亚都支持弗朗索瓦·密特朗，原领导人居伊·摩勒、阿兰·萨瓦里变成了少数派，而密特朗只带了几个思考问题的俱乐部，如“共和体制协议会”。 722

1973年的立法选举恰值斋月战争^①和第一次石油冲击前夕。但是，美国（水门事件）和东南亚出现的混乱动摇了共和国与世界均势。如果社会党和共产党联盟在法国取得胜利，很可能削弱我国在暴风雨前夕的地位。出于偶然，也可能是阿兰·维尔内和让·格里奥向我建议，我写了一篇批评共同纲领的文章；在1974年和1978年我继续这样做——这场战役于1981年在反常的情况下以失败告终，因为1974年和1978年那种人和思想均被动员起来的感人景象已不复存在。

1973年我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震动了舆论，在竞选运动中产生了影响。《快报》周刊全文转载了这一篇文

① 即第四次中东战争。——编者注

章，文章题目是《化圆形为正方形》。我竭力指出，左派共同纲领所规定的目标和打算使用的手段二者之间有矛盾。我一一列举了社会党宣布的主要改革，如对银行和保险公司实行国有化（同样的命运还威胁着私营企业）。“国有化的进展将与经济发展和群众要求联结在一起，关键是群众将承担最大的责任。当企业的劳动者表示有这种愿望，而企业的结构又表明有这种可能的时候，劳动者就可以采取新的形式参与企业的管理和领导。”此外，我还指出了共同纲领的杂乱无章，诸如，缩短劳动时间、大量增加社会转移费用的支出、把宝押在加快经济增长速度上（而当时年增长率已在5%至6%之间），这一切都是在集中计划和投资银行代替现有机制的情况下进行的。我做出如下结论：

723

在国家财政投资与资本市场之间，在计划与竞争之间，在对外开放经济的增长与封闭限制经济的通货膨胀之间，必须进行选择。20世纪的法国经济，首次接近其最先进的对手。正是这个时候，老掉牙的社会主义者胆大包天，患了精神分裂症，竟试图进行一次已经到处碰壁的试验。

第一篇文章《化圆形为正方形》受到广泛评论，第二篇《处境不妙的多数派——被迫摊牌》却受到忽视，为人遗忘。我首先回顾了法国经济在数量上取得的可观成就：1960~1970年，法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按不变价格计算）达5.8%，联邦德国为4.8%，英国为2.8%。同时，按人口计算的年平均增长率，法国达4.7%，联邦德国为3.7%，英国为2.2%。1971年和1972年，法国又有了增长。但是，我也看

到了选举前夕社会舆论的不安和多数派的担忧。

我追述了“五月风暴”暴露出来的不足之处，随后我又列举了其中的各种错误，我强调指出这种成功的局限性，并且指出要害所在：占统治地位的政党的作风和各种制度的精神。

在公众眼里，戴高乐派有时采取傲慢的甚至是独断专行的方式，毁坏了一项非常崇高的事业……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民主国家，在这个国家中，议员借口多数制的规矩，不先去监督执政机构，而以“支持”共和国总统为豪。自1968年以来，这种荒唐现象达到了名副其实的“无比”的程度。埃德加·富尔先生强迫高校实行类似国民议会的制度，而国民议会却已堕落为皮影戏。

接着我又指出，现在已经到了1973年，戴高乐派及其政权的前途依然捉摸不定。我写道：

多数派代表人物发表的《对反对派的透视》一书中，有许多问题涉及第五共和国体制以及多数制原则的精神实质。中间团体的落后分子，或者说孟德斯鸠的信徒们，理所当然地受到诛伐。但愿这些先生首肯思考一回。工业社会的中间团体机构并未消失……目前的共产党像过去一样强大，由于戴高乐将军和蓬皮杜执行的那种外交政策，这个党甚至比过去更强了……10年以来，共产党人认为第五共和国的外交是“现实主义的”，在他们的语汇中，这就意味着方向正确。第三势力政党曾在20年前主张北大西洋联盟和建设欧洲，戴高乐派和共产党人却在客观

上联合起来，一道加以反对……多数派不仅远远未能消灭这些中间团体——多数派认为中间团体是第四共和国的残余，应该被抛到九霄云外——反而把共产党看作同其他政党一样，将其纳入了国家机体。多数派还创造了一些条件，使一种近乎奇迹的东西有可能实现：重建了一个社会（根据当时的民意测验，它的选票和议席将超过共产党）。

我再次说明一下，这几行引文写于1973年2月。

我还探讨了“逼牌”的技巧问题。共和国总统一旦被选出，总统多数派的候选人就会向选民提出，选民做出选择是何等重要：要么选出议会内与总统一致的多数派，要么闹出一场宪法危机。最后，我提到了共和国总统的作用。我写道：

我相信，现行制度久而久之终究行不通。一有机会它就得向法国人民重复说：“要我们还是要动乱。”最后人们必将得到这样的回答：“看一看到底怎样动乱吧。”除非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否则任何一个人都没有魄力足以连续7年担当如今法国总统应负的责任，况且，法国总统甚至认为没有必要为自己配置一个类似美国总统挑选的那种参谋班子……后者（社会党人）依靠他们的纲领，明天或后天可能赢得选举的胜利，但到了他们获胜之日，法国也就失去了所有外国观察家（包括莫斯科和华盛顿的）所承认的它的机会。

我断定迟早必然要发生的事情，果然在1981年5月发生了。

在社会党执政两年以后，我预言的后果有一半已经出现了。

725

众所周知，乔治·蓬皮杜的健康情况支持不到7年任满，沙邦·戴尔马该当总统候选人。法国报刊对总统的健康表现出十分谨慎的态度；这同美国报刊大不相同，美国报刊要遵循本国报纸的习惯和它们对于职责所怀的观念。总统面部的浮肿暴露出他服用过什么药物（可的松），可以让人猜想出他得了不治之症。我回忆起《新闻周刊》上的一篇冷酷无情的文章，文章说，把相隔几年的两张总统面部的照片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他的病症（多发性骨髓瘤）和他还能活多久（最多18个月）。这篇文章发表于1973年尼克松与蓬皮杜在雷克雅未克会见的时候。外国记者第一次被总统的恶化的情况震惊了。

蓬皮杜逝世的时候，让·多麦颂刚刚接任报社的领导职务，无法逃脱各种“权贵”施加的压力。他同意我的意见，第一轮选举之前，在沙邦·戴尔马和吉斯卡尔·德斯坦之间保持相对中立的态度。他把这两个多数派代表之间的竞选看作类似美国的初选。起初，他打算劝阻吉斯卡尔·德斯坦不要分裂多数派，因为沙邦已经先宣布要当候选人。他的仓促宣布已经使政界，特别是使舆论界有点不安。在竞选运动开始的几个星期，《费加罗报》每天刊登一篇支持多数派的文章和一篇支持密特朗的文章。编辑部中有一部分人倾向于密特朗，希望报纸倒向中左派。社会党人撰写的文章，我记得只有一篇未刊登，就是皮埃尔·若克斯的文章。据让·多麦颂说，这篇文章辱骂了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此文）。我终于说服了让：在最后一个星期，《费加罗报》不再充当自由论坛，我们必须表明态度，无保留地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

在新闻部工作期间，我与沙邦·戴尔马友好地共事了两个

726 月，他任新闻部秘书长，我当安德烈·马尔罗的办公室主任。这已经是遥远的过去了，后来，我们不时见面。在前面的有一章里，我提到有一次在布路斯坦-布朗歇家中共进午餐时，我们就阿尔及利亚的独立问题发生过一次激烈的争论。但一般来讲，我们在这种会见中重温了青年时期的友谊。我不相信他在第一轮选举中会战胜德斯坦。我在一篇文章中列举了民意测验揭示出来的投票意向，我强调指出，弗朗索瓦·密特朗对沙邦·戴尔马和吉斯卡尔·德斯坦采取了不同的行动方式。我写道：“对第一个，他舞弄花剑；对财政部部长，他则高举接舷战用的短刀。是想顾全孟戴斯·弗朗斯的旧部呢？还是要努力摧毁一个全法国人都看重的知名人士呢？”1974年4月30日，我又补充了一句，7年以后，似乎更有理由重提这句话了：“一个自1969年起就管理财政的人，仍有机会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

到了1974年，我显然要比1969年更频繁地介入党派之争。诚然，不管怎么说，我的活动方式仍然是写分析文章多于从事斗争。我从不对沙邦·戴尔马或弗朗索瓦·密特朗进行人身攻击。我认为，即使沙邦没有遇到雅克·希拉克的“背叛”，他也不可能赢得第一轮投票。我不愿指出沙邦的主要弱点，即他不愿强加于人，不愿上“电视”。我只想谈谈一些主角的手法，他们的战略和演说。

沙邦·戴尔马是唯一自称拥护戴高乐主义的候选人，而在戴高乐将军住在爱丽舍宫时，他从未当过部长。……为了迫使共和民主联盟合作，他仓促宣布当候选人。而共和民主联盟中最接近蓬皮杜的一派拒绝明确表态支持他。他本人，

作为总理，采取了一些自由开明的措施——尤其是对法国广播电视局的措施——使自己落到传统戴高乐派分子的一边，成了元老的核心，而这些元老却不愿意冒险为他战斗。总理梅斯梅尔用必须服从党的纪律来说明他的合作，似乎更多地是想调解多数派，使他们在第二轮选举时团结一致，对付密特朗，而不是要影响民众，不是要民众在选民成分大部分相同的两个候选人之间进行选择。……（1974年5月2日） 727

在第一轮选举的前夕，在有关沙邦-吉斯卡尔角逐的文章中，我拒绝引用他们在辩论中互相攻击的论点。这两个人之中，谁敢自称更能干呢？做任何比较都会得罪两个中的一个。怎么可能知道这两个人当中谁在爱丽舍宫更能取得成功呢？“谁处在第二位时光彩照人，到第一位时就相形见绌。”同样，我也没有讲这两个人在第二轮选举中获胜的相对机会。随着事态的发展，当初我认为很重要的一场辩论今天看来已经不足挂齿：这两个人中谁将结束每5年或每7年一次的对法国体制的重新考虑？“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向我们保证说，新社会的设想，一种人民戴高乐主义的社会思想，将避免一场冲突，如果让综合理工学院、国家行政学院出身的大资产阶级分子进入爱丽舍宫，就不可能使民众同他们的总统保持一致。另一个候选人的支持者反唇相讥道：竞选运动业已表明，一个认真的、明智的部长可以同不同阶层的成千上万的但都承认了他的选民接触。”我最后选中了“新多数派”这种称号，它是第一个联合体，其他组织随后也可参加，但是其他组织并未参加。我怀疑沙邦·戴尔马能否做得更出色。障碍依然如故：两轮多数投票制神圣不可侵犯，这是戴高乐主义遗产的一部分。

我在两轮投票之间发表了5篇文章（5月7日、9日、10

日、15日、17日)，概括了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支持者可以使用的各种论据，他们不必进行人身攻击，也不至于沦落至公共集会上那种辩论的水平。我重复一下第一篇文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可以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密特朗在1974年败北而在1981年却取得成功：

728

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时未能当选，倒不是因为共产党选民使人担心，甚至不是因为有几个共产党人会参加政府，而是因为密特朗同意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与共产党结成有机的联盟。由于这种联盟，他使自己陷入了一种抉择：他要么背叛共产党盟友，要么背弃自己在最近三周的讲话中多次向法国人许下的诺言，即当一个致力于社会和平的总统。

在题为《奇怪的联盟》的第二篇文章中，我强调密特朗的竞选运动与共产党的竞选运动之间有差别：“共产党人曾多次参政，但确实只有一个国家有过一个共同纲领，那就是1945年的捷克斯洛伐克。”

这个顺手拈来的论据使人想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危险。在西方，这个共同纲领带来的灾难，在一个虽然未被苏军占领但自1945年以来就被纳入苏联势力范围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但是，由两党签署的共同纲领却在密特朗总统和社会党的头上悬挂着一种经常性的威胁：密特朗要么向其伙伴提出的要求让步，要么只好与帮他取得政权的这个联盟中断合作。^①

我追述了上一年我提出过的论点，即共同纲领包含的并非

① 任何人都不会在1974年想象，社会党能独自掌握国民议会内的绝对多数。

改变政策的萌芽，而是改变社会的萌芽。我提醒那些“洞察力强”、不相信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诺言的诚意的人：“有些人在报刊上或沙龙里把5月19日的选举说成是在中右派或中左派之间选择，这是自欺欺人，掩盖真相。这确实是一次根本性的选择。也许密特朗当选以后，不能完成共同纲领提出的和他的盟友要求的彻底变革，但是，只有左派激进派才会相信密特朗先生将在其盟友背叛他以前背弃他们。”

在做了一番我自认为相当客观和公平的比较之后，在斟酌了双方的恐惧与希望之后，我认为吉斯卡尔·德斯坦面临以下任务：“在维持带来1/4世纪的进步的国际共同体的同时，引导法国在困难年代中前进；结束由一个多数派集团单纯执掌政权的局面；改变一些政治规则或政治实践，因为这些政治规则或政治实践迫使法国每7年一次，用俄国式的轮盘赌来决定自己的未来。”他在这三项任务之中完成了第一项，但没有完成第二项，更不要说第三项了。戴高乐式的国家消失了，但把它的某些弊病传给了吉斯卡尔式的国家，法国的未来再一次由俄国式的轮盘赌来决定。这一次实在是多余的。

729

在1974年选举以前，我见过吉斯卡尔·德斯坦不止一次，但我同他没有保持定期联系。我可以肯定，许多记者比我更了解他，他们至少以一般报人与政界人物接触的方式比我同他交谈得多。

我还记得我们的会见，譬如，有一次是就我的《大分裂》同他在电台上辩论，我想这次辩论大概是在1948年或1949年。他手里拿着书^①，书页切得仓促，有些地方还没有切开^②。

① 也可能是《连锁战争》一书，如果是这本书，那就是在1951年或1952年。

② 法国新出版的书，印厂不切，由读者边读边切；这到1980年代已不时兴。——译者注

1940年代末或1950年代初，他偶尔来参加一两次《费加罗报》的经济问题讨论会，内容是有关某个稳定计划，或有关反通货膨胀斗争。当时，他表示支持采取解决某一问题的措施而不是一揽子措施（控制信贷或减少财政赤字）。

730 几年以后，1955年，我去拜访埃德加·富尔总理，路过他的办公室，当时正值摩洛哥危机的高峰。我们聊了几分钟。出乎我的意料，他强调法国的行政管理机构在保护国制度方面存在不足之处，却没有强调民族主义运动。当他成为副国务秘书，又升任财政部部长以后，我有不少机会同他见面或听他讲话，因为当时我在国家审计委员会。有一次在国家审计委员会开会的前几天，我批评他的政策不过是一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他火冒三丈地答复这篇文章（当然我也竭尽全力反驳了他的攻击）。几年以后，当时任这个委员会秘书的迈克尔·罗卡尔告诉我，他几乎无法整理这次对话的纪要，很难修饰或缓和这次对话的激烈语气。

我还记得一件事：1968年在欧洲一电视台，我们就当时的各种事件或关于《难觅的革命》一书展开辩论。他当时还处于官运不太亨通的时期。我们一起抱怨法国的制度很脆弱，无须一场真正的风暴，只要一股强风，就能把它吹得摇摆、震动，摇摇欲坠。他强调戴高乐将军威力无边，说得更明确一些，强调将军一经摆脱危机，就越发左右逢源。

到了1973年立法选举时，我们的关系才带有某种私交性质。他给我打电话，对我那篇关于共同纲领的文章《化圆形为正方形》表示赞赏；他在晚间辩论节目中同弗朗索瓦·密特朗对话时使用了我的许多论点，特意向我表示歉意。他对我说：我别无他法，因为你阐明了所有论据或最好的论据。这一

天，我使他喜出望外，因为我向他保证，在预定于1976年举行的下次总统选举中，我将支持他。在这次7年任期届满时，实际上是乔治·蓬皮杜逝世时，他成了多数派最好的候选人。再过7年，尽管密特朗于1981年取得胜利，我仍未改初衷。

1974年，在第二轮投票前夕，他邀请我参加两个候选人的最后一轮辩论，还是在原来那间播音室。他的竞选运动负责人一本正经地向我重申，他从《费加罗报》的文章中获益不少。尽管如此，我并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也没有成为他的知己，而且我根本也不想这样做。

在他当选几周之后，他组织了一次有关核战略问题的工作午餐会。出席这次工作午餐的有3个涉猎这个问题的作者，即P. 加洛瓦将军、A. 博弗尔将军和我，两个军事问题的专业记者，即《世界报》的J. 伊斯纳尔和《费加罗报》的J. -P. 米特阿，还有梅里将军（梅里将军当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了三军参谋长），此外还有两个将军，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总统一开始就宣布，他只想听不想说，因为他过去根本没有研究过，现在也未研究防务问题，他说今后自己也要研究。这些话使我感到有些吃惊；作为财政部部长，他想必参加了一些有关防务的内阁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必然会提到防务理论的某些方面，与会人员即使没有进行严密的分析，也会进行一些讨论。

731

在工作午餐上，弄笔杆子的将军P. 加洛瓦和A. 博弗尔讲话最多。P. 加洛瓦到会最早，他在大厅里等着。我来出席会议使他感到不痛快，因为我们过去有过争论；由于不痛快，他叙述自己的论点时比平时更加偏激，这就使了解他的那些人觉得他把自己关于原子均衡力和国土神圣化的观点推到了极端。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使他缓和下来，而是相反。在谈话结束

时，我感到总统肯定不会挑选加洛瓦将军做顾问，因为总统对于经常依靠威胁来维护安全的理论，依靠制造滔天大祸以大规模报复维护安全的理论，本能地持怀疑态度。有时，总统以嘲讽的口气问我们3个人对战术核武器的重要性有何看法。加洛瓦将军回答说，毫无作用；总统微微一笑转向博弗尔将军：“您来说说主要的。”我只能采取折中立场。总统告诉我们还要再次会晤，但从未实现。工作午餐结束时，他讲了一句话，这句话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我无法设想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应该按电钮。伊斯纳尔和米特阿离开爱丽舍宫时，对加洛瓦将军讲话有失分寸颇表惊讶。

另有一个场合，大约是1974年年底或1975年年初，我同总统谈了1个小时。当时在首都流传着有关吉斯卡尔·德斯坦的私生活的流言蜚语；总统的汽车在早晨5点钟同一辆送奶车相撞，这成了巴黎人晚饭桌上的热门话题。《世界报》上的一篇文章提到这次即使不是恶意中伤也是无中生有的诽谤运动。有一天，《费加罗报》记者伊夫·古奥告诉我，总统在一次同记者共进午餐时，指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这一点我拿不准）导演了这场反对他的运动。我立即拿起笔来，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我批评他不应该指责以色列人或犹太人阴谋反对他。我写道：这种指责出自您口，很可能造成使您第一个感到难堪的后果。这封信交给了在爱丽舍宫新闻处工作的一个女秘书，由她送去，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弟弟的未婚妻。

总统立即给我打来电话，邀请我就这个问题谈一次话。我强调指出他的那些指责的严重性，他回答我说，这些话不是根据假设或捕风捉影，而是有事实为依据的。据我后来知道，这些事实不过是一个以色列记者给《鸭鸣报》打过一次电话。

以色列大使向我保证，他的手下不愿意同这个以色列籍的可疑记者有任何联系。总统接着询问了我法国的犹太人的情况、他们的人数、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他刚刚读过巴尔夫尔关于“犹太人之家”的著名宣言，这是以色列国家的创造性文件之一。他认为，局势将朝着对希伯来国家不利的方向恶化；耶路撒冷的执政者不接受别人提出的在外约旦成立巴勒斯坦国的方案，这是错误的。有朝一日，连1967年划定的边界以内的领土对他们而言都会成为有争议的。

在这次语调友好的谈话中，最使我感到震动的是，吉斯卡尔·德斯坦完全没有亲以色列或反以色列、亲犹太人或反犹太人的想法。在战争期间和战后，他对德雷福斯事件时期法国的四分五裂与群情激奋似乎一直无动于衷。最近，他才了解建立以色列国家的缘由。可以说，他缺乏一种感情，有了这种感情，尽管他不赞成以色列的行动，也会同情法国的犹太人。他在任7年的后期，总统府秘书长就是一个犹太人，这位秘书长的父亲死在纳粹集中营里。如果他在去近东访问的前夕或在哥白尼大街暗杀的翌日征求过这个秘书长的意见，就不会采取那些使一部分犹太人反感的行动了。在这次谈话的结尾，他又提到核战略问题，他送我到办公室门口时讲道：我还不能完全掌握辩论，将来我们还应该就这个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但这种讨论从未实现。我曾多次应邀出席宴请施密特总理或桑格尔总统的正式午宴或晚宴，我只有为了《费加罗报》的事才求他接见，但他从未因此会见我。可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

733

当然，选举以后，我对总统的决策完全可以自由地评论。直到最后时刻，他的胜利是多么短促和没把握呀！“乔治·蓬皮杜的财政部部长自从1969年就任这个职位，这位部长终于在通

货膨胀加剧的时期赢得了胜利。但除了许下一大堆愿和利用各方面的助手延续了他的管理，他没有拿出任何东西，这确实使我目瞪口呆、惊叹不已。这是由于候选人机敏过人，还是法国人民明智，抑或是对手具有一些隐蔽的弱点呢？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几种解释中做出自己的选择。”过了几行，我提醒他不要对这次选举的教训忘乎所以：“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这方面也应扪心自问，光靠他进入爱丽舍宫时的能言善辩、行为举止，以及把过人的机智同无固定内容的谈吐结合起来，就能够团结和治理法国人吗？”（1974年5月22日）我的建议藏在字里行间。一个人晋升到总统府，而且多数派占主导地位的党中有一部分人对他抱有特殊敌意，那这种晋升就可能带来另一种政治实践。“不能再独断行使权力，乔治·蓬皮杜的顾问们自吹自擂曾经‘赶走’总理，从而弄得各个部长胆战心惊的时代结束了。”（1974年5月22日）我希望有一个稳固的内阁班子，其生死存亡都不仰赖总统的选择。“这个班子里强有力的人物越少，总统就越可能随时处在第一线，也就越容易遭到攻击（上帝知道他将要遭到多少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讲，靠总统多于靠议会多数派的班子突然上台执政，就意味着重新回到一种假总统制。”众所周知，事后看来，挑选雅克·希拉克任总理是一个错误；当时我认为这个内阁颇为“软弱”。“从这个内阁中找不出任何一个部长，他本人的权威可以补充共和国总统的权威。”在取得这种近乎奇迹的胜利之后，我最担心的是多数派内部发生分裂。“首都人士认为，吉斯卡尔派似乎同奥尔良派^①的传统联在一起，

① 奥尔良是七月王朝路易·菲利普的家族称号，时当自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译者注

戴高乐派则同波拿巴派传统相关，一个比较自由，另一个更有社会性。”在总统任期7年内，我尽最大可能避免在多数派中的两派之间表态。“只要投票方式今后仍无改变——而且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其将会改变——共和民主人士联盟就只能参政而不能理政。共和国总统可以统治但不能得罪共和民主人士联盟。”（1974年6月19日）在争夺巴黎市市长的拼搏中，我给人的印象是选中希拉克来对付吉斯卡尔，这个问题我下面再谈。

对于总统的外交政策我很快就表示有保留。1974年年底在一篇题为《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的国际职权》的文章中，我就流露出某些担心：“从理论上讲，您是欠了勃列日涅夫的情，因为在两轮投票之间他不是曾派他的大使拜访过您吗？但不幸的是，您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出法兰西国王没有忘记奥尔良公爵^①的抱怨；我认为您可能轻而易举地忘记了这个贵宾给您的支持，但共和国总统却只能承认共和国的利益。”我再一次强调苏联在军备方面的努力——美国总统则在几年以后，特别是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才承认这种努力。“苏联在缓和年代，完成了从未有过的大规模常规武器和核军备方面的努力。”（1974年12月6日）最后，我还直接向总统陈述了有关可能签署的《赫尔辛基协议》问题。我说：“总统先生，西方能否体面地取得实质性的让步和兑现未来的诺言，或者假装取得事关荣誉必须取得的东西而甘愿冒丢脸的风险，这要由您来判断。”（1974年12月26日）

6个月之后（1975年6月6日），我在一篇题为《自愿的

① 引用法国王朝嫡支波旁与旁支奥尔良之间百年不止的嫡庶之争。——译者注

芬兰化》的文章中采取了更为激烈的语气。我援引了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的两句话：“在目前的形势下，讨论任何欧洲安全问题都是无用的。”他认为：“组织欧洲防务的计划会引起苏联的担忧，这是可以解释的。”我同意第一句话，即只要我们的同盟国留在北约组织的统一司令部里而法国不参加进去，讨论欧洲防务问题从一开始就会碰到不可逾越的困难。反之，害怕苏联人对欧洲防务计划做出反应，我认为是站不住脚的，不能接受的：

鉴于目前的力量对比状况，共和国总统怎么能够那么认真地以为，苏联至少会在一定时期内，从欧洲防务组织计划中看出针对它的某种威胁或某种欧洲军事压力呢？我遗憾地写道：无论戴高乐将军，还是乔治·蓬皮杜，都不会承认苏联领导人的这种恐惧，因为苏联人只尊重抵抗他们的人。既然同意赋予莫斯科过问欧洲防务组织的权利，总统就在所谓“芬兰化”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即使不讲核威慑，民族独立也应是全方位的。

也许，《没有猛兽的丛林》（1975年1月10日）这篇文章虽无意挑起论战，却最好地反映了我对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人品和态度的看法。他初出茅庐，第一次进入国际外交的丛林。他向勃列日涅夫做出了他的前任们不肯做的口头让步。他宣布准备近期内在最高级会议上决定是否召开赫尔辛基会议，而乔治·蓬皮杜一直拒绝做出这种承诺。他对哈罗德·威尔逊也做出过某些让步，支持他在英国的公民投票中取得成功。与美国总统在马提尼克的会谈是在双方都心平气和的气氛中举行的，没有受到对抗。

一个德高望重、肩负历史重任的人，在凌霄宝殿举行记者招待会，对上千名全神贯注的记者描绘一幅祸患深重、阴云密布的世界图景。而法国在这个世界上游离于集团之外，保留着一个孤芳自赏的地位，因为它没有超级大国积聚起来的实力和手段。然而，它拒绝任何附庸地位，只接受明智的建议，不接受其他建议。这样的时代，到底到哪里去了？

在这篇文章里，我借用了密特朗在他的一本书中引用过的话，后来这句话被到处引用，但多少有些走样了。

736

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与1914年以前的历史文化教养出来的戴高乐将军不同，他似乎体会不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真正悲剧。当安德烈·丰塔内先生向他提到威尔逊先生的顾问——豪斯上校说过的“外交是君主疲劳时的一种消遣”时，他很高兴听到这种把外交看得十分轻松的说法……吉斯卡尔·德斯坦不是像马基雅维利那样对待外部事务，而是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或者是故作天真。这个第五共和国的几乎是常任的财政部部长，以他那习以为常的无拘无束的派头，学步于国与国之间的丛林之中，幸亏他没有碰到冷酷的猛兽。我们衷心为他并为我们自己祝愿，希望他永远不要撞上凶煞。

总统于1975年10月访问莫斯科时，第一次撞上凶煞。在此之前，我在《法苏合作的限度》一文中，曾误以为会晤没有问题，至少不会出大问题。当时，法国围绕西班牙和葡萄牙

问题的争论正值高潮，甚至一部分温和派报纸也指责总统（我倒认为他有道理）没有大张旗鼓地反对处决案犯——处决令是佛朗哥将军下的，是对暗杀佛朗哥指定的继承人卡雷罗·布兰科的一种报复行为。我写道：按照外交传统，法国总统和苏联的头号人物，理应把国家之间的对话同意识形态冲突区别开来。在葡萄牙问题上，法国和苏联分属对立的阵营，既然苏联人认为法国显然属于“帝国主义”阵营，情况又怎能不是如此呢？我国既没有参加限制战略核武器的会谈，也没有参加限制欧洲常规武器的谈判。用一句外交术语，还有什么值得“在双边范围内”进行讨论的呢？苏联人曾经向蓬皮杜建议在法苏特殊关系方面再向前迈一步，即签订一项友好条约。蓬皮杜婉言拒绝了这份殷勤，我本来以为吉斯卡尔·德斯坦尽管在朗布依埃动过一番感情，表过一阵热忱，或许也会敬谢不敏。更何況，自从勃兰特与苏联签订了那些准和平条约以后，在巴黎和莫斯科之间已没有什么“优先的关系”可言了。

法国总统的访问使旁观者们感到困惑不解。访问一天之后，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生病了，最高级会谈只好中止；吉斯卡尔·德斯坦按照原定计划到外地去访问，但是在苏联的花名册中，陪同他的官方人士的阶层甚至够不上二流水平。很明显，苏联人给他冷遇，对他表示不满。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我对于吉斯卡尔·德斯坦在第一次晚宴结束时的讲话还比较重视。法国总统讲到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要缓和。这个题目他在法国讲过多次，但在莫斯科，是第一次讲，也是最后一次。这次讲话、第一天的会谈，以及关于最后公报的谈判，惹恼了苏联人，苏联人想让他知道这一点。

全世界的报刊评论了这种不顾外交礼节的行为和勃列日涅

夫的外交病。总统默不作声，认为这些插曲不过是记者们杜撰出来的或不怀好意设想出来的，根本没这回事。而我却早已著文评论这次“错误的会见”。有一天晚上，总统亲自为此给我打来电话。我们在电话里谈了近半个小时。我没有记下任何东西，只有个笼统的回忆。记者们杜撰了一个事件；勃列日涅夫确实身体不适；到外地访问符合访问计划。没有必要小题大做。也可以设想，这些小毛病不过是翻译们搞出来的。

总统未能说服我，只使我感到难办。如果在这次谈话的第二天我发表一篇评论批驳总统说的话，那我就弄僵我们之间的关系。当然，我的文章能对他有一点儿影响，我对此从来不抱任何幻想。由于我经常批评他，任何人都不能说我对政府有一丁点儿奴颜婢膝。于是，我把已经写好的评论扔进纸篓，重新写了一篇，拐弯抹角地处理事实真相，毋宁说是罗列了一些几乎是互相矛盾的论点。

文章首先列举了出现危机的迹象：“修改访问日程，缩减两个头号人物会晤的时间，宣布取消预定的两国外交部部长的会晤，所有这些事件，在别国本来不会引起注意，然而在这里却有理由引起一些疑问。”据说，在苏联没有任何事件是偶然发生的。我还指出，《真理报》发表了法国共产党的声明，我还做了一点儿让步，指出也许这个决定不是最高层做出的。同样，我接受了勃列日涅夫身体不适的说法，“确实是良性感冒，要不然怎么两天之后又恢复同法国总统的会谈呢”。尽管采取小心谨慎的做法，我还是指出了在最后公报中，在近东问题上，在当时由莫斯科提出的裁军会议问题上，对苏联的用词做了几处让步。除了这些只有专家才能看出的细节，还有实质性的东西。苏联人从来不接受意识形态竞争方面的缓和，因为

按照他们的世界观，和平共处只是对国家关系而言，不能用于意识形态或社会制度。从法国这方面讲，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还是戴高乐将军或乔治·蓬皮杜的法国，都不能把法国在大西洋联盟中的特殊立场，强调到与法国外交的另一面不能相容的地步。法国外交的另一方面，就是欧洲共同体，就是法国努力使自己同欧洲共同体成员国的对外政策趋于一致，即使不能一致，也要彼此接近。

739 几天以后，我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又写了一篇有关法苏关系问题的文章，因为在我看来，总统在莫斯科遭到冷遇，事实已无可否认。能否就说总统因此受到挫折呢？“优先关系”一词只有法国人用，苏联人并没怎样用过。然而，不管怎么样，法国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呢？至多，苏联外贸负责人对法国提供的产品能够有些优待。如果说戴高乐将军曾主动同莫斯科建立联系，那么尼克松-基辛格政府和勃兰特政府都以不同的方式照他的样子去做了。现在苏联人已经无须法国人的外交斡旋，就可以在西方人都在尝试同莫斯科建立或正在建立类似的联系。

这种全方位的缓和——共和国总统的典型气质——带来了一种麻烦的怪现象。因为当法国的政策倾向于同联邦德国发展密切合作时，莱茵河彼岸的报纸便情不自禁地庆幸法国正在失去其莫斯科特殊对话者的地位，而老戴高乐主义者则担心法国丢掉的地位被联邦德国抢去。

从总统7年任期开始，我就批评他，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至少在表面上——跟他打交道的那些人的本质。为什么

要向列宁墓献花圈呢？他是一种信仰的先知，宣传这种信仰就会使地球上的所有吉斯卡尔·德斯坦一命呜呼。“真有道理，有些人只从永世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政治和历史，而他居然主张同这些人握手言欢。”

1969~1974年，我当时还被当作戴高乐政府或后戴高乐政府的反对者；而实际上，笼统地讲，我成了吉斯卡尔或吉斯卡尔主义的支持者。当我翻阅这个时期的文章时，我很惊异，我居然用同样的方式、同样的风格，支持或批评乔治·蓬皮杜和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当然，这两个人的外交政策也没有什么实质差别。蓬皮杜比他的继任人更不相信苏联人。至少从言辞上看，他比吉斯卡尔·德斯坦坚决。直到逝世，他一直未同意签署《赫尔辛基协议》。

把1969年以后的文章同1962~1969年的文章做比较却比较困难；法国外交政策的原则，是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和戴高乐将军辞职之间形成的，这些原则变成了神圣的信条：建立战略核打击力量，退出北约组织的联合司令部，与莫斯科维持优先关系，口头上的反美主义或反大西洋主义。讨论的不是一些真正不可逆转的外交举措，而是这些举措的长期后果。1969年以后，戴高乐主义外交就成了法国的外交；甚至至今依然如此，社会党取得胜利，即弗朗索瓦·密特朗取得胜利以后，至少也曾一度如此。1958~1969年，密特朗曾经是戴高乐将军最经常的，也是最不宽恕的对手。后戴高乐主义，无论是乔治·蓬皮杜的还是吉斯卡尔的后戴高乐主义，都尊重戴高乐遗产，即便轮到密特朗，从他赞同战略核力量之日起，他也发誓尊重这份遗产。在法国与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上，总统在近东和欧洲共同体问题上的自主余地或创造余地肯定仍然是很小

的。我对吉斯卡尔·德斯坦 1975 年访问苏联大发一通议论，是因为总统向列宁墓献花暴露了他的某些心理活动。今天，还有谁关心那次访问的最后公报以及双方做了哪些口头让步？有关吉斯卡尔·德斯坦外交活动的这几页文字，如果还有一点儿意思的话，那也不过是因为它表明了我对一个友好政权的态度，也可以多少说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人品。

共和国总统与他的前总理在巴黎市市政府问题上的争吵，促使那些估摸两党破裂后果的人，以及试图防止“多数派自杀”（借用 1977 年 2 月 21 日我的一篇文章的标题）的人加紧活动。

最初，我表态支持雅克·希拉克，至少表面上如此。保卫共和联盟（原共和民主人士联盟）在巴黎市议会中占多数，并占有市议会议长一席。根据共和国总统的意愿进行改革以后，市议会议长变成了巴黎市市长——自 1871 年以来，这个显要的头衔一直乏人继承。多数派两党本来在市长的共同候选人问题上已经接近达成协议。出于我至今仍不了解的一些原因，联合候选人皮埃尔·泰亭哲退出竞选，总统未事先征求雅克·希拉克的同意，就挑选了多维尔市市长多尔纳诺先生来代替。雅克·希拉克立即下战书，毛遂自荐，担任“光明之城”的市长。

741 1976 年 1 月 2 日，我在国家元首和他的前任总理的对立公开以前，就对其内涵做了分析。对于两个人分道扬镳的原因，我也不见得比市井小民知道得多。我对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弱点并非视而不见，但是，当我把国家元首比附跟他打交道的欧洲或美国的政府首脑们时，我的火气马上就消了。我对雅克·希拉克不太熟悉，我更是从来不觉得他有什么法西斯派头（尽管有这种流言蜚语）。从他奉承农民的做法来看，他倒

有点像激进社会党人；他办事干练，喜欢到处握手，随时提出竞选口号，他的竞选口号不消几天便被捐弃如秋扇，这样看来，他又像大城市的鼓动家。他是一种我们大可期待又非常担心的自然力量和政治力量。这两个人当中，我认为只有吉斯卡尔·德斯坦才具备一个国家元首的才智、经验和权威，但他绝对不能犯把雅克·希拉克变成不可调和的政敌这种错误。可能从1977年开始，这一对恩爱冤家，兄弟阋墙，弄得两败俱伤。在大声疾呼反对“多数派自杀”这件事上，我白费了力气，只得求告总统，因为我同另一个没有联系。

在《疾病大全》一文的结尾，我强调了法兰西民主联盟与保卫共和联盟的冲突的荒谬绝伦，然后建议了一种总统显然不会采纳的做法。我说：

雅克·希拉克也许有办法挑起一次内阁危机，迫使共和国总统解散议会，但我不认为他会任性地干下去，或听他的军师们的话冒险把宝押在这上面。如果提前选举——他将为此负责——这是拿自己的前途开玩笑，正如共和国总统拿他的任期押宝一样。在国家元首方面，至少应该暂时适应爱丽舍宫与波旁宫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为什么不让政党去挑选巴黎市市长的候选人呢？戴高乐将军本人也曾设想把第五共和国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席位留给保罗·雷诺，他并未因沙邦·戴尔马当选而气出病来。共和国总统只能在生命攸关的问题上，在涉及国家命运和经济行动时，采取断然态度。

742

1977年，我发现总统试图同反对派建立对话关系的一线希望破灭了。

他把自己的一部分选民弄得不知所措，但又未能吸引对方的人。他可以稍微改变一下自己的举止，适应法国人喜欢的总统派头。他不能变成一名“打手”。吉斯卡尔·德斯坦与雅克·希拉克是对手，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仍然是盟友。谁能为他人作嫁衣呢？有人说，“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当然，保卫共和联盟主席最终帮了国家元首的忙，或者倒过来，后者给前者帮了忙。

1978年，联盟主席确实给国家元首帮了大忙；1981年，他却闹了个同归于尽。

后来的1个月，我几乎没有为希拉克辩护，而是主要致力于反对总统掀起的不让希拉克当巴黎市市长的运动。实际上，我是建议他不要在巴黎挑起反对他的前任总理的圣战，因为他很可能吃败仗；接着我又提出了联盟主席的道德权利——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戴高乐派先丢了爱丽舍宫，随后又丢了马提翁宫。同样一部宪法过去帮助过戴高乐的国家，也帮助了吉斯卡尔的国家，而现在情况越发严重，因为总统的党在议会多数派里面继续处于少数。保卫共和联盟竭力维护它在巴黎的地位，为什么不去理解它呢？为什么硬给它扣上欺君的罪名呢？如果说希拉克当候选人冒犯了总统的威信，后者为什么不来一个避实就虚呢？假若对手挑选了他稳操胜算的这块战场，常识告诉这个总统——战略家，他如果不能避免这场角逐^①，就应该置身事外。

总统感情用事地投入战斗，结果输了。爱丽舍宫对电视台

^① 后来有人告诉我，在米歇尔·波尼亚托夫斯基的鼓动下，是总统本人决定在这个地方决一雌雄的。

施加的压力从未像选举巴黎市市长时那么大。保卫共和联盟的市议员固守金城汤池，城池的有些地方是坚不可摧的。弗朗索瓦兹·吉鲁受命进攻其中一座堡垒，而尽管她得到《快报》周刊的支持，但仍没能攻下来，因为一件糟糕的勋章事件把她搞得一败涂地。我的一个表亲阿隆-布伦蒂埃在抵抗运动中是她的领导，也出面替她作证。总统要求她在一个选区的候选人名单上领头，答应给她一个部长职位——不管选民做出什么决定。可是勋章的“丑闻”免除了总统对她许下的诺言。

总统对我的建议很不满意。我的两篇文章却给科雷兹省的议员^①帮了忙，事情很简单，因为这些文章承认他的候选人资格有合法性。是否帮助很大？我不得而知。有几个希拉克派人士为了奉承我曾多次对我说，如果没有我的文章，他们就不会成功（这同时也助长了我的“狂妄自大”）。爱丽舍宫大发雷霆，似乎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如果我真希望自己能起这种影响的话。《费加罗报》在巴黎的豪华区过去占有、现在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发表文章对政治阶层有影响，但影响不了选民。

在爱丽舍宫，人们考虑为什么我对总统来了一个“暗算”。在他的亲信当中，有些人认为我采取这种态度是由于阿卜·达奥德事件，他是慕尼黑暗杀以色列运动员事件的组织者之一。我曾经激烈地批评——也许激烈过了头^②——政府在司法部的支持下，过于仓促地摆脱了这个讨厌的巴勒斯坦人。我感到很意外，更感到奇怪，这些职业政治家竟不肯想一个办法，既不出于卑劣的动机，又不搞阴谋诡计。何况，我在阿

① 指雅克·希拉克。——译者注

② 不少读者给我来了信，我才做出这样的判断。

卜·达奥德事件之前就写过，总统不应亲自卷入巴黎市市政府的争吵，他在那里很可能会丢面子。

744 写了这几篇遭到反对的文章以后，我同雅克·希拉克、玛丽-法朗士·加罗、皮埃尔·朱利叶见过一两次面。我发现雅克·希拉克很讨人喜欢，或者不如说我发现他“有意思”，就像青年人的口头语那样；我同他来往很随便，比同吉斯卡尔·德斯坦随便。总而言之，我同后者没有进行过任何完全非政治性的谈话。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始终无法捉摸的人。

市镇选举以后几个星期，我就销声匿迹了。在心脏病发作以前，我曾就 1978 年春天的“不可避免的冲突”写过几篇文章，提到了“需要一年才能说服”的期限；关于内政的最后一篇文章发表于 3 月 28 日。四篇文章标志着 30 年的合作终结了，它们分别发表于 4 月 23 日和 27 日。

我写这四篇文章是为了向《费加罗报》的读者告别，是为了试一试我的手是否还能勉强涂抹几个字。这些文章将编入本书最后一部分，最后那部分专门叙述我多活的那几年。在医生的帮助下，大自然让我又多活了几年，我对此不时感到苦中有甜。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总结了我的一段生活。在这 15 745 年间，除了在大学教书，我还当记者，而且是个活跃分子。这本书于 1955 年春天问世，比我候选任教于巴黎大学早几个月。它对左派知识界是一种挑衅，而左派知识界在大学教员中虽不是多数，但有影响。这本书在赫鲁晓夫苏联共产党二十大报告前一年出版，尽管引起了公愤，却是应时之作：巴黎的知识界由此开始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产生怀疑。

对各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即我心目中的那种批判，并未随着《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出版而中止。首先，我同各种各样的对手争论，尽力阐明我的立场，反驳许多读者对我提出的悲观主义或虚无主义的诘难。接着，《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一文中的结论，在大西洋两岸引起了一场相当激烈的论战。1960 年代初期出版的三本论工业社会的小册子，促使我把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回顾过去，我有时也问自己，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去评论意识形态呢？有关意识形态的评论，我写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三论工业时代》和另外两本书（《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

人家说我生性好辩，我倒觉得情有可原。并非我对论战的效果抱有很大幻想。人们信奉主义，不仅赖以表达自己的感

746 情，而且赖以整理自己的感情，这种感情能够长期不买账，不买敌对言论的账。不管怎么样，有思想的人总是竭力为他们的信仰进行论证或辩解。其中有不少人，从来也没有信服那种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也就从不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徒们争论。

我列入意识形态批判范畴的文章和著作都是我在青年时代自己给自己安排的使命，即把观念和观念所反映、扭曲或改变了的现实进行对比，同时追踪事态和观念的进程。《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的前三章就是论述“左派”“无产阶级”和“革命”这三头不可侵犯的“圣牛”，以便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这些暧昧的概念及其不同含义。

这种批判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启示，又受到康德思想的启示。可以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因为马克思一向越过空谈和幻觉去探究真正的实践。马克思会怎样评断一个自称属于无产阶级而又不给无产阶级任何自由的政权，比方说选择工会代表的自由？也可以说这是康德式的批判，因为它指责历史的哲学，这种哲学的奢望超出了认识和合理预测的界限。

这30年间，巴黎意识形态的新风尚总是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重新解释而变化。我列入意识形态评论范畴的那些文章，如果从实质上看而不从表面上看，文体都很不一样。《知识分子的鸦片》在我看来——我现在还是这样认为——是供知识界阅读的论著。《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近似哲学著作，更别说《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有几页用了好些术语行话，我并未剔除它们。

结构与人群

战后法国发生的论战使我回想起 1923 ~ 1933 年德国的论战。我又一次处于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共有的领域，即同时对个人和人类的历史命运提出质疑。阿尔都塞属于另外一代人，他从另一个角度探讨马克思主义。我对他研究了好久，完全是出于一种好奇。新一代使用的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些时髦概念，他们能够从那些旧作中提炼出一个闻所未闻的马克思，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吗？如果不能的话，那能不能提炼出这样一个马克思，在他那里，一个世纪以来所有马克思的阐释者遇到的难以逾越的困难，有朝一日都奇迹似的消失了？

747

我的有关阿尔都塞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于 1967 年出版后石沉大海，没有引起反响。无论是阿尔都塞本人，还是他的信徒们，都不认为我的著作值得讨论。《年鉴》杂志拒绝刊登阿兰·贝桑松的一篇评价，可能是因为这篇文章有溢美之词。与此相反，列维-斯特劳斯感谢我寄给他这本书，他来信说，这本书使他相信，确实没有必要读《保卫马克思》和《阅读〈资本论〉》（这是阿尔都塞的两部主要著作）。

阿尔都塞的做法，从某些方面来看同萨特的做法相似，从另一些角度看又大相径庭。两个人都是哲学家或哲学教员出身，他们竭力要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再探索，或者说采取更为准确的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的总纲目中创立一种初步的或不十分明确的哲学。这种哲学有两点长处：既保留了马克思和列宁的历史观点或政治论点的实质部分，又避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化。战后初期，萨特摒弃了唯物主义；后来，在《辩证

理性批判》一书中他又不全盘否定自然辩证法，但他赋予辩证法的含义本身与自然辩证法不太相符，他退了一步，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学派有掌握自然辩证法的可能性。另外，他们两人在经济知识方面都是门外汉^①，他们接受了《资本论》的真理，萨特居然用几行，阿尔都塞用几十页或几百页，用其他文章和另一种理论知识重新阐释了《资本论》。

748

然而，他们两个人的做法是走了两个极端。萨特援引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把实践、行动，即阶级和阶级斗争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心内容。其次，异化（或矛盾）的终结使人类历史的冒险圆满成功。最后，他主张的是人道主义的和史实性的马克思主义。阿尔都塞则抛弃了马克思青年时期的著作和从“认识论上决裂”以前的马克思。他把《资本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他发明了一种大写的历史科学，或者说一种历史永恒的科学，一种清除了全部人道主义、全部史实主义的斯宾诺莎主义科学。作为共产党员，阿尔都塞不能像萨特那样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面前保持相对的自由。他经常保留那些神圣的字眼儿，却不妨碍他赋予它们完全不同的含义。举个例子，他也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提法，但是这种唯物主义已经与自然辩证法毫无共同之处，他认为历史唯物论是“理论的理论”或哲学的一部分。历史唯物论是历史科学的理论；这些分支理论的总体构成辩证唯物论，后者是所有门类的知识的确定有效的原则。

阿尔都塞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作为主要文章，

^① 阿尔都塞曾问他的同窗好友皮埃尔·穆萨，读哪些书才能了解现代经济状况，穆萨建议他读《工业社会十八讲》。

这篇文章久负盛名，因为考茨基曾引用它当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前言。这篇文章初步提出了一种认识论，阿尔都塞则阐释了它的内涵。学者分析和了解一种具体经济，无须从实地观察的事实、居民数量、工人的分布、生产量等开始，而应该从各种抽象、价值、交换、生产、分配入手。具体不在起点，而在终点。精神必须求助于抽象才能占有具体。黑格尔思想方法的特点毋庸置疑，《政治经济学批判》就反映了这个特点。

在同一篇文章中，马克思探讨了观念的逻辑体系与观念的历史连续性二者之间的关系。他斩钉截铁地断言（就像他在《哲学的贫困》一书中做过的那样），逻辑次序不与历史次序相耦合。每个观念都依其自身规律发展，这样一种观念在很不发达的经济中却已充分形成。但是，只能根据资本主义经济揭示以前各种经济的全部含义，有如用人的体质来说明猿猴的体质。

749

最后，这篇文章中出现的“结构整体”一词为阿尔都塞提供了他的根本论点。一个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与知识结构之间的关系的模式提出过疑问。他们一直在探究《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言之谜。^①阿尔都塞也探讨这个谜，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找到了这个秘密。根据“一切都是结构的”这一观点，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

首先，再也谈不上满足于“决定性”“对应性”等模棱两

① 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英国分析家，像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也求助于这篇序言。

可的概念了，因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是一个有结构的整体，科学的成果首先从中释放出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些要求中的任何一种都不能吸收或者单一地决定其他要求。正是各种要求的关系，标明了每个整体的结构。经济要求，说到底起决定作用的；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或在各种社会形态中），正是经济要求决定了统治机构。在农奴制生产方式中，决定性的要求是政治，因为攫取剩余价值的基础是依靠武士的军事统治，武士则既保护农奴又剥削农奴。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占了统治地位，而且起着决定作用，因为劳动与资本的自由交换掩盖了剥削。政治只保留了保障经济安全的任务，经济已经可以自行其是。

750 由阿尔都塞奠定基础的历史科学，研究的是由观念、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构成的对象。这种历史科学既不是叙述，也不是贯时性分析，而是类似一种基本上是共时性的、对各种不同生产方式的研究，最后可能成为一种没有叙述、不留一点儿进化论或人道主义痕迹的人类历史研究。在每一种生产方式中，一种情况都会对其他情况产生结构性因果作用。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科学，它本身也是为了探索每种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性原因，这些原因可能导致生产方式解体，同时也促进另一种生产方式诞生。

历史科学其实就是对不同生产方式的共时性分析。在我看来，这种设想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倾向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发现这种倾向的萌芽，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则更加明显。用德文来说，就是“论一种历史科学基础的序言”。历史现象繁复多样，能够用少数几种生产方式来划分吗？生

产方式形式不一，到底该用主导情况来解释，还是用决定性的情况来解释呢？能否引用五种要素（劳动者，使用生产资料，改变一个客体，生产过程要求真正占有成果与生产资料，合法占有成果和手段等生产要素）来重新构成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结构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如何发挥作用呢？总而言之，用什么巧妙的方法使这种历史的科学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协调起来呢？

答复最后这个问题并不困难，也只有答复这个问题才不困难。阿尔都塞用一种没有实践、没有史实（或者极言之，没有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把巴黎市民弄得目瞪口呆。但是，他接受了对《资本论》的传统解释。他把经济学家马克思的天才寓于剩余价值论，这没有任何创见；恩格斯、考茨基和第二国际的所有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也别无二致。劳动价值说、劳动交换工资论（只对劳动日的一部分给予报酬）推演出剩余价值论，而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利润、利息和收入的唯一来源。说到底，《阅读〈资本论〉》一书不敢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统解释一根毫毛，至少对所有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是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核心组成部分是如此。 751

阿尔都塞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是关于“认识论决裂”的看法。1845年，马克思似乎与黑格尔的影响、费尔巴哈的设想（主体的人创造事业，并为其事业所囚禁与异化）彻底决裂了。马克思成为唯物主义者（更通俗的说法是现实主义者）以后，才能提出无机物或有机物的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来自大脑，人靠思想——从实际上讲靠技术，从智力上讲靠科学——来征服自然。人道主义的历史观——主体的人坠入异化，阶级斗争是为了达到解放——将从此消失。同时，耶稣教

士、加尔维兹教士 (Calvez) 或费萨尔教士 (Fessard) 将并不存心歪曲那成熟了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即《资本论》的和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

就马克思主义学来说, 路易·阿尔都塞的论著经不住推敲。1857 ~ 1858 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渗透着黑格尔主义。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之前重读了黑格尔的《逻辑学》。“认识论决裂”的概念作为历史论证是站不住脚的。这只能让人们注意到马克思本人的哲学的歧义和暧昧之处, 随着时期和心境的不同, 这本著作的观点有时更近似于黑格尔的说法或阿尔都塞自己的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至少部分地来源于这种歧义和暧昧。剩余价值论是剥削论 (商品经济内在的不公平) 的基础, 是异化论 (物介乎于人之间) 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既是道德的批判, 又是存在的批判。

752 阿尔都塞对《资本论》的第二卷、第三卷兴趣较小, 不大关心对资本主义的历时性分析和整体之间的因果关系^①。阿尔都塞既是党员又是哲学家, 他知道历史的进程同信徒们从马克思的著作中得出的预见并不一致, 奇怪的是, 他却成功地给人留下了一致的印象, 至少使人消除了预言与事件发展相矛盾的看法。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资本主义的自我毁灭是由于资产者逻辑行为的两个“副作用”: 平均利润率的下降趋势和群众的贫困化。资本的积累同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制度息息相关, 可变资本 (劳动的价值) 在资本的有机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必然会逐渐减少, 从而造成利润率的趋势性下降, 因为利润仅仅来源

① 从一个整体过渡到另一个整体的决定性因素。

于可变资本。由于一种内在的正义，资产者最后都将同归于尽，因为他们当中的任何人在争夺利润时并不了解剩余价值的来源，都用死资本来代替活资本，用机器来代替工人。阿尔都塞没有把1917年革命同这种规律联系起来，更没有同工人的绝对贫困化或相对贫困化联系起来。他使用了一个后马克思主义概念——“超决定论”来说明革命。革命不会仅受一种形势的作用而爆发，只有各种不同情况交织在一起——政治的正统性被腐蚀，同时发生了经济危机——才能引起革命。各种情况的整体造成的形势，才可能是革命的形势。

我得承认，在阿尔都塞的思想中，我没有看出任何独到之处，他根本不配被称作“大哲学家”。几个听过他教课的朋友对我说，他们入党时，阿尔都塞在高等师范学院确实吹起了一股自由之风。他帮助他们摆脱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派的枷锁，指导他们阅读或重温《资本论》，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进行再探索。我赞同这一点。但是，要找到哲学的康庄大道，仅仅同博比尼大街的那个学校中的本本主义保持距离是不够的。

诚然，他同昔日的巴黎风气决裂了。他创立了一种包括各种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形态）的社会学（他称之为“历史科学”），并在他的结构性整体中对每个生产方式本身做了分析。马克思本人也曾设想这样一种社会学，但他只留下了只言片语。阿尔都塞没有超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内容；他提出了反经验的认识论，即观念先于事实和质量化，这是一种滑向空谈和神学的认识论。他为了解决理论与实践统一这个老命题，把理论称作“理论实践”。实际上，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已经提出过从抽象到具体、从概念到事实的方法。他建议用经济学概念来分析“有机整

体”，只有经济学概念才有助于找出其结构。找出结构并不依靠这些概念本身，而在于每个概念所具有的形式和它们在每个整体中的关系。然而，要确定一个特定制度和特定时期的生产力的状况，或生产和消费的相互关系，光靠玩弄文字游戏是不够的，必须着眼于现实，或所谓的经验主义现实。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是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以外发展起来的。与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相反，阿尔都塞把他的学生引向《资本论》、生产方式、要求；在这一点上，他帮了他们的忙。同时，他也把他们引向一种烦琐哲学，实际上是在伪博学 and 假结构主义认识论的掩盖下的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经院哲学。

当1960年代的风暴来临时，阿尔都塞的门徒们立即作鸟兽散，有的变成毛主义派，有的仍忠于党，还有一些人转向社会学。1968年以后，阿尔都塞模式似乎已成为过去，至少在巴黎是如此。大学生们的骚乱出色地扮演了《辩证理性批判》中正在经历熔炼的人群。萨特的“实践”观点重现生机，但只不过昙花一现。到了1970年代，主观主义 - 存在主义和客观主义 - 结构主义，这两种马克思主义同时凋落。少数几个毛主义派分子或极左分子试图搞恐怖主义，另一些人躲避到生态运动和保护自然运动中，还有一些人成了人权卫士。当然，这主要是分析巴黎，而不是分析法国。“高级知识分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法国共产党在1968年拒绝了一次革命的机会。特别是俄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以索尔仁尼琴为首，把知识分子搞得莫知所从。但是，一种同1914年以前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差不多的马克思主义，在教育界、大学毕业生或助教中继续起着绝对性的影响。评论社会党压倒共产党和右翼多数派的胜利所用的语言，几乎全未依靠哲学教授们。

对于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党员们来说，略微粗浅的马克思主义就足够了。

《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几乎与《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同时出版。这两本书都获得了评论奖。朋友们不止一次地问我：“你为什么写这些书？”我对自己也提出过同样的问题。很显然，我是逐渐产生写这些书的念头的。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一书出版后，我读了不无超然之感。在学院的讨论课上，我还有一两次提到过这本书。当“我的小同学”获得诺贝尔奖并拒绝接受时，皮埃尔·布里松曾来向我要稿子。我没办法，便写了一篇有关《辩证理性批判》的文章。他失望地对我说：“那就寄给我一份你在巴黎大学的讲稿吧。”我把讲稿压缩了1/3后寄给他，这份东西可能使《费加罗文学报》的读者感到困惑不解——读者们也许并不像社长想的那样困惑——但赢得了莫里斯·纳多^①的赞许。他指出，目前对让-保罗·萨特的评论寥寥无几。他接着说：“只有《费加罗文学报》是例外。还能相信谁呢？”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下决心拿起笔来，认真地研究这部可以说是身裹重重铁甲的巨著。1966~1967年，我在巴黎大学专为这本书开了一门课，许多高师备考考生也前来听我讲解。

打印的讲稿在我的朋友圈子中传开了，而我却对是否使用这部手稿尚犹豫不决。我认为它不可能像《工业社会十八讲》一书那样公开出版，因为严谨的分析与即席演讲不同。修改打字稿不仅要花很多时间，而且效果也不一定令人满意。此后，

^① 我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最严厉的批评者之一。

在 1967 ~ 1973 年这几年中，我不时想到这部手稿，并编写了几部分。我打算就暴力问题写一本小册子，由两个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关于萨特或者暴力的浪漫主义，另一部分是关于克劳塞维茨或暴力的合理性。1972 年，我放弃了这个过于勉强的写作计划，把本是两部分的内容分别写成两本书：一本是 755 《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比较薄；另一本题为《克劳塞维茨，思考战争》，是一本大部头的书。

前一本书是否符合“不要漏掉一点儿东西”这种多少有点庸俗的想法？我欣赏《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但对这本书的评价不像萨特本人的评价那样高。我认为，萨特把这本书排在《存在与虚无》之上，该书的排名比在大多数非萨特派的排序方式中高出许多，尽管这些人因《存在与虚无》的术语晦涩难懂和语气过激而讨厌这本书。我当时的看法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今天依然如此。《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使我对两个方面感兴趣，一个是它与“萨特思想”的关系，即“自我”（或者“实践”）同整体的辩证关系；另一个是它与“暴力”的关系。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就开始同萨特交锋，随着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评论，涉及的内容日益广泛。实际上，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中，最清楚不过地展现了他从自由意识，向自行约束（承担义务）和向屈从于整体和事物的过渡这一过程。

我忽略了《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表现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忠诚：

如果哲学应该同时综合知识，能作为方法，能作为起调节作用的思想，能作为进攻的武器，还能具有语言的同一性，如果这种世界观也同样是一种社会的工具，如果一

个人或一个集团所具有的独特观念成了文化，甚至成为整个阶级的性质，那么很显然，哲学的创新时期是不多见的。从17世纪到20世纪，我认为有几个以哲学大师的名字为标志的创新时期，即笛卡儿和洛克时期、康德和黑格尔时期，最后是马克思时期，这三种哲学轮番成为孕育特殊思想的沃土，为人类文化开阔了视野。只要这些哲学思想所代表的历史时期没有过去，它们就是不可超越的。（《辩证理性批判》，第17页）

我认为，这段经常被引用的话纯属蠢话（可供福楼拜玩味的大蠢话），它重拾了或者说是歪曲了黑格尔的一个观念：一种伟大的哲学思想，可以说能使一个时代的精神具备外形，但是哲学不能囊括全部知识（黑格尔对数学和物理学的理解并非正确，而它们是反映“时期”的一个基本特征），也不一定就是方法和能起调节作用的思想等。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我们的文化不可超越的前景，这用我们年轻时候的话来说是“胡说八道”。马克思主义当然没有综合我们时代的全部知识，也远远没有精炼归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按照哈佛大学或者牛津大学的观点，今天的哲学是分析哲学，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756

我对《辩证理性批判》一书中的观点并不是很重视，现在的兴趣就更不如当初我写书评时那么大了。在分析理性与“辩证理性”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区别。在萨特的思想深处，存在一种辩证法。它与大多数哲学家的辩证法不同，不能直接或间接地用对话形式来确定它的含义。萨特式的思辨，缩小为对社会的整体化认识和把意识引申到未来。意识的确能够包括它所面临的社会形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意识把它所

面临的各种分散的事物整体化了。但是，这种对现实的整体化视角与被说成是哲学的使命的“知识的综合”毫无相同之处。“整体化视角”，并不是全部的认识。

由此看来，意识的辩证法（或者作为人类行为的辩证法）要求一种与应用于大自然的感知方式不同的感知方式。这种感知方式与德国人的“理解”，与许多作家继续用来作为“解释”的反义词或至少有所区别的“理解”没有什么不同。在《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中，我没有雄辩地论证，而只是指出，“倒退 - 进步”模式只是狄尔泰的一种理解模式。况且，萨特自己也只是以他常用的傲慢口气提提“老狄尔泰”^①。他们两个人都把重新确定意识的过程和掌握这种过程的可悟性作为认识历史现实的目的（狄尔泰——不是萨特——可能会在这里补充道：还有情感的作用和对人们的好感）。

757 萨特是想证明（《辩证理性批判》一书的明确目的），整个历史是辩证的历史。但是，他的论证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举棋不定，或者，他想像所有个人主义方法论的理论家们那样^②，其立论是用个人行为说明一切，或者解释一切，只有个人行为才是思辨的或可悟的；或者，他想利用“自我”向“普遍历史”的过渡来制造错觉，说明“自我”对感知环境的整体化，与知识的整体化或人类未来的整体化没有本质的区别（萨特准备在《辩证理性批判》第二卷中分析的整体化，还留有某些片断可寻）。

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把理性称为“意识的辩证法”，既然

① 萨特除了从我的第二篇论文中了解到有关狄尔泰的情况外，对其他有关此人的情况大概是一无所知。

② 按照这种理论，社会科学中的一切解释都要参照个人行为。

意识是自由的，那怎么能先验地断定意识必然会选择理性呢？在笛卡儿看来，上帝既然是绝对自由的，似乎也应该选择其他的真理或者另外一种逻辑。萨特的个人意识如同笛卡儿的上帝，每时每刻都在重新创造世界。为什么个人意识一定是理性的意识呢？为什么说理性是对意识、思辨行为的理解呢？为什么要说康德式的评论和萨特式的行为之间有一种渊源呢？我的同事于勒·维尔曼说得对，我不该提及《纯粹理性批判》这种超然存在的演绎法。可以这样说，萨特通过他独特的、不能异化的自由向半屈从的转化，再现了个人实践的史诗；在第二阶段，自由的反抗逐渐陷入囹圄，甚至走向斯大林主义和个人崇拜。总之，我曾经感兴趣的，而且现在仍然感兴趣的是个人实践同整体的融合，是这些整体所具有的多种多样的模式。

萨特对“系列”与“组群”的对照，显然是没有彻底研究人类群体的无限多样性。在汽车站排队候车的“系列”旅游者和一个攻克巴士底狱的“组群”，象征或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形式。那些思想有问题的人还可以回忆起苏联革命初期，汇集在一起的人群攻打冬宫的情景，以及在食品店前排队领取社会主义分配日常消费品的人们。

758

除了系列与群组的对照，萨特以大量细致的、启发性的分析说明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有时在消极愿望的支配下，人们团结在一起；有时人们虽然在共同行动，但内心是孤独的。萨特为人们提供了创造一个有对象、有制度的世界所需要的机制，而人们在这个世界里却只感到自己是局外人。无论其行为的目的性如何，个人行为都会与其成就的反目的性相互抵触。这种历史观与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总结的历史观并不矛盾，但在一些哲学和政治的基本观点上，我们是相互对立的。

萨特认为，既然我们领会了历史不同阶段中可认识的某些片断，就该得出这样的结论：全部的历史都应该是可悟的。^①然而，掌握了部分整体性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一下子掌握一种历史的整体性。另外，如何证明这种历史的整体性将能最终结束人剥削人和人压迫人呢？果然，萨特的理论出现了漏洞，人们对所有的异化现象能否同资本主义异化一道消失产生了疑问。

……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将采取什么措施来消除“形形色色的”分散化呢？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使作为当代社会之异化标志的集合客体融合在一个真正反映相互主观愿望的共同体当中呢？在这个共同体中，只看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关系。……资本主义异化形式的消失是否就等于所有异化形式的消失呢？（第 349 页，脚注）

在本体论方面，萨特想把自我的绝对性与历史的整体化结合起来。他承认意识客观化的必然性和这一客观化所产生的异化因素：

759

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要在事物中刻上自己的丑恶形象，如果他通过这种形象来认识自己，就会使他感到迷惘和不知所措，尽管这不过是导致意识客观化的总体运动。（第 285 页）

① 我在让·华尔哲学院举办过一次关于整体性的讲座。我听说萨特也用这个题目举办了一次讲座。其间，他提到了我的片断可悟性观点，并且批评了这一观点。他认为：如果存在可悟性，它就必须是整体的。这次讲座的时间大约在 1966 ~ 1967 年。

萨特的出发点是自我，或个人实践，或稍纵即逝的、自由的、自身透彻的意识。意识通过它的行为和经它加工的客体而扩展到外部世界；这种意识同其他意识汇合，但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是通过服从共同的制约，或服从无限的层级。这样，意识就充满了社会存在，具有了适应这样或那样一些整体的特点。意识由此变得对自己而言是陌生的了。无产者、犹太人、有产者、工程师和银行家，作为个人则代表着他所依附的整体，同时始终保留了与之脱离关系的自由。在被动实践中，自由趋向客观化，但是这种自由绝不会完全丧失。换句话说，萨特把意识的社会化描绘得如同坠入地狱一般，说成是社会存在的庸俗化和匿名关系的非人性。

当然，这种从本质上用异化来说明社会化的做法，是符合本体论观点的。儿童在没有超越自我的非正题的意识之前，在能够自我反省之前，就已经社会化了。而这种本体论的理论涉及一个被人们诅咒的全人类共存的观点。在任何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日常关系都停留在人的表面关系上，这些关系要听任习俗和礼仪的支配。但是，每个人由于自己的出身、宗教信仰和社会地位不同，作为无数电视观众中的一员，作为千百万工人或有产者中的一分子，他在自己的社会存在中，有时由于他的特殊作用，有时由于他的前社会存在或超社会存在，^①而显得独具个性。

在萨特的眼里，既然得体的微笑变成了装腔作势，那么混沌初开就是反抗：攻占巴士底狱的人群体现了组群、共同体的诞生。在肤浅的读者看来，描写聚集在一起的人群，便是谱写一曲英雄的乐章；事实上，这个人群代表了萨特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的解答。就像莱布尼兹提出的单子是由于社会所具有的本质而被判定为相互孤立的一样，意识同样也是与外界相隔绝的。

760 意识（或个人行为）只有在临时采取的、毫无组织的行动中，才能不受自身的约束，这种行动使每个人在其他人之间发挥媒介的作用。汇集在一起的人群，不再是美好社会的形象（不能每天都攻占巴士底狱），而是这样一个象征的姿态：本质上是自由意识发现自己是孤独的、被奴役的；这种意识与其他大量的不同的意识相联系，通过对现实的否定而自己解放自己。

把自由定义为反抗、透视未来和否定，这与黑格尔的传统学说比起来，没有任何独到之处。然而萨特的创新之处是，用群众作为反抗的典范，作为反抗的说明。就一个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或者更形象地说，就一个以意识的自由或自由意识为起、止点的哲学思想来说，这是一个悖论。然而，这种悖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汇集的人群当中，没有人想要别人去死，没有人在其他人的注视下丧失主体性。大家是在共同行动，每个人都轮番指挥别人和被别人指挥。但是，这个悖论也是致命的：所有的意识组成一种团体，而这个团体却是用来反对一个“敌人”，由此造成了以反抗者之间的和解来发动反对其他人的战争。那些被视为仇恨的对象的人在同样的情绪的支配下也起来反对另一个团体——巴士底狱，即建立的政权。由此产生了一种暴力哲学（或是暴力革命），这种哲学即使没被肯定，也至少是被提出来了。个人行为的象征在抽象思维中不再是对现实的否定，但在具体过程中，在以集体暴动形式汇集在一起的群众行动中，并且由于这种集体的行动，意识超越了相异性。在正常时期，这种相异性使每个意识都独立于其他意识。

萨特本体论的另一个特点是瞬间的彻底分离，如果说这不是加深了对暴力的推崇，那么也是强调了对它的偏爱。意识对

过去和现在而言都是自由的，从而产生了“誓言”的作用。发誓是带有神秘色彩的做法，用于禁止拥有今天做出决定而明天就背信弃义的自由。为了不受鱼妖的诱惑，于利斯（Ulysse）把自己捆在船桅上。一个战士发誓为他从事的事业服务，并服从这项事业，一旦他违背了自己的誓言，就将受到其他战友的处罚，或者更形象地说，他就命令其他战友处罚他。战友之间私下的友谊，同所有人向一个人施加恐吓或者一个人向所有人施加恐吓是分不开的。

那么能否从理论上说明抵抗运动呢？当然可以，按照萨特的解释就更是如此。他把革命者（或地下工作者）的实践，说成是自由指导的实践，实践的内容不断创新，自己随时敢于承担全部责任。“萨特拒绝承认同自己的过去有任何同一性。”^① 为了说明我们之间的哲学和政治分歧的深刻根源，引用我原书中的一段话，可能要比我现在再来说明更为清楚。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我们看过《辩证理性批判》这本书后，认为这本书顽固地坚持把本体论、个人实践、认识论或者思辨构成（即个人意识思辨）置于首要地位。作为社会人，要服从某些制约，他承认一些“价值”观念，并同某些“利益”联结在一起，他属于某一个阶级，或者被这个阶级所渗透，他是一个系列中的原子，或者一个群体中的行动者，按本体论的观点，这些都是出自个人实践，因此，任何集体、系列或群体，都不能消除个人实践本身。而个人实践

^① 语自西蒙娜·德·波伏娃。

在物质中的必然表现，别人对我们的行为动机的错误理解，物质与系列的辩证关系，总之，也就是自由的绝对性与消极实践之间存在的明显矛盾，怎样才能得到解决呢？或者，这种辩证关系是同“自为”、“他为”，以及“自为主体”即别人眼中的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一样的常见现象；或者，个人实践要不就是完全自由的，要不就是完全被束缚的。在我前面列举的例子中，有些文章赞同第一种观点。最后，萨特出于一时的激动，选择了第二种观点；即使有些与物质化和系列化密切相关的异化结构并不随着阶级、资本主义和压迫现象的消亡而消失，萨特仍然坚持他的观点，即要么完全自由，要么完全被束缚。他认为，在这个不同寻常的世界里，当代历史的动力和意义就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与暴力辩证法是一致的。因此，萨特不去审时度势，只是从原则上反对自由主义（按他对这一词的理解）和改革。他对暴力和革命的选择既是哲学上的选择，又是政治上的选择。我长期以来指责他热衷于谈论革命，指责他纵容以良好动机为名的犯罪行为。总之，我认为，萨特是把一些政治观点提到哲学的高度，他从理性上为“双重标准”的立场辩护。我既有不对的一面，也有正确的一面。我指责他从我的哲学思想出发，来阐述他的哲学含义。要弄清楚的是，一个“系统”地选择了暴力或者革命的哲学是否还配称作人类的辩证法，尽管它与其他暴力哲学不同，它指出人类的前景不是指包括地球上所有居民的一个整体，而是指他们相互间的无限统一：这个无限统一就其愿望和价值观来说是具有普遍意义的，是同法西斯主义针锋相对的。（第221~222页）

我的《历史哲学导论》同样代表了一种自由的哲学。我不否认，人，尤其是西方人，在本质上是“创造了诸神的人，是有限的人，他对自己的限度不满，但是没有绝对的终点和希望，他就无法生活”（第313页）。然而，任何人要考虑自己的生活和行动，都必须首先选择或者拒绝在系统内工作。理智的选择则要求他将现存制度与革命者将要实行或预见的制度加以比较。正是这个比较，使我采取了目前的立场，而萨特始终否认这一点。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否定现实，即否定资本主义的民主社会。尽管有时他也含蓄地承认，形式上的自由比“无产阶级专政”给予了人们更多的权利和保障，但是他仍然肯定革命的特权或革命的设想。在我的理智选择和萨特的无条件介入这两种立场之间，如果不是出于偶然，则不可能有任何相同之处。但只有一点例外：对一种政治的选择并不非要加入一个政党来体现。（《历史哲学导论》，第328页）萨特和我在实践中都遵循了这个准则。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的过去是自由的。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我就同萨特讨论过这个观点：“从来就没有完全的自由，一个人的过去限定了他的创造性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对于我们存在的连续性，我用两个词或两种象征加以说明：“悔恨”和“忠实”。第一个词意味着改宗，第二个词表示必须承担义务。绝对的自由，在瞬息间增加新色彩的自由，始终令我感到不可思议，这与其他人和我的经历是矛盾的。我从来就认为，自由应该是一种逐步的解放：“解脱来自摆脱了幼稚幻想的意识，它承认的是现实中的世界，而不是儿童们所幻想的或父母们所描绘的世界。”（第348页）

763

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个人，我都使用了“义务”（engagement）、

“忠实” (fidélité)、“改宗” (conversion) 这些具有宗教色彩的名词。在历史上,任何革命都像改宗一样,既要改变环境也要改变人。这是一种双重解脱,一种从作为历史延续的现状中的解脱和从历史自身中的解脱。这里所说的历史已不同以往,因为它通向另一个未来,展现出一种新的视野。因此,有必要对“忠实于历史”这一概念的含义和价值加以研究。然而,无论是革命者,还是保守派人士,他们直到取得胜利的那天都对此全然不知。革命者夺取胜利后,便继承了原来的衣钵,保守派人士则把忠实于历史同循规蹈矩混为一谈。抽象地表达出忠实的含义,这对国家和个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各国人民在内心深处已被各自的历史、被谋求唯一命运的天性打上深深的烙印而始终保持本色时,“忠实于历史”的含义对国家来说便更是至关重要的了。

我们对于决策、自由和时代之含义的理解,始终不甚相同。由此产生的哲学观点上的分歧并未影响我们之间的对话;哲学上的分歧一旦转变为政治上的分歧,这种对话事实上就不可能了。在这一点上,思想差距显示出我们之间的误解。我做了百般努力,但依然难以懂得,这样一个思想家,竟会这样地胡思乱想;针对我的思想批判,他竟然来一个道义批判:我这个有产者,心甘情愿接受的名号就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一书的发行量很小,但也只能如此。此书虽然我尽量写得简单明了,但仍不免有难懂之处,因此不可能使广大的读者都接受得了。这本书被翻译成英文后,有关评论褒贬不一。英美哲学界中一些拥护萨特的哲学家对我进行了批评,但没有暴跳如雷;另一些非萨特派的哲学家,如 E. 戈尔纳 (Ernest Gellner),对我居然有兴趣进行这些毫无意

义而又引起了众多反响和激烈评论的思辨感到奇怪。还有一些人，如狄尔泰，则非常正确地指出：书中的不足之处是对某些问题的分析过于简略，例如，萨特的辩证法和理解的关系，对社会科学中不可理解的部分的论述，萨特的本体论同个人主义方法论之间的关系。

许多朋友（如列维 - 斯特劳斯）饶有兴味地阅读了这部著作，书中虽然有许多令人无法接受的思想，却不乏精彩的分析。朋友们寄给我一些热情洋溢的信，时至今日，这本书仍有许多忠实的读者，比方说珍妮·赫希劳特。

莫里斯·克拉维尔为此写了几句话，刊登在《新观察家》周刊上。这就越发值得重视。艾蒂安·伯尔尼在一篇题为《两个同学》的文章中，首次设想促成我和萨特的对话。这要是在15年前，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的事。文章说：

走中间道路的人——或者更明确地说，走正确道路的人比极端主义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了解自己，而且比极端主义者本人更了解他们。极端主义者是绝对主义偏执狂，他们不懂得这一点，而且也不了解自己。阿隆的《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一书恰好精彩而又准确地证明了这一点……阿隆甚至宽厚地承认，他的粗暴的对手确实具有一种天才的创作力，这种天才的创作力体现为，毫不掩饰其含有愚蠢和错误见解的足智多谋……关于等待和预言的方式，在《辩证理性批判》第755页上是这样写的：“如果只有一个真理，那么‘历史的深刻含义’总有一天会在哲学家面前被揭示出来。”而阿隆的结论是：“萨特的激进的个人主义本体论使他永远不能领悟人类历史的整

体化真理。”虽然萨特从年轻时候起就自认为担负着继承尼采的光荣使命，他在自由和真理之间展开了一场生死斗争，并且还宣布了真理的异化观点，但是，他的这个希望显得更加渺茫了。

艾蒂安·伯尔尼在文章结尾处希望萨特“能够在为人正直的阿隆的感召下，从革命的教条主义中清醒过来，从对过去的耿耿于怀过渡到两人的对话上来”。当然，对话没能实现。萨特看过这本书，米歇尔·孔达告诉我萨特对他说：“阿隆至少是读了我的书的。”而萨特在《新观察家》周刊上刊登的对他的采访中，指责我歪曲他的思想的唯一目的是想更加有力地驳倒他。这大概是任何一个批评家都没有对我进行过的指责。

为第三方进行的辩论

战后的大辩论终于平息下来了；由于巴黎人需要争论，我们便把外国发生的事件当作辩论的借口和题目。知识分子们对第三者——如古巴、智利、葡萄牙和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进行辩论。

我对于非洲或其他地区发生的大多数政变不予评论，因为这种政变过于频繁，也就见怪不怪了。只有上校们的政变是个例外，我对《费加罗报》刊登了题为《希腊的悲剧》一文当然也不后悔。重读智利将军发动政变翌日，即1973年10月4日的文章，不管怎么样，我也不感到内疚。

在反对上校们的这篇文章中，我写得淋漓尽致：“上星期五，当我得知希腊政变时，我产生了一种幼稚的愿望，想重新变成大学生，以便有权大声喊出我的愤慨。……不管这些新主

子吹嘘会干什么好事（‘雅典实行管制’），这个事变对于一个爱好自由、生性慈善的国家来说，很可能成为悲剧，这个国家象征着文化的高峰之一，象征着理性的祖国。”我追述了君士坦丁国王与议会多数派领袖帕潘德里欧之间的长期不和睦——国王拒绝对后者给予信任，右翼和中间派无法就组织临时政府和主持新的选举达成协议。策划政变并未通过国王同意，看来国王只能在屈服或被废黜之间选择。“如果答应下来，就算是被迫答应的，国王就将把君主制度搞乱，最后并无任何出路……如果拒绝同帕潘德里欧合作，君士坦丁国王就会把事情弄得越发不可收拾。他想利用宪法，而上校和将军们却违背了宪法。但愿上校们也害怕明天会出现对他们来说不可收拾的局面。”事件的发展未出乎我的判断和预料：国王和上校们都从舞台上消失了。我在《费加罗报》收到的信主要是表示反对的，有几封措辞激烈。例如，我有什么权利去评论另一个国家的政治？那个国家自己正在寻找救国的道路，根本不理睬那些自命不凡和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

766

1967年，蒂埃里·莫勒尼从希腊带回一系列支持军人政权的文章；如果我需要保护，那么我的希腊朋友——科斯塔斯·帕波欧阿努和杰出的卡拉曼利斯自会这么做的。

我曾多次见到康斯坦丁·卡拉曼利斯。应《费加罗报》的要求，我想对他做一次专访，他拒绝了，因为对他来说，公开发表谈话的时机尚未到来。他自己也知道，解决希腊问题还得靠他，等希腊人倾听他的声音时，他当然要发言。他对我说过多次：“你所写的文章，我都愿意在上面署名。”当他返回希腊的时候，《新闻周报》说他曾在巴黎大学听过我的课，从而神话传开了。如果我真的教过他，我当然会为此感到骄傲，

但我并没有这样做过。^①我能教他什么他所不知道的呢？

我对智利政变的态度——这次政变使总统丢了政权也丢了性命——却遭到左派的指摘。老实说，我记得最牢的是《新观察家》周刊副主编波斯德的一封辱骂信；1933 ~ 1934年，他在勒阿弗尔中学当过我的学生。

我的文章一定会引起一个左派人士的愤慨吗？到今天，我仍不这样认为。这篇文章开头就向阿连德表示哀悼：

阿连德总统的生与死都同样令人敬佩。他恪守对宪法的效忠誓言直到最后，既没有放弃他的社会主义草案，也没有取消公众的自由。最终是军队，而不是左派联合阵线，宣布实行戒严，中止了民主制度，而这种民主制度早已成为拉丁美洲国家的榜样。如果灵魂的质量能代替思想的质量^②，如果一个国家元首只需对自己的用心负责，那么智利的历史就黑白分明了。武装的妖魔打败了当局的仁政。

767 我不能肯定，对阿连德总统的开明作风表示敬意，是否超出了这个人的功德。他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人和极左分子命运连在一起，他在执政的最后几周，在尊重个人自由方面，也没有像我歌颂他的那样一丝不苟。

对于这个手执步枪死在官邸里的总统表示敬意之后，我提出了一个论点。不管这种论点是对还是错，当时不只是我，而且现在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支持它，这种论点就是：双方都预

① 我永远不会忘记，1977年我在医院收到他送的一束美丽的鲜花。

② 这话是莱昂·布伦什维克说的。

料到这样一种结局，双方都准备进行实力较量。公众舆论也预感到这一点，并且十分担忧。通货膨胀有如脱缰之马，日用必需品十分匮乏，配给制、黑市、此起彼伏的各种罢工，这似乎就是对智利式社会主义的总结。到此为止，从主要内容来讲，我的分析与左派经济学家后来对智利左派的试验的破产的分析并没有什么区别。

工资——特别是最低工资大大提高了，这最初带来了经济活动和消费的明显增长。但到了第二阶段，物价飞涨，国际收支逆差膨胀。改革中受到损害的阶级，为国有化的威胁担惊受怕的社会阶层，起来反抗了。混乱、暴力事件、供应困难，为两个极端派进行一场决斗创造了气氛。

然而，对军人们的行为过于宽恕，这是我犯的错误，正如我介绍阿连德政府的行动那样。智利军队在“遵守宪法”方面是如此有名，以致当时我错误地认为，军人是为了避免内战而不太可能是为了干预社会主义的进展而出面干涉。搞政变的将军们仍然控制着圣地亚哥。他们当中的主要人物不仅提出要合法政府赶下台，消灭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和极左的政党，而且要建立另外一个他们认为十分稳定的政权。我对皮诺切特将军一无所知；全世界的大多数评论家对他的了解也并不比我多。这次政变在几年之后，仍想把民主制度引向正轨；军队，或者不如说军官集团的一部分，不过是想把他们的国家从马克思主义的灾祸中“拯救”出来，然后“革新”。

768

在阿连德试验的第一个阶段，法国的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加斯东·德费尔到圣地亚哥去朝圣，热情洋溢地评价智利式的社会主义。因此，我提醒读者反对这种无法容忍的混淆视听。我写道：“智利不是法国，智利人民联盟与共社两党

的联盟有深刻差别。法国军队不会派它的首脑到左派政府中去加强这个政府。^① 1961年，法国士兵已经表明，他们懂得怎样从半导体收音机^②中得到好处。”

澄清这种混淆以后，我又谈到从智利的例子中可能汲取的教训：“弗朗索瓦·密特朗过早地为—场最后演变为悲剧的试验而欢呼，这倒无关宏旨。他与共产党人结盟，在我看来也没有什么决定性意义，因为左派革命运动的极左分子比共产党人对阿连德的阻碍更大。关键是实施共同纲领，能否不至于引起经济危机，弄得左派政府不得不辞职或采取专制手段。”^③ 我与左派和右翼不同，我不愿利用智利的悲剧做例子在法国进行辩论。

这次政变发生在度假期间，我不愿对这个我从未研究过、也未访问过的遥远国家的政变进行评断。^④ 路易·加布利尔—罗比内的高级参谋之一催促我写文章。编辑中至少有好些人公开表示反对社长写的一篇文章，这篇肤浅的文章由于想揭露对肇事者进行打击的人，给人的印象是支持骚乱肇事者。而我的“文章”——我还记得——却相当受报社内左派人士的欢迎。三个星期以后，我又对其加以补充、修改，这样就成了一篇短文，登在头版左边一个竖条栏目中，我们通常称之为“报柱子”。我说希望经过一次短暂的军事干涉之后，士兵回到军营

① 阿连德让布拉特将军进政府当内政部部长。

② 为防止军官发动政变，戴高乐事先向驻阿尔及利亚的法军分发半导体收音机。后来，戴高乐通过广播号召法国士兵跟他走，不要参与兵变。——译者注

③ 科尔姆专门为此写了一本小册子《向社会主义过渡》，以葡萄牙和智利的情况之对比为例。

④ 我对事变之后的智利稍有研究。

中去，选民重新回到选票箱旁边。然而，“掌了权的军人集团野心勃勃。我们所掌握的消息——不管这些消息多么不完整，可能还是片面的——令人不幸地感到，对于他们行动方式之粗暴，思想之贫乏，确实不会再有丝毫怀疑了”。文章结尾，我对“那些关心智利式社会主义试验的人”，对“今天表明态度以便拯救那些受到镇压的威胁的人”发出呼吁，“以便在恐怖中保留选择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我甚至向基辛格提出：“应该让军人集团懂得，逐步恢复一种合法政权而不是镇压，才能保证得到华盛顿的支持。”我承认这个结论使人感到好笑。

更有甚者，葡萄牙也成了争论的对象，几乎成了法国辩论的核心问题。涉及《费加罗报》和我本人立场的档案材料，在我看来既简单又光明磊落。我过去同葡萄牙没有多少关系，只结识过几个反对萨拉查的大学生，他们在我的朋友、当时任法国驻里斯本的大使弗朗索瓦·德罗兹的官邸小住过一周。我曾写信为罗伯特·卡尔曼-列维的侄子说情，因为他在一个地下革命组织的案件中受到了牵连。法国当局曾多方营救这个乌尔曼族的青年，他父亲在葡萄牙已旅居几年，在那里经营一家企业。葡萄牙驻巴黎大使向我建议，我写一封信可能会对萨拉查的决定产生一定的影响；只有萨拉查本人才能对阿兰·乌尔曼不予起诉，否则阿兰·乌尔曼难免会被判几年的刑。我收到了萨拉查的一封亲笔信，原文如下：

雷蒙·阿隆先生，我国驻巴黎大使向我转递了您于3月1日写的有关一个法国侨民的信，这个阿兰·乌尔曼先生被控告同一个共产党组织有某些积极的合作行动。政府

尽管掌握了证据，但还是决定只把他驱逐出国，这已于本月16日执行。我们知道并且高度评价乌尔曼家庭和它在葡萄牙多年以来的景况。我为采取这一决定感到高兴，并希望您把这一决定看作宽宏大量的证明，同时也是对我们的法国朋友的谅解。阿隆先生，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敬意。

是否正如乌尔曼家族的人和葡萄牙大使向我肯定过的，我的信比法国大使的交涉更有效呢？

我回顾这段插曲——当然它的意义也有限——是想在为这个统治葡萄牙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人立传时做个补充。萨拉查反对民主制度，他的政权和他本人都动用秘密警察。说他是法西斯分子，把他同希特勒、斯大林甚至佛朗哥相提并论，这是哗众取宠或玩弄字眼。作为一个被军队扶上台以结束混乱局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他不属于我们的同代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曾自诩是真正的革命者；佛朗哥本人则注重历史多于未来，但是，为了上台执政，他不惜在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下进行一次残酷无情的内战。萨拉查从军人手里接过政权，始终不渝地维护一个基督教的葡萄牙，一个卢西塔尼亚帝国，而对于已经成为口号的现代化、经济增长、工业化、社会转移等无动于衷。他患了脑溢血，始终未曾痊愈，但卢西塔尼亚帝国还在，全体葡萄牙青年都要服3年军役。我在里斯本逗留时见过卡埃塔诺教授，这个法学教授不像萨拉查那样墨守过时的思想意识，但他来不及，也没有力量同萨拉查主义决裂。他被革命甩到了后边。

我本满怀喜悦地祝贺“康乃馨革命”，但革命一旦即将展开，我便指出“从黑到红”和重新回到“剑与圣器”的危

险。^①我过高地估计了共产党人与武装部队运动联合夺得政权的危险。我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做法相反，没有去里斯本朝圣。当马里奥·苏亚雷斯旅居和流亡法国时，我同他见过面。阿兰·乌尔曼把他引荐给我，并要求我支持他谋一个大学的职务。我在1974~1976年写的有关葡萄牙的文章中，一直为社会党辩护，并多次提醒它不要出偏差。 771

1974年10月12日，我请巴黎大学的一个同人讲话。他指责我欢呼萨拉查政权的垮台，并提到了一些往事：

1921年10月的一个不祥之日，安东尼奥·格兰若总理和他的一个阁员被骚动的水兵枪杀在兵营里。当天，我就在里斯本。但今天有谁会想到这件事，有谁知道这一切呢？由于人们对沉溺于幻想已习以为常，一代又一代的人不了解这个插曲，认为葡萄牙向来就是一个宁静而繁荣的国家，只是来了个萨拉查主义，才无缘无故恶毒地捣毁了幸福。

同时，我这个同寅还给我寄来一些葡萄牙教授的信件摘录，揭露大学里的乱抓滥捕事件。任何革命都未能在不制造另外一些不公正现象的同时，纠正这些不公正现象。对于这名同事的指摘，我并没有退让：“虽然可以说萨拉查不是法西斯分子，但这并不能减轻他的罪过，因为他已经不属于他生活的时代，因为他本人曾扼杀了自由权利。”作为经济学家，他把货币稳定置于一切之上，不惜牺牲经济的发展。在他看来，国家

^① 这是两篇文章的标题，后一篇文章暗指军队（剑）与革命意识形态（圣器）的勾结。

的贫困是自然造成的，对此只能听天由命，而且这有助于发扬基督精神。他本人倒是公正的，他维护了政权和少数人的财富；而少数人的成就也不足以为他辩解，因为总理宁要秩序而不愿冒变革的风险。萨拉查只看到了非殖民化的消极方面（如果用马克思主义的语汇来说）。他指责欧洲国家政府软弱或卑怯，美国政府轻率。他对“世界舆论”充耳不闻，相信自己是在诚心实意为了拯救一个多民族共同体的卢西塔尼亚神话而奋斗到底。在现实促使他的政权和他的幻想加速毁灭以前，他就离开了人世。

772 围绕葡萄牙，法国进行了比对智利问题持续时间更长的辩论。在法国，没有任何人——当然指左派，但也包括多数派的权威性发言人——赞成智利的政变。共和国总统本人也一反外交惯例，当智利大使向他递交国书时，他影射这个国家的国内制度。与此相反，法国人——除了极少数人——对“康乃馨革命”欢呼以后，立即发生分裂。左派方面，法共支持阿尔瓦罗·库尼亚尔，社会党支持马里奥·苏亚雷斯。革命时期的一次偶然事件引起了关于新闻自由的一场论战，反对共产党人而接近社会党人的《共和国报》停止出版，企业工人对记者进行新闻审查。既然此时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各个工会，还至少控制了部分电台和电视台，就很可能轮到被收归国有的报纸丧失其独立性了。《共和国报》事件带有象征性意义，尽管工人人们的行动不一定是受共产党的指挥。我评论过《共和国报》事件，《世界报》在头版左边专谈外国事务的栏目中也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这个事件。这篇文章结尾的一句话是：“如果葡萄牙社会党人在法律上有可能拥有一份日报，那当然是公平的，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法国社会党人没有经济条件来掌

管一份日报。”

我认为这种比附是虚伪的、骗人的，因为保卫共和联盟也没有广泛发行的日报。至于社会党，它对《世界报》的利用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即使再出一份《人民报》，也不可能被利用到如此程度。

不管怎么说，法国不是葡萄牙，智利更不是法国。社会党人可以毫无障碍地在电台、电视台、报刊上发表意见，这就很好。他们在巴黎没有一家大报，因为别的党——包括共和民主人士联盟、独立共和党人——也没有这样的日报。

对于我在 1975 年 6 月 23 日发表的文章，雅克·福韦 (Jacques Fauvet) 于 7 月 1 日反驳说：“这有什么可笑的！”他同时也反驳了曾激烈地为报刊自由鸣不平的埃德加·莫兰。米歇尔·莱格里 (Michel Legris) 在一本有关《世界报》的著作中，对雅克·福韦在这场辩论中的雄辩术做过长篇大论的分析。我不愿使读者感到乏味，不再全文或部分引述这篇长文；该文章冗赘，貌似谦恭，实则并非如此，由于谨小慎微而语焉不详，带有属于福韦本人而不是《世界报》编辑的不足之处。我过去经常提出疑问，为什么于贝尔·伯夫-梅里指定他当接班人呢？一个创业者，一个社长，往往要靠传位的人而免于被人遗忘。确实，伯夫-梅里和福韦两个人属于同一个大家庭，即滑向社会党人左派、从情感上讲反美多于反苏的基督教民主人士家庭。截至 1981 年 5 月 10 日，《世界报》一直是一身二任，既是半官方报纸（或全国性论坛），又是反对派报纸。

773

为了反驳雅克·福韦，我只要简单提出一点就够了：

如果福韦先生和《世界报》满足于说明，一次革命

在它的初期阶段不能阔气到讲究自由，我可以承认，过去确实往往如此，如今这是值得商榷的。使我感到荒唐的是，他们企图用全然不同的法国情况来为葡萄牙的一段插曲辩解。与其事后为这种革命捏造合法性，为什么福韦先生没有提出这样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即武装力量运动的革命到底是带来了新闻自由，也就是说反映了各派思想的报纸，还是带来了苏联式的报纸？

武装力量运动企图玩两面派手法：既抓住最高权力不放，又组织自由选举。当选的议员负责起草宪法，他们渐渐要求军人不大愿意给他们的实际权力。情报部门策划的一次夺取革命政权的尝试或半尝试悲惨地流产了，这标志着革命阶段的结束。早已明日黄花的美妙幻想经不住军人与文官、阿尔瓦罗·库尼亚尔与马里奥·苏亚雷斯彼此之间的角逐，何况还加上通货膨胀与罢工、非殖民化与从安哥拉和莫桑比克回国的几十万军人。葡萄牙依仗其帝国，还能受其伟大历史的一点儿荫泽；等到只剩下本国的版图，那就宏图也罢，幻想也罢，一概烟消云散。欧洲共同体给它提供了一条退路，而不是新的开端。

774 按照马里奥·苏亚雷斯的说法，葡萄牙先是社会主义的，后来变得温和了，不再是欧洲报纸的头版新闻。如果菲德尔·卡斯特罗建立的是一个代议制的、多元的和亲西方的民主制度，任何人也不会关心古巴。

索尔仁尼琴对巴黎知识界的冲击发生在同一时期。如果我在《费加罗报》上写的一篇关于“新书简介”专题节目的评

论没有惹得让·达尼埃尔大光其火的话，我也就不会卷入左派知识分子围绕《古拉格群岛》一书作者的争吵了。“索尔”的人格的确打动了我的心：他来自另一个世界，是个不同凡响的人，生活在地球上的40亿人之中，有他这种个性的人还不多见。他的话是向我们大家，向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说的。无论是皮埃尔·戴克斯，还是让·多麦颂，都没有在对话中强出头，他们也不想这样做。让·达尼埃尔惹我生气，但同时，我也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一样，感到自己的耻辱，竭力把他反对法帝国主义或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同索尔仁尼琴反对克里姆林宫的斗争相提并论。正如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向我解释过的，我患了一种外来的犯罪感。连犹太丑角，如马克斯兄弟班子中的小丑，都不能引我发笑：反而，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受人耻笑的小丑。

我在两天之后（1975年4月18日）写的社论中尽力说明了我这种迷迷糊糊的感觉。直到如今，我仍不认为这篇社论超出了辩论的界限。如果让·达尼埃尔一定要指责我的意见过激，那么他对萨特在1968年5月发表的针对我的文章又做何感想呢？我请读者看看他指责的内容：“对于从《死人之家》回来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谁忍心把一个官僚或这种官僚制度的忠实信徒推荐给他来对话呢？”另一天，在电视台，让·达尼埃尔表示遗憾，因为一个共产党员都没有到，所以他自己不得不扮演吃力不讨好的角色。索尔仁尼琴不是一个政治人物，尽管他的言谈、作品和生活构成了具有其全部痛苦和天才的政治现实。他的信念超越了政治，因为这些信念激励着一种非同凡响的个性，因为归根结底，这些信念是一种精神实质，即相信自由并无条件地崇拜真理。《新观察家》杂志社社长要求《癌症患者的病房》的作者就日常新闻发表意见，就等于把对话

降低到巴黎人的市井议论的水平。在西方，谁在像索尔仁尼琴一样战斗呢？回答很简单——没有人，因为问题提得太唐突。左派没有人，右翼也没有人。要进行同他一样的战斗，就必须面对同样的敌人，冒险在集中营里度过漫长的岁月，在同样的较量中汲取抵抗地狱般机器的无穷力量。关于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文章或著作，我们写了不少，我们没有什么可抱憾的。当然，我们碰到《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作者时，也没有权利为此而骄傲。至于索尔仁尼琴对越南、葡萄牙或智利的的评价——当然，他们称之为“讨论”——可能是流亡者自己弄糊涂了。萨拉查政权留下文盲占50%以上的人口；智利的将军们滥施镇压和严刑拷打；葡萄牙的尉官和校官们比昔日的主子开办了更多的工厂和学校。北越的共产党人至少结束了战争。索尔仁尼琴使人难堪，惹人发火，正是因为他击中了西方知识分子们的敏感点，击中了谎言。他们对他说，如果你们接受大古拉格集中营，对一些小古拉格又何必表示那种道貌岸然的厌恶呢？集中营就是集中营，管它是棕色的还是红色的。

五十多年来，西方知识分子拒绝倾听别人提出的问题。他们果然提出，集中营有“好”有坏，有的集中营由于动机善良而光彩熠熠，另外一些还是集中营。在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了这种错误，总想找出理由来曲意谅解或革出教门。自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更是大错特错，正如他们拼命拖着不承认有什么古拉格，让它把号称最仁慈的政权作为自己的隐身符。一方面是萦绕心头的左派团结与如何和共产党同志合作，另一方面是“集中营里的犯人”，两者当然不是势均力敌

的。但据我所知，几乎没有法国人不为索尔仁尼琴的伟大而折服。不管怎么样，我相信几百万电视观众欢迎他的祝愿，仁慈的、诚挚的和充满希望的祝愿，这种祝愿照亮了一个人的面孔和目光。

几年之后，让·达尼埃尔在他的《决裂的年代》一书中 776
仍然觉得我的话是一种人身攻击，这种攻击在我是失了身份，对他也是不公正的：

我对这件事不能无动于衷：雷蒙·阿隆居然完全失去冷静而大发雷霆，态度之粗暴在他身上是少见的，因为我没有在他这样一个人杰面前乖乖地退避三舍。他根本不愿意听清，也不愿了解我的问题。他似乎认为，他所崇拜的偶像的回答没有任何意义，他指责这是我挑起的。然而，从某种意义来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观察是否并无错误。崇拜是我最恨的东西。我可以爱，可以钦佩，但绝不会折腰。我相信，在我平生最佩服的那些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面前，我都没有哈过腰。我对任何人都是如此。

在我的文章中，我没有发现丝毫失去冷静的痕迹，更没有要求他退避三舍。我只是看到他因为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参加讨论而感到遗憾，自己承担了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我和他一样，并不准备赞成索尔仁尼琴对世界局势的所有评断。但是，当时的让·达尼埃尔还没有做过是否过敏的皮试，开口就是他的“共产党同志”。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对他个人结交的共产党人还大加赞誉，不许别人把共产主义比作法西斯主义。

我没有指责他谈其他专制制度或比较专制的制度。他也反对这些制度。然而，面对索尔仁尼琴，法国知识分子为了挽救“左派的团结”，进行了错误的立论：苏联的古拉格与萨拉查的葡萄牙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我丝毫不想攻击让·达尼埃尔，因为我说过，这个对话者的伟大足以压倒任何人。我只是批评他没敢承认知识分子左派犯的根本性错误。在越南，让·达尼埃尔只知道唯一的敌人——美帝国主义，而这个帝国主义自己定下的最终目的，就是撤退。索尔仁尼琴认为越南也有一个共产主义和另外一个古拉格群岛，他是对的。让·达尼埃尔倒是老实地引述了索尔仁尼琴关于越南的谈话：

777

签订《巴黎协议》时我还在苏联，我的所有朋友都感到惊异，他们不了解这些协议将被认真对待。看看今天的情况吧！假设越南南方攻击了北方，必将出现一场雷鸣、一场风暴和大喊大叫。人们将指责南方的反革命分子违背了《巴黎协议》，即使这些反革命分子过去是反对美国的抵抗战士。如果是越南北方侵入南方，大家都会额手称庆，或者宁愿自己不去过问这个问题，而是建议外国人尽可能快地离开西贡，离开金边，因为他们的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障。你们知道外国人离境对我意味着什么吗？这就是见证人走了，就是所有可能目睹胜利之师进城后将发生的事、能回忆或讲述这些情况的人都离境了。结果，对我在别处目睹的情况的记述将会推迟几年。

《新观察家》周刊即使在“给越南一条船”的运动出奇地引起人们联想时也没有反躬自省，至少据我所知是如此。如果

北方反对南方，按照左派的想法，这种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当然，越南在美国巨无霸面前显然十分矮小，自然会引来世界舆论的同情，即使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没有全盘开动。但是，西方忘记了这些矮小的人带来的是什么制度，什么样的古拉格。

难道还需要我自己说我是无辜的吗？我从不掩饰我对南方的同情，但也没有定见，因为理查德·尼克松当选伊始就甘愿从越南脱身。作为世界政治的评论家，我既要考虑依实力做出的决定，也要考虑美国人民要结束这场无止境的和成问题的战争的意志。

几周之后，我在1975年6月12日的《费加罗报》上回答《世界报》“自由谈”栏目转载的索尔仁尼琴的一篇文章。照他的说法，对西方而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不战而败。南方已经输掉这场战争，因为人们总是倾向于“靠某些幻想来维持永久繁荣”，那么这就不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了，而是要制止第四次世界大战：“或者制止它，或者屈膝投降。”

我列举三条理由予以反驳。1945年以来的共产主义扩张 778
有以下重要事实为依据：东欧国家的苏维埃化，这些国家由俄国军队“解放”，随后执行苏维埃制度；共产党和共产党军队在中国的胜利；欧洲帝国的消失在某些情况下，特别是在越南，为当地的共产党提供了夺取政权和建立共产党政权的机会。

西方在上次大战的翌日，似乎本来可以阻止东欧苏维埃化。当时美国握有不可相抗的实力。出于多种原因，包括政治的和道义的，华盛顿在外交上，无力在几周之内更换自己的敌人，在由于打败第三帝国而声誉日隆的苏联盟友的逼迫下，不得不撤出东欧。美国不介入中国内战没有错，它的错误可能是在加速非殖民化方面，但从主要方面来讲它是对的。所有这些事件，从

整体来讲，当然等于一种撤退，或者说是西方的衰落。但是，西方给予它曾经殖民和剥削的民族以独立，却并未背离西方的本意。

索尔仁尼琴把美国反对对越战争，说成是拒绝“承受在越南的遥远战争的苦难和悲痛”。我驳斥说：“……在这种拒绝中，掺杂着一部分‘神圣的自私’，但也包括一部分理想主义、负疚和心虚。一个民族、一个民主国家，只有在它感到从道义上讲与自己有关，相信是在捍卫一种切身利益和原则，或至少是在捍卫一桩善良的事业时，才肯打仗。西方知识分子拒绝正视北方政权是一种斯巴达式的、无情的、绝对邪恶的政权……”

借这个机会，我再次提出，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些不道德的东西。一个民主国家对与它打交道的那些国家的国内制度不能够也不应该视而不见。但是，一个民主国家同样不能、也不应该用十字军远征的办法来推广自己的制度，因为“随时随地攻打自己认为不好的制度，如果采取攻势，那就是进行圣战，如果采取守势，就是打必败的仗”。我对西方执政者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但尚没有得到果断的、明确的答案。779 例如，是否应该与苏联进行贸易？支持还是不支持中国反对苏联？针对 1975 年以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把东西方的对立放于次要地位，把南北对立摆到前台，我重新提出我坚信的一个论点：“不管各方面的人说什么，尽管西方和第三世界之间有利害冲突，苏联与自由西方的对立仍然是 20 世纪的关键。”

1977 年，为了我的朋友爱德华·希尔斯的一本书，我写了一篇文章，题为《论善于运用意识形态》，文章把自我辩护和自我批评搅在一起，但后者超过前者。

当然，我重申了一个我多次支持的论点，即至少暂时来说，马克思主义仍然是西方最后的思想意识体系，是最后的完

整阐述体系。马克思主义指出了恶的根源（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指出了值得诅咒的人或集团（资本家或资本主义，后者是历史主体），指出了历史受命起“赎罪”或“救世主”作用的人或集团。与其分析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不如解剖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衰落。我要自责引咎，尽管我没有直接而只是间接引起了混乱。这是世俗信仰与意识形态、世俗信仰与宿命论之间的混乱。作为世俗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衰弱了，这有助于对问题进行合理的切磋，同时也造成了派别丛生，互相冷眼相待，总之，引起了各种争论。

我曾给“意识形态”一词下过一个狭义而明确的定义，它接近“世俗信仰”，而“世俗信仰”这个定义弊多利少。无论对世界有无完整的阐释系统，宿命论和太平盛世说照样层出不穷。旁观者对紧张与缓和、信仰与怀疑的此去彼来一览无余。他赞叹，同样的希望尽管多次上当，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激励人们去攻打同类的巴士底狱或粉刷一新的旧巴士底狱。1930年代初，卡尔·曼海姆担心高举遐观的意志会被苟安现实的意志所取代。卡尔·波普尔爵士和其他许多人希望，人们按照科学的方法，对始终不会完善的社会秩序的可能改革进行理智的探讨。卡尔·曼海姆的担心平息了，那个社会工程师的希望也落空了。

780

即使是在过去的几百年中，人们从上层到底层都讲传承原则，讲教义真理，但只要意识形态中包含神学，包含教会信条，这些政治讨论都可以称作意识形态的争论。到了当代，在那些已经不再自称代表一种真理、一种来自上苍意志的制度下，政治已完全成为意识形态，或者换一种说法，意识形态的争论构成了政治的实质内容。

“旧制度”并不是按照文人墨客争论的结果建立起来的。君主的正统很难同教会的教义分开，贵族的正统来源久远。一旦教会和传统遭到怀疑或被抛弃，大声宣告的人民主权、所有政党和社会集团都会被牵扯进一场无休止的辩论：什么制度最适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自由与平等），最有利于集体发财和个人福利。这些宣传机构的形式视不同政党和不同时期而异。一个极端派主张，理想的整体应该是对现状和价值观念的比较严格的整合；另一个极端派则认为，理想的整体应该是自行组成一些体系，而这些体系自愿互相包容，审视现状，预测未来。我过去用“意识形态”一词来称呼后一种类型的整体，但今天还能不能这样说，我就有点举棋不定了。

当然，把斯大林式的宣传与根据多种参数（个人自由、生产效率、收入分配、生活质量等）对不同经济制度所做的比较分析相提并论，我认为这有些不妥。一方面，人类的整个历史——即使不是宇宙的整个历史——一直在走向没有阶级（或者非对抗阶级）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向所有现代经济提出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既参照理论，又注意实践，探索不同的解决方式，以便准确说明每种解决方式可能带来的后果。一方是未卜先知，认为现实与价值观是一致的；另一方认为存在与应该存在具有两重性，从而执着地探讨二者孰优。两者的对立如此突出，以致我不敢用同样的词语来称呼这两种态度。

1977年我写道：促使我今日改变用词的，首先是合乎这两种理想之间的理想越来越多；其次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对学说中派生出一些教条，这些教条也是同样粗浅和蛮横的；最后，宣传和社会科学所用的概念大同小异，现代社会本身从党派对立中吸取的认识和它们理应从各个科学学科中得到的认

识之间不断互相渗透。在称作“社会主义”的制度中，这种互相渗透导致了一种同一化：意识形态至上的制度实际上把从马克思主义中抽象出来的，或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据的某种世界观树立为国家的真理。在西方，我们的社会既没有对有关西方社会认识的一种总结，也没有对其前途的统一的看法，更没有对其理想的形象概括。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断言，或者直接颁布一种普遍真理，拒绝区别自己的所知和所欲；自由派或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都意识到头脑发热会造成陷阱，意识到现实本身也有莫名其妙之处，从而经常不断地对自己的设想和判断提出质疑。这是怀疑主义吗？绝对不是。自由派不懈地追求真理，对他的最终信念，即他所信奉的伦理和理智箴言从不动摇。我同那些真正的信徒、世俗信仰的虔诚信徒持对立的立场，这并没有错。但我把一方称为“意识形态”，另一方称为“非意识形态”，那就不妥了。不如稍加修改后借用帕斯卡尔的一本书的书名：意识形态的正确用法。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 美国霸权的终结

782 1947~1958年，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多数是涉及经济事务和世界外交进程的。我对第四共和国的党派之争兴趣索然，因为各届政府、各种联盟实行的政策本质上没有区别。1955年议会解散以后，共和阵线理论上取得胜利，促成居伊·摩勒当上内阁总理；内阁负责向阿尔及利亚派遣军队。应皮埃尔·布里松之约，我就《第四共和国要活下去就必须改革》一题写了几篇文章。我设想在原有制度范围内才可能进行改革，而这样，改革就毫无意义了。实际上，需要一次冲击，一次全国性危机，来使议员掌握的共和国认输，这样才能不打破法制而制定一种像第五共和国宪法那样的宪法。

在戴高乐将军当政时期，我被当作“反对派”。我对“废旧政权”丝毫没有留恋之情。对于将军的外交政策，在某些点上我不赞同，但就1968年5月事件而言该站在哪一边，我却毫无犹豫。我的评论文章有时难免过激或多有冒犯，这是由于一方面，我对社论撰稿人的义务有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我宁愿同统治我们的君主保持距离，首先是我不同意将军的外交政策。

783 在后戴高乐主义的12年中，我在法兰西学院讲课并著书立说，这些比后来参与《费加罗报》和《快报》周刊的工作占据了我更多的时间和注意力。然而，1970年代，战后建立起来的一切体系——布雷顿森林会议制定的货币体系，靠美国

的实力和意志、两个大国的勾结和斗争、美利坚共和国的核优势来维持的国际体系——都被突发性的打击动摇了。其实，这些突发的危机从1960年代起就已经在酝酿并逐渐成熟了。

1969~1975年，有一个人经常出现在公众视野，这就是亨利·基辛格。我对他的了解超过我对任何一个美国国务卿、任何一个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了解，可能只有莫里斯·舒曼除外。我甚至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他是我的朋友，当然不要忘记，“朋友”一词的含义是伴随年龄和环境的改变而变化的。对于我青年时代的友谊，如与拉加什、萨特、吉尔、尼赞、康吉莱姆，我曾有切身感受，而且我经常重温这种友情，总之是我难以忘怀的。我们之间不分彼此，慷慨解囊，而对表面上的竞争毫不在乎。这是青年人的单纯或幻想？我不知道。即使政治未能把这种友谊割断，可是友谊也难免衰老，也可能更加深沉、更加牢固了；每个人都被职业、家务缠身，没有时间进行没完没了的交谈了。

成年人之间建立的友谊就大不相同了。我是1937年碰到马奈·斯佩尔伯的，那是在位于巴克街的安德烈·马尔罗的狭小寓所里。我们的友谊在战前的艰苦年代里经受了考验。这种友谊一直维持至今，从未间断，也未见削弱。我们从事同样的战斗，反对共同的敌人，即使意见相左时，心也是连在一起的。

在1940年代末，亨利·基辛格刚从哈佛大学毕业，就来拜访我。他当时主持一份刊物，叫《文汇》（*Confluence*），他同时给哈佛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暑期班讲几节课。1950年代，我在巴黎或美国不时见到他。我远远地关注着他的生涯和他著书立说的成就，特别是他的成名之作《核武器与外交政策》。

我欣赏这本书，但在在我看来，它不值得喝彩。他只是由于注意强调政治相对于技术的优先地位，而同其他国际关系学教授相比在某些方面较为突出。

784 我在哈佛大学任客座教授的那个学期，经常到剑桥去看他。他邀我主持他的一次讨论会。^①毫无疑问，他对我很重视，或者换个说法，他虽然自认为智力超人，据说想压倒一切凡夫俗子，但不包括我。由于年龄上的差异，他总是以一种晚辈或学生的态度敬重我。他从来没有做过我的学生，但从《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一书中获益匪浅。同我一样，他对历史比对科学模式更感兴趣。对这本书的质量他诚恳地表示赞许。我相信他的话是真诚的。^②

我知道他在事业上有一番抱负。在1960年代初期的美国，这就意味着要在华盛顿谋取一个要职。他也不放弃纯学术上的成功，希冀在国际关系和战略问题专家中执牛耳。然而，他也许说过，现在这种形式下的政治科学，单靠自己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行动比理论更有价值。爱因斯坦比一个核能源工程师高超10倍，但一个国务卿要比一个最好的国际关系学教授强得多。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承认这种价值的等级划分。

我是不是预见到“基辛格博士”在华盛顿弱肉强食的世界中会获得如此意外的成就呢？肯定没有。我也没有预见到他的失败。我只是有些怀疑，他能够让总统听他的意见吗？能用奉承话把记者笼络住吗？能迫使参议员尊重他吗？我也许可以打赌说“能”，但绝不会拿我的脑袋押宝。

① 48小时以后，我接到一所军事学校的邀请，请我讲同一课题：实力与外交的关系。美国信息交流之快，可见一斑。

② 参见《纽约时报》上的评论。

1969~1975年，我在巴黎和华盛顿多次见到他。根据回忆，我第一次到白宫见他是在1970年，正值柬埔寨危机。第二次是在1972年春天，当时北越的进攻已使南越军队陷入危险境地。他记得我的上次拜访，因为他一开头就向我提到：“您带来了风暴！”他途经巴黎时，经常同我共进早餐。有一次，法新社在一篇电讯稿中提到，基辛格路过巴黎时，曾会见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和雷蒙·阿隆。我极少提到我与当今世界大人物的谈话，因为这种谈话确实比较少，而且我从中毫无受益或受益甚微。1953年，尼赫鲁在新德里曾接见我半个小时，我对这个人记忆犹新，但他没有对我讲过任何新东西或秘密。韩国的李承晚总统会见我整整一个小时，我对这次会见比较感兴趣，特别是他通情达理地讲了朝鲜的分治问题，并且提起朝鲜有好几个世纪曾分裂成几个王国。

785

基辛格在1969~1975年与我的谈话中，没有向我透露过报刊上或到处流传的小道消息中无法得到的东西。尽管如此，同一个正在与苏联人、越南人、以色列人、阿拉伯人谈判的人接触，有助于我说明事态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对基辛格的思想方式深有同感，这是从“同感”一词的本意来说的，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也会与他有同样的感受。至少，他在这些谈话中乐于向我解释，出于什么理由他才采取这种或那种态度。而且，大家都听到他主张体面的和平，并指出投降的代价。即使在同我谈话时，他也从来不就一个主题使用同样的语言，例如，关于战略核武器力量对比的重要性或微不足道等。1969年，他已经注意到维利·勃兰特奉行东方政策的苗头。对此，他并无好感。他是否经常阅读我的文章，我不能肯定。我估计，他的助手们很可能不时把我的文章拿给他看，主要是

明显地批评他的或赞扬他的文章。只有一次，他写信回答我有关塞浦路斯的一篇文章。我批评他，说他没有立即谴责希腊政变，而且明显地容忍这种会招致土耳其军事干涉的行为。随后，我们互相还通过几次信。不管怎么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在他当政以前和以后一直保持了同样的性质。在他解除公职后，我同意成为他创建的非正式智囊团的成员。

786 我对 1969 ~ 1975 年美国外交政策的态度，有没有由于我同这种政策的制定者之一有个人关系而较为宽容呢？

根据我就某一问题所写文章的数量可以看出，在所有的现实问题中，黄金与美元的关系引起我很大的兴趣。为什么我的兴趣会走两个极端，我找到了两个都说得通的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个人方面的和政治上的：美国的收入逆差引起法美争论，我出于职业上的义务对此有意表明态度。第二个理由更多是学术上的：货币体系与核武器体系，至少在表面上有两个共同点。在这两种情况下，从背景或从根源上讲，一个魔鬼或一个图腾在暗中起作用。炸弹是利用其散布的恐怖，只要炸弹不出地下仓库，就可以压压激情；黄金是利用其掀起的拜金主义，储存在诺克斯堡的黄金，构成信贷金字塔的基础。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就向抽象化跨出了最后一步，因为当一种货币不再成为一种实际财产或代表一种实际财产时，它就成了一种购货凭证，不太看得出信贷的性质。

我认为，无须进行具体的分析，外行也容易理解这场争论——就算不能理解这些机制的微妙之处。美元起着跨国货币的作用，在全世界流通，可以兑换其他任何货币。美元是由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权力机构发行的。即使在社会主义世界市场

中，美元也往往被当作记账货币。1945年以来，美元在理论上是可以兑换黄金的。财政部部长曾写信通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美元兑换黄金。当时，美国拥有世界黄金储备的80%左右，按1盎司35美元计，其储备相当于270亿美元。基于这个事实，美元成了黄金的对等物，保证美国享有用它本国货币在国外和国内购买物品和劳务的独一无二的特权。从195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国际支付每年（1957年除外）都出现逆差，但数目不大，总在10亿上下，华盛顿领导人所希望的黄金再分配开始了。 787

对这种逆差感到不安的，首先是肯尼迪总统。他要求专家们，例如萨缪尔森教授，提交研究报告。萨缪尔森认为，美元与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的比价太高了。1940年代末，汇率升高，欧洲经济恢复以后，这种汇率已不再适应购买力平价。他的分析没有被公布，而经济学家们也认为不可能进行如愿以偿的贬值。欧洲人还没有忘记他们战后的虚弱状况，对于有利于美国出口的美元贬值不会等闲视之。

1960年代，我不时评论雅克·吕埃夫与大西洋彼岸的经济学家之间的技术争论，也对戴高乐将军与美国执政之间的政治争论做一些评述。雅克·吕埃夫重新提出他在两次大战之间的主张，强调金汇兑本位制的弊端，或者说，强调使用本国货币作为黄金的等价物和储备货币。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要求有剩余美元供其他国家使用，而其他国家则把这些美元作为国库券存放在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对美国的信贷体系不会起任何紧缩通货的影响，因为这些信贷仿佛又加了油。同样一批资金用了两次，第一次是从国外购买物品和劳务，第二次是这些资金回到美国以后，用来增加货币量，同时供给通货增加发行量。

由于当时美国企业乐于购进欧洲企业或在国外设立子公司，对这种现象必须加以指责的想法在法国国家元首的头脑里油然而生，因为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或金汇兑本位制注定要使美国享有特权：美国可以用本国货币偿还债务，或更甚之，用本国货币购进外国企业。而且据说，国内通货膨胀造成的美国国际收支逆差将其恶果扩大到了整个世界。

1960年代初，雅克·吕埃夫不相信这种基础不牢的货币体系能够维持下去。我还记得我从哈佛大学讲学回来后，在保罗·雷诺家中同他交谈过一次；我打赌在肯尼迪任期届满以前，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应勒内·鲁瓦的要求，我就这个问题在他主持的一次计量经济学讨论会上发过言，我不揣冒昧地预言，今后几年之内，美国将奉行相同的政策，几乎不做修改，而且它还会掌握这种政策的手段。一旦美国的黄金储备降到一定数量——我“粗略”估计到100亿美元（官方价格）以下——美国就会中止用美元兑换黄金。我的估计没有大错。讨论会的一个与会者给我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是一个科班出身的数学家，信中提及对高师和社会文献中心的怀念。既然政府人士的决策至少在短期内对货币的影响大于国外需求对美国出口的弹性需求的影响，他就开始怀疑自己从事的计量经济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

从个人角度，我拒绝明确表态，我同雅克·吕埃夫和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都保持友谊，而他们两人却一直互相怀有很大的反感。我从来不知道这种年轻时候的争吵究竟出于什么原因，也就不在他们之间传话。当他们把矛头指向贴心的冤家时，我认为两个人都不对。他们用词之激烈始终使我感到惊异，因为这两个人一般来说对他们的同行都是宽宏大度的。

雅克·吕埃夫指责鲍姆加特纳只讲事物的表面，而从不抓住其根源和机制；鲍姆加特纳反唇相讥，说吕埃夫把自己禁锢在一个概念圈子里或抽象的设想中，以致失去与现实的接触。

确实，雅克·吕埃夫 1945 年从同他的能力本来相称的职位上被排挤下来以后，反而扩大了自己的探索领域，设想一种体系或次序自然哲学，研究从阿米巴或细胞到国民经济，甚至到世界经济。他从来没有放弃他的研究，也没有放弃他的行动。他的警告在很大程度上被 1970 年代的混乱证实了。我个人不相信有可能重新建立金本位，这也是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吉尔伯特主张的。他是国际结算银行的顾问，是吕埃夫孤军奋战中的唯一盟友。这种不可能是不是由于美国领导人从政治上拒绝考虑呢？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的事态发展证明我是有道理的。这种不可能是否同世界经济的性质也有关呢？辩论仍在继续。而且，区别政治上的不可能与技术上的不可能，是否经得起分析呢？

789

我并不相信金汇兑本位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之通货膨胀趋势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但我强调指出两个明显的事实：美国享有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外债的一种特权，从长远来讲，这种特权对它自己也是危险的；美国对国际支付逆差习以为常，把这种逆差看作正常现象，这样一来，美国就不肯采取一些限制措施，而经济形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迫使其他有逆差的国家采取限制措施。这两件事让真正的问题被束之高阁了。

美元升值有利于美国对外投资，同时也有利于欧洲出口。在这场赌博中谁是赢家，谁是输家？事实上，在像法国这样的国家，美国大公司的子公司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增长；即使是美

国买进一家要破产的企业，国家不是也可以从“瘸鸭子”企业的扭亏为盈中得到好处吗？这些美国子公司的对外销售都要计入法国对外账户的存款账上。换句话说，在战后年代，随着美元升值，美国享有的特权对我们国家的利益并没有什么损害。

而且，我怀疑没有任何体系能够代替布雷顿森林会议体系。美国人明白无误地表明了他们的意图：他们不会恢复金本位制，他们将停止黄金流通。诚然，我多次强调，美国人不会向市场大量抛售他们的黄金储备，以致造成黄金市价暴跌。但是，他们可以使用一定数量的黄色金属来改变货币的定义。从而，一项史无前例的试验开始了。

在各国内部，货币的价值不再取决于中央银行库存黄金的数量，而是取决于物价水平，取决于货币作为购物凭证所能买到的物资和劳务的数量，取决于对外贸易。在本国经济中，货币中断了与实物的联系，而几千年来，这些实物曾充当过货币。黄金由于能够兑换美元，因而在账面上仍然是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的基石。一旦美元不能兑换黄金，国际货币体系也同样将成为一纸空文。美元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和象征；美元虽然声誉日衰，但仍居统治地位。因此，我多次建议法国人和美国人共同参加“谁输了谁就赢了”的游戏。如果用中止兑换黄金来造成美元猛跌，法国人可能使他们揭露的恶果变得更加严重。1971年8月危机之后不到两年，美国人便把自己的学说贯彻到底，干脆来个完全放任自由。他们单方面违背了布雷顿森林会议原则，不再固定货币汇率，无论是货币还是黄金，都实行浮动汇率以代替固定汇率。

后戴高乐主义的领导人就算不能说遵循将军的实践，但仍恪守其理论。他们继续批评美国对货币的管理，始终赞成固定

汇率，反对美国悍然以用之不竭的美元来支付它的外债。与此相反，乔治·蓬皮杜当选总统和吉斯卡尔·德斯坦重返里沃利大街^①以后，法郎就实行贬值。当时，我赞同这一决策，它开启了到1974年为止的高速增长阶段。事后我思忖，1968年11月劝阻戴高乐将军不要使法郎贬值的人，如让纳内和雷蒙·巴尔，他们是不是有道理呢？1969年的贬值造成通货膨胀，使企业主们习惯于按法郎与马克，以及与同马克有联系的其他货币的过低比价来结算。法郎贬值搞出了个“补偿额”制度^②；共同体农业政策的实施越来越不对头，因为这个政策实际上是以汇率稳定为前提的。

791

1974年的危机是1960年代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两个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都未采纳某些经济学家的理论，说什么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符合事物的本质，应该满不在乎地容许逆差，甚至鼓励这种逆差。美国作为世界的银行巨头，进行长期投资，吸收短期贷款。实际上，这两个总统曾经采取局部措施压缩美国在海外的支出（如美国驻外军队的经费），阻止资金外流，限制外国借款人涉足美国市场，等等。这些局部措施中的任何一种都未能对美国的国际收支总平衡产生影响。此外，1965年以后，约翰逊拒绝用税收收入为越南战争提供军费，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的通货膨胀。1971年8月，尼克松被迫中止美元兑换黄金，致使美元与工业大国的货币的比价降低。现在回过头来看，1971年的争论只足一哂。

① 法国财政部所在地。——译者注

② 在共同体所有国家中，价格原则上是一样的，将本国货币贬值的国家应根据货币贬值的百分比对本国出口征税。其他国家的机制则朝相反的方向运转，对本国出口实行补贴。

792 欧洲人对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批评相当激烈，同时他们又反对美元贬值，因为这种贬值对国际收支逆差只是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法国人坚持美元必须对黄金贬值，或者说，黄金价格要提高，使黄金确实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一切货币的价格都按黄金比价来确定。尽管尼克松在亚速尔群岛会议上同意 1 盎司黄金的价格从 35 美元提高到 42 美元，但 1971 年达成的妥协并未被维持下来。总统的顾问、大多数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反对货币体系强加给他们的限制。美元贬值表面上看让美元声誉下降了，实际反映了一种解脱，也就是一种胜利。

事后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围绕黄金、美元、跨大西洋关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等问题写了这么多文章。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我是从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实际财产）的消失中看到了一种历史哲学的意义。同时，对我这个喜欢穷原究委的人来说，这些半技术、半意识形态的辩论也提供了材料。从这一点考虑，我对任何一方都不表示完全的赞同或反对。1971 年 9 月 3 日一篇题为《各人有各人的道理》的文章，可能最能代表我的态度，这种态度使某些读者有点恼火，而对有些人来说则令人开心或富有教益。

在这篇文章中，我阐释了约翰·康纳利（J. Connally）和总统的决策：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美元与主要竞争国货币的比价平均下降 10%，在改变汇率之前，对进口商品征收 10% 的关税。这一事件引起三种类型的反应，用三句话来表示倒比一篇长文还清楚，即“我早就告诉过你”，“厚颜无耻与心安理得”，最后一句是：“好了，曙光已在天边。”

第一种说法在法国最时兴。美国已经把本国货币变成跨国

货币，对本国账目上的收支逆差无动于衷，却强迫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储存实际上无法兑现的大量美元。总有一天，这些中央银行不得不拒绝按照荒谬的金汇兑本位规则去赌弹子，换句话说，拒绝把从美国收支逆差中得到的债权送回美国去投资。借用雅克·吕埃夫的一句话，就是“当至必至”，或者说，“原形毕露”。

第二句话“厚颜无耻与心安理得”，是强调美国外交政策的粗暴无礼。这种政策割断了美元与黄金的联系，同意美元在外汇市场贬值，但又不采取正式的贬值办法，也就是说，不改变美元与黄金的比价。尼克松总统试图迫使德国人和日本人答应按美元对他们的货币进行估价。从这里，一派有人认为美元已经垮台，货币霸权已寿终正寝，另一派人则认为美国的统治改了形式。根据美元对一种货币进行估价，不是体现为战略退却，就是体现为屈膝投降。 793

最后一句话“好了，曙光已在天边”，大体上表达了伦敦《经济学家》周刊为什么那么兴高采烈。《经济学家》周刊从美国采取的这些措施中看准了固定汇率即将完结。工党政府的尝试不惜中断经济增长，顶风逆潮，也要维护一种不现实的汇率，这就至少部分地说明了这家英国周刊为何如此热衷于灵活汇率，而这种汇率是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的。《经济学家》周刊趁机揭露法国政府的荒谬观念和盲目的固执己见。同时，它对共同体农业政策由此而遭受困难，对德国人与法国人之间必然由此而发生争吵幸灾乐祸。它强调要从根本上改革货币体制，反对固定的比价，时不时调整一下大百分比。各国货币不能按照官僚们的命令，而是通过市场调节确定与其他货币的比价。

我对这三种说法不置可否。第一种说的是实话，因为美国

国际收支逆差造成外国中央银行存积美元的情况不会长此下去。^① 我认为，汇率浮动既不是灵丹妙药，也不是大难临头，实践将会证明国际贸易能否适应浮动的货币。第二种说法也有部分真理，美国不愿意放弃美元在世界市场上的特权，恰好相反，它要的是取消固定汇率，保留特权，并消除影响其自由行事的最后障碍。

赎罪日战争^②和液体燃料价格上涨4倍以后，1971~1973年的争论就失去了意义。通货膨胀的压力大小不一，因国而异，这就使固定汇率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了。继1972~1973年的通货大膨胀之后，石油危机很可能至少是暂时地迫使各国实行浮动汇率。1960~1973年的争论已经时过境迁。

今天有时还在争论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那些中央银行同意维持美元牌价，还同意美国储存超过它需要的美元呢？伊夫·洛朗（Yves Laulan）在一本书中说，由于德国人和日本人把他们的安全寄托于美国，自己不必支付本国的防务费用，所以采取这种态度。他们支持美元，为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付出财政代价，就等于他们偿还了自己的债务，其总额大致与他们本应支付的本国防务经费相等。对于这种解释，我还想说明一点——是补充，而不是相左的意见：美元升值有利于美元对外投资，但同时也有利于欧洲的出口。欧洲出口的增长是“欧洲奇迹”的经常性的必要条件。因此，我认为法美斗争、巴黎和华盛顿政府围绕货币体系的论战可笑之至，我的这种观点并没有错，因为它们双方是在玩“谁输了谁就赢了”的游

① 只要外国银行不购买美元、不囤积美元，就能使美元汇率下降，而美元汇率下降就等于马克或日元升值。

② 指第四次中东战争。——编者注

戏。加速美元跌价，就是保证失去宝座的美元继续统治。结束金汇兑本位，不等于恢复金本位，而是停止黄金流通，至少是缩小黄金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用浮动汇率来代替固定汇率。如果戴高乐将军不发表讲话或法国执行另外一种外交政策，同样的事态很可能也会出现。总之，即使雅克·吕埃夫在理论上有道理，直至1965年以前，金汇兑本位还是为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考虑到美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采取其他任何体系都只能更糟。从1973年到1982年8月，甚至在我动笔写这段文字之时，即尼克松大发雷霆10年以后，美元的汇价一直徘徊在不到4法郎至7法郎多之间。实行浮动汇率尽管受到货币当局或多或少的控制，至少在短期内肯定不能保证汇率同购买力的比价相一致。根据利率、资本运动和经营者的先期透支，各种货币会轮流升值或贬值。

795

当前的做法是滑向什么体系呢？我不知晓。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发现我选择了一种不太适当的立场。我赞同雅克·吕埃夫的相当一部分论点，这引起了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对我的蔑视。我对法国政府的官方观点也进行了足够的批评，从而引起戴高乐派的卫道士们对我的猜疑。从1974年开始，另外一些人又指责我在事实的威力或美国的意志面前屈服。这种指责至少是言过其实了，因为我不止一次想提出一种战略使法国政府有机会达到目的。事实上，政府人士在管理国内经济时从来不与他们的国际货币理论相一致。乔治·蓬皮杜采纳了魏尔纳计划，这项关于欧洲共同体的经济和货币联盟的计划事先就注定行不通。他容忍经常性的通货膨胀，但由于缺乏实力，这种通货膨胀不能使主张固定汇率的代言人拥有精神权威。

翻阅一下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过的文章汇编，我吃惊地发现，我没有对美国干涉越南的初期阶段进行评论，这让我有一种负罪感（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的开始部分承认，这场无休止的战争开始时，他也没有予以多大的注意）。1953年我途经西贡时，才第一次从法国行政当局的秘书长的口里听到吴庭艳。这个高级官员对我说，吴庭艳是美国人的人，是改信天主教的安南官僚。他还说，吴是最后一条路、最后一张牌。这次谈话的时间是1953年10月，是在奠边府战役和日内瓦会议之前。

796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的最初几年，评论和争论都是关于法美摩擦的。我们的盟国负责承担吴庭艳的非共党政权——实际上是个疯狂反共的政权——同时也把法国的影响，甚至法国的存在消除了。一所美国大学取代了全国的行政学校，其任务是培养新的国家官员。至少报刊是这样叙述法国人是如何被一扫而光的。他们先是在奠边府蒙受越盟的奇耻大辱，后来又被美国人挤出去。

《日内瓦协议》规定的“自由”选举未能举行。我对此既不奇怪，也不感到荒唐，因为在朝鲜和东德，共产党政权也不容许自由选举。难道胡志明能够容忍吴庭艳在河内组织一次公众集会吗？吴庭艳政权经受得住胡志明和他的军官们在西贡或其他城市举行的公共集会的冲击吗？对下述事实我考虑得也不够，即在印度支那战争期间，我在巴黎争论中多次提醒注意，越南革命者从未放弃他们开始活动时宣布的目标，即三国的统一。在他们看来，交趾支那、安南和东京属于统一的同一整体。

1954年，越盟曾经把南方的一部分忠实支持者转移到北方。吴庭艳立即搜捕共产党人以便把他们消灭，或至少使他们无法为害。1950年代末期，北越共产党决定恢复对美帝国主

义的“傀儡”或“帮凶”的战争。艾森豪威尔离开白宫时，在南越服役的军人已不足 1000 人。肯尼迪对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要求做出部分让步，“顾问”的数目一下子增至一万五千多。他为什么让美国在南越承担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防务呢？他果真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吗？是否像戴高乐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的，肯尼迪想在东南亚修筑一道反共防浪堤呢？直到如今，我也不知道肯尼迪到底出于何种动机。我个人觉得还是做点儿基本说明为好。 797

美国对吴庭艳政府的援助可以自圆其说，即实践筑坝堵截的理论。既然还有一半的越南人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外，那么西方人都要关心这一半还享有“自由”的人。

欧洲人支持大西洋联盟，曾经赞同美国在朝鲜采取行动。对越南的行动是否属于同一类型呢？回答这个问题要参照许多不同情况，而我们对此知之甚少。我们知道，而且凡是访问过韩国的人都知道，在三八线以南，确实存在一个政治实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随时准备自卫，反对北方的进攻。那里存在一种热爱朝鲜和反共不可分割的爱国主义，要求谴责 1950 年 6 月 25 日的入侵，完全支持哈里·杜鲁门和迪安·艾奇逊。而在 1954 年和 1960 年，难道也有一种南越的爱国主义吗？把两个越南的情况同两个朝鲜或两个德国的情况相提并论，站得住脚吗？任何人也不怀疑，如果东部的德国人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愿，他们肯定会选择像“被资本主义剥削的”骨肉同胞那样的生活条件。然而，如果西部的德国人试图用军事力量把旧德意志帝国的两部分统一起来，他们就会在西方被所有人（包括右翼和左派人士）看作战争贩子。因此，把美国参与维持南越共和国的生存说成帝国主义行为，我不认为这是正确的。

对另一方面的考虑也会影响我们的态度。南方政权值得挽救吗？有必要偏爱这个政权超过北越人建立的政权吗？西方报刊，尤其是美国报刊，无情地揭露了南方政权对民主原则的侵犯。这些报刊报道了集中营中的暴行——因为那里也有集中营。这样就提出了问题：美国在为南越而战的同时，是不是也在为一种战略地位，为西方观念，为美国的威望，或照基辛格的说法，为美国的信誉而战呢？

798 如果我的记忆力还不错的话，我当时倾向于下述立场：对南越和美国来说，南方共和国最好能维持下去。但是，美国有能力坚持到底吗？这场战争的费用似乎超出了这场赌博本身的价值。换句话说，美国有可能不仅是犯一个错误，而是会铸成大错。对这些不同的或者互相矛盾的想法和分析，我也有些举棋不定，于是我溜之大吉，只是充当人类的疯狂和互相攻讦的旁观者的角色。

越南战争同过去的所谓民族解放战争或朝鲜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北越军队没有像朝鲜军队那样跨过明确的分界线。在南方进行“小规模战争”的“游击队员”得到了北方的后勤支援，同时也不断补充在北方招募和训练的士兵。为了反击北越的进犯，约翰逊制定了一种逐步升级的战略，并且用空军来付诸实施。美国人在北方既不找军队打，也不想占领工业，而只对一个国家的领土狂轰滥炸，可是他们同这个国家并未处于战争状态，只是因为后者向南方的战士提供援助和后勤供应。

这些狂轰滥炸有什么战略意义呢？轰炸胡志明小道的目的在于，即使不能阻止北越士兵到南方去，至少可以减少其数量。我回想起大约 1966 年在五角大楼同麦克纳马拉的一次谈话。他按照自己的习惯，用几个图来说明他的想法。他划了三

条横线：上面一条线代表未进行轰炸时从北方到南方的士兵的数量；中间一条线是尽管轰炸但还能过去的人数；最下面一条线表示要使人数减少到多少才能彻底扭转战局。不仅要轰炸胡志明小道，而且要轰炸整个越南北方，其作用是“惩罚敌人”，破坏敌国领土，起用几个世纪以来历史上使用过的方法。在19世纪，法国人在征服阿尔及利亚的过程中，就毫不犹豫地使用过这类方法，例如，向水井里投毒，断绝商队的水源。华盛顿的领导人约翰逊和他的班子转告河内，如不停止对南方的渗透和对越共的后勤供应，他们就要轰炸北方。他们执行了一些教授就核战略制定的理论：主张使用暴力升级，以便说服河内的共产党人放弃他们的计谋。 799

我分析了这种反颠覆战争的特殊形式和逐渐密集的轰炸，对这一战略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轰炸造成物毁人亡，但没有破坏城市（当一些为北越的事业辩护的美国人在《巴黎协议》签字后访问河内时，他们惊奇地发现，这个城市的主要部分依然屹立在那里，远远不是像他们想象的那样变成了一片废墟）。

至于轰炸的心理效果，则同上次战争中对德国人的轰炸一样无效。居民“顶住了”。逐步升级的恐吓未能动摇北越政府的决心。北越政府并未认真对待加拿大人转达给他们的警告，反而坚信美国人会自我节制。

美国人要想让别人相信美元停止兑换黄金，他们自己首先应该相信。^① 要恐吓北越人，美国人就应该认真对待他

^① 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停止兑换黄金了，但握有黄金的人没有理由去指责负责停止兑换的人。

们自己升到极点的威胁。在这两种情况下，发出信息的人自己都不相信，收信人当然也不会相信。(1968年3月6日)

800 几个月以前，我的朋友布瓦依埃尔夫妇还曾问我是否“赞同”过美国用凝固汽油弹轰炸。有人曾对他们说我是持赞同态度的，目的是让他们放弃对我的友谊。这个问题同沃尔顿和米西卡曾经向我提过的下述问题没有实质差别：您是否谴责过阿尔及利亚的酷刑？我对这些预审法官的口气有点恼火了，我不是一个“大善人”。1945年，我衷心希望法国同意印度支那三国统一。1965年或1968年，存在过一个南越共和国，在我看来，它比北方的极权主义更可取。美国用一场“前途未卜的战争”来拯救这个共和国，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帝国主义意志，倒不如说是因为有一种认为自己万能的幻想。至于凝固汽油弹，应该像憎恶酷刑一样憎恶它。军人能不能或应不应该避免使用这些手段？这很容易回答：理所当然不应该使用。

由于华盛顿的领导人自己尚且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打仗，战争就更无把握。从1954年到1960年对西贡的支持，起初属于一种建筑防浪堤的自动反应。1961~1962年，肯尼迪由于猪湾事件的失败和在维也纳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感到受辱，于是竭力表示“强硬”，以消除赫鲁晓夫可能抱有的幻想，后者对肯尼迪上任初期的挫折产生了误解。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访问西贡时，千方百计地阐述了关于多米诺骨牌倒塌的问题。随着美国在死胡同中越陷越深，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就更不理解他们花费那么多人力和美元，牺牲那么多生命和财产，究竟为了反对谁和出于什么目的。

继邦迪之后和在基辛格之前，任白宫总统国际事务顾问的罗斯托对我阐述过他津津乐道的一种具有世界史规模的理论。他说，胡志明和越南的扩张是革命浪漫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如果美国能够战胜这个胸怀主义的征服者，一个时代行将结束。华盛顿的另外一些顾问认为，在胡志明的背后就是林彪及其农村包围城市战略；还有些顾问认为在胡志明的背后是克里姆林宫的帝国主义。后来的事实证明，最后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

春季攻势实际上是越共的一次失败。居民根本没有追随“解放战士”。这些战士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暴行。这些人让那些被俘人员自己去挖掘坟墓，然后把皇城顺化市成百上千的官员和社会名流赶进去。1954年南越共和国驻巴黎大使范维谦——我的朋友兼高师毕业生——曾写过一本动人的小说，描述青年时代的爱情。1968年4月13日，他通过法新社发表了一条消息，谴责越共在他们暂时控制的地区所犯的罪行。他说：“这些知识分子没有仔细看一看，许许多多普通职员、无辜的办事员及其家属、休假的军人、法国牧师、德国教员及其妻子在毫发无损的情况下被活活埋葬（迄今已达300人左右），或经各种严刑拷打致残后被杀害（约700人），有时是几个人被铁蒺藜捆在一起……”但这条消息犹如泥牛入海，被人忘却。革命事业美化了北方的罪行，加重了南方的罪行。

801

1969年尼克松和基辛格上台执政，我此后更加坚持这种看法。共和党人对于美国介入越南战争不负任何责任。尼克松本来可以接受北方的要求，只需几个月就可以赢得舆论界所呼吁的和平，至少可以成为最能倾听社会舆论的发言人。北方的要求是什么呢？可以概括为一个词——“联合政府”。很显然，这个政府将排除“傀儡集团”，包括阮高其和他手下的

人，换句话说，就是那些治理着南越共和国、象征着抵抗势力的人。共产党建立的“南方临时政府”——所谓第三种势力，其中包括若干在首都咖啡馆里高谈阔论并反对阮高其的人——并不能在西贡人士与河内人士之间充当中介人或调停人。他们有意无意地成为越共的同盟者或同谋，与越共没有什么区别，或更恰当地说，他们根本不能与越共和北越共产党有所区别。“临时政府”意味着取缔南越政权，也就是意味着美国认输。美国将不得不迫使阮高其和他的同僚让位走路，换句话说就是背弃他们，出卖他们，承认他们只是靠了一支外国军队的恩典或实力才活得下去。

802 尼克松和基辛格不是不知道选民们期待他们结束越南战争，然而，无论是选民还是国会议员，都理解不了北越实际上是要求美国投降。“联合政府”一说旨在掩盖投降的实质，但也不怎么掩盖得住。基辛格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追述道，他曾打算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同越南达成一项协议。尼克松更有远见，他对此深表怀疑。基辛格被任命为外交特别顾问之前在《外交季刊》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设想进行两种谈判，一种是美国与北越谈判，另一种是两个越南政府之间谈判。北越拒绝第二种谈判，因为它不“承认”阮氏政权。按照共产党人的世界观，这个政权是子虚乌有的，只能扮演帝国主义“傀儡”这一无足轻重的角色。因此，1969年共和党领导集团的战略公之于众后，我立即准确地预言战争将持续下去。

例如，1969年7月2日，我首先强调在河内与华盛顿之间不可能达成一项政治协议。我写道：“……如果尼克松总统愿意从越南脱身又不想让敌人（指西贡的越共政府）轻而易举地取得政治胜利，他可以想尽办法在南方找出一个替代政

权。然而，北越人始终坚定不移地拒绝与‘西贡傀儡’对话。”接着我又写道：“一切迹象表明，似乎北越人和越共把最终取得政治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民厌战的心情上面。由于在战场上胜败难分，战争演变为意志的较量。谁能坚持到最后一刻钟，谁就能取得胜利。如果战争不能在未来18个月内结束，面对日益增多的激烈反对者，尼克松能对付得了么？”文章的结论是：“无论今天还是过去，尼克松当政也好，约翰逊当政也罢，美国人除了在政治失败和继续战争之间进行选择，岂有他哉？也可能有第三条道路，只要有朝一日北越人认为他们的敌人与他们一样有耐心。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否则他们怎么可能这样认为呢？”换句话说，我正确地提出了两种抉择：要么失败，要么把仗打下去。

1972年，在北越军队跨过非军事区发动攻势受挫后，我希望北越的外交政策会有所改变，同意签订一项不取消阮氏政权的美越协议，也就是说，停火而不做政治解决，但这是当时北越人一直拒绝的。1972年10月，北越人确实做出重大让步，从而使谈判终于取得一个成果，只有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挪威评审委员们才会把这种解决方案同和平混为一谈。南方政府保留下来了，但北方军队进驻南方，并留在当地，而黎德寿仍否认南方政权的存在。当时，人们把《巴黎协议》后南越的情况描写为一张“花豹皮”。

1973年达成的这些协定后来变得怎么样，这已经众所周知。两年以后，北越军队大举跨过非军事区。阮高其下令撤退，以便收缩和加强防御地区。撤退变成了溃败，共产党仅仅用了几个星期，就达到了1946年12月发动对法战争时设想的目标，使印度支那三国统一在苏联式政权之下。

基辛格把巴黎协定说成是一个几乎出人意料的成功。尼克松和他的顾问们一直坚持拒绝投降，即拒绝推翻美国人几年来予以支持并为之打仗的阮高其政府。由他们自己把他赶下台，实在太不光彩了。与北越打交道，同时又让阮高其有机会维持下去，这是一种体面的和平。

尼克松总统和他的顾问并不是不惜一切代价地拒绝“输掉战争”，如果越共取得政权标志着最后的失败的话。他们希望还有可能不要输掉战争，但最重要的是，不要背弃已经许下的诺言。强迫西贡接受一个联合政府，就意味着背信弃义。如果美国背叛或似乎要背叛其盟友，失败就会变成一场大祸。完全可以假设，他们丢掉的远远不只是一场有限战争，丢掉越南和面子，更重要的是，他们将丢掉盟友的信任和敌人的看重。

804 这是我在1969年10月30日的《费加罗报》上发表过的几句话。我无意掠人之美，只是重复了基辛格的辩护词，像许多人一样，我是听他亲口讲过的。在同一篇文章中，我还援引了罗伯特·肯尼迪的一本小册子中的几句话，他也认为美国无条件地立即撤兵是不可能的，是一种灾难。他写道：“单方面突然撤兵会在亚洲以外引起对‘美国信誉’的怀疑。”

有人可能会问我，既然你从1957年就鼓吹阿尔及利亚独立，或至少主张阿尔及利亚人有权享有独立，而当时“叛军”或抵抗运动刚刚建立军队，那么你为什么也不向美国建议一种“根本解决办法”呢？

在阿尔及利亚，法国人企图维持全盘或部分殖民地局面，

而我认为，采取所谓开明的过渡办法也会导致独立。我要求承认阿尔及利亚人独立的权利，也就是要求实行法国主张维护和倡导的各国人民有自决权的一致原则。这同美国在越南的情况毫无共同之处；美国人不想留在那里，而是想离开，他们要保护一个至少在表面上是独立的政府。这个政府是否受到人民的支持？答案不太明显。南方人民是否愿意被北方同胞“解放”？他们显然没有参与自身的解放。这是一次军事进攻，把阮高其政权打入了历史的冷宫。如果对这场战争进行政治评断，确实也取决于美国有无能力把这场较量坚持到底，因为对于一个国家元首来说，一步走错、战略不慎都会被看作失策。

不计其数的人赞扬北越的抵抗运动，赞扬北越激昂慷慨地攻击美国“帝国主义”。如果我声援他们，我就会成为笑柄。在我看来，美国将其军队和信誉押在越南的稻田里犯了（或已经犯了）一个错误。但是，到了1969年，美国能够在道德上认输，在政治上投降吗？美国能够自己建立一个服从河内、稍加掩饰的共产党政权吗？基辛格事后也可能承认，美国与其拖到1973年，不如在1969年就消除这场倒霉的祸患。延宕4年加剧了美国内部的混乱和争吵。如果能早4年，结果也许不至于这样坏，但我不敢肯定。不管怎么样，基辛格可以回答说，1973年签订《巴黎协议》两年以后，如果没有水门丑闻，北越便不会发动总攻。《巴黎协议》虽然没有最终挽救南越共和国，但协定规定，允许南越共和国存在，从这一点上讲，北越第一次承认了南越共和国的存在。

805

当然，1973年1月26日，没有任何人张灯结彩。我曾写了一篇题为《停火就会带来和平吗？》的文章，我写道：

是这场战争的结束还是一次战争的结束？谁也说不清楚。未来取决于这方或另一方人士的意图如何，或明智与否。而且，阮高其总统和临时革命政府如果想这样干的话，他们可以随时找到机会，互相指控对方违背了一项似乎无法执行和肯定无法监督的协定。但是，我们还是暂时不管分析是否严密，也不要去做扮演普世良知的代言人，而这正是我们某些同行喜欢做的，他们自封为道德判官。既然我们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我们就不要放弃希望。可能越南人自己将凭直觉共同找出一条通往和平的秘密道路，而这条道路光靠理智是难以发现的。

哎！还是理智再一次告诉了我们真理何在。

几个月以后，亨利·基辛格负责处理斋月战争引起的危机，因而声誉日增。这个杰出的谋士令举世瞩目，而头号人物却为之黯然失色。斋月战争分裂了法国人，但没有引起“六日战争”爆发前后那样的群情激动。

1967年我还认为，尽管以色列首先发动进攻，纳赛尔仍应对战争负主要责任。到了1973年，在我看来，责任已经颠倒过来了。萨达特本来想准备行动，确定日期，打以色列人一个措手不及，但以色列的外交弄得他别无出路。以色列的政治领导阶层分为鹰派和鸽派，有的支持大以色列国，有的反对大以色列国，无法向它的对手提出一种解决方案，只好采取最容易被接受的做法。它决定让以色列军队留在原地，邀请阿拉伯国家与希伯来人国家直接谈判。这种没有先决条件的谈判可以讨论冲突的各个方面，当然，以色列人也不是不知道阿拉伯人

必定会拒绝邀请，因为阿拉伯人认为，在1967年的惨败之后举行对话无异于屈膝投降。

我回想起1971年在耶路撒冷同一个半官方委员会谈的话，这个委员会负责研究这个地区未来10年的军事和政治前景。我对他们说，萨达特不能无限期地推迟报复的时间，不然，埃及内部会发生破裂。或者对外发动攻击，取得一项成功，因为没有这种成功，萨达特本人就无法走上通往和平的道路。你们能不能送给他一次“微小的胜利”呢？到了1973年，这种微小的胜利几乎变成了一场大胜仗。

在前面一章，我提到我对这个时期的剖析：埃及人没有遇到抵抗就跨过苏伊士运河，向以色列人发起袭击，并且挡住了以色列一个装甲旅。以色列为了消灭埃军桥头堡而过早发动反攻。在战争爆发以后最初几天，我在电视台与卡恩、絮费尔、萨布利埃进行辩论。我对以色列人在停火之前能否把埃及人赶到运河的对岸表示怀疑。

回过头来看一看，我对危机期间萨达特的战略和基辛格的做法深表赞赏。埃及总统进退两难，他同以色列人谈判就要丢脸，可又不相信自己拥有决胜的必要手段。因此，他准备进行一场有限目标的战争。他使尽种种计谋，竟然麻痹了以色列人的警惕性，成功地取得了出其不意的效果，就像以色列人在1967年所做的那样。以色列军队没有处于戒备状态。在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发动攻击的当天早晨，动员令才发布。在戈兰高地前线，面对叙利亚几百辆坦克的攻击，以色列靠几十辆坦克的英勇奋战和对其的运用有方才挽回败局。如果不是萨达特不顾军事指挥官的意见而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埃及军队渡过运河之后就很可能直捣山区。也可能是政治上的考虑造成了军事

上的失败。萨达特需要取得一次军事胜利来洗刷 1967 年的耻辱，但他不打算进行一次规模类似 1967 年惨败的报复行动。等到以色列军队全部被动员，把坦克主力转移到西奈半岛前线，一场坦克大战就此展开。沙龙将军率部勇敢地从中线突破，使以色列人得以包围埃及第二军。基辛格在被围部队遭到歼灭之前，终于迫使双方接受停火。他没有任何理由让以色列取得轰动人心的胜利，故意推迟给以色列援助，只是在它因军火供应不上而即将面临真正的致命危险时，基辛格才决定提供援助。

谁是赢家呢？以色列给埃及造成的损失超过自己的损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色列打赢了。如果再打几天，它就能消灭跨过运河的埃及部队。但是，埃及人也可以吹嘘他们开战时取得的胜利。既然胜败未卜，就算不能一揽子解决以色列同所有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起码也能为埃以冲突的和平解决创造必要的条件。

我在 1973 年 11 月 6 日发表的《胜利者的失败》一文招来了一些犹太人骂我的信。1967 年以来我对以色列政策的批评，可概括如下：

耶路撒冷政府把它的军队部署在苏伊士运河上，就等于向苏联发出挑战，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向西欧发出挑战。它剥夺了埃及在西奈半岛的石油和埃及在苏伊士运河的收入。它这样做就加强了埃及和波斯湾富国之间的团结，等于敦请苏联进一步插手，同时使任何埃及政府不可能永远忍受这种局面。

在军事方面，我重申 1967 年以来我同以色列将军们谈

话中提出的反对论点，即反对以运河为前线。它表面上是一条天然防线，实际上却不是。1973年，以色列人破天荒第一次需要美国对战争本身提供物质援助。他们虽然在最后一刹那才得到了这种援助，可是对美国的依赖也就更加触目了。

在进行较量的这些日子里，对以色列人打击最厉害的是，所有欧洲人都拒绝提供他们的机场给美国充当空中桥梁。在所有欧洲人之中，只有“康乃馨革命”前的葡萄牙例外，它允许美国空军的飞机使用亚速尔群岛的基地。对于以色列人来说，物资供应即使不是每时每刻的问题，也是每天要解决的问题。任何一个欧洲大国都不愿意由于参加援救行动——即使是有限的——而冒险惹翻生产石油的阿拉伯人。亨利·基辛格并不掩饰他对欧洲人的怯弱所感到的“轻蔑”和“恶心”。欧洲人则感到被人辱没，因为大国之间背着他们进行对话，而这种对话近似于勾结或合谋。

基辛格好像是一个杰出的魔术师。当苏联人大肆威胁要用空降部队对出事地点进行干预时，他深夜去说服总统，命令美国在全世界的军事设施采取警备状态。同时，他登上飞机去莫斯科，与勃列日涅夫达成停火协议，从而剥夺了以色列的部分胜利——这是国务卿一直希望但又从来没有说出口的。随后，他在耶路撒冷与开罗之间不知疲劳地穿梭往还，为埃以冲突的解决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在当时，这是一个曾经轮番同周恩来、毛泽东、勃列日涅夫、黎德寿谈判过的人，经过几个小时、几天、几个月或几年，他总能达成一项协议。加上新闻界的帮忙，他就成了神奇的人物。两个处于冲突之中的非洲国家政府曾设想求助于这个外交家的斡旋。然而，塔庇阴深渊

(la roche Tarpéienne)离朱庇特神庙也就不远了。^①

809 石油价格翻了两番，石油生产国决定对美国实行暂时封锁，使能源危机成了第一位的问题。美国军队撤出以后，越南一下子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历史性扩张的次要插曲。基辛格试图重振大西洋联盟，但只带来了一些无足轻重的协议。建立“能源局”只是为巴黎与华盛顿、米歇尔·若贝尔与亨利·基辛格之间的无谓争吵提供了机会。报刊尽报道这两个外交部部长轮番使用的过火语言。法国拒绝参加能源局。参加与否，在我看来都无关紧要。另一个学究式的争论，是围绕欧洲人对美国采取什么共同外交方式这一问题。欧洲9国在采取一种共同立场之前，是否必须征求美国的意见呢？美国不愿意在《北大西洋公约》伙伴国听到它的声音以前面对一个欧洲集团。大概是在1974年，我应国务院官员的邀请在国务院俱乐部发表谈话。俱乐部秘书问我讲什么题目。我经过一番思考并征求了“负责人”的意见，提出了这样一个题目：为什么国务卿忘记了基辛格教授的想法。事实上，亨利·基辛格在一本译成法语的题为《大西洋彼岸的误解》的书中毫不含糊地写道：美国不能指望一个统一的欧洲会表示赞同和自动通融。当了国务卿以后，他就很难容忍他在做教授时预见到的，并且认为是免不了的和健康的独立意愿了。一个正直而难对付的盟友，要比一个骨子里不买账的卫星国强。

俱乐部负责人事先对我说有几十个听众，而实际上有一二百名官员在等待我，有的坐在座位上，有的站着。可能其中有

^① 塔庇阴和朱庇特神庙是古罗马的两个地方，寓意“胜利之后失败就快来了”，已成为一种固定比喻。——译者注

些人感到有兴趣，是因为我对他们的首长表示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或我对他们的首长使用了一种揶揄的口气。也可能像我遇到过的所有美国听众那样，在这种场合，参与者一般都对报告人表示善意和倾向于相信他的论点，而对意见相左的报告人，也不惜采取同样的热情态度。我对这次报告会——包括我的讲话和听众提的问题——怀有美好的回忆。

这些外交风暴本身对我的影响并不大。欧洲人拒绝为美国空军向以色列空运物资提供基地，我把这种态度看作对于美国不同欧洲人协商，却集中精力同莫斯科、北京对话的外交政策采取的一种报复。国务卿的轻蔑态度不管有无道理，都与梅特涅或俾斯麦的信条不相干。更何况，他还指责他们，发表共同声明虽是过问与自己有关的事，但是他们不管愿不愿意，反正只能充当旁观者。我现在认为，过去对欧洲人过分宽容是不对的，但也不赞成基辛格的目中无人。

810

他处理斋月战争危机的本领固然值得佩服，但是对于缓和的意义，我却仍觉担心。诚然，尼克松政府没有开始与莫斯科的对话，也没有主动率先讨论缓和问题。尽管如此，从1969年到1973年，舆论仍然把责任归于尼克松政府。美国外交恢复了与北京的关系，改善了同莫斯科的关系，签订了第一个限制战略武器协定和一项文件，表面上确定了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对外活动的精神。有两个条款概括了这项君子协定的实质，其一是约束，意即要有节制或自制；其二是两个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得为自己谋求单方面的利益。从字面上讲，这项条文意味着美国和苏联将结束它们全球性的明争暗斗。1972年，没有任何人（至少是那些专业评论家）相信，尼克松访问了莫斯科，苏联就会停止支持或操纵所谓“民族解放”运动。

斋月战争至少对那些抱有幻想的人揭示了“缓和”二字含义不明。1973年11月，我们还不知道列昂·勃列日涅夫是否曾鼓励埃及总统出兵越过苏伊士运河。

811

据我们所知，列昂·勃列日涅夫在提供物资、坦克、大炮、萨姆3式和萨姆6式导弹、反坦克手雷的时候，全未讨价还价……战争一打响，列昂·勃列日涅夫就促使阿拉伯人采取行动（如果致布迈丁总统的信件确有其事的话）。冲突爆发几天以后，他就为盟国提供物资，建立了一个空中桥梁，而当时美国尚拒绝向以色列提供给养。从这一点上不是可以看出，苏联人缺乏缓和精神，他们违背节制原则，企图靠损害对方而得到“单方面的利益”吗？当然是这样。本来就只有大傻瓜才相信这种字面上的保证。（参见1979年11月5日《费加罗报》上的文章）

前一年在莫斯科签订的君子协定，又有什么意义呢？欧洲人（特别是米歇尔·若贝尔）揭露说，这是狼狈为奸。借用法国外交部部长的一句话，就是两个超级大国在空中大桥上握手言欢。

与此同时，欧洲舆论界，可能包括美国舆论界，慢慢意识到了力量对比正朝着有利于苏联方面变化。在第一阶段削弱战略武器会谈中，美国曾同意苏联在发射工具的数额上占有40%的优势，以抵消美国核弹头的优势（因为苏联人还未掌握多弹头分导技术）。3年之后，海参崴会谈勾勒出一项协定的大致轮廓时，苏联人拥有的多弹头分导导弹，从运载量与核弹头的爆炸力方面来看，都已据优势。《第二阶段削弱战略武器条约》于卡特总统任期内达成，被当即提交国会，而反对派则对于双方

待遇是否平等提出疑问。尼克松和福特都曾接受战略武器对等的原则。然而，美国在爆裂范围方面保持最大的优势，这不仅对美国领土的安全来说，而且对西欧来说，也是美国威慑的一个必要成分吗？

正是在基辛格被看作超凡圣人的几年中，苏联第一次变成了超级大国，变成了一个能够向全世界任何地方抛出军事力量的全球性强国。福特在竞选中败北以后，基辛格引退，撰写他的《回忆录》。但在美国，特别是在国会，他仍然享有盛誉。但是，为什么不问一问他是否利用他的天才，掩饰或美化了美国外交的退却以及共和制帝国的衰败呢？

1977年1月初，我在《费加罗报》上写了一篇自认为对其成败和遗产秉持公允态度的分析文章。我首先指出了他在新闻媒介方面取得的成功：

812

任何一个国务卿都从来没有给职业新闻工作者和猎奇记者提供如此多的题材，别人也不会为他们牺牲那么多的时间。这是一个十分重视维护自己形象的人。他对资料了如指掌，使人赞叹不已。他体格健壮，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有满腹心计的即席讲话，耸人听闻的言辞，往往把人弄得目瞪口呆。他的态度时而殷勤时而粗暴，他经常用耐性磨败对手。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受不了他的魅力，更受不了他的磨功。他即使度过一个不眠之夜，体力依然充沛，照样能临机应变。……然而，这个艺术家——从这个词的一语双关含义来讲——准备了两手。他一张弓上安两根弦，一盆火上放两块烙铁。如果运气不符合他的希望，他使用历史的名义谴责运气。当西贡陷落、四年的努力付

之东流时，他又去重读青年时代看过的书，探索西方的衰落问题。他的挚友雷斯顿报道了这个“野蛮的哲学家”的忧郁的思虑。这在理查德·尼克松政府和杰拉尔德·福特政府的人士中是不合适的，这是一颗靠不住的明星。然而，他征服了华盛顿。……

其次，我承认基辛格功勋卓著，善于处理危机：“不管别人对他的全局观点有什么看法，他确实是一个处理危机的高手。总而言之，他的马基雅维利式（从双重性来理解这个形容词）杰作——还是那场斋月战争——使以色列人措手不及。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取得了精神上的胜利，但他们的敌人实际上没有失败。”处理斋月战争的危机，为埃及总统发动和平攻势奠定了基础。他的耶路撒冷之行震动了世界舆论。

最后我才点出实质：

归根结底，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并决定历史评价的，就是整体观念。人们认为正是这种整体观念启发了他，于是他表现为既要缓和，又拒绝与意大利共产党人接触。亨利·基辛格考虑莫斯科与华盛顿直接相关的利益，同意俄国人统治东欧。为了维持两个超级大国各自区域的平衡，他不惜支持智利总统阿连德的政敌，或宣告意大利的历史性妥协是无法接受的。一个波兰人挖苦这种政策是：哪里的共产党人已经信誉扫地就予以支持，哪里的共产党人还得人心就将其打倒。基辛格大概会这样回答：如何把已经被搞臭的共产党人赶下台。

基辛格的政策除了与北京接近，还继承了美国 1947 年以来，尤其是 1953 年以来的政策。同莫斯科达成部分协议，抵制苏联的区域性进攻，两者结合起来可以说明基辛格的手段，但不如用 30 年来不成文的美国外交规律来加以说明。我不会漠视“缓和”中的新情况，或美苏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在这种背景下，怎么能不对这种平衡策略的最终想法产生怀疑呢？

我看不出在基辛格教授的著作与缓和思想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尽管国务卿的自尊心有助于我了解他如何成功地把他自己心目中的实用主义举措美化为长远的谋略。教授警告说，不要幻想可以通过谈判把一个思想上很革命的大国变成一个保守的大国。……尽管亨利·基辛格善于处理危机，尽管他否定意大利共产党，或者正是由于他否定意大利共产党，过分靠拢苏联，他才可能从精神上瓦解西方。

当里根同共和党中的极端反共派再次执政时，基辛格在他们心目中是主张缓和与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的人，他在其实际负责的事务中，举止更像鸽派而不是鹰派。

对他的指责（某些人认为是赞扬）站得住脚吗？答案没那么简单。基辛格给人的印象是，他与总统周围的人，与美国政界大不相同。他个人的优点是脉络分明的表达能力，即美国人所说的分析才能，还有美国记者（和所有美国听众）十分偏爱的幽默俏皮。简而言之，可以说他在智力上的优势本身就令人折服。

我在 1982 年对他的评价与 1977 年的相比有什么实质的不同吗？半个世纪以来，我不敢随便评论别人，我扪心自问：如

814 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又能干什么呢？尼克松能够答应西贡的“联合政府”吗？如果他不能答应，战争拖下去就势不可免。这样，西哈努克亲王几乎必然要垮台，军事行动也必然会扩大到柬埔寨。我读基辛格《回忆录》时，这个已经成为回忆的作家所提出的论据并不能始终使我信服，反而加强了我“旁观者清”的感觉。总统和他的顾问受到国内外对手的夹击，竭力争取通过谈判实现和平。为了平息国内舆论，他们逐步撤回远征军；为了挽救南越共和国，他们支持它的军队；为了迫使北越领导人妥协，他们动用了空军。巴黎协定挽回了面子；尼克松的下台缩短了保留面子的时间。

走访北京和莫斯科不单纯是为越南找出路。无论如何，有朝一日，美国将恢复同北京的外交关系。既然1963年以来两党公开了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首都之间的争吵，从而为美国外交提供了明显的活动余地，那么恢复这种关系就更加顺理成章和大有好处了。莫斯科和北京双方都支持北越，但并未因此互相让步。美国同北京的对话，可以影响莫斯科对美国 and 越南的立场。

回过头来看一看，这种外交政策尽管十分机智，但似乎并未改变越南局势的发展。1972年，北方的共产党人政权既不缺乏对付轰炸机的炮兵或导弹，也不缺乏发动春季攻势所需的装甲车和物资。《第一阶段削弱战略武器条约》保证了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平衡；纸面上写的要求采取良好行动，并不能禁止莫斯科对“民族解放”运动提供“兄弟般的援助”。缓和只是稍微改变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争斗的方式，并未改变其争斗的实质。如果尼克松和基辛格两人没有亲自领导美国外交，他们就会指斥缓和不过是个幻想。因此，1981年尼克松出版了

815 《第三次战争》一书，他阐释的国际关系哲学同他对北京和莫

斯科搞缓和的劲头并不相符。

基辛格本人相信缓和吗？他相信他那一套协议能够先约束、后驯服那革命的魔王吗？也许。但他补充说，这项政策要求有一个强大的、保持警惕的、准备回击莫斯科的任何侵略和颠覆企图美国。自从人们感到美国已经分裂，已经让帝国的包袱压得喘不过气来，这种政策就注定要失败了。但是，从1973年到1976年，在水门事件中或以后，参议院密切监督着国外的一切活动。参议院拒绝了基辛格要求的拨款，没让他用来阻止那个与莫斯科有联系的、得到古巴军队支持的政党在安哥拉取得胜利。

尼克松辞职以后，他为了表示坚定不移，继续保持缓和的方向。他曾建议福特总统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当我批评他害怕触动克里姆林宫权贵的敏感点时，他首先回答我说：“如果他们接见我国持不同政见的人，我们会怎么想呢？”我回答他说，我们没有他们那样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也就不再坚持了。实际上，当政时期的基辛格在他认为能够互相妥协或希望能够互相协调的两种立场之间摇摆不定：要么继续执行最坚定的遏制政策，预防共产党人在智利、意大利、安哥拉上台执政；要么签订限制战略武器协定，以及美苏贸易、技术合作协定。苏联作为一个革命大国，必须被遏制。苏联是两大军事强国之一，要求在这个世界上占有与其实力相应的地位。最好是满足它的要求，何况美国也没有办法拒绝它的要求。一方面是抵制这个意识形态——军事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把美国的这个“新交”纳入世界大合唱中。这些指导思想无可指摘。不幸的是，这两个思想未能说出同样的话。在一个民主社会中，这可能是一种束手无策的先天弱点；同时，由于环境不利——越南、水门事件、国内争吵——基辛格的两项计划都没能贯彻下去。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816 《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世界中的美国，1945～1972年》和《克劳塞维茨论战争》这两本书没有多少共同点，尽管这两本书都是依据我在法兰西学院的讲义改写而成的。前者讲授时间是1970～1971年；后者是在1971～1972年。从讲课的角度讲，二者也不同。我开设关于美国对外活动的课程，是因为我已经同一家美国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倒是开设了有关克劳塞维茨的课程，才引起我做一番尝试的念头，这个念头就是想评介一部名著——《论战争》，想评论一下一个战略家及其继承者。

头一本书是记述历史，另一本是说明一种思想；前者是讲20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的美国，后者是探索一个普鲁士人，他历经祖国的兴衰，恨透他的死敌拿破仑，可是又不能不为之倾倒。乍一看，我似乎用偶然的个人巧合把两本书关联在一起。我提出它们之间有一种含义深远的联系。

我曾经设想将本章命题为“回顾往昔”。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3年与北越签订和平协定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我那时一直在随时评论。所以，我在书中对自己也有批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把当时对各种具体事件的判断，同我今天由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和部分档案公开以后得出的总看法进行了一番比较。

我研究克劳塞维茨是为了探索现代战略的起源（或起源

之一)。20 世纪的战争和原子弹至少从表面上看打乱了传统观念，外交艺术和战争艺术都出现了问题。从拿破仑开始，不论哪一方的军事领袖，他们一心追求的就是取得毁灭对方的胜利，摧毁敌人的军队，由胜利者独断规定和平的方式。这种拿破仑式的辩证法，曾经把欧洲和世界从萨拉热窝引向广岛，从恐怖分子针对一个人的炸弹引到杀伤成万无辜平民的原子弹。1951 年我就针对朝鲜战争写过一篇《论没有胜者的和平》的文章，稍后，我又在《原子科学学报》上发表了《半个世纪的有限战争》一文。

因此，尽管一本书谈帝国共和国的外交家，另一本书则谈一个战争理论家，尽管两本书有各种差别，毕竟存在一种内在联系，不是在思路上面，而是在想不到的关系上面。这个普鲁士战略家比任何人都了解，战争会走向极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逐渐承认，战争很少按照自己单纯的概念发展。在 1/4 世纪中，美国尽管与苏联势不两立，但不管赌注多大，它却一直避免使战争升级到极点。核武器的无比威力，难道不能使总体战阶段宣告终结吗？克劳塞维茨不是曾经帮助人们怎样思考战争吗？战争的概念是统一的，而其史实则是千姿百态的。

《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

对我来说，《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这本书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一本历史类的书，甚至可以说是一本叙事的书。怎么才能叙述美国在 1/4 世纪中的对外活动呢？第一个困难是如何断代。这个时期能够同上两个世纪分开吗？我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写了一篇长达 15 页的序言，题目是《世界岛》。《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法文版曾以短文加以赞誉。

818 “世界岛”这个概念来自一个著名的英国地缘政治学家 H. J. 麦金德，他对德国的 K. 豪斯霍弗尔学派起过影响；他在著作中，特别是那本《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中，论述了陆地与海洋、大陆强国与海洋强国之间的斗争。海上强国只有在拥有足以提供足够资源的经济基础时才能维持其统治。罗马能够战胜迦太基，就是因为它掌握了制海权。英国是在统治全岛之后，才取得了控制海洋的大权。也就是说，苏格兰在并入联合王国之后，才免除了一个潜在的敌对邻国。

反对英王朝的 13 个美洲殖民地分阶段逐步变成了世界岛。但是，我把这些阶段统统归入 1783 年《巴黎和约》到 1898 年反对西班牙战争这一时期。在这个世纪当中，殖民者大功告成，他们占领了北美，进行移民和开发，目的是使北美地区免于像欧洲那样连绵不绝的明争暗斗。13 个殖民地没有进行大规模战争，就达到了它们的目标。黑格尔在 1831 年就看出美国享有岛国的好处，他写道：“北美洲的自由邦不像欧洲国家那样互相猜忌，必须维持一支常备军来对付它。加拿大和墨西哥是不必担心的……”

我认为 1898 年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份，下一个时期到 1941 年 12 月珍珠港事件美国参战为止。这是一个奇异的、多变的、矛盾的时期。美国战胜了西班牙，曾经有点犹豫不定是不是要模仿欧洲式的帝国主义。1917 年参加欧战、参议院拒绝批准《凡尔赛条约》，以及实行中立法，都没有形成任何体系，也没有提出任何计划。美国完成了自己的“天然使命”，在美洲创立了一个讲英语的大帝国，它将朝何方施展宏图呢？它开始实行一种欧洲式的殖民化（如波多黎各、菲律宾），后来又不肯这样做。1917 ~ 1918 年，美国举足轻重，决定了世界大战

的结局和英法的胜利，随后又自动撤退。1930年代，国会通过一系列法令，预防共和国参加战争，因为美国已经料到要发生战争。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人也是倒退着走向未来的。

这两个时期之间有重大差别，它们在我要再次论述的那个时期之前。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末，思想和事态的变化产生了一种美国开国元勋所设想和追求的世界秩序，就是一个占据了北美最大地盘的主权共和国，从地缘政治学来讲，又是一个岛国。可是，到了第二时期末，旁观者既看不出剧情的发展逻辑，也看不清演员的意图。1947~1972年这个全球优势时期，同第一时期相仿，胜似第二时期。美国像20世纪对待其“天然使命”一样，坚决承担了帝国的重担，但使命已全然不同了。

美国随着事态的发展卷入了世界政治，但它已经不是同印第安人部落，不是同没落的西班牙帝国，也不是同温文尔雅或逆来顺受的大英帝国打交道，而是同一些同样坚决地维护其权利或利益的国家打交道了。美国曾揭露欧洲制度的邪恶性，参与建立一种同大陆不相上下的全球体系。美国人并不认为，他们在19世纪的领土扩张主义同欧洲帝国主义有什么血缘联系。他们看不出扩大贸易和自由交换与帝国主义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参与世界政治——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全然陌生的领域——并给世界政治打上他们过去的实践和偏见的烙印：一方面是世界主义、合法主义，另一方面是对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小国进行的粗暴的统治。

英国曾经是欧洲平衡的保证人，或者换个说法，是敌视一切能够扩张自己的势力，积聚财富，直至向这个海上霸主的岛国挑战的欧洲国家。随着陆地强国由于兵戎相见而互相削弱，

美国便像昔日的英国一样崛起了。但是，世界岛应该建立并维持什么样的平衡呢？在欧洲，借用麦金德的说法，世界岛可以维护它在世界大岛中的桥头堡地位，可以扼制陆地强国向边缘地区、沿海地区推进的势头。但是，欧洲不过是世界舞台的一角，它的地缘政治不能说明世界舞台的各个方面。

第二个困难是，从遍布全球的大量事件中，能够找出什么历史的一致性呢？有没有一种情节，情节有没有一致性？我采取一种方便但可能有争议的断代方法。在战后年代里，与苏联的对立显然支配了华盛顿领导人的行动。借用我在拙著中使用过的概念体系，我一方面考察国家之间的体系，或者还包括美国的外交战略行动，另一方面考察世界市场上的商业交流和金融流动。美国极其想保持一个稳定的地区，让自由制度从中繁荣发展。本书的前半部分是叙述，也可以说是抽象的概括，因为这一部分仅仅用 135 页就追述了充满危机和战争的 25 年动乱。我想写一个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中立的叙事，我要揭示出角色们可能抱有的动机。对于 1950 年代末美国围绕杜鲁门的政策和所谓冷战开始的辩论，我也表明了自己的立场。

在题为“追究罪犯还是冷战的根源”的第一章中，我不得不从历史学家的角度，对我自己作为当事人，或至少作为评论家亲身经历过的一个时期表明自己的看法。过了 20 年，这些事情会不会改头换面后再出现呢？所谓“修正主义者”——赐给那些把冷战的主要责任推给美国的历史学家的美名——属于美国传统。在美国，对墨西哥的战争、对西班牙的战争和参与 1917 年世界大战之后，每一次都曾出现一个修正主义派别。头两次战争，在当时就未能使舆论达成一致，甚至参加 1917 年战争也是如此。事后的批评，无论从道德上或

政治上，又使用了当时反对总统或执政党的论据。由于真相逐渐暴露，官方的说法受到怀疑，批评又增加了其他论据。从大同盟演变为冷战，只激起一股分散的、软弱的反对势力。最初，反对苏联扩张运动伴随着反共狂热，从而产生麦卡锡主义。它采取了“追捕妖婆”的可恶方式，虽然不能同苏联的清洗运动相提并论，但这种迫害手段同一个民主国家是极不相称的，但其疯狂性怀疑多于疯狂性迫害。 821

大体上讲，这本书没有脱离我当时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我竭力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杜鲁门应该对冷战负主要责任，但同时，我也排斥了这个问题本身。如果冷战时期只从1947年（高谈有关德国问题的莫斯科会议失败和建立双管区）算到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这6个年头，那么只有斯大林才是冷战的罪魁祸首。反之，如果把冷战扩大到整个战后时期，或至少扩大到1962年秋天的古巴导弹危机，那就没有必要去追究“罪魁祸首”了。苏联人与英美共同进行了反对第三帝国的斗争，他们又互相怀疑对方背叛自己（单独苟和），并且不确定共同的目标。美国人和苏联人之间的冲突，不是由细节上的决定——如轰炸广岛和长崎，或美国突然对盟国停止（租借法案的）援助等——引起的，而是在“被解放”国家中逐步却锲而不舍地实行苏联的作风，安插苏联的人，传播苏联意识形态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同盟国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具体事件则不一定如此。历史学家应该在两件事上纠正当时的评论家，即朝鲜战争和中国出兵问题。如今我们才知道，对韩国发起攻击的是金日成而不是斯大林，后者只不过是开了绿灯。金日成在征求毛泽东的意见时，后者回答说他不相信美国会介入；11月，毛泽东曾两

次警告美国人（我在上一章已经写过这件事），反对他们的军队逼近鸭绿江。美国人，包括执政者和公众舆论，由于误解和无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感情用事。

822 一旦“遏制”口号占据了美利坚共和国领导人的头脑，华盛顿在这 1/4 世纪中的外交政策就不难理解了，事态的一贯性跃然在目。美国在 1945 ~ 1948 年进行了一场维护荣誉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战争以后，采取了一种防御战略，除了在公共集会和政党纲领中，历史学家找不出任何“解放”战略的迹象。

这种解释——近乎没有解释——又提出了一些历史文献问题。^① 如果综观多年来美国大兵在越南的稻田中的打仗和牺牲（4 万人以上），想要找出同事件规模相应的原因、赌注、彩头和理由，那么该到哪儿去找这些东西呢？经济利害？显然是微不足道的。战略要害，多米诺骨牌一倒一连串？河内取得胜利以后，确实要把它的统治扩大到老挝和柬埔寨，为了自己的利益，重新统一印度支那。但是，美国是否想遏制这种共产主义，抑或苏联的帝国主义、越南的帝国主义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敌人变得越来越难以确认了。对于这一切——美国对越南的担保——公众舆论越来越难以理解了。让人理解，就需要说明当事人的意图，或出于什么原因做出决定。我这本书设想的，首先是遏制的意图，后来执政者又无法找到体面的出路。最初，肯尼迪可以自由选择（至少有相当大的选择余地）；后来，约翰逊和他的顾问们试图把战争合理化，但他们既不知道

^① 在 1974 年第 4 期的《社会学欧洲文献》中，我发表过一篇文章，详细地谈到了这些问题。

如何结束战争，也不知怎样打胜仗。

该书的第二部分题为“世界市场中的美国”，讲到了想要说清楚碰到的另外一些困难，总的来看，困难更大些。美国的存在和行为对世界市场的其他经济体有很大影响。美国并不追求它的活动所带来的一切后果。从某个方面来讲，该书只对一个特定的领域做了分析。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促成了欧洲经济的复兴，美国也帮助日本重建了它的城市。后来，日本人重新掌握了他们自己的事务。他们受益于较少的军事预算，快马加鞭，打破了经济增长的任何纪录。美元涌向欧洲 15 年之后，美国国际收支逆差代替了美元的“结构性”短缺现象。战后初期美国的对外活动——如马歇尔计划，创建国际机构——事后已不再引起争论；这些活动是既慷慨又明智的，或者说，是一种“开明的利己主义”。

823

至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问题，美国外交政策是受制于某些集团的利益，还是受制于整个社会的经济利益问题，答案就不太明显了。我认为，要用经济原因详细地、逐字逐句地解释外交决策是不可能的，几乎是荒谬的。当然，华盛顿的一些大人物（特别是他们在参议院委员会辩护时）强调，越南蕴藏着财富，在越南打败仗就会带来损失。这种论点公然只想到单纯的合理性问题，没有什么意思。但是，如果用强权欲和美国社会的本质来说明遏制政策，就不荒唐了。同样，我们可以探讨，美国的资本扩张是否符合国内经济的需要，其他国家能否容忍美国的资本扩张，以及如果美国失去了军事优势，其他国家会不会如此长期地支持美元。

有一派历史学家和国际关系问题专家，他们不愿把国家之间的体系同世界市场分开，不考虑是否根据征服领土或进行殖

民活动，来确定帝国主义的含义。美国之所以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是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中成了核心经济体，是因为美国经济可以操纵世界市场而不受后者的左右或限制。美国经济可以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而受其他国家的经济的影响不大，从这个具体意义上讲，美国经济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美国经济可以
824 决定世界市场的规则，美国可以在国外投资，在当地再投资，或者把利息、利润汇回本国，这消费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资源。只要拾起马克思主义的牙慧，就不难建立一种帝国主义理论，它借鉴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但又有很大不同。这种帝国主义不抢主权，也不建立殖民地（从欧洲的通用的含义讲），只是一种经济货币制度，该给它扣上帝国主义的帽子，因为它吸吮了周边国家的劳动剩余价值和原料。富人靠损害穷人来增加他们的财富。

我的分析却得出了略有不同的结论，即如何抓住人们的动机，尤其是像美国这样的集体行动者的动机。被莫斯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争取过去的国家，至少部分地摆脱了世界市场；历史学家总是可以用另外一种说法——“为了自由贸易的自由世界”来解释威尔逊写的“为了民主的自由世界”。在某种程度上，自由世界同自由贸易世界是融为一体的。只有精神反常或不通情理的教条主义者，才会硬说美国保护西欧或在朝鲜打仗的唯一目的是扩大自由贸易的地区。美国是否采取了一种帝国式的行动？我用下面这段话来加以说明：“这种行动并不单纯考虑维持狭义的民族利益；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尽力保持整个体系的平衡与秩序，仿佛它曾经有意识地承担起这种责任。”美国正是为了对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负责，才在柏林和首尔驻军，最终不得不在亚洲大陆进行两次军事干涉。

至于美国的资本扩张，这自然来自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企

业和银行。如果没有这些销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是否一定会停滞不前呢？提这些问题不够恰当。一般来讲，在外国投资的收益会高于在母公司所在国的资本投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当然向收益最高的地方流动。之所以有部分资本向欧洲流动，原因是美元比价过高；1970年代，当美国货币一度贬值时，资本又朝相反方向流动。 825

归根到底，用经济原因或经济模式来解释美国的对外活动，在我看来不如从整体上同时抓住国家之间的体系和世界市场来得有意义，这两个方面加起来构成了“美帝国主义”或以美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秩序”。在上文，我概述了从列宁到当代作者们的词义的演变情况。在这本书中，我探究了被对手称为“帝国主义的”体系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碍了穷国，即发展中国家的“起飞”。19世纪以英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体系”并未阻止日本起飞，同样这个体系变成以美国为核心以后，也没有阻止日本升入一流的行列。不少国家和地区，如韩国、中国台湾和新加坡也是在世界经济的背景下，采取自由方式，成为高速发展的榜样。

菲律宾对“美帝国主义”的反对一般集中在拉丁美洲问题上，这有两点原因。从军事含义上讲，“美国佬的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待的时间最长。美国海军陆战队直到1934年罗斯福宣布实行“睦邻政策”时才从尼加拉瓜撤出。约翰逊向加勒比海、多米尼加共和国派出海军陆战队，去封锁他担心会滑向卡斯特罗主义的一场革命。杜勒斯向危地马拉派出远征军，去推翻转向左倾的阿本斯总统。这不是把遏制政策用到西半球了吗？我倒认为不如说这是美利坚共和国继续推行20世纪甚至21世纪对某些讲西班牙语的国家无耻地实行的炮舰政

策。正是在这个地区，指控经济政治帝国主义，才有最充分的根据。

826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喜欢把他们的一切不幸都归咎于美国。但在1945年以前，北美的这个共和国对它的南方邻国并不怎么感兴趣。阿根廷在19世纪是从伦敦而不是从纽约弄到资本的。法国知识界对巴西的影响超过美国。反之，古巴（富兰克林当总统时就想把它兼并）、中美的小共和国尽管形式上是主权国家，是独立的，却无法摆脱经常性的经济压力和政治压力，有时包括军事压力。我认为，断言南美的不发达是北美高度发达的条件或代价，这是不对的。阿根廷也好，巴西也好，都不曾为美国经济提供原料或必不可少的市场。南美洲国家的政局不稳，既不是美国佬造成的，也不是他们维持下来的；它们在军人独裁和脆弱的寡头政治民主之间来回摇摆，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1945年以后，美国曾替这些国家中的多数国家训练军队，不管这些国家是否由军阀执政。故而，美国实际上帮助了它本来讨厌的政权，以使它们维持下来。特别是在不少中美洲国家，事态的发展导致了进退维谷甚至可悲的境地：不让一些小暴君继续在位，就得眼睁睁地看着成立卡斯特罗式的政权。

无论在该书的第一部分还是第二部分，我都未提出简单的评断，我也尽可能不提出价值判断。有关外交战略的活动，我按当时的进展情况叙述，同时尽力根据当事人的意图和事态发展的逻辑，稍稍涉及美国的政治制度和公众舆论，使这种活动容易让人理解。在第二部分，我尽力采取同样的方式，分析发生过的情况，分析美国领导人对世界市场做过的决策，以及美国经济——根据当时的状况——对外国经济造成的后果。我希

冀的是了解而不是判断。历史学家重温记忆犹新的事件，有的叫人失望，有的叫人厌恶，当时的主角和旁观者至今仍在激动不已。记述这样的史实居然采取我这种态度，倒是相当罕见的。

在法国，报刊和公众对这本书的态度差不多是中立的，大体上，不如说是有保留的支持，只有克洛德·朱利安的挖苦文章（这是预料之中的）除外。米歇尔·塔图的评介使我大为恼火，不是因为他信手列举了几个时间上的错误（我写这本书时没有卡片，而是靠记忆）。这倒是打的规矩仗。但是，这篇评论的标题——《他们是坏蛋，还是可亲的人？》却向我展示出《世界报》最拿手的无赖作风。他们为什么要拿出恰恰是我不愿提出的问题来谈论呢？ 827

我从我保存的资料中找出两篇评论（可能是因为这两篇都是赞同我的）。路易·艾伦在《泰晤士报》上首先概括了该书的内容，或至少描述了该书的大体轮廓。

1973年，美国人从越南撤出了军队，但南越的命运仍然是不确定的。今天，尽管他们的失败是惨重的和显而易见的，阿隆精严有力的结论却是谁也驳不倒的……遏制政策在欧洲是成功的，因为美国人正确地回答了多数欧洲人的要求，而且美国人在欧洲也注意谨慎行事。譬如，杜鲁门宁愿依靠技术优势从空中向200万柏林人提供物资，也不用军队运输强行冲破封锁……朝鲜改变了这一切以及其他许多事情……冷战扩大到全球范围，冷战已经制度化了，以致美国实行大规模重整军备的政策，西欧和美国都是如此……阿隆显然是在家里工作的，但他以令美国同代

人脸红的严谨性和想象力，翻阅了所有的公开文件，查清了所有疑点，探隐索微，使我对法国人的博学和逻辑性恢复了信赖（当然过去就相信，但已被打破而有了缺口）。

不言而喻，《泰晤士报》的这个评论家——我并不认识他——对我过奖了，我不认为我做的是那样的。

大卫·瓦特在《观察家》上的评论则表现出更多的保留和分寸，他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即标题《一阵麻醉风》所暗示的：

828 这是一本非常好的书，但又奇怪地令人捉摸不透。两年前当这本书以法文出版时，有个评论家曾指出书中有一点儿麻醉剂的味道；英文译本中可以感受到一阵风……对于这样一部由最杰出的法国评论家之一写的大战以来的美国外交史，人们自然期望作者文笔明快而幽默，功力不凡。可是阿隆先生从容不迫地写出了一部复杂的著作，语调冷静而超脱。诚然，这些人曾经丧失理智，毕竟谁不会时不时失去理智呢？而他们却要应付许多历史、许多现实的压力。总而言之，事情不算太坏，难道不是这样吗？读过了包括冷战的根源、朝鲜事件、越南（还有其他许多事情）的三百多页以后，人们不免感觉到，结论未免下得有点温和……阿隆本人也以典型的傲气为自己辩护，反对这种苛求，并宣称自己是写这个时期的真正历史的第一人。

我从来没有自称自己是写这个时期的历史的第一人。在前言中，我开宗明义地讲过：

尽我所能给予评论，但我既不为美国辩解，也不指责美国……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在一个庞杂的体系内部，斯大林蓄意随着军队前进到什么地方，就把自己的制度扩大到什么地方，这是同一切习惯做法相一致的。毫无必要为了替斯大林辩解，就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美国。斯大林从未想当天使，他嘲弄这种单纯幼稚……当然，那些习惯于用摩尼教徒的方式来思考当代世界的人（人民被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魔鬼压榨成奴隶了），必将大肆攻击这本书，因为书中既无叛徒又无英雄，该书没有激起任何义愤。在我们这个时代，激起义愤的机会是不会少的——这路货色已经供过于求了——因此，请读者原谅我不轻易激起义愤。

大卫·瓦特赐给我的，超出我的奢望。

阿隆这本书几乎可以肯定是对战后美国外交最公允的一部评论……时髦的说法是杜鲁门挑起冷战，苏联人后来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对美国的侵略的一种反应。针对这种说法，这本书写得尤其好……朝鲜和越南是症结所在，尽管我相信阿隆说得也有道理，他认为艾奇逊和肯尼迪在不同情况下的所作所为，总的讲是出于防御动机，这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在这一点上，本书很缺乏道义深度。对历史学家来说，避免一种过分的伦理主义是对的，但是，如果修昔底德叙述远征西西里岛时使用阿隆描述美国远征西贡时的语气，我们就绝不会把它的历史书看作一部“不朽之作”了。

瓦特借助修昔底德的权威来压我也是有道理的，但是他弄错了。这个希腊人叙述远征西西里岛的语气与我叙述美国远征西贡的语气有所不同。可是在语气的不同这一问题上，瓦特搞错了。瓦特抱怨我的那本书中缺少“道义深度”，可是修昔底德比我更不在乎那种“道义深度”。我没有借花献佛，未曾把驻雅典的使臣们恭维米洛斯的法官和绅士们的话奉献给肯尼迪总统——使臣们说，强权统治、最强大者能使每个人就范，这是合乎天理人情的。这个雅典人非同凡响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他目光深邃，能透过表面现象和虚假花招，完全洞察人类的真相。如果我在非道德方面同修昔底德争个高低，就会惹恼瓦特；我所缺乏的——当然指除文才以外——不是道义深度，而是悲剧深度。对尼希亚之死的唯一评语“这个人比谁都不该遭受这样可耻的结局”，使读者哽住喉咙。4万名美国青年倒在越南战场上，每年在美国公路上因车祸死亡的青年也不比这少。几十万，可能几百万越南人在自相残杀中丧生。但是，1975年西贡陷落后，两个越南终于联合在一起，总人口超过1946年12月战火点燃之日的人口。武元甲虽然取得胜利，但还不足以熄灭这场战火。

有一次我在蓬索夫人家吃午饭，听到亨利·德·蒙太朗谈起他至今仍不为苏美争夺世界所动，却继续为雅典与斯巴达、罗马与迦太基之间的争斗而激动不已。人民之间的战争，数以
830 千万甚至上亿，已经超过人类范畴。统计数字代替了活人。群众角斗，彼此抗击，甚至肯尼迪在达拉斯遭暗杀，在我看来也不如尼西亚之死那样悲惨。因为尼西亚是在一次远征结束之后被胜者处死的，而他曾劝阻不要进行这次远征。肯尼迪则死于一个名叫奥斯瓦尔德的人的枪弹之下，这是个无名小卒。如果

我的这本书不谈一些抽象的主角，如美国或苏联，或者不谈差不多一样抽象的主角，如尼克松或基辛格，而是谈人民，谈战士，也可能就有悲剧色彩了。美国的对外活动主要表明了一种狂热，而不是人类的悲惨命运。

对于“麻醉剂”的批评，我倒乐于接受；历史充满了喧嚣和愤怒，我净化历史，勾勒历史，抓住历史的主线，剔除历史中的嘈杂、丑闻和无谓争吵。我撇开大学生及其愤怒不谈。最后，并非出于我的本意，该书给人的印象是美国似乎一心想成为有理性的主角，但它时不时犯些错误。我本来应该至少影射一下白宫的内幕，就像记者们描述的那样，或者像一些国家元首在回忆录中写的那样。

我还有可能以履行历史学家的义务为名，滥用旁观者严守中立的权利。在拙作的第二部分“世界市场中的美国”中，我分析了几个问题，但没有澄清几个对立的论点。安德烈·马尔罗说过：“任何政治都是摩尼教式的，但是，不应该过火。”而我却反对摩尼主义，也许还过了头。

克劳塞维茨

由于要讲13节课，我趁机重读了《战争论》一书，并且熟悉了一下有关这个普鲁士战略家的文献。有几个法国军官和外国军官来听我讲课，他们希望得到讲义原稿，可是原稿已经没有了。我再三犹豫用不用我的笔记和讲课后的打字稿。我决定不再像前次出版《工业社会十八节讲》那样请人修改我的打印稿。我对这种形式的书表示怀疑：一本论文或大部头著作，敢说能够全面介绍克劳塞维茨吗？我选择了第二种办法。自从《和平与战争》问世以后，我只发表过一些论文。我再

受一次真正考验的时刻到来了。这个决定相当古怪：我年近七十，再来研究“马克思”，再来研究历史的哲学，可能更符合我的生命逻辑和我的专业。

为了给自己找个理由，我在《形而上学与道德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引用了 B. 克罗齐的一句话：“只有像一些哲学家那样思想狭隘和知识贫乏，学术上孤陋寡闻，土头土脑——是怎样就怎样说吧——才能解释他们对克劳塞维茨那样的书为何那么无动于衷，那么拒之门外。”一部最负盛名而也许人们最乏研究的战略论著到底有何特征，这当然会引起一个哲学家的兴趣。

我给自己提出了四个主要目标。首先介绍一下他的生平和历史命运，这有助于了解其人和他成长过程中的社会和道德背景。其次，阐明克劳塞维茨的哲学方法论。再次，专攻一个最难解释又最重要的问题。克劳塞维茨在 1827 年的序言中宣布，他要就下述两个课题修改原著：首先要区别两种战争，一种战争的目标是打垮敌人，另一种则仅仅是在边界占领一些土地。其次是关于战争不过是推行国策所用的另一种手段的观点。那么，他说这些话的真意何在？最后，分析进攻与防御的关系，这使我注意到武装人民和人民战争问题。在课程的结尾部分，我对这个钦佩拿破仑的敌手的后代，包括忠实信徒和背叛师门的人，进行了评论；我还指出，核武器的产生即使不给克劳塞维茨的分析性理论，至少也会给其实际运用带来某些变化。随后几年我开了“政治行动的理论”和“政治的角逐与赌注”两门课，继续进行了同一性质的研究工作。拙作也借用了这两门课的内容。

在第一章，我简要叙述了这名战略家的一生，命运拒绝给

他提供取得辉煌胜利或历史性创举的机遇。但是，他先后作为沙恩霍斯特和格奈森瑙的知交，被卷入了革命和王朝时代的重大事变。他像大多数同代人一样，目睹了作为18世纪特征的有限冲突与阴谋诡计，也目睹了王朝垮台与群众崛起所带来的几乎无限的战争，以及二者形成的鲜明对照。他对此感触很深。历史的曲折多变使他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军事与政治的联系应是他思考的起点和核心，这种联系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从社会学角度讲，政治（政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正统的原则等）与军队的组织模式或战斗方式等，具有对应关系；其次是一个相当明确的规则，即军事行动服务于政治目的。战争有一种特殊的法规，但没有特殊的逻辑。在克劳塞维茨看来，军事工具服从政治意志，这一点十分重要，以致他在修改原稿时又进一步强调了 this 思想。

在概括这一课程时，为了能够从中看出他的方法，我是这样介绍《战争论》的第一章的：

开始，最简单的模式就是决斗的模式，它意味着战争的最初定义，即使用肉体暴力进行意志较量。分析这种模式可以得出上升到极端和绝对战争的理论，这符合他的观点。到了第二个阶段，克劳塞维茨又引入了这种模式所忽略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空间（一个国家不是一个决斗者，它拥有领土和人民）、时间（一场战争、一次战役、一个国家的命运不是一蹴而就的），进攻与防御不相对称，这就要分析为什么暂时停战。最后是政治。一个国家根据整个形势、敌人可能的意图以及现有手段，来确定战争本身的目的，决定战争的计划 and 该出的气力。

第一章是对全书哲学思想的概括，引出了战争现象的第二个定义，或对其内部结构的陈述，“战争现象是（人民的）激情、（战争首领的）心灵的自由驰骋和（政治，即国家智慧的化身）理解力这样离奇古怪的三部曲”。

1972～1975年，我满怀愉悦和激情地钻研这部著作。我经常去国家图书馆阅读德国学者和法国学者对这部专著的评论；我高兴地发现德尔布鲁克对战争的两种战略或两种类型的解释曾引起过争论。我不敢说自己彻底结束了这场论战，却敢说，通过对他的“宏伟乐章”的不断阐释，我重新绘出了克劳塞维茨的思想的发展过程。我又信心十足——可能带着幻想——继续对克劳塞维茨探幽索隐，发现他修改第三卷早在撰写第一章以前，而第一章却最完整地表达了这个战略家的思想。我很清楚，我绝对无意去完成一项政治使命，从来没有想过把克劳塞维茨拉入自由世界的思想家行列。这部著作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少数人士之间）带有倾向性的学术争论的目标。

对于克劳塞维茨的思想，可以有两种不同而又不相互矛盾的解释。其一是认为他的思想核心是，毁灭性战争，藐视不忍喋血的将军，关于绝对战争（或理想的战争、符合其观念的战争）的概念，势不可避免地要上升到极端，军队永远不会嫌兵多，等等。其二是把注意力放在他的思想的另一方面：战争是政治（通过用另一些手段或汇合其他手段）的延续，因此，国家元首高于军事首脑。他再三断言，绝对战争，或理想的战争，在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同绝对战争比起来，大多数战争只能算半截战争。

对克劳塞维茨感兴趣的大多数德国军人倾向于第一种说法。1870～1871年的胜利，说明了毁灭性战争的理论。莱茵

河两岸的某些阐释者反对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按照他的说法，防御是最强大的战斗方式。20世纪初名噪一时的法国军官吉尔贝尔（F. Gilbert）认为，关于防御高于进攻的说法是和这本书的其余部分相矛盾的。^①我认为，既推崇防御，又称颂直接的、猛烈的大规模进攻，二者相矛盾的看法是不难驳倒的。看看他的著作就可以知道他的思想是如何发展的：青年时代，他主张不惜一切代价的防御论，后来他从拿破仑所致力战争中，特别是在俄国的战争中发现了防御战的妙用。他越来越强调战争的历史性、不同时期战争的多样性，因而也就需要战略的多样性。有两种战争，一种是要在解除敌人的武装以后全权决定和平的条件，另一种则倾向于按照军事结局取得有益的和平。这两种战争反映了两种理想，其中任何一种理想都是受政治目的支配的，并且都会对军事行为产生影响。

如果采纳克劳塞维茨思想的第二方面，就会摒弃利德尔·哈特，因为他把克劳塞维茨称作“群氓和自相残杀的马赫迪”^②，他还提到所谓“普鲁士人的《马赛曲》”；还会脱离普鲁士或德国参谋总部推崇的观点，这种观点要求军事首脑在战争期间，在宣战与停火中间，可以完全做主。在这个问题上，《战争论》的原文已被篡改，并把原意倒了个儿。此外，我并不觉得忽略了拿破仑的仰慕者，他那种审美性的欣赏让歼灭战或一种符合他观点的战争，在这位普鲁士将军的心灵中掀起

① 让·饶勒斯反对法国参谋总部的理论，借用了克劳塞维茨关于防御是最有力的战略模式的说法。

② 马赫迪系伊斯兰教某些支派崇拜的复临真主。1881年苏丹的穆罕默德·艾哈迈德以马赫迪的名义领导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史称“马赫迪运动”。——译者注

835 的激情。出于职业习惯，他赞赏真正的战争，有时似乎蔑视那些半截子战争，喜爱重剑胜过花剑。作为战略家，他不忘强调，防御对较弱的一方有好处。作为导师，他既不建议进行绝对战争，也不劝打半截子战争。他向国家元首们建议，不要弄错战争的性质，他对那些不懂得敌人要把冲突升级的人才明确提出这种建议。但是，他也写过，绝对战争完全不是国家元首或战略家应该抱有或遵循的一种理想。一方面，战争的性质和激烈程度，首先是由冲突的政治背景决定的；另一方面，国家元首虽然不能左右这种决定，克劳塞维茨却暗暗肯定，战争的命定论很难同对人的意志和英雄意志的赞扬相容。

第二卷中，我试图追述一下对克劳塞维茨的各种“解读”，同时根据他的观点阐明 20 世纪的几次战争。第一章题为“从毁灭到消耗”，说明双方参谋部都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取得毁灭对方的胜利而告终，结果，资源最富有的协约国利用中欧帝国的民穷财尽取得了胜利。第二章采取同样的方法，分析了 1939 ~ 1945 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列宁在瑞士时研读《战争论》一书，从中汲取了一些教益。多亏列宁，克劳塞维茨才在苏联变成并且现在仍然是一个神圣的作家，所有军事问题专家都引述和讨论他。第三章为论述人民武装开了个头（见第六卷第二十六章标题），我追溯了不穿军装的战士所从事的战争、所经历的各个阶段。

在第二卷的第二部分中，我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某些论点，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威慑的期票”是说克劳塞维茨告诉我们，战斗可以最终解决预支的战事、预支的外交和策略问题。有了核武器，不用战斗来解决，不用把威胁变成行动，就能使

核威慑生效吗？“战争是变色龙”，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确实存在现代各种各样的战斗模式，从恐怖分子的个人行动到分区轰炸，战争从来没有如此多样化。从这一点来讲，战争从来不像这样无所不在。与20世纪相比，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简直像是面对广大观众进行的一次无精打采的惨剧彩排。

我的朋友儒弗内尔是一个战略著作的细心读者，他的表扬有时是客套的，有时又是真心实意的。（“我非常喜欢人物介绍，它更加叫我相信，遗憾的是您很难让人洞察到您的真实感情。”）他对第二卷极有分寸地表示有所保留：

我要向您承认，我没有“收到”像第一卷那样“铿锵作响和闪闪发光”的第二卷。您的克劳塞维茨受的是18世纪的教育。他是在文化单一的世界中打仗的，因为他确实发现，资产阶级制造出来的“长裤汉主义”并未成活。1914年的愚蠢战争，只有两样出轨的东西：一是放射鱼雷，二是没有通过谈判取得和平。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乃是一个死亡集中营！大家有目共睹，我认为这次战争中表露出来的仇恨同克劳塞维茨说的战争风马牛不相及。而蔑视人类的说法同威尔斯利大厅（有些人追溯到弗雷德里克二世）的谈话是两码事，他曾对一支拒绝再次冲锋的部队说：“这帮子杂种，就想永远活下去……”克劳塞维茨强调意志，这确实有道理，但是，这种意志要服从自己的规律……

836

从第一卷到第二卷，有些读者认为是成功的，另外一些读者认为流于太勉强或穿凿，值得争论。但是我认为，说拿破仑

战争中没有仇恨也言过其实了。克劳塞维茨本人就说过，战斗在战士的心灵中激起仇恨。确实，格奈森瑙憎恨法国人，却没有想到要处死俘虏、妇女和儿童，但他要求把拿破仑带上法庭。法国占领欧洲不能同希特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占领相提并论。克劳塞维茨对武装民众宣传得也不少，尽管他预料到双方都会很残酷。我在本书中多次提到，同 20 世纪的战争相反，拿破仑战争在我们看来还相当文明。

我心目中想的读者是德国读者，不是大众读者。这不是拙著的对象。拙著的对象不过是同行中人、历史学家、国际关系问题专家、政治学家，有时也包括哲学家。这本书在法国评价很高，我的朋友们表示热烈祝贺，但这没有多大意义。在莱茵河这一边，对这个问题有真正研究的人为数很少。P. 纳维尔是例外，因为他为《战争论》写过序言。据我所知，他并不喜欢我的书，但他也没有进行攻击。在德国的际遇就差一些了。在法国，我的年纪开始能够替我当挡箭牌了。某些读者不管该书说得对不对，认为这部令人头痛的大部头文笔倒还不错，可是，翻译过去就不行了。

有三封信鼓起了我的信心。第一封是卡尔·施密特的信。1953 年我作为客座教授在图宾根访问时会见了他一面。朱利安·弗伦德在他的论文前言中对自己的两个导师——卡尔·施密特与我表示敬意，他成了我们的中间人。我们偶尔有书信往来。我有时把我写的书寄给他，他总给我写回信。卡尔·施密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是公认的才华出众的法学家。他属于德国的大学者之一，这些学者超越自己的专业，涉足一切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就像马克斯·韦伯那样，权且把他们称作哲学家吧。

卡尔·施密特从未加入过国社党。他是一个知识博大精深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希特勒分子，也从来不是希特勒分子。但他是一个右翼学者、国家主义者，对魏玛共和国充满轻蔑，他无情地分析了魏玛共和国的矛盾与没落，并以法学家的身份，阐明了希特勒为什么能上台并组织纳粹专政政权。他着重阐述了1934年6月30日事件，即“长刀之夜”。在当时，这种阐述就被看作表示赞同。甚至在战争爆发以前，当局已经不把他当作受欢迎的人。1945年以后，他承认自己铸成大错，隐居到威斯特伐利亚的一个乡村，至今还活着。

下面是他的感谢信的开头部分：

上周，2月13日，伽利玛出版社把您的新作《克劳塞维茨论战争》惠寄寒舍。此后，我就爱不释手，我“放”不下书，也被书抓住不“放”。这是一部使人全神贯注的书，书分成两部分，两部分均圆满完成，这是一项完美无缺的成就。这是一部前所未闻的成功之作，从头到尾都很吸引人，甚至“注释”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不必从字面上去看这些溢美之词——这是一封私人信函——我感到对于右翼，我大可放心了；本书是保守派或反动派能够接受的。

威尔纳·哈尔维克教授——他主持出版了《战争论》的最后一版，我是在明斯特举行的一次军事历史讨论会上认识他的，他曾向我通报过一些情况——来过一封友好的信表示感谢：“对您在发挥自己的思想和在解读克劳塞维茨方面的深度和新意，我深为感动。您对克劳塞维茨的解读，使人清楚地看

出了他的思想结构和内容，过去是看不到这些的……”这些话也没有超出研究项目相同的教授之间的一种恭维。

1933年我和我的朋友戈洛·玛恩曾在柏林一起目睹了焚书的场面。他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执教时，我又在巴黎碰到他。他使我相信，我下的决心没有错，我对一个普鲁士战略家下的几年工夫也没有白费。他说：

毫无疑问，这是您写得最好的一本书。我们知道，您以前的著作质量都很好，而且越来越好。这本书又增添了一些独到之处：只同一个人的思想有关，有一种传记成分。传记写得很出色；对德国北部的事物了如指掌，在识趣、理解方面（我不喜欢 Einfühlen^① 这个词）也是如此……第一卷与第二卷的衔接，从分析克劳塞维茨直到当下，这个大胆的做法，我认为一切都成功……

因此，一个素不相识的社会学家用长达四十多页的篇幅^②，对我进行粗暴攻击，攻击我的书，攻击我本人，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这篇评论文章不乏学究气，里面的人身攻击绝不少于学术争论。文章暗示我没有战争经验（事实也是如此，但关于战略问题的探讨，却不怎么能说服人。过去有人对德尔布鲁克也提出过同样指责），影射我有犹太精神，不许我客观地分析希特勒，如此等等。对于学术评论，我一一作答，对于人身攻击，我不屑一顾。在这样一本书中，找不出学术上值得争

① Einfühlen，德文，意为感情同化。

② 该文刊登在《政治杂志》上。由于我是该刊编委会成员，刊物负责人问我是否反对发表这篇文章。我当然不会表达任何反对意见。

论的地方，但我也不认为，如果争论不超出学术范围，倒也不见得不可能或不必要从争论中找出主要症结。

克劳塞维茨的辩证法是否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呢？我认为没有。R. 海玻（R. Hepp）没有提出任何可以改变我的看法的论据。“有限观”的定义，仗打到顶点才算战争的说法，在我看来与黑格尔的战争概念毫无共同之处。我认为，我本人的解释仍然是最接近原著的，至少是接近第一章的意思，而克劳塞维茨自己认为这是他真正完成的唯一一章。战争的最初定义是决斗——用暴力迫使对方服从他的意志，包括精神和物质双重力量的较量。决斗被抽象化了，它要升到极端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克劳塞维茨在第二个阶段，已从把战争简单地比作决斗，过渡到国家之间与民族之间的对抗，这种对抗视不同利害关系和情绪激烈程度，有的上升到极端，有的则不一定。理想的、理论的、抽象的战争，既不是韦伯所讲的一种理想类型，也不符合黑格尔的战争概念，它反映了冲突本身的实质，抽去了决定战争的条件和敌人赋予战争的目的。

同大多数解读者相比，我使用了较多的我称为“三位一体”的定义，我也可以称之为，而且应该称之为“三部曲”。现实战争或具体战争，包含着（人民的）激愤、（军事首脑的）灵感天马行空和（体现国家化身的政治和智慧的）磋商。凡是克劳塞维茨谈到下述问题的文章，我一点儿也没有忽略：他多次说过，战争一旦摆脱习惯的束缚，就不可能轻易恢复20世纪的狭隘形式。未来的战争很可能变成民族战争，也就是说有愤激的民众参加，有发展到极端的趋势。我的文章也有有懈可击的地方，即过分强调了思虑的作用，这是对军事首要服从国家元首方面的后果看得太多了。当时，国家元首就是

君主。但是，如果细心地读一读克劳塞维茨的原著，任何人都几乎不会怀疑，他确实越来越重视两种想法的意义，一是政治优先，二是战争的类型具有两重性，这可能使那些把克劳塞维茨简单化了的信徒们感到恼火。

840 另一个评论家 H. J. 阿恩特 (H. J. Arndt) 用一种委婉的方式指责我没有考虑到那些不作为政治手段的战争，这些战争是由于单纯的冲突引起的，可能成为你死我活的战争。他引述了克劳塞维茨的几句话 (第八卷第六章 B)，但我认为与我的解释并不矛盾。整句话如下：

当战争开始时，政治观点可能要消失，大概只有由冲突引起的战争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这类战争才有这种可能。一般的战争只能是一般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从这一句孤立的话中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论点，即单纯冲突酿成的你死我活的战争，与政治已经毫无关系。如果注意到这句话的上下文，情况就不同了。克劳塞维茨的意图恰好相反。他希望证明，指挥战争的权力属于君主，而不属于军事首脑。他在第一章明确指出，文明民族之间的战争只能由政治动机引起。在同一章 (第二十五、二十六段)，他解释说，随着冲突的动因不断扩大，战争的尚武因素便越来越多而政治因素则越来越少。战争赌注越大，便越会把战争引向暴力的顶端；战争的目的有可能与政治目的混淆在一起。然而，你死我活的战争，其政治性并不亚于有限战争。在这两种情况下，决定战争模式的是各种动因和政治背景。我不认为我低估了战争可能升到极端的危险性和战争一直打到底的可能性，因为战争有它

自己的能动性，可能摆脱老谋深算，摆脱君主的思虑。在核时代，危险性更是增加了。

要说我的想法值得争论，我倒十分同意，但这种想法在什么地方，出于什么理由要贬低克劳塞维茨呢？我的想法是否像 R. 海玻写的那样，把克劳塞维茨贬低成一个无害的、无辜的思想家呢？恰恰相反，他和修昔底德、马基雅维利一样，是个危险的作者，我曾把他同后面两人做过比较。诚然，作为杰出的战争理论家，他对军事、战役、战术的论述大大超过对政治的论述。同样，他也曾指出政治在战争中的地位，但没有分析政治本身。他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性，不让自己沦为约米尼 (Jomini) 之辈，是因为他花了一生的心血去钻研兵法和政治逻辑，同时也由于他既不忽略战斗的阴森恐怖，也不忽略老谋深算。我没有把他看成经学家，而看作理论家，说他是一位研究战争的学者但不是常胜将军，他在抽象概括方面达到最高水平，却不让人去阅读报纸或战士的自述，显然，这并不是贬低他。可能有些人，包括 R. 海玻和另外一些人，希望他更粗暴一些，在他们的想象中，他不会为自己思想上的不同倾向而忧心如焚。面部表情只有画家的目光才能抓住。一个无私的人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只顾自己的人。

841

我认为，本书的第二卷——或第二部分——比第一卷薄弱多了，而且经不起追问。R. 海玻的一些看法（关于鲁登道夫，关于希特勒与克劳塞维茨的关系）是正确的。但是，他对我讲的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句话进行了最恶毒的攻击。例如，他指出以下几句话：“希特勒和斯大林这两个恶魔，一个以他的罪恶行径背叛了他的思想，另一个贯彻了他的思想。武器支持了魔鬼，而魔鬼并不努力让一种魔鬼理论取得胜利——

可这就是正义。” R. 海玻指责我犯了一个流行的错误，即用双重标准来衡量，左派犯的罪行就不如右翼的重，等等。我该不该说“可这就是正义”？我自己也曾多次扪心自问，可是一直没有把握。

在这类生死搏斗中，“正义”一词的含义是什么呢？双方谁负最初的责任呢？如果是这样，希特勒负的责任就比斯大林大一些，尽管由于1939年的条约，后者也负一部分责任。斯大林的思想就比希特勒的思想好一些吗？当然，他的思想是马克思原来的思想。难道这种思想的危险性就小一些？这还有待商榷。希特勒如果获胜，其后果就一定要比斯大林获胜更坏吗？一个犹太人的回答是不会含糊的。一个德国人，例如恩斯特·荣格，就可能回答说，希特勒不会维持多久，德意志人民将会看清纳粹狂，可能一下子把欧洲也解放了。每个人都可以对后来可能发生的事自由设想。反正，尽管“正义”一词在这个背景下有些词义不清，但我仍未感到这句话有什么令人脸红之处。

842 在该书的结尾，我对汉森·维特曼·鲍德温（Hansen W. Baldwin）有关美国战争行动的评论加了批注。这个记者指责美国历届政府的“实用主义，无条件投降和总体胜利的学说”，指责他们对城市不加区别地狂轰滥炸。R. 海玻抱怨我没有更加有力地揭露西方人的“罪行”。他愤愤不平地引用了下面这句话：“1945年8月，毁灭了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就像扩大推行了毁灭全体居民而不仅是敌人军事力量的原则。”当然，这不是表面上的问题，而是现实问题；且不去管这个句子写得如何，但其中的“就像”这一词语意味着使用不加区别的暴力。读到下面这句话就没有什么疑问

了：“原子弹是英美空军摧毁德国城市的延续。”^① 在这一章里，我分析了单纯的冲突如何发展到极端，我辩明了克劳塞维茨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毁灭的原则针对的是有生力量，而不是丧失了战斗力的力量，虽然他在第二章中也顺便提到，摧毁这个国家也是制服敌人的一种手段。海玻指责我把克劳塞维茨弄得枯燥无味，然后又抱怨我这几段分析中缺乏好恶感。

我们权且不谈这些细节，还是看一看 1930 年代“保守派革命”的理论家阿明·莫勒（Armin Mohler）的那篇短文吧。他认为，在西方世界，包括联邦共和国，大家几乎一致认为这本书是介绍克劳塞维茨的唯一一本有价值的书。他接着说，不一致的只有两个大学教授 H. J. 阿恩特和 R. 海玻。这两个评论家企图指出，我之所以把克劳塞维茨变得枯燥无味，目的是使之适应西方自由主义的需要，反对苏联世界利用克劳塞维茨。莫勒拒绝表态——这需要占相当篇幅——他只写了一篇短文，但他似乎乐于让共产党人与自由派迎面相撞，在他看来，他们是互相敌对的兄弟。

我个人并不认为 R. 海玻是以共产党人的观点来批评我的；他是借助于一种国家主义，而我对这种国家主义的来源和目标一无所知。他年少气盛，把攻击一位老权威当作乐事，更何况这位老者居然奢谈战略问题，不自量力地怀着民族的光荣、普鲁士军队的光荣。我给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复信，这对他来讲无疑是一个收获。一年以后，一个名叫马斯克（G. Maschke）的记者在《法兰克福日报》的报道中引用了 R. 海玻的论点。

843

^① 这些轰炸无疑已构成战争罪行，但是这种轰炸与（杀害囚犯的）煤气室不同，其出发点不是消灭人。

我在第一部分对克劳塞维茨的评介既合乎苏联人的观点又合乎西方人的观点，如今双方都推崇政治优先于军事的观点。我没有无保留地赞同列宁主义者对克劳塞维茨的解释，有一个明显的理由就是，这个普鲁士人认为国王是国家团结的化身，而列宁否认这种团结，认为在社会主义之前，阶级斗争撕破了这种团结。谁也不能阻止列宁用阶级来代替国家，利用《战争论》为其自身目的服务。他不会一下子又变成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门人的得意门生。

我乐于承认埃里克·德·丹皮埃尔和儒弗内尔给我指出的第二卷中的毛病，虽然卡尔·施密特和戈罗·马恩曾认为我成功地冒险引用拿破仑战争于当代。我个人对第二章的结尾部分尤其没有把握，我尝试着用《战争论》中的概念来说明当前的形势。我还想维护题为“威慑的期票”这一章。在这一章里，我着手解释我所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即自从冯·彪罗（H. von Bülow）的评论文章问世以来，原来反复发表的一种看法还剩下些什么呢？这种想法认为，战役之于演习，有如现款交易之于期货交易。美国人要求并希望能够避免支付现金，因为在他们的思想里，威慑是使用核武器的一种威胁方式，可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种威胁可能永远不兑现。苏联人是否也这样想呢？专家们对此有争论。苏联人希望在不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取得历史性战局的胜利。

844 然而，我并不认为我引用《战争论》分析当前形势时的一些简单失误或枝节性错误，会把 R. 海玻和马斯克惹得大动肝火。在我看来，至少前者的激烈态度，如果是出于理论分歧，起因却与某些貌似科学的思想有些政治瓜葛。我不顾当时的主

导思想，坚持认为冷战并不是克劳塞维茨所讲的一种战争，认为苏联并未同美国或西方世界处于交战状态。我不否认，自上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紧张的，互相之间采取的行动如果换一个时代就可以认为是好战行动。我也并不怀疑当代的和平与战争的界限模糊不清。但是，在下面一些概念上，我同意苏联人的观点，即与阶级斗争相比，与国家之间的对立相比——这种斗争与对立是经常性的——战争的特点在于主要使用肉体的暴力。不管对此同意与否，事实是：克劳塞维茨确实曾用暴力来说明战争的特征，并且认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政治的继续或补充手段。在这一点上，我认为苏联人有道理，他们把阶级斗争与内战区别开来，把武装的和平与国家间的战争区别开来。苏联人不断重复，而我也坚持的是，作为克劳塞维茨的忠实信徒，应该说，“武装斗争是战争的主要手段和特殊因素”。这种概念上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在和平时期国家就不采取对付潜在敌人、当前敌人或经常性敌人的活动。

我竭力戳破我称为“颠倒过来的惯用语”中暗含的论点，例如，能不能说和平是战争的其他手段的继续呢？在这个问题上，我也不否认，与内务人民委员部有联系的恐怖主义网竭力把欧洲民主国家搞乱。他们采取的敌对活动远远超过古往今来的间谍活动（霍布斯在描述国家关系时也提到间谍，并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方式）。克劳塞维茨尽管怀念伏尔泰或孟德斯鸠描绘过的欧洲共和国，但已经预感到民族战争或人民战争将意味着什么。因此，今天，一个理论家完全可以拒绝承认战争的特征是暴力或优先使用暴力。总之，苏联人坚持以使用（优先使用）暴力与否来区别和平与战争，是符合克劳塞维茨本人的指导思想的。

我拒绝把惯用表达式颠倒过来，这显然激怒了反对我的人。表面看来，我反对把它倒过来使用的理由很简单，因为在战火平息的时候，这种表达并不排除各个国家可以在战场之外或用其他方式进行争斗；但是，从克劳塞维茨的观念来讲，说和平是战争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却毫无意义，因为战争的特点就是使用武器。如果在当代，各个国家可以用不同于昔日欧洲国家之间的敌对方式互相对抗，我当然同意这一点。放到今天，克劳塞维茨会怎么想、怎么写，谁也不知道。我本人对当前形势的判断属于我自己的观点；我承认，根据克劳塞维茨的另外一些观点，别人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让我们从彩头的大小和感情的力量这两个观点谈起吧。当然，苏维埃政权与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造成了一种政治环境，很可能发生第一种类型的战争，可能上升为极端的战争。接着可以看到，冲突扩大到全球，到处暴力肆虐，随后开始打仗。难道不应该从此得出结论，就苏联和美国而言，本来属于第二种类型的一些“小型战争”——但从地区来看，也属于第一种类型的战争（南越已经被消灭）——会不会有朝一日把交战国推向极端呢？再者，一个对决战念念不忘的克劳塞维茨的信徒补充说，一场争夺控制整个欧洲的根本性冲突，怎能不随着赌注与激情而发生爆炸呢？

846 我认为还可以有另一种估计，这是我的看法，不是克劳塞维茨的看法。我根据这个战略家的说法，强调老谋深算，强调政治是理智的化身，强调国策与政治的无上威力。东德人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们把克劳塞维茨马克思主义化了。他们断言，在资本主义世界和社会主义世界之间，根本性决战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他们希望或者幻想，东西方冲突最终可能由于双方

在非核战中打得筋疲力尽而告终。东方的理论家们并不排除可能做出一项不使用核武器的决定，但我曾错误地认为，这些武器单纯用于威慑，不会用于决战。最近 35 年来，这些武器的作用确实如此，但用于威慑并不是这些武器应有的用处。如果用来对付没有这种武器的敌人，这些武器便能起决定性作用。在超级大国之间，这些武器便可能造成一种共同自杀。但有人设想了这样一些场面：由于运载导弹攻击准确，使用核武器可能不会对战胜者或战败者造成世界末日般的杀害。

因而，我承认一个醉心于歼灭论的克劳塞维茨门徒会深信生死的搏斗，要求分个死活，可能采取与我全然不同的方法，解开这个世界之谜。我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中并准备在这个世界中谢世。我所反对的，是指责我贬低了克劳塞维茨，说我把他看作一个没有进攻精神、不了解历史悲剧的思想家。而这种悲剧，我窥见到了，我感觉到了，从头到尾，我都尽力使大家认识到这种悲剧的存在。以色列是在暴力中诞生的，只能在暴力中维持下去，将来很可能在暴力中消失。超级大国也许不滥用核暴力来解决它们之间的纠纷，但这只是一种期望，或者说是把宝押在理智上。克劳塞维茨既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保证，也没有判定我们必须逆来顺受，听天由命。不是克劳塞维茨便是自由派软骨头吗？当然并非如此。克劳塞维茨了解历史悲剧，他有勇气把一部分主动权交给人民和英雄，因此在我看来他要比“主宰群盲和屠杀的马赫迪真主”更高大，比藐视古罗马执政官“拖延者”费边（Fabius Cunctator）的青年军官更高大，甚至比小毛奇、施里芬（Schlieffen）或福煦（Foch）的老师更高大。

有两篇文章可供我作为结束语，一篇批评十分诚恳，另一篇则热情过分。尽管威尔弗里德·孔茨曼（Wilfried

847 Kunstmann) 错误地以为我主要是想把这个战争理论家从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但他把第一卷和第二卷加以明确区分: “如果我们把这本书看作一个整体, 首先是因为第一卷系统地重建了关于战争的理论, 而阿隆的著作, 对研究克劳塞维茨是必不可少的。”评论文章接着却说: “随着阿隆越来越接近现时, 这本书便解体了: 离题、转弯抹角、重叠反复和往往是画蛇添足的注释。”

威尔弗里德·冯·布雷多夫 (Wilfried von Bredow) 的文章中有一段正是我天真地梦寐以求的, 我不惜贻笑大方照录如下:

德文译文仍然光彩照人 (尽管经过翻译, 文字平淡了), 作者令人倾倒的博学多才, 以及他善于把科学和经验巧妙地结合起来的能力, 使这本书成为法国文化与德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顶点, 对这本书再怎样评价也不过分。

接着, 评论家与作者保持了距离。他指责我在前几本书中有一种消极接受既成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多么可憎——的倾向, 说我不去改变这些现实:

在这本书中, 我却找不到任何这种倾向; 同他以前写的几本书相比, 这本论克劳塞维茨的书作为晚年之作, 无可指摘。

我略去他对本书两卷本的评论, 直接谈一谈他对本书引起争论的一段结论。有为数不多的人讨论过这本书, 对此, 他写道:

有几个我不愿点出大名的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写评论。还有几个——这对我也是一个危险的警告——出于一种新国家主义的怨恨，不承认阿隆的真知灼见。阿隆的理性保守主义——他的理性保守主义在这个国家本应占有更重要的地位——似乎已不被德国政治学的门徒们所接受，这就够令人担忧的了；而现在的发展趋势则使我担心将出现更糟糕的事。

我希望这种担忧是言过其实。但我对于当下面临的一种德国新国家主义，也同样十分惊讶。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848 回想 1970 年代——直到 1977 年 4 月——我只记得我活动频繁而心情却很平静，没有发生过任何类似 1968 年 5 月事件或“六日战争”引起的那种争论。法兰西学院占据了我的大部分工作和时间。从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上层知识界日渐衰落。时过境迁，随着几个星期中昙花一现的风云人物们的销声匿迹，人们原谅了我在 1968 年 5 月的态度。一代新的知识分子登上舞台，声誉大振；他们也得益于巴黎时尚，而巴黎时尚本身受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其是索尔仁尼琴的冲击。

1955 年我当选去巴黎大学任教，讲授有关工业社会、国际关系以及历史社会学主要理论的课，并将相关内容撰写成书。我后来又获得法兰西学院的教席，自觉重现青春，平添新的干劲；如果不是想不要愧对这座学府中的一席之地，我可能就没有勇气继续进行对克劳塞维茨的深入研究。

849 我把我在法兰西学院的讲课看作“试投”（用球场用语来讲），我将它们不断修改、成书。其中两节“从德国历史主义到分析哲学（1972 ~ 1973）”和“历史世界的建设（1973 ~ 1974）”，就是我在《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一书的前言中提到的设想。1970 ~ 1971 年和 1971 ~ 1972 年，我讲授的课程之一的题目叫作“社会学思想评论”。我至少希望撰写《社会学

主要思潮》第三卷的初稿（《社会学主要思潮》在法国只出版了一卷）。这一课程我未讲成，但它帮助我了解到应该如何进行这种“评论”。

这些“试投”中的任何一篇（关于“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和“克劳塞维茨”的除外）都不值得改写成书。准备工作无休无止。如果不是由于我讲完我的课程后不久便患了脑血栓，我很可能会写一本《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1976~1977）》。1977~1978年的课程是《论自由》一书的继续，题目是“自由与平等”，但在本书中，这个问题并没有在我过去的探索中占有的那种地位。

1973~1974年，我的课程命题为“论后工业社会”。我为什么取了个这样的题目呢？或许是当时“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比较流行，但主要是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不许我使用其他更符合我本意的题目。我最喜爱大仲马，特别是他那本《二十年后》。确实，我曾设想参照事态的发展，重新审读我对东西方社会进行比较研究的3本小册子。

1974~1975年，即《工业社会十八讲》发表19年以后，第一次石油冲击伴随着罗马俱乐部的伪科学预测，搅乱了刚刚摆脱1968年狂热的人们的思想。这是我20年之后重新注意到原来的问题，而不是什么自我批评。

“工业”一词可以追溯到17世纪，当时的含义是灵巧、能干。《小罗贝尔词典》引用了费内隆（Fénelon）的一个提法：“智慧之神的威力和匠心（工业）”。《利特雷词典》引用莫里哀的一句话：“轻一点，讲话是我的拿手好戏（工业）。”拉辛在《伊菲革涅亚》（*Iphigénie*）一剧中写道：“但是，不久他记起他那狠心的行当（工业），把我当作荣誉和祖国。”18

850 世纪广泛流行的含义均来自技能，包括所有财富生产活动和金属加工活动。《利特雷词典》援引了伏尔泰的一句话，奇怪的是，这句话与20世纪末的“时代精神”相吻合：“工业弥补了自然和疏忽给我们的气候造成的缺陷。”

“工业”一词的历史含义，或其意识形态内涵，似乎是圣西门的门徒们赋予的。圣西门本人创造了“工业家”(l'industriel)这一名词，用以区别工人(l'ouvrier)和壮工(le manoeuvrier)。他还把工业家同企业主(le propriétaire)区别开来：后者并非管理者，不参加劳动。反之，圣西门的门徒们绝不把工业同农业、商业、银行对立起来。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中，我发现了“银行产业”的说法。“工业主义”“银行体制”等概念带有历史的哲学含义，它们指的是一种社会组织，即同“军事体制”相对而言的另一种组织。人剥削人，变成了共同开发自然。

在《进步梦幻的破灭》^①一书中，我曾提到奥古斯特·孔德把军事秩序同工业秩序做过的比较。我们知道，目前，圣西门的门徒和奥古斯特·孔德都弄错了。人类部分地控制自然以后，他们得到更多的武器来互相残杀，并没有获得更多的道理来和睦相处。但是，一旦撇开迷人的选择，工业家怎么样，军人怎么样，那么，正如安凡丹和巴札尔在《圣西门学说释义》一书中指出的，圣西门谈工业制度在不少方面早于马克思思想。这两个预言家谴责行将被工业制度消灭的人剥削人的现象。他们称颂组织的长处而不是市场的长处。我们似乎可以称

^① 我在另一篇论文《纪念奥古斯特·孔德的讲话》中也谈到了这一点，参见《战争与工业社会》。

之为组织社会主义，因为他们谴责遗产，强调劳动为大多数人的福利服务。

圣西门的信徒们虽然也看到了社会矛盾，但他们从来未能得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论点，即无产阶级的救世主作用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彻底决裂。他们仍然是精英论者，为群众做好事，而不是由群众做好事。尤其是他们未能拟定出批判资本主义和传统经济的相应理论。马克思利用李嘉图的学说，建立了剥削的科学理论和两种制度的根本对立（其中一种制度必将让位于另一种制度）的理论。 851

1974年，我已经不再对持怀疑态度或抱有敌意的人讲课，听众都是事先就赞同的人。用巴黎流行的风尚来判断，情况已全然不同，至少表面上是如此。1955年，法国人对他们的经济发展还没有信心，他们正在非殖民化的最后搏斗中挣扎着。1957~1958年的第三讲与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不期而遇。1958年5月我正在讲授最后一讲，而第四共和国已濒临末日。到了1974年，战后初期的怀疑态度已成为过去；欧洲国家接连出现或同时出现的“奇迹”所带来的过分的乐观主义也已消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患了罕见的“滞胀”病。根据传统的见解，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是两种相克的病症。添加一剂通货膨胀药，不可能启动经济增长中卡住了的机制。通常的治疗方法已不起作用。人们在寻求另一个凯恩斯。原油价格四五倍或十倍地上涨，事实证明，西方人在前一阶段取得的利益是不合理的。石油价格的昂贵（不是指价格本身，而是同不久前的价格相比）使罗马俱乐部的论点站住了脚。这里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我简要地陈述了一下我为什么不愿意采用“后工业社会”

这个概念。诚然，发展中的工业部门今后比传统工业部门更加直接地依赖科学，尽管 19 世纪末化学工业已经提供了榜样，并作为例子说明了后工业社会时代的特征——直接靠科学哺育工业。此后，“工业”不再是指所谓的第二产业，而是指系统利用知识以提高生产力，所谓后工业社会仍然属于工业型社会，尽管与前几个阶段相比，现阶段具有某些独特之处。

852 法国人到 1955 年才勉强意识到，他们正在复兴，而且“奇迹”正在发生，我果断地把增长问题列为经济分析的核心。当然，传统经济学家并非不了解增长问题，或换个说法，类似增长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看来，他们对增长问题的研究只占很小一部分，与这一现象本身的重要地位极不相称。^① 李嘉图的论著只有一章论及依靠劳动者的技巧、机器或组织来增加财富的问题。科林·克拉克的《经济发展》（*The Economic Progress*）一书奠定了西方经济增长的理论；尽管后来他的统计数字受到指摘、否定、匡正，但这毕竟还是一本基础性的著作。

这种理论提出必须以国民生产的统计数字为前提，这种统计可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但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至少在法国）人们并未经常使用这种统计。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的宏观经济也引出经济增长的理论，从而把各种国民经济从各自的制度中抽象出来并加以比较。苏联的五年计划促使西方人去探讨与整个计划相关的数字。1955 年，我强调指出增长论的科学价值和增长这一现象本身带来的物质、政治和精神后果，即可供分配的蛋糕有规律地增大。

^① 这一点对亚当·斯密可能不适用。

1974 ~ 1975 年，我的使命恰恰相反，我尽力强调总量——例如国民生产总值——的准确含义，强调总数的准确性是有一定限度的。众所周知，各国国民生产的计算方法是受各国的统计惯例决定的，这样得出的数字是不真实的、不准确的。统计人员掌握市场经济情况，而国内劳务基本上不属于商品领域。为了在统计数字中反映出国民生产中非实际财富的增长部分，只有把非商品活动变成商品活动。

1968 年以后，经济增长本身的价值受到怀疑，更甚于增长论摆弄数量的可靠性。在 1974 年讲授这一课程以前，1965 年我曾撰写《进步梦幻的破灭》一书。该书发表于 1969 年，853 我在这本书中尽力准确地指出，人们从财富和劳务增长中可能得到些什么，不可能得到些什么。“重新评价”并不是“痛苦的纠正”。战后经济增长是得人心的，今天依然如此，尽管客观形势要求人们不能再用简单的态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不能指望依靠增长来解决社会冲突，至少不能仅仅依靠它来解决。目前的经济衰退过去以后，经济增长还是可以指望的；绝不能设想一种不顾科学和技术进步而瓦解经济的激进变革。还是回忆一下吧，集体富裕并不足以消除舆论认为的太过分的不平等现象。但是，害红眼病的人——他们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说别人的收入增加得比他的快，尽管他自己的收入也增加了，可是他的满意度却反而降低了。若用这种现象来代替人类追求最大限度满足的理想模式，那就越发叫人齿冷了。

我不仅谈到 1970 年代的危机——正常但太过突然的石油价格上涨，慢性通货膨胀，国际货币体系瓦解——还谈到了罗马俱乐部的论点。在我看来，俱乐部的第一个报告是伪科学的杰作，是用数字粉饰灾难性太平盛世的典型。1974 ~ 1975 年

对 2000 年的大恐惧，反衬了 1960 年代的大希望。我尽力就环境污染、自然资源枯竭、人口等突然提出的问题，为西方人提供了一些合理的、适当的答案。

有关人口总数和人口在各个大陆和国家分布的情况所引起的争论还是次要的。而人口数量和食品问题的前景却使人不安。如果把人类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发达的、富裕的西方社会就成了吃人的社会，欧洲和美国公民消费的卡路里相当高，而这些卡路里正是东南亚的人们所缺少的。我即使被人骂作无耻之徒，也不同意这种指责。

854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几百万儿童仍死于饥饿。在这些地区，由于缺乏卫生设备和生活条件，几百万儿童和青年在 10 岁或 20 岁之前就早逝了。用行话来说，这种人口状况就是欧洲过去几个世纪的人口状况。我祖父费迪南有两个孩子不满 5 周岁就夭折了。美国的农场主和欧洲的农民，不会响应基督徒或慈善家的号召而改变他们的经营方式，去为第三世界生产更多的卡路里。在我看来，这样改变西方农业是不合理的，甚至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保证最贫困者最低限度的口粮从数量上讲已经够了。但这些粮食要付钱、要运输；从人类整体来讲，当地生活条件对居民的影响远远超过食品的绝对短缺。总之，如果要指出罪魁祸首，那么为什么忘记苏联式政权由于渎职旷职或教条主义而使其农民劳而无获呢？如果这些农民享有西方农民那样的自由，他们也会保证俄国人、波兰人和东德人有一切必要的食品，甚至更多。

我所要揭露的，是人们笼统地谈问题，谈人口或粮食问题。营养学家们对我们说，西方人吃得太多了，方式不好；阿尔及利亚沿海或孟加拉的忍饥挨饿的儿童则奄奄一息；临近

2000年，将有70多亿张嘴要吃饭。因此，必须降低出生率。在上帝眼里，人人平等。从体魄或智慧的潜力来讲，人与人是不平等的。降低西方的出生率，对反对人口过多的斗争无济于事，相反，会加剧危机。欧洲和美国的人口下降，不会增加非洲或南亚饥饿人口的食品，反而可能减少高效率生产者的数目，很可能使富裕的人民停滞不前，而他们又是科学和技术的创新者和开路先锋。目前只有这些精英——也许事出偶然——才能带动全人类发展并减少贫困群众的疾苦。

我曾希望从中得到有关方法和思考方式。在什么情况下，有必要包括整个人类？在什么情况下，应该分别研究各国或国家集团？涉及人口问题，那是不言自明的。借口要养活那些行将饿死的人，就期望减少吃得太多（或方式不好）的人的数量，这只能表明一切良知都不会原谅的愚昧无知。涉及不发达或第三世界的研究时，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不加区别地把历史上最古老的文明、中华帝国和非洲部落的人口都算进去，怎么能够理智地谈论第三世界呢？怎么可能设想一种适用于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发展理论呢？对外援助怎样才能有效呢？在初期发展阶段必须实行计划化，这种传统思想经过实践验证了吗？工业化国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助第三世界发展呢？

最近的经验教训使人得出一种历史观念。思维的社会学方式倾向于区别不同的发展程度和社会类型。要认识当前的形势，就必须把这种形势放到一定的时段内去考察，必须认清欧洲发展和退缩这种双重运动暂时的结局。中国本身借鉴的正是欧洲文明，至少从它的意识形态上讲是如此。因此，即使在目前，历史的主要症结仍然是在自由的工业社会与专制的工业社会二者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正如大家所说，南北对立不会代替东

西方的对立。至于我们文明的精华，摊牌还将在欧洲。欧洲的两个部分，最终是一方说服另一方，还是一方统治另一方？

由于存在这些疑问，我写了《为衰落的欧洲辩护》一书。

《大分裂》与《为衰落的欧洲辩护》两本书相隔 30 年。前者是为了说明我感到的一种需要，即从我看到的大体情况分析世界形势，为的是描画出我在《费加罗报》发表的文章都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辩护》一书则出于偏爱或偶然。
856 我同罗贝尔·拉封出版社签订了写一本普及读物的合同，该书旨在指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即自由经济相对于中央集权官僚制的计划经济的优越性，西欧相对于东欧的优越性。我一心幻想可以与我的朋友们合作写这本书。而实际上，几乎只靠我一个人来写；让-克洛德·加桑诺瓦确实曾帮我做了些校订工作，用一些统计数字为有关苏联经济的章节加了一些图解。

半个世纪以前我改学社会学，一开始我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我甚至设想过要用一种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马克思在知识和政治方面的传世事业。我本来想以社会经济为背景说明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首先说明社会民主主义，同时指出，恩格斯和考茨基对马克思的思想的阐释对社会民主党人的行为产生了什么影响。但是，读了有关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 1914 年以前的著作后，我大失所望，很快打消了这个念头。勒兹莱克·科拉科夫斯基 (Lezlek Kolakowski)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完成了这个计划，但他采取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方法，即写思想史的方法。

1977 年使我感到惊异并且在《辩护》一书的第一部分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西方多少带点儿马克思

主义色彩的左派间的对话。萨特在他同共产党断绝来往以后还一再讲，马克思主义依然是当代不可逾越的哲学。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揶揄他为西方的思想大师，并且回答他说：“马克思主义业已声誉扫地，只成为人们嘲弄的对象；在我国，没有一个认真的人，没有一个小学生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不觉得好笑。”这正是本书第一部分要回答的问题：谁说得对呢？是流亡的俄国人，还是西方的，法国或意大利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双方会做出截然相反的判断，而且都那么自信呢？这种理论或这一整套思想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刽子手和死囚，或轮番或同声援引这种理论呢？为什么在被判死刑的法庭上的布哈林（Boukharine），狡诈地躲在阴影里的斯大林，宣传自由的哲学家萨特，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的卫道士苏斯洛夫（Souslou），都轮番或同时援引这种理论呢？持不同政见者针对西方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论据：他们说，我们，我们了如指掌，因为我们亲眼见到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实践的，见到马克思主义是如何受到检验的。你们在西方，你们只能就马克思的思想、他的言辞和梦想进行思辨，而经验已经向我们昭示了你们老不肯相信的东西。

857

西方人能够据理反对的是什么呢？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和西方起着截然不同的作用。在那边，马克思主义可以为当局辩护，在这里，可用来批评当局。一部分人抨击这个理论，因为它给人用作借口来压迫他们；另一部分人又采用同一理论的某些成分，因为这个理论对他们来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最好的揭露。同样一个理论，既可为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张目，同时又是攻击最有效益的经济和最自由的社会武器。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对其后世的命运至少应负一部分责任吧？

当时的青年哲学家们，从斯大林追溯到列宁，从列宁追溯到马克思，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追溯到马克思主义，有时是为了清算，有时却是为了谴责社会主义的“思想大师”。我不想深入讨论遗教被拐骗的问题，而只想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因素。我说，马克思的责任在于，他把两个方面糅合在一起：一方面是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和谴责；另一方面是他对社会主义的预见与乌托邦的想象。他的分析手段——剩余价值、剥削——如今可以不加区别地运用于已知的各种制度，不管是私人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任何企业、个人收入或官僚阶层，都剥削剩余价值。

他的预言业已被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所谓社会主义政权的实践所否定，同当初一样空洞无物，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怎样变成领导阶级？为什么集体所有制会突然表现出具有空前无比的效率呢？有什么高招儿能使专断的、集权的计划转化为宽恕个人自由的、民主的制度呢？除了官僚主义的计划化，有什么机制能代替商品形式或市场呢？当马克思宣称他的预言是科学预言时，神话就开始了。

858 让我们用比较抽象的概念来说明这些看法吧。正如《资本论》的副题所标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同对政治经济学本身的批判叠合在一起的。《资本论》的小标题已经暗示出了这一点。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谴责利润，因为利润不是钱的正当报酬，或者说不是短期用钱的正当报酬，而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马克思把我们说的市场叫作“商品形式”，因此主张取消市场。共产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按劳取酬，是不是由市场来估计每一个人在总的生产中所做出的贡献呢？如果不由市场来尽这一职能，那么由谁呢？除非由

社会集体自己来担任这个职责，但其专横独断将远胜市场，你说是不是？

该书的第二部分比较了欧洲两个部分的经济，分析了苏联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模式，分析它的低下效率。我讨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老漂浮在苏联模式与各式各样的社会民主主义之间，又分析西方帝国主义作为帝国主义所提供的理论和词汇，因为这是核心，是世界经济的策源地，是它向第三世界购买一部分原料予以加工制造。不这样，它就会一下子瘫痪。

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面，国与国互相依存，很有偏颇。强者、富者，总占便宜。然而，如果把这样一种事实叫作“帝国主义”，把输出原料的国家所依靠的工业国家叫作“帝国主义”，那就势必用同一个词混同两码事：一 859 一是不可避免的依赖关系，二是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如果诸君喜欢的话，也可以说，美国海军陆战队出征法属圣多明戈）。宣传家故意利用这种模糊不清的观念，说苏联帝国不搞帝国主义，而欧洲国家连瑞士在内仍然是帝国主义，哪怕大家都搞了非殖民化。在这种动乱之中，人们竟然忘记了第三世界的命运仍然与大西洋体系而不是跟苏联集团结下了不解之缘。不发达国家的原料卖给欧洲、日本、北美洲，然后买那里的产品，并且从资本主义工业国那里获得它们大喊大叫要求给予的援助，几乎是全部的援助。可是从苏联那里，它们又得到些什么呢？无非是帝国主义的观念，对它们仰仗的人进行控诉，对什么也不给他们的人歌功颂德。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该书的第三部分，其中有一章分析世界经济的“新发牌”，不过讲得有点过于乐观。另外一章检阅了西欧三个国家——英、意、法各自特有的经济恐慌。第三章则触及最根本的东西，即那个统领、指导、照亮了全书的问题：富饶、辉煌、富有创造力的西欧，是否就在这时候不可抗拒地走下坡路呢？在内部发生了一次解体，外部遭到一个扩张到德意志旧帝国版图中心的军事帝国的连续打击下，西欧是否要衰亡呢？

书名《为衰落的欧洲辩护》让出版家罗伯特·拉封大为惊讶，这书名没有满足他的口味，只是在浸透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或广而言之，浸透了进步主义的时代，才引发了一种奇怪的动静。这位典型的左派人士自19世纪以来从未背弃伟大的祖先，可以说出于本能地拒绝假设在历史的进程与善良人的向往之间存在矛盾。

从20世纪初，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就在发问：生产资料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制度？马克斯·韦伯没有提出计划经济的种种问题，但是熊彼得却屡次提出，并且企图设想一种合理的计划，该计划既顾到物价，也顾到自由市场和消费品。任何计划经济的模式，都不包括收入平等或者公民的自由，不将二者作为“必然的结果”。换言之，在意识形态中，非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与人道社会主义的各项价值脱离了关系。

我在一篇题为《试论没落，法国一个世纪以来的自我批评》^①的文章中对两个方面做了比较：一方面是1870年法国战败前后的意识状态；另一方面则是1957年的全国性讨论，

^① 参见《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1957)。

讨论非殖民化的最后几年。普雷沃斯 - 帕拉多尔 (Prévost - Poradol) 写的《新法兰西》，勒南研究近代史的著作，都在提醒我们，那些想要摆脱偏见的人往往在思想上犯了局部失明症。

萨多瓦战役^①刚刚结束，普雷沃斯 - 帕拉多尔便预感到要打仗，而且要打败仗。他观察到法国的人口增长率比德、俄、英等国都低。而在文化发展程度相等的国家之间，必然以数量决胜负。他不相信日耳曼人会长期优胜，他们哪怕在欧洲成了霸主，仍然会撞上俄国人和英美人结成的联盟，这就使他们没法左右世界政治。他对于德国日后的悲剧，确有远见。因为德国占据欧洲的首位来得太晚，它的梦想过了一个世纪便变成了一场噩梦。法国把阿尔及利亚搞成殖民地，取得了空间和人口数量。后来缺了这些，法国便沦为平庸而无足轻重的国家。“原住民”虽然被撵走了，但没有被灭种，只是把地盘让给了殖民者。

欧内斯特·勒南天真地为殖民化辩护，今天看来他的辩护会显得有点无赖。他说：

大体上，殖民化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需要。一个国家不搞殖民化，就非搞社会主义不可。那就是富人跟穷人打仗，高级种族征服低级种族，然后住下来治理他们，这都毫无让人看不过去的地方。英国在印度搞这样的殖民化，对印度大有好处，对整个人类有好处，对本国也有好处……同种之间的征战该受谴责，而高级种族改造劣种和

^① 萨多瓦战役发生在 1860 年代，其时普鲁士战胜了奥地利。——译者注

杂种则是合乎天理人情的。在我国，百姓几乎都是降尊的贵族，下手特重，使刀剑比使卑劣工具合适得多。与其做工，不如打仗，也就是说，回到早期状态。我们的天赋就是“开辟帝国”……天造地设的工人，乃是巧手如神的中国人种，他们几乎没有一点儿气节。公公平平地统治他们，替他们那样的一个政府重重地抽他们税，让征服者从中获利，中国人肯定满意。种地的种族是黑人。对他们施仁政，一切都会井井有条。只有欧洲种族才是战士和当主子的种族。强迫这样的种族，像黑人和中国人那样到土地上去劳苦，这个种族就会造反……

《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上的文章发表了20年以后，1975~1976年，我又在法兰西学院开了整整一门课讲西方的衰落。这一讲不值得出版，加过工也不值得出版，但是我在《辩护》中不时引用这篇讲义。在讲义里，我尽力想明确在具备哪些必要条件的前提下才能客观地使用“衰落”这个概念。雅克·夏尔多从《巴尔贝齐厄村民的幸福》一书中看出了人生的妙处。这部书是传世杰作。在他的心目中，我们的时代也许出现了永远堕落的兆头。汗牛充栋的书籍，经由潦草轻率、不学无术的出版商得以匆忙出版，以飧不解阳春白雪的读者，这些书坐视我们的社会日见愚昧粗俗，不管国民收入怎样蒸蒸日上。

史学家根据另外一些价值观，认为古罗马帝国不如古罗马共和国，不如古罗马共和国时代那样讲究气节，这是一种没落。斯宾格勒把“文明”本身看作没落，城市膨胀，重商主义，功利主义哲学，信仰衰竭，等等，这些都是衰落的表

现，都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末日。文明像一切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注定要趋向成熟和老化。我不想讨论斯宾格勒的论点，因为这些论点没法讨论，它们事前就拒绝了讨论。我只举些例子：神光四射的直感，扣人心弦的比喻，不是叫人受到教益，就是叫人生气。不管怎样去评价斯宾格勒，反正他的主要作品基本上都是在1914年以前写的。这里面已经预告大战将临，庞大的帝国将要出现，同时滋生批判思想、实证思想、唯物思想，还有神秘主义的反应，但它们都还在边缘阶段。 862

汤因比^①既没有斯宾格勒的天才，也没有他那种傲气和悍气，可以说他是受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与1914年大战渊源相同之观念的启发。这一观念如母亲十月怀胎孕育出11卷本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大谈特谈古罗马帝国的衰亡。其独到之处在于扩大传统的思考，潜心思索一切文明的命运。汤因比也想窥测未来，各种文明的未来，同时留给各种文明一些掌握命运的自由。他创造并传播了好些概念，这些概念现在都通俗化了，例如，崩溃与断裂，乱世，好战国家，内部或外部的无产阶级，世界帝国，世界宗教等。如果大家同意这种类型同，那么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和1914年开始的欧洲瓦解都将说明，两次大战都闹得天下大乱。

尽管我不肯忘记这些广阔的远景，但在授课时，特别是在《辩护》一书中，我仅仅探究了地位下降与没落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地位下降意味着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实力减弱，或

① 汤因比所说的“文明”，就是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后者把一切“文化”远景到来前的一个阶段叫作“文明”。

863 者说，一个集体对人类的伟大事业的贡献减少，不得不严格限制自己的能量。法国在 19 世纪国力下降，那是由于它与别国比起来出生率相对下降。英国在 1860 年也是这样。作为帝国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世界工业中心，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是没法保持的，因为这种地位自身就会堕落，倒不是说帝国都会逐渐腐败，而是其称霸的秘诀让人学了去。再如美国在 1945 年享有的经济、金融和军事优势，也是没法保持的。那时候，世界市场上的逐鹿者还没有从战火余烬中走出来；在国与国的体系中，敌手还没有把自己的力量派出欧洲旧大陆。就上述两个事例来说，到底是下降，还是没落？没落是什么意思？马基雅维利会回答说：活力凋零，或者历史性的生气衰竭。这种概念当然不易说清，但可以让社会学家去明确、去丰富。

我在讲义里做了尝试，仅就 1870 年的战败批评了对有关法国没落的曲解。我引用了一些精彩绝句，譬如，“法国遭到了大革命的报应”（勒南语）。不错，从 1789 年以后，法国便没有一个君主、一套制度，来保障国运并被人民群众确认为正统。君主也罢，制度也罢，没有一个能经得住出事故，更经不住打一场败仗。然而，法国人走在其他欧洲人前面是由于节育，与国民内讧并不相干。直到 1914 年，法国才差一点儿被德国人的数量优势压垮，而并非在 1870 年。1870 年，帝国军队在几个星期内被摧毁了，因为士兵比德国的少一些^①，炮队较弱，高级指挥部也不高明。那么，为什么法国的军事机器会败落至此呢？今天的史学家至少为答案提供了一些材料：军队中的军官招募，“知识分子”被歧视，这些都存在问题；念念

① 原因在于体制结构，并不是因为普鲁士和法兰西人口上的差距。

不忘拿破仑打过的胜仗滋生了虚骄之气；还有征兵制和建立国民军都脱离了革命的或帝国的实际情况。1870年跟1940年一样，法国在战场上吃败仗，首先是由于军事上的错误和弱点。像E. 勒南那样怪罪法国人民武德衰退，乃是信口雌黄。他在别处看得比较清楚，点得比较中肯：到了我们的时代，战争已经成了科学上的事情。征服阿尔及利亚的将领们，如麦克马洪元帅，他们是意想不到这一点的。

一次失败的军事原因本身并不足以说明问题，这些原因要求观察家把眼界放得更宽一些。为什么军事思想在18世纪的后1/3世纪有所发展，19世纪有所衰落，而到了1870年以后又有所复兴呢？为什么法国的科学到19世纪的前1/3世纪以后会衰退呢？为什么在整个19世纪没有建立名副其实的大学呢？那些名牌大学、法学院或医学院拥有很高的教学质量，但过分注重实践。对这些疑问进行社会学分析可以提供某些答案；把这些答案综合起来会使人得到半文学语言的说法，或者让人概括出这样一句话：一个集体显得无力应战，或没有能力去改造已不适应20世纪新情况的制度。人数减少造成实力下降，但并不注定会带来1870年的灾难；在我看来，国家的科学和军事衰落也不能归咎于人口减少。

864

1918年以后，尽管法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对衰落的焦虑仍然不断地折磨着法国人的心灵，至少其中有远见的人是这样的。战后，表面上还冠冕堂皇，到了1930年代，门面已剥落、裂缝也渐渐塌落成尘。这是因为经济未能摆脱危机。法国人互相掣肘，不少活跃分子照搬莫斯科、柏林或罗马等外国模式。从1933年或1934年开始，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国际联盟已毫无意义。1930年代的衰落是我们亲身经历的，我们看到了

它的明显特点是，由于缺乏内部团结，集体无力对付外来威胁。领导阶级既不了解世界危机，也不能控制这个危机。领导阶级消极地容忍希特勒扶摇直上，进行侵略和战争。法国人缺乏马基雅维利式的活力，这种活力是伟大帝国的基石，没有它，国家就会衰亡。

在1981年10月法国电视二台的三套节目的第一套节目中，我讲述了1930年代的“衰落”。我收到费尔米热(A. Fermigier)一封妙不可言的信。他也提到1930年代，但他对这个年代保留着光华耀眼的回忆。他写道：

在另一点上，我听到您的讲话时有点惊奇：当您讲到战前那些年，国事衰落的念头始终萦绕在您脑际。也可能是因为我年幼无知，我对这个年代保留着美好的回忆。我经常念叨，如果不了解1940年以前的法国，就不懂得什么叫生活的乐趣！那时，人们以礼相待，生活费用便宜（我可不是主教的儿子），遍地生辉，文明成风。当然，悲剧正在于此，人们对此没有多大办法，但也存在对幸福的企望，存在现实的幸福，显然正因如此，法国人才不愿意打仗（当时德国人则没有多少东西怕丢失）。我还没有谈战前巴黎经常举办的文化节给我留下的印象，例如勒努瓦(Rehoir)、儒韦(Jouvet)、《新法兰西评论》、雅克·鲁歇(Jacques Rouché)的歌剧、法国电影（呵！今非昔比！）、雷里斯、纪德、蒙太朗（是的！），还有后来叫我感到恼火的人，现在我们能举出类似的群英会吗？就拿1937年的博览会来说，尽管有人冷嘲热讽，却是有许多美妙的建筑设计超过了1930年来在法国（以及在欧洲）

已完成的建筑物。在国家图书馆参观马丁·杜加尔的作品展览时，我联想到，他晚年的那个时期就是您的年代。再说一遍，我看到了当时的悲剧，但不知道衰落何在？

费尔米热提醒我说，衰落的概念含混不清。他这话说得有道理。他提到“幸福的现实”时，忘记了1933~1936年工人的境遇是多么艰难。1936年的一时欢快之后他们又跌进苦海。罢工、社会局势紧张，哪有幸福可言？文化又有什么两样？战后“青春焕发”的法国似乎无法同1930年代“衰落的”法国相比拟。是的，我们知道，小说、绘画、思想和艺术作品不会由于被军事胜利的阳光一照就大放异彩，当然也不会由于失败的阴影而变得惨淡苍白。19世纪的法国绘画经历了各种制度，可能是受各种丰功伟绩或痛苦磨难的影响，始终富于创造精神和夺目的光华。那些衰落论者往往倾向于把国家的命运和文化的命运混为一谈。今天，唯一称得上帝王民族的只有大俄罗斯民族，但它确实没经历过伯里克利时代。也许儒韦时代的巴黎比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时代的巴黎更绚丽（这一点我仍然不敢肯定）。非形象艺术派绘画也可能要凋落了，没有人为今天的建筑艺术辩护。然而，1930年代的法国不了解外部世界。有多少书能告诉法国它在世界中所处的地位，它的经济已经衰落，甚至它的大学和科学（除了几个名人）也落后了？1930年代的报刊，无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都极端贫乏。

1945年以后，法国人尽管发生了殖民战争，尽管失去了 866
法兰西帝国，但表现出了一种与战前年代全然不同的活力。付出太大的代价换来了胜利，举国陶醉而好景不长，苦难却是更

好的启蒙老师。诚然，我国也加入了欧洲繁荣的“奇迹”行列，但没有在“光辉的30年”中名列前茅。30年前一个瑞士历史学家出版了《与教堂钟声合拍》一书，内容涉及一个消失了的法国。出版这本书就带有讽刺意味。好歹我们跟上了我们的时代，有了各种工业，城市四通八达，农民行将消失，信息工业得以出现。数学压缩人文科学。1980年代的法国人，包括青年人和高级官员，曾在美国大学里交往。记者对世界也不再陌生。“法国钟表走法不同。”^①

在1975~1976年的课程中，我试图分析英国的下降，尽力把三个有关的弊端都考虑进去。这三个弊端虽然笼统，但很明显：对成就居功自傲、躺在遗产上睡大觉和裹足不前。当然，这些弊端无法严格区分，但是，其中任何一种弊端造成的后果都是显而易见的。要取消一个曾经有过光辉时刻的工业部门（如造船）是痛苦的。功成名就的企业家就喜欢贵族的生活方式，而不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去顽强地争夺市场。曾经把本国推向顶峰的统治阶级，没有及时发现衰落的早期征兆。

在《辩护》中，我只考察了英国地位下降的最后阶段。在19世纪后25年，德国在高速发展的工业部门——化学、电力方面占领先地位。英国在两次大战之间，其1919~1931年的经济管理，其1933~1939年面对希特勒灾祸的外交，都显示出英国的盲目与软弱。1945年以后，英国人进行的非殖民化活动，从英伦海峡的对岸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但是，经济增长率比欧洲大陆的主要国家低一半，于是英国的地位同它的传

^① 瑞士历史学家H. 鲁蒂 (H. Lüthy) 写的一本书，法文书名为《法国与自己的教堂钟声合拍》，德文原名为 *Frankreichs Uhren gehen anders*，意思是法国钟表走法不同。

统伙伴和敌手相比下降了。

下降或（和）衰落？增长率不足以衡量一个集体的长处。生活质量、人与人的关系，不受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影响，而是恰恰相反。这样说，并不等于留恋盛产美酒的巴尔贝齐厄村或楼荫下的乡村，便可以诅咒我们这个钢铁和电脑时代。在当代，经济成就如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民族“潜力”及其共同行动能力的最可靠的指标之一。如果明天英国按人口来算的产值低于西班牙，那么我们一脚踏上英伦三岛就感受到的灿烂文明的魅力，今后还能经受住阶级争吵和不幸的人移民国外吗？

书名起得古怪，这本书为衰落辩护，其实是把两个欧洲做一番对比。如果用苏联世界的效率同西方的自由对比，情况就类似世界通史的民间图画：自由欧洲代表雅典，马克思主义的欧洲则代表斯巴达（或者前者代表希腊，后者代表罗马）。但是，劳动生产率却站在自由的一边。另一边自称追求极丰富的意识形态，可是人民却仅能糊口。苏维埃欧洲只是在军火方面略胜一筹；或许应该说得更明确一些，它在军火储备方面，在防务开支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极高方面，确实无与伦比。因此，书名和书的内容难以捉摸，便同欧洲的命运、西方的命运之难以捉摸不谋而合了。

尽管西欧不同国家继续以不同的方式生活着，但我认为把这些国家看作一个整体、作为一个分析对象是合理的。马塞尔·莫斯认为这种近亲渊源决定了一种文明，六国或十国共同体的各国毫无疑问都自行维持这种文化上的渊源关系。各国之间，种族上的差别、家庭形式上的差别依然存在，但社会机制（工会）、经济机制（企业和国家的作用）、政治机制（政党和代议制）大同小异，当然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殊的传统。

欧洲这个整体——今天已被苏联帝国分割了——曾经是西方文化的发源地，是向世界传播西方文化的原动力。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先后建立的海上帝国已成为过去。落潮比涨潮快得多。在东部，罗曼诺夫帝国变成了苏联，这在已经失去地盘的昔日征服者头上投下了阴影。在西部，欧洲人在南北美洲留下了类似古希腊城邦在地中海的殖民国家。美国得益于土地连成一片，南北两边都没有敌对的邻国，从而在这些殖民地中崛起并成了它们的杰出代表。夹在一个表面上西方化的军事帝国与一个已经成为宗主国和整个欧洲的继承者的殖民地之间，一些昔日的伟大民族至今对它们各自的特点比对它们的共同命运更为关心。这些民族组成的整体经过“光辉的30年”之后正处于一个艰难阶段，由于能源和原料均依靠海上运输，而如今制海权已不再属于它们，因此没有能力自卫。

欧洲这个整体在世界市场上又重新找到了它的地位，但在国际关系方面则不行。尽管签订了《罗马条约》，尽管在经济合作或外交磋商方面有所发展，但欧洲国家并没有试图共同扩大一个国家的首要使命——国防。民族的欧洲取得成功，也许就是依靠国家的多样性，它急转直下地衰落，肯定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欧洲可能再也无力恢复其在历史上的全盛地位了。当我在讲课或撰写《辩护》时想到衰落问题，我对欧洲的历史抉择是这样看的：要么并入由美国控制的帝国范畴，要么即使不被吞并也要受苏联军事帝国的奴役。

从1945年到1975年，由于一些不可阻挡的力量，美国的地位下降了。经济优势、核垄断难以为继。欧洲经济复兴，这是华盛顿的领导人所期望或支持的。日本崛起也是如此。美国的外交是希望日本在国际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美国的外交政

策原先旨在阻止莫斯科的政治寡头们聚积军火并操纵其支持者或恐怖分子网。从1975年起我就看到美帝国面临解体的威胁，汤因比可能把这种帝国视作世界帝国。 869

对美国也好，对欧洲国家也好，衰落问题都是同“集体行动的能力”，也就是同经济的、政治的结构与实践有关的。我没有下什么断言，只指出现在大家所说的英国病的一些症候，但西方民主国家或多或少也染上了这种病症：院外集团、压力集团和工会的势力过大；能够把集体凝聚在一起的思想或见解被削弱了，被视为美国成功之秘诀的劳动道德观被削弱了；逐步变成繁文缛节的法制过多；大学和学者偏爱基础研究，对于可以转化为贸易王牌的发明则兴趣较小。总而言之，美利坚共和国的奠基人并不关心如何使共和国拥有搞世界外交的手段；随着对苏联的军事优势日益缩小，对竞争性伙伴的经济优势也日益缩小，美国再也不能保证帝国成员的安全了。曾经领导过战后政治的东海岸领导阶级，由于越南战争而分裂并自我毁灭。美国的中心正在向西部转移，离旧大陆越来越远。

在课程结尾时，我对人类历史的两个全景式观点做了比较——这两种观点对局势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判断。一种观点认为，两个世纪以前，在英国已经发生了新石器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最根本的变革，现在我们进入了工业时代的第三个世纪。人类的其余部分——可能快慢不一，可能苦乐不一——先后进入这个世纪。美国还处于领先地位，但它很可能像一个世纪以前的英国那样失去先锋作用。仗——人们在两个世纪以来做的事——仍然要打下去。再过一两个世纪，人们可能停止走这条路，而去探索生活的另一种意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欧洲处在一个军事意识掌权的帝 870

国阴影的笼罩之下，过着一种不稳定的生活，既没有意志，也没有战略。西方的美国同它的欧洲老根越离越远，失去了能够使不同种族的居民团结起来的一些信念。最近的将来，不是什么大西洋文明，而是欧洲将在一个帝国权力的控制下重新统一，这种统一将破坏欧洲的文化和向往。

老实说，这两种观点并不是直接对立的，一个是从人类历史的前景来纵观各个大陆和许多世纪，另一个则只着眼于人类的一部分和几十年的光景。赫尔曼·卡恩式的乐观主义不能避免若干民族的被消灭或专制主义的散布。对西方文明的未来抱悲观态度，也不能阻止科学—技术的继续发展。我使用“下降”这个概念，完全是从相对意义来讲的。即使目前用于英国的这个“衰落”概念，也是指一个民族没有能力振作起来或无力改变其机构或习惯。但是，今天，中等水平的英国人生活得比帝国全盛时期还要好。美国帝国的解体，只不过稍微有点像罗马帝国的崩溃。西方的美国脱离了欧洲，绝不会堕入野蛮时代。而西欧脱离美国，则将陷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俄国囹圄。还需多长时间呢？采取什么形式呢？工业社会或科学社会，是否会滑向或注定沦为苏维埃主义呢？在这些社会中，美好的信仰，甚至礼让的传统，都会丧失殆尽吗？

由于草率地签了写书合同，《辩护》是一本应时之作，没有更深地探讨我已经研究过的课题。因此，我爽快地甚至由衷地接受大致如下的批评：“这一切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这一切他已经解释过了”^①。

① 我要补充说明，在法国或其他国家，这本书整体上是受欢迎的。《相遇》(Encounter) 杂志刊登了本书的内容简介，这则简介给亨利·基辛格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个素不相识的挪威青年教授里查·森丁^①细心地阅读了有关本书的报刊资料，做了如下摘录：

871

那么多欧洲人陷入盲目……求助于马克思主义是怎么来的呢？……是否有那么强烈的需要，要相信未来，相信现实以外的未来，渴望未卜先知呢？（马克斯·加罗登在《快报》周刊上的简介）这部《辩护》忘记了向读者评审会提供相信欧洲文明前景的理由。（阿兰·若阿内斯：《洛林共和国报》）归根结底，无能就是缺乏信心……自由本身不是目的，只有与伟大的目标相联系才有意义，但这个目标，我们还没有发现或已经把它忘却了。（埃蒂安·博尔纳：《萨瓦省共和国报》）至于第三部分，这里可悲地缺乏形而上学的广度，甚至应该说，缺乏信仰的广度。（马塞尔·克莱蒙：《新人报》）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弊病”与我们的“小小困难”之间进行比较，能找出真正的生活准则吗？在这一点上，雷蒙·阿隆几乎没有进行什么辩论，仿佛他身上的经济学家一点一点啃掉了哲学家。（吉尔贝·孔德：《世界报》）还有一点使人困惑不解，就是在“优等”制度内部也没有希望。人的眼里难道只有增长、繁荣和钱吗？总之，只会看到“生活水平”吗？（尽管极不平等）（伊夫·弗罗勒内：《外交世界月刊》）这本书仍然是一个“经济人”的作品。（让-马丽·博努瓦：《文学新人》）

① Richard Sinding, *Qu'est-ce-qu'une crise?*, PUF, 1981. 作者自己不愿承担对西方进行指责的责任。完全相反，他认为西方哲学本质上是批判的、创造性的。

这些报刊资料不仅使那个挪威哲学家吃惊，也使我感到诧异。这些评论有的带有敌意，有的是友好的，它们是怪罪这本书，怪罪作者，还是怪罪我要弄清楚的现实呢？弄清现实也不过是想预测未来。

多数评论指责我作为“经济人”来写书，指责资本主义社会唯利是图。这真是一个富有讽刺意味的批评。25年以前，同样一些人曾指责西方没有能力同“苏联社会主义”和计划化的经济竞争。如今，就经济增长率的竞赛结果而言，西方人占了上风，他们又认为这种竞赛无足轻重，把它撇在一边。那个伟大的卫道士让-保罗·萨特，始终坚贞不屈，他是如何大声疾呼，揭露法国老板们的马尔萨斯主义呀！吉尔贝·孔德于1977年在《世界报》上把《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形容为“无法忘却的”，莫里斯·迪韦尔热则于1955年在同一份报纸上对它大肆诋毁。让·普荣在《现代》杂志上反驳这本书说，工人依靠经济进步和工会自由获得“真正的解放”在法国是不可能的，因为财富拥有者考虑到他们的实力地位和声望，将拒绝经济发展。我昔日的乐观主义，当时曾被人嘲笑，现在又理所当然地被看作老生常谈，这是人所共知的，并且有数字为证。伊夫·弗罗勒内问我：以后怎么样呢？算了吧！谁也没看见增长率。然而，工人——知识分子自称是他们的代言人——并不轻视任何微小的增长，这些增长也会对他们有好处。

另外一些深熟世事的作家走得更远，甚至从原则上谴责西方现代社会、重商主义、抽象理性主义。什么都要算一算，一切都要付钱。他们故意把西方社会的这些特点都算在美国头上；他们闭口不谈经济，这有时会使他们成为“文学白痴”。

博努瓦不惜称颂协和式飞机的伟大，把它比作“圣吉米那诺的贵族修筑的城堡，这些城堡一座比一座高”。爱欣赏贵族们可以大肆挥霍（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而不爱看到负责管理的人不得不精打细算，他们的计算能力不太行，把技术成果同交易成功混在一起。协和式飞机靠纳税人的税款才能飞行，否则就飞不起来。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

即使这些评论家口头上同意我讲的“西欧在经济上比苏联强”，他们也要贬低这种成就，情不自禁地强调西欧的局限性。吉尔贝·孔德怀疑对两个欧洲进行比较能够找出“一条生活准则”。但是，指望从一次历史分析中就得出一条生活准则，不是愚蠢到极点了吗？在所有这些评论中，读者都是采取这种或那种方式，指责西方对自己的前途失去了信心，指责本书作者没有给西方带来信心或伟大的目标。

《为衰落的欧洲辩护》这本书的书名，恰好就点出了这些评论家似乎不可一世地发现的事实：欧洲尽管工业效率高、富裕、自由，但自我怀疑，这种怀疑有一半是受了它的敌手苏联人的迷惑和吸引。这些对话者是否希望我也来提一提上帝是如何殉难的呢？继汤因比之后，让我再来传布基督精神或天主教义的复活吗？让他们去找我的朋友安德烈·弗罗萨尔吧，他已经见到了上帝。也许，除了这些社会经济现象，西方文明也深深为众人（或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衰落而痛心。假设情况是这样，那么哪一个分析家敢自诩能够平息同代人的极度渴望，或者更谦虚一点，自认为有权扮演预言家呢？

873

埃蒂安·博尔纳在一篇还算友好的文章中申明：“自由本身不是目的，只有联系伟大的目标才有意义，但这个目标，我

们还没有发现或我们已经忘却了。”托克维尔也曾写过：“谁要从自由之中寻求自由以外的东西，谁就只配侍候人。”自由社会有时完成了一些伟大的目标，但它事先并没有想到这些目标。允许人们有权选择自己的官员，让他们享有个人自主权，同时也就有助于政治的和精神的多元化。自由社会本身就是一张王牌，我竭尽全力帮助自由社会打赢这个赌。我不认为形而上学比政治思考对自由社会的帮助更大。

读者对这本过长或过短的《辩护》的结尾部分可能感到不满足，我乐于承认这一点。从某一方面来讲，我的本意就是要读者不满足。有两种历史哲学（或历史观点）同时启迪了我的思考，尽管这两种哲学是互相矛盾的。一方面，对民主和自由的信念，相信民主自由制度加上混合经济，可以成为当代最好的出路，或者换个说法，是最不坏的出路。另一方面，意识到这些制度同样可以引起一种连续不断的类似的内战，公民变成单纯的消费者，各种压力集团泛滥成灾，使国家瘫痪。无须接受斯宾格勒式的解释（按照这种说法，民主的有益的城市文化本身就标志着文化衰落的一个阶段），然而也应该问一问——帕累托和其他许多人过去也探讨过——自由的发展、信仰的多元化、个人享乐至上，会不会损害社会的协调和行动能力呢？

由于受到这两种哲学的双重启发，有时我很肯定，有时我又产生怀疑。至于怎样才能增加一些死里逃生的办法，我既不含糊其辞，也不会默不作声，尽管一个评论家显然无法掌握什么秘诀，使正在解体的社会凝聚在一起。对于欧洲的未来，我不做结论，也不自诩有先见之明，我只是提出问题。

第五部

※

死缓阶段
(1977 ~ 1982)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877

1977年5月，我离开了《费加罗报》。如果不是在这之前的一个月我突患心肌梗死，而这次患病永远地改变了我的生活，我是不会把这个事情看成“死缓阶段”的开端的。在我结束了法兰西学院“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这一课程的次日，也就是准备离开《费加罗报》的前一天，我由于即将奔赴新的工作岗位而过度兴奋，忘记了自己已入垂暮之年，突然间我觉得自己踱到了死亡线上。从那时起，死亡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成为每天都出现在眼前的东西。

我突然患病，立即被送到了科香医院急救中心。我虽然丧失了说话和写字的能力，可头脑却依然清醒（我希望是完全清醒的，可是我能有把握吗？），但我不能与人交谈。我用手示意要一张纸和一支笔，用左手十分困难地写下了3个单词：死亡（mourir）-不（pas）-可怕（peur）。值班实习医生是前巴黎政治学院院长J. 夏普撒尔的儿子，他微笑着对我说：“您的病情没有那么严重。”我是在演戏吗？我想不是。我在片刻之间变成了一个旁观者，一个无法支配自己身体和说话能力的旁观者。我的“我”、我的“自为”、我的“灵魂”在反抗着一切，似乎没有受到损伤（当然，这只是幻觉）。急救中心主任蒙萨利埃医生是让-克洛德·卡萨诺瓦的朋友，他当天晚上从乡间赶来，向我保证说我可以恢复说话能力，至少可以

大体上恢复。那天晚上，我听见三四名医生互相询问：我的面孔是否变形了？因为他们无法确诊我的脸究竟是向右歪还是向左歪；他们之间的谈话使我觉得很有趣，也使我不再担心了。那天晚上，我说出了几个字。蒙萨利埃医生后来告诉我说，我在半睡眠状态中说出的几个德文单词。次日清晨，我在短暂的时间里再次恢复了说话能力，似乎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但好景不长。恢复说话和写字的能力需要好几个星期，而恢复后的效果并不令我十分满意。

根据医生们的诊断，由于我的心跳过缓（每分钟 50 ~ 55 下）和心律不齐，在心房一侧形成了一个血栓。这次发病的起因不是脑动脉破裂，我虽然年事已高，血管却没有老化。为了调整心律不齐和防止形成新的血栓，我必须注意饮食起居。而说话的能力只能等它慢慢恢复，后遗症将是轻微的。

入院最初几天的情景使我终生难忘。科香医院的神经科大夫测验了我的说话能力。他把两样东西指给我看，一个是矿泉水瓶的盖子，另一个是瓶子的颈部。这是我终生都不会忘记的两个单词，但当时却一个也说不出。接着大夫又让我念“治外法权”（extraterritorialite）这个单词，我觉得这大概是法语中最难读的词了。尽管这次试验全部失败了，但是那个大夫还是乐观地对我说，我在来年就可以重返法兰西学院的讲台了。

每当我回想起患有失语症的那短暂的一天，以及后来丧失部分说话能力的漫长时光，我总要扪心自问，为什么这种病并不像自己过去想象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当我向朋友们叙述这一段经历时，他们的反应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简直太可怕了。”然而，坦率地讲，我的感受却并非如此。是出于俏皮？是出于麻木不仁？是出于自尊？还是因为有毅力？这几条恐怕都

站不住脚。我的“我”突然离开了我的肉体，它对此并不能泰然处之，而是好奇地问自己：它所支配的躯壳到底还能派上些什么用场？这里还要补充说明一下，从入院的第二天起，我便恢复了一半的说话能力，因此可以与他人进行最低限度的交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感到永远丧失部分说话功能比承受第一次打击还要痛苦。1977年，开学以后，我强迫自己接受考验，到电视台做即席演讲。但在我患病以前，我是绝对不会同意参加“人物讨论”这一电视节目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节目的时间总共为一个小时，偶尔也可能超过几分钟。节目的前20分钟为自我介绍，然后开始进行辩论。一般情况下还有两个检察官和两个律师参加。有时，检察官和律师也互相担任对方的角色。安娜·辛克莱尔认为我有足够的能力进行自我辩护，就把莫里斯·迪韦尔热、尼科斯·普兰查斯、菲利普·德·圣-罗伯特和阿尔·德·伯努瓦全部放在我的对立面。自我介绍部分是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师办公室录制的，它被压缩成了一种自我独白。节目的录制工作一个下午就完成了。贝尔纳·博尼洛里和安娜·辛克莱尔坐在我的旁边，他们本来应该向我提几个问题，但是因为时间不够，只好作罢。那天，我只关心我的形象，而不在乎谈话的内容，在这长达35分钟的独白过程中，我只在一个字上结巴了三四次。

879

同4个对话者进行的论战并没有给我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普兰查斯抓住一切机会表现他的反阿隆立场。这是一个左派人士在这种场合下必然要采取的立场，大概是为了得到同志们对他参加这次电视节目的谅解。菲利普·德·圣-罗伯特在几年前曾模仿莱昂·都德的文笔写过一篇骂我的文章，但是他的文笔还不够泼辣，缺乏都德的才气。把他的人格和作品相

比，我更厌恶前者，因为我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我所厌恶的法兰西行动派的影子。他还使我再次感到，这些民族主义者或反动派属于另一个我根本无法生存的世界。阿兰·德·伯努瓦扮演了他的角色，并没有过于咄咄逼人。莫里斯·迪韦尔热颇有礼貌的批评，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

在即席辩论中，我只有两次因为出“故障”而停了下来。由于“滑稽的”这个形容词怎么也说不出，我只好让步，改用“这是一种滑稽”的说法。^① 在我的亲密朋友当中，有些人是关心我的医生。他们很快就发现我在讲话时常常把音节颠倒，或者把甲词当成乙词用，一些较难的词也常常念错。这些都是最典型的后遗症。这次考验使我感到宽慰：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对我已不是禁区了。当然，在我通过教师资格考试之后，考试委员会的主席就曾提醒我注意控制讲话的速度，不要过快，免得有些学生听不懂。随着时间的流逝，我讲话的速度自然而然地放慢了。语言表达方面的才能从某些方面来看居然经受住了年龄与岁月的考验。总之，《工业社会十八讲》《社会学主要思潮》，甚至连《难觅的革命》一书都是我口授写成的。可是从今以后，这个曾经使我在百忙之中无须拟稿而只需在面前放些笔记或借助一个简短的提纲，就能不停地用法文、英文或德文讲课的才能，还剩下多少呢？

在 1977 ~ 1978 年这一学年中，我吃力地完成了在法兰西学院的教学任务。整个学年有 26 个学时，其中我用了一半的时间组织学生在课堂上讨论“社会正义”问题，用另一半的

① 这句话中，“滑稽的”法文是 *caricatural*，“这是一种滑稽”的法文是 *C'est une caricature*。此处，阿隆想不起这个词的形容词形式，而用名词形式代替。——编者注

时间讨论了“自由与平等”问题。这样的教学安排是我的第一次尝试。我坚持执行我的教学计划，但并非没有注意到在授课过程中，自己常常在某些单词上打磕巴。然而，这些单词并不一定是那些发音较难而令我在课前感到担心的词——这是畏难心理所带来的一种后果——有时一个十分普通的单词也会突然把我堵住。

我同意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去讲课，更确切地说，是给负责出版一本国际关系杂志的学生们开讲座。讲座主题是“工业社会与战争”，我用了我为纪念奥古斯特·孔德而做的演讲的题目。这个题目，早在20年前我就曾在同一个地下剧场里讲过。这一次我没敢冒险进行即席讲座。讲座由拉尔夫·达伦多夫主持，与会人数和20年前差不多，或许还略多一些。然而我这个讲演者已今非昔比，讲座的内容也增加了一个重新估价的部分，但仍比不上先前的讲稿。在英美听众面前，我没有脱离讲稿，更没有开什么即兴的玩笑。由于过分拘泥于讲稿，我等于用英文宣读了事先写好的论文了。更为不幸的是，讲座刚进行了几分钟，我的嗓子就开始嘶哑起来，结果给听众留下的印象是我为了避免失音而在拼命地控制自己。在患心肌梗死之前，我在法兰西学院就曾受过嗓子嘶哑的折磨。这次嗓子着了凉，我又大受其害。同年，即1978年秋季，我开设了解读阿拉斯泰尔·巴肯（Alastair Buchan）的讲座。这个讲座是为纪念战略研究所的创始人阿拉斯泰尔·巴肯而开设的。他曾是牛津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教授。就在这个战略研究所里，我用嘶哑的声音宣读了事先用法文拟好的讲稿。这是一次艰苦的考验，听众固然听得苦，而讲的人更苦。我在几个星期中为准备这两次讲座所花费的心血与我所得到的成果是根本不成比例的。

881 5年过去了，那次暂时的失语症至今还对我有些什么影响呢？基于很明显的原因，我无法做出客观公正的判断，因为我经常会夸大失语或口误的严重性。然而我有时又走向另一个极端，总相信自己在青年时代使亲朋好友们吃惊的口才，并没有因为我年龄的增长和身上到处都是血栓而下降。以下就是我做出的结论。

我需要得到公众的鼓励。我在家里出的差错要比在大庭广众下多。而内心的独白要比对话更容易对付。1977年以后又过了好几个月，由于栓塞的后遗症未能完全消失，我就去请教一个正音科医生。这是一名年轻、漂亮、有风度的女性，她让我读一篇难度较大、生僻字也比较多的课文 [大概是波斯科 (Bosco) 或者吉奥诺的文章]。连我自己都非常吃惊，我连续读了好几页，竟然没有出现任何“故障”。这次谈话持续了半个小时，其间我只出了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事故”。那个正音科医生劝我不必再去接受什么再教育。她对我说：“那些接受再教育训练的人甚至不指望能够达到你现在的水平。”也许我的这次成功表现使她产生了错觉，事实上是测验本身调动了我的功能。

我逐渐恢复了运用英文的能力，但是熟练程度显然是非常有限的。1981年，我在牛津大学开了一次讲座，题目是“麦卡勒姆” (Mac Callum)。当时我即席演讲，没有看一眼笔记。在前一年，我还以同样的方式在爱尔兰皇家科学院就苏联外交问题举行过一次即席讲演。我可以自豪地说，讲演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问题。然而，我也羞愧地回想起在谈到我在网球比赛中的名次时，我竟然未能精确地说出“4/6”和“2/6”。我当时说的是“4%”。安娜·辛克莱尔没有注意到这一点^①，因为

^① 在“人们不总是20岁”节目中。

她不懂记分的方式。

对我来说，损失最严重的要算是德语了。我很少有机会讲德语。由于缺乏练习，我在1977年以前就不大能够用这种语言做即席发言了。现在每当我回想起1965年我在图宾根用德语开设讲座时的情景就深感快慰。那次讲座是为纪念马克思·韦伯诞辰100周年而开设的。西德的社会学协会为了避免其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纠纷，把三个大规模的讲座委托给了三个外国人：塔尔科特·帕森斯、赫伯特·马尔库塞和我。塔尔科特·帕森斯曾在图宾根上过大学，因此懂德文。他说德语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发音却很正确。但是由于他没掌握句子的语调和重音，结果，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德国人，都听不懂他的发言。在一份会议记录中，《月报》将我的德文水平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加以对比。帕森斯用德文演讲是出于对主人的尊重。同样，听众为了表示敬意，虽然根本听不懂，也没有流露出不耐烦的情绪，他们在帕森斯的将近一个半小时的发言过程中始终保持了安静。

882

我认为放弃德文对我无关紧要，然而我又多次对这一损失感到懊悔。1974年，我被选为“科学与艺术勋章协会”的会员，当时我本应该用德语来答谢西德总理的欢迎辞。在该协会于1977年召开的年会上，我又应邀对其中的一名成员致辞，但到最后一刻，我不得不表示歉意。此后，我又接到过发言的邀请。1979年，我应邀做了发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宣读完发言稿，总算没有使自己当众出丑。发言过程中，我只是在几个既难发音、拼写又长的单词上打了磕巴。1979年，我在法兰克福领“歌德奖”时的发言却使我感到面上无光。回想起来，我仍然觉得自己的发言稿平淡无味。此外，发言的效果

比我事先所担心的还要糟糕。我在学习英语之前就掌握了德语，而且对这门语言的理解要比对英语深刻些。但是我为什么没能再次征服这门语言呢？是不是因为再教育训练要求多讲，而我却缺乏练习？是不是大脑受损伤部位与储存德语单词的能力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我不清楚，甚至也不知道第二个设想是否值得认真考虑。

我使用学生时代学到的词汇时“语无伦次”，这是否使我感到羞愧万分呢？我是否早就应该告老还乡呢？有很多“亲爱的同事”在私下议论：如果这些文章不是署名雷蒙·阿隆的话，读者们又会怎样评价它们呢？当然，我也曾想模仿罗曼·加里的做法——署一个无人知晓的笔名，以便了解公众如何评价自己的文章——但对于一个记者来说，我认为这种尝试毫无意义。一个社论撰稿人或专栏作家不可能像一个作家那样，只需写出一本小说就可能赢得批评家们的崇敬和公众的好感，他们不能靠一两篇文章来树立自己的威望。尽管我在《战斗报》工作时，有幸因成功地撰写了一系列有关党派的文章而迅速确立了自己社论撰稿人的地位，但就记者来讲，一般总要经过长期的努力才能晋级，才能拥有自己的读者群，才能受到国家领导层的注意。在我与《快报》周刊合作期间，相比于我写的每周社论，我认为我对自己写的几篇文章——如关于“新右派”，关于《世界报》以及哥白尼街的凶杀案——更满意。

我的写作常常出现“故障”，如笔误、混淆词汇，甚至还出现了拼写错误。幸亏书写错误可以在读者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得到纠正。笔误引起了我的好奇心。这些错误到底是纯属偶然，还是应和了弗洛伊德的某种理论？我在写信时最常犯的错

误是写错主有形容词，把“你们的”写成“我们的”，把“你的”写成“我的”。我几乎分辨不出“一种受压抑的欲望”，“一种自己都不肯承认的愿望”和“明知故犯”在含义上的差别。我想在这种情况下，精神分析学家自己大概也会借助某些生理现象来进行解释的。

出院以后，对于无法治愈的智力衰退我曾经苦恼过吗？有些担心倒是不假，但是还谈不上苦恼。我能够把这一点归功于我的意志力，归功于某种以我为中心的倾向，或者说一种幼稚的虚荣心吗？在我看来，对我发病几个星期之后的行为所能做出的解释是，我的意识和我的“我”保持了完整的连续性。受损伤的只是我的大脑部分，并非我本人。控制语言的中枢出了毛病，并不意味着思维也出现混乱。我的右手是变得不听使唤了，但是工具的残缺不影响手艺人的功夫。更确切地说，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我的文笔对一般人来说是比较抽象晦涩的，即使在同类型的文体中也超过一般的抽象和晦涩之程度。抽象的文笔往往导致词汇的贫乏单调，所以我担心自己的文笔日益干涩，这并非杞人忧天。

时至今日，我还背不出我曾熟记心中的那些诗句。我未能保持对之前的事情的记忆，一些我说过话及一些我曾亲身经历过的事件我回想不起来了。然而，我认为自己在1977年之前积40年之经验形成的观点，以及通过亲身经历所形成的牢固思想体系，却基本上抵抗住了血栓的侵蚀。有一天，我冥思苦想，试图背诵出《年轻的命运女神》中的某些诗句：“万能的局外人，必然的天体/愿将其光芒四射……”^①我不得不核

① 法国大诗人瓦莱里的诗句。——译者注

对原文（实际上这是西蒙娜·韦伊送给我夫人的一首手抄诗）。我总是记不住一些现成的短语。

尽管如此，我还是强迫自己像往日一样生活。事实上，我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1976年和1977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在法兰西学院开的“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尽管有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由于我在多年的教学中把这样一种虽然含混却又含有丰富内容的思想看作这种思想的核心和精髓，因此觉得有必要把它写成一篇有分量的论文。4月里的一天上午，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约瑟夫·丰塔内，就好像我这个72岁的老人还想植一棵树，还能参加一项冒险行动。我深信自己无论如何不会一头扎进这种丧失理智的尝试中去。然而，我居然会考虑得那么认真，这倒颇足以说明我当时的精神状态。那时，我没有完全放弃在《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之后再写两卷书和最后一卷关于马克思本人的书。我当时认为我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1977年4月之后，我开始问自己到底还能活多久，以及可恶的心肌梗死还能给我留下多少精力。

我的身体出现了微妙的变化。虽然我在《法兰西学院的开题演讲》一文中写道，对我来说“大局已定”，但是我现在在怀疑，我当时这样说，并非毫无保留。我这样讲，并不是故作姿态，或者想炫耀自己。人到了65岁，当然大局已定，或者“基本上”已定。就理性而言，这个“基本上”不必深究。但是也许可以说，我的感性意识却一味地对这个“基本上”耿耿于怀。当然，我无意再次推究历史理论，但是《历史哲学导论》和《人类的历史命运》这两本书却可以算为山九仞，功亏一篑了。这两本书既不打算对马克思的思想做简要阐述，

也不准备与巴黎的马克思主义者们进行论战，目的只在综合分析一下马克思思想的各种倾向，而并非探讨这种思想本身。一切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历史运动无不发源于这种思想。

1978 ~ 1979 年是我除了撰写某些已经承诺下来或奉命而作的文章以外没有任何教学任务的头一年。我开始再次考虑完成《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的续集部分。我当时还没有确定自己的写作计划。直到 1979 年夏天，我才着手写作自己萦怀已久的三本书的第一章。这三本书的书名分别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的哲学》《回忆录》。要完成这三本著作，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这个写作计划似乎超越了我的能力范围，因此我应该选择写第三本书。我渴望不受拘束地回忆自己的往事，这并非出于自觉的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本能的意愿。 885

在全盘写作计划中，我最终选择了从研究角度来讲要求最不苛刻的一本书。我并不想知道，我对谈论自己的反感，是否真正变成了坦白自我的渴望。朋友们怀疑我没法用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语言风格进行写作。我开始回忆遥远的过去，但对自己是否能够坚持到底并没有把握。我让人把自己写好的第一部分读给贝尔纳·德·法鲁瓦（Bernard de Fallois）听，他肯定地对我说，这种对历史事件夹叙夹议的回顾会吸引一批读者，甚至使一些年轻人感兴趣。因为这些年轻人只是通过带有倾向性的历史书，或者战胜者们所散布的种种传奇性说法来了解近半个世纪的历史。承蒙他的鼓励，我终于实现了目标。^①

① 我当时还没有考虑用对话体裁来写作《介入的旁观者》这本书。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886 当我暂时置身局外时，我与《费加罗报》分手的消息已经在巴黎不胫而走。我原定在4月份同詹姆斯·戈德史密斯爵士进行谈话，但我们的谈话却被拖延至我出院三个星期之后才履行。我又比较自如地讲起话来，这造成了假象。那次谈话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我怎么也说不出“好大喜功”（*mégalomanie*）这个词和形容词“好大喜功的”（*mégalomane*）。被所有《快报》周刊的同人称作“吉米”的詹姆斯爵士给人留下的最初印象是智力超群。我不同意阿兰经常引用的这样一种观点——“总之，每个人都经历了他所向往的生活”。我更赞赏“成功总是应得的”这样一种表达婉转而又意义明确的论点，尽管其所使用的词汇听起来有些不合情理。换一种说法，成就并不完全靠运气。^① 詹姆斯爵士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大资本家，是因为他的目标是赚取大量钱财，而且他拥有出色的工具，那就是他的智慧。我在《快报》周刊工作的最初几个月中，他几乎每周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上一期杂志中的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他对新闻专业缺乏经验，他同别人一样也常常出错，但是一般来讲，他的批评和建议还是正确的，因此受到别人的重视。

有了在《费加罗报》工作的经历，我对那些无休止的会

^① 关于R. 埃尔桑我也是这么说的。

议、窃窃私语、派性、垄断势力以及内部纠纷尤其感到害怕。我应该在离开《费加罗报》和4月份患病之后，中止我已经干了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并从此改换门庭，著书立说。我从未改变固有的生活方式——中等职员的生活方式。我通过作家版权组织在地方报纸上刊登文章，收入已足够维持我的生活。如果退出公众生活，我能够有时间和勇气写出我曾提到过的一两本书吗？对此，我无法给予肯定的回答。更确切地说，这种隐退只能更清楚地表明，死亡的临近使我产生了一种淡漠感。我知道这种淡漠感可以被形容为泰然处世或者明智。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这样认为，这种淡漠感具体到我的情况，所能表现出来的形式就是自暴自弃。

887

我庆幸自己选择了《快报》周刊的工作。如果换成《焦点》周刊，我的生活是否能够更加舒适和丰富多彩，那就不得而知了。我只想说明，当我在报社里的职责被确定和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之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詹姆斯爵士亲自对我说，我可以不必出席所有的编辑部会议，因为这种会议只涉及出报过程中各部门之间的问题。从此逐渐形成了一种默契，每星期一的编委会很少讨论最近一期或下一期刊物的内容和方向问题。身为周刊的社论撰稿人，又是编委会的主席，我还承担了一部分主编的责任。然而，除了某些小问题，这部分责任并没有引起我的良心问题。

1978年的竞选前夕，詹姆斯爵士委托我做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重新阅读所有的文章，如果发现这些文章可能不符合既定方针，就要提出来加以讨论。但是他忘了告诉我，奥利维尔·托德曾以书面形式要求，并且如愿以偿地获准在撰写社论时带有社会主义倾向。当天夜里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吉

米当时正在加勒比地区，他不断打电话到会场，甚至声称要禁止周刊出版。《鸭鸣报》以其传统方式评论了这次事件：这篇评论的矛头指向了我。

在我进入《快报》周刊几个月后，弗朗索瓦兹·吉鲁表示愿意回到报社工作。我们对她的申请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在最后的否决中，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888 弗朗索瓦兹·吉鲁聪明灵巧，有一种魅力，甚至连她的声音也相当迷人，令人信服。我们曾多次见面，她甚至还邀请我参加过说不清是为纪念《快报》周刊的什么节日而举行的一次朋友式的聚会。弗朗索瓦·密特朗和加斯东·德费尔也出席了那次招待会。与会的巴黎荷兰银行的一位老总走过他们面前时，对社会党进行了揶揄：“它嘛，谁都知道，已经不在。”加斯东·德费尔当面骂了他。令人不愉快的文章不时出现，都是攻击我的某篇文章或我的某些政治判断，对此我倒没有怪罪弗朗索瓦兹·吉鲁，更多以为是J. 施莱贝尔干的好事。在巴黎竞选事件中，我显然对弗朗索瓦兹·吉鲁寄予了同情，但是仍要强调一点：她为什么要同那些人混在一起呢？此后，由于她申请回《快报》周刊的要求遭到拒绝，她始终不肯原谅我（更确切地说，她是怪我代人受过）。

弗朗索瓦兹·吉鲁要求回报社工作的申请在1978年年初提请编委会审批。当时领导报社工作的还是菲利普·格伦巴赫。戈德史密斯不希望弗朗索瓦兹·吉鲁返回报社。让-弗朗索瓦·拉威尔（J.-F. Revel）是报社的老人了。他与弗朗索瓦兹·吉鲁一起工作了多年，出于对她的真诚友谊，他不能对过去的领导采取敌视的态度。我们大家出于政治上或感情上的种种明显原因，对这个问题感到左右为难。F. 吉鲁在创建《快

报》周刊的工作中，有过或几乎有过堪与 J. 施莱贝尔比肩的功绩。拒绝她回《快报》周刊工作，在我们大家看来简直可以说是公平的和残酷的。

然而，我们不能不考虑到一些具体困难，进一步说，就是她重新回到报社几乎是不可能的。一部分原来班底的人在离开《快报》周刊时得到了一笔优厚的补偿津贴，这是法律对记者离职所规定的。其中有些已经快到退休年龄的人便乘此机会离开了《快报》周刊，他们中的某些人由于还能够其他地方找到工作，更是何乐而不为。为了使新的《快报》周刊与原来由 J. 赛尔旺 - 施莱贝尔的《快报》周刊彻底决裂，戈德史密斯便把在《新观察家》工作的奥利维尔·拉德和在《费加罗报》工作的我一同聘请了来。我曾多次问他，赛尔旺 - 施莱贝尔和弗朗索瓦兹·吉鲁是否永远离开了报社。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使我再也没有任何疑虑。我并不记恨他们当中的任何人，我只是希望履行新的计划，彻底改变《快报》周刊前一阶段的状况，不再出现用《O 的故事》^①的相关内容做封面的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吉鲁在其参加竞选的巴黎选区赠阅了几千份《快报》周刊。《快报》周刊不能再沦为虽合法但为个人的雄心服务的工具了。

889

在编委会的讨论会上，反对吉鲁返回报社的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就我所知，她自己并不想重新掌握报社的领导权。编委会其他成员试图采取一种折中的解决方式，允许她写些有关社会问题的社论，但不能涉及政治。我指出，同意聘用一个曾任部长职务的人回来工作，但又规定她不许涉及政治，这是荒唐

① 色情小说。——译者注

的。我建议由戈德史密斯向她转达否决的回答，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我个人的意见……我承担了这个责任。当时周刊已经决定，《快报》周刊在1978年的选举中，支持在今天看来是反对派的立场。她这位前部长对总统的敌意将会使编委会的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化。戈德史密斯对我支持了他的决定表示感谢。他对我说，能够友好地解决在杂志的新业主与前女老板之间可能存在的行政诉讼事件，他感到庆幸。

值得庆幸的是，在P. 格伦巴赫离开几个星期后，詹姆斯爵士被说服同意任命J.-F. 拉威尔为社长。在我看来，格伦巴赫的离职是不可避免的。他属于《快报》周刊老班子里的人，由于高高在上、喜欢发号施令且口气生硬，记者们越来越反感他的领导。拉威尔享有或几乎享有全体记者的信任和友谊，他虽然也是杂志社的老人，但是他并没有在最后阶段——当社长或弗朗索瓦兹·吉鲁使周刊服从于他们的政治倾向时——与赛尔旺-施莱贝尔同流合污。我不知道我那些措辞强烈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吉米的决定。总之，我自己对这次任命深感满意。1981年6月的危机也没能改变我的这一看法。

890 我来《快报》周刊时，刚刚结识J.-F. 拉威尔。我曾读过并且欣赏他的两本畅销书：《既非马克思，也不是耶稣》和《极权的诱惑》。我翻阅过他抨击哲学家的小册子（其中也涉及我），对《伪君子们的阴谋》一书，我既不十分赞成，也不强烈反对。我吃惊地发现，他身为作家，除了有无可非议的丰富学识，还有一种使读者都能领会的论战艺术。他的书简洁而又不落一般论战的俗套，并且充满了一种他自称是发自内心的反共色彩，从而在大西洋两岸拥有众多读者。这一事实说明他处理棘手的体裁仍能履险如夷，举重若轻。同时，我对他执拗

地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对他在起来反抗他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国家主权时，一跃落进乌托邦而感到惊异（当我们相熟之后，我把这些想法告诉了他）。

依我之见，我们两人之间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自尊心的竞争。我们说好每星期一上午讨论各自社论的内容。可能某些时候他认为我的选题更为恰当，但我却不这样认为，每两次中至少有一次都是他向我建议应采取什么题目。因此，我开始为这个团队尽职，并且不回避承担整个报社的责任。在编委会的辩论中，我很留恋《费加罗报》的自由：自由地选择时间、内容和篇幅。经过几个星期的练习，我已经充分适应了12个版面和我的3栏社论。由于我坚持按照自己的风格写作，所以不得不在没有充分进行论证的情况下，比平时更进一步地表达某些论点或看法。让-弗朗索瓦的社论和我的社论互不矛盾，而是相得益彰，前者用事实说明和证实问题，从事论证性文章的写作，我则为了表明某种立场或进行某种评论而专门写分析文章。

我要补充的是让-弗朗索瓦对我十分体谅，也很有分寸。由于这种关系在新闻界人士中并不常见（在教育界中也是如此），所以我对此感触很深。我已经习惯人们称我为“老先生”和把我看作“长者”这种状况了，但不能说我对此一点儿情绪都没有。从1977年4月起，我已经开始老了，而且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我还是更希望别人不要让我感觉到自己老了，即便是出于礼貌的考虑。同样，奥利维尔·托德和我的关系也密切起来。他让我看了他写的关于萨特的书的初稿，我向他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我们俩，还有安娜-玛丽和苏珊，四人一起吃过一次午饭。危机是在5月11日或12日爆发的。

891 5月10日晚上，我带着孙子孙女洛尔、阿兰和波利娜来到报社，我想在那里让他们把我预先写好的评论弗朗索瓦·密特朗获胜的社论听写下来。吉米正在同让-弗朗索瓦和其他一些记者讨论事情。我没有感觉到暴风雨即将来临。吉斯卡尔·德斯坦关于《预谋背叛》的公告，以希拉克为首召集的原多数派的会议，都不许我发表已经写好的文章。原定12日（星期二）我要进科香医院动个不大的手术（切除一个憩室，它已经使我难受了几个月，也可能是使我难受了几年，我越来越感到不舒服）。就在11日的下午，我碰见奥利维尔，他异常激动，突然告诉我说，吉米把他赶出了报社。我不了解老板和由他挑选的领导班子之间发生冲突的深刻背景和偶发原因。一到医院，我就给《快报》打电话，问我的社论是不是没有被发表——这与报社的危机没有任何关系。我让我的朋友蒙萨利埃相信，所有的化验都要等星期三才能做，所以我没必要在星期二这天住进医院。我回到《快报》，同让-弗朗索瓦和吉米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谈话。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来缓和紧张的气氛。

吉米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这样的观点，即《快报》不能够也不应该办成一份右派的《新观察家》那样的刊物。这是由两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决定的：要么像信仰宗教一样加入左派；要么在当前除了被政治阶级革出教门的“新右派”，能够与左派相匹敌的右翼已不复存在。另外，许多编辑都来自左派，他们不会把周刊办成一个反对社会党政府的刊物。在这次谈话中，吉米打算把奥利维尔继续留在《快报》，但是不再让他担任总编，因为报社的总编同社长最接近，他不仅要在工作中与社长密切合作，而且肯定会影响社长。

就我个人来说，我对竞选运动期间出的最后几期周刊并不满意。让-弗朗索瓦以他惯有的文风撰文反对共产党，但并不太反对密特朗。最使我感到气愤的是《快报》于第一轮竞选前夕刊登的4篇文章。每篇文章占两个版面，安排在相等的位置上。其中的两篇是支持密特朗的，另外两篇是支持德斯坦的，而让-弗朗索瓦写的文章名义上是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实际上其内容却是让-弗朗索瓦反对马歇但也不支持吉斯卡尔。当他要求我把已经写好的《选举的说明》一文由三个版面改为两个版面时，我同他进行了一场近似争吵的讨论。在这之前的一次编委会上，我非常吃惊地听到他竟然说出这样的话：他对我和马克斯·加罗采取的立场都表示遗憾。因为马克斯·加罗参加了支持密特朗的委员会，我加入了拥护吉斯卡尔的委员会。他还说，报社根本没有必要卷入总统竞选的斗争中去，因为几年来我们撰写的文章对读者的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最后时刻刊登的文章的影响大得多。

892

刊登上述4篇文章的那期周刊使我深感不安，要比让-弗朗索瓦当时意识到的要严重得多。一份自诩客观的刊物并不意味着必须保持中立或不介入，如果它表示自己不能够采取任何立场，那么这不仅说明刊物水平低下，而且还会让该刊物丧失威信。大选过后，我就想辞去编委会主席的职务。在社长与编委会主席之间无人能够进行仲裁。但是，当让-弗朗索瓦和我对贝尔纳-亨利·莱维的一本书出现分歧时，我们找到了一种折中的方案：设法发表两篇评论文章。伊夫·居欧后来打电话告诉我说：从简单的专业角度出发，他反对把支持密特朗的两篇文章和支持德斯坦的两篇文章并列发表。在电话中，我让步了，因为有马克斯·加罗在场，我虽然并不赞成把写书评的人

一下子晋升为政治社论撰稿人，但当时不便多加解释。我们当时还不知道——他也没对我们讲——他正觊觎着波旁宫的一个席位（也可能他自己不了解这个情况）。

尽管我在最后几个月中对《快报》发展的方向抱有疑虑，但对让-弗朗索瓦还是信任的。不过这并没有打消我辞去徒有其名的编委会主席的念头。5月12日，我仅仅想防止吉米同让-弗朗索瓦和奥利维尔的分道扬镳。

星期二晚上，我们分别时没有就具体方法达成协议，大家要在夜里想出办法来。我认为，要奥利维尔·托德接受降职，在《快报》当一名社论撰稿人，并负责“封面报道”^①，这是不太可能的。而我毫不怀疑让-弗朗索瓦将跟奥利维尔一道引退。星期三上午出了什么事？我从医院打电话到《快报》，接电话的是让-弗朗索瓦，他明显是不知所措，对我说“我辞职了”，接着挂断了电话。

关于5月13日（星期三）发生的事情，我听到了两种说法。吉米对我说：“我是10点半到报社的，因为9点钟我在外面有一个约会。一到报社，我就发现社里乱七八糟，让-弗朗索瓦辞职了，托德被撵出了报社，记者们自己开起了会，处处人心浮动。看到这种情况，我没有其他选择，只好发出两封信，一封是解雇的信，另一封是接受辞职的信。”而照其他人的说法，那天上午他们二人收到了这两封信后，报社就乱了套。虽然我们三个人在谈话结束时并没有做出结论，但很可能关于他们两人一个被解职，另一个主动辞职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吉米

① “封面报道”（cover story）指的是每周发表一篇文章，就一个专题进行深度分析，以期增加本期杂志的吸引力。

到达报社时看到木已成舟，只好顺从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5月13日至15日这3天里，让-弗朗索瓦·拉威尔和奥利维尔·托德不断发表声明，但是我并不了解声明的内容。他们的声明遭到了伊夫·居欧和扬·德·雷克泰的反驳。作家攻击记者，离开的同事指责留在报社的人。在那些天里，我因动了手术，既不能介入论战，也无法打听消息。还是吉米通过我夫人使我了解到了报社的一些情况。让-弗朗索瓦和奥利维尔都没有来医院，他们既没有打听我的情况，也没有表示有探望我的愿望。这在我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也许，他们认为我在精神上是支持他们的，然而若真是如此，他们为什么又不同我接触呢？也许，他们把我看作这次争端的局外人，我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奥利维尔·托德要在《晨报》上发表文章来猛烈抨击我返回报社后所写的第一篇社论呢？

由于杂志的一幅封面不符合吉米的口味，他勃然大怒，并在一气之下赶走了主编，社长也因而离开了报社。如果只就这些事实本身而论，显然是吉米理亏。在错误——如果存在错误的话——与制裁手段之间，轻重悬殊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如此，木已成舟，两个受害者又能怎样？想让吉米认错吗？他们了解吉米，知道他们无法搞垮他，吉米宁可停办报社也不会向别人屈服。他们虽然无法战胜吉米，但还可以使大多数编委，尤其是那些享有名望的编委辞职，从而使吉米陷入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决定就成为事态发展的关键：如果4个编委全部辞职，将要接替他们工作的人难道还敢来冒险吗？在几天之内，报纸和电台一直等待“住院的雷蒙·阿隆”表态。我请伊夫·居欧到科香医院与我见面，让他把我的决定告诉大家。

在总统竞选第二轮投票前夕出版的周刊的封面上，德斯坦老态龙钟，密特朗英姿焕发、沉着稳健，这至少会让人产生一种误会。《鸭鸣报》的短文就是最好的证明：《快报》的老板已经准备靠拢新的执政者。也许正是《鸭鸣报》的评论惹恼了詹姆斯爵士。吉米给我看了负责封面报道的编辑们写给他的信，信中说，他们是遵照收到的指示行事的。

我认为吉米并没有记恨奥利维尔，虽然前者出于极端的保守主义观点，讨厌甚至可以说是蔑视后者那种软弱的社会民主思想。其中的奥妙在我看来并不难理解。吉米和其他实业家一样，怀着一种简单的热情，满怀信心地投身于报业。他的动机不是发财，而是捍卫和宣传自己的观点。

《快报》曾经是左派的刊物。它反对过印度支那战争，反对过阿尔及利亚战争，反对过戴高乐主义以及共和国民民主人士联盟的统治。在1974年大选的最后时刻，J. 施莱贝尔宣布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弗朗索瓦兹·吉鲁不得不在《普罗旺斯报》上对自己投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票做出解释。报社的指导方针虽然多次变更，但编辑部的立场依然倾向左派。多少年过去了，但是老板同一些记者的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他希望周刊果断地成为“自由”（从欧洲的意义上的）的刊物，而记者们（一些社论撰稿人除外）则摇摆于两个阵营之间。

895 说实在的，吉米对密特朗获胜并不感到意外，但他对此怒不可遏。大选前吉米同执政者已经就埃尔桑集团的前景进行过谈判，在他看来，该集团的财政需要采取严厉措施加以整顿。他希望借此机会控制《费加罗报》，同时解决《快报》中的某些人事和经济问题。

5月10日以后，原打算从大大超编的《快报》编辑部抽

调一部分人到《费加罗报》去的计划破产了。此外，吉米过于悲观地预计，广告收入将减少 25%。从逻辑上分析，奥利维尔·托德的离职与可能出现的财政困难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在吉米的思想中，企业可能蒙受的损失与刊物的政治内容之间是有紧密联系的。在宁可承受财政损失也要保住刊物这一问题上，他至少是同我，而不是同我所反对的那些观点站在一起的。那幅封面使吉米大受其辱，好像他是一个叛徒，随时准备与社会党人携手合作，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吉米只想跟他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吉米的所有这些不痛快的情绪，包括 5 月 10 日事件的打击和多年积压的怨恨，一下子被奥利维尔·托德的封面事件引发了。而他这个点燃导火线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牺牲品。最后还需要说明一点，吉米早就想提拔伊夫·居欧和扬·德·雷克泰（后者是同我一起离开《费加罗报》的）。

我有一个想法，但是这个想法却无益于我在报界同人中的名望。就我个人来讲，我极不赞成一个刊物的编辑部享有自主权。我目睹了《费加罗报》不可挽救的衰落局面，“老板”的职位落在一个其背后派系林立的傀儡手里，某些在业务上不是骨干的编辑就会在报社内部制造政治纠纷。于贝尔·伯夫-梅里在谈到编辑协会和当时协会的主席让·施沃贝尔（Jean Schwoebel）时总是唉声叹气（当他心情好的时候）。《世界报》从于贝尔·伯夫-梅里的手里换到了雅克·福韦的手里，又差一点儿落到克洛德·朱利安的手中。罗贝尔·埃尔桑未能重振《费加罗报》，但是他起码知道哪些署名作家特别重要。吉米也是如此。如果实行民主办报，将来由谁来掌握报社的领导权和决定权呢？我更希望布里松这样的人当领导，其次就是吉米这种类型的人。

896 读者会默默念叨，这是个右派人物。我的平等意识还不至于使我否认下述两种人的区别：其中一些人鹤立鸡群，而另一些人尽管可以受人尊敬，但总觉得自己大材小用，心中多少有些愤愤不平。何必在任何人都不相信的平等问题上做戏？是右派反对左派吗？我请读者们读一下让·达尼埃尔的《决裂的时刻》这本书。《新观察家》周刊的社长支持学生反对教师和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但他反对出于同样动机的另一场斗争，这场斗争的矛头并不是针对他本人的，而是指向周刊的等级制度。让·达尼埃尔爪牙并用，拼命维护在他看来完全合法的权利。请允许我在这里引用几段让·达尼埃尔在他与自己的编辑部以及与萨特辩论时记录下来的文字：

我请《现代》杂志社的社长注意，我同意他的杂志所实行的推选原则，并且不介意他的个人行径。在艺术和政治上，人们只能选择那些志同道合的人做朋友。萨特对此没有任何表示，我接着说：难道可以把有关政治或文学内容的文章交给负责行政、销售和订阅工作的同事来审阅吗？难道应该征求那些我明知会同编辑方针唱反调的人的意见吗？难道萨特自己会同意把《现代》杂志在某个月制定的路线一一交给他的秘书，甚至出版商和印刷厂主吗？总之，能把舆论和创作与分配劳务和财产同样对待吗？

让·达尼埃尔在另一篇文章中坦率地承认，他对“五月风暴”抱有极大的同情。这种同情心同他维护领导者的权威，以及为决定的统一性进行辩论的立场是自相矛盾的。读到他的这些文章，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他丝毫也不同意那些像他

一样为维护他们搞好业务所必需的权利而斗争的教师？为什么不觉得让行政人员参加选举学院董事会是件荒唐的事？

难道大学与一份杂志或报纸不是属于同一类型吗？当然不是。但是，教师的工作却与记者的工作十分相似。无论怎么说，这也是一种脑力劳动，只能由内行来评价。学生对教师的评价同读者对记者和作家的评价一样重要，但这是用户的评价——如果能这样比喻的话——本身并不能成为无可争议的判决。教师、作家不明不白地就靠边站了。在1968年和1969年，受少数人教唆的学生起劲反对的是那些与当时盛行的观点唱反调的教师，而不是那些水平低下的教师。让·达尼埃尔还写道：“一个朋友向我指出，我在同一期刊物上叙述自己在杂志社内部同‘五月风暴’的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同时又歌颂‘五月风暴’的成果，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不去寻找另外一种矛盾的统一，我承认这个矛盾是存在的……我曾花费了不少时间去评论各种‘呐喊’、各种有待破译的耸人听闻和任意夸张的文告。”让·达尼埃尔在结论中指出：要同法国人民言归于好，而他们最终会怀念爆发街头巷战的那一天。“1968年5月，这个民族的年轻一辈所迸发出来的生命力让我热爱这个民族，不只是从书本上，也不是迫不得已。当我要求自己去说服社里的造反派，改变一些造反派的立场时，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中间的某些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对造反派的这种感情又叫我怎么能反对他们呢？”这种“对造反派的反抗”又有何神秘之处呢？为了避免陷入简单的俗套，我认为，在奋激的时刻，每个人都参加了反对一般当权派的斗争，但当个人非常合法的权利受到威胁时，这种斗争却很少有人参加。对我来说，我没有任何需要维护的权利。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898 在1977年4月的震动过去之后，我于同年7月开始撰写一本关于1978年3月选举^①的小册子。这么做是出于政治激情吗？正相反，我是为了让自己不像一个受到死亡判决的人那样变得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同年8月，当我思考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的论战时，一个明显的想法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共产党人已经决定与社会党人在《共同纲领》问题上决裂；左派将在来年的3月露出分化之相。1977年9月，我在《快报》周刊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在这篇被我命名为《大幻象》的文章中，我预告了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协商将遭遇失败。一些时日之后，激进左派运动的施瓦森伯格在欧洲1台回应伊万·勒韦时说完全是在异想天开。

对左派决裂的预见首先让我萌生了放弃撰写这本小册子的想法，虽然某些“要人”曾恳求我去写。他们是这样对我说的：只有您才拥有足够的道德权威和能力去向我们的同胞阐明《共同纲领》的危害，向他们阐明目前多数党的失败将会导致的政治危机。我为是否结束这项写作犹豫良久^②；这本小册子

* *Revue Commentaire*, n°41, Printemps 1988, pp. 157 - 165.

① *Les Elections de mars et la V^e République*, Julliard, 1978.

② 或许是贝尔纳·德·法鲁瓦让我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最终于1978年1月的最后几天付梓问世，就传播和接受评论而言，这次发表的时间已是太迟。左派的雅克·阿塔利用最能伤害我的方式攻击了我。他说这是“一本多余的书”，换句话说：该是您闭嘴的时候了。我们在数年前有过真诚交往。他曾就《化圆形为正方形》一文对我写道，他虽不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却依然认为它是对《共同纲领》的最好批判。我曾邀请他参加于道德与政治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他曾邀请我去参与一个他既是嘉宾又是制作人的电视节目。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在加拿大广播中的一次对话中采用的是近乎友好的非议语气。他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说，他年轻时候曾遐想自己变成了——这属于他的众多梦想之一——左派的雷蒙·阿隆。他的怨气从何而来？

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提到了有一次他与老板争论时用的某些言辞。比如，我引用了下面这句话：“今天，通货膨胀泛滥的真正根本性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的买和卖的社会关系变成了商品。”这是从马克思那里抄袭的句子，尽管它显示了哲学上的自负，却没什么深层含义。我的评论是否有可能被看成侮辱和人身攻击？“您的友谊、爱情、工作、抱负，所有这些，经过社会关系中的买和卖都变成了商品吗？其他人都是商品世界的囚徒，难道您就不是吗？”我也在章节的末尾加了个注释以便缓和这场论战：“我在重读那些反对雅克·阿塔利的论战文字时不无尴尬，比起我的那些简单批判来，他的思想应该有更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不过，我曾经而且至今依然对他满怀期待：也许可以用我对他的失望来解释这次挑衅的发生。”实际上，当时的我先是被他的超群智慧迷住了，后又对他那些只有媒体才会感兴趣的典型巴黎式书籍感到失望，比如《声

音》这本以一项既散漫又肤浅的研究为基础而写成的音乐社会学的书。

900 读者或许会反驳说，我的这本小册子并不比雅克·阿塔利的反唇相讥有更多的价值。实际上，这本册子也的确没什么独创性：我赞成说我的某些评论也有可争议之处。即便如此，在我看来，这些对左派短期规划的批评同对它长期规划的批评一样，它们到今天也还站得住脚：通过提高购买力，尤其通过提高处于底层阶级的雇员的购买力来让经济复苏的做法在1978年或1981年的局势下能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真的实现了预计的所有改革，得到的又将是怎样一个社会呢？1982年发生的各种事情印证了我的大部分警告。

今天当我再次阅读这本册子的时候，最令我惊讶的是我在其中居然拒绝设想最坏的政治情况。在最后一章中，我正确描述了如果密特朗成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政府的总理，他面对的将是怎样一种极难处理的局面——除非社会党可以靠一己之力保证其在国民议会中成为绝对多数。（我虽在一个注释中提到了这种情况，却没有在此过多停留：到了1978年，正如选举结果表明的一样，社会党没有可能获得绝对多数。）密特朗会试图在宪法划定的框架内实施他的计划。由于他将受到共产党的掣肘，吉斯卡尔·德斯坦便会对他有所戒备，并窥伺一个有利时机去解散议会或为了制造一场总统选举而提交辞呈。一位真正的权术家会与我持有完全不同的推理思路。

总有一天，左派会成功赢得选举：以右派或自由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最为危险的左派获胜的结果乃是选举出了一位社会党总统；最不可怕的则是左派仅以微弱优势获得了议会

多数。^① 总统自 1958 年来在法国权力中占据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位社会党人入主爱丽舍宫就会让选民一下子转向左派。弗朗索瓦·密特朗预见到了这点，而且他是对的。如果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和左派激进党人士于 1978 年在国民议会获得了议会多数，即便是大大超过了半数的多数，即有 50 个到 100 个议席，社会党政府应该还是会对共产党人手中的选票有所依赖。共产党当时已经在指责社会党滑向了右派。共产党在选举后还会重施故技吗？无论是在 1974 年还是在 1978 年，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战略都没有真正取得成功；即便他在当时获得了权力，他在行使权力的时候也会困难重重。

我当时认为——今天的我则想知道自己在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认为——1978 年标志着一个决定性考验，吉斯卡尔一旦渡过难关，他的重新当选就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了。左派人士阿兰·图莱纳就发生的事总结说，旧式社会主义和对旧思想的重提（国有化生产资料）已经没人愿意再听，呼唤国家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做法已经过时。米歇尔·罗卡尔，他则是踏入了政治竞技场中，就像弗朗索瓦·密特朗真的是在坐等机会流失而不会进行第三次尝试一样。事后看来，米歇尔·罗卡尔是所有我们这些人中最不理性的：他在党内开展反对密特朗的活动的同时，又宣称说如果社会党第一书记期望成为总统候选人，他就会放弃争夺候选人之位，这种情形下，他的反密特朗活动又怎么能够开展呢？就算密特朗 1979 年还在犹豫，这些针对他的老旧意识形态的暗示也会激发他的抱负以及他对这位年轻对

① 对现有反对派也是一样：如果右派在 1986 年赢了，它又能利用这次成功做些什么事呢？

手的敌意。罗卡尔被剔除后，初期民意测验显示吉斯卡很容易就能获胜。当时的欧洲选举未曾表明存在一场倾向于社会主义的运动。而且大部分观察者也都没有对 1980 年的局部选举给予足够的重视，这些选举全都是在对社会党有利的市政选举结束后不久举行的。在 1980 年的最后几个月中，总统支持率和总理支持率一起下降。第二次石油危机继续产生着各种后果。通货膨胀突破了 10% 的大关，与此同时，失业率也在继续攀升。

1981 年的竞选活动比 1978 年的更奇怪。三年前，共产党不知疲倦地不断攻击社会党，说它是“滑向右派”的罪魁祸首，而且双方都在考虑是不是还要继续把让左派获得多数作为自己的目标。共产党政治局因为决定在第二轮投票中遵从“共和纪律”——也就是说让共产党候选人退选，以支持占据最佳位置的其他左派候选人——而上了电视，毫无疑问，这肯定对让游移不定的选民加入在野反对党阵营没起什么鼓励作用。^① 1981 年，共产党将两面派手法推进到了极致，并且最终玩火自焚。乔治·马歇对吉斯卡尔·德斯坦进行了猛烈攻击，其程度比其他任何人的攻击都更猛烈，与此同时，他又暗示说，出于支持率不够的原因，共产党无法对弗朗索瓦·密特朗和社会党施加足够的压力以让他们重新选择左派政策。他是不会无条件地让共产党人退选以支持社会党候选人的。而社会党候选人早在事前就已指望共产党的无条件退选，而且他估计得也的确没错。

^① 乔治·马歇被其他政治局成员簇拥的形象让人不禁想到苏维埃政治局的真实写照。

吉斯卡尔·德斯坦很迟才宣布参选，他只有数周的准备时间，而且他面对了来自其他九位候选人的各方面的攻击。这九位候选人中有三人自称奉行戴高乐主义；玛丽-弗朗士·加罗发出了反苏信息——戴高乐派在1958~1974年当权期间也从未发出过的这样的信息。米歇尔·德勃雷指责说上一个七年总统任期内实施的国家管理纯属放纵主义；雅克·希拉克则在两个主题间举棋不定，不知是以曾经被罗纳德·里根运用自如的自由主义作为主题，还是以通过国家行为和支出来重启经济这种“专断主义”作为主题更好。他将攻击集中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身上，而且通过拒绝号召他的支持者在第二轮时投票给吉斯卡尔·德斯坦而对德斯坦发起了致命一击。

弗朗索瓦·密特朗曾经提出110条建议，这些建议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社会主义草案》和《社会主义宣言》^①。竞选运动期间，他在旧多数派的各种失败上大做文章，他不仅一味强调通货膨胀和失业率的糟糕情况，还就吉斯卡尔·德斯坦出访华沙、维也纳会议以及《安全和自由法》大发议论。在专家的建议下，他尤其注重自己的形象：那种“沉静的力量”。

吉斯卡尔·德斯坦指望的是法国人的正统主义。尽管他自称是已经出局的候选人，却依然很少光顾位于弗朗索瓦一世街上的政党办公室，而是继续行使他的总统职能。他相信选民会把他同其他候选人，把他这个总统同一般的政治人物区别对待。他几乎没有为自己在七年任期的所作所为做任何辩护，也没有就执政最初几年里实施的改革（在他领导的多数派中

903

^① 《社会主义草案》这一从马克思主义中汲取了最多思想的文件，阐述的是社会党的哲学和学说。《社会主义宣言》在梅斯大会后拟定，明确了在社会党获胜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政府的施政纲领。

有部分人是憎恶这些改革的) 以及对以不得人心著称的雷蒙·巴尔的国家管理做任何辩白。他就如何应对失业稍微做了个计划, 并在其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真正满富激情维护的是他的对外和平政策、他与其他国家的对话以及他对制度的维持。“如果你们想要的是一个虚弱的总统, 那就不要投票给我。”

在吉斯卡尔·德斯坦自己都没有为自己而战的情况下, 别人又怎么去为他而战呢? 不要忘记, 以通货膨胀或失业率来说, 法国处于欧洲国家的中等水平, 而法国人口的总体消费在最近七年间至少上升了 25%, 这些都由《快报》周刊提请人们注意了。我确实不能做的是从总体上赞同已经遭到我多次批判的吉斯卡尔的外交政策。我知道而且也以间接方式试图让其他人明白, 他对苏联的过度武装与联邦德国的和平主义或中立主义运动忧心忡忡, 他赞同对欧洲导弹系统进行现代化; 他在部长委员会中对部长们侃侃而谈, 却没有把这些告诉法国人民。弗朗索瓦·密特朗利用了这种沉默, 不但趁机提出说即便他与共产党有着联合关系, 他密特朗也会是一个更少纵容苏联的人, 而且还表明自己对大西洋联盟忠心耿耿。

事后, 我想弄清楚自己当时的超然态度, 或者更确切地说, 我想弄清楚那些在 1978 年担心左派获胜又在 1981 年事先就对选举听天由命的个人或集体力量代表为何会表现出超然态度。拿我自己来说, 我不认为自己的超然源自脑血栓, 我在 1978 年行动了起来, 但这些行动是在有些勉强自己的情况下进行的, 这也是事实。比起我在《快报》周刊上发表的社论, 当局——无论他们这么做对错与否——对我在《费加罗报》

工作时写的那些文章更加关心。实际上，或许在我脱离日报^①的同时，我也随之部分或全部地失去了那种多数党人士——无论他们是处于吉斯卡尔阵营还是希拉克阵营——认为我拥有的公众影响力。除了让-弗朗索瓦·拉威尔的和我的社论，周刊文章会因为作者不同而要么倾向于社会党人，要么倾向于多数党，不过更多时候还是倾向于前者。有鉴于此，我当时觉得自己是置身于战斗之外的。

由于无法为吉斯卡尔·德斯坦辩护，我只能把《社会主义草案》《社会主义宣言》《提议》作为反对目标。大多数法国人都不仇视国有化；虽然他们总是不失时机地对国家低声埋怨，却又总会重新信赖国家；他们不怎么喜欢价格自由或市场自由。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他的提议中删除了1972年纲领中荒谬、过分的部分。他提供给法国人的是一种更少压制的司法，更多中央分权的行政，对银行和一些工业集团的国有化，以及通过提高大众购买力来复苏经济的办法。我并不相信他在经济方面的短期纲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是无法减少失业率的），我也对国有化不怀任何期待——尽管国有化并不一定会引起灾难；我对他选择的分权模式也深表怀疑，不过我对分权原则本身却没有敌意。说社会党-共产党政府的上台会在长时间内带来个人自由的扩大，在我看来，这几乎不可能：不过怎么才能证明呢？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很多“提议”都引起了担忧：教育或卫生领域的“国家服务”将以怎样的形式开展？这位候选

^① 这里是指《费加罗报》。——译者注

人在竞选运动中对此几乎完全没有提及。吉斯卡尔读提议读得太晚了，以至于他在最后时期发表的论战言论没有对选民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

第一轮结果进一步削弱了对社会党第一书记的反对。共产党被部分支持者背弃后走投无路，只能做出让步。弗朗索瓦·密特朗在第二轮投票时需要共产党的支持，但他在什么都没有允诺的情况下就得到了这种支持；乔治·马歇如果拒绝，就会进一步加剧自己党派的失败。这位左派总统一旦入主爱丽舍宫，便期望左派能在议会获得多数：选民也给了他一个社会主义多数。

905 这件事情对于处在“死缓阶段”的第四个年头的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呢？就我个人而言，我感觉没有被政权更迭或“变化”所波及。戴高乐执政的最后时期，我在将军的忠诚拥戴者眼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夸大”自己主人的情绪——变成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乔治·蓬皮杜曾在他竞选运动开展的初期给我写过一封友好信件，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和我有过私人联系，或许我那些“得罪人”的文章中的某一篇冒犯了他。在吉斯卡尔·德斯坦的七年任期中，我觉得自己比惯常情况下更接近总统。^① 1977年后，我曾几度与总统电话交谈，也数次被邀请参加官方宴会，而我也出席过两三次；总统曾就一期《快报》周刊向我们间接表达了他的“难过”，在那期周

① 为了不有所隐瞒，我必须提及下面这件事：总统授予了我国家功绩骑士勋位中的高等骑士勋位勋章。当时由于我的身份，他无法把国家荣誉军团勋位中的一个更高勋位授予我。我拥有军官勋位的时间还不够长，还不足以让我在国家荣誉军团勋位中升级。

刊中，让-弗朗索瓦·拉威尔和我批评了他的华沙之旅。我有个老习惯，我总会激起我为之投票且从原则上支持的那个当局对我的憎恶。我好奇地等待着新的体验：我从原则上反对的那个当局对我的憎恶。

至于现在这位总统，我对他不存丝毫反感。我也曾多次与他见面，我和他还在电视节目中有过一次交谈，那是一次勉强称得上是学术谈话的交谈，我们首先谈论了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然后讲到了时事，特别是智利的政变。我徒劳无功地尝试说服他相信，他想实施国有化的那些大工业集团并没有构成垄断，而且也将无法提供任何公共服务。他为阿连德总统的失败发动反击；我则对皮诺切特将军夺权感到遗憾，不过，对于一支以忠诚闻名的军队发动的“政变”，我更多是用左派政府和它那拖后腿的极左派盟友所犯的 error 加以解释，并未理会假想中的美国干涉。在电视论战中，细致入微的论述通常起不到好效果：弗朗索瓦·密特朗没有拒绝采用黑白分明的阐述以获得好处；一边是卑鄙的军人，他们谋害了本国元首和民主制度，另一边是骁勇的英雄，他们希望给一个分裂了的社会带来更多的公正。

我是想说，就国际背景而言，我不认为他是一位适合于法国的总统。他和社会党议员多数派一道，把我们重新引向昔日的共和制、一个法国本土派政党、一种书生政治以及一种对世界的懵懂无知。弗朗索瓦·密特朗对行政管理的厌恶即便在他的亲友圈中也是公认的。他在操纵经济词汇上很成功，并把从一两个幕僚那里吸收的某个论点加以发展。然而在一场讨论中，当他的对话者对这个论点提出批评时，他却无法找到论据

为自己的论点辩护。我还记得 1974 年他与吉斯卡尔的一场对话，当时的他提出要让法郎对马克进行价值重估——这一提议就当时而言一点儿也不荒谬——然而，当他的对话者转去嘲讽这个提议时，他却做不到反唇相讥。他就像第三共和国与第四共和国的“大人物”一样，具备文学才华，醉心于华美的辞藻。我不认为国家行政学院的毕业生就一定会是最好的执政者或最有天分的“政治家”。人文修养并不排斥对当下现实的理解力。乔治·蓬皮杜编过一本法国诗选，但这并不妨碍他进银行获取经济知识和金融能力。弗朗索瓦·密特朗让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迟到的皈依，不幸的是我觉得他的这种皈依又的确真诚而且出自自身意识形态。

出身中等资产阶级家庭的他在很年轻时，就对会让他想起“重商主义”^①的丑恶的夏朗德的大资产阶级心生厌恶。他支持国有化学说的论据，永远不会超越平庸或变得卓尔不群。国有化包含在社会主义《圣经》中，它是与共产党结盟的必要条件。一旦把国有化写进了纲领，它就会一直保持不变，因为无论这两个左派政党之间的关系如何演变，它都在社会党的计划中。

907 自上次大战结束以来，第四共和国时期如同第五共和国时期一样，对始自 1939 年的衰退做出反应的法国人及其领导阶层，为自己定下的目标是把“与教堂钟声合拍的法国”转变成一个现代的工业科技共同体。经济复兴开始于第四共和国；戴高乐将军和他的幕僚批准通过的是一部保留了个人自由、挫损了议会机

① 这个词反映的不是 17 世纪的重商主义，它大致相当于一种被突出贬义色彩的商业概念。

构却没有排除它们在有利条件下有着重新振作的可能性的宪法。我分享了激励着几代人的那些情感、憧憬、期望，正是这些人成就了1981年的法国——这个国家的前进冲力已被世界危机所限制，但依然对昔日的决心忠贞不渝，那就是在自由民主制度中（尽管存在总统权力过大的问题）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

我并没有忽视那些支持执政党的变化了的论据。十四年的总统任期，确实是太长了。谁能在如此长的时间中忍受住总统任期带来的孤独，抵制住包围着自己的奉承者？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的左派，似乎在言语上变得越来越激进，也越来越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至于右派一方，则在慢慢失去革新的能力，它不断地被那个不负责任的、对自己会在短时期内被赋予治理重任不抱希望的反对派骚扰。

无论这些理由本身如何铿锵有力，它们也无法胜过相反的论据；我心甘情愿、毫不犹豫地接受作为支持吉斯卡尔·德斯坦为候选人的竞选支持委员会要人名单中的一员。自那以后发生的事也没有让我对自己的这个选择感到后悔。1981年5月，让如此多法国人衷心感动的“变化”——左派终于当选了！——几乎不可能获得什么新成果，所有观察家，甚至连社会党人，都在一年的执政结束时意识到了这一点。生产没有上升：需求膨胀导致的是对外国商品的购买。1982年，贸易赤字已经接近1000亿法郎，正如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在最后一次与还是候选人的密特朗对话中预告的一样。当时的密特朗愤慨反击说，右派永远不会理解左派引领的“新逻辑”：经济增长将减弱由通货膨胀和失业反常相结合带来的痛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国际收支赤字让18个月的新逻辑实验走向了终结。我犯了过于乐观的错误。从春天开始，财政部通过冻结

价格而重新实行了价格控制，与此同时，预算部门也减慢了对预算资金的使用。

一位读者反驳我说，右派政府（比如 1975 年）也同样犯过错估行情的错误，这并不足以构成对变革的谴责。左派政府不得不用滔滔雄辩、先贤祠国家纪念仪式和提高对大众的收入再分配来庆祝胜利。而后，它便会回到平淡无奇的现实中，处于世界市场的限制之下，而法国在这种限制下是无法在不贫困化的情况下全身而退的。

左派政府在执政初期所犯的那些错误，我本是可以原谅的：学习成本；因为左派神话的存在而无可避免地让步。它不得不以慷慨赠予来开始自己的统治，即便这意味着它随后必须采取必要措施去充实已经半空的国库。然而，社会党的远期规划也不比近期规划好到哪里去。我在两种规划中看见的都是错误思想的集锦。

为了对抗失业，作为候选人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承诺新设 20 万个以上的公务员职位，换句话说，增加被保护的法国人数量，与此同时处于生产和出口这些前线部门的法国人的数量则维持不变。在不减少日工资的条件下缩短工作时间；实行提前退休；所有这些提议都倾向于平分工作，而不是创造新工作岗位。雅克·阿塔利在就我那本关于 1978 年选举的小册子写成的书评中指责我，说我听任失业，说我在世界危机的糟糕后果面前示弱。而左派却在承认无能中走得更远：增设公务员职位和实行提前退休恰恰表现的是一个公务员政党在才智和精神上的平庸。

比起这些措施的实际的不良后果，它们在象征意义上的灾

害性更甚。在这个法国为了保护自身工业而投入一场艰苦战斗的时刻，左派要出于怎样的荒唐认知才会自认为有必要去让法国人相信，救赎将会奇迹般地随着那些满足了他们私愿的变化一起到来：工作得更少却挣钱更多？与此同时，在出生率低于代际更替水平的情况下，社会党部长力主推行中止妊娠，实施业已通过并宣布的（将改变家庭收支商数的）税收措施。即使不提对“鼓励生育”政策的某种敌意，这一切也显示出一种冷漠无情。就历史而言，实际上是右派而非左派在关心孩子的数量和法国人的数量问题。 909

比慷慨赠予更进一步的是，这个多数党还期望用1936年莱昂·布鲁姆式的国有化来证明自己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什么要对整个银行系统都实施国有化呢？除了具体行动与社会主义和生产资料国有化（实际上是国家化）之间存在一贯混同外，谁也不知道政府的动机。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业群体，而不是其他工业领域？没有人能对此做出合理回答，因为这一选择是任意做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偶然为之，是10年前社会党和共产党进行协商的结果。事实上，国有化，尤其是以这种方式实施的国有化，反映了那种米歇尔·罗卡尔毫不犹豫加以反对的（这对他造成了不利，这也是真的）的陈旧做法。

国有化并不一定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不管怎么说，领导私有集团或公有集团的都是同一些人或同一群人。然而，国有化一旦达到了某种规模，国有化后的行业就会对开放经济的运行形成一种无法承受的负担。

不论涉及的是教育还是卫生，社会主义规划都表达了同一个意思：国家化和工会权力。所有现代社会都已向这个方向倾斜，法国社会在所有工业化国家中也算得上是在这条被托克维

尔称为“监护性专制主义”且有可能导致在人民民主制的道路上走得最远的国家之一。为了让法国人在第五共和国也能体验执政党更迭的滋味，需要付出的代价——当时在我看来太高，而且现在我也依然如此觉得——太高了；雅克·希拉克为了除掉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代价。

910 我已多次指出，在苏维埃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或混合经济）之间并不存在有特色的可行的社会主义。今天，我依然坚持这一断言。密特朗的法国，就其经济制度而言，与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并无不同。国境的开放及对欧洲货币体系的参与迫使政府——无论它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受限于同样的约束；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对欧洲共同体和世界市场的参与，让密特朗的法国和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法国同其他所有致力于逃脱这种约束的国家一样受到了制裁。

社会党人国有化了银行，而这一切又是在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希望保留银行的自主性还是将其用于达成自己的目标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在没有设想任何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就对某些工业集团实施了国有化。部门经济方式取代了插槽经济方式，这是一种不但含糊而且危险的方式，无论在怎样的情况下，都会受到世界市场和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的影响，不能作为一项政策来实施。

人民阵线政府和 1981 年政府之间的相似性，对那些头脑清晰地经历过 1930 年代的人而言很明显。在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施政纲领与莱昂·布鲁姆的施政纲领之间确实有着某些相似。他们都承诺提高大众购买力、减少工作时长及实施社会法案（带薪假期、集体谈判）。尽管人民阵线遭遇了经济挫折，尽管 1936 年选举出来的国民议会投票让贝当元帅在 1940 年获

得了全部权力，莱昂·布鲁姆政府在左派的记忆中，在国家神话中，依然具有特殊地位。让·拉库蒂尔（Jean Lacouture）曾为这位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主席立传，在这部美化程度有时堪比圣徒传记的传记中，他对他的伟人犯下的错误只是略微提及。带薪假期在莱昂·布鲁姆的颂扬者心中比40小时工作制更有分量。

为什么弗朗索瓦·密特朗在重犯莱昂·布鲁姆某些错误的情况下，却没有获得可以与莱昂·布鲁姆媲美的道德成功或神话式成功呢？39小时工作制不但没有得到工会的支持，就连共产党的党内支持也没有取得。舆论则趁此机会揭露，大量的工薪者、雇员和公务员的工作时间实际上已经小于40小时，他们却还去要求减少工作时间，而且他们也实现了这种诉求。右派政府在1958年到1981年与西欧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本质上并无不同。社会立法，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完全可以与其他国家的法律媲美。1974~1981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国家开支部分（公共开支和社会转移）大约上升了7个百分点（大约从36增加至43）。社会党候选人在自己的竞选运动中表明会让国家开支所占比不超出43这个百分点，但实际上已经超出了。1936年，莱昂·布鲁姆有条件同时实现改革社会立法、提高大众生活水平和复兴经济；弗朗索瓦·密特朗却无法这么做，因为他接手的是一个陷入世界性危机的经济体，何况以前的国家管理也与社会党宣传的正好相反，其缺点不在于过分严厉而在于放纵主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执政党更迭能在平静中进行，这显示了法国民主制的成熟。尽管面对的是政权更迭及与资本主义决裂

的连篇絮叨，法国人还是继续既无担忧亦无热情地生活在这一新时期中，好像这次法国的多数党派易手对他们而言并不比英国和美国的多数派更迭更有意义。我们应该把这看成人民的麻木还是睿智呢？这届政府本可以向外界证明社会党 - 共产党的联盟有能力成为相对于右派和自由主义者组成的那个多数存在的另一种常规选择，然而，这个政府在一年之内就犯了如此多的错误，发表了如此多的蛊惑言论，这让它无法再证明这点。

我对横生出来的这个密特朗七年任期并不特别感兴趣。我思考的是法国正在经历的这个社会党政府执政期所包含的历史意义。法国会抛弃自己的抱负吗？法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因为与当局不断对抗的工会权力而动弹不得吗？国家将在什么时候，又将如何从社会主义实验中走出来？这个实验注定是会让英国模式衰落，还是会让法国从那种并非始于1981年却从1981年5月重新加强的国家行政约束中摆脱出来？

回顾往昔，我想起自己写的第一篇政治 - 经济分析文章，那篇文章讨论的就是人民阵线以及它失败的原因。1946 ~ 1947年，我反对的是第一次宪法草案，就是那部最后被选民否决的宪法。对于第二次宪法草案，也就是第四共和国宪法，我由反对转为支持。我从未参与第四共和国的政党争夺，即便是在法兰西人民联盟存在的那个时期也不例外；我在《费加罗报》上发表的那些文章，讨论的都是经济问题——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等。《不变的与可变的》^①一书是根据我1957年在哈佛大学开的讲座写成的，我在其中对第四共和国做了总结，在我看

^① Calmann-Lévy, 1959.

来，这些总结即便放在今天来看也依然公允。我心怀好感地跟随着第五共和国的初期发展步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开始对只由单独一个党派执掌共和国以及因此导致的左右派决斗感到担忧。我在1973年发表的三篇文章中，只有第一篇，也就是《化圆形为正方形》被重印、传播和使用。其他两篇文章都对“逼牌”问题提了醒：一旦右派总统当选，他就会要求国家给他一个他能够与之合作的议会，然后，人们会要求总统与议会多数派取得一致，还会有无穷无尽的种种后续要求。总有一天，选民会拒绝这种逼牌而去尝试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依旧体现为《共同纲领》和社会党-共产党联盟，它就隐藏了对国家本身的损害。

我就阿尔及利亚问题写成的那两本小册子不能说有什么学术价值；它们的目的在于影响公共舆论，它们属于政治行为。《难觅的革命》^①一书无法被归入任何一类——它既不属于学术分析又不属于政治行为：它是本即兴之作，时至今日，读者依然能在其中看到至今有效的分析（我认为如此）、在我身上已不复存在的激情以及我在当时的过度担忧。也许我对法国“政治科学”的最大贡献要数分别发表于《政治科学法国月刊》和《政治学研究》^②上的那两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我通过对民意测验结果和选举结果的同时运用，讨论了选举社会学的齐格弗里德传统；我为社会学分析方法辩护，驳斥了地理分析方法（有些人在今天重新采用了地理分析方法，轮到他们利用各个省份或地区的过去——甚至是很遥远的过去以及这

913

① *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Réflexions sur les événements de Mai*, Fayard, 1968.

② Gaillimard, 1972.

些地方的家庭传统——来解释不同省份或地区的政治倾向了)。

这种对国家生活^①的参与——有时还是很积极的参与——给我带来的既非自负，也非不满。我当时对法国复兴很有信心，特别是对国家现代化和经济增长充满了信心。与其他很多观察家不同，我没有特别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破产倒闭的情况，而是浓墨重彩地描绘了1919~1929年的重建与1930年代的危机加深之间形成的反差。危机的加深是由于连续几届政府（1938年达拉第—保罗·雷诺的政府是例外）的错误所致，这些政府都没能真正明白处于世界大局中的法国的情势：它们在1931~1936年错误地维持了汇率水平不变，实行了让人痛苦的过度通货紧缩，而后的人民阵线又犯了与此相反的另一错误。所有这些都证明马尔萨斯主义就是植根于资产阶级或法兰西民族的（即便国民生产总值在以每年5%的速度增长，让—保罗·萨特依然继续大肆攻击这种马尔萨斯主义）。在正常条件下，法国经济会同其他国家的经济一样地发展，而我的这种乐观看法也为发生的事件所证实。

我之所以笔耕不辍，既非出于学术好奇心，也非出于党派激情。虽然下面的陈述看起来好像已经过时，极端说来还好像是荒谬的，但我还是要说，我从1930年代初开始就是作为公民和爱国者在书写法国，我觉得法国处于将死的危难之中。由于政权的无能以及各党派在山雨欲来时仍然猛烈地互相论战，这种危难愈加严峻。我一直都不认为——甚至在1940年那种

^① 我也就教学问题写过很多文章。

情况下也不认为——爱国主义是可以由一群法国人垄断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Robert Paxton）曾既惊异又带些许愤慨地指出，国家行政主体几乎毫发未损地挺过了分裂岁月，但在法国解放头几个月及解放后第一年中进行的大清洗却从各个方面打击了法国，而且国家尚未结痂的旧伤口也被重新擦开了。服从过维希政府却在1944年之后可以保留公职的军官和公务员比比皆是。如果在伦敦我没有做到从脱下军服那一刻起就像一个戴高乐派那样行事的话，那很可能是因为我对派别性的反感——即便它是最令人尊重的派别。

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采取了黑白分明的立场，不过，与其他人不同，我所写下的文字没有任何一篇是针对黑脚^①的，我既没有批评他们的排犹主义，也没有攻击他们的轻率盲目。他们注定会从1955年或1956年起成为那些超出了他们掌控的一系列事件的牺牲者。他们对这些事件负有部分责任，这是肯定的；如果他们当时就能揣测出事情的结局，他们应该不会那样地加以阻挠。因为他们原本就会失去他们的祖国——那片他们自以为属于自己同时却有一千万穆斯林生活于其上的土地。

当我在1973~1981年用文章支持多数党时，我反对的并非左派本身。就共产党来说，我一直是它的顽强敌人，这不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外国的民族主义政党（我在此引用的是莱昂·布鲁姆的话），还因为它托身的政体让我恐惧。至于社会党，我在不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情况下用文字同这个政党战斗，因为它拒绝汲取20世纪给出的教训而重拾了老思想，并且对一些显而易见的国家利益视而不见。

① 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定居的法国人。——译者注

就这样，社会党被迫做出了导致自己分裂且连它自己都憎恶的决策。我不希望社会党人输掉，也不希望因为他们放下了烦人的经济限制且把意识形态置于优先地位而让我与他们一同失掉法国。人类的前途并不依赖于法国的未来。但是，真正让我担心的还是法国的将来。每当我脑海中的担忧胜过期望之时，我就会想起《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最后那段话：“……（法国）总是比人们预料的更好或更糟……它善于设想宏伟蓝图，而不适合去尽善尽美地实现伟业。”

915 法国的复兴似乎对我们而言，对我们这些老人而言，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还对1940年的沦陷、1945年的废墟和1958年第四共和国的垮台记忆犹新。虽然我无法知道社会主义实验的历史后果，但我还是无法说服自己相信这段插曲会长时间地让我们的国家失去机会。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 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916

卡特胜选既没有让我惊奇，也没有让我失望。我认为换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符合大西洋联盟的利益——不管美国这个“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愿不愿意，它都是承担了这个联盟的领导责任的。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身边先后待了8年后，是否还有足够的威信来有效完成国务卿的职责？接手局面的福特总统曾被理查德·尼克松任命为副总统，而尼克松又是为了免遭弹劾和进监狱的耻辱而最终被迫辞职的；1976年只有卡特与越战和水门事件没有干系。诚然，历史地说，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一样都要对越南的悲剧——它对越南人和美国人来说都是悲剧——负部分责任。但来自佐治亚州的詹姆斯·卡特不属于东岸自由主义权势集团，正是这一权势集团先把美国的军队和威望投入对抗北越的战争中，而后又出于对尼克松的憎恶和为自己辩解的原因，不断残忍地攻击那些绝望地寻求在不投降的条件下撤军的人。

甚至1976年美国对人权的坚决主张，在我看来也预示将要发生令人高兴的转向。在宣传战中，苏联的异见人士反驳了阿连德遗孀的言论；杰拉尔德·福特曾听从亨利·基辛格的建议，将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拒之门外；詹姆斯·卡特则毫不

* 发表于一本名为《评论》的文集中，*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 Commentaire - Julliard*, 1984。

- 917 犹豫地接纳了布科夫斯基 (Boukovsky)。或许, 同样的个性原因还让卡特成功获得国会对他的对外政策的支持。这位实实在在的基督徒会洗清凝固汽油弹的轰炸和中情局的秘密行动给美国带来的污点。这些论据在我看来并不愚蠢, 即便事后看来也是如此。在美国, 总统选举相当于把宝押在一个人身上而不管那个人身边环绕的是哪些人。猪湾事件刚失败时, 我们曾一度相信自己输掉了这场赌博。而今天,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赢还是输: 肯尼迪还没来得及面对他的越南行动的后果就去世了。至于卡特, 我们已经知道我们输了: 杰拉尔德·福特和基辛格应该会比卡特干得更好。

就人权外交的得失而言, 它似乎并非只有过失。在拉美, 右派专制者没有自动转变成民主人士; 但他们至少已经感到, 仅仅满足公开反共这个条件是无法保证自己能够继续获得美国的支持的。华盛顿对异见人士的命运和囚犯的待遇表现出的兴趣很可能可以拯救生命, 减轻痛苦。人权, 在大赦国际和其他这类中介组织的活动下, 受到了全世界舆论的关注。卡特的外交政策不但支持反对权力滥用, 而且致力于说服与美国有友好或联盟关系的政府实施人权方面的改革。

人权外交与美国现实主义政治 (“各国的国家利益”) 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在伊朗问题上显露了出来。沙阿 (巴列维国王) 决定解散萨瓦克^①——至少是从理论上解散——并对政权实施自由化。我们已经清楚此事的后续发展: 正当这个政权试图将权力建立在人民共识的基础上, 并赞同给政权反对者一定的言论和游行自由的时候, 它却遭到了清除。它慢慢在所有

^① Savak, 沙阿的秘密政治警察。

阶层那里都失掉了人心：农民几乎没有享受到农业改革的好处，百货商店受到现代商业形式的威胁，神职人员因农业改革变得贫穷且对现代道德风气满腔怒气，在经济发展中诞生的资产阶级瞧不起帝国王室卖弄古风且受到了西方自由的启发。沙阿在石油带来的数量庞大的美元面前自我陶醉，他被建立丰功伟绩的妄想冲昏了头脑，他订购了最为昂贵的装备去武装用征兵制征召来的军队和那支应该有力量在波斯湾地区实现伊朗和平的海军。美国国务卿赛勒斯·万斯，这位越南综合征的思想囚徒，接受了认为伊朗会发生一场难以阻挡的人民运动的观点。今天的我们已经清楚，卡特总统的所作所为具有不协调的地方，在最后几个月中，他被扯进在根本问题上各执己见的幕僚之间，而就他个人而言，他是一个没有能力在极端情况下做出决策的人。

没有人会否认人权外交存在风险：美国援引人权法案更多是造成自己的盟国而非敌对国家政局不稳。当然，言论也会穿越国境线进入苏联，詹姆斯·卡特鼓励异见人士，他在美利坚共和国与受压迫的人民之间初步创立了一种联盟。然而，这些部分成功终究无法改变本质上的失败。

知识分子以及与大赦国际^①类似的那些组织，如果能够不计行为发生地、政权性质和政权之间的联盟关系而对所有违背人权的行为都一并揭露，他们也许是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任务的（至少可以达成他们的众多目标任务之一）。如果真是如此，他们的行动就脱离了从本质上包含着朋友和敌人的二元性

① 这一组织真的是在诚实正直地达成自身的目标任务吗？我们有太多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政治。道德主义者是不会把友邦国家的警察实施的酷刑折磨与将异见分子囚禁于疯人院的做法区别对待的，他会一视同仁地批判和揭露这两种行为。美利坚共和国的总统是无法这么做的。他可以按自己的期望去对盟国施加影响，却不能把道德主义逻辑进行到底。他被迫表现得伪善。他不可避免地要根据外交走向而对有罪国家所犯的罪行区别对待，这让他无法做到对自己的道德原则一直忠诚。

919 这种区别对待对美国外交的限制比对那些站在西方一边且相对开放的独裁国家——当这些国家出现游击队或爆发内战时，就会有记者，会有成百上千的记者去报道——更甚。这些政权，尤其是除了古巴以外的拉美政权都一直与苏维埃的意识形态统治保持着距离。那里的独裁者通常以大产权阶级为支撑，他们在颠覆 - 镇压这一永无休止的循环中，以及在被世界新闻一丝不苟地予以报道的各种屠杀中泥足深陷。前些年的阿根廷内战和 1982 年的萨尔瓦多内战，看起来似乎比古巴的卡斯特罗政权还要残酷得多。比起萨尔瓦多的现有政权来，我们完全可以从道德和政治上更加偏向于桑地诺在尼加拉瓜建立起的政权、索摩查政权或萨尔瓦多游击队建立的政权。但美国外交则并不一定必须比起桑地诺来更偏向于索摩查，比起萨尔瓦多的军事委员会或右派当选者来更偏向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我想说的是，外交家的选择不能仅仅被道德考虑所支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不能仅仅由盟国、敌国或中立国国内政权的功德过错来支配。

在某些历史时期，外交因无法知晓各国境内形势而变得棘手。其他时候，这种在手段和目标上都受到限制的纯粹外交会让位于一种国际性内战。欧洲不但经历了宗教战争，还经历过

意识形态之战。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国家则并非植根于自身的历史和人民的共识之中；对外的干涉越是增加，在外交上对干涉加以否认的例子也随之同步增加。美国与苏联不同，它无法对自己的“干涉”加以乔装，因为它不能隐瞒任何事情。

而事实上，道德主义者谴责的不是对其他国家的内政实施的“干涉”本身。他抵制的更多是国家具有的那种可以不把国家行为置于国际审查之下的权利。作为个人的保护者，道德主义者会心甘情愿地删掉《国际联盟盟约》中对成员国内政和“国际公法”管辖事务之间做了严格区分的那项条款。然而，道德主义者的行为会再一次与权力的不对称性相撞——一些权力是开放的，另一些权力则是封闭的，而封闭性的权力不仅对公民权利而言总是负面的，而且对个人权利而言也通常是负面的。

920

在我一生的岁月中，权利与国家利益、道德与政治之间出现矛盾的情况一旦摆在面前，我便无法对别人指责我的观点不道德或非道德依然泰然自若。盟军在1939~1945年曾与德国作战，当时却把德国同第三帝国混为一谈。人权阵营毫无疑问在西方，但它即便不情愿也不得不与那些手染鲜血的政权建立联系。当时，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去揭露这个暂时的妥协性联盟。英美在他们首脑的带领下犯下过战争罪行，实施过“地毯式轰炸”，毁灭过德累斯顿、广岛和长崎。他们还向苏维埃当局交出过因为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而拒绝被遣返回国的战犯或流放人员。

1962年，正值导弹危机，肯尼迪总统宣布对古巴实施部分封锁，对苏联向其输送过核武器的、卡斯特罗治下的岛屿实施隔离。美国没有依仗任何被国际社会以清楚或暗含的方式公认的国际法，是美国先在土耳其安置了泰坦火箭，这一行为在

一定程度上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提供了理由——相对土耳其泰坦火箭同莫斯科的距离而言，古巴的导弹更接近华盛顿。古巴 - 土耳其的局面并行存在，这被赫鲁晓夫援引为理由，而在危机过去后不久发生的泰坦火箭被撤走，也很可能是肯尼迪和赫鲁晓夫之间达成的秘密协议。当这件事情正在发生的时候，法学家没有对隔离古巴共和国提出任何异议。他们惧怕的是双方针锋相对的后果，而不是反正是被伪装过了的违反国际法的后果。

921 三场关于外交道德的争论都是围绕美国对越战争进行的。战争的起源：美国是否越俎代庖地替南越共和国发动了一场不公正的战争，或者如果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不是美国干预了那个囊括三圻^①却又分裂成两部分的越南内战？鉴于美国记者在南越当地观察到了违反人权的行为，南越共和国是否真的值得美国去帮助？最后，美国是否由于在这场战争中使用的武器而自身也犯下了战争罪？

从这些对人权、道德，以及外交的不道德或非道德的零散评论中应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当一个国家不但是本国国家利益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整个国家间体系的负责人时，它是不能拒绝妥协式盟友的。如果它对这些盟友施加的压力过大，就有动摇它们的政权的危险，还有可能在德黑兰或萨尔瓦多让完全不关心西方民主的价值的政党获得权力，它们从此以后将不再是盟友而是敌人。这个国家需要综合考虑其他国家的不同制度，但对这些制度的判断仅构成了它的众多考量之一。它不可

① 三圻 (Trois Ky) 指北圻 (Tonkin, 也称东京)、安南 (Annam) 和南圻 (Cochinchine)。——译者注

能对那些同时处于苏联影响和西方或美国影响下的国家的内政袖手旁观。是否插手别国事务，是否支持别国的半壁江山去对抗另一半，是否支持别国的现政权去对抗革命运动，这些都属于机遇问题，也就是谨慎问题，而不属于原则问题。在现政权和革命政权的道德功绩上做比较，这并不对决定起最终支配作用；这种比较带来的是对理智磋商而言不可或缺的其他要素。当西方人极力抵制某些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时——比如诉诸武力、大刀阔斧地用武力创建一个国家或扩展疆域——他们既没有搞错自己的利益所在，也没有侵犯公平正义。但是，当尼赫鲁治下的印度占领了处于葡萄牙控制下的果阿领土时，西方人却没有援引这些原则。甚至当以色列兼并戈兰高地且似乎还要继续兼并阿拉伯人居住的犹大山地和撒马利亚时，他们也没有援引国际法。当阿根廷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时，他们却想起了国际法。

人权政策作为美国的一个历史时期、一种越战的反作用和一种对共和国理想主义的恢复，即便在詹姆斯·卡特获得了连任的情况下也不会长久存在。没有任何“冷血巨兽”会一直遵守国际公法或道德戒律。虽然冷血巨兽们通常拥有彼此相近的手段——强迫、说服、威慑、动摇、引诱、收买、稳定——它们各自的目标却同它们的政体一样互不相同。苏联和美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做出反应的方式也不相同，即便它们都会更加偏向于其他与自己有相似政体的政权。苏联人将他们的专制主义强加于自己的势力范围，美国人则间或会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重建自由。不幸的是，两者之间并非总有明显反差。

922

近东危机，即以色列 - 阿拉伯冲突，近几年出现了新趋

向：一个自称阿拉伯的国家与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定。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从飞机上下来，将脚踏上希伯来人的土地的那一刻，我同千千万万电视机前的观众一样，感受到了这一事件的伟大性。我听了在以色列国会举行的演讲，我为埃及总统的演讲所折服，对北京的演讲却大感失望。前者表现得情真意切、激动万分，这种效果或许仅仅因为他那充满魅力的言辞，北京的演讲则没有达到这一历史性会面应具的高度，这或许是因为翻译不准确。

欧洲人因为这种部分的和平而面露失望之色，他们不断强烈要求制定一个整体解决方案，而在目前看来这似乎还没有可能实现。是出于相信整体解决方案的原因？还是因为他们期望博得除了苏丹和阿曼苏丹国以外其他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好感？在1982年，我们可以说萨达特对耶路撒冷的访问让他自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也是第一个敢于这么做的人；这次访问实现了以色列从西奈沙漠撤军以及一个中规中矩的和平。^① 以色列人严格遵守了条约，至少在涉及同埃及有争执的事务上是这样。有鉴于此，他们证明了自己言而有信——这就等于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发出了邀请。

法国和欧洲共同体采取的立场应该被批评。以色列与埃及实现和平动摇了阿拉伯的抗拒态度，这肯定对整体和平有益无害。欧洲人提出的解决方案——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犹大山地和撒马利亚）建立一个阿拉伯国家——是无法解决争端的：人们是在假设问题能就此得到解决。一个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管理的约旦河西岸国家，即便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作

① 这30年来又成功起草以及签订过多少这样的和平条约呢？

为实在国家而拥有的权利，它也不会带来和平，而只会带来战争。存在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那个政治实体与以色列只可能是共生关系，至少这个政治实体会把自己想成是在重新征服巴勒斯坦全境上迈出的第一步。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声明不会在一夜之间把一个不管怎么说凝聚力都不强的组织——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统一性是靠斗争且是在斗争中维持的——转化成一个致力于与敌人和平共处的政府，何况这个敌人在十几年中一直都被指认为大众憎恨的对象。

923

《戴维营协议》一旦签署——其磋商之旷日持久，让人已经对其最终能否达成无法乐观——我希望知道的便是以后的以色列外交将会采用怎样的路线。从黎巴嫩领土出发与以色列做斗争的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由他们统治的独立国家，如果以色列外交拒绝接受这一点，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不过，从贝京的意图和他的行动来看，他拒绝考虑将约旦河西岸地区——他口中的犹大山地和撒马利亚——置于希伯来国家的国境之外。对古代以色列土地的殖民化并不意味着要对现在阿拉伯人居住的省份实施兼并，这种殖民事先划定了《戴维营协议》中规定的自治限度。当然，这些协议文本没有把自治视为最终状态。5年之后，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最终命运将由人民和条约签署人一起决定。

围绕自治进行的谈判之所以暂时受阻，原因众多；我不认为谈判受阻的责任都在贝京身上。不过，我还记得“六日战争”刚刚结束时我与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众多政界人士的谈话。我尤其记得总理列维·艾希科尔的话：“财富困境”。对那些征服来的土地予以保留？拿哪些征服来的土地进行协商？以色列应该保持1967年已经得到改善的国境状况，还是憧憬

一个囊括了犹大山地和撒马利亚的大以色列？由于没有做出选择，以色列一直保持现状，直到萨达特跨出第一步；不过，在这期间又发生过两次战役，一次是1970年，另一次是险些让以色列陷入大灾的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今天的以色列即便在言语上未表示，在行动上也已经选择了大以色列。

924 梅纳赫姆·贝京没有否认写在《戴维营协议》中的自治承诺，不过，他期望的是能与“温和派”显贵进行商议，并拒绝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对话。在他眼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过是一帮恐怖主义者和暗杀者。以色列治下的阿拉伯人似乎没有倒向温和派的倾向。他们的民族主义随着占领时间的变长——不论这种占领是处于公民政权还是军事政权的治下——而越来越强烈。那些倾向于合作的名流每天都是在拿生命冒险。民族解放运动只能靠清除怀疑派、温和派以及妥协派才能得到它自称是其代表的巴勒斯坦人民的承认。在包括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国家间共同体给予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半承认地位的情况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就更没有协商妥协的动机了。

在乐观主义者眼中，发生在黎巴嫩的事件开启了北方的第二次和平前景，它与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创造且为之牺牲了性命的、由埃及-以色列条约开启的第一次和平相似。或许，以色列人最终还是会通过武力驱逐巴勒斯坦人和进步民兵组织或让他们沉寂无声。或许，黎巴嫩政府能够让这个10年来被内战和外国干涉撕扯得四分五裂的小国重新获得统一。或许，梅纳赫姆·贝京明天会因为他那由武力唱主角的“现实主义”外交而沾沾自喜。他低估了贝鲁特轰击——发生在萨布拉和夏蒂拉的大屠杀——的道德成本，高估了以色列在近东强加以色列式和平的能力。

不说当下，最让人担忧的问题还是以以色列的未来。以色列既民主又军事化，战时它由拿起武器的人民拱卫，它的政治视界中没有显而易见的和平前景（可以说从目前直到 20 世纪末都是如此），就像犹太人曾是“被排斥”的民族一样，以色列是一个“被排斥”的国家，它强迫自己将强权政治进行到底。它与其他被排斥的国家和地区，诸如南非、中国台湾，结成了友好关系。犹太复国主义梦想下的公正之国与强国之间存在反差，这是个根本问题。以色列人会说，这是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诚然如此，然而，如果以色列是一个只由希伯来人组成的国家——即便它是个小国，即便就其国家规模而言它属于过度武装——一切也可以是另一番模样。大以色列疆界内的阿拉伯人的数量到 20 世纪末会与犹太人一样多。以色列的危险会来自内部还是外部？会源自侨居的巴勒斯坦人（或其他国家的阿拉伯人）发起的侵略，还是源自居住在以色列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这些巴勒斯坦人即便从以色列的技术及与占领政权兼容了的尊重个人权利的行政管理中得到了好处，却依然是二等公民——发起的暴动呢？

925

以 20 年或 30 年为期来看，以色列很可能继续享有侨居在外的犹太人的支持，尤其是美国犹太人共同体的支持。我们暂且可以认为，美国在今后会同今日一样有保全以色列的决心，并且在必要时候还会为以色列的存续而战斗。而今日的阿拉伯世界已经被互相对立的各种运动搞得四分五裂，其局势即便在中期内也难以预见。光说以色列 - 阿拉伯战争会继续下去是不够的，这场战争会随着持续时间的延长而势头日减吗？从某个角度来说，它越发严重了。当然，穆罕默德·安瓦尔·萨达特和埃及的先例让前景看起来并非如此黯淡。以色列希望成为耶

路撒冷这座被三种宗教奉为圣城的城市的唯一拥有者。它期望用武力和占领领土来保证自己的安全，与此同时，全世界远程武器的数量已大大增加。它期望将几千年前以色列的摇篮之地也囊括进版图。有鉴于此，他并没有仅限于巩固希伯来人的国家，而是集中了两个民族的人口，这两部分人口从来就没有被统一过。不过，待到和平在整个地区内得以建立之日，他们也将在一起和平地工作。恶性循环：阿拉伯人不接受大以色列，而大以色列又只能在阿拉伯人已在政治上，再在精神上（或以相反次序进行）让步和解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

听说本·古里安曾禁止人们做预见性研究。事实上，如果这个新国家的匠师们当时没有选择采取行动而只是对他们的成功概率进行了计算，以色列也就不会存在了。当今的以色列人还有没有理由去遵循本·古里安的禁令呢？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926

我的一些朋友在 1978 年创建了《评论》季刊，它让我想起《自由法兰西》和《论证》。周围环境促使我沿用了我在前面两份月刊中写文章的形式：6000 字到 1 万字的研究性文章，适当超越当下时事以便让文章在《评论》刊出几个月，甚至一年后还能在外国刊物上翻译发表。这些研究文章中的其中两篇是以整个国家间体系为主题的：《从美国帝国主义到苏联霸权主义》和《苏联霸权的第一年》。其他两篇是对美国朋友的回应，一篇回应了乔治·凯南，另一篇回应了诺曼·波德霍雷茨，后者是由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出资维持的美国月刊《评论》的总编。^①

先让我们回忆一下那些显而易见的变化。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冲突破坏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即便这两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国表面上和解了，它们之间的破裂也不可能得到修复。

* 发表于一本名为《评论》的文集中，*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 Commentaire-Julliard*, 1984。

① 以下是雷蒙·阿隆提到的参考文献：

- 《Mr. X... règle ses comptes avec son passé. L'isolationnisme de George Kennan》(*Commentaire*, 2, été 1978)。

- 《De 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 à l'hégémonisme soviétique》(*Commentaire*, 5, printemps 1979)。

- 《L'hégémonisme soviétique : an I》(*Commentaire*, 11, automne 1980)。

- 《Réponse à un ami américain》[Norman Podhoretz] (*Commentaire*, 17, printemps 1982)。——法文版编者注

927 那些不属于两个阵营中任意一方的国家的数目有所增加，其势力也有所壮大，比如印度。经济方面，欧洲国家和日本从今以后开始同美国对抗。美国相对于苏联而言不再拥有军事优势，相对于它的盟国而言不再拥有无可争议的经济优势。两极体系、大西洋联盟以及两个超级大国之间那种夹杂了默契的对抗，这些情势中还剩下了哪些呢？我曾整体研究过的战后两极世界是否已经成为昨天，对当今世界是否需要做另一番解释呢？

在与这些变化相反的一面，我们观察到了某些不变因素。两个超级大国没有丧失它们的军事霸权。与苏联或美国相比，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国家看起来都像矮子。理论上讲，以欧洲共同体的国民生产规模和劳动生产力水平而言，欧洲共同体毋庸置疑可以成为一个超级组织。而心理和政治上的众多原因却向我们表明，在可预见的前景中，这种潜力无法转换成实际势力。在我看来，从现在到 20 世纪末，美国和苏联会一直实际作为两极或两个超级大国存在（如果撇开一场把两极都卷进去的大战这种假设的话），这是肯定的——即便我也同样肯定不存在任何关于未来的确定主张。然而，它们能用它们的军事机器干些什么，它们能在相互对立及各自支持自己的保护国的局势中干些什么呢？

双方都拥有同归于尽的手段。犹如两个有能力互相用剑刺穿对方的决斗者，这两个各自拥有成千上万核弹头的国家能在一场暴力盛宴中互相摧毁对方的大部分城市。这种同归于尽的图景出现在了理查德·尼克松所谓的“共同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这类美国官方学说中。显而易见，这种威胁没有大的威慑力——不过它也不是完全没有力量，因为战略家不应该排除敌人出于绝望而孤注一掷地做出

非理性的勇敢行为的情况。即便如此，这一设想下的威慑还是更接近虚张声势。而且当虚张声势者不是为自己而是为某个朋友实施吓唬的时候，这种虚张声势有可能会更加缺乏效果。

如果我们唯一能够设想的情况就只有这一简单模式，那么舆论的担心也会得到缓解。实际上，这一模式撇开了两个要素：飞机或导弹不一定要以敌人的城市为目标，它们首要瞄准的是对方的核武器运载工具；核炸药可以装填在大炮炮弹、轰炸机炸弹或导弹弹头中。换句话说，核武器不一定会导致同归于尽或暴力盛宴。核武器出于两个技术原因而趋于平凡：导弹的精确度提高到了如此程度（数千公里外发射误差只有几百米），炮弹或核弹头的爆炸威力又被降低到了如此低的水平，以至于我们可以设想，这将导致武器投放，尽管这些武器不会导致交战国被完全毁灭。

就目前而言，让人恐惧的场景乃是苏联对美国的陆上导弹——1000个“民兵导弹”——实施第一次打击。事实上，苏联拥有360枚SS-18洲际弹道导弹——每个导弹含有8个爆炸威力为200百万吨级的核弹头，每个导弹都可以让多个美国陆基导弹丧失战斗力。美国为实施反击也准备了成千上万的核弹头，它们是装备于潜艇上的北极星导弹和海神导弹，不过潜艇导弹没有安置在发射井中的民兵导弹精确。这种反击将招来苏联的第二次攻击，而这一次就接近“共同确保毁灭”的情况了。

这一场景促成了“机会窗口”（window of opportunity）这一概念的形成。就我个人而言，我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这个概念。似乎里根政府也同我一样，因为这个概念没有包含任何紧

急措施来让窗口进一步缩小；具体而言，就是它没有让导弹免受第一轮攻击的措施。

这一场景并非“共同确保毁灭”框架下的唯一设想。一些法国专家想象了 SS 20 导弹——每个导弹带有三个核弹头——袭击北约防御系统之致命处的情景。在此，人们依然是以外科手术的情形在想象打击，即在既不毁坏城市又不杀死巨大数目的居民的情况下解除敌人的武装。我不认为这种场景在现如今还有真正出现的可能；今天的科幻在明天或许就成了现实。对于接下来的数年而言，我继续相信核武器对两个超级大国而言会是最高诉求手段，美国和苏联将尽可能避免投入那些有可能向极端升级的武装冲突。

这一判断的正确性则因为存在一个重大假设而无法知晓：尽管苏联军事领导人的重要性日渐增长，继勃列日涅夫后的苏联领导人依然忠诚地按照原来的行为方式行事。比起观念上的获胜，他们对扩张和势力的渴望总是更甚，他们也不会舍弃自己的谨慎原则。入侵阿富汗并没有违背这些原则；相反，对西欧直接发动军事打击，虽不一定就会引发世界末日，但这一侵略的后果是没有人能预见的。

在我看来，克里姆林宫领导人越是有其他办法达成目标，这种直接打击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便实现不了对西欧的军事支配，也可以追求实现对西欧的政治支配。伊朗革命除去了美国在中东投入武装力量的主要踏板。一旦沙特阿拉伯或海湾的酋长国受到了来自内部或外部的威胁，美国还拥有怎样的干预手段呢？而如果苏联的影响借革命之势的同时又受到霍梅尼（Khomeyni）伊斯兰或巴勒斯坦起义的启发，并在世界的这一地区占了上风，那么西欧出于石油供应的原因就会依赖那些敌

视西方或本身就属于苏维埃的政府。

我们常常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苏联和美国积攒武器有什么用处。假设这两者在战略核武器水平上保持了均衡，苏联人还是一直维持了一支较美国军队而言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的军队。一方的1万辆坦克自然无法同另一方的4.5万辆坦克相提并论。我们很难再想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其中发生了持续数年之久的坦克战——再次重演。但这并不妨碍这样一种看法在欧洲——很可能也在全世界——流行着，即认为苏联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美国不过位居第二。这种想法影响着各国决策者的思想和决策——包括盟国的国家决策者。美国在1970年代的灾祸发生前，曾同时为西欧的军事安全和原材料供应提供保障。如今的美国已经部分丧失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能力，欧洲的舆论，尤其是德国的公众舆论对这位保护者已经不再像以前那般信任。欧洲人开始向东欧寻求平衡力量的保证，在让自己对苏联有用的同时也想从苏联那里找到能源的替代来源。

930

中国人所说的“苏联霸权主义”是否确切定义了目前的形势？我更偏向于回答：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如果用共产党人的词汇，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里——苏联经济只发挥了很一般的作用，完全不是一个大势力应该发挥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的世界经济中，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苏联的举足轻重，它比起自己的伙伴国——东欧国家和越南——毫无疑问地处于支配地位。它为其伙伴国提供了大部分原材料，其中还包括这些国家需要的能源。然而，这个社会主义市场虽同资本主义市场展开了竞争，却无法超过资本主义市场。前者不仅要向后者购买制造品，而且还要以用美元表示的世界市场价格为参考，以

便定出社会主义伙伴国之间的商品交换价格。简而言之，苏联因矿产资源丰富、石油生产充足、国土广袤、人口众多而确实是一个大经济势力，但它属于一种特殊的经济类型：生活水平低下，对外贸易与发展中国家模式相仿（相对于成品，它出口的是初级产品），管理水平更多处于相较先进国家的优良水平而言的低水平。从这个角度上说，无论将何种形式的霸权赋予它，都会出现某种自相矛盾。

霸权只涉及国家间体系。在中欧，苏联在战术核武器和常规武器上都具优势；它在非洲之角（南也门、埃塞俄比亚）、非洲南部（莫桑比克、安哥拉）和中东也占据了地缘政治要地。苏联向波斯湾或南非丰富矿藏地实施扩张的可能性增加了。但一切又都未成定局。1917年革命为布尔什维克建立世界性帝国奠定了基础，如今的布尔什维克继续在世界性帝国的道路上前进。而且，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布尔什维克扩展了空间，积累了武器。20年来，苏联人建成了一支海军，依理论而言，这支海军仅仅因为美国海军拥有大型航空母舰而稍逊一筹。从数量上讲，苏联军队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保持了世界第一的地位。

当我在1982年春天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是否不得不总结说，西方在实施纯粹防御性政治 - 军事策略的同时便已经不可挽回地输了？我不这么认为。美国在欧洲和近东拥有的实力让（苏联的）任何军事冒险都充满了危险。只要美国和西欧继续保持它们之间的联系，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人便会把对旧大陆直接发起攻击谴责为冒进主义行为。如今的苏联被老人政权所主导，如此情形下，我们只能凑合着把希望寄托在莫斯科寡头政治家的谨慎上。

亚欧大陆的边缘地带^①与美利坚共和国之间的联系有时接近断裂的边缘。联邦德国期望不计一切代价保住与东边欧洲，尤其是与东德之间的联系。当处于里根治下的美国人寻求与苏联人在言语上较量的时候，他们又因向苏联放出的贷款的数额和利率而懊悔不已。不过，既然连美国自己都向莫斯科出售了数百万吨的谷物，他们也就没有足够的威信来教训欧洲人了。在未来的岁月中，一面是苏联的扩张主义，另一面是大西洋联盟的防御战略，我在1947年命名为“和平不可能，战争不大可能”的局面也会因此而长时间持续下去。

我并没有对近35年来发生的变化视而不见。二战刚结束时，这种好战的和平局限于欧洲。苏联在世界其他地方有的仅仅是政治和心理手段、它在各处的代理人以及与它的信仰相同的那些政党。1982年，苏联人却已可以随心所欲地把他们的军事力量投放到世界的所有地方。不过就帝国这一角色而言，932他们还没有替代美国人。事实上，即便在美国霸权盛行的那25年中（1945~1970），美国也并非总能强加自己的意愿于他国，或总能做到根据自己的好恶来解决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武装冲突或非武装冲突。美国没有引领非殖民化的历史运动，它成功限制了这一运动的影响。在近东，它与苏联达成了半默契，制止了以色列-阿拉伯战争。1982年，美国还在对两年前就已爆发的伊朗-伊拉克战争作壁上观；作为调停者，美国也没能成功阻止英国和阿根廷之间那场荒唐战争的爆发。西撒哈拉战争已经持续了多年：法国先是在吉斯卡尔·德斯坦当政时支

① 边缘地带（Rimland）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地缘政治学中相对于心脏地带提出的概念。此处主要指西欧。——译者注

持摩洛哥，后又变成中立，最后于弗朗索瓦·密特朗当政时偏向于阿尔及利亚一方。军事上的双头垄断局面依然存在，却从未像如今这样在两大势力范围内隐而不显。南北对立没有替代东西对立。对西方人而言，除西欧在原材料供应上承受了变数，他们的主要威胁来自苏联的意识形态统治政权，它不把本国工业主要用于人民的福祉，而是用在扩充军备上。说到意识形态威胁，是因为苏联人又火中取栗，成功地利用了第三世界对不求进步的寡头政治的反抗；说到军事威胁，是因为苏联即便没有发起它完全有手段实施的攻击，却也玩弄了恫吓手段。

两个超级大国继续互相对抗，它们时而几近串通，时而争斗不息。两种情形如此这般交替进行的情景，至少部分地说，只是观察家尤其是欧洲人的想象。对苏联方面而言，串通是一种战术；对西方而言，它则是一种幻觉。在1970年代，也就是正当尼克松和基辛格为了脱身越战、缓和局势，从而签署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第一轮协议及发表良好行为声明的时候，苏联势力比其他任何时期都获得了更大增长。它给北越提供用以侵略并摧毁南越共和国的武器时，没有显示丝毫的吝啬。东西方冲突常常发生在南方内部，换句话说，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内部，这些国家被急躁不安的穷人和自私自利的富人搞得四分五裂。比起在全世界四处传播、导致西方工业国家同苏维埃国家相互对立的势力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来，那些被我们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群众的命运，长远看来可能会对人类未来有更大的影响。在我们的时代，自由制度的存续才是世界性历史的利害所在。

另一种威胁的影响——核武器的威胁——也同样重大，西方人一方面实施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又在力图消除这种威胁。

争论依旧不断，但它们也因技术革新和力量对比的改变有了些许翻新。导弹能够精准命中几百米远的目标，强型辐射武器可以避免摧毁建筑且把破坏局限于有限空间。核武器的爆炸威力高可达千万吨级，低则可以控制到比最有威力的化学炸弹更低的水平。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法完全解除对方的武装，不过，所有最精确的陆基导弹却是有可能变得易被摧毁。一方面，一些专家强硬坚持这样的论点：对核界限的逾越无论如何都会导致向极端情况升级。而另一些专家则试图驾驭巨兽，并设想如何能无灾害地运用核武器。两方专家有着同样的目标：避免出现世界末日。但他们的方法却相反：他们要么预告说第一颗核弹的使用必将开启无可避免的大灾难，要么教导国家决策者事先就对在向极端升级的过程中于何处喊停加以思考，哪怕在向升级的过程已经启动的情况下也要思考。

迄今为止，所有这些精妙构思都脱离了事件本身：没有任何场景被证明是与现实相符的。法国人说服自己相信让核威胁变得可靠的最好办法就是事先宣布拒绝战争。处于武器阴影下的这种和平——这些武器只能作为一种负面存在而起作用——能否无限期地延续下去呢？从对大势力之间的通过战争所寻求的和平以及对无核国家之间小型战争的首批分析和研究算起，35年过去了。今天的我们并不比昨天更清楚这种半和平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1970年代，美国的两次轰动性大失败——北越征服南越和伊朗帝国政权陷落——动摇了整个国家间体系。美利坚共和国放弃了那些与它命运有所牵连的政权；美国国会在1975年武元甲部队出发进攻西贡时禁止了美国总统对此进行干涉；而且，当在被癌症侵蚀的沙阿（巴列维国王）开始丧失决策能

力之时，詹姆斯·卡特也无力替代他或向他推荐一种本可能救这位统治者于水火的战略。

这两次失败，尤其是第二次，影响了美利坚共和国的信誉，还影响了力量的区域平衡。美国因为被剥夺了在伊朗的基地而丧失了波斯湾地区捍卫自身利益的全部或部分能力。更糟的是，美国似乎出于本身政体的原因以及基于人们众望所归推选出的那个领导人无法胜任的原因，从此以后不再有能力完成二战加诸于它、后来在 1/4 个世纪中也有力地承担了的任务。

尽管发生了这些偶然事件，而且它们大多是对苏联有利的，这种对峙的自相矛盾之处依然存在。克里姆林宫的人继续努力将全世界所有种族和所有肤色的人与国家团结到自己旗下。即便马克思主义在巴黎知识分子圈中不再时髦，它也依然对知识分子以及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各国人民充满了吸引力。另一方面，即便苏联对支持它的那些国家进行了武装，却没有为它们提供供给。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那些自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国家刚解放时就获取了权力，但国家还是因为意识形态和部族之间的争端而依旧四分五裂。除了武器，这些国家没有或几乎没有从苏联那里得到其他任何东西。胜负尚未分出。我们已经知道光靠国民生产总值的统计数据是无法赢得战争的。但是，我们也还不至于认为，那个对自己的坦克军团洋洋得意而其人民却在贫困和奴役中倍受煎熬的国家会注定取胜。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935

1950年代，人们围绕共产主义和苏联社会的性质问题辩论不休；1960年代，人们出于对工业社会的疑惑而展开论战；然而到了1977年，这些辩论都已经成为历史，参战的积极分子没有了，辩论无声无息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分子从此销声匿迹，他们在中学，甚至在大学里仍然有不小的力量。在巴黎的“上层知识界”，这种人却是寥寥无几。近年来的明显趋势是，那些年轻的评论家又回归到早期或更早时期盛行的反共立场上。人们没有放弃对技术开发、环境污染、水泥堆砌起来的的城市以及兴建核电站进行谴责和拒斥。这一斗争仍在进行着，与现代文明对立的人确实是在揭露我们社会中的弊病和现实的灾难。但是，与这些反抗者持有相同观点的“大知识分子们”并不把“生态主义”与哲学相提并论。1960年代的左倾思潮依然活着，但是左派分子却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党，一部分人加入了社会党，还有一部分人一改过去的坚定立场，转而加入了捍卫人权的斗争，此外，另有极少数人似乎热衷于直接的行动。

巴黎知识界并不因此对思想论战产生忧虑，尽管这些论战直接或间接地产生着影响，但毕竟只局限于在期刊和杂志上进行讨论。我首先想到了“新右派”。它的首领、发起人和最杰出的代表无疑是阿兰·德·伯努瓦（他曾以不同的笔名写过

许多文章)。他由于《右派眼中的世界》一书荣获了法兰西学院大奖，从而引起了人们对他主办的两本杂志《新流派》和《要素》的关注。

阿兰·德·伯努瓦的工作班子并不掩饰他们的动机是再次从左派手中夺回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权，即便是在被称作右派分子之人掌权的情况下，也要坚持夺回仍旧掌握在左派手中的思想领导权。就这一点来说，我同意他们的观点。除了法兰西行动派的残余分子和几乎不露面的法西斯分子或国家社会主义者，差不多所有党派都自称信奉左派思想，即自由和民主思想。社会主义者指责右派政府没有减少不平等的差别（主要是收入的不平等），而右派代言人却没有反驳，或者没有理直气壮地反驳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等级差别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有必要的。“新右派”坚决反对传统的民主-自由派，而我则问心无愧地承认自己曾是这一派别的理论家之一。当然，我不否认在阿兰·德·伯努瓦喜欢评论的作家中，有些人（如马基雅维利和帕累托）是应该加以评论的。我拒绝使用那些真正信仰民主的人喜欢使用的文笔来介绍西方社会。我不作诗，不自我陶醉，撕破了遮掩着党派之间的对立的面纱，道出了国家之间的斗争的真谛。阿兰·德·伯努瓦喜欢某些哲学家的观点，比如卡尔·波普尔爵士，我觉得自己同这个爵士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总的说来，阿兰·德·伯努瓦在政治上的见解使人不由地联想到法西斯分子和国家社会主义者（我无意指责他们是他们中的一员，我是说他的思维方式常常同他们不谋而合）。

以阿兰·德·伯努瓦最近写的一篇关于美国和苏联问题的文章为例，他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宁要苏联的警察，也不要布

鲁克林区的汉堡包。这样一种选择除了表示美国化是万恶之源，还能说明什么呢？要使这种主张具有某种意义，就必须接受这个观点：美国主义销蚀、排除、压迫和取消习俗和信仰的特性，而苏联的统治只是使国家丧失其独立性。前者将剥夺人民的文化，后者还有可能将其保留下来。

在阿兰·德·伯努瓦使用化名写的一篇论文中，他揭露在美国出现的反对权力的抗争。这种抗争产生出美国的非文化的典型特征：助长了金钱至上风气的原则上的平均主义；对高级准则的不重视；形式和风格的丧失。“新右派”厌恶的是“重商主义”，其概念与16世纪和17世纪以同一名称标立的思想流派没有多少联系。在所有的现代社会里，生产和由它带来的消费是君主和公民（或臣民）最关心的内容之一。历史上的君主们为了享乐和炫耀他们的光荣，大肆挥霍国家的剩余产品，其程度是今天的民主社会中那些“精英”望尘莫及的。然而，有时君主宁可贬辱其亲王之脸，也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同时根据传统、出身、裁决宝剑，当然还有上帝等并非平淡无奇的原则来建立他的合法性。当然，贵族社会在口头上表示蔑视与贸易、生产、交换有关的一切价值，但是它在行动上并不摒弃物质财富和奢华。它既不创造财富，也不与其他人平分财富，而是独自占有财富。在我们这个世纪，一个崇尚武功而轻视店主利益和诅咒科学的非重商主义社会，将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企图以极权方式进行统治的政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颇有教育意义的社会图景，在这种社会里，统治者是一个为实现某种“宏伟计划”而工作的“精英”。然而，他对人间福禄是无动于衷的吗？在法西斯的意大利，在希特勒的德国，在斯大林或

勃列日涅夫的苏联，腐化堕落现象已司空见惯，盛行成风，其程度远远超过了“财阀统治”。那些企图垄断思想领域的党内骨干分子有时也做出自称为雄武英勇的表率，但是反对派和抵抗组织的中坚分子并未在勇气上比他们逊色，贵族社会只有在贵族战争舍君莫属时才说得通。一旦全体人民都参加了战斗，参战者有时相隔数十公里、数百公里或数千公里，他们便向空中发射追寻目标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懦夫和勇士，但是不会出现理应掌握政权的精英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世纪，少数暴力集团的威胁依然存在。这些由盗贼和流氓组成的暴力集团，嘴里叫喊着伟大和高尚，一些思想流派便辱骂痛斥民主与贸易，充当他们的开路先锋。

“新右派”的非重商主义理论家们也揭露平均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们重新捡起了达尔文的论点，或者更为常见的表现是鼓吹生物学的论点，而这些论点在19个世纪末是信誉卓著的。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情况来看，任何人也无法严格地判断出遗传和环境的因素在一个人的性格和事业中究竟占多大的比例。这些狂热的平均主义者主张取消遗传因素，主张把人完全看成社会的产物，他们纯粹是在胡说八道。无论是身体上的、艺术上的，还是智力上的特殊才能，都贮存在遗传基因中——虽然基因只有在环境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充分发展和显示出来——我对此是坚信不疑的。在一定的人口，个人的遗传系统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这些差别又导致了不平等。通过测验测出的智力不平等是否就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呢？为了避免争吵，我们姑且把通过测试反映出来的能力上的差异，至少部分地归结于遗传因素。

如果我们从人口内部的个人差别过渡到假定的社会阶级和

种族的差别，那么就会出现更多疑问。整体的比较会引出两种不同论点，造成两方面的混乱。在测试一个阶级的平均智商（或画出它的智商曲线）时，测验不可能反映出不受任何环境影响的纯智力水平。此外，这些测验所反映的能力无法确定人们的全部性格，测验也无法区分各种各样的思想类型。

“新右派”出于无法掩饰的思想意识方面的用心，常常运用生物学的论据。民主主义者则倾向于把权利平等与先天才能上的平等混为一谈，从而为一种科学的驳斥提供了口实。而下列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不平等与测试所反映的智力差别并不相符，智商最高的人不一定是身居要职或享有最优厚报酬的人。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划分，精英人物（或身居要职的少数人）并没有提出遗传学上可以划分出等级的理论根据。

939

第三种观点，即人种学与文化的多样性，同前面的两种观点是吻合的。阿兰·德·伯努瓦似乎并不把人种学及其民俗学的多样性——主要是历史的多样性，无论其起源如何，这种多样性引导人们去信奉多神教——建立在遗传学的基础上。

难道是对平均主义的厌恶才引起阿兰·德·伯努瓦对犹太教徒和基督徒信奉一神教的反感吗？基督徒的罪过是承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基督教徒长期容忍了奴隶制，而且时至今日，南非的基督教徒仍然对反对种族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表示忍让）。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被基督教摧毁的多神教时隐时现，并且还有人怀念。有些人怀念多神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真主，有些人向往罗马帝国是因为它接纳了被征服的人民所崇拜的偶像，然而在耶稣诞生后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又有谁是自愿做异教徒的呢？历史学家们一直在研究罗马人信奉本家

神祇的感情和他们的信仰的性质。是什么魔力使包在究龙绣蟒的裹尸布中的神又回到了现实生活中？

阿兰·德·伯努瓦引用多神教来攻击那些拯救灵魂的宗教，因为这些宗教既取消各种文化的独特性，又激起了十字军的愤怒。教徒以他们唯一上帝的名义，怀着握有唯一真理的血腥信心，用他们的蔑视和仇恨谴责异端分子。犹太教徒在几个世纪中因弑神罪而受到迫害。他们固执地信奉他们唯一的上帝，甘愿做其俘虏，拒绝加入罗马帝国的基督信仰合一运动。这一错误使他们又遭受罗马人的虐待。从这个侧面，阿兰·德·伯努瓦又表现出一种似乎同他理想的其他方面相脱离的宽容。

直到今天，“新右派”禁止自己做纯政治观点的宣传，不允许自己对民主政权妄下判断。反对平均主义的立场使它走向右倾，但是这种右倾与乔治·蓬皮杜的右倾毫无共同之处，与
940 吉斯卡尔·德斯坦的右倾更是相去甚远。在阿兰·德·伯努瓦看来，主张民主自由的右派只不过是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和美国的
重商主义包上糖衣后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新右派”的立场同法西斯分子和国家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十分相似，“新右派”既讨厌民主自由派，也厌恶平均主义的社会主义。我再次强调，“新右派”最终宁愿要莫斯科也不要华盛顿。

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即从逻辑上分析，“新右派”的理论一旦取得主导地位，必将导致一种多少有些专制但绝非民主的体制？对此，我很想做出肯定的回答，但不免仍有犹豫。我拒绝自作主张地给一种形而上学理论的蕴涵下结论。从形而上学向政治转变，很少受硬性逻辑的约束。阿兰·德·伯努瓦会这样说，他的异教徒式的宽容与那些极权党派所向往的

思想垄断势不两立。即便如此，对民俗学的兴趣，对平均主义的憎恨，对美国的指责，在民主社会中对英雄主义的崇拜，以及运用生物学的题材留恋虚构的、借助历史的画面等，凡此种方法是不会有任何结果的，最多只会形成一种宗派，至于为不为害，则要视局势而定。

有些犹太人和犹太人团体的官方机构常常攻击阿兰·德·伯努瓦的“新右派”，指责它有国家社会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他们还建议政府封闭它的喉舌，借口是它触犯了禁止以口头或书面形式煽动种族仇恨的法令。主张对“新右派”进行审查的犹太人搞错了。阿兰·德·伯努瓦是否出自内心地仇视犹太人呢？我不得而知，这对我也无关紧要。在他最近几年发表的文章中，我找不出证据，他自己也否认这一点。为了使文化具有丰富的多样性，他是主张维护残存下来的地区文化的，其中为什么不包括维护犹太教的独特性呢？总而言之，以阿兰·德·伯努瓦的聪明，他总不至于不懂得纳粹分子由于使用了毒气而遗臭万年。他的某些观点越是接近1920年代、1930年代德国的右派革命者或国家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他就越远离排犹主义的立场。^①

发生哥白尼街凶杀案的第二天，电视台二频道的一个记者 941
就这个事件的起因和责任对我进行了采访。他试图让我把话题转到“新右派”的知识分子身上。我粗暴地回答说，我不会容忍这种东拉西扯的说法。反对阿兰·德·伯努瓦思想的人应该以思想来战胜他，而不是用大棒和硫酸。我还说，思想有其

① 关于“新右派”的问题，我写了一篇两页的文章，刊登在《快报》1977年6月21~27日刊上。

危害性，但是自由主义的美妙和虚弱之处正是它不禁止畅所欲言，即便对危险的思想也是如此。

我对“新右派”的立场使我接触到另外一个良心问题，即在谢世之前，除了对我自己毫不隐晦的犹太信仰，我对犹太组织、一代新犹太人和犹太复活运动诸问题采取的是什么立场？在前面谈到“六日战争”和戴高乐将军举行记者招待会那一章中，我已经非常坦率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然而1967年以后，历史并没有停止发展。自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以来，犹太人团体由于大量定居北非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犹太人的大批涌入而不断扩大，并且发生了变化。“法籍以色列人”的子孙对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们的慎重——被前者称作胆怯或者谨慎——嗤之以鼻。多米尼克·施纳佩尔对今天的法籍犹太人进行一次调查，他根据他们对以色列的态度，对接纳国的看法（按以色列犹太人的说法），以及对政治运动的主张对他们进行了分类。

我只有一次机会谈论了自己对贝尔纳-亨利·莱维的《法兰西意识形态》这本书的看法，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新哲学家”没有触及我个人。他们在研究哲学的方法上没有什么独到之处，与现象学家、存在主义者或分析学家都不能相提并论。他们写的论文不同于学院的标准形式。“新哲学家”的成功靠的是新闻机构的宣传，得力于在今天的巴黎缺少一个公正的、令人信服的评判。他们人人都通过了哲学教师职衔的考试，但谁也没有追随过萨特或梅洛-庞蒂。有些人曾信奉过阿尔都塞，尽管后来又背离了他，但从来也没有否定他。“新哲学家”首先引起轰动的，是他们彻底反对苏维埃主义，甚至

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我没有任何理由同他们论战。如果对自认为是代表新生事物，或让人们相信他们是代表新生事物的青年人或年轻人进行攻击，并以此来结束自己的晚年，未免有些荒唐。况且，这些青年人并没有错。他们对时代的不幸，即像我这样年纪的人在过去经历过的不幸和今天我们共同经历着的不幸，有着独特的感受和反响。但是，J.-M. 伯努瓦、A. 格鲁克斯曼和B.-H. 莱维突然介入围绕苏维埃主义展开的政治辩论，这使我“目瞪口呆”。无论是《马克思死了》《炉灶与食人者》，还是《人面兽行》，都没能加深我对马克思、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苏联的任何了解。我虽然尊重 A. 格鲁克斯曼，并对其极有好感，但是我不大喜欢他的《思想大师们》——作者在书中抨击了曾使他受益匪浅的德国哲学小册子。

我没有对《人面兽行》这本书进行过过多的讨论（除了在《评论》杂志上引用了书中的一段话，并说了几句俏皮话加以评论）。另一本书是《上帝的遗嘱》。书名和全部内容都过分自负，作者假装渊博，他对耶路撒冷和雅典下的不容分说的断语，使我难以欣赏这种华丽辞藻的魅力。这种浮夸的修辞方法受了马尔罗的影响，既吸取了他的某些特长，也继承了一些不足之处。

当时的情况要求我对《法兰西意识形态》一书加以评论。我通过电话告诉让-弗朗索瓦·拉威尔，依我之见，这是三本书中最出色的一本。同时，我建议他不要把这本书列为《快报》周刊的每月一书。在三本书中，《法兰西意识形态》是最出色的吗？也许我错了。也许《上帝的遗嘱》无论怎样也应得到更高的评价。我应该说的是，这本书触到了法兰西意识的敏感点。与前面的两本书不同，《法兰西意识形态》涉及一个

与当前有关却又是一个令人争论不休的历史问题，即维希政府的来龙去脉。

94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维希政府使法国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在所有被占领国中，唯独维希政府始终要求德国承认其合法性。它爪牙并用，与占领当局违约越权的行为做斗争，以至于主动要求对它自己所做的有损其形象的行为（如流放犹太人）承担责任。维希政府的领导人将 1940 年和 1942 年的外交选择置之度外，公开宣布了一种独立于占领国意志的纯法兰西理论。维希政府的思想体系从何而来呢？它代表的又是哪些人的利益呢？同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佛朗哥主义和萨拉查主义相比，我们又该怎样评价它呢？

此刻还不是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在朋友们的恳求下，我写了一篇评论《法兰西意识形态》的文章。我的朋友多数是犹太人，他们由于书中的观点过激而对这本书表示十分反感，同时他们又担心会发生误会。他们不希望人们把莱维——他曾揭露过莫里斯·多列士和贝当元帅所共同持有的法兰西思想——看作犹太人团体的代言人。有多少法国人没有受到文学咖啡馆里富基埃-坦维尔的控诉呢？

B.-H. 莱维在对我的文章进行反驳时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犹太人对某些官员持保留态度，难道就是懦夫行为吗？我已经讲述过，在 1937 年或 1938 年由法国掀起的如何对待希特勒德国的辩论中，一个没有任何排犹思想的朋友是怎样劝告我要“节制”行事的。以色列国家的存在虽然不同于希特勒前期的德国，却同样提出了双重国籍的问题。

没有经历过 1933 ~ 1945 年的犹太人常常以高傲的态度对

待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因为后者心有余悸，害怕“引起排犹主义”。在他们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甚至是可鄙的。正如朱利安·班达所写的那样，排犹主义是出于仇恨的需要，它来自一种欺侮人的欲念，与犹太人本身的行为无关。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自己必须保持谨慎，就等于承认犹太人同其他人之间存在差别。如果一个人自认是法国人，如果他同自己的同胞一样都是法国人，为什么就任何事件发表意见时还要犹豫不决呢？

这一推理将能证实今天的犹太人是否愿意统一，他们的犹太信仰是否仅仅停留在精神范畴内。因此，当犹太人的意识把犹太人同以色列联系在一起时，尽管以色列有其种种特点，但它依然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非犹太血统的法国人就有权利要求他们表态，他们究竟属于哪一个政治集团？只要人类还分属于一个个独立的“强权国家”，流散在异国他乡的犹太人就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并且必须在以色列和已经成为他们第二祖国的“接纳国”之间做出抉择。身为法兰西共和国公民的犹太人有理由在精神和思想上保持与以色列人的联系，但是，如果同以色列的这些联系发展成为政治上的，并且超出了法国公民资格的范围，那么他们就应该理智地选择以色列公民的身份。

944

B. - H. 莱维激烈而又不太合情理地揭露了所有那些以各种方式表现出自己在思想上接近维希政府、反对革命、反对犹太主义、鼓吹社团和行会主义等倾向的思想家和作家。法国的土地和法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使法国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和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莱维却指责一切这样赞扬法国的人。他只接受一种法国，那就是 1789 年的法国，由联盟及各个行省自愿一起向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进行宣誓的法国。人人在权利和义务上都是平等的。B. - H. 莱维唯一热爱的法国是它

的子弟们自愿建立的法国，这样的法国同 B. - H. 莱维对它的热爱是同样抽象的。的确，法国作为人权的故乡和大革命的发源地，在整个 19 世纪遭到了许多法国人——也许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的否定，排犹主义在我们国家同在德国一样到处泛滥。泰奥多尔·赫茨尔本已同当地人打成一片，对犹太问题不再关心，倒是德雷福斯事件唤醒了他的犹太人意识，激发了他的犹太复国主义。此外，还有机构体制，甚至民主自由派的思想基础，也遭到 1930 年代盛行的随笔作者们的严厉批评和唾弃，并且被他们打得粉碎。罗伯特·阿隆、阿尔诺·当迪厄和埃玛纽埃尔·穆尼埃对财阀统治的民主派的憎恨方式，有些近似法西斯分子。维希主义在其初期不仅受法兰西行动派的影响，也受这些小团体和“思想集团”的影响，而这些组织对精神生活的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但是，这些组织在战前不过是些边缘组织，它们当时尚未开始从事纯政治性的活动。

945 法国的独到之处，不仅在于国内盛行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相似的各种思潮，而且也在于这些思潮从没有煽起过一种真正的法西斯主义或者国家社会主义，甚至也没有导致过右派专权的严峻危险。只有占领时期是个例外。在法兰西学院，排犹主义悄悄地涂上了受人尊敬的色彩。法兰西行动派和莫拉斯成为海军军官、外省的乡绅和巴黎大部分资产阶级社会的思想宗师：无论是来自“火十字团”的拉·罗克上校的党^①，还是雅克·多里奥的党，都达不到危险的程度。德雷

① 尽管表象于他不利，德拉罗克上校却从来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从德国流放回来便坐牢。戴高乐将军写信给他的家属，对这位公民、这位爱国人士表示了敬意。

福斯事件证实了法国这个实体既抵制得住排犹主义和“虚假的爱国主义”，也抵制得住邪恶的毒害。我认为，我们的国家在1930年代对右派的革命是很反感的，从于勒·费里（Jules Ferry）时期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的教师也都站得很稳。他们的爱国主义在20世纪初就深深地扎根于革命，扎根于人权论和理性主义之中了。法国不乏法西斯或准法西斯主义的思潮，所缺少的是准备接受这种思潮并愿为之奋斗的群众。

无论是埃玛纽埃尔·穆尼埃，还是于贝尔·伯夫-梅里，在1940年都未接受戴高乐主义的立场。这种立场就是简单地认为：战争在继续，法国的战败并没有决定斗争的结局；现在必须进行战斗，改革法国的时机还没有到来；在占领者的鼻子底下搞改革，不等开始就会丧失人心。1930年代的这伙“新哲学家”同大多数法国人一样，并没有立即用回顾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曾认为是比较好的态度。一个负责审判嫌疑分子（这些人没有马上唾弃贝当元帅，只是在1943年才参加游击队）的年轻而又擅长辞令的宗教裁判官，至少应该理解人们对腐朽的第三共和国的愤愤不平，理解人们所向往的是一个不被老态龙钟和大腹便便的激进派们所充斥的共和国。

B.-H. 莱维的书不配引起所有这些论战，但此书在某些社会阶层中产生的影响却发人深思。随随便便引用书中的语句倒也没什么。令我吃惊的是，欣赏这本小册子的犹太人对他们的“接纳国”所表现出来的情绪，以及对法国和法国文化的广泛指控。此地和其他地方的一代年轻犹太人难道终于开始憎恨他们所选择的国家了吗？

946

我们不谈这本书了，它已经占用了我太多的时间。我联想起组织成别动队的那些年轻犹太人，他们把一个新纳粹集团的

头领弗莱德里克森 (Frederiksen) 痛打了一顿, 并用硫酸攻击了一个老实无辜的公民。这个公民同排犹主义毫无关系, 只因与弗莱德里克森同名就白送了性命。这一错案败坏了别动队的名声。他们的手段引起了人们广泛的非议。舆论认为, 那些积极分子尽管毁了犯罪分子的脸, 他们依然是不可饶恕的。人们会指责我的思想是个大杂烩: 一方面否定法国文化的整体性, 另一方面却主张使用暴力反对排犹主义。不能把这两种精神和物质的行为混为一谈, 但是它们可能出自同一个根源, 这就是虽然出现了德雷福斯事件, 但法国是第一个给犹太人自由的国家。到了 1940 年, 法国却又成为西欧民主国家中唯一一个在没有占领当局的压力下主动制定管制犹太人的法规的国家, 而这个法规是根据国家社会主义者们曾颁布的法规制定的。

在全世界, 大多数受到种族灭绝创伤的犹太人已经恢复了那些他们被同化时所丢弃的犹太意识。在法国的犹太人也受到了维希政府的伤害, 尽管他们在法兰西共同体的处境相对来说要好一些。其中部分原因^①应归于非占领区的存在。然而, 让犹太人更感到伤心的不是管制犹太人的法规本身, 而是社会上的司法法庭和道德法庭的表现。更明确地说, 是法国人对制定这项法规根本无动于衷。行政法院在解释和执行这个法规时, 也把它与其他法规同等对待, 似乎法学家们对违背共和国原则的法律可以与随便一项政府决定等同视之。

① 在法国, 受到种族灭绝迫害的犹太人的比例比荷兰和比利时等其他西方国家都低, 但是我不愿意就这一事实而介入一场争论。也许是因为存在一个非占领区, 也许是因为有了维希政府而因祸得福, 或者尽管有维希政府也不过如此? 我认为, 区分这个问题的两个因素并不是做不到的难事: 一方面, 非占领区的存在对犹太人有利; 另一方面, 这一点也并不能全部归于维希政府的行动。

我遇到一些年迈的和年轻的犹太人，可以这样说，他们因为法国曾制定了犹太法规，以及法国警察根据维希政府或占领当局的命令在冬季赛车场进行大搜捕这两件事而记恨法国和法国人。既然他们不肯原谅法国，那么法国也就不再是他们的祖国，而是他们能够舒适地生息之地。对于那些无法开始新生活的上了年纪的犹太人来说，这种态度是很正常的。但是，那些根本就不关心他们的“接纳国”、他们第二故乡的命运的青年人，为什么不去当以色列公民呢？我常听到这样的回答：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同那些从不扪心自问的法国人相比，对法国态度苛刻的犹太人难道不是对这个国家的热爱更加深切吗？这是可能的，但是，这些感情由于长期的压抑，最终便会消失。

1970年代后半期，控制宣传媒介的“大知识分子们”或知识官僚们，终于公开放弃了半亲苏立场。他们有时仍然支持左派的联合，但是他们不再崇拜革命了。他们更经常地把赌注押在社会党上，认为只有它能够用左派多数派来取代右派多数派。在这种气氛下，我最后一次见了让-保罗·萨特。

布瓦依埃尔夫妇发出了“越南难民之船”的倡议。我要对这对从前信仰毛主义的夫妇说句，我内心尊重他们，并把他们视为朋友。他们合写的《第二次从中国归来》以其真挚的笔调打动了我，我给他们写信说了我的看法。他们的第二本书《石头的信仰》更使我吃惊。在这本书里，他们以个人见解揭示了众人称为信仰的秘密。“相信某物”意味着什么呢？斯大林主义者、毛主义者又相信什么呢？如果他明天改变了自己的信仰，那么他对一些事物又该做出何种解释呢？布瓦依埃尔夫妇在回顾以往时，揭露了被控制的意识、沉默的策略和信徒伤

残自己身体的真实情况。我和苏珊同他们两位见了面。苏珊和克劳蒂娜·布瓦依埃尔夫人一见如故。奥利维尔·托德和安德烈·格鲁克斯曼也马上表示声援，支持人道主义行动，营救逃脱越南政权的难民，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这个行动。在绝望的海洋里，一条营救船和几个令人钦佩的“无国界医生”干得了什么？这种想法只能叫我们大家束手无策。这个“行动”本身是否有一种政治意义？当然。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政权迫使成千上万名男人、妇女和儿童冒着生命危险，乘着小船在海盗横行的大海上漂泊。这些人的出逃是为了寻找自由。

营救难民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的行动，可以说属于国际红十字会的活动范围。有人告诉我说，格鲁克斯曼已经说服了让-保罗·萨特。当我来到营救难民行动记者招待会的几分钟后，萨特在格鲁克斯曼的搀扶下也来到会场。我当时坐在座位上，向他转过身去，格鲁克斯曼对萨特说了我的名字，我们互相握手，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我们之间很熟的话：“你好，我的小同学。”他当时不是回答了一句“你好”，就是什么也没说。这张我们握手的照片后来被 100 多个国家买去转载。

克洛德·莫里亚克对这次会面做了如下描绘：

格鲁克斯曼在萨特耳边说了几句话，这时雷蒙·阿隆向萨特伸过手去，萨特面无表情地握了他的手，既无敌意，也看不到热情。阿隆显得有些紧张尴尬，既不安，又高兴。我侧耳倾听，听到雷蒙·阿隆说了三四句欢迎的话，但是只听清了其中的一个词，“同学”，也可能是“老同学”，这个词使我感到吃惊。在他们分道扬镳如此之久

后，这个称呼显得流于俗套，不够味，别扭，然而仍然令人感动。

我是在这篇文章被收入《孩子们看到了父辈的微笑》一书之前看到了这段话，我给他写了下面这封信，他未加任何评论地收录在书中。信中说：

亲爱的克洛德·莫里亚克，我拜读了你的日记，其中谈到了在“越南难民之船”的记者招待会上我和萨特会面的情况。

请允许我指出如下几点：当我握住让-保罗·萨特的手时，我向他说的是“你好，我的小同学”，而不是“老同学”。这是要抹去30年的分歧，重新回到50年前的一种姿态，因为在高师，我们这个小圈子里都互相称为“小同学”。如果萨特听到这个称呼——但我不能肯定他听到了——他就会认为我向他说出了我能说的和我应该说的话，949
这个称呼既没有什么不够味的，也没有什么令人感动的。

至于我的感情，要比你印象中的简单得多，既然我们并排坐到一起，无论是他还是我，都不会感到局促不安，或彼此生气。事实上，当我看到他双目失明、近乎瘫痪时，我只是感到一片同情和无限怜悯。我已多年没见到他，感到他正向死亡走去。顺致敬意。

我为什么说正向死亡走去？萨特不到一年以后，于1980年4月去世了。而在此一年前，他还能保持着智慧和意志的力量吗？没有了这种力量，萨特就不再是原来的萨特了。

我的这一说法针对的是萨特逝世前《新观察家》周刊刊登的他与贝尼·列维的谈话。

几个星期之后，声援“越南难民之船”的代表团在爱丽舍宫受到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接见。代表团中的两个成员安德烈·格鲁克斯曼和克劳蒂娜·布瓦依埃尔谈得最多。他们要求法国增加接纳难民的人数，还要求法国采取某些紧急措施。总统在直接向让-保罗·萨特提问时称他为“我亲爱的大师”，萨特对总统的提问只回答了很少的几句话。萨特表示完全同意格鲁克斯曼的观点。我记不起我讲过什么值得一提的话。代表团成员后来在转达同总统的会面情况时，对总统的一句话倍加讥讽。总统当时问“他们为什么出逃？”或“他们为什么想出逃？”，提出这个问题的本身不就反映了他对苏联政权一无所知？我自己并不肯定这个提问只是表现出一种幼稚无知，因为难民出逃并不是出于同样的动机。在同总统会谈后，我们在法兰西学院即刻召开了记者招待会，让-保罗·萨特讲了几分钟的话：他的声音没有变化，语调也没有改变；声音仍然洪亮、清晰，几乎同年轻时候一样；他说话没有任何夸张，也不拖泥带水；他既不像演说家在演讲，也不像教授在上课，我又找到了原来的萨特。

当然，萨特和我一样，并不认为握一下手就能消除 30 年的隔阂。这种静悄悄的但又引人注目的会面具有一种什么意义呢？至少两个“吵翻了的”朋友在双方的心中都未消失。萨特真诚地写过颂扬加缪和梅洛-庞蒂的文章，但这是些悼念文章，与传统的悼文不同。他为加缪写的悼词涉及他的本质：

他在 20 世纪反历史地代表了道德家们源远流长的当代传承者，他的著作也许在法国文学中最具特色。他那执

拗的、既狭隘又纯粹、既严肃又富于情感的人道主义，同这个时代的大量未定型的事件展开了一场令人怀疑的斗争。然而，反过来，由于他顽强地坚持本人的拒斥立场，他的看法与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和现实主义的拜金主义者的看法相反，他再次肯定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存在道德现象。

萨特说，他同加缪的争吵只是共事的一种方式；我认为，他同梅洛-庞蒂的关系也同样如此。他们之间的争吵是在后者的《辩证法的历险》发表之后，论战涉及政治，也涉及哲学，但与他同加缪的争论不同，没有那么多的个人义气。梅洛-庞蒂指责萨特犯有他所说的极端布尔什维克主义，换句话说，就是以党的意志代替无产阶级的意志。在政治方面，他们辩论的焦点是阶级与党的关系；在哲学方面，梅洛-庞蒂认为，在阶级与党之间、具体情况与决策之间缺少协调。把绝对的和无条件的自由，把笛卡儿式的上帝的自由，转换成自我，变成了党的自由，同时也就拥有了马克思赋予工人阶级的那种历史使命。西蒙娜·德·波伏娃反驳说，庞蒂的批评忽略了本体论与实体论之间的区别：绝对自由的本体论在一定历史命运下不排除自我和党的联系，没有这些历史命运，意志就不是来自类似笛卡儿式上帝的决定的单纯命令，而是通过自我或阶级为摆脱自身异化进行的长期斗争。

“执拗的”“既狭隘又纯粹”的人道主义者加缪，主张在具体情况与行动之间建立协调关系的非共产党人梅洛-庞蒂，都这个哲学家的格雷万蜡像馆中找到了一席之地。他们活着的时候，萨特既没有饶恕过这个人道主义者，也没有宽待过这个非共产党人。在他们死后，萨特倒是给予了他们颇有诚意的颂

扬，不过也只是没有越出悼词所能容忍的虚情假意而已。我想，即便在我死后，萨特也不可能在他的蜡像馆中的当代陈列室里给我保留一席之地。奥利维尔·托德说，在那次轰动一时的重逢之后，萨特在同他进行最后一次谈话时，反复说我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是工人阶级的敌人。如果就我的出身和生活方式来说我是资产阶级分子，那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说我是工人阶级的敌人，我却觉得没什么意思。萨特这种近似愚蠢的见解明白地表达了他对我的感情，起码在政治上是这样。然而，我也能举例说明他对我的一种态度。安德烈·马尔罗要求加斯东·伽利玛脱离《现代》杂志，因为上面登了一篇梅洛-庞蒂的文章，文章冒犯了马尔罗。马尔罗对我说：“他把我当成懦夫，而他却只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打过仗。”我托人转告萨特，这件事与我毫无关系。他回答我说，在这件事上他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我们之间的握手对于历史学家是否有什么象征性的意义？我不太清楚；西蒙娜·德·波伏娃却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①本质上是伦理学家的萨特竟然主张为美好的事业采取极端的暴力形式。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把革命与共产主义，也就是与苏联等同起来。从1968年起，青年人追随着萨特的另一种思想，即人群的融合、个人或集体实践的自发性。他自己也脱离了已经成为官僚主义和个人崇拜化身的革命。他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真正归宿——无政府主义，但不是有些自称无政府主义政党的那种东西，而是个人揭竿而起，进行反抗的无政府主义。同时，他不再允许为了崇高的目的而犯罪，他不再嘲讽自由派的“柔嫩灵魂”，转而同情受专制政权，甚至是受一个

^① 参见西蒙娜·德·波伏娃的《永别的仪式》一书。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制政权迫害的人。正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在布瓦依埃尔夫妇和无国界医生的倡议下又重新走到了一起，而谁也没有叛离各自的初衷。

萨特去世时，我尽可能地少说话，少写文章。除了在《快报》周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只参加了电视台的一次新书评介节目“省略号”。在这种座谈会式的场合，我不能不马上做出反应，这将使我十分为难。我要说的太多了，所以还是少说为佳。 952

下面是1980年4月25日我在《快报》周刊上发表的文章：

当让-保罗·萨特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皮埃尔·布里松催我为《费加罗文学报》写篇文章，谈谈我对青年时代的回忆，谈谈我们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几年交往。我拒绝了，因为萨特对经院式的颂扬一向很反感，政治又使我们分道扬镳，在他得诺贝尔奖的时候，我既不便清算旧账，也不能对我们的分歧避而不谈。因此我给皮埃尔·布里松提供了一篇关于《辩证理性批判》的长文。《费加罗文学报》的总编失望至极，他对我说：“这是一份巴黎大学的讲义。”事实上，阅读和讨论一个哲学家的著作不正是纪念一个思想家的适当方式吗？人们敬仰他的精神力量，但无须赞同他的观点、立场。

五十多年前，我们在开玩笑时互相许下了诺言：谁后走一步，就要为先去世的人在高等师范学院的同学录上撰写一篇生平传略。如今，诺言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从学生时代的亲密无间到“越南难民之船”记者招待会上的握手，流过的时光太长了，但是有些东西却依然保留下来

了。庆贺萨特的业绩是吃力不讨好的，但又必不可少，我宁可把这项任务留给别人去做，尽管这项业绩的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范围之广泛，会使当代人感到无所适从。由别人对他做出公正的评论吧。即使萨特不止一次地投入未必是正当的战斗，但是，从来没有人怀疑过他的慷慨与无私。

我想起了我们在圣日耳曼大街靠近巴克街和陆军大楼的一次谈话，那时，萨特对自己的天赋已毫不怀疑。他对我说了大致这些话（原话记不清了）：要和黑格尔并驾齐驱，对他来说并不太困难。我告诉他我对自己的疑虑，还说我对未来不是很有把握。在这次谈话中，我们还谈到了别的问题，谈到了革命。我向他提出了一些毫无创见的异议。我认为，被压迫者，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代表被压迫者的那些人，会乐于充当被他们赶下台的那批人的角色。如果引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句话，就是陈腐的烂泥将重新开始泛滥。萨特大概回答我说，革命以后必定会出现同样的不公正，或者类似的不公正。革命一旦发生，我愿意像幼儿园里的老师那样不辞辛苦地为它效劳。

953

那次谈话是在我们学业结束之后，那时我们都快25岁了。我不止一次地回想起这件事。直到慕尼黑事件之前，萨特对政治还不太感兴趣。西蒙娜·德·波伏娃回忆说：他们那时谁也不指望什么改革，什么渐进的改良，因为只有突然的、全面的革命，才可能改变事物的发展，改变生活。因为萨特实际是一个伦理学家，而且终生不渝，尽管出于革命的绝对逻辑，他写了不少关于暴力的文章，

例如为法农^①的著作写的序言。萨特的这类文章可以列入具有法西斯色彩的文选之中。

作为哲学家，萨特的思想主要来自他本人。1933 ~ 1934年，他在柏林攻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有一次在一个露天咖啡馆里，他首次听我谈到了现象学。通过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回忆录，我们了解到，萨特对于这种适合其需要和想法的现象学方法崇拜得五体投地。然而，无论从现象学还是从《存在与时间》中，他得到的只是一种词汇，至多也只是一种方法。他自己创造了一种理解（Weltanschauung）。这是一种以“自在”和“自为”为结构的世界观：一方面，事物具有消极的物质性和非意义性；另一方面，意识对“自我”不断探索，却永远不能与“自我”相吻合，然而能够设想并创造出意义。没有意识，则任何事物都没有意义，而意识本身却是虚无的。

“自我”是一种强透视性的意识，是一种以上帝的形象表现出来的自由意志。萨特不是在书本中，而是在自己的身上发现了它。像笛卡儿一样，萨特也不相信精神分析法会有助于他对自己的了解，至少他在年轻的时候是这样认识的。萨特要求这一高傲的“自我”不仅对自己，同时也要对所有人毫无保留地负起责任来。身陷孤独的囹圄之中，出于对存在的徒劳无功的探索的厌倦，“自我”希望通过一种真诚的关系，走出社会喜剧，即无论是自己还

①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在非洲颇有影响的思想家，萨特曾为他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译者注

是其他人都不能代表另一方，都不能剥夺另一方的自由，而重新返回其他人中间。

954 今天，我个人仍然认为，《存在与虚无》这本书远远超过了萨特的其他著作，最忠实地反映了他的世界观，反映了人类环境中的各种矛盾，并富有适于各种文学形式的存在题材。《辩证理性批判》只是在表面上否定了《存在与虚无》，但是萨特把“自我”放到了社会现实中，把“自我”称为“个人实践”，从而使它“马克思主义化”。他以社会化造成的存在和行为方式来填补缺少“自我”的自由，同时又竭力以一种更加微妙而又不大具有说服力的辩证法来维护一种强透视性的“自我”，这种形式的“自我”就是《存在与虚无》中的自由。

为什么萨特认为有必要宣布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真理（大概他并没有深入研究过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中的一个历史时期呢？我想这样讲一定有很多心理的和社会的因素，姑且不去讲它。如果一场革命为人类提供了新的开端，我的读者肯定会想到，没有任何幻想的萨特正准备献身于教育人民的事业。由于发表了《恶心》《墙》《苍蝇》《禁闭》等作品，萨特得以成名。而战后初期，萨特面临的却是被分裂的法国和世界，这不仅是因为强国互相争夺所致，而且像尼采所预言的那样，也是由于哲学上的冲突造成的。萨特对资产阶级深恶痛绝，不可能选择西方阵营、美国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他时而对另一个阵营寄予希望，时而幻想出现一个第三种阵营。为了寻找献身革命和自由的党和国家，他访问了莫斯科和哈瓦那，走上了荒唐的朝圣道路，尽管他始终未得其门而入。

在斯大林主义最猖獗的几年里，他以同路人自居。在写作《辩证理性批判》时，也就是1960年代初，萨特还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左倾主义之间举棋不定。

我认为，最近《新观察家》周刊上连载的让-保罗·萨特的文章不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但是其中属于他个人的一些看法却与我的记忆之所及相符。他根本不满意自己所看到的社会生活，认为这种社会生活与他对人类最终目的的概念不相适应。萨特的观点是乌托邦还是千禧年梦？我看更像是对人与人之间建立另一种关系的向往和追求。我们俩都读过康德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这本书，并且潜心思考了每一个人对自己做出的决定性选择，但是人永远有改变观点的自由。萨特从未放弃过人们能够全体一致地改变立场的希望，但是他从未想到把介乎个人与人类之间的制度纳入他的体系之中。对于一个卷入政治斗争的道德家来说，这真是一场悲剧。

955

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次谈话中，萨特问我：既然你不相信革命，既然你明知道这个社会卑鄙，你为什么还对政治感兴趣呢？卑鄙这个词可能比他原来用的词还温和一些，当然，用哪个词关系不大。我当时似乎是用阿兰经常引用的那句话回答他的：文明就像一层薄膜，一触即破，裂口处便会冒出野蛮行为。革命同战争一样，可能会撞破经过多少世纪慢慢形成的文明薄膜。^①

电视台的“省略号”（新书评价）节目虽然有一定影响，

^① 1980年4月25日《快报》。

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节目很成功。在 70 分钟的时间里，四个人坐在一起谈萨特，又能有什么效果？有些情节我至今记忆犹新：对于普瓦罗·德尔什不时的奚落，我置之不理。他大概是要表明自己与右派观点的人界线分明，然而他这种过分的积极实在是多余的。许多持左派观点的人感谢我反对贝尼·莱维的立场，感谢我断然提出《新观察家》周刊上刊登的萨特的最后谈话不是出自我的小同学的手笔。我同格鲁克斯曼展开过讨论，他坚持把萨特同索尔仁尼琴相提并论。对萨特的友谊驱使他得出这样一种荒谬的论点：索尔仁尼琴痛恨西方世界的“思想宗师”所起的作用，讨厌他一贯容忍的那些声称铸造新人的党派和运动。我当时很激动，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为此，萨特的两个朋友克洛德·朗兹曼和让·普莱分别打电话和写明信片对我表示感谢，安娜·菲利普和罗曼·加里在他们的一本著作中为我写了献词。

加里寄给我《风筝》一书，上面写满了对我的溢美之词。几天之后，我向他表示感谢。我当时正在整理过去的材料，便提出把他在 1945 年写给我的一封信寄还给他。在这封信中，956 他向我表达了他面对纷至沓来的赞扬信和赞美文章所产生的惊喜之情。我当年在伦敦读到他的《欧洲的教育》的书稿时就已预见到他会获得成功，现在这一预言已经变为现实了。加里回答我说，他希望得到这封写了那么久远的信件。不久，他在收到这封我自己并没有保留复印件的信之后，又给我寄来一张明信片，这次我没忘记影印一份。明信片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雷蒙·阿隆，谢谢您的这封信，它使我回想起我保持信仰的旧日时光。我当时还相信文学是光辉的，相

信名声，等等。然而时至今日，这一切都已成为“等等、等等”了。我一直怀着钦佩的心情聆听您那卓越的思想课。您对这些黑暗时代所做的分析是如此深刻，以致我在读您的书时，有时竟然相信有可能得到解脱，相信还存在另一条道路。兼有出众的才华和浩然之气，真乃稀世之珍。我要用我所喜爱的一句俗语祝愿您：再接再厉。您忠实的朋友。

明信片上签署的日期是1980年11月29日，而他在1980年12月2日便与世长辞了。

最近我重读了《新观察家》周刊上刊载的萨特与贝尼·莱维的谈话，我在新书评价节目中排除这是萨特的作品的可能性。我断言这不是萨特写的，口气非常生硬，这可能是出于对贝尼·莱维的反感。我重读了这些谈话，进行了慎重的思考，是否应该撤回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说法呢？这些谈话的口气的确不像是我的小朋友的口气。5年前，他在回答米歇尔·孔达提问时所云同这些谈话截然相反。此外，西蒙娜·德·波伏娃和萨特的其他好友都否认萨特身体衰弱到这般地步，以致可以对自己的言行不承担责任了。1975年，他同孔达谈话时说自己的机智没受到影响，说他的机智同过去一样敏捷有力，唯一衰老的症状是，有时谈话找不到适当的词。

据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追述，萨特的身体状况在1975~1980年明显恶化了。由于血液循环不正常，他的双腿逐渐瘫痪。我想，心血管系统的损伤大概对他的大脑也有一定的影响。即使他的眼睛不失明，这些病痛也会妨碍他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

妨碍他完成《辩证理性批判》和《福楼拜传》^①的最后写作工作。当然，我们也不能从此得出结论，认为他说的话都是他的对话者强加于他的，是完全违背了他自己的思想的。

1975年的谈话和1980年的谈话在有些问题上自相矛盾到了这等田地，竟让人联想到他的观点改变了。在同孔达的谈话中，萨特指出：思维在本质上是孤独的，只有独自一个人时才能思考，思想只能属于一个人。在谈到音乐时，他毫不犹豫地承认，他不喜欢音乐会，他只有在独自一人时才欣赏音乐。而5年后，他却这样说：

我没有能力再从事写作了，所以我不得不同别人交谈，我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对话者，然而我马上又意识到，你不可能是一个秘书。我必须在思考时有你参加，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一起思考。这就完全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式，因为时至今日，我从来都是一个人工作，一个人独坐在桌前，在我面前，只有一支笔和一张纸。而现在，我们要一起来构思一些想法。有时，我们也存在分歧。但这是一种只有当我衰老时才可能想到的交流方式。

我读完这几句话以后，很想马上就说这不是萨特的话。他这是首次接受一个“复数”的思想，即几个人而不是一个人的思想。这种个人的思想，至少萨特自认为是面对所有人的。他第一次承认，个人思想具有普遍的意义，人在衰老时就不得不共同思考。他不仅用这一观点来说服自己，并且还努力说服

^① 指《家庭的白痴》。——编者注

他的读者。看来，这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因为有了其他人的帮助，他就可以评断自己的过去，阐明他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中都未能阐明的伦理学谱系。萨特对待进步的观点，对待因历来部分的失败而接近人类最终目的的观点，也同样起了变化。西蒙娜和让-保罗年轻的时候只相信一种整体的动荡；70岁时，萨特承认他犯了某些错误是因不够激进，而不是因过分激进；75岁时，他说：“我认为，行动的发展过程就是一系列的失败过程。失败中会产生某种意想不到的积极事物，失败本身就孕育了积极的因素，然而希望成功的人却不予重视。正是这些部分的、局部的、不易被人们辨明的成功促进了事物的发展，这些成功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实现了进步。我始终是这样来理解人类历史的。”萨特对历史可能是这样“理解”的，但是他肯定没有一贯如此地来“解释”历史。 958

另外，我觉得把他后期的言论同他的人格和思想倾向联系在一起没有什么不合适。他说自己从未绝望过，从他最后几年中的表现来看，他说的倒是实话。萨特是个幸运儿，他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愿望。1975年，他表示对自己的一生感到满意，并敢于承认这一点。他有什么可以不满意的呢？作为哲学家的萨特对现实中的萨特的回答是：人是一种无谓的激情。前一个萨特本身并没有绝望，但作为形而上学者的他，是毫无希望的。大约在五十年以前，或五十多年以前，他对我吐露说，他不愿意要孩子，因为在他看来，人的生存条件是没有出路的。

对存在的绝望，对大多数人的蔑视和讥讽，在战后已被另一个萨特所遗弃。这时，他已经不大在个人的道德中，而是更多地集体行动中寻找一条走出密室的道路。在《辩证理性批判》中，他把绝望与革命者必须有的希望结合起来。他仍

然把自由视作最终目的，但是作为“人类的开端”的反抗，自由似乎注定要带来许多后遗症。(萨特是否会在这本书的第二卷中，指出这种后遗症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呢?)

我认为从这些谈话中还是能够辨认出萨特的一些论点，这些论点同过去相比已经失去了棱角，变得平淡无奇了。总而言之，从这些谈话中看不到坚定的口气、独特的思想或者独特的表达方式，即使当他重复自己所说的话或者当他自己搞错时也同样如此。30年前，当他回忆起自己青年时代的冷酷性格时，萨特乐于承认：“我变成‘蜜翁翁’‘老好人’了。”他只有在最后一次谈话时才变成这样。在此之前，他从来不是这样的人。

当年事已高的萨特摒弃绝望的折磨，拒绝再体验任何形式的忐忑不安时，他大概会讲出自己的部分的真实情况。但是，即使如此，表达这种真相的文章又是何等贫乏，何等平淡无奇而又令人感到费解！

请注意，从那时起，人们在我的著作中几乎再也看不到自暴自弃的绝望情绪了，这仅仅持续了很短的时间。我注意到许多哲学家在探讨绝望情绪和其他任何一种哲学思想时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即他们在从事哲学研究的最初时期只是根据道听途说得来的东西便发表自己的见解，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题材。但是后来，他们渐渐地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因为他们意识到他们对此并没有亲身体会，而只能依赖别人的感受。我从不感到忐忑不安。1930 ~ 1940年，这是哲学的关键概念之一。这一概念来自海德格尔，并且一直为人们所使用，但对我来说却体现不出任何东西……

在读这些谈话时，令人感到压抑和无法忍受的是，贝尼·莱维有意或无意地对一个老人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度。萨特因年老体弱，丧失反驳能力比智力衰退更加严重，他声称自己不懂得犯罪感的含意。他的年轻弟子使他回想起在1952~1956年这个被索尔仁尼琴称为“西方世界的思想宗师”竟成为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这个残忍的贝尼·莱维对萨特说：“你的那个同路人已经死了。我希望可以对他盖棺论定。死者是何许人也？是个阴险的恶棍、大傻瓜、蠢人，还是骨子里善良的人？”萨特回答他说：“我认为他是个不坏的人……”萨特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他当同路人的时间不长，这对他来说是次要的事情。是党使他陷入了困境，当他向党进行抗争时，他并不是那么差劲。”

他现在说自己的作品失败了，他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道主义者那样声称要相信进步，在没有恐怖的友爱之中探求左倾的原则和伦理的标准。“一个伦理学家必须传播友爱思想，直到这种思想成为所有人之间唯一显而易见的关系。……”他否定了自己为法农的书所写的序言，否定了他对暴力的崇拜。他重新撰写关于犹太人的文章：“那时所缺少的正是犹太人的真实情况。请注意，这种玄奥的犹太人的真实情况犹如基督教徒的真实情况一样，在我的哲学中只占微乎其微的地位。我把自我意识同那些来自其内部继而又可以从其外表寻找到的所有的特征中分离出来。这样一来，犹太人就被剥去了那些玄奥的和存在于人们主观想象中的特征，从而不能以他原有的方式存在于我的哲学之中。而现在，我是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人们的。”

的确，在写《犹太人问题》这本书时，萨特还不了解犹

960 太人，不知道他们的命运是不是玄奥的。在这些谈话中，我之所以无法相信这就是原来的萨特，是因为在比他年轻、比他果断的对话者面前，萨特简直像个受害者。那个年轻人迫使他在自己过去犯过错误的问题上低头，但是萨特正是在这些失误中显示了他的才华，尽管其方法有些令人不可思议。

史学家们将来可以就这些谈话大做文章，但谈话的结尾部分也并非毫无高超之处，尽管这些谈话既不像第一个萨特，也不同于第二个萨特。“革命者要实现的是一个令人们满意的人道的社会，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这种类型的社会不是一个事实上的社会，而是一个理应存在的社会，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道德的关系。这就是关于革命的最终目的的伦理学观念，然而，人们只能从救世主降临说的角度来真正地思考这个观点。”在社会制度方面，萨特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世人方面，他是一个伦理学家。尽管他走过的政治道路崎岖曲折，但是他在自己的一生中始终是个伦理学家。他在逝世前夕虽然受到贝尼·莱维的纠缠，然而他依然承认了自己的一个真实思想，即在人类历史上的对救世主的期望。

1975年，《新观察家》周刊刊载了以《70岁的自画像》为标题的采访萨特的谈话记录。一年之后，让·达尼埃尔（或许是贝尔纳-亨利·莱维）也要求和我进行一次谈话，我欣然接受了这个请求。同莱维的这次谈话持续了几个小时，我对他充满信任，谈起话来无拘无束。谈话的内容当然与我和萨特有关，这篇采访文章刊登在1976年3月15日的《新观察家》周刊上。记者的问题是：“归根结底，萨特与阿隆两人之

中究竟谁更能标志出那个时代的历史呢？”我的回答是：“毫无疑问，萨特的影响现在已经比我大得多了。这首先是因为他留下了众多的著作，数量上已远远超过了我。他的写作范围涉及小说、戏剧、哲学和政治。其次，在我的著作中，有一部分内容注定会很快被人遗忘，正如有一次莫里亚克在谈到我的一本书时所说的：‘如果阿隆同意脱离现实的话，他就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孟德斯鸠。’”这种说法的前半句倒是真的，我确实没有完全脱离现实。

而且，我的身份是个分析家或者说是个评论家。这种作家对他们同代人可能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著作往往受时局变化的限制，因此同创作家的著作相比，就更容易成为明日黄花。那些创作家并不怕失败，他们敢于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去建造一座座概念的教堂。说到这里，B.-H. 莱维打断我的话问道：“如果他们失败了呢？”我对此回答道：“在知识界看来，我之所以应该受到谴责，正是因为真理尚未被揭示出来时，我就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们谴责我的另一个依据是，我没有指出通向良好社会的道路，未能传授进入这种良好社会的方法，对此，他们并不准备原谅我。”我的对话人马上反问：“而您自己对这些问题又是怎样想的呢？在这种情况下，在萨特和阿隆之间选择哪一方呢？是选择站在谬误立场上的战胜者萨特，还是选择站在真理立场上的战败者阿隆呢？”我起初拒绝回答这个问题。我说：“讨论这个问题没有多大意思。”B.-H. 莱维仍坚持问道：“那就换一种方式提出这个问题。站在错误立场上的萨特起了什么作用？站在正确立场上的阿隆又起了什么作用？”对此，我不无反感地回答道：“我认为萨特的灾难在于他总有一天要受到世人的谴责，因为他把自

己能言善辩的口才和丰富的感情都用来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他滥用自己宝贵的才智，试图向人们证明斯大林是不能反对的^①，人们至少应该向他靠拢。但是，今后也许有一天，人们对他和我们仍然有兴趣，他们会说，我从来没有为了辩证法的需要为不合理的事物辩护。我从来没有为皮诺切特辩护过，也从来没有为斯大林和希特勒辩护过。”

一些左派人士往往从我的上述谈话中得出一种奇谈怪论，认为与其同阿隆站在真理的一边，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也没有做过这样的解释。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才解释为什么好些人不肯否定这种毫无道理的偏爱。甚至在事后，我也认为那些追随萨特误入迷途的人不见得有什么了不起。他们对萨特的崇拜在某种程度上只是表现为一种近似于盲目的忠诚。这个追求自由的哲学家所发表的奇谈怪论同我没有任何关系。拒绝充当同路人这一角色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阿隆分子，甚至不一定赞成我。只要这个人不拘时间地点，时不时碰巧说了些中肯的话，这个人便会被视作阿隆派。“不如同萨特站在谬误的一边”，这种具有讽刺味道的说法不仅荒谬无稽，而且令人感到厌恶，它似乎认为同阿隆站在一边就是可耻的。我还需补充说明我的功绩是微不足道的吗？在我之前，已有很多人讲述了苏联的真实情况。伯特兰·罗素在1920年代初曾去苏联旅行，回来时也有了清醒的认识；鲍里斯·苏瓦林从1930年代起就开始论述斯大林主义的实质。成问题的是，许多大思想家和慷慨高尚的人仍然坚持他们的幻想和错误。我不必恭维那些同萨特一起误入迷途的人；他们如

① 在这里我应该说不能反对共产主义。

果不愿意会见我，可以从其他同路人中挑选，不过这有点尴尬。

萨特去世两年后，一部以《萨特的遗嘱》为题发表的言论集几乎再次掀起了辩论的高潮。该书作者米歇尔-安东尼·比尔尼埃应邀参加了电视台的“新书评介”节目，但是他那次没讲什么，其他几个客人也都避免评论这本出色的小书，因为无论是这个思想大师的敌人还是其朋友都对这本书感到棘手。人们重读书中摘引的反映他立场多变的言论时，肯定会说：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思想大师。这本书一开始就引用了萨特发表在1950年1月的《现代》杂志上的文章：“……如果关押在集中营里的人数达到1000万……那么就会出现量变到质变的转化，这种转化将使整个制度发生变化，改变前进的方向……人们不能纵容共产主义，然而，在任何情况下，人们也不能向它的敌人妥协……”接着，书中引用了他在《共产党人与和平》一书中的话：“如果有一天苏联对避免战争失去信心，那么它自己就会首先挑起战争，有谁又会因此而指责它呢？”他在给阿尔贝·加缪的《致〈现代〉杂志社社长》的回信中写道：“两个阵营的存在可能使我们既感到气愤，又感到毛骨悚然，也可能使我们从此不得安宁，然而我们为什么要对这种现状感到为难呢？”在谈论罗森堡事件的文章里，萨特指出：“……请注意，美国已经被疯狗咬疯了。我们必须割断与它的一切联系，否则也会被疯狗咬了发起疯来。”1954年，他从苏联回来后写道：“我在那边碰到了一些有新思想的人，他们对我们西方人来说有时叫人难以理解，但是除了友谊，我们同他们之间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关系了。无论法国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它都不可能走与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苏联在言论自

由方面是无懈可击的。”关于匈牙利的暴乱和苏联的镇压行动，萨特认为：“最大的失误恐怕要算赫鲁晓夫的报告了。因为依我之见，在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之前，是不能这样开诚布公的。对一个长久以来已成为该政权化身而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斯大林）进行郑重其事的政治揭露，并且详细公布其罪行，简直是一种疯狂的行为。”萨特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态度也是友好的：“卡斯特罗同时象征着整个古巴岛，它的人民、牲畜、庄稼和土地……我们应该明白，巴蒂斯塔手下的那些大庄园主攻击卡斯特罗将古巴据为己有，攻击中说的这一情况根本就不存在，因为他就是整个古巴岛的化身。他既不屑占有它，也不屑为自己保留一块土地……古巴人应该赢得胜利，否则我们会失去一切，甚至失去希望。”（十多年后，由于一名古巴诗人遭到监禁，萨特与卡斯特罗分道扬镳了。）他在为法农所著的《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书作序时写道：“在反抗的最初阶段，人们必须开枪，打倒一个欧洲人，这等于一箭双雕，既消灭了一个压迫者，同时又消灭了一个被压迫者。一个人死了，另一个人却自由了……”1962年，他为了参加一次世界和平运动大会而重返莫斯科时写道：“苏联的作家和他们的读者之间经常交换意见，一本书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读者对它的反应。”诸如此类，还有关于1968年写的“人道面孔的社会主义”“五月风暴”，对苏联共产主义和极左主义的谴责。

《新观察家》周刊对比尔尼埃的著作保持沉默，《快报》周刊亦是如此。这两家周刊并未以此为荣。但是它们是能够为自己的沉默进行辩护的。然而，一个昔日的萨特分子利用萨特进行自我批评，把萨特说成是万念俱灰，意识到自己在意识形

态问题上游移不定的人，从而同他心目中已经死去的英雄算总账，这实在令我气愤不已。这种蠢话对我没有任何用处，我早就熟悉萨特的那些文章，熟悉他那些坎坷不平的政治经历，他在辩证法思想上的反复徘徊，以及他在人道主义和信仰（或崇尚）暴力之间的游移不定。即使是在论战文章中，我也很少引用萨特所下的那些总是言过其实，有时甚至是荒谬的，并且往往是自相矛盾的论断。我对这种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言论集毫无兴趣，而且萨特本人在世时，也总是拒绝做任何自我批评，从不理睬别人对他的过去的奚落讪笑。但是，我是否应该把我的证词补充进去？无论是今天的萨特分子还是明天的历史学家，都无法回避这些问题：为什么这个大思想家会这么胡言乱语？为什么他肯对一些人物和事件自封为政治和伦理的审判官？为什么他使那么多青年人向往莫斯科和哈瓦那，而事后从不感到内疚？

964

一个3集的电视节目（1981年10月录制的），可以说是根据我和萨特两个小同学之间历时30年的对话拍摄而成的。该片的“剧本”后来也以《介入的旁观者》为名成册出版了。然而电视片的编导不明白我为什么会选择走一条与那些和我同时代的名人所走的截然不同的道路。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他们要我做出解释。

就这样，我在1980年同两个年轻的知识分子建立了友谊。他们属于参加1968年运动的那代人，其中一个当时参加了托派党，另一个虽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组织，却也心系这一次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一次接受《世界报》（星期日增刊）采访的时候，我结识了他们之中的多米尼克·沃尔顿，采访是在人文

科学之家的我的办公室里进行的。采访结束之前，这个年轻人和布鲁诺·弗拉帕特一起问我，愿不愿意屈尊帮助他们拍一个关于我的生活和思想的3集节目？我当时不假思索就一口答应了。我说：“我很喜欢电视，何乐而不为呢？”

多米尼克和他的朋友让·路易·米西卡一起来看我，主要是为了就拍摄计划和有关讨论内容达成协议。他们一再向我介绍片子的整个构思，以及每集的中心思想。我漫不经心地听着，对所有问题都用同一方式回答：同意，这是你们的事情。我把我的材料拿给他们看，其中主要是我的著作发表后收到的信。我们无所不谈，却很少讨论电视节目的内容。我对此并不热心，因为我不喜欢在谈话之前做准备，在电台或电视台上发表谈话更是如此。我允许他们向我提出他们希望我能解答的所有问题，但是我不想事前准备好答案。我不是演员，当别人强迫我重复一个片段时，第二次的效果往往还不如第一次理想。

为什么多米尼克和让-路易能把我和苏珊都说服了呢？也许这是个愚蠢而又毫无意义的问题。有谁能够说得清为什么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有时不通呢？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争取搞清楚这一点，而不必涉及那种既不能接触又见不得亮光的非物质性问题。让-路易告诉我说，他们来找我我是出于思想上的好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三十多年里，我没有向巴黎盛行的任何思潮做过妥协。我所采取的立场的逻辑性是什么？是什么样的政治哲学促使我采取拒绝或接受的立场呢？

我是不是被他们的好奇心感动了？我确实被他们说话的语气和方式所感动。在《快报》周刊，甚至在让-弗朗索瓦·拉威尔离开报社之前，由于我已年过花甲，以及由于大多数记者

对我表现出敬意和尊重——起码在表面上是这样——我一直感到孤独。多米尼克和让-路易同我交谈时毫无拘束之意，好像是在同他们年龄相仿的同学或朋友交谈，同时他们又尽量避免与我过分亲热，以免使我们三个人都感到窘迫不安。他们两人性格相异，却又有不少相似之处。他们既喜欢互相交谈，又喜欢同其他人交谈。多米尼克比让-路易更健谈，但他并不剥夺让-路易的发言机会。他给人们留下的一个错误印象是，对各种类型的人和环境都能够应付自如。让-路易总带有一种犹太人的忧虑情绪，我对此深表同情。我们常常在门前或台阶上又没完没了地继续谈起来。我们是以近 50 年来早已被人们所忘却的一种方式结为朋友的。这种亲密无间的同志情谊在时而漫谈、时而推诚相见的交谈中不断吸取养料，不断加强。多米尼克和让-路易完全出乎意外地使我重新得到了这种情谊。

他们要求我给他们两个星期，用 10 天的时间进行录音。但在第一个星期的星期五，我却无法拒绝阿兰·佩雷菲特的邀请，为获得托克维尔奖的大卫·里斯曼（David Riesman）去瓦洛涅发表贺词。为了不耽误整个下午的录音工作，我坐直升机赶了回来。其实不要太认真可能更好。由于不小心，我患了重感冒，在整个第二个星期里，我的嗓子都是嘶哑的，有时别人根本听不清我在说什么。由于这个节外生枝，关于我对我的犹太信念持什么看法的那节重要讲话未能被录制下来。

多米尼克和让-路易负责录音的剪辑工作，这项工作持续了好几个星期，在这方面，我对他们寄予充分的信任，全部录音长达 20 多个小时，而在 3 集节目中的讲话部分最多不能超过一个半钟头，每集大约只有 45 分钟（其中至少还要有 15 分钟的图片说明）。剧本打印出来后，他们俩又建议我把它写成

一本书。起初我拒绝了这一建议。我正在写回忆录，何必再出版这些访谈呢？为什么要永远保存这些由让-路易和多米尼克现场安排，而非我自己准备的即兴谈话呢？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不想剥夺这两个年轻人出版一本书的机会，我几乎认为这本书应该成为他们的作品，从而使他们的才华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们不仅读过我的主要著作，而且也看过我写的大量文章。）出版社社长贝尔纳·德·法鲁瓦做了我们的裁判，他赞成我朋友们的意见。1933 ~ 1934 年，我在勒阿弗尔中学任教，当时阿尔贝·帕尔是我教的哲学班的学生，我一直同他保持联系。他承担了我部分谈话记录的定稿工作，并使其保持了对话录的风格。他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介入的旁观者》一书受到评论家、我的朋友们以及读者的好评，而且还被翻译成德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以及英文，虽然英国人和美国人一般来说不大喜欢访谈体裁的著作。

除了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整个新闻界都对我持赞赏的态度（当然还没有达到毫无保留的程度），这还是第一次。请看发表在《世界报》上署名为米歇尔·孔达的文章，他是萨特的朋友，负责其小说在七星文库的出版工作。文章的基调还是友好的，只是结尾部分有点咄咄逼人。他对我和萨特历时 30 年的对话做出如下结论：

……长期以来，左派知识界把阿隆用来以丑衬美，以非衬是，把他看作可以耻笑的敌手，今天却发现自己，或差不多是拥护他的……应该读读阿隆的这本书，因为它的成功为访谈式的作品恢复了名誉。人们过去认为写有特殊身份的人物之间的交谈是拍马屁，从而贬低了这种体

裁……（萨特与阿隆之间的）对话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不是说他们通过写作你问我答……而且这两种对立的思想虽然源出同一种文化（现象学和马克思主义），却成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这两极之间，进行了一场 20 世纪思想界百折不挠的交锋……在我们的头脑中……存在两种兄弟般的敌对观点：一种观点是从主观上的希望和愿望出发，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计划；另一种观点是用理智的可能性和顽强的现实来提出警告……左派是他的老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左派始终是他的老家。阿隆提出论据反对左派，是为了让其睁开眼睛面对现实……阿隆是个冷静的有立场的分析家，他对事物采取客观的态度，不当感情冲动的党派活动家……

967

在文章结尾部分他以咄咄逼人的口吻写道：

这种决定取舍的地缘政治观点，难道能够开脱阿隆视而不见的现象——尽管他在印度支那和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曾坚持了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但在饿殍遍野的南北关系上他又视而不见，这难道也是地缘政治所能为他辩解的吗？

那些无国界的医生比我、孔达和萨特本人都要强得多。如果我也像孔达的老师那样，把罪责归咎于美国的繁荣富有，我是否就算为孟加拉国和撒哈拉地区的饥民出了力气呢？

对于“自由派的悲观主义”，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个说法，“显然属于他的先师本杰明·贡斯当和托克维尔的传统，

带有某种令人失望和痛苦的色彩”。接下去的这句话如果不是荒谬无稽的，起码也令人感到不愉快：

……人们只能认为阿隆（在现实原则问题上）是言之有理的，就像人们承认他对一切问题的看法是正确的，但在本质问题上却是错误的。本质问题是，当受压迫者起来反抗时，他们所拥有的唯一权利是伸张正义。无论是谁，只要他不承认自己是压迫者，那他就不能否定这一权利，尽管这样做对所有人来说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孔达在此处改变了腔调，又回到那些自视清高的才子用来指责我的老生常谈上。我并不是在所有问题上都正确（我自己不知曾犯过多少次错误），但在“受压迫者的反抗”中，有什么最根本的东西是我未能发现的呢？是否存在一个“受压迫者”的反抗，一种在任何条件下任何国家都有的反抗呢？那些反抗者有权伸张的正义又由谁来确定呢？至于“承认自己是压迫者”，我倒是乐于承认，正如承认我们大家，其中也包括孔达本人，都是享有特权的人。1982年6月，当我碰到孔达时，我在对他的文章表示了谢意后，补充说道：“你为什么认为有必要写上最后那一句荒谬的话？它给我加上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他回答说：“齐奥朗（Cioran）也为这句话指责了我。”接着，他针对我的那些指责（我把有关饥饿和反抗的两句话弄混了）为自己辩白。不过他还是颇为友好地承认：968 “离开自己的老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当时应该回答他说：“对此中的苦衷，我也略知一二。”

一个天生的或者受过专门培训的保皇派记者——热拉尔·

勒克莱尔在《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责我的倒不是我的“自由派”或“痛苦的色彩”，而是我对生产性社会的实用主义抱有“绝对信任”。他在文章中写道：“环境之所以能使神经得到片刻休息，正是因为知识界中没有多少类似的绿洲。”看来我的错误不是使读者丧失信心，而是错误地坚定了他们的信心。文章还说：“不幸的是，这个光明磊落而又正直的人同时也在无条件地为一种陷于矛盾之中的文明辩护。”

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指出，选择自己认为的最有利于人类的社会或政权乃是最初的和最原始的选择。根据卡尔·波普尔爵士对这种概念所下的定义，这种选择类似于一种科学的假设，足以在现今的历史命运下，为“社会工程师”倾向改良主义而不爱革命的态度进行辩解。在这一点上，萨特和我是否背道而驰了呢？我从伦敦回来后，他送了我一本书，书名是《存在与虚无》，上面的题词是：“这本《历史哲学导论》中本体论的导论谨赠我的小同学。”从本体论来讲，介入行为表现为奔向未来，向形势应战。介入行为并不是对赞成或反对进行理智思考的后果。它否认现实，但是对自己要创造的未来又一无所知。

根据本体论的某种含义，萨特所分析的介入行为反映了人的生存条件和行动上的不自由。人始终不了解自己的行为后果。但是，如果他从对人类命运的分析过渡到对政治的思考，那么他就不会不假思考地采取介入行为了。认真思考的第一个阶段，首先要求我们认识或者设想自己生存的这个世界和其他可能存在的世界。现代人的历史性起码包含了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多元化意识，以及对不同社会的了解。这种制度的多元化在我们这个世纪是可能实现的。人们在不同的社会里找到了他们

的归宿，探索到了他们生存的意义。

969 米歇尔·孔达指责我视而不见“饿殍遍野”。热拉尔·勒克莱尔认为：“在一个虚无主义的世界里，放任的自由是毫无理智的。”他这样写道：“一个如此深思熟虑的人却没有意识到自由世界的局限性，实在令人感到遗憾。”按照他的说法，应该“在托克维尔和马克斯·韦伯之外，引用尼采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并且应该承认，这个社会更是一个愿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理智的社会。而我大概过于理智，因而不能同意这种观点。对《为衰落的欧洲辩护》持批判态度的那些人也同样指责我，说我在书中有些地方本来应该用形而上学来谈问题，而我却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谈问题。

坦率地说，我很少求助于哲学家或形而上学者的观点，尤其不向那些被认为是法国的哲学家或形而上学者求援。正如对一切文明，他们对我们的“自由”和“有局限性的文明”的命运又阐明了些什么呢？那个年轻的论者不仅在纸上写出了“虚无主义”这个词，而且把尼采的名字也同它扯到了一起。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虚无主义的时代。上帝不复存在了，我们的世界观和我们的信念掩盖了对强权的欲望。每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幻想和奢望来选择信仰的。真理已不复存在，即使有的话，又怎样分辨它呢？

西方社会，尤其是西欧国家，的确承受着人们所称的虚无主义的折磨。思想家们对严格建立信仰并付诸实践一事感到爱莫能助。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承认，无法根据感情、心境和习惯以外的因素来选择信仰。这些表明理智丧失威信的种类思辨，在魏玛共和国的后期成为知识界的主流。自从超然存在的宗教和后来盛行的世俗宗教衰落以来，一种对宗教教义的怀疑情绪侵蚀着欧洲人的信仰。在那些自认为是或者愿意成为天主教徒

的人当中，大多数人都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理解教会的基本教义，绝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放弃了基督教的信仰。

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产生了大批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把自己关闭或者局限在家庭和几个朋友的狭窄圈子里。尼采事先就表示他痛恨托克维尔的“监护式的专制制度”。也许托克维尔应该把“专制制度”这个词换成“福利国家”，以此在一党制的国家中区分温和的社会民主专制制度和残暴而又凶狠的专制制度。

这种有些一般化的分析受到了一种本身并无意识的欧洲中间派的影响。虚无主义并没有使整个人类的思想发生混乱。从欧洲桎梏下解放出来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正处于反对贫困和争取信仰的痛苦磨难之中，根本无暇顾及虚无主义。这些国家的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他们往往只关心自己的特性，关心反对西方文化的斗争，或者关心他们为了生存而应该吸收的那部分西方文化。欧洲的虚无主义一方面来自上帝的消亡，另一方面，或更主要的方面，则来自欧洲人的历史观念，来自欧洲在当今世界的地位。 970

自由文明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联合国，欧洲心目中的民主国家只占极少数。印度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它正维护着旧日的主人留给它的政治遗产。自由主义并没有像机器和种族主义那样征服了全世界。按照今天的说法，马克思预言了世界的“技术化”，尤其是他预言了资本主义将席卷整个世界，并在其征途中，把一切旧的传统习惯、一切神圣的财产，以及人与人之间最宝贵和最真挚的情谊碾得粉碎。我认为，马克思并不否认他自己赞成这场席卷全球的、残酷而又必要的资本主义运动。诞生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摧毁了亚细亚生

产方式，而那些受帝国政府剥削的村落，或多或少还能基本上自给自足。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体系中的重点是技术化。“技术化确实”包括在马克思的体系中，但是在马克思的作品中，有 90% 或 95% 的文章都与生产方式、经济体制和经济矛盾有关。从某种程度上说，欧洲人已经完成了历史哲学家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掌握了把科学应用到技术上的技能。也许应该说，他们发现了一种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的形而上学，它能够用技术改造大自然。今天，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仍然继续推动知识与技能的发展。正因为欧洲人的历史使命似乎业已完成，所以他们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疑问，并想知道到底应该归罪于什么。

971 科学的真实性越是被工程师们的实践所证实，认识论者和学者们就越是对真理的特殊性产生疑虑。这些真理在自然界和在征服大自然的过程中大获全胜，然而这些真理却只是暂时的。生产和毁灭的方式越是多样化，供人类使用的通信手段、计算设备和思维工具就越发由假想变为现实，人们也越是担心请神容易送神难。预言家们从四面八方把我们紧紧包围了，其中有罗马俱乐部的成员，有对核武器感到忧心忡忡的军事家，有被环境污染吓得目瞪口呆的生态学者，也有为在 20 世纪末世界将人满为患而整日惶恐不安的人口学家。所有这些都向我们预告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传播灾难的预言家们实在为数不少。我既不需要尼采也不需要海德格尔的指点就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的前途并不受理智的控制。

所有这些恐慌情绪都不是杞人忧天。欧洲人受到一个又一个威胁，昨天还主张经济增长率为零的人，今天就变成了低速增长的反对派。他们已经丧失了制订共同计划的意识。大多数西欧人生活在满足与要求满足的争执之中，生活在要求福利国

家保障他们相对殷实富裕的生活中。这个正在衰老的旧大陆因无法更新换代，便雇用了大量的外籍工人从事最脏而且报酬最低的工作。欧洲是已经接受了意识形态的统治，还是要显示出自己已经是一个做到了部分自我协调的社会呢？

明智的欧洲人能够起来反对战争，并且与武器诀别吗？欧洲人经历过各种各样的探奇，如十字军远征、征服殖民地、对科学无止境的探索等，他们出于传统习惯，热爱自己的自由，但已经不能团结一致来保卫自己，或有所创新了吗？从现在起到20世纪末，可能是欧洲经济处于停滞和衰退的年代。面临这种形势，欧洲人能够放弃互相攻击和互相抛弃而携手并进吗？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随着时间和心情的不同而发生着变化。

海德格尔认为，尼采是西方最后一个形而上学家。海德格尔本人根据哲学史来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并为我们诊断历史扩大了范围。然而，他们是否由此而帮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我们的未来呢？西欧的未来更多取决于宗教的失势还是人口的下降呢？我想对这些问题进行充分的哲学思辨，以免做出绝对的回答。

972

相反，对可能出现的世界末日和人类面临的各种威胁，我倒知道应该到何处去寻找信念和希望。但是，在解决工业社会带来的不利因素时，在对待核武器、环境污染、饥饿和人口过剩等问题上，我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不过我知道，对于千禧时代的信仰以及不切实际的空谈都无济于事。所以我主张尝试、了解和谦逊。

如果说充满奢望和不靠谱的各种文明终将在遥远的未来实现预言家的梦想，那么除了理智，还有什么共同的使命能够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呢？

结束语

973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有幸同三个无法否认比我强的人结为朋友，这三个朋友就是让-保罗·萨特、埃里克·韦尔和亚历山大·科耶夫。有几年，我对萨特的看法产生过动摇；马尔罗对《关于真理的传说》（*la Légende de la vérité*）^①一书的看法使我对萨特感到担心，他从1930年代初就崭露头角的丰富想象力和旺盛的创作力没有体现在一部卓越的著作中，而是断送在哲学与文学的混合体里。我们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因此而费劲，让-保罗·萨特责怪我对“胡说八道”过于战战兢兢，他这样说当然有其道理。即使在所谓的精确的科学研究中，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错误也有其有利的一面。然而，萨特在政治上却常常滥用可以犯错的权利。

埃里克·韦尔的名字大概只有数千人听说过。他拥有非同寻常的、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渊博学问。我曾多次同他争吵，起因只限于时事，与哲学上的分歧无关。但一旦我们的谈话涉及哲学，我几乎由衷地感到他的智力超过我，他看得远，钻得深，自成一派。在当时，他对著名哲学家的了解比我更为深刻。

我对亚历山大·科耶夫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如果我提出一

① 这本书的手稿曾被伽利玛出版社退回，不久后这本书连同萨特其他未发表的文章一并出版了。

种大胆的设想，那么他在我之前就已经完成了对该设想的构思。即使他没有产生这种想法，他依然具有这种能力。他对哲学知识的了解之广泛、基本功之扎实，也同样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遗著可以作证。1938年，他也同样误解了“正在形成的历史”，因为在入侵波兰事件发生的前几个月，他还不相信战争已经迫在眉睫。我在本书的某一章中曾提出过下面这个问题：他在1939年宣称自己严格奉行斯大林的立场有什么道理呢？

我同三个杰出人物结下了亲密无间的友谊，我们之间的友谊使我避免了对自己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三个人中，只有一人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怪物，另外两人几乎一辈子默默无闻。我从未幻想把自己同历史上的伟人相比，相反，我只喜欢援引这些历史人物的话来阐述自己的看法，并且加以发挥。我羡慕萨特，他在25岁时就认为自己能够达到黑格尔的水平。这个圈子里的另外一个人则认为，自己如果从事的是社会经济学研究，肯定能超过马克斯·韦伯，我对此却表示怀疑。我也羡慕埃里克·韦尔。有一次他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哲学的发展将由他来完结，我对此只能报以微笑。至于科耶夫，他认为自己的著作标志着思想和人类史发展周期的结束。直到今天我读他的著作时，仍然怀有50年前那种感觉，也许只是更加恍然吧。

当然，我对这几个杰出人物的看法介于赞赏和怀疑之间。但是这种赞赏的心情使我对自已并不抱太高的要求，同时也使我不至于对自己的雄心和著作之间存在差距而感到痛苦。每当我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完成一本书之后，我就把它抛在脑后了。从作者的角度来讲，我对《历史哲学导论》《知识分子的

鸦片》《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克劳塞维茨论战争》这几本书比较满意，这种感觉持续的时间大概较为长些。

我对自己的任何著作都感到不十分满意，但是因为木已成舟，无法挽回，所以尽管它们同自己所希望达到的水平相距甚远，我对书中的不足也能泰然处之。《历史哲学导论》这本书本应多花一年的时间好好润色一下，写作方法也应该更自然些，少一些省略，更放得开些。同样，尽管我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构思，《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这本书仍然写得过于仓促，对每个部分思考的成熟程度也不一样。当我的一篇文章汇编^①出版后，来自英国和美国舆论界的反应，无论是最宽容的，还是最严厉的，都没有影响我对自己的看法。贝尔纳·克里克教授没有把我看作托克维尔的门徒弟子，而是把我看作托克维尔的同辈，对于克里克教授的话我并不相信。面对我敬重的历史学家费利克斯·吉尔伯特（Félix Gilbert）颇为严厉的评论，我也并不感到抬不起头来。

如果说我不在乎别人对我和我的著作的评价，那并非我的心里话。那个讨厌的血栓还没有使我的脸皮厚到如盔甲一般。然而，我在20岁时具有的那种过分敏感已经降到正常值以下了。如果我失去某些人的友谊和尊重，无论他们是上年纪的人还是年轻人，我都会感到痛苦，因为他们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至于其他人，他们完全有权把我埋葬。在我同辈的少数幸存者中，乔治·康居朗应该享受他应得的安宁。他的隐居生活、谦虚品德以及他仅供少数读者阅读的著作的罕见质量，使他不必卷入那种为了在巴黎建立威望或权威而互相攻讦的搏斗之中。而我出于偶然或反常的原因，则固执地不肯保持沉

① *History and Politics*, New York, 1978, Free Press.

默。我受到别人攻击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有时也攻击别人，但我总是尽可能地避免主动出击。对于我来说，论战的年代已经结束了。但是不知出于何故，我有时仍然感到自己必须揭穿骗局，必须继续进行我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战斗。我将心甘情愿地把点燃的火炬交给其他人。

《是什么东西让雷蒙·阿隆四处奔忙呢？》，这是维昂松-蓬特在《世界报》上对拙著《社会学主要思潮》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的题目。过去让我奔忙不止的是我那不幸的父亲遗留下来的未竟事业。但是这项事业并没有要求我去追求荣誉。我父亲的确希望获得荣誉勋章，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我父亲为之奋斗而又未达到真正目标的一种补偿。我既不向往那些“荣誉”，也不企望在社会上获得成功。还是皮埃尔·布尔丹催我填了一份申请表格，从此我成为法国荣誉军团勋章获得者，我享有该荣誉长达 28 年之久，这也算是一项纪录。其他的头衔都是自己送上门来的。人们用来形容温斯顿·丘吉尔的那个惯用语对我也非常适用：对各种勋章，从不申请，也不拒绝，从不佩戴。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接受授予我的 12 个名誉博士头衔，因为拒绝会显示出一种不得体的傲慢。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的革命性的动机，在我看来是毫无意义的。我对法兰克福市授予我的歌德奖深感荣幸。在我获奖 3 年之后是 G. 卢卡奇获得此奖，而 3 年之前则是 E. 荣格。

976

新闻工作虽然没有为我在大学的同事们面前增添光彩，但或许正是这个引起了国外学术团体对我的注意。如果没有我的文章，国内的教授们可能会更欣赏我的著作，而国外的大学就不会那样经常地想到我。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我已经实现了父母对我寄予的希望，正心情舒畅地等待我的最后时光，而不

必更多地陷入对父母晚年的痛苦回忆。

我是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由于有机会接近高水平的哲学家，我明白自己永远不会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分子。如果我在1945年重返大学教书，如果我在1947年被送入巴黎大学的校务委员会，如果我放弃了新闻工作，我一定会写出另外一些书来。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就是，我将会写出一部洋洋洒洒的巨著，而不只是列入“思想”丛书中的三本书。这本巨著可能不会吸引太多读者，但会具有我一直向往的严谨性。我对未写出这本可能会与《历史哲学导论》或《克劳塞维茨论战争》齐名的巨著感到遗憾。但是，我为传播自由而写的分析和鼓动文章弥补了我的这些损失。

我因未能写成而引为憾事的著作是什么呢？有些读者可能会回答说：一本关于马克思的书。我只能不无踌躇地赞成这种普遍的看法。任何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学者，都不会对已经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用我的朋友乔恩·埃尔斯特的话说，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人才能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拥有才智和为人正直呢？一个人也许既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拥有才智，但是他（在思想上）不会是正直的。真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为数并不少，但是他们都缺乏才智。埃利斯特正在写一本以“赋予马克思含义”（*Make Sense of Marx*）^①为目的的书，这不是一本人物思想传记，而是根据马克思的一些著作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书，也可以说，是对有价值的马克思主义，或者说在今天仍然适用的马克思主义的一

① 翻译成法文不太容易，意思是记取马克思合情合理的话，从文章中摘录我们能给予的含义。

个总结。

我现在的计划以及我几年前的计划，完全不同于早年的，即把青年马克思的哲学思辨的实质提炼出来，把握住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中阐述的经济学观点的主要脉络，并从上述两个方面总结出可能存在于马克思身上的多样性以及这个革命预言家的特性。1967～1977年，我在法兰西学院任课时编写的教材已经描绘出了写作的基本轮廓，但是我怀疑自己没有时间完成这篇论文。在我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将留下一个空白。但是，这个损失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了不起，同样，它对我本人来说也并不算回事儿。

就在我从事写作的时候，一场关于马克思学的新论战再次兴起。这场论战是由那些突然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产生兴趣的英国分析学家挑起的。他们重新拿起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这篇著名的文章。马克思自己认为，这篇文章包含了他的历史观的实质。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没完没了地评论这一观点，而卢卡奇和在他之后的存在主义者们都嗤之以鼻。此外，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之间撰写的某些经济论著至今尚未发表，因此要全面地认识马克思的经济学思想，则必须等待今后几年的马克思学研究的发展。专家们所知道的一个叫马克思的经济学家，要比仅仅是《资本论》的作者的那个人更丰富、更微妙，也更加令人感兴趣。但是这个实用的马克思——如果我可以这样讲的话——有可能改变了世界历史，但他是一个散布错误观念的人，比如他提出的剩余价值率就使人联想到生产资料国有化可以为劳动者从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夺回巨大的价值。而社会主义，或至少是共产主义可以消除其中“经济的”和“肮脏科

学的”败类。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他作为经济学家，也许他的思想最为丰富，并且最叫人迷恋。但是作为预言家兼经济学家，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公认的鼻祖，他却是个令人诅咒的诡辩家。他应该对 20 世纪出现的种种情况承担他应负的责任。

978 我对自己在《历史哲学导论》和《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中所宣布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同样感到遗憾。分析家们对这两本书的争论已不再使我感到过于激动。但有两场争论令人颇费笔墨，其中一场争论被人们称为“亨佩尔 - 德雷之争”（the Hempel-Dray），另一场争论则是围绕“社会行为”的本质（或现实性）而展开的。在我看来，可以说争论已到强弩之末。我对第一场争论多次做过暗示，它属于对“解释”和“理解”持不同见解的问题。解释历史同解释科学的最理想方式是相同的，它首先要求有一种或多种普遍性的设想，从中可以推断出其特殊的连续性。这种模式往往是暗含在社会史学家的著作之中的。但是当涉及一种决定和一个处在独特情况下的人物时，史学家便根据主要角色的特点，用当时情况的逻辑分析来解释这一决定。通过了解希特勒的野心和性格来理解他在 1941 年 6 月做出攻打苏联的决定，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样说也并无太大的把握。我认为，像解释一个血栓、一场暴风雨或一场地震那样来解释希特勒的决定，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其存在的意义上讲，都是错误的。

我对第二场争论的内容倒是颇有兴趣。它涉及社会事实，涉及“社会行为”的本质，而这种本质是不应该与社会现象混为一谈的。一种邮政制度，一种铁路制度，一个教会，难道能够同一个实体等同起来，或者能够更简单地与一个能够做出决策的、可以用形容一个人的方式来形容的主体相提并论吗？

这场既微妙又复杂的争论大概会永无休止地延续下去。一种邮政制度，或者一个古老社会里的赠予或非赠予制度并不是指某个有血肉之躯、富有感情的皮埃尔先生或者保罗先生。一种“社会行为”必须包括一些人，一些稳定的、受礼仪约束的或者有组织的关系，也包括保证制度长期存在的行动。这种制度难道能够像人一样行动和发号施令吗？对此，我试图像一个目光敏锐的分析家那样回答既是又不是，或者回答说是或不是，这就随您的便了。无论是一个狭小的古老社会，还是一个广阔的现代化社会，都是由各种各样的整体和部分组成的，这些社会组成部分始终存在，它们并不是在社会学家的观察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但是这些社会组成部分的存在方式并不是从生物学角度说的一个生命有限而又具有独特性格的个人的存在方式。在这些“社会行为”之中，大量的个人当然可以互相替换。受仪人走后，接替的人照样发挥同样的作用。 979

尽管对这些问题的分析令我相当失望，我还是被它们迷住了。这些分析不仅关系到就方法论的个人主义^①开展的辩论，也关系到有关整体主义^②的辩论。我很想阐明自己对社会组成部分的零乱看法。按照狄尔泰的说法，就是对内在联系（Zusammenhänge）的看法，我们所有的人都是社会组织的细胞。

这场老调重弹的争论分别被冠以不同的名称，又成为涂尔干和塔尔德之间谈话的主题。卡尔·波普尔爵士所说的整体主

①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及其观点表现为，肯定所有的社会现象归根结底是由个人行为决定的，在社会科学范围内的全部解释都必须归结到个人行为上去。

② 也有人把它称作全体论或整体论。

义者与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者（例如哈耶克）之间的对话，也是以此为中心的。社会学家认为社会是自我运转的一部机器，个人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齿轮，绝对逃不脱无情的宿命论。照这样说起来，这场辩论便具有了另外一种形式。我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就是为了在阐述社会整体本质的同时，也阐明个人主义或者整体主义的某些解释模式。

我本应同时进一步发挥我在《历史哲学导论》和《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中阐述过的观点。当社会学家研究一个社会（或者其中某个部门）的“运行机制”时，可以说他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来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定义的，但是他并没有排除其中异变的可能性。出于方法上的原因，他的注意力越是集中在固定的整体部分上，他就越感觉不到对他来说是难以察觉的变化，然而有时这些变化却又突然使他大吃一惊。我本希望把制度与历史结合在一起研究。我在《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一书中曾指出，国际市场中的国家之间活动的相对独立性，要比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重要。现在在中学或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并不是自愿选择了这个职业，而主要是顺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需要。但是任何经历过希特勒和斯大林时代的人如果否认“英雄”的作用，并且仅仅看到一种全面的、无法改变的、可以预料到的宿命论在发挥作用，那么他就一定是在盲目地看待历史。而同时代的人在这种宿命论的发展过程中却能听得到声音，看得到愤怒，从而去探索其含义。

980

在我们这个经济发展与战争交织的时代，我本应该——也许我将会——在 20 世纪末期写出一本类似《关键的年代》（斯宾格勒）的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勾画出怀疑人类历史的哲学的轮廓。在 20 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本来会导致第三

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这种看起来符合逻辑的连续性由于技术更新和核武器的出现而被中断。这些新的手段大概永远不会被超级大国用来对付对方，因为它们可能造成的破坏将远远超过一次胜利所能带来的利益。

暂且不谈这些令人后悔不已的事情。假定有哪个人愿意在明天读一读我下面的笔录，那么他就会从中找到历史遗留在一个人的脑子里的全部分析、愿望和疑虑：我是法国公民，但是由于半自由的法国政府根据种族标准制定了一项法令，我又是被其摒弃于外的犹太人。我是欧洲共同体成员国之一的法国公民，而法国又是世界四大科学和经济中心之一，但是因为缺乏保护自己的能力和法国正在美国的保护和苏联提出的以自由换取和平的建议之间举棋不定。一个比任何时代都更加开放的、更加自由的欧洲正在因反对工业社会的各种限制而倍受煎熬。也许欧洲正在衰亡，因为任何文明都在自由中发扬光大，一旦丧失信仰，便枯萎凋零。从现在起至 20 世纪末，欧洲将处在这样一个世界里，这个世界将面临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但其科学和生产仍然注定要蓬勃发展。

令我不满的除了这些，我还常常后悔没能够把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提出的问题深究下去，并且也未对一些问题做出回答。怎样解释历史主义呢？对于我们从小就接受的并且用来指导我们分辨善恶的那种信仰体系，难道我们只能成为它的俘虏吗？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西方文明难道真比那些受其扼杀、践踏并且多次濒临死亡的文化优越吗？在某些方面，我依然是一个启蒙时期的人。我当然不会用“迷信”这个字眼来扼杀宗教的教义。我往往能够同那些虔诚的天主教徒和睦相处。

只要不涉及宗教，他们的思想就是绝对自由的。由于对世俗宗教怀有恐惧心理，我对超然存在的宗教倒是产生了某些好感。

世俗宗教与一般所说的社会信仰有本质上的区别吗？我们的社会始终在教导我们如何去判断人，去判断他们的行为和著作；而世俗宗教则企图占据绝对价值的垄断地位。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与等级、思想和制度的分化相比，标志着一种倒退。西方世界应该把它的强盛与富饶归功于或者起码部分地归功于政教分离。在苏联，一些伪教徒信奉着一种被人们称为“社会真理”的宗教，这种被称为社会真理的宗教集中了或者统帅着所有的附属真理。对于我们欧洲人和西方人来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定为国家真理，这不仅意味着一种倒退，而且等于自暴自弃。西方世界只能在多元制度下生活并且生存下去。

从词的广义上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应该被形容为一种迷信。拯救灵魂的宗教教义之所以能够免遭批驳，是因为它所承认的现实——或者真理——实际上是不能用理性认识的规律进行检验的。相反，企图成为最终真理的教条主义是科学研究范畴中的一个内容，属于被评论的对象。

某些人说我一贯反对共产主义，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坚持这一立场。我认为，共产主义的可憎程度不亚于纳粹主义。为了区分阶级救世与种族救世，我多次使用过的论据已经几乎不会再触动我了。阶级救世论的那种表面的普遍性最终变成了一种装饰门面的东西。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就同国家救世论或帝国救世论混杂在一起了。号称具有世界性的阶级救世论不仅没有超越国界去捍卫那种建立在共同信仰基础上的脆弱关系，反而把国家之间的争端或者战争神圣化了。

思想上或精神上的多元论并不追求一种可以同数学或者物理学的真理并驾齐驱的真理，它也不会重新下降到一种普通观点的水平。多元论已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它利用那些竭力否定它的种种信仰所表现的虚假谬误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对自己进行检验。既然什叶派教士也企图像苏联共产党那样统治世俗社会，那么伊朗的什叶派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可以说是一丘之貉了。西方人比列宁或者霍梅尼的信徒略胜一筹，因为西方人知道在科学真理和宗教信仰之间存在区别，尽管科学真理也不过是暂时的。他们还知道，西方文化的某些方面也是其他文化的一部分，因此他们对自己同样提出疑问。拒绝怀疑的立场可能有助于增强战士的斗志，却排除了和解的可能。霍梅尼们和那些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使我们联想到，“信仰的感召力”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引起十字军东征。今天的西方人不仅了解多元论在精神权力上的合法性，而且也认识到我们文化中的特殊性，因此只有他们为具有意义的人类历史开辟了道路。

从逻辑上讲，使政治脱离教会的影响也会导致一种多元制。但这并不等于说可以把党派之争同精神上的多元制相提并论。在我看来，由于传统的信念已经日薄西山，我们今后则需要探讨社会秩序问题，或者说，探讨政治制度问题。认为一个永远处于争执之中的社会比一个大家都由相同的信念连接起来的社会更为优越（要看优越性对谁而言？），这并不是一个理智的观点。我认为，政治上的争执是宗教争执的必然结果。然而，对于政治上的争执，人们可以采取暴力或狡猾的手段进行打击、镇压、扼杀，或者根据政体而持容忍的态度或进行协调。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得出这样一种结论：我称为“立宪多元

制”的政体将永远是最好的和唯一正确的政体，因此应该在全世界加以推广。多元制的政体符合那种被奥古斯特·孔德称作“人类先驱者”之人的思想境界。要使所有人都有权参加有关共同命运的政治讨论，其前提是放弃绝对真理。但是，有些社会是不可能交出这个权利的，然而这个权利也不至于土崩瓦解。

983 在古典哲学中，民主制必须有公民，有贤良的公民，有遵纪守法的公民。在工业社会中，民主使生产者与消费者、利益集团与政党彼此对立。一种政权产生于这些不可避免的明争暗斗中，必然受它们限制，随时都可能堕落，可能无法很好地认识集体安全的必要条件。

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诉说道，由于民主代表了历史，由于臣民们在几个世纪的岁月中形成了对君主的感情，因此，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将来，人们都希望一国之主应该与民众有所不同。如果以冷静的态度对所有理论上可行的政体进行正反两方面的比较，我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是应该把欧洲的还是美洲的民主政体排在首位。但是在西方，还有哪种政体会享有合法性呢？一党制政体只能依靠无法掩盖的暴力和民众沉闷的屈从来维持。东欧国家的实践已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即便在政治方面，对历史主义的争论也带有抽象的和几乎是人为的特点。如果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对人类社会没有停留在新石器时代或希腊城邦时代是否感到惋惜呢？我认为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而且问题本身也毫无意义。猿人的智力发展决定于他们的基因遗传因素。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共生活是以多种方式组成的。这种多样性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对“历史主义者”来说，问题在于没有辨别好与坏的标准。在比利牛斯山的这边是真理，翻过比利牛斯山可能会成为谬误。

社会学家赞赏语言和风俗的多样性，赞美人类表达方式的丰富性。用什么样的尺度和标准，我们才能在这些“社会”中进行选择，在等级制度中为其中的每个社会排名次，并且在这些“社会”中挑出一个最佳社会或者评个典范呢？马克斯·韦伯曾以同样的兴致提出过后面这个问题，即把德国文化和法国文化相比，哪一个更为优秀呢？我的回答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在它们中间进行选择，还是想把其中之一置于对方之上呢？

984
如果好与坏在不同的社会里会颠倒过来，那么多样性的确会把我们引向怀疑主义。我认为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真诚、坦率、慷慨、温良和友谊并没有因时代变迁、大陆相异或者超越了国界就改变其形象。当然，同样的行为在一个集团中可能被视为挑衅行为，而在另一个集团中则可能被看作一种健康的体育运动。人们并不是用同样的标准来评价各种活动和成就的，在同一个社会中，并非仅仅存在一种模范人物类型。骑士、教士和学者追求的最高目标并不相同，不能用统一的标准来判断所有人类学所规定的文化范畴的内容。如果有人提出统一的标准，这个人必定是某一特定文化的成员。在一场混战之中，并不存在超然的旁观者。

文化的多样性在某种程度上同艺术的多样性是相通的，我们对文化的繁荣应该感到欣慰，而不应该为它的无政府状态而抱憾。我们这些西方人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我们比其他人更了解这种多样性的意义，更渴望追求真理，或者更渴望追求世界性的普遍准则。目前存在的分歧在折磨和撕裂着我们的历史意识。然而，我们并没有丧失自我克制的能力，或者起码可以说，我们是能够容忍不同意见的。

高卢征服了罗马，并由此产生了法兰西民族。我们应该诅咒这个历史事件，还是应该赞美它？每个人都将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知识做出回答。我们还是把这种对历史的评价留给那些有兴趣的博学者、论战者，甚至像费希特这样的极度热衷于宣传和鼓动的哲学家去做吧。只有这些历史评价变成了政治评价时，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

在我们这个时代，成千上万的人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的内心正经历着两种文化的交接运动，其中一种文化濒临死亡，而另一种文化则既使他们感到厌恶，又具有吸引力，因为它指出了一条通向富强和昌盛的道路。大约半个世纪以前，我就这样写过：西方世界再也无法断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是喜欢自己缔造的社会，还是喜欢自己破坏的社会？由于丧失了殖民帝国，欧洲人不再承担原有的责任了。他们可能仍在搞着灭绝种族文化的勾当，但是他们并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会起这种作用。人类历史留下了大量文化消亡的印迹，有些文化甚至已从现在还活着的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对于印第安人、印卡人和阿兹特克人来说，历史是悲惨的。有谁会怀疑这一点呢？历史不仅贬低了文化遗产的价值，而且也同样败坏了古人的名誉。历史将走向何处？明天的世界能否为中途倒下去的人所遭受的苦难进行辩护呢？任何人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到了20世纪的今天，我们从昔日文化的乡土气中，从幼稚的进步主义和简单的相对论中解放了出来。奠定我们的信仰之基础的，是科学的真理和承认无论贵贱高低，任何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发生在20世纪的种种事件打破了我们的幻想：科学的发展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也不能保证社会的发展。与一般流行的观点相反，希特勒和斯大林政权的暴

行使我们摆脱了进步主义的粗犷形式。我们知道，任何情况——包括最坏的情况——都可能发生，但是最坏的情况在道义上是可以同情理区别开来的。

我应该由此而写出比“思想和行动中的历史意识”^①更好的一种理论。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思想上既承认所有文化都有生存的权利，同时又坚决维护他自己的文化呢？这对矛盾怎样才能在实践中得到调和呢？我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从属于这个国家，却又忠实于我的犹太祖先。一旦某些城市遭遇了核武器，或者说，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惨遭杀戮，我们又将如何接受这一不测事件呢？我是否有必要再次引用我在《历史哲学导论》中写的最后一句话呢？那句话就是：

人的存在是辩证的，也就是说，是富有戏剧性的，因为人类生存和活动在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里，不管需要多少时间，人类总在探索一个难以捕捉的真理。除了一种不完整的科学和一种形式思维，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保证求得真理吗？

我将把社会准则与道德操行更好地区别开来，我将使学术真理和人类大同的基础更加坚实。在行动上，我将更具体地描绘我们的历史命运，但我不会使用截然不同的语言。在平时时期，生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的公民几乎没有机会体验孤注一掷、铤而走险以前那种狐疑不决的苦境。当集体的安全受到威胁时，当我们在权衡核威慑与核武器的利弊时，当我们对接受美国的

^① 这是我在阿伯丁大学的吉福德讲座中的两场演讲的题目。

保护还是甘愿接受苏联的保护而拿不定主意时，我们便置身于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我们将在两种不健全的社会制度中做出抉择，以其中的一种去反对另外一种。我们还会勉强接受可能出现的惨局，而这种惨局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坚决抵制的。

大约在半个世纪以前，我曾用“戏剧性的”这个词形容过我们的历史状况，到底应该称它是“戏剧性的”还是“悲剧性的”呢？在某些方面，“悲剧性的”的确比“戏剧性的”这个词更恰当。在核轰炸的威胁之下，迫不得已建立安全体系是个悲剧，在扩充常规军备与核威胁之间进行抉择也是一个悲剧，以工业文明摧毁古老文化也是一个悲剧。但是，如果经历了所有悲剧之后仍然无法设想出一种幸福的结局，那么只有这时才能得出悲剧的结论。我坚持认为幸福的结局是可以想象的，这是远远超越政治视野的“理性观念”^①。

我是否像让·多麦颂那样一些人所说的，后悔没有成为基辛格式的显赫人物呢？对他们这些人，我会友善地说：你们误会了。罗杰·马丁·杜加尔在他尚未出版的《回忆录》中，曾过分恭维地描绘了我的形象，并且按照他自己的方式解释了为什么我不会“治国”。^②

① 康德意义上的。

② “当我拜读雷蒙·阿隆的著作时，我会不由自主地赞成他的观点。这种感觉非常强烈，从而使我认为人们应该赋予他一种绝对权力，应该委托他来治理国家。这是一位自梭伦（Solon）谢世以来人们等待着的‘理想统治者’。但是当我想象他居其位时，我又觉得他过于聪明而不适于执政！这是因为他的智慧不仅会使他在对手面前解除武装，而且还会使他太谅解对方，以至于没法对他们进行排斥和打击……”这篇文章的落笔日期是“1957年夏季”。罗歇大概是针对我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所持的态度而发此议论的。

就我个人来说，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自己从来没有治国之才，甚至连当顾问的资格都没有。我对文字的处理一向谨慎，但对自己的言谈话语却比较随便。我经常即兴或者任性地讲一些过头话，然而这些话既不反映我的真实思想，而且还可能使人们对我失去信任。政治家对自己的舌头要像对待手中的笔一样小心谨慎。我并不是不会见什么人讲什么话，但是我无法忍受那些外交辞令。我不喜欢讲话时字斟句酌，至于当面撒谎，即使是一句最通常的假话，也会使我感到难堪，就连拒绝一顿晚餐或一场讲座之类的小事，我都编不出借口来。

987

再者，我从来不认为自己具有经济学方面的才能。当然，大多数财政部部长也同样缺乏那些从事教育和管理经济的人员所具有的专业才能。当一个部长打算在政府部门之外聘请一名顾问时，他怎么会挑选像我这样一个既缺乏专业知识，又在思想上一贯我行我素，而且易动感情，不具备顾问修养的人呢？

我同亨利·基辛格一直保持来往。他对我是怀有好感的，而且不论我是否在场，他都不掩饰这种感情。正是基于这些原因，一些评论家在谈到我时，总是情不自禁地联想到基辛格。我的子孙后代会永远引以为荣地珍藏一本基辛格的《回忆录》，书的扉页有作者亲笔题词“献给我的老师”（除非有朝一日，历史学家把基辛格从铜像座台上推下来，而且我也和他一样受到命运的捉弄）。在华盛顿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每天早晨向总统汇报世界局势，作为总统的代表在北京或者莫斯科进行谈判，假如我是个美国公民的话，国务卿这个职务肯定会对我具有极大的诱惑力。更何况哈佛大学

的麦克乔治·邦迪、罗斯托、基辛格和 Z. 布热津斯基都是和我派头一样的教授，他们既没有参加过竞选活动，也没有去拥趸总统，却都登上了国务卿的宝座。当然，如果我是个美国公民，肯定也会希望体验一下作为当权者的滋味。但是，（我希望）我仍会及时地意识到自己并不具备基辛格那样的才干。

担任国务卿，光是具有智慧和判断能力、能够掌握情报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种我力不能及的左右逢源的能力。例如，他必须能够在华盛顿这个人與人、部门与部门之间弱肉强食的世界中立住阵脚；必须能够笼络住新闻界，或者起码要避免与之为敌；必须能够制定出把年轻人送上战场、充当炮灰之类的必要决策，或对制定这类决策施加影响。我并不是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拒绝诉诸武力，但是，抽象地允许诉诸武力是一回事，当场说服总统并且立即使用武力却是另外一回事。顾虑重重和憎恨暴力的习性只会使我难以胜任像基辛格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所担任过的职务。

不谈这些不现实的心里话了，权当我假想在法国也设立了一个类似的外交和国防事务顾问的职位。但是第五共和国的任何一届总统都不会需要，也不会接受这样一个顾问，顾问这个职位也不会产生多大的吸引力。戴高乐将军的大多数外交活动都不过是演几场戏。对于他的拉丁美洲、罗马尼亚和波兰之行，将军除了记得自己受到了热烈欢呼，还留下了什么其他的回忆呢？人们对他做出的某些决定至今记忆犹新：法国退出了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为了使法德两国摆脱“美国霸权”的控制，力图缔结法德联盟（但是以失败告终了）；同莫斯科重新建立了关系（继缓和之后，两国之间既没有达成谅解，也

没有发展合作关系)。从那时起，法国的外交便集中在两个方面：与欧洲共同体的伙伴们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在世界其他地区展开活动。

在非洲，法国努力保持它的势力范围，并且维护它与法语国家之间的关系。在乍得、中非和金沙萨（扎伊尔），危机时起时伏。所有这些决策，无论成功与否，既不需要非凡的远见卓识，也不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在中东，法国缺乏直接影响局势的必要手段，因此除了发表一些声明，法国外交几乎别无活动的余地。法国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尽管第五共和国的历届总统都以美国总统为楷模，想独揽外交大权，但是这种想法只能是一种幻想。自戴高乐将军去世以来，除了同意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法国外交并没有脱离原来的轨道。法国在今天的世界之所以有现在的地位，并不能归功于法国的外交政策，而应归功于全体法国人民，归功于他们杰出的工作和文化素养。

我既没有幻想过当部长，也没有幻想过当大使，更没想过在某个著名的委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至于是否接受“九贤人”中的一个职位，当时完全取决于我个人的态度）。我常常对自己提出这些问题：青年人从我的教导中得到了哪些启示？989
我的文章对我的国家、我的读者，以及法国报界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否有利？在过去的30年中，无论如何，我每周至少要写出一篇文章。我在过去30年中的辛勤劳动是否发挥了一些有益的作用？我过去一直在探索这些问题，它们既给我带来了苦恼，又让我充满了希望。

在巴黎大学工作的12年中，我对我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从不感到担忧。我向我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

学生传授有关工业社会的理论、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孟德斯鸠的社会学观点以及我对国际关系的研究。这样的教学内容大概在某些方面同一个负责汇编考题的专家为某些专攻社会学的学生上课时所讲的内容有所不同。然而，从我的青年时代到1968年爆发学潮，巴黎大学处于一个过渡期，面对此时期入学的学生，一个以单调乏味而又严谨的方式来逐段分析和解释社会学的老派教授，不会比我教得更好。也许有些人认为我的教学方式更好一些，但是大多数人认为我不如别人。社会学家们之所以强调专业培训社会学研究人员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了解这种培训的局限性，而且归根结底，他们知道这是一件不费气力的事情。

我曾反复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从广义上解释我的教学思想或政治内容？我曾谈到自己和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有过一段交往。1982年，在我这本书的写作即将杀青的几个月前，该校一个毕业生将他写的一本书中的一些片断寄给了我。他并不打算出版这本叙述自己一生的回忆录。在这本不厚的书中，他是这样谈论我的：

我们完全是遵照奥里亚克的建议（他的建议对我们来说就是命令），来到巴黎大学一间配有护墙板并且光线十分昏暗的大厅，参加由一个神态威严、名叫莱昂·布伦什维格的人所主持的法国哲学协会的讨论会。莱昂·布伦什维格有着宽阔的前额，犹如希腊神话中的天神，他那深邃的目光似乎可以向一切表面现象发出挑战。雷蒙·阿隆刚刚发完言，他好像要散架了，一张线条夸张的面孔看上去像是一副面罩：扇风耳，鹰钩鼻，还有一个既带有讽刺

意味又充满辛酸的嘴。他以一种超脱式的冷静，阐述了自己对历史的相对论、民主政体的脆弱性以及人类未来的变化无常等问题的看法。他的观点激起了身材魁伟的维克多·巴希的愤怒。浑身不停地颤抖的维克多·巴希以希腊平民演说家的声调，声若洪钟地维护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自由诞生于希腊，并且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启迪人类，它是一盏永不熄灭的明灯。自由是所向无敌的。他的对话者，其表情冷酷淡漠，彬彬有礼地^①回答说：什么事情都不是命中注定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充其量可以这样想，人们由于厌倦，可能在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后，仅仅在口头上承认理智与道德比激情和暴力更为有效和更为可靠。理智与道德彼此协调一致，才可能让双方都立于不败之地……显然，雷蒙·阿隆是正确的。^②

① 确实如此！

② 我抄下了这段有关我的面孔的描绘，并拿给另一个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听过我讲课的学生看。这个“高等师范生”当时已在大学任教，他既没有参加过学生们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出席过法国哲学协会的讨论会，但是他还记得他的老师。他在给我的来信中这样写道：“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您的表情和神态在课前、课上和课后与那段关于面孔的描绘是吻合的，但是它还缺少了一样东西，应该添上‘笑容、亲切和好脾气’。的确，您参加哲学协会的讨论会并不是为了表现出亲切，而是为了捍卫您自己的观点。就算我承认您的嘴带有‘讽刺’，我绝不承认它带有辛酸。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词来替换那个字眼，但是我从未感觉到您有辛酸，就连那天晚上，当巴黎大学刚刚表示它不支持您而支持古尔维奇后，我偶然去看您，也没从您那带有讽刺意味（并不总是如此）的嘴上感觉到辛酸。对不起，我当时的确从您的嘴角上察觉到某种愁绪，请您原谅，这是事实。”第二个听我讲过课的人在战前的年代里成了我的朋友。那些仅站在远处听我讲过课的人，以及那些曾到我在布朗湾的小房子里来看我们并同我一起讨论我在这所房子里完成的论文《灵魂的自由》的人，两类人对我的看法是不大一样的。

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的那个学生上面提到的法国哲学协会的讨论会是在1939年6月举行的，我自己在前面的一章中，也以复杂的心情谈到过这次会议的情况。当然，在对未来毫无把握上，在战争的威胁和民主政体的脆弱性等问题上，我是正确的。虽然暴风雨已从地平线升起，但是维克多·巴希却仍然泰然自若地生活在他个人的信仰之中。他后来遇害了，原因是他是犹太人，他所信仰的东西全是纳粹分子和他们的法国帮凶一心要毁灭的东西。

那个“师范生”在回忆他的哲学老师时说：

991

我们在学校同时听两个哲学教师的课，他们俩虽然都是犹太人，却截然不同。德雷福斯·勒福瓦是个责任心很强的教师，他从不缺课，课总是讲得完整而又详尽。他从不向我们提问，也没有什么令人吃惊的观点，我们对他的课无动于衷。而雷蒙·阿隆却是个思想敏锐的人，他给我们上课时，根本不考虑课程的安排。他向我们谈他自己对历史哲学的看法，从马基雅维利到索雷尔，从霍布斯到帕累托，无所不谈。他的课富有挑战性，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雷蒙·阿隆用人们肯讲的和不肯讲的各种政治实践来反衬理想的乐观主义。这种政治实践就是俾斯麦曾经实行，后来又给予希特勒启示的现实政治。雷蒙·阿隆那时刚从德国学习归来，他在留学的几年中，目睹了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他显然对这种思潮感到深恶痛绝，但同时也被它所吸引。他曾经信仰过社会主义，并且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着深刻的了解。他赞赏马克思对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对后来那种摩尼教式的预言主义，对后来那种不准申诉

的判官态度却嗤之以鼻。他以清醒的意识和现实主义猛烈抨击各种幻想。我并不想放弃我自己的信仰，但是我承认他的观点对我是有影响的。当我们渴望继续生活在19世纪时，雷蒙·阿隆却像光明驱散乌云一样，以他那缜密的思想剥去了19世纪的神秘色彩。此时，我们这些手无寸铁、赤身裸体的人突然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然而，我们几乎对他产生了一些怨恨，因为似乎是他把我们引到了那里。其实，当雷蒙·阿隆揭露孕育着战争的纳粹的危险性时，他令人毛骨悚然，尽管他对革命信条不再寄予任何希望，扮演了反动员的角色……

1935~1939年，令人毛骨悚然的不是我，而是当时使我也感到恐惧的那个世界，我们大家今天都清楚这一点。我从来就不是个冷酷的人，但是我常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为什么呢？是因为腼腆？是因为拒绝混淆黑白？还是为了遵从斯宾诺莎的劝告——“对人类的行为不要嘲笑，不要遗憾，也不要抱怨，而要去理解”？大概与每个方面都有一些关系，也许还有更神秘的原因。我在1930年代——我的青年时期——讲过一些话，那些话可能表露了一种精神上的欢乐，我自以为驱散了乌云，接近真理。我对各种信仰一面口诛笔伐，一面不无留恋。如果在批判之中透露怀念之情，那么也许我的声音就不会由于一味分析而显得那样冷酷了。我那股子不平之气反而会显得热情奔放，虽然以意识来反对现实是徒劳的。

992

当我撰写《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一书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也马上想到了那个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听过我讲课的学生所使用过的形容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必须在战争与和

平之间，在维护法兰西的主权与让阿尔及利亚获得独立的权力之间进行选择，所以必须“无情地”打破这种僵局。分析问题没有什么冷淡与热烈之分，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我们应该持公正的立场。还有一次，为了感谢我为几百个天主教学生开了一场讲座，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我道谢。他还在电视中看到了我与平日迥然不同的形象。他为了压倒 V. 纳巴科夫，让我和后者在电视中辩论。

人们对我还有更为严厉的指责，说我反动员。难道我终生都在“反动员”吗？我不应该是这种人，因为我并没有献身于这种排他的和严峻的使命。1935~1939年，对我在圣克鲁高等师范学院的学生们来说，我可能起过反动员的作用。^①但是，怎样才能有幸做得更好一些呢？福科内为我提供了这样的选择：“心灰意懒或者穷凶极恶”。那个“师范生”和他的同学们认为我很可怕，因为我动摇了他们的信念，使他们看到了近在咫尺的生命危险。我为之辩护的那种民主制度，即便是处在衰落阶段，仍然比那些极权制度要优越。有一次在莱昂·布伦什维格的家里，让·卡瓦耶斯说：“我们为《法兰西晚报》反对《大众旁观者》而战。”这个最坚决的抵抗运动英雄说出这样的话，并非出于失望，而是有意进行嘲讽。我并没有为我的听众指出一条革命救亡的道路。如果革命救亡只能指望斯大林，我这样做难道是错误的吗？

战后以来，难道我始终在搞“反动员”吗？对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崇拜者、拥护者和同路人来说，以反动员来涣散他们的斗志是非常必要的。我在这件有益于身心健

① 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样看我，尤其是那些信天主教的学生。

康的工作上花费了不少精力。今天，并不是我的那些论据，而是现实和风气使共产主义所体现的革命希望丧失了信誉。然而，那个“师范生”在1930年代可以问我到底“向什么东西发出挑战”，到了1982年，米歇尔·孔达却无权这样写了。战后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实现了蔑视民主的人认为它们不可能实现的进步。这些国家实现了经济增长，获得了个人解放，改善了社会关系。究竟是谁在推行一种“苦行僧式的”教育呢？是那些相继到莫斯科、贝尔格莱德、北京或者哈瓦那去朝圣的人，还是那些挣脱了愚昧信仰的桎梏，并致力于自由体制的繁荣和改革的人呢？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自由体制并不太坏，大概在历史上也不是最坏的。

对世俗宗教的批判本身就包含了某些明确的观点，它表明了一种总的立场，而有些人却给它加上因循守旧的罪名。我承认现有自由民主体制的那些特点是不错的。在我偏爱的《论自由》一书中，我竭力想阐明，自由的两种形式必然要结合在一起：国家要给个人留下一定的自主权利，给赤贫者留下一定的谋生手段，以便让他们也能够行使那些得到公认的权利。现代民主体制懂得选择的自由，也清楚自由的能量。但是前者要受到国家的限制，而后者则由社会法律加以保证。我认为，西方社会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树立了这两种自由形式互相妥协让步的典范。

如今，那些思想大师大概不会再把我称作“穷凶极恶或者心灰意懒”的人了。他们有可能会指责我是个保守分子，对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无动于衷，对那些只要不是瞎子、任何人都能一目了然的不完善的甚至存有许多弊端的政体听之任之。富人与穷人、强者与弱者总是相对存在

的。所有社会正义论（sociodicée）对我们的种种社会制度所做的辩护还不如神善论（théodicée）对造物主所做的辩护更加令人信服，然而就是那些神正论也始终未能充分证实造物主是“至善”“全能”的。那些无限推崇平等，把它置于自由之上的人，对我在论文和著作中只用适当的篇幅谈论不平等的“丑闻”横加指责。

我在巴黎大学任课时，经常论述不平等的问题。有一年，我每周用两个学时来论述这个主题。我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不甚满意，也就没有专门就这个题材发表过任何东西。

994 平均主义者，根据这个词的含义，我完全是这样的人。我讨厌那些过于繁杂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社会等级观念会扼杀手足情义。这是拯救灵魂的宗教和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传授给我的吗？我的许多同事，而且往往是那些左派人士，在自己的学生面前表现得傲慢无礼或者独断专行，他们的这种态度令我感到惊愕。而我承认，我不知道在这些感情之外，社会公正还包含哪些内容，也不知道怎样分配收入、财富、威望或权力才符合公正的条件。美国研究权利学说的哲学家们几年来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趋向于认为，最大的平等与维护自由是可以并行不悖的。这些思辨虽然精彩，却不能掩盖对某些具体情况做出判断的事实，也无法消除综观全局时的疑虑。

由于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在各个方面都体现平均主义，所以除了在一个绝对专制的政府统治之下，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可能遵循任何简单的原则。做出否定的判断往往比做出肯定的判断要容易得多。某些团体、某些专业或者某些个人持有货币，或者享受非货币方面的利益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把他们

与其他团体、行业或者个人所得的利益做比较，也找不出答案。揭发不公正是比较容易的，而要指出整个社会怎样才算是公正的却并不容易。如果我们抽象地看待任何职业，就应该考虑到培训的成本、劳动的繁重程度、对共同福利的贡献、效率或者收益，以及个人精神方面的贡献（对此我就不谈了）。从这些考虑出发，任何人，甚至包括最精确的计算机，也无法对上述问题做出明确的回答。每个人在职业选择上有很大的偶然性，对于失败者来说，他可以将此归咎于命运，以此推卸个人的责任。

从某种意义上讲，所有为寻求真理而从事政治写作的人都是揭露骗局的人。在自由与平等的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社会学家们往往更加心怀疑忌。他们不相信那些在社会舞台上表演的人所开出的空头支票。那些最有胆略的或者最为悲观的社会学家因为再也看不到完善社会的前景而对完善社会失去了希望，他们便会极为苛刻地判断他们自己的社会。同是这个标榜机会均等的社会，其社会结构、阶层、治人者与治于人者仍然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各阶层的人员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发生变动，但是整个体制仍在传宗接代。继承人借助某些文凭，为自己增添了理所当然的头衔。

995

从同一事实出发，社会学家们却对我们的自由社会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家庭条件优越的人的子女比工人或农民的子女有更多成功的机会，这不足为奇。教育体制越是要求把孩子们集中在同样的学校里，使他们享有表面上的平等条件，机会均等似乎就越可望而不可即。实行统一式学校的幻想已经破灭。然而，人们是否有必要对机会不均等感到气愤，或者就算无法惠及所有的人，起码也对大多数人能够得到均等机会而感到高兴

呢？

同所有的社会一样，自由社会也使青年人“社会化”了，并且向他们灌输了某些价值观念和一种善恶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掌握政权、占据社会首要地位的那些人也会迫使人们接受他们的信条。法令或者国家所具有的道义权威使领导阶级更加合法化，并且进一步巩固了它们的统治地位，这难道是一件可耻的事？也许我们还是应该赞赏，一个没有宗教信仰、可能已经堕落的西方社会赋予了每个人充分的选择余地？如今，属于全人类的科学文化在塑造培育青年人方面已经占有首要地位，教育体制所传播的价值观促使人们不再遵从现行秩序，而是对其持批判态度。

从今以后，马克思主义再也不能以无阶级社会的乌托邦思想或以苏联的现实例子来镇压民主自由制度了。马克思主义可以用来孕育一种虚无主义。只要一味强调在不太专制的集体中存在价值观的专断和人际关系的不平等，人们最终便不得不承认这些显而易见的事实：如果现代社会能够自行再生产——如果它不能自行再生产，就不成其为社会——它的变化速度就会超过以往任何社会。而自由制度与我们所能看到的苏联式的专制制度依然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如果有人认为莫斯科的国家意识和巴黎的“象征性暴力”仅仅在程度上有所区别，那么他就会让社会学至上主义弄瞎了眼睛，看不到我们这个世纪的关键所在。

996 追随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家们认为，欧洲只能依靠信仰，依靠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才能重新振兴起来。我对此表示无能为力。如果我是犹太教或者基督教的信徒，我会尽力去宣传我的信仰或者我的真理。既然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空下的位置

便留给超然的信仰。而我个人坚持哲学家的信仰，对事物持怀疑态度，而不是否定态度。为了协调基督教的教条和现实的科学而进行的种种努力引起了我的兴趣，但是都未能说服我。旧福音书上的宇宙论与今天的各种宇宙论，由于没有机会交锋，反而可以协调地并存。科学从来不可能产生任何类似犹太人民同盟或耶稣启示的东西。

宗教社会学从方法上撇开了超自然的方面。它能否回答如下问题：21世纪会是个信仰宗教的世纪吗？天主教会再次复兴吗？如果有这种可能，那么它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呢？它将朝完整主义者所主张的方向发展，还是朝思想解放的神学家们所主张的方向发展呢？我觉得自己无权对此做出任何肯定的回答。在一个主张拯救每个灵魂的天主教和一个充当革命运动精神助手的教会之间，我更相信前者（尽管在我看来，后者在拉丁美洲各地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让我先撇开传统的教会不谈，集中精力来探讨一下世俗宗教。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否也本末倒置了呢？我是否因时运不济而误入歧途，或者错误地将经济和战争作为我思考的主要题材，作为我们时代的主要课题呢？我让自己在错误与时运不济之间进行选择。说实在的，我还能够做出其他选择吗？当我开始接触到历史意识时，“大萧条”已经激发了德国的民族主义，并为希特勒上台铺平了道路，从而把欧洲推向了灾难。马克思主义在莫斯科占了统治地位，在柏林爆发了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我的研究方向。我当时希望成为研究这些革命和战争问题的当代历史学家。

是我的时运不济吗？难道是我从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的德国历史主义中得到的启示使我偏离了正确的航道，偏

997 离了涂尔干和塔尔德的道路吗？受到日耳曼思想的“污染”、被让-保罗·萨特举世无双的文笔改头换面的我们这一代人，是否已经显得有些过时了呢？这是可能的，我对此毫不介意。然而，目前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们正同时运用着已不带政治色彩的马克思和韦伯的观点，而恰恰是这些政治色彩掩盖了两人之间互补的科学性。

我个人认为，虽然我曾受到德国文化的熏陶，后来又受益格鲁-美国人重视分析的影响，但是这些因素并没有使我背离法国。在1939年以前，德国与我们的命运攸关。直到1945年第三帝国灭亡时，起源于德国的各种思潮已经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影响。德国并不应该比其他欧洲国家对种族主义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追随者、尼采以及尼采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却预示了那些争霸世界的重大冲突，并且对这些冲突做了说明和解释。

日耳曼的诸神成为明日黄花后，由黑格尔-马克思主义体系变异而来的一种学说就成了美国式民主体制的唯一对手。这种民主制讲究实用，抛弃了形而上学，并且追求严谨的语义哲学。全世界的技术化向前突飞猛进。在现实面前，马克思主义的种种空想最终几乎自行消失了。甚至自1973年以来（可能还要早几年），经济形势发生的变化也改变不了人类未来的前景。

当我展望未来时，我没有发现什么值得乐观的理由。欧洲人因为出生率下降正在自己毁灭自己。他们拒绝生育，人口已经出现了老龄化。与此同时，他们无法摆脱一种在“20世纪末”让位于他人的思想的困扰。他们可以重演战后“光辉的30年”之故技，让外国人来填补空缺，但是这样做，就可能

加剧外籍人士和受到失业威胁的国内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大概从现在起至 20 世纪末，民主 - 自由的综合体和混合经济都要受制于经济低速增长、通货膨胀、货币危机以及国民收入与社会开支的比例问题等诸多因素。法国曾经出人意料地复兴了一个阶段，但是，由于无法适应残酷的竞争，再加上内部无休止的争吵和一味落后于时代的思想体系，法国再次陷入半瘫痪状态，并因此而逐渐丧失了原有的世界地位。

998

美国已经丧失了军事优势。苏联增加军备首先是用于威慑，然而一旦时机成熟，它也同样会进行武装干涉。以东海岸为大本营，影响并领导了共和国外交长达 25 年之久的美国政治阶层已经自取灭亡。美国政治阶层本是发动越南战争的罪魁祸首，却在理查德·尼克松尚未来得及结束战争之时，便把罪责嫁祸于总统的头上了。J. 卡特和 R. 里根总统则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外交政策上的人心一致已不复存在。美国没有足够的财力同时进行社会立法和重整军备这两项工作。美国在科学上依然保持着绝对领先的优势，它的生产设备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然而，无论是美国的敌人还是盟友，却都已觉得它前途未卜，难以预测。

在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作为大西洋联盟的一根关键支柱，其地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而现在似乎已经开始摇摇欲坠。西德位于前沿阵地，直接与苏维埃帝国接壤。它一方面设法在自己的领土上保留一支美国军队，另一方面又尽量不冒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们。几百万西德人的和平主义思潮限制了政府的决策能力：它到底是表达了人们对核武器的一种合乎情理的忧虑心理，还是表达了西德人民不愿意民族继续分裂？西德人对祖国被一分为二的隔绝状况已经越

来越难以忍受。法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和解是可靠而真实的。然而，在 1950 年代的论战中提到的日子——这就是，无论是社会党人还是保守党人担任波恩的总理，他都将面临来自东方的威胁和来自西方的保护的局——是否已经来临了？他最终将何去何从呢？

如果我放任情绪低落下去，即使在人们回首往事，承认我在大多数斗争中都采取了正确立场的时刻，我也可能会说，我为之奋斗的全部思想和事业都似乎已经岌岌可危了。但是我不想向悲观失望的情绪做出任何让步。在某些人看来，我为之辩护的那些政权仅仅是经过修饰伪装的政权，它们在本质上依然属于专断和暴力的政权，这些政权本身是虚弱而又动荡的。但是，只要它们还是自由的政权，就仍然保存着人们想象不到的巨大能量。我们将在核武器毁灭世界的阴影笼罩下，在可怕武器所带来的恐慌和科学奇迹所带来的希望这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下继续长久地生活下去。

我并不想用自己对正在发生的历史的看法作为这部过于冗长的回忆录的结束语。从定义上说，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对我个人来说的终点，对历史本身和其他人没有任何意义。我所从事的职业活动，无论是撰文、写书还是教书，都没有填满我的生活。自 1977 年以来，我能够安详地而不是痛苦地度过我的“死缓阶段”，这全都要归功于我的妻子、子女、孙子孙女们和朋友们。多亏有了他们，我接受了死亡的降临——这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在死亡之前，我经受了脑血栓后遗症和衰老的折磨——这更令人感到痛苦。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自己在 20 岁的时候常常对同学们和自己说的一句警言：“拯救自己这

个凡夫俗子的灵魂吧。”不管上帝是否存在，任何人在生命行将结束时，都无法判断自己将升入天堂还是堕入地狱。多亏有了他们这些人——我过去很少谈到他们，他们给予过我相当多的帮助——我重温那句警言时，既不感到胆怯，也没有任何担忧。

作者书目提要

这份书目提要既不完整，也不科学，它的作用是便于那些对本回忆录感兴趣的读者按照我划分的五个时期查找到相关著作。

一 1928 ~ 1940 年

《当代德国社会学》(*La Sociolog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 Paris, Alcan, 1935, 176 p. Rééditions: 1950, 1957, 1981。

《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局限》(*Introduction à la Philosophie de l'Histoire, Essais sur les limites de l'objectivité historique*), Paris, Gallimard, 1938, 335p., 1981年再版时被收入“诸如此类”(Tel)丛书，并附有与书中内容相关的几篇文章，如《史学家如何撰写认识论》(《Comment l'historien écrit l'épistémologie》), *Annales*, nov. - déc. 1974 和《叙事，分析，阐述，解疑：对若干历史常识问题的评论》(《Récit, analyse, interprétation, explication: critique de quelques problèmes de la connaissance historique》)。

《历史批判哲学：论当代德国史中的一种理论》(*Essai sur une théorie de l'histoire dans l'Allemagne contemporaine: 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Paris, Vrin, 1938, 351p., 1950年和1970年再版，列入瑟伊出版社的“问题”丛书，书

名改为《历史批判哲学》(*la Philosophie critique de l'Histoire*)。

1928 ~ 1933 年, 我为《自由论坛》(*Libres Propos*) 和《欧洲》杂志(*Europe*) 撰稿。这个时期, 我写的文章几乎都涉及法德关系、国家社会主义的崛起、希特勒的革命等问题。

1934 ~ 1939 年, 我为《社会学年鉴》(*les Annales sociologique*)、《社会研究杂志》(*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 和《哲学研究》(*les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撰稿。除个别文章外, 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文章都是书评。《帕累托的社会学》(*la sociologie de Pareto*), 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 Forschung*, 1937; 《意识形态》(*L'idéologie*) in *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 VI, Dans la *Revue de Métaphysique et de Morale*, XLIV, 1937, 《对法国经济问题的思考》(*Réflexions sur les problèmes économiques français*) 和 1939 年《埃利·哈莱维论专制时代》(*L'ère des tyrannies de Elie Halèvy*)。

1936 年, 巴黎阿尔康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第一卷(*Inventaires I*, Paris, Alcan) 收录了我的论文《社会危机与国家意识形态》, 分编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 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现实”的栏目下。

1939 年 6 月 17 日我在法国哲学学会上的发言《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Etats démocratiques et Etats totalitaires*), 刊登在该学会 1946 年的会刊上。

二 1940 ~ 1955 年

1940 ~ 1945 年

战争期间, 我只同斯塔尼斯拉斯·斯蒙季克合作写过一本小书, 书名为《关键的一年, 1940 年 6 月 ~ 1941 年 6 月》

(*L'Année cruciale: juin 1940 - juin 1941*), Londres, Hamish Hamilton, 1944。

我在《自由法兰西》杂志 (*La France libre*) 发表的大部分文章 (截止到 1944 年年底) 汇编成了 3 本书。

《反对暴君的人》 (*L'Homme contre les tyrans*), New York, édition de la Maison française, 1944, 400p. ; rééd. en 1945, par Gallimard。

《从停战到国民起义》 (*De l'armistice à l'insurrection nationale*), Paris, Gallimard, 1945. 373 p. 。

《帝国时代与法国的未来》 (*L'Age des empires et l'avenir de la France*), Paris, tribune de la France, 1945, 373 p. 。

1945 ~ 1955 年

《大分裂》 (*Le Grand Schisme*), Paris, Gallimard, 1948, 338 p. 。

《连锁战争》 (*Les Guerres en chaîne*), Paris, 1951, 497 p. 。

《知识分子的鸦片》 (*L'Opium des Intellectuels*), Paris, Calmann-Lévy, 1955, 334 p. 。

除了 1945 年与《观点》 (*Point de Vue*)、1946 ~ 1947 年与《战斗报》 (*Combat*) 和从 1947 年春天开始与《费加罗报》 (*Figaro*) 合作外, 我同时为其他刊物撰写文章。

我在《精神自由》杂志 (*Liberté de l'Esprit*) 上发表了《评〈北大西洋公约〉》 (1949 年 4 月刊)、《中立的骗局》 (1950 年 9 月号)、《关于可能的战争的思考》 (1951 年 12 月 ~ 1952 年 1 月刊)、《探究一种战略: 分割世界; 错误的抉择》 (1953 年 3 ~ 4 月刊)。该杂志也发表过我的某些思想评论

文章，如《救世主与明智》（1950年12月刊）和《极权制度诱惑》（1952年5~6月刊）等，我把这些汇编成册，题为《论战集》（*Polémiques*），Paris, Gallimard, 1955。

从1952年开始，我经常与《论证》季刊（*Preuves*）合作，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对德国大学生的一次讲话》（载于1952年18~19期），是1952年2月在法兰克福大学所做报告，《后斯大林时代的俄国》（第32期），以及几篇我从亚洲访问归来的文章，其中有两篇是围绕《知识分子的鸦片》辩论的驳斥文章，即《辩证法的幸运与不幸》（第59期）和《狂热、谨慎与信仰》（第63期）。

三 1955~1969年

《工业社会十八讲》（*Dix-huit leçons sur 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Idées, 1962, 378 p.。

《阶级斗争》（*La Lutte de classes*），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Idées, 1964, 378p.。

《民主制与极权主义》（*Démocratie et totalitarisme*），Paris, Gallimard, Collection Idées, 1966, 384p.。

这三本书是根据1955~1956年、1956~1957年和1957~1958年我在巴黎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编写的。社会资料中心在公开发行这些复印讲义时曾用过不同的书名（如《工业社会的发展与社会分层化》《工业社会社会学：一种政治制度理论的初探》等）。

《对本世纪的希望与忧虑：没有偏见的探讨》（*Espoir et Peur du siècle, Essais non partisans*），Paris, Calmann-Lévy, 1957, 343p.。这本书包括三篇论文，其中一篇谈右派，另一

篇谈衰落，还有一篇谈战争。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La Tragédie algérienne*），Paris, Plon, Tribune libre, 1957, 76p.。

《阿尔及利亚与共和国》（*L'Afrique et la République*），Paris, Plon, Tribune libre, 1958, 146p.。

《工业社会与战争》（*La Société industrielle et la guerre*），附有《1958年世界外交图解》，Paris, Calmann-Lévy, 1958, 182p.。

《不变的与可变的：从第四共和国到第五共和国》（*Immuable et changeante, de la IV^e à La V^e République*），Paris, Calmann-Lévy, 1959, 265p.。

《历史意识的纬度》（*Dimension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Paris, Calmann-Lévy, 1960, 335p.。在这本论文集中，除了第一篇论文《历史的含义》是1946年为“百科全书编委会”撰写的以外，这一时段的其他文章还有《显形与推理》（我在哈佛大学一次英语讲座的法语译文）；《论历史的客体》，1959年我提供给《法国百科全书》第20卷；《国家与帝国》载入《法国百科全书》第11卷；《世界性历史之黎明》，1960年第三届“萨缪尔勋爵论坛”刊载的我的一篇讲稿《哲学家的社会职责》的法语译文，讲稿曾在1957年华沙举行的国际哲学研究院大会上被宣读。

《国家间的和平与战争》（*Paix et Guerre entre les nations*），Paris, Calmann-Lévy, 1962, 793p.。

《大辩论：核战略的启蒙》（*Le Grand Débat, initiation à la stratégie atomique*），Paris, Calmann-Lévy, 1963, 274p.。

《论自由》（*Essai sur les libertés*），Paris, Calmann-Lévy, 1965, 285p. Rééd. Dans LA Coll. Pluriel. 1977.。

《社会学思想流派概述》(*Les Etapes de la pensée sociologique*), Paris, Gallimard, 1967, 659p.。本书是根据我在巴黎大学任教时的讲义编写而成的。社会资料中心在公开发行这些复印讲义时使用过另外一个书名:《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讲义为两卷本。1960年发行的第一卷内容有孟德斯鸠、奥古斯特·孔德、卡尔·马克思、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962年发行的第二卷内容有E. 涂尔干、U. 帕累托、马克斯·韦伯。本书最初以英文本发行,书名为《社会学主要思潮——基础读物》。

《三论工业时代》(*Trois Essais sur l'âge industriel*), Paris, Plon, 1966, 242p.。

《难觅的革命》(*La Révolution introuvable*), Paris, Fayard, 1968, 187p.。

《戴高乐、以色列和犹太人》(*De Gaulle, Israël et les Juifs*), Paris, Plon, Tribune libre 1968, 187p.。

《进步梦幻的破灭》(*Les Désillusions du progrès*), Paris, Calmann-Lévy, 1969, 375p.。

在此期间,我写的关于第五共和国初期与评论戴高乐将军对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政策的文章都刊登1958~1962年《论证》季刊上。

我的大部分社会学研究论文刊登在《欧洲社会学档案》上,其中大部分或至少我认为有再版价值的论文都可以在《政治研究文集》(伽利玛出版社)中找到。

四 1969~1977年

《从一个神圣家族到另一个神圣家族:论各种幻想的马克思

主义》（*D'une Sainte Famille à l'autre, Essais sur les marxismes imaginaires*），Paris, Gallimard, Coll. Essais, 1960, 308p.。

《论社会学的历史状况》（*De la condition historique du sociologue*），我在法兰西学院首开的课程，Paris, Gallimard, 1970.。

《政治研究》（*Etudes politiques*）Paris, Calmann-Lévy, 1972, 562p.。这本论文集主要包括：《马基雅维利与马克思》《阿兰与政治学》《马克斯·韦伯和迈克尔·波兰尼》，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国际关系的分析文章。

《像帝国一样的共和国：世界中的美国，1945 ~ 1972 年》（*République impériale, les Etats-Unis dans le monde, 1945 - 1972*），Paris, Calmann-Lévy, 1972, 338p.。

《暴力的历史和辩证法》（*Histoire et dialectique de la violence*），Paris, Gallimard, Coll. Essais, 1972, 271p.。

《克劳塞维茨论战争》（*Penser la guerre, Clausewitz*），第一卷《欧洲时代》，第二卷《全球时代》，Paris, Gallimard, 1976, 427p. et 365p.。

《为衰落的欧洲辩护》（*Plaidoyer pour l'Europe décadante*），Paris, Laffont, 1977. 511p.。

五 死缓阶段

《三月的选举与第五共和国》（*les Elections de mars et la V^e République*），Paris, Julliard, 1978, 511p.。

《介入的旁观者》（*Le Spectateur engagé*），Entretiens avec Jean-Louis Missika et Dominique Wolton, Paris, Julliard, 1981, 339p.。

从1977年4月起，我脱离了《费加罗报》。

从同年9月起，我每周为《快报》周刊撰写一篇社论。

我在《评论》杂志 (*Commentaire*) 发表的时评文章有：《X先生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乔治·凯南的孤立主义》，*Commentaire*, 1978 (I.2)。

《为了进步：偶像垮掉之后》，*Commentaire*, 1978, (I.3)。

《从美国帝国主义到苏联霸权主义》，*Commentaire*, 1978, 1979 (II.5)。

《是否存在一种纳粹神话?》，*Commentaire*, 1979 (II.8)。

《苏联霸权的第一年》，*Commentaire*, 1980 (III.11)。

一个名叫罗伯特·弗朗西斯·柯乐洪的英国教授写过一篇博士论文，题为《雷蒙·阿隆：一位知识分子的肖像》，这是现存唯一一篇对我的生平进行学术研究的论述。这篇论文没有公开发表，但可以找到。

索引

A

- ABBAS, Ferhat : 484
ABETZ, O. : 312
ABOU DAUD : 743
ACHESON, Dean : 324, 358-359, 361, 375, 797, 828
ADENAUER, K. : 125, 340, 358, 360, 368, 375, 560-561, 580-581
ADJOUBEI, Alexis : 332
ADORNO, T. W. : 124-127
AILLERET, Charles (général) : 583
AILLET, Georges : 43
AKZIN (Pr) : 329
ALAIN : 37, 52, 66, 69-74, 80, 88-90, 101, 121, 135, 144, 163, 176, 185, 190, 204, 206, 211, 422, 444, 886, 955
ALBARRAN, Pierre : 30
ALBERT, François : 76
ALEXANDRE, Jeanne : 86, 490
ALEXANDRE, Michel : 86
ALLAIS, Maurice : 412
ALLENDE, Salvador : 766-768, 812, 905, 916
ALLIBERT, Raphaël : 243, 245
ALLISSON, G. A. : 594
ALPHAND, Hervé : 370
ALQUIÉ, Ferdinand : 441
ALSOP, Joseph : 324, 371
ALTHUSSER, Louis : 155, 747-753, 941
ALTMAN, Georges : 280, 309, 788
AMAURY, Émilien : 282
AMROUCHE, Jean : 489, 498
ANDREWSKI, Slatislav : 152
ANDROPOV, Youri : 213
ANSELME (saint) : 57
ANZIEU, Didier : 623
ARAFAT, Yasser : 923
ARAGO, Emmanuel : 91
ARBENZ, Jacobo : 825
ARENDE, Hannah : 241, 386
ARISTOTE : 44, 64-65, 139, 383
ARMINIUS : 366
ARNAUD, Jean : 110
ARNDT, H. J. : 839, 842
ARON (famille) : 312
ARON, Adrien : 29-30, 32-33, 41, 47-50, 79, 91, 639, 646
ARON, Dominique *voir* SCHNAPPER
ARON, Émile : 181
ARON, Emmanuelle : 260, 354, 439
ARON, Ferdinand : 33, 854
ARON, Max : 33
ARON, Paul : 33
ARON, Robert : 146, 944
ARON, Robert (frère de l'auteur) : 32, 36, 47-50, 84, 104
ARON, Suzanne : 115-117, 129-131, 135, 214, 217, 260, 331, 489, 890, 947, 965
ARON-BRUNETIÈRE, Robert : 280, 743
ASTRUC, Alexandre : 281
ATTALI, Jacques : 241, 898-899, 908
ATTLÉE, Lord : 546
AUBOYNEAU, Philippe (amiral) : 249
AUCLÈRES, Dominique : 109
AUPHAN, Paul (amiral) : 242
AURIAC, Oscar : 989, 128
AVELINE, Claude : 383
AVNI, Dan : 38

AXELOS, Kostas : 457
 AYRAULT, Roger : 110

B

BAADER-MEINHOF (bande) : 625
 BACHELARD, Gaston : 45
 BAECHLER, Jean : 461
 BAINVILLE, Jacques : 193, 336-337, 357, 579
 BAKOUNINE, M.A. : 384
 BALANDIER, Georges : 441
 BALDWIN, Hansen W. : 841
 BALFOUR (Lord) : 648, 656, 732
 BALLANGER, Robert : 612
 BAO DAI : 395
 BARCLAY DE TOLLY, M.B. : 320
 BARDÈCHE, Maurice : 275, 654
 BARJONET, André : 614
 BARRE, Raymond : 142, 619, 790, 903
 BARUCH, Bernard : 403
 BASCH, Victor : 990, 216
 BATTISTA, F. : 963
 BAUMGARTNER, W. : 332, 788
 BAVEREZ, Nicolas : 2-3, 7-8, 10-11, 14-16, 20-21, 23, 26
 BAYET, Albert : 296
 BAZARD, Armand : 850
 BEAU DE LOMÉNIE, E. : 487
 BEAUFRE, André (général) : 730-731
 BEAUVOIR, Simone de : 74, 103, 129-130, 268, 417, 419-420, 632, 634, 761, 950-951, 953, 956-957
 BEGHIN, Ferdinand : 683, 690, 692, 695
 BEGIN, Menahem : 658, 660, 922-924
 BEGUIN, Albert : 407
 BELL, Daniel : 534
 BEN GOURION, David : 576, 646, 655-656, 665, 925
 BENDA, Julien : 77, 129, 426, 429, 943
 BENÈS, Edouard : 257-258, 479
 BENJAMIN, René : 66
 BENNY LÉVY : 631, 949, 955, 959-960
 BENOIST, Alain de : 651, 879, 935-937, 939-942
 BENOIST, Jean-Marie : 871-872
 BÉNOUVILLE, Guillaïn de (général) : 418-419
 BÉRARD, Armand : 56

BÉRARD, Léon : 51, 55
 BERGSON, Henri : 66, 69, 82, 121, 181, 261, 444, 713
 BERIA, L.P. : 367
 BERL, Emmanuel : 56, 189, 206
 BERLIN, Isaiah : 322
 BERNANOS, Georges : 196
 BERTAUX, Pierre : 210
 BERTRAND, Pierre : 110
 BESANÇON, Alain : 527, 747
 BETTENCOURT, André : 695
 BEUVE-MÉRY, Hubert : 293-294, 296, 342, 344-347, 350, 352-353, 482, 773, 895, 945
 BIDAULT, Georges : 263, 307, 317, 342, 396, 482, 506
 BIRAULT, Henri : 490
 BISMARCK, O.E.L. : 991, 366, 810
 BLANCARD, Jean : 720
 BLANCHET : 78
 BLEUSTEIN-BLANCHET, Marcel : 272, 297, 482, 613, 726
 BLOCH, Jean-Richard : 104
 BLOCH, Marc : 221
 BLOCH-MICHEL, Jean : 291, 293
 BLONDEL, Charles : 82
 BLUM, Léon : 3, 76, 94, 145, 147, 185, 191-192, 197-198, 200-202, 204, 263, 285-286, 289, 317, 439, 653, 909-911, 914
 BONALD, Louis de : 85
 BONAPARTE : 251, 253, 466
 BONILAUDI, Bernard : 706, 879
 BONNAFOUS, Max : 210, 224, 265, 442
 BONNEFOY, Simone : 441
 BORNE, Étienne : 485-486, 494, 505, 590, 764, 871, 873
 BOROTRA, Jean : 246
 BOSCO, Henri : 881
 BOST, Jacques-Laurent : 121, 766
 BOUDDHA : 107
 BOUGLE, Célestin : 82, 85, 101, 103, 122-125, 127, 144, 151-153, 198-199, 210, 221, 439, 653
 BOUKHARINE, N.I. : 413, 856
 BOUKOVSKY, Vladimir : 917
 BOULANGER, Georges (général) : 173, 381, 496
 BOULGANINE, N.A. : 469
 BOUMEDIENE, M. : 576, 810
 BOURBON-BUSSET, Jacques et Laurence : 324, 489
 BOURDAN, Pierre : 975, 255

- BOURDET, Claude : 282, 293, 486
 BOURDIEU, Pierre : 453, 457, 613, 618
 BOURGÈS-MAUNOURY, Maurice : 471
 BOURGIN, Hubert : 122
 BOURGUIBA, M. : 501, 580
 BOURRICAUD, François : 456
 BOUTHILLIER, Yves : 479, 481
 BRANDT, Willy : 582, 737-738, 785
 BRAUDEL, Fernand : 53, 588
 BRAUN, O. : 95
 BREDOW, Wilfried von : 847
 BREHIER, Émile : 163, 260
 BREJNEV, Leonid I. : 992, 213, 372-373, 528, 734-735, 737-738, 808, 810, 929, 937
 BRIAND, Aristide : 76, 90, 208
 BRISSON, Adolphe : 302
 BRISSON, Jean-François : 300, 684, 686, 689, 701
 BRISSON, Pierre : 21, 292-294, 296-297, 304, 323-324, 342, 358, 366, 368, 469, 474-475, 482, 543, 654, 683-690, 692-693, 698-699, 702, 705, 708, 710, 754, 782, 895, 952
 BRODERSEN, A. : 152
 BROGAN, Dennis : 73, 232, 252, 440
 BROSSOLETTE, Pierre : 253
 BROYELLE, Claudie et Jacques : 495, 799, 947, 949, 951
 BRÜNING, H. : 92-96
 BRUNSCHVICG, Adrienne : 45
 BRUNSCHVICG, Léon : 989, 992, 43, 45, 57, 62, 66-70, 72, 81, 83, 102, 107, 121-122, 158, 162, 181, 189, 197, 201, 312, 444, 452, 629, 646, 675-677, 766
 BRZERINSKI, Z. : 987
 BUCARD, Marcel : 146
 BUCHAN, Alastair : 880
 BUDBERG, Moura (baronne) : 235
 BÜLOW, H. von : 843
 BURÉ, Émile : 194
 BURKE, E. : 539
 BURNHAM, James : 76, 274, 324
 BURNIER, Michel-Antoine : 962-963
- C**
-
- CAETANO, M. (Pr) : 770
 CAILLAUX (Mme) : 298
 CAILLAUX, Joseph : 76, 298
 CAILLOIS, Roger : 377
 CALMANN-LÉVY, Robert : 769
 CALVEZ, Yves (Père) : 751
 CAMUS, Albert : 3, 17-18, 281-282, 290-291, 332, 423-424, 435, 494-495, 538, 631, 634, 668, 950, 962
 CANGUILHEM, Georges : 975, 74, 83, 88-90, 104, 225, 783
 CARAMANLIS, Constantin : 400, 766
 CARRERO BLANCO (amiral) : 736
 CARTER, Jimmy (président) : 998, 299, 658, 811, 916-918, 921, 934
 CARTIER, Raymond : 299
 CASANOVA, Jean-Claude : 452, 720, 856, 877
 CASSIN, René : 227, 243
 CASTRO, Fidel : 774, 963
 CAUTE, David : 322
 CAVAILLES, Jean : 992, 181, 223, 260
 CÉSAR : 56
 CHABAN-DELMAS, Jacques : 79, 278, 482, 506, 725-727, 742
 CHALANDON, Albin : 309-310
 CHALLAYE, Félicien : 88-89
 CHAMBELAIN, N. : 197
 CHAMSON, André : 114
 CHAPSAL, Jacques : 877
 CHARDONNE, Jacques : 277, 861
 CHARLES X : 134
 CHASTENET, Jacques : 278
 CHATEAUBRIAND, François René de : 134
 CHATELAIN, Nicolas : 324
 CHAUTEPS, Camille : 193, 202
 CHAUVET, Louis : 702
 CHÉREAU, Patrice : 865
 CHEVALIER, Jacques : 498
 CHEVRILLON, Olivier : 713
 CHIRAC, Jacques : 703, 705-706, 726, 733-734, 740-743, 891, 902-903, 909
 CHOU EN-LAI : 808
 CHURCHILL, Winston : 975, 226, 240, 246-247, 274, 315, 357, 363, 414, 544, 549
 CILIGA, Anton : 465
 CIORAN, E.M. : 967
 CLARK, Colin : 451, 512, 527, 852
 CLAUDEL, Paul : 85
 CLAUSEWITZ, K. von : 974, 108, 172, 234, 245, 399, 586, 591, 754, 816-817, 830-836, 838-849
 CLAVEL, Maurice : 420, 764

- CLÉMENT, Marcel : 871
 CLOTIS, Josette : 217
 COBB, Richard : 238
 COGUEL, François : 199
 COHEN, Albert : 237
 COHN-BENDT, Daniel : 614, 636
 COLLARD, René : 684
 COLLINET, Michel : 465
 COMERT, Pierre : 254, 278
 COMTE, Auguste : 982, 64-65, 72, 120, 145, 385, 387, 460, 513, 515, 528, 538, 606-608, 638, 850
 COMTE, Gilbert : 871-872
 CONNALLY, J. : 792
 CONSIDÉRANT, Victor : 122
 CONSTANT, Benjamin : 967
 CONSTANTIN (empereur romain) : 649
 CONSTANTIN DE GRÈCE : 765
 CONTAT, Michel : 992, 630, 764, 956, 966-968
 COOPER, A. Duff : 579
 COPEAU, Édie : 115
 COPEAU, Jacques : 255
 COPEAU, Pascal : 110
 CORBETT, J. : 355
 CORNIGLION-MOLINIER, Édouard : 196, 259-260, 272, 305
 COT, Pierre : 233
 COTNAREANU (Mme) : 297, 683
 COTY, René : 297, 471
 COUITÉAS DE FAUCAMBERGE, Jean : 476
 COURNOT, Antoine Augustin : 385, 390
 COUTROT, Jean : 198
 CRESSON, André : 64
 CRICK, Bernard (Pr) : 975
 CROCE, B. : 831
 CROZIER, Michel : 455
 CRU, Robert Loyalty : 232
 CUAU, Yves : 731, 892-895
 CUÉNOT, Lucien : 82
 CULBERTSON : 30
 CUNCTATOR, Fabius : 846
 CUNHAL, Alvaro : 772-773
 CYRANKIEWICZ, Josef : 561
- D**
-
- DABERNAT, René : 290
 DAHRENDORF, Ralf : 101, 609, 880
 DAIX, Pierre : 774
- DALADIER, Édouard : 198, 208, 362, 913
 DAMPIERRE, Éric de : 477, 572, 843
 DANDIEU, Arnaud : 146, 944
 DANIEL, Jean : 483-485, 506, 774, 776, 896-897, 960-961
 DARBON, André : 224, 266
 DARLAN, François (amiral) : 242, 247
 DARQUIER DE PELLEPOIX : 276
 DAUDET, Léon : 879
 DAVID : 646, 661, 777
 DAVY, Georges : 295-296, 448, 460
 DÉAT, Marcel : 77, 104, 147, 210, 243
 DEBRAY, Régis : 68, 540
 DEBRÉ, Michel : 283, 315, 363, 366, 482, 492-493, 619, 655, 902
 DECTER, Midge (Mme) : 319
 DEFFERRE, Gaston : 279, 721-722, 768, 888
 DELBOS, Victor : 65
 DELBRÜCK, H. : 400, 833, 838
 DESANTI, Jean-Toussaint : 420
 DESCARTES : 44-45, 48, 72, 103, 755, 757, 953
 DESCAVES, Pierre : 273
 DESGRAUPES, Pierre : 719
 DESJARDINS, Paul : 114-115, 129, 148
 DEUTSCHER, Isaac : 465-466, 525
 DIAGNE : 99
 DIÉM, N.D. : 795-797
 DILTHEY, Wilhelm : 979, 103, 138, 156-157, 160-162, 180, 756, 764
 DIMITROV, G. : 383
 DJILAS, Milovan : 264
 DOLLFUSS, Engelbert (chancelier) : 186, 202
 DOMENACH, Jean-Marie : 407, 668
 DOMINIQUE, Pierre : 206
 DORIOT, Jacques : 146, 207-208, 243, 945
 DOS PASSOS, J.R. : 633
 DOSTOÏEVSKI, F.M. : 103, 774
 DOUMERGUE, Gaston : 184, 316
 DOYEN, Paul (général) : 365
 DRAY, William : 978
 DREYFUS (affaire) : 29, 33, 40-41, 69, 646, 653, 732, 944-946
 DREYFUS-LEFOYER, Henri : 991
 DRIEU LA ROCHELLE, Pierre : 206-208
 DROIT, Michel : 684-685
 DROUIN, Marcel : 127
 DRUMONT, Édouard : 196, 647
 DU GUESCLIN : 592

DUBARLE, Dominique (Père) : 427-430, 436
 DUCHESNE, Jacques : 255
 DUCHET, Roger : 494
 DUGUIT, Léon : 497
 DUHAMEL, Alain : 634
 DUHAMEL, Georges : 58, 114, 684-686
 DULLES, J. F. : 328, 362, 469, 598, 663, 825
 DUMAS, Alexandre : 849
 DUMAS, Georges : 53
 DUNS SCOT, J. : 355
 DUPLESSIS, Maurice : 571
 DUPUY, Pierre : 246, 573
 DURKHEIM, Émile : 979, 996, 103-107, 150, 152, 156, 166, 450, 457, 459-460
 DUROSELLE, Jean-Baptiste : 453, 593
 DURRY, Marcel : 444
 DUVAL, André : 269, 308
 DUVAL, Colette : 269-270, 308
 DUVAL, Jean : 114, 158, 269-270, 308, 393
 DUVERGER, Maurice : 379-380, 382, 386-387, 390, 393, 430-433, 465-466, 525-526, 537, 696, 872, 879

E

ECOTAIS, Yann de l' : 893, 895
 EFFEL, Jean : 269
 EINSTEIN, A. : 67, 73, 784
 EISENHOWER, D.D. : 314, 375, 469, 565, 597, 796
 ELIAS, N. : 153
 ELSTER, Jon : 976, 454, 456
 EMMANUEL, Pierre : 318
 ENFANTIN, Prosper Barthélémy : 850
 ENGELS, Fr. : 85, 750, 856
 ERVAL, François : 516
 ESCANDE, Maurice : 39
 ESCARPIT, Robert : 78
 ESHKOL, Lévi : 923
 ETIEMBLE : 450

F

FABRÈGUE, Jean de : 187
 FABRE-LUCE, Alfred : 70, 77, 195-196, 206-207, 277, 381, 569, 622, 635, 637-638, 653, 719

FAIÇAL (roi) : 656
 FALLOIS, Bernard de : 885, 898, 966
 FANON, Frantz : 953, 959, 963
 FARES, A. : 498
 FAROUK (roi d'Égypte) : 655
 FAUCONNET, Paul : 992, 103, 150-151, 156, 164, 166
 FAURE, Edgar : 76, 474-475, 482, 615, 617, 641, 705, 723, 729
 FAUVET, Jacques : 772-773, 895
 FEBVRE, Lucien : 237, 383-384
 FENELON, François DE SALIGNAC : 849
 FERMIGIER, André : 864-865
 FERRERO, Guglielmo : 385, 400, 492, 523
 FERRIÈRES, Gabrielle : 261
 FERRY, Jules : 945
 FESSARD, Gaston (Père) : 136, 662, 674-678, 751
 FEUERWERKER (rabbin) : 659
 FICHTE, J.G. : 984, 69, 81, 456
 FINLETTER, Thomas : 551
 FLANDIN, Pierre Étienne : 184, 189, 193
 FLAUBERT, Gustave : 755, 956
 FLORENNE, Yves : 871-872
 FOCH, Ferdinand (maréchal) : 226, 846
 FONTAINE, André : 736
 FONTAINE, Arthur : 115
 FONTANET, Joseph : 707, 710, 884
 FORD, Gérald (président) : 142, 811-812, 815, 916-917
 FORD, Henry : 318
 FOUCAULT, Michel : 13
 FOUCHET, Joseph : 450
 FOUQUIER-TINVILLE, Antoine Quentin : 943
 FOURASTIÉ, Jean : 451, 512, 527
 FOX (Pr) : 593
 FRANCO : 196-197, 736, 770
 FRANÇOIS-FERDINAND (archiduc) : 168
 FRANÇOIS-PONCET, André : 208, 300, 482, 686
 FRANKLIN, Benjamin : 826
 FRAPPAT, Bruno : 964
 FRÉDÉRIC II : 836
 FREDERIKSEN, Marc : 946
 FRENAY, Henri : 233, 253
 FREUD, Sigmund : 69
 FREUND, Julien : 189, 837
 FRIEDLÄNDER, S. : 99
 FRIEDMANN, Georges : 383, 449, 454-455, 457, 500-501
 FROSSARD, André : 432, 655, 873
 FURET, François : 459

G

- GABILLY, Marcel : 333, 684, 686, 691, 702
 GABRIEL-ROBINET, Louis : 279, 299, 482, 683-694, 696, 698, 705, 768
 GAITSKELL, Hugh : 545
 GALLIMARD : 973, 309, 837, 951
 GALLO, Max : 871, 892
 GALLOIS, Pierre (général) : 730-731
 GANDILLAC, Maurice PATRIONNIER DE : 441
 GARRAUD, Marie-France : 705-706, 743, 902
 GARY, Romain : 16, 19, 21, 231, 237, 280-281, 882, 955
 GASPERI, Alcide de : 375
 GAUCHON *voir* ARON, Suzanne
 GAULLE, Charles de (général) : 987-988, 11-12, 131, 133-135, 225-226, 228-229, 231, 233-235, 243-250, 252-256, 261, 263-264, 270-271, 274, 278, 280-281, 284-285, 288-290, 294, 297, 301, 303, 305-317, 335-339, 342, 348-350, 353, 363-365, 370, 372, 374, 380-382, 395-396, 418-419, 458, 473, 478, 487-488, 491-502, 504, 507, 509, 523, 543, 546-552, 554-556, 558-571, 573-584, 611-614, 617-618, 621-622, 629, 632, 635-637, 643, 656, 658, 661-662, 666-670, 673, 683, 704, 715-716, 718-721, 724, 726, 730, 735-736, 738-741, 782, 787, 790, 794, 796, 851, 904, 907, 945
 GAXOTTE, Pierre : 52
 GEISMAR, Alain : 614
 GELLNER, E. : 763
 GEORGES, Joseph (général) : 246
 GIAP, Nô Nguyễn : 474, 829, 934
 GIDE, André : 127, 132, 145, 200, 323, 865
 GILBERT, Félix : 975
 GILBERT, Milton : 789
 GILSON, Étienne : 306, 342-344, 347-357, 374
 GIMOND, Marcel : 283
 GINSBERG, Morris : 259
 GIONO, Jean : 881
 GIRAUD, Henri (général) : 247, 250-251, 271, 305
 GIRAUDOUX, Jean : 633
 GIROUD, Françoise : 743, 887-889, 894
 GISCARD D'ESTAING, Valéry : 11, 140, 212, 482, 621, 697, 701, 704-705, 720, 725-729, 731-743, 785, 790, 891-892, 894, 900-907, 909-910, 932, 939, 949
 GLASSER, Georges : 79
 GLUCKSMANN, André : 57, 625, 942, 947-949, 955
 GNEISENAU, Auguste NEIDHARDT V. (comte) : 831, 836
 GOEBBELS, J.P. : 97, 110, 209
 GOERING, H. : 273
 GOETHE, J.W. : 134
 GOLDSMITH, James (sir) : 710, 713, 886-889, 891-895
 GOLIATH : 661, 777
 GOMBAULT, Charles : 254
 GOMULKA, W. : 581
 GORCE, Georges : 666
 GOTTH-OTTLILIENFELD, Pr : 108
 GOUHIER, Henri : 387, 441, 673
 GRANJO, Antonio : 771
 GRENIER, Roger : 281, 291
 GRIOT, Jean : 333, 686, 689, 691, 722
 GROETHUYSEN, Bernard : 160, 180, 577
 GROSSER, Alfred : 590
 GRUMBACH, Philippe : 713, 888-889
 GUÉHENNO, Jean : 114, 190-191, 269
 GUÉROLT, Martial : 144
 GUILLE, Pierre : 57-58, 74-75, 129, 783
 GUILLEMIN, Bernard : 121
 GUINDEY, Guillaume : 56
 GUISSARD, Lucien : 426
 GUITTON, Jean : 265, 635, 720
 GURIAN, Waldemar : 354-356
 GURVITCH, Georges : 990, 68, 295-296, 441, 448-451, 455-456

H

- HABERMAS, J. : 127
 HACHA, Emil (président) : 254
 HAFNER, Sébastien : 209
 HAHLEWEG, Werner (Pr) : 838
 HALBWACHS, Maurice : 158, 201
 HALDER, Franz (général) : 204
 HALÉVY, Élie : 73, 83, 101, 122, 210-211, 222, 653
 HALÉVY, Florence : 210-211, 222
 HALPHEN (famille) : 58-59
 HALPHEN, Henriette : 58-60

HAMELET, Michel : 702
 HAMELIN, Jean : 691
 HAMON, Léo : 473
 HARCOURT (Mme d') : 705
 HARKABI (général israélien) : 648
 HASSNER, Pierre : 452-453, 645
 HATTU, Guy : 260
 HAUSER, Henri : 125
 HAUSHOFER, K. : 818
 HAYEK, Fr. von : 979, 161, 229, 259, 539
 HAYTER, W.G. (Sir) : 551
 HEALEY, Denis : 371
 HEALTH, E. : 545-546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 997, 6, 61, 69, 84, 109, 131, 135-139, 141-143, 157, 179, 331, 456, 675, 751, 755, 818, 952
 HEIDEGGER, Martin : 63, 68, 102, 109, 131, 142, 393, 457, 542, 953, 959, 969-971
 HEMPEL, C.G. : 978
 HEPP, Jacques : 43
 HEPP, Robert : 838, 840-843
 HERBERT, A.P. : 229
 HEREN, Louis : 827
 HÉRODOTE : 71
 HERR, Lucien : 75
 HERRIOT, Édouard : 51, 75-77, 91, 104, 208, 366, 446
 HERSANT, Robert : 300, 695-707, 709-713, 886, 894-895
 HERSCH, Jeanne : 480, 685, 764
 HERZL, Théodore : 653, 944
 HEURGON, Anne : 114
 HEURGON, Jacques : 53
 HINDENBURG, Paul v. BENECKENDORFF : 93
 HIRSCH, Étienne : 362
 HITLER, Adolf : 978-979, 991, 996, 4, 6, 18-19, 85, 87-88, 91-96, 98, 100-101, 107, 110-113, 132, 134, 142, 145-148, 173, 177-178, 188-194, 196, 202-205, 208-210, 212-214, 217, 221-222, 226, 229, 232, 239, 242, 257, 273, 276, 343, 349, 366, 379, 385, 390, 393, 399, 414, 418-419, 521-522, 543, 590, 594, 770, 837-839, 841, 961
 HỒ CHI MINH : 108-109, 283, 286, 394-396, 473, 577, 796, 798, 800
 HOBBS, Thomas : 991, 844
 HOFFMANN, Stanley : 593
 HOOK, Sidney : 371

HORKHEIMER, Max : 124-127
 HOUSE (colonel) : 736
 HUGO, Victor : 269
 HULL, Cordell : 248
 HUME, David : 102
 HUNT, Pierre : 482
 HUSSERL, E. : 63, 68, 102-103, 109, 129, 953
 HUTCHINS, R.S. (Pr) : 533
 HYPOLITE, Jean : 189, 444

I

ISNARD, Jean : 730-731
 ISTEEL, André : 202
 IZARD, Georges : 686

J

JACOB, François : 230
 JACQUIER-BRUÈRE : 283
 JANKÉLÉVITCH, Vladimir : 281
 JASPERS, K. : 323
 JAURÈS, Jean : 40, 52, 201, 653, 833
 JEANNENEY, Jean-Marie : 222, 498, 790
 JEANSON, Francis : 423-424, 507-508
 JÉSUS-CHRIST : 648, 667, 676-677, 889, 939
 JOANNÈS, Alain : 871
 JOBERT, Michel : 809, 811
 JOHNSON, L.B. (Président) : 570, 574, 662-663, 791, 798-800, 802, 822, 825
 JOLIOT-CURIE, Frédéric : 323, 383
 JOMINI, Antoine Henri (baron) : 840
 JOSSELSON, Michaël : 320
 JOUVENEL, Bertrand de : 76, 205-208, 480, 835, 843
 JOUVENEL, Robert de : 206
 JOUVET, Louis : 865
 JOXE, Louis : 615
 JOXE, Pierre : 725
 JUAN CARLOS (roi d'Espagne) : 197
 JUILLET, Pierre : 706, 743
 JUIN, Alphonse (maréchal) : 365
 JULIEN, Claude : 826, 895
 JULLIARD, Jacques : 590
 JUNGER, E. : 976, 101

K

- KAAN, André : 391-393
 KAHN, Herman : 329, 599, 870
 KAHN, Jean-François : 806
 KANT, Emmanuel : 986, 6, 18, 44-45, 57, 62, 65, 72, 81, 102-104, 131, 139, 142-143, 151, 157, 161, 179, 416, 655, 755, 954
 KAUFMAN, Pierre : 281
 KAUTSKY, K. : 539, 748, 750, 856
 KENNAN, George F. : 320-321, 371-373, 375-376, 926
 KENNEDY, John Fitzgerald : 490, 544, 546-547, 549, 552-553, 555-556, 559, 566, 572, 597, 601, 603, 787, 791, 796-797, 800, 822, 829-830, 917, 920
 KENNEDY, Robert : 804
 KENNEDY, Ted : 299
 KERILLIS, Henri de : 194
 KEYNES, J.M. : 210, 300, 851-852
 KHIEM, Pham Duy : 801
 KHOMEINY, Iman : 982
 KHOMEYNI, ayatollah Rouhollah Mousavi : 929
 KHROUCHCHEV, Nikita S. : 992, 346, 368, 413, 452, 461, 464-467, 516, 528, 530, 600, 632, 745, 800, 848, 920, 963
 KIM IL-SUNG : 325, 359, 821
 KISSINGER, Henry A. : 986-988, 329, 552, 592, 600-601, 704, 738, 769, 782-785, 795, 797, 800-815, 830, 870, 916-917, 932
 KLEE, Paul : 109
 KLEIN, Jacob : 142
 KÖNIG, Marie-Pierre (général) : 300, 365, 475
 KOESTLER, Arthur : 413, 632, 678
 KOJÈVE, Alexandre : 973-974, 63, 135-136, 138-143, 196-197, 208, 217, 622, 675
 KOKOSCHKA, Oskar : 109
 KOLAKOWSKI, Leszek : 856
 KOLM, Serge-Christophe : 768
 KOYRÉ, Alexandre : 68, 125, 135, 142-143, 196, 236, 356, 382, 590
 KRAVCHENKO, Victor : 465
 KRIEGEL, Annie : 713
 KROPOTKINE, P.A. (prince) : 384
 KRUPP, A. : 213
 KUHN, T.-S. : 82

KUNSTMANN, Wilfried : 846

L

- LA BRUYÈRE, Jean de : 52
 LA ROCQUE, François de (colonel) : 185, 945
 LABARTHE, André : 230-231, 233-237, 243-244, 248, 250, 256, 260, 265, 271, 312
 LABRIOLA, A. : 85
 LABROUSSE, Ernest : 444, 455-456
 LACAN, Jacques : 136
 LACOMBE, Olivier : 53
 LACOSTE, Robert : 481
 LACOUTURE, Jean : 910
 LACRETTELLE, Jacques de : 684, 686-687, 702
 LAFFONT, Robert : 855, 859
 LAGACHE, Daniel : 44, 53, 104, 441, 783
 LALANDE (Mlle) : 38
 LANGER, W. : 249
 LANGEVIN, Paul : 110, 190, 200
 LANIER, Edmond : 53
 LANZMANN, Claude : 674, 955
 LAPORTE, Jean : 296
 LARMINAT, Edgard (général) : 365
 LAROQUE, Pierre : 222
 LATTRE DE TASSIGNY, Jean-Marie G. : 365, 395
 LAULAN, Yves : 794
 LAURÉ, Maurice : 410-412
 LAURENT, Pierre : 613
 LAUTMANN (Mme) : 65
 LAVAL, Pierre : 95, 148, 184-185, 198, 225, 242, 244, 488
 LAZAREFF, Pierre : 278, 331-333, 633
 LAZARSFELD, P. F. : 455
 LAZURICK, Robert : 292
 LE BAIL, Jean : 75
 LE BRUN KERIS : 494
 LE DUC THO : 803, 808
 LE FUR, Louis : 76
 LE GOFF, Jacques : 455
 LE MATAF, Jean : 88
 LE ROY, Edouard : 64
 LE SENNE, René : 296
 LECA, Dominique : 56
 LECANUET, Jean : 280, 721

- LECLERC DE HAUTECLOCQUE, Philippe (maréchal) : 365, 396
 LECLERC, Gérard : 968
 LECOUTRE, Martha (Mme) : 230, 234-235
 LEFORT, Claude : 425, 613
 LEFRANC, Georges : 75, 77-78
 LÉGLISE (capitaine) : 224
 LEGRIS, Michel : 694, 772
 LEIBNIZ, G.W. : 759
 LEIRIS, Michel : 865
 LEJEUNE, Michel : 269
 LÉNINE : 982, 208, 323, 331, 451, 474, 533, 539, 577, 582, 591, 604, 740, 747, 824-825, 835, 843, 857-858
 LENOBLE (Père) : 430
 LEONARD, John : 640
 LERAY, Jean : 110
 LESAGE, Jean : 491, 571, 574
 LEVAĪ, Ivan : 898
 LEVESQUE, René (Premier ministre) : 491, 571, 575
 LEVI ESKOL : 663
 LÉVI-STRAUSS, Claude : 17, 121, 611, 623, 631, 638, 671, 747, 764
 LÉVY, Bernard-Henri : 892, 941-945
 LÉVY, Isidor : 34
 LÉVY, Louis : 254
 LÉVY-BRUHL, Lucien : 128, 182
 LIBERMANN, L.G. (Pr) : 530
 LICHTHEIM, Georges : 539-540
 LIDDELL HART, B.H. : 834
 LILIENTHAL, D. : 403
 LIN PIAO : 800
 LIPPMANN, Walter : 323-324, 339-340, 554-556, 559
 LITVINOV, Maxime : 221
 LOCKARD, Bruce : 235
 LOCKE, John : 755
 LOICHOT, Marcel : 311
 LOISY, Alfred : 430
 LONG, Huey : 107
 LOUIS XIV : 502, 669
 LOUIS-NAPOLÉON, NAPOLÉON III : 252-253, 381, 496
 LÖWENTHAL, Richard : 371
 LOYOLA, Ignace de : 675
 LUCHAIRE, Jean : 206
 LUDENDORFF, Erich : 841
 LUKACS, G. : 976-977, 109, 126, 155
 LÜTHY, H. : 866
 LYSSENKO, T.D. : 526
- M**
- MAC CALLUM : 881
 MAC ELROY, Neil H. : 491
 MAC GEORGE BUNDY : 552-554, 800
 MACARTHUR, Douglas : 324
 MACHIAVEL, Nicolas : 991, 210, 222, 267, 433, 660, 736, 840, 863, 900, 936
 MACKINDER, H.J. : 256, 398, 587, 818, 820
 MAC-MAHON, Edme P.M. (maréchal) : 863
 MACMILLAN, M.H. : 545, 547, 552
 MADARIGA, Salvador de : 196
 MAETERLINCK, M. : 233
 MAHEU, René : 125
 MAHOMET : 648
 MAISTRE, Joseph de : 85
 MALIK : 401
 MALINVAUD, Edmond : 531
 MALLARMÉ, Étienne dit Stéphane : 56
 MALRAUX, André : 973, 73, 114-115, 130-135, 148, 158, 196, 206, 208, 217, 259, 263, 269-270, 274, 277-282, 284, 304-305, 308, 315, 337, 357, 378, 396, 493, 547, 577, 579, 635, 726, 830, 942, 951
 MALRAUX, Clara : 114, 131-132, 135
 MALRAUX, Florence : 131
 MAN, Henri de : 147
 MANDEL, Georges : 653
 MANENT, Pierre : 461
 MANN, Golo : 97, 197, 331, 591, 838, 843
 MANN, Heinrich : 97
 MANN, Thomas : 97
 MANNHEIM, Karl : 102, 107, 109, 126, 152-156, 159-160, 259, 646, 779-780
 MANTOUX, Étienne : 214, 216, 222
 MAO ZEDONG : 360, 474, 535, 625, 808, 821
 MARCEL, Gabriel : 68, 187, 419, 433
 MARCHAIS, Georges : 891, 901-902, 904
 MARCUSE, Herbert : 125-127, 535, 541-542, 624-625, 882
 MARIN, Jean : 255
 MARITAIN, Jacques : 216, 253-254, 277
 MARJOLIN, Robert : 123, 144, 184, 196, 198, 222, 229, 236, 255
 MARQUET, Adrien : 147
 MARROU, Henri I. : 167, 441

- MARSHALL, G.C. : 311, 336, 347, 351, 362, 370, 374-375, 384, 407, 823
- MARTIN DU GARD, Christiane : 115
- MARTIN DU GARD, Roger : 986, 115, 135, 281, 331, 865
- MARTIN-CHAUFFIER, Jean : 685
- MARTINET, André : 110
- MARX BROTHERS : 774
- MARX, Jean : 83
- MARX, Karl : 976-977, 991, 996-997, 24, 42, 69, 85-86, 125-126, 144, 153, 156, 393-394, 415, 451, 456-457, 459, 512-513, 515-517, 519-520, 528-529, 535, 620, 625-626, 655, 675, 746-748, 750-753, 755, 831, 841, 849-850, 856-858, 877, 884, 889, 899, 942, 950, 952, 970
- MASCHKE, G. : 843-844
- MASSIP, Roger : 327, 333, 685
- MASSIS, Henri : 186, 188
- MASSON-FORESTIER, Henri : 684
- MAUBLANC, René : 213
- MAUGUÉ, Jean : 53-54
- MAULNIER, Thierry : 303, 493, 684, 688, 766
- MAURER, I.G. : 561
- MAURIAC, Claude : 301, 308, 348-349, 948
- MAURIAC, François : 992, 3, 85, 292, 298, 300, 332, 485-486, 633, 684-686, 706
- MAURIN, Louis (général) : 188
- MAUROIS, André : 73, 243, 960
- MAUROY, Pierre : 722
- MAURRAS, Charles : 145, 192-194, 254, 276, 302, 336, 496, 577, 582, 945
- MAUSS, Marcel : 53, 73, 82, 107, 152, 221, 867
- MAX, Alfred : 634
- MAYER, Hans : 335
- MAYER, René : 657
- MC NAMARA, R.S. : 552, 597-598, 600, 798
- MEAD-EARLE, E. : 320
- MENDÈS FRANCE, Pierre : 368-369, 474-475, 481, 498, 545, 613-614, 621, 636-637, 720, 726
- MENDRAS, Henri : 456
- MERLEAU-PONTY, Jacques : 281
- MERLEAU-PONTY, Maurice : 63, 109, 134, 136, 180, 281, 383, 413-418, 421, 424-426, 464, 509, 634, 941, 950-951
- MERTON, R.K. : 152
- MÉRY, Guy (général) : 730
- MESSMER, Pierre : 568, 726
- METTERNICH, K.W.N.L. (prince) : 810
- MEUVRET, Jean : 57
- MICHELET, Edmond : 488-489
- MICHELET, Jules : 670
- MISES, Ludwig V. : 539
- MISSIKA, Jean-Louis : 131, 238, 473, 799, 964-966
- MITHOIS, Jean-Pierre : 730-731
- MITTERRAND, François : 614, 621, 701, 721-722, 725-728, 730, 735, 740, 754, 768, 888, 891-894, 900-908, 910-911, 932
- MOHAMMAD REZA PAHLAVI (shah d'Iran) : 917-918, 934
- MOHLER, Armin : 842
- MOLIÈRE : 849
- MOLLET, Guy : 468, 471, 475, 478, 498-499, 655, 721-722, 782
- MOLOTOV, V.M. : 221
- MOLTKE, H. von : 846
- MONCK (général) : 253
- MONDOLFO : 85
- MONET, Claude : 387, 390
- MONICK, Emmanuel : 49, 255, 283, 363
- MONNEROT, Jules : 309
- MONNET, Jean : 229, 243, 307, 362, 364, 366, 370, 375
- MONNIER, Henri : 497
- MONSALLIER, Jean-François (Dr) : 877, 891
- MONTESQUIEU, Charles DE SECONDAT (baron de la Brède et de) : 989, 9, 327, 450, 459-460, 462, 478, 505, 522, 723, 844, 960
- MONTERLANT, Henry de : 277, 653, 829, 865
- MONZIE, Anatole de : 76
- MORAZÉ, Charles : 611
- MOREL (Mme) : 74
- MORIN, Edgar : 637, 772
- MOSCA, G. : 511, 520
- MOULIN, Jean : 233-234
- MOULIN, Raymonde : 461
- MOULLEC dit MORET (cap. de vaisseau) : 250
- MOUNET, Paul : 39

MOUNIER, Emmanuel : 44, 63, 145, 406, 944-945
 MOUROUSI, Yves : 611
 MOUSSA, Pierre : 747
 MOUTET, Marius : 286
 MOZART, W.A. : 59
 MÜNZENBERG, W. : 234
 MUSELIER, Émile (amiral) : 233, 236, 248-250, 313
 MUSIL, Robert v. : 97
 MUSSOLINI, B. : 95-96, 145, 148, 186, 196, 202, 204, 213, 646, 770

N

NABOKOV, Vladimir : 992
 NADEAU, Maurice : 291, 433, 754
 NAPOLÉON I^{er} : 93, 134, 137-138, 208, 320, 381, 390, 399, 816, 831, 834, 836
 NASSER, G.A. : 329-330, 464, 467-470, 643-645, 655, 659, 662, 666, 805
 NAVARE, Henri (général) : 474
 NAVILLE, Pierre : 456, 836
 NEGRI, Enrico de : 84
 NEGUIB, M. : 655
 NEHRU, I. (Madame) : 645
 NEHRU, Pandit : 325, 785, 921
 NICIAS : 829-830
 NIETZSCHE, F. : 997, 62, 69, 131, 764, 954, 969, 971
 NIXON, Richard Milhous (président) : 998, 324, 725, 738, 777, 791, 793-794, 801-803, 810-812, 814-815, 830, 916, 927, 932
 NIZAN (famille) : 58-59, 130
 NIZAN, Paul-Yves : 53, 57-60, 62, 65, 68, 74, 104, 128, 149, 260, 783
 NOËL, Maurice : 684
 NORA, Pierre : 590

O

OLLIVIER, Albert : 91, 281, 283, 285-286, 291, 301
 OPPENHEIMER, Fr. : 153
 OPPENHEIMER, J. Robert : 321, 324, 685
 ORAB-OGLOV : 465
 ORENGO, Charles : 477, 634-635

ORMESSON, Jean d' : 986, 125, 684, 692-694, 697-700, 702-711, 725, 774
 ORMESSON, Wladimir d' : 273, 299-300, 684, 701
 ORNANO, Michel d' : 740
 OSTROROG (comte) : 325
 OSWALD, Lee Harvey : 830
 OULMAN, Alain : 769-770

P

PAGANON, Joseph : 91, 197
 PALEWSKI, Gaston : 204, 281, 309
 PALLE, Albert : 121, 966
 PAPAIOANNOU, Kostas : 612, 766
 PAPALIGOURAS, M. : 400
 PAPANDRÉOU, Georges : 765
 PAPEN, F. von : 93-96
 PARETO, V. : 991, 210, 213, 431, 451, 511-512, 516, 519-520, 535, 873, 936
 PARIGOT, Hippolyte : 51-53
 PARK, Chung Hee (Président) : 785
 PARODI, Jean-Luc : 489
 PARSONS, Talcott : 882
 PASCAL : 48, 67, 781
 PASSERON, Jean-Claude : 613, 618
 PAUL, Marcel : 264
 PAUL-BONCOUR, Joseph : 75, 77, 104, 193
 PAULHAN, Jean : 577, 582
 PAXTON, Robert : 913
 PÉCAUT, Pierre Félix : 128
 PERETTI, Achille : 705
 PÉRICLÈS : 865
 PÉRIER-DAVILLE, Denis : 690, 699-700
 PÉTAINE, Philippe (maréchal) : 224-225, 228, 242-248, 254, 261, 265, 271, 275-277, 298, 301-302, 312-314, 479, 496-497, 509, 720, 910, 943, 945
 PETSCHKE, Maurice : 332
 PEYREFITTE, Alain : 615, 965
 PFLIMLIN, Pierre : 506
 PHILIP, André : 115, 284
 PHILIPPE, Anne : 955
 PIA, Pascal : 268, 281-282, 285, 291, 293, 309, 482
 PICASSO, Pablo : 132
 PINAY, Antoine : 294, 310
 PINEAU, Christian : 655
 PINOCHET, Augusto (général) : 767, 905, 961

PISANI, Edgar : 621
 PISAR, Samuel : 212
 PLATON : 44, 72, 139-140
 PLEVEN, René : 247, 361, 364, 370
 PODHORETZ, Norman : 319, 926
 POHER, Alain : 720
 POINCARÉ, Raymond : 42, 183, 208, 316, 390
 POIRIER, René : 441
 POIROT-DELPECH, Bertrand : 955
 POLANYI (Mme) : 322
 POLANYI, Michael : 321-322
 POLIN, Raymond : 142
 POLLOCK, Friedrich : 124-126
 POMPIDOU, Georges : 11, 309, 546, 582-583, 615, 617, 621, 683, 704, 715, 719-721, 724-725, 730, 733, 735-736, 738-740, 790, 795, 904, 906, 939
 PONCEAU (Mme) : 829
 PONGE, Francis : 635
 PONIATOWSKI, Michel : 697, 742
 POPPER, Karl (Sir) : 979, 158-159, 539, 780, 936, 968
 PORÉE (Mme) : 123, 199
 POUILLON, Jean : 121, 433-434, 631, 872, 955
 POUJADE, Pierre : 673
 POULANTZAS, Nikos : 155, 879
 PRATZ, C. (général) : 768
 PRÉVOST, Jean : 206
 PRÉVOST-PARADOL, Lucien Anatole : 860
 PRINCE NOIR : 592
 PROUST, Marcel : 18, 39, 75, 103-104, 114
 PROUVOST, Jean : 278, 297, 299-300, 683, 685-692, 695-696, 698-699, 701-702, 705, 712, 721

Q

QUADRUPPANI, Serge : 99
 QUENEAU, Raymond : 136
 QUEUILLE, Henri : 309, 349

R

RABAUD, Étienne : 82
 RACHLINE, Lucien : 272

RACINE : 849
 RAMADIER, Paul : 287, 418
 RANKE, L. von : 167
 RANULF, S. : 107
 RAVSCHNING, Hermann : 204
 REAGAN, Ronald (Président) : 998, 813, 902, 928
 REBOIS, Charles : 700
 REINHARDT : 109
 RÉMOND, René : 623
 RENAN, Ernest : 277, 478, 860, 863
 RENOIR, Jean : 865
 RENOUVIN, Pierre : 590
 RESTON, J. : 812
 REVEL, Jean-François : 713-714, 888-893, 903, 905, 942, 965
 REYNAUD, Jean-Daniel : 593, 741
 REYNAUD, Paul : 184, 198, 202, 244, 363, 479, 788, 913
 RHEE, Syngman : 358, 360
 RIBBENTROP, Joachim von : 221
 RICARDO, David : 850, 852
 RICHELIEU (cardinal de) : 549
 RICKERT, Heinrich : 102, 157, 161-162, 180
 RIESMAN, David : 965
 RIPKA, Hubert : 254
 RIQUET, R.P. Michel : 661
 RIST, Charles : 144, 216
 RIST, Léonard : 43, 324
 RIVAUD, Albert : 653
 RIVET, Paul : 190, 200
 ROBBINS, Lord Lionel : 229, 259
 ROBIN, Léon : 64
 ROCARD, Michel : 729, 901, 909
 RODINSON, Maxime : 648
 ROMANOV : 868
 ROMEU, M. : 442
 ROMIER, Lucien : 298
 ROOSEVELT, Franklin D. : 86, 240, 247, 414, 479, 825
 ROSE, François de : 769
 ROSENBERG (affaire) : 962
 ROSENBERG, Alfred : 273, 407-408
 ROSENTHAL, Gérard : 421
 ROSINSKI, Herbert : 108, 111
 ROSSI, P. : 159, 162
 ROSTOW, W.W. : 987, 537, 800
 ROUBACHOV : 413
 ROUCHÉ, Jacques : 865
 ROUGEMONT, Denis de : 318, 371

- ROUSSEAU, Jean-Jacques : 11, 25, 65, 120, 450, 459, 638
 ROUSSET, David : 3, 418, 420-421, 465
 ROY, Claude : 417, 640
 ROY, Jules : 231, 237, 264
 ROY, René : 788
 RUEFF, Jacques : 184, 787-789, 792, 794-795
 RUSSEL, Bertrand : 88, 962
 RUYSSSEN, Théodore : 88-89
- S**
-
- SABLIER, E. : 806
 SADATE, Anouar el- : 330, 660, 805-807, 922-925
 SAINT-EXUPÉRY, Antoine de : 253-254
 SAINT-JOHN PERSE, Alexis LÉGER : 254
 SAINT-ROBERT, Philippe : 879
 SAINT-SIMON (comte) : 393, 456, 513, 850
 SAKHAROV, A. : 694
 SALAN, Raoul (général) : 492
 SALAZAR, A. de : 145, 769-771, 775-776
 SALOMON, Charles : 52-53, 110
 SAMUELSON, P.A. : 787
 SANDYS, Duncan : 363
 SARCEY, Yvonne : 302
 SARRAUT, Albert : 188, 193, 195, 475
 SARTRE, Jean-Paul : 973-974, 976, 997, 10, 12, 44, 46-47, 53, 57-58, 60-65, 72, 74-75, 80, 103-104, 119-121, 129-131, 134, 140-141, 148, 156, 173, 180, 236-237, 260-261, 268, 270, 285, 407-408, 413, 417-421, 423-425, 433-434, 452, 464, 507, 539, 613, 623, 628-633, 647, 664, 675-676, 695, 747-748, 754-759, 761-762, 764, 774, 783, 856, 871, 890, 896, 913, 941, 947-963, 966-968
 SAUVAGEOT, Jacques : 709
 SAUVY, Alfred : 198, 200, 408-410, 434
 SAVARY, Alain : 249
 SCELLE, Georges : 76
 SCHACHT, H. : 124
 SCHARNHORST, G.J.D. : 831, 843
 SCHELER, Max : 159-160, 536
 SCHELLING, T. : 329
 SCHILS, E. : 152
 SCHLEICHER, Kurt v. (général) : 93-94
 SCHLIEFFEN, Alfred (comte) : 846
 SCHLUMBERGER, Jean : 684-686
 SCHMID, Carlo : 371
 SCHMIDT, H. : 372, 733
 SCHMITT, Carl : 591, 837, 843
 SCHNAPPER, Dominique : 35, 49, 116, 121, 131, 260, 453, 516, 941
 SCHNAPPER, Laure, Alain et Pauline : 890
 SCHRÖDER, Rudy : 108-109
 SCHÜLE : 110
 SCHUMAN, Robert : 307, 361, 366, 375
 SCHUMANN, Maurice : 252, 305-306, 315, 356, 488-489, 504, 783
 SCHUMPETER, J.A. : 606, 859
 SCHUSCHNIGG, K.E. : 202
 SCHWARTZENBERG, Roger-Gérard : 898
 SCHWOB, Philippe : 269
 SCHWOEBEL, Jean : 895
 SENGHOR, Léopold S. : 733
 SERGE, Victor : 465
 SERIGNY, Alain : 494
 SERVAN-SCHREIBER, Jean-Jacques : 328, 486, 507, 633, 695-696, 888-889, 894
 SESTON, William : 266
 SHARON, Ariel (général) : 807
 SHILS, Edward : 534, 779
 SIEGFRIED, André : 37, 298, 300, 467, 543, 566
 SIHANOUK, Norodom : 814
 SIKORSKY, W. (général) : 257
 SIMIAND, François : 144
 SIMMEL, Georges : 154, 157, 160, 162, 180
 SIMON, Pierre-Henri : 75, 433-434, 486
 SINCLAIR, Anne : 879, 881
 SINDING, Richard : 870
 SMADJA, Henry : 282, 293
 SMITH, Adam : 852
 SOARÈS, Mario : 770, 772-773
 SOCRATE : 83
 SOLJÉNITSYNE, Alexandre : 3, 626, 694, 753, 774-778, 815, 848, 856, 916, 955, 959
 SOLON : 986
 SOMBART, W. : 153
 SOMOZA DEBAYLE, Anastasio : 919
 SOREL, Georges : 991, 540
 SOROKINE, P.A. : 595
 SOUSLOV, M. : 856
 SOUSTELLE, Jacques : 250, 309, 317, 366-367, 478, 482, 486-487, 492-493, 504
 SOUVARINE, Boris : 465, 498, 962
 SPAAK, Paul-Henry : 79

SPANN, Othmar : 154
 SPENGLER, Oswald : 980, 131, 159-160, 393-394, 861-862
 SPERBER, Manès : 112, 132, 304, 318, 386, 393, 420, 783
 SPINOZA : 989, 991, 64, 67, 459, 655, 664
 SPITZER, Léo : 83-85, 102, 114
 STALINE, Joseph DJOUGACHVILI, dit : 979, 992, 4, 6, 111-112, 132, 134, 138, 178, 185, 196, 213, 217, 221-222, 257-258, 264, 315, 318, 331, 342, 346, 349-352, 357, 359-360, 367, 379, 383, 401-402, 408, 410, 412, 414, 426, 432, 465-466, 479, 521, 525, 529, 583, 594, 632, 675, 770, 821, 828, 841, 856-857, 937, 961, 963
 STAVISKY : 184
 STÉPHANE, Roger : 406, 647
 STERNHELL, Zeev : 144-146
 STIBIO, André : 487
 STIKKER, Dirk : 551
 STOCKWELL (général) : 551
 STOETZEL, Jean : 295-296, 448, 454-455
 STRAUSS, Léo : 15, 592
 SUFFERT, Georges : 712-713, 806
 SUSINI, Eugène : 111
 SZOMBATI, Alexandre : 97
 SZYMONZYK, Stanislas, Staro : 230-231, 233-235, 237

T

TAFT, R. (sénateur) : 361
 TAITTINGER, Pierre : 740
 TARDEGER : 979, 996
 TATU, Michel : 827
 TCHAKOTINE, Serge : 112
 TERRENOIRE, Louis : 487-488, 503
 THANT, Sithu U. : 662
 THERIVE, André : 508
 THIBAUDET, A. : 385
 THIERRY D'ARGENLIEU, Georges : 395
 THIEU, Nguyễn van : 801-805
 THOMAS, Albert : 115
 THOREZ, Maurice : 198, 317, 943
 THUCYDIDE : 9, 452, 829, 840
 TILLION, Germaine : 487, 493
 TITO : 383

TOCQUEVILLE, Alexis de : 975, 215, 252, 459-460, 527, 612, 624, 626, 873, 909, 967, 969
 TODD, Anne-Marie : 890
 TODD, Olivier : 713-714, 887-888, 890-893, 895, 947, 951
 TONNIES, F. : 154
 TORRÈS, Henri : 418-419
 TOUKHATCHEVSKI, M.N. : 258
 TOURAINE, Alain : 454-455, 590, 626-628, 901
 TOYNBEE, Arnold : 996, 87, 385, 540, 862, 873
 TRAJAN : 646
 TRICOT, Bernard : 611
 TROELTSCH, Ernst : 159
 TROTSKY : 100-101, 132, 525
 TRUDEAU, Pierre Elliott : 491, 571, 575
 TRUMAN, Harry S. (Président) : 328, 352, 358-359, 375, 797, 820-821, 827-828

U

ULBRICHT, Walter : 340
 ULMO, Jean : 198
 ULYSSE : 760

V

VALERY, Paul : 53, 165
 VALLAT, Xavier : 276, 662, 666
 VALLON, Louis : 312
 VALOIS, Georges : 59, 146
 VANCE, Cyrus : 918
 VANDENBERG, A. : 344
 VEBLEN, T. : 606
 VEDEL, Georges : 497
 VERNANT, Jean-Pierre : 611
 VERNAY, Alain : 722
 VERNEJOL (président de l'ordre des médecins) : 719
 VERRIER, Louise : 259
 VIANNEY, Philippe : 283
 VIANSSON-PONTE, Pierre : 975, 669, 694
 VIDAL-NAQUET, Lucien : 223
 VIERKANDT, A. : 154
 VILLEFOSSE, Louis de : 249-250
 VOLTAIRE : 844, 849

VOURCH, Guy : 260
VUILLEMAIN, Jules : 757
VYCHINSKI, A.I. : 413

W

WAHL, Jean : 68, 188, 413, 758
WASHINGTON : 498
WATT, David : 827-829
WAXMAN, Chanin I. : 534
WEBER, Alfred : 153
WEBER, Max : 974, 983, 996-997, 7, 9,
15, 102-103, 105-107, 118, 138, 152,
156-157, 161-162, 170, 176, 180, 182,
322, 331, 459, 593, 837, 859, 881, 969
WEIL, Éric : 973-974, 96, 135-136, 142-
143, 196, 480
WEIL, Simone : 115-117, 125, 197, 480,
664, 884
WEISS, Louise : 206
WEIZMANN (général) : 329, 656-657
WELLS, H.G. : 235
WERNER, Pierre : 795
WEULERSSE, Jacques : 53

WEYGAND, Maxime (général) : 244, 246,
255
WIESE, L. von : 153-154
WIGHT, Martin (Pr) : 591
WILLESLEY : 836
WILSON, Harold : 545, 735-736
WILSON, T.W. : 824
WOHLSTETTER, Albert : 596
WOLTON, Dominique : 131, 473, 799,
964-966
WORMSER, Olivier : 140
WRIGHT, Richard : 664

Y

YOSHIDA SHIGORU : 325
YOUNG, A. : 592

Z

ZAY, Jean : 193, 653
ZIEGLER : 653
ZINOVIEV, Alexandre : 527, 858
ZOLA, Emile : 223, 490, 653

增订本译后絮语

法国迄今出版了三个版本的《雷蒙·阿隆回忆录》。第一个版本由 Julliard 出版社于 1983 年出版，第二个版本由 Robert Laffont 出版社于 2003 年出版。中译本分别由三联书店、新星出版社于 1992 年、2006 年出版。2010 年，Editions Robert Laffont 又出版了《雷蒙·阿隆回忆录》第三版的“增订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新锐董风云同志发现了这一版本，认真审阅后建议以此为蓝本，补充翻译和修订前两个译本，出版一部《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本书就是在他和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推动和支持下完成的。

本书的特色或与前两版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把先前的出版者因嫌书稿过于“臃肿”而删去的“社会主义插曲”“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走向苏联霸权主义？”这三章又收录进去，故称“增订本”；二是增添了一篇由法国当代史学家尼古拉·巴弗雷写的序言，即卷首的《雷蒙·阿隆与世界性历史的时代》。此外，在文字编排和润色上，新版也有少许改动，并取消了前两版的副书名“五十年的政治反思”。

新版补回这三章内容很有必要，也很重要。因为关于“社会主义”“苏联霸权主义”和“人权”等问题的看法，尽管在前面的几个章节中已零星地提到，但没有集中地概括论述，略去实在可惜。雷蒙·阿隆自称早年曾是“朦胧的社会

主义者”，晚年患心肌梗死以后，稍有恢复，便想在有生之年完成三部专著，社会主义便是选题之一，另两个是马克思主义和回忆录。可惜上天没有垂怜于他，他只完成了《雷蒙·阿隆回忆录》。

新添序言的作者尼古拉·巴弗雷是《历史的明证——雷蒙·阿隆传》的作者，1980年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与雷蒙·阿隆相差了半个世纪的校友。这篇序言联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国和世界实际，特别是世界经济问题，对雷蒙·阿隆的一生做出新的评价，反映了新一代精英对前辈的认识和理解，对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可能有所助益。

还应说明，已有的两个中译本是在国内学术界和出版界前辈和朋友的宝贵支持和帮助下，经过两代学人的刻苦努力和辛勤劳动而得来的果实。法语界和外交界前辈孟鞠如教授参与了第一版的翻译并通校全书，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先生于1926年赴法留学，1933年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有多年外交和教育工作经验，近乎是阿隆的同代人。他的翻译老道、传神，颇能体现阿隆的文采和口气。刚从大学毕业的几位青年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回忆录》出版后，受到广大读者和同行的欢迎或好评，为当时的西学东渐尽了绵薄之力。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到80年代初期改革开放起步阶段的主客观条件限制，特别是由于时间紧迫，我们采取了流水作业式的集体翻译方式，第一个译本中存在风格不统一，译名混乱，甚至闹出张冠李戴的笑话，还有一些技术性错误和个别硬伤。第二个译本在保持了第一个译本的基本风格的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采取了一些弥补措施，但不彻底。

社科文献出版社的这部《雷蒙·阿隆回忆录》（增订本），

是以2010年 Robert Laffont 版的“增订本”为蓝本，出版方延请从巴黎政治学院留学归来的王女士补译了上述三章和尼古拉·巴弗雷的序言。我们对前两个中译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检查和修改，对于当时出于各种原因漏译或译文走样的地方，我们也按法文新版做了补译，因此本版本也可以被称为“全译本”。我们期望本版增订本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更完整地了解雷蒙·阿隆和那个时期法国的真实情况，也相信读者和专家们能够对作者和书中提到的各种理论观点做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从中汲取养分。

最后，利用这次增订本出版的机会，我向多年来曾经关心、支持和提供过宝贵帮助的我国和法国各位前辈与朋友再次表示感谢。

杨祖功谨识

2015年元月 北京

译后记（1992年版）

一本70万字的译作付梓之际，有些情况似乎应该向读者说明。

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或许对雷蒙·阿隆还不太熟悉，他在战后法国、国际学术界、新闻界却是一个素负盛名的重要人物。一方面，他在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许多学科都有所建树，出版了一系列学术著作；同时，他又从事新闻评论长达40年，对战时和战后的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国际关系等问题做出了独到的分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此，他曾获得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并被世界上十几个著名研究机构和大学授予荣誉院士、荣誉博士称号。

他亲身经历或目睹了希特勒的崛起、法国人民阵线、慕尼黑事件、维希伪政权和抗德斗争、冷战时期、欧洲联合、美苏争霸、核战略、非殖民地化、戴高乐主义、“五月风暴”、越南战争、左翼联盟、法国社会党重新执政等，从学者的角度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分析或评论，并就其中一些问题同以萨特为代表的左翼知识界进行了几十年的论争。作为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欧洲和世界风云变幻的见证人，阿隆的“政治思考”对于我们了解这一重要历史时期无疑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按照法国的习惯划分，阿隆属于右翼，他被公认为自由派知识界的代言人。其实，他的学术思想和政治立场有一定代表

性，很难用简单的政治概念来界定，其形成与发展是很复杂的。他出身于洛林地区一个殷实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期受到当时盛行的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他在高师攻读哲学时自认为是个“朦胧的社会主义者”，与萨特是同窗好友。当他立志要成为“介入的旁观者”并要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一个“角色”时，他曾研读过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资本论》。他到晚年仍宣称“至今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仍饶有兴味”^①。1930年代中期，他赴德国继续攻读哲学和社会学，对胡塞尔和韦伯尤为推崇；在此期间，他也目睹了纳粹主义的猖獗，亲自听过希特勒的演说，这使他的政治思想和历史哲学观发生了重大变化。二战期间，他追随戴高乐在伦敦主持《自由法兰西》笔政。战后初期，由于对苏联的看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于左翼知识界，阿隆同左翼知识界决裂，转向右翼。在国内，他有保留地支持政府，特别是传统右派政府；在国际问题上，他积极主张与美国结盟、同德国修好并加强合作，激烈反对苏联，成为一个坚定的北大西洋主义者。

阿隆的历史哲学观和政治哲学观在他的博士论文中^②已初步形成。首先，他认为历史是自由的，历史的发展从整体上讲是不可预测的。历史是一系列制约，人只能在这些制约中发挥作用。他用这种“历史相对论”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历史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前景。其次，他在论述如何在社会生活中进行政治思考（即他的政治哲学）时，强调首先要做出根本选择：接受还是拒绝本人所

① 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朱利亚出版社，1983，第53页。

② 雷蒙·阿隆：《历史哲学导论》，伽利玛出版社，1938。

处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前提下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政治行动。他反对采取暴力或革命形式。这些基本信念决定了他对历史和政治的态度。因此，他观察和分析一切事物的出发点都是维护他所赞成“西方自由民主社会”；出于同样的目的，他对西方国家有时也提出批评或谴责，对苏联则抱有政治偏见，为此不惜同萨特、加缪等老友反目。

阿隆继承了自由派思想家孟德斯鸠、托克维尔、韦伯等人的思想，强调理性是解释世界、改变世界的唯一手段，人类要维持生存，只能寄希望于理性和科学。他承认阶级斗争的存在，但反对无产阶级代表了社会党的未来这一观点。他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工业社会的最好制度，但也指出这种社会制度的“脆弱性”和“自我毁灭”倾向。他批评萨特是个“伦理主义者”，主张从政治上思考问题，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对美苏关系、欧美关系和法德关系曾提出过一些远见卓识。他曾告诫过美国：“不能根据尊重人权的观念来制定一项外交政策”，否则会丢掉“西欧以外的一切盟友”。^① 作为一个有理性的政治学家，他提出，公民意识是维护民主的条件，即在民主法制下，公民应遵守纪律。

尼采曾预言，20世纪将是以前哲学名义进行大战的世纪，阿隆以他的大量著述参加了这场大战。他的论著涉及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在这些论著中不乏学者的睿智和政治家的敏锐，他思想缜密，知识渊博，是一个难得的政论家。当然，我们也同样看重他的直言不讳，作为一个传统自由派的代言人，他讲出了西方政治家想讲而不敢讲出来的看法。

^① 雷蒙·阿隆：《介入的旁观者》，朱利亚出版社，第297页。

为了保持完整和准确，我们全文照译。书中包含着明显的政治偏见和错误观点，特别反映在对待苏联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上。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时是能够鉴别的。

承译本书各章的译者为：刘燕清（第一、二、四章）、孟鞠如（第三、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五章）、沈雁南（第七、十二章）、马燕（第十三、十四章）、孙国琴（第十六、十七、十九章）、杨祖功（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章）、赵健（第十八、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章^①，结束语，作者书目提要）。由孟鞠如教授通校。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三联书店的戴文葆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的张契尼同志曾给予热情支持和协助。在此，仅表谢意。

1985年10月 北京

^① 此处的第二十八章为本版的第三十一章。——编者注

没有雷蒙·阿隆，世界将感到更孤独，而且更空虚。

——基辛格

《回忆录》是阿隆的宝贵遗产，它教育他们如何思考历史，如何思考政治，如何思考社会。于我而言，阿隆就是世上之盐。

——斯坦利·霍夫曼

阿隆的《回忆录》以极其瑰丽的方式，带领读者经历了一个个引人入胜的世界。他留下的这本著作提醒着我们一个至关重要的真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看清事实而斗争，纵然他们并不总是能够如愿以偿。

——《新共和》(New Republic)



Ouvrage publié dans le cadre du Programme d'Aide à la Publication
FU Lei de l'Ambassade de France en Chine



由法国驻华大使馆“傅雷图书资助出版计划”资助出版



甲骨文官方微信



定价：168.00 元（上、下）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a

SS号=14278808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上册

- 第一部 政治教育（1905 ~ 1939）
 - 第一章 父亲的遗嘱
 - 第二章 学习与友谊
 - 第三章 发现德国
 - 第四章 在拉丁区中心
 - 第五章 灰心丧气或幸灾乐祸……
 - 第六章 浩劫之路
- 第二部 政治愿望（1939 ~ 1955）
 - 第七章 战争
 - 第八章 没有抒情的幻想
 - 第九章 记者和活动家
 - 第十章 瓜分欧洲
 - 第十一章 20世纪的战争
 - 第十二章 “知识分子的鸦片”
- 第三部 祸患之中的教师（1955 ~ 1969）
 - 第十三章 返回古老的巴黎大学
 - 第十四章 阿尔及利亚的悲剧

下册

- 第十五章 工业社会
- 第十六章 将军的宏伟计划
- 第十七章 和平与战争
- 第十八章 “他没有理解我们”或1968年5月
- 第十九章 “自信与统治者”
- 第四部 当官的年代（1969 ~ 1977）
 - 第二十章 从皮埃尔·布里松到罗贝尔·埃尔桑
 - 第二十一章 后戴高乐主义
 - 第二十二章 论意识形态批判
 - 第二十三章 亨利·基辛格与美国霸权的终结

- 第二十四章 论历史评论
- 第二十五章 西方的衰落
- 第五部 死缓阶段 (1977 ~ 1982)
- 第二十六章 心肌梗死
- 第二十七章 在《快报》周刊
- 第二十八章 社会主义插曲
- 第二十九章 受到考验的人权：卡特总统和中东冲突
- 第三十章 走向苏联霸权主义？
- 第三十一章 一代人的结束

结束语

作者书目提要

索引

增订本译后絮语

译后记 (1992年版)

封底